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MAPPINGS

# 图绘

## 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美国]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著 陈丽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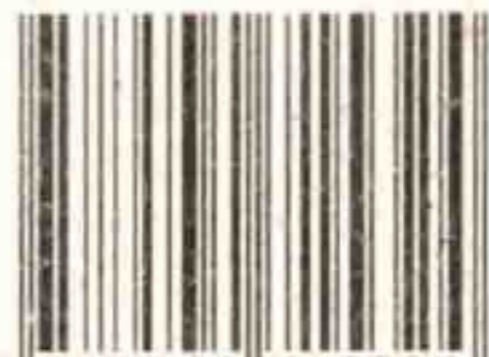
弗里德曼是女性主义、文化和叙事理论方面的权威，本书对以上三个领域都有着丰富且深刻的贡献……而与这个主题的其他著作不同，本书不但适合专家阅读，也适合普通读者。弗里德曼绝非学究式的学者，她的观点陈述总是清晰而有力。

——R.拉达克里希南，马萨诸塞大学教授

《图绘》从多条路径，强有力地介入到女性批评研究之中。它所描绘的图景，将有可能成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萌芽。它提出用全面的多元文化和地缘政治观点来定义女性主义，这极大地拓宽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边界，并突出强调了叙事作为一个意义产生过程的重要性。在探讨诸多主题的时候，弗里德曼撒下了一张大网，这张及时网思想深刻、切中要害，广大的读者都会从中受益。

——约瑟夫·A.布恩，南加州大学教授

ISBN 978-7-5447-1532-4



9 787544 715324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http://www.ppm.cn)

定价：49.00 元


HUMANITIES AND SOCIETY


# 图 绘

## 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Fusan Stanford Friedman*

[美国]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著 陈丽 译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绘: 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 (美) 弗里德曼 (Friedman, S. S.) 著; 陈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4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ISBN 978-7-5447-1532-4

I. ①图… II. ①弗… ②陈… III. ①妇女学-文化地理-研究 IV. ①C913.68  
②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1171号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by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Copyright © 1998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7-155号

书 名	图绘: 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作 者	[美国] 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
译 者	陈 丽
责任编辑	于伊莎
特约编辑	陶泽慧
原文出版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插 页	2
字 数	367千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32-4
定 价	4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致鲁思与乔安娜

我命令你们成为

优秀的长跑者

优雅前行

穿越黑暗

前往高地

我最亲爱的姑娘们

我的姑娘们

我珍视你们甚于自己

——露西尔·克利夫顿

## 致 谢

xi

《图绘》一书起源于一系列会议论文、大学讲座和学术文章。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论战之火在今天重新点燃,高校内爆发出激烈的辩论和冲突,讨论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未来。在这个战火重燃的论战背景下,作为一个对在高校内正在发生的热切辩论和冲突保持敏感触角的女性主义者,我感觉有责任写下这些文章。正如我在《图绘》一书中所分析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的概念一样,书籍也是文化共融的互动与刺激的产物。要想对所有帮助过《图绘》成书的个人、团体和机构给予充分和恰当感谢,就需要对我的职业和个人生活这两个相互重叠的领域做一个完全的图绘,而我目前不想做这个自传性的尝试。

然而,我必须向许多人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启发、灵感、质疑、批评和鼓励。爱德华·弗里德曼多年来一直是我最重要的老师,向我亲身示范了如何质疑所有层面的正统观念。从他高瞻远瞩的原创性和才华中,从他的学术勇气和刚正不阿中,从他对亚洲和社会理论的了解中,从他始终如一的尊重、爱意和陪伴中,我受益良多。我还要对以下几位表示深深的感谢: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感谢她的学术光华与友谊,还感谢她建议我写作本书;我的编辑,黛博拉·马尔慕德,感谢她在帮助我将此书塑造成形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睿智判断力;约瑟



夫·布恩和 R. 拉达克里希南,他们对我的草稿的机敏评阅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评论,还拓宽了我的研究背景;琳达·戈登、朱迪思·瓦尔泽·李维特和内莉·Y. 麦凯,感谢她们的友谊,她们的女性主义研究工作的榜样作用,以及我们在共处时的多次长距离散步和谈话;我的女性主义理论课上的许多研究生,尤其是道恩·基特利(她探讨内战前美国的空间与主体性的论文激发了我对空间定位的兴趣),托马斯·弗斯特(他探讨理论和女性写作的论文最早令我接触了女性主义“边界话语”),和拉斐尔·巴科利尼[她探讨 H.D. (希尔达·杜立特尔)的流动性和主体性的论文加深了我对后结构主义的理解,而且她很慷慨地介绍我接触多位欧洲女性主义者];我自 1975 年以来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过的女性研究课的本科生,尤其是那些以我的学术讲座为主修课的学生,感谢他们的大胆不羁和对严谨学习的热情;詹姆斯·菲兰,感谢他在拓宽叙事学研究上表现出的领导才能,也感谢他介绍我加入叙事文学研究协会;西蒙·吉甘迪和 R. 拉达克里希南,他们的研究工作和谈话最早将我更深地引入后殖民研究中;尼尔·L. 怀特海德,感谢他在杂合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感谢他引导我逐渐深入地了解人种学理论;我孜孜不倦的研究助手们,尤其是希瑟·海怀特和迪德尔丽·伊甘;在以下大学和机构里对构成本书的一些章节做出热烈回应的听众们:博洛尼亚大学、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迪尤肯大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密歇根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女性研究所、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犹他大学、劳伦斯大学、乌特勒支大学欧洲跨学科女性研究网、现代语言协会会议、叙事学会议、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文学科研究所、威斯康星大学国际性别研究圈、威斯康星大学文化多元主义研讨会、威斯康星大学边界研究小组和威斯康星大学的英语系与草稿组。至于我写作的时间保障,我特别感谢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威斯康星大学研究生院和威斯康星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提供的经费,而且,在人文学科研究所进行的跨人文学科的交流对我思想的发展尤其重要。

我还深切感谢相关机构,允许我以完全或修改后的形式在本书中重印以下的文章和章节:

“‘Beyond’ Gynocriticism and Gynesis: 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 and the Future of Feminist Criticism.”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5.1 (June 1996): 13—40. ©1996, the University of Tulsa.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Beyond White and Other: Relationality and Narratives of Race in Feminist Discourse.” *Signs* 21 (Autumn 1995): 1—49. ©199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Uncommon Readings: Seeking the Geopolitical Virginia Woolf.” *South Carolina Review* 29.1 (Fall 1996): 24—44. ©1996 Clemson University.

“Post/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t Criticism: The Politics of Recuperation and Negotiation.” *New Literary History* 22 (Spring 1991): 465—490. © by *New Literary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Making History: Reflections on Feminism, Narrative, and Desire.” *Feminism Besides Itself*. ed. Diane Elam and Robyn Wiegman. London: Routledge, 1995. 11—53. ©1995 by Routledge.

“Crav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Lyric in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Women’s Long Poems.” *Feminist Measures: Soundings in Poetry and Theory*. ed. Lynn Keller and Cristanne Mill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15—42. ©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4.

我还要同样感谢以下插图的版权所有:

Chip Kidd, for the cover design for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by Gish Je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 by Gish Jen.

## 目 录

致谢		001
引言	定位式女性主义	001
<b>第一部分</b>	<b>女性主义 / 多元文化主义</b>	<b>017</b>
第一章	“超越”性别： 新的身份地理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前景	019
第二章	“超越”肤色对立： 女性主义话语中的种族叙事	047
第三章	“超越”差异： 边境地带的迁移型女性主义	093
<b>第二部分</b>	<b>女性主义 / 全球主义</b>	<b>149</b>
第四章	地缘政治素养： 在“本土”将女性主义国际化 ——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例	151

第五章	讲述接触： 文学研究与人类学交界处的跨文化交往与叙事诗学	187
第六章	“路线 / 根源”： 边界、边境与身份的地缘政治叙事	213
第三部分	女性主义 / 后结构主义	253
第七章	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歧见： 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女性主义	255
第八章	创造历史： 关于女性主义、叙事与欲望的思考	281
第九章	渴望故事： 女性主义理论与诗学实践中的叙事与诗歌	325
注释		347
参考文献		400
索引		447

## 引言

# 定位式女性主义

你所绘制的是曾去之地的地图。但我们将去之地尚无地图。

——奥德莉·罗德,《访谈》

然而我们继续挣扎于各种身份认同之间,边界的挣扎仍是我们的现实。

——葛洛莉亚·安莎杜娃,《边境/荒界》

边界话语随处可见——不论该边界是字面意义的还是比喻意义的,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象征性的。如今,面对快速变化的文化形态和全球地貌,国家疆界和个人边界变得越来越容易逾越,艾德丽安·里奇等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所开启的“对女性沉默的描绘”已经演变为第三波女性主义的空间实践。边界在承认联系的同时强调分离,就像桥一样。桥表现了通过的可能性,也标示了分离的事实和必须跨越的距离。个人、性别、群体和国家间的边界在各种身份之间竖起了高墙。这种高墙既是概念性的,也是实际存在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某种想象的或真实的界线,身份简直难以想象。但边界也明确指出了间隙空间,即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交流的中间地带。边界强制实现了

沉默、沟通失败和错误认知。边界也鼓励越界、瓦解、调和与混杂。边界有保护作用,但同时也有限制作用。正如内斯托尔·加西亚·坎西利尼所云,“每条边界上都既有牢固的铁丝网,也有坍塌的铁丝网。”( *Hybrid Cultures* 260—261 )他所说的并非只是美国和墨西哥等国边界所架设的电网和界墙,还包括那些心理上的和象征意义上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无处不在,将全球的人们分割成各个想象出来的共同体。牢固的铁丝网也会坍塌,接着重修,接着又坍塌。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化的大环境里,女性主义已经越来越敏锐地意识到边界作为地位和处境的标志物的意义。女性主义早期强调沉默与隐身,如今转而关注定位——在不断形成和转化,并永远处于区分运动之中的公共空间内探讨身份认同的地缘政治。<sup>1</sup>

4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审视女性主义在文化理论领域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术和教学实践中与其他进步运动的交流情况,为女性主义勾画未来的发展路线。本书综合了过去二十年中不断演进的学术论争,绘制出女性主义理论与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后结构主义交锋互动的图景。本书探查了相互交叉的各种文化理论的成就与局限,强烈主张采取新的思维方式,以超越存在于我们与他们、白人与他者、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男性与女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固定性与流动性等之间的传统界线。本书跨越了学科界线,探讨具有政治爆炸性与紧迫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并具体提出了性别、人种、族群、阶级、性征、宗教和国别所蕴含的含义,因为这些定位差异的坐标轴构成了多元的身份认同,挑战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本书始终坚持认为,我们既要“超越”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也要“超越”绝对论式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因为,二者在提出本质主义的身份概念的同时,又拒绝与身份有关的任何文化交往。本书主张,在纯粹差异与解构主义的能指自由嬉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边界地带,应去寻求一种对话的立场。本书还认为,不论是某些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理论,还是后结构主义理论,都十

分热衷于探讨差异,然而,这种对差异的热切关注却忽视了在两种差异之间的边界地带,存在着种种共生、调合、互动的形态。女性主义与其他进步运动的未来,笔者认为,在于朝外转向,转而去拥抱矛盾、移位和变化。

在倡导对话沟通的同时,《图绘》一书也以论战的姿态提出,以往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多元化女性主义应该掉转方向,这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消除差异、普适性的女性主义虚假概念中,而是重新创造一种一元化的女性主义,这种女性主义能够包容全球范围内为数众多而且常常相互冲突的文化和政治形态。伊莱恩·马克斯和伊莎贝尔·德·科蒂弗农于1980年出版了经典文集《新法国女性主义》,宣告美国的女性主义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这种转向要求人们承认,在一个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存在着差异性(存在于国家间和国家内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与运动)。<sup>2</sup>女性主义的多元化迫使人们承认差异,否认某一种女性主义具有凌驾于其他女性主义之上的霸权。20世纪70年代末,在各国内部以及国际之间的各式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着多变和深刻的分歧,催生了这一转向。这种多元化政治有力地中止了一些人(尤其是白种的、异性恋的西方女性主义者)试图为一切人代言的倾向;这些人错误地认为,父权制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文化形态,全球的女性没有差异,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体都是同质的。这场多元化运动极大地发展了女性主义并使其多样化。笔者坚信,这场运动对于发展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化的、超越国界的女性主义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它的成功本身却凸显出,有必要发展一种新型的一元化女性主义,这种新型女性主义接受差异,但并不使其物化或异化。不同女性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界线,但与之同样确凿的是,这些边界必然也必须被跨越。它们并非固如磐石,而是随着文化形态、环境和联系的变化而改变。女性主义的生存与传播正是取决于这种流动性。

我所倡导的一元化的女性主义采取一种定位式认识论,这种认识

论并非建立在静态或抽象定义的基础上,而是认为,历史和地理特性的不断变化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理论、目标和政治实践。<sup>3</sup> 女性主义的定位式研究包含了多种多样的形态,因为它的定位分析需要一定的地缘政治素养,为了培养这种素养,就必须认识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产生了各不相同而且变动不居的社会性别体制,而这些社会性别体制与其他各不相同而且变动不居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运动交叉互动,以追求社会公正。定位式女性主义因而鼓励研究差异的各种表现形式,但同时又不仅限于此,它也不会去建构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去阻挡方兴未艾的跨文化交流与杂合的产生与可见性。

定位式女性主义还承认,女性主义在跨越多重边界和适应新环境之时,要付出舟车之劳与种种艰辛。借用爱德华·萨义德对“理论旅行”的论述,我们必须承认,女性主义很少是纯粹土生土长的,与文化本身一样,它是在与他者的跨文化互动中融合发展而来。借用萨义德的话,女性主义的迁移“从未畅通无阻”。“它的再现和制度化过程必定不同于它在原初之时。这样一来,有关理论与思想的移植、传递、循环和交流的论述就变得复杂起来。”(“Traveling” 226)定位式女性主义关注时间与空间的特异性,但与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不同的是,它并不褊狭地局限于某一种女性主义形态,它看到了异质性女性主义运动及其产生条件具有多样性,并以其为基本原则。《图绘》本身就是一个恰当例子,可以说明打破美式地方主义的意义,因为,一部作品,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还是非女性主义的,如果书中人物或该书作者的思想传统植根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它的影响就可以无处不在。

定位式女性主义需要一种地缘政治素养,这种素养承认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叉,本土文化与全球文化总是互为补充渗透。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英德帕·格鲁沃和凯瑞·卡普兰在界定“跨国女性主义”( *Scattered Hegemonies* 1—36 )这一术语时所提倡的东西,以及佳亚特



里·C. 斯皮瓦克用“跨国人文素养”（*Outside* 255—284）这一概念所倡导的内容。《图绘》认为，理解女性主义，需在全球语境下进行，既要联系历史又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涵括它在各地所呈现的各种形态以及这些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的，《图绘》也抵制某些过于简单化的全球化元叙事。其中一种叙事认为，女性在所有社会中都遭受同样的性别压迫。这种叙事虽然将女性主义国际化了，但它却将女性之间的联系完全建立在性别受害的基础上，从而压制了女性的能动性，忽视了文化的具体背景，妨碍了读者理解性别与身份的其他构成物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女性争取普遍权益的努力（我亦有此追求），6 不应该割裂女性与其具体环境之间的联系，从而认为她们遭受了千篇一律的性别压迫。

还有一个不足为训的元叙事，则将其全球化策略建立在第一世界 / 第三世界或西方 / 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大谈白人 / 西方人（总是已经）统治有色人种 / 非西方人这样一种单向霸权的故事。它对世界历史的讲述，无论是透过西方现代性的有色眼镜（殖民主义）还是西方后现代性的有色眼镜（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市场），这种叙事都陷入了它所谴责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优越论的泥潭。它掩盖了这一事实：时至今日，武力征服和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始终存在，而且，它不仅产生于西方，也产生于其他的诸多强权社会。它忽略了亚洲、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地区和亚太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崛起的主导文化与文明，包括目前有“世界亚洲化”之称的亚洲崛起现象（Edward Friedman, “Rise of China”）。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差不多所有社会（即便不是全部）中都存在的社会等级划分，这种社会不公将这些社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极大地复杂化了。更有甚者，它并没有考虑到个人和群体的历史能动性、跨文化交流与共生在一切文化形态中的作用，以及“西方”和“非西方”两者都是由混杂成分构成的这种异质特性。

在抵制过分简单化的普适主义和二元主义叙事的同时，《图绘》一

方面力主权力在全球范围内多向流动,一方面继续警惕西方特有的支配形式,并在两者之间艰难沟通。鉴于我本人的美国公民身份(美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种族主义结构)以及白人女性的立场,我在呼吁美国人拓展种族对话,打破白人/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压迫者/被压迫者这种主导思维模式之时,必须承认种族特权的实际效果,我发现这一点尤其具挑战性。我深信,一个具有广泛可比性的全球/定位式的女性主义能够改变我们对“本土”与“他乡”的分析,它从新的视角去考量本土状况,揭示出那些联接本土与他乡的结构,从而有助于打破一成不变的思维僵局。

笔者在《图绘》中提倡将女性主义置于全球背景中加以研究,这与斯皮瓦克为了将女性主义国际化而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这类二元划分方法进行诸多批判的目标一致。“我认为我们应当看到西方也存在个体差异,”她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说,“其实我不太赞同那些将接触双方均视为同质化的观点。”(*Post-Colonial Critic* 39)她坚持认为“跨国女性主义既非打着革命旗号的旅游观光,也非单纯地寻找证据。”(*Teaching Machine* 39)她担忧,如果我们将“美国的多元文化和多种族身份这一令人吃惊的建构”当作“全球性研究的基本原则,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279)。<sup>4</sup>相反,她建议,“关键在于在国内的、全球的、历史的以及当代的流散人群之间进行沟通。我们既要对西方进行人类学研究,又要研究非洲、亚洲、亚太和美洲的各种文化体系,将那些地方的居民看作具有历史能动性的主体”。(278)具有地缘政治意识的定位式女性主义,在思维上着眼于全球,从而避免用一种文化状况去生搬硬套另一种文化状况;它接受地方性的能动作用和观念化的产物,并持续地关注,这些差异是如何在形式多样、方向不一的全球交流体系内部通过互动而不断进行调整改变的。

自始至终,本书集中关注的只是高校内部的女性主义,而且笔者对此并不感到不妥。这样做的依据是,高等教育机构内部的知识工作

十分重要。通过研究、出版和教学来生产知识和传播知识,此举并非置身研究对象之外,故作中立之态去反思世界,它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并以这个世界为服务对象。高校生产、保存、收集、整理、传承新旧知识,并不断地对其加以重组——以供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去消费。高校的确有它遗世独立、自成一体的一面:例如,终身聘用制度(在施行之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终身受聘者的思想自由;大学校园(当其存在时)在某种程度上使学生在“回到”“现实世界”工作之前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和机会。<sup>5</sup>但是高校并非象牙塔。它对知识的关注绝不意味着它可以远离形形色色的人群,远离相互冲突的态度、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以及所有大型社会性机构都有的阶层划分。此外,作为培养一代新人的主要机构,高校的社会影响力不可低估。不论公众认为高校与“现实世界”如何脱节(高校传授的知识是神秘的,甚至是可笑的,常常是无用的;高校教授心思散漫,行为利他,工作太少而又特权过多;高校的价值观要么太精英化,要么太革命化;高校学生都热衷于参加各种派对),高等教育机构都是一个主要的社会参与者。高校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边界一直是可逾越的,在网络空间革命降临之际益发如此。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论战证明了,由高校主持或在高校内部展开的文化工作非常重要。时至今日,论战热度依然不减,因为收益颇高,非常高。而且,随着加速发展的知识革命迎来了信息时代,论战的热情会更加高昂。在这个信息时代中,无论何人,无论何物,谁掌控了知识并且渴求知识,谁就可能在权力的结构与运作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新千年的到来和工业时代的结束,无论此种说法让人感到多么陈腐,我仍认为它们很重要。无论在全球范围,还是在各国本土,人类社会正在快速穿越变化的门槛。就影响程度而言,这种变化足以媲美五百多年前活字印刷术的传播和航海技术大发展给全球带来的变化。当年,这两项革新作为主导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东西方经济体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思想、货物和人员交流的速度。<sup>6</sup>由计算机带来的虚拟、

8 真实和象征的知识地貌,引用奥德莉·罗德的话来说,“目前尚无地图”来描绘。和H.D.一样,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航行者,发现 / 未知领域, // 没有记载的地域; / 我们没有地图”。(*Trilogy* 59)在未来,知识会是怎样被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组织起来和传播开来,面对着这些范式转型,我们无地图可循。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各种知识工作者,包括高校中的人士,将会变得越来越关键。

因此,聚焦于学院派女性主义,正如我在《图绘》一书中所为,就是探索女性主义在解构和重构象征秩序及其实际影响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学院派女性主义是由高校体系内部的一种反对派话语发展而来。它一直认为,高校掌握着非常重要的规范性力量,塑造了人们乃至整个文化对于女性和社会性别体制的看法。另一方面,学院派女性主义同样认为,高校具有培养新知识的潜力,可以抵制各种意识形态的侵袭。因此,知识及其传播也就成为高校的女性主义者积极行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用武之地。和霍米·巴巴一样,笔者也完全抵制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这一对立经常把女性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主义教育者的“抽象”工作;另一种是“在社区”工作的女性主义者的积极行动,此处的“社区”是指诸如强奸危机救助中心、受虐女性庇护所、女性健康与堕胎门诊以及其他宣传性组织。巴巴在《理论的奉献》一章中呼吁,在“沟通而非否定”的基础上构建一种“交流政治”,“沟通相互矛盾、相互对抗的事物,开辟杂合场所,开发斗争目标,消除知识与其对象、理论与实践政治理性之间势不两立的状况”(*Location* 25)。作为知识、教育和积极行动的“杂合场所”,强奸危机救助中心等类似机构产生并传播知识;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与课堂教育参与可以产生实际影响的政治行动,改造和改良象征秩序和社会秩序。然而,作为女性主义的不同用武之地,社团组织与学术机构需要采取不同的运作模式。为了取得成功,知识工作必须保持开放态度,随时接受变化与挑战,尤其要抵制任何正统观念,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和其他进步实践的正统观念。在一定

程度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笔者才强调学院派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与争论是女性主义未来发展的肥沃土壤。

叙事,作为表意思维的一种多重性表现形式,始终是本书描绘女性主义论战态势之时的中心话题。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些论战以故事的形式呈现,表现了对立与和解的争斗情节,同时展示沟通的反复进行,编织出对话性的和性质不同的调查叙事线索。在另一层面上,如果没有叙事,身份事实上是无法想象的。人对自己的认识是通过讲述自己和他人的故事来进行的。作为变化不已的现象,身份本身即是人为建构的叙事,是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经历过发展、演变与革新的系列事件。第三,叙事文本——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影像的,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虚构的还是确有所指的,想象的还是历史的——构成了文化表达性的主要文献。叙事是面向文化的窗口,也是文化的镜子、建构者和征兆。文化叙事以故事的形式将社会秩序的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进行编码和加密,这就是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所谓“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之中暗含的“政治无意识”,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在《超越尽头的书写》中称之为“文化叙事”,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征等制度即是围绕这种文化叙事而建构的。文化叙事也讲述了群体和个体与霸权主义的叙事和历史进行商讨和对抗的战略计谋,这当中有互动,也有抵制。横扫高校的后现代转向让许多领域敏锐地意识到了语言(尤其是语言文本性)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叙事与之同等重要。《图绘》试图推进许多领域(包括女性研究)的学人去了解叙事。叙事诗学——对故事形式和功能的全方位研究——不仅为解读叙事提供了策略,还为阐释叙事自身在一切文化形态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sup>7</sup>

《图绘》围绕着有关交往的叙事来组织全书,各章之间形式独立但观念相联,规划相同,但主题不一而且互相交叉。然而,各章均可独立成篇,作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对女性主义理论作出其独特贡献。它们写于1989年至1997年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当时环境与时代的印记。<sup>8</sup>

交往这一比喻代替时间顺序，成为各章的组织原则。《图绘》沿着三条分析轴线，意在展示话语之间的越界与杂合。这三条轴线是：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性主义/全球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这么做遵循了巴巴所说的沟通的精神，斯皮瓦克称其为具有建设性的干扰和危机，而詹姆斯·克利福特、鲁斯·弗兰肯伯格、拉塔·马尼、诺玛·阿拉尔孔和卡玛拉·维斯韦沃兰等人则都曾以不同方式将它与结合主义联系起来。<sup>9</sup>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女性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完全有别于多元文化主义、地缘政治或后现代主义。我也不认为交往的双方只有差异。每一对名词之间的斜杠（/）表明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不同于拉康使用的“短线”：拉康在划分能指与所指之时，用它表示二者截然有别。）事实上，我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或者说，必须成为学院派女性主义内在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一种象征性补充，而是融入其基本预设之中。然而，我也坚持认为，女性主义与这三者并非完全对接。这四种话语各有其历史渊源、侧重方向、论争内容、内部分化、提问方式、知识基础、方法论和文化影响。甚至我用来指称各个话语的术语（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也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尽管这些话语互有重叠，但它们的知识目标和政治目标还是互有区别，套用斯皮瓦克的话，足以相互“干扰”。在采纳结合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我打算将女性主义与其他进步话语齐头并置，从而响应克利福特提出的观念：“研究结合现象的一种现代‘人种志’。”按照克利福特的说法，这门学问要不断地“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既关注本土又具有广泛的可比性”<sup>10</sup>（*Predicament 9*）。一元化定位式女性主义，以全球为背景，涵盖了具体环境的差异，在它创造性的成长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话语进行交往，本书通过考察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全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拟就描述这些交往的情状。

本书第一部分集中关注女性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交往，主要考

察内容是,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学术话语与建立在人种、族群和(或)性征基础上的学术话语,二者是如何使对方陷入创作危机的。在这一部分,整个三章的写作重心,一是对女性主义僵局的观察思考,二是提出突破僵局的尝试方法,构建一种理论框架,以“超越”那些陈陈相因而且经常无效的思维模式。玛丽·路易丝·费罗斯和谢瑞恩·拉扎克称这种思维模式为“差异僵局”(“Seeking Relations” 1051),这一术语反映的是,由于阶级、人种、族群、宗教、性征、国别等因素,女性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这样一来,以“女性”范畴为中心,将所有女性联合起来,统统纳入旗下,的确困难重重,虽说此举并非不可能,也并非不可取。《“超越”性别》(第一章)认为,应避免以性别为惟一分析范畴而罔顾其他,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身份的认识应发生重大转变,从发展型思维方式转变为地理型思维方式。我勾画了在过去二十年中演变而来的六种身份的立场范式——它们各不相同但互有交迭,将定位式女性主义理论化,并且提出,女性主义有必要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和实践继续存在下去(写于1994年至1995年、1997年)。《“超越”肤色对立》(第二章)指明并辨析了主导女性主义关于种族和性别叙事的三种套路,这三种套路陈陈相因而且二元对立(否认、控诉和忏悔的套路),主张进一步发展关联性这一话语,赋予它充分的灵活性,以处理那些构造了不同女性生活的多维权力关系(写于1992年至1995年)。《“超越”差异》(第三章)认为,美国女性主义的“差异话语”霸权压制了跨文化交流和交融杂合的实际效果,也压制了在此基础上的乌托邦式愿望。该章描绘了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和全球化研究中有关杂合性的各种模式和论战,深入解读了安莎杜娃的《边境/荒界》,认为它是涵括了纷繁见解之全景的神话诗学叙事(写于1997年)。

在第一部分中,我对超越一词的使用,有其特殊含义,我并不是说,应当放弃性别和差异等范畴,我主张的是,应当对它们加以补充。女性主义理论之所以陷入僵局,是它们的霸权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它们的存

在本身。笔者认为,学院派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突出强调,会继续发挥其政治重要性,对差异的考虑,也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笔者仍然认为,女性主义需要一块“超越”这些范畴的地带,以解释身份的矛盾性、流动性和复杂性。巴巴曾论述过文化研究中使用的“超越”这个比喻,正如他所说,“‘超越’领域既不是一个新领域,也不是过去的遗留因素……在‘超越’中,(会产生)一种迷向感、一种方向的混乱,‘超越’是一种探索性的、躁动不安的运动,这层意思非常精妙地体现在这个词的两个法语译文之中: au-delà——这儿那儿,各处, fort/da, 忽此忽彼、来来回回”。( *Location 1* )<sup>10</sup>

- 11 本书第二部分着手处理了近来女性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交往,这是后殖民研究、全球化研究和跨国研究的影响日益增长所导致。这部分探讨了地缘政治思考方式的内涵,即不仅思考“他乡”的他者,也思考全球环境如何影响我们对“本土”的思考。笔者认为,强调以人种、族群和国家为基础的集体从属关系,导致人们忽视了地理位置和空间迁移也是构成身份的特定成分,它们和这些想象的共同体通常密切联系,但并不同向延伸。“地缘政治素养”将空间思维理论化,拓宽了传统的地缘政治观念,而这种空间思维又可补充历时性所主宰的历史叙事。为了举例说明,本章还以异于常规的方式解读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一些熟悉段落,以此来证明,女性主义的国际化会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地方性事物和本国事物的固有认识(写于1996年、1997年)。《讲述接触》纵横于文学研究与人类学之间,审视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互动如何为故事添枝加叶。这一章倡导定位/空间思维,改变以往的一些叙事理论的做法,后者主要依据家庭罗曼史的情节,着眼于分析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欲望所造就的三角关系。《路线/根源》这一章的标题引自詹姆斯·克利福特的两个对立概念,其主要观点是,有关身份的叙事与叙事的自身身份,二者之间需要就维护差异(根源)和接受因跨越时空而导致的杂合性(路线),进行含蓄的对话商讨。



该章将朱莉·达什的黑人流散影片《大地的女儿》与任璧莲的移民小说《莫娜在希望之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来考察在身份的形成和表现过程中“根源”与“路线”在叙事方面的变化(写于1997年)。

本书的第三部分回顾了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交往,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主宰了人文学科旗下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活动领域,这一章还探讨了历史书写对于女性主义的意义。由于批评理论从法国跨越大西洋漂流到美国,以极为不同的形式在此生根发芽,该部分的三篇文章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为地缘政治互动的一个例子。它们是较早发表的,探讨后殖民研究、跨国研究和全球化研究对女性主义产生理论影响的文章,因而还可以充当一个文化转换和移植的例子。在描绘法国后结构主义和美国女性主义的杂合与冲突的同时,本部分还讲述了我本人对后结构主义的杂合性接受与抵制。这段叙事构成了前面几章的基础,也构成了我的现代主义研究的基础。<sup>11</sup> 为了避免照搬前人,我修改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许多方面,形成了我自认为是颇有成果的话语混合,来反映我对自己的定位:借鉴异域思想以重新思考地方问题的一位美国学院派女性主义者。

《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歧见》(第七章)的初稿完成于1989年12月,它追溯了高校先前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当时批评理论的霸权开始让位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贯穿文化研究之中,但二者又迥然有别,因为文化研究坚持回归历史,回归物质影响。那时候,我感受到一种突变,但未能完全预料到,在北美高校,(由英国移植而来的)文化研究竟会以惊人的速度取代后结构主义理论。《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歧见》考察了历史和“现实”对理论的回归,与此同时,它主张理论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理论化,融汇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和唯物论女性主义的真知灼见,重新引入诸如身份之类的概念。《创造历史》(第八章)首先论述的是,关于法国后结构主义引入美国女性主义话语这一段历史,各派女性主义说法不一。本章以此为例,说明女性研究的认识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

12

要遵循客观主义做法,搜寻有关女性和性别的所有被压制的真相;另一方面,采取建构主义的视角,认为一切真相都与产生和利用它们的主观因素有关。在呼吁两者相互沟通的同时,《创造历史》抵制了历史书写突出胜利者的倾向,并且确认,有必要以叙事形式创造“多元的”女性主义历史(写作于1994年至1995年)。后结构主义通常不信任长篇叙事,转而突出抒情短诗,以其为革命性话语,《渴望故事》(第九章)对此提出质疑,具体做法是,它将这些在法国首创的观点与20世纪末美国女性的长篇诗歌创作放在一起,进行比照。这一章以艾琳娜·柯蕾普费兹的《记账者》为范例去论证,在女性创作的长诗中,并没有显示出叙事与诗歌之间存在着敌对关系,它们反倒显示出这两种模式的协作沟通,说明女性既有书写历史的能力,又有书写神话的能力。

一至三部分中提到的交往,涉及多层次的跨界现象,在这些被跨越的边界当中,既有学科之间的,也有理论上的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尽管学院派女性主义需要保持其独特身份:一种异质性的社会理论和运动,但是,它也要开发出跨学科策略,以便与其他理论话语和学科进行杂合、融汇和交叉。《图绘》一书反映了笔者在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研究方面的立场,其阐释重点在于再现、文本性、叙事诗学,以及写作与阅读实践。本书反映了高校中日益增长的跨学科特性,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成果,尤其是人类学、地理学、电影和大众传媒研究、历史学以及心理分析等学科的成果。此外,本书的观点和方法论也包含了跨学科文化研究在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女性研究、美国黑人研究、族裔研究、后殖民研究、社会理论、后结构主义、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和全球化研究。借镜其他学科来透视女性主义者争论的问题,这样做的同时,我并没有局限于其他学科的女性主义作品;相反,我发现女性主义学术之外的种种理论框架有助于打破学院派女性主义内部的僵局。

然而,本书最大的理论灵感源泉还是叙事文本——影像文本、文

字文本、报告文本、历史文本、神话诗学文本等等。它们成了我的实验场地,我从中发现了新的思维途径,并对一些理论议题进行测试。《图绘》采取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有意地使用和平行比较各种叙事性材料,同时充分考虑各个材料的背景——盛期现代主义小说、畅销小说、流行电影和先锋电影、录像和戏剧、剪报、理论、诗歌、散文和辩论文章。大量的文本是作为补充材料在书中被一笔带过,还有一些被挑选出来,用于展开讨论和例示说明,这方面的文本有: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第一章);琼·乔丹的《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米拉·奈尔的《密西西比马萨拉》,和尼尔·乔丹的《哭泣的游戏》(第二章);玛丽亚·鲁冈的散文,安娜·德维阿·史密斯的《镜中火》和《日暮洛城1992》,以及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边境/荒界》(第三章);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和《一间自己的房间》,以及佐拉·尼尔·赫斯顿的《她们眼望苍天》(第四章);奈乐·拉森的《流沙》,简·里斯的《藻海无边》,以及 E.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第五章);朱莉·达什的《大地的女儿》和任璧莲的《莫娜在希望之乡》(第六章);克里斯蒂娜·霍夫·萨姆斯、琳达·戈登、乔安·斯科特、伊莱恩·肖沃尔特、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以及陶丽·莫依的作品(第八章);以及艾琳娜·柯蕾普费兹的《记账者》(第九章)。在力图尊重这些文本的丰富复杂性和无法调和的矛盾性的同时,我带着一种工具主义意图去使用这些文本,对此,我并不讳言:寻求它们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启示教导,它们对当代热门论战的潜在影响,以及它们的集体智慧和乐趣。它们讲述的故事很重要,而我们讲述的关于它们的故事亦很重要。



## 第一部分

### 女性主义 / 多元文化主义



# “超越”性别： 新的身份地理学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前景

在这本勾画女性主义态势之作的开端,我想先进行一次元批评尝试,对性别与身份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思考,思考我们曾经之处和将去之地,尤其当我们正跨越千禧年迈进 21 世纪之际。“我们”一词直接指称的是学院派女性主义者这一群体,她们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内部形色不一和见解分歧的女性主义。但是,这一词也暗中涵盖了为数更多的、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她们的知识目标和政治主张与学院派女性主义并行不悖而且互有交流。我也十分清楚,“我们”一词的麾下聚集的是见解不同的女性主义者,有的时候,它勉为其难地涵盖了几代不同的知识分子——从那些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成年的知识分子(如我本人),中间经过那些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崭露头角的知识分子,再到今天的研究生,后者必然要借助于前辈一脉传承下来的思想,但她们渴望推进和超越前人留下的问题、框架和范式。“我们”包括在读研究生和新晋的助理教授,对于过去 30 年间发生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所有转型,她们应当有所了解,与此同时,对于最新的知识前沿,她们十分渴望。“我们”还包括老一辈学者,她们经历过那些转型,

而且贡献颇多，她们必须更新自己，以便与时俱进，适应不断变化的学术态势。有的时候，那些疲惫不堪的人们——焦虑不安的研究生、精疲力竭的教授——似乎走投无路，但有的时候，文学研究的新地理又提供了永不消逝的地平线，让他们得以继续前行和发展。

正是本着“我们”是“多维”群体这种精神，我才提出，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未来在于超越性别，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承认并且强化那些业已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部分成因即是我所说的新的身份地理学。这样一个“超越”性别的运动，即便没有危险，也令人不安。毕竟，学院派女性主义所开启的突破就在于，它以性别为思想探索的合法框架。这个成就来之不易，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受到校内机构精简和外部抨击不断的困扰，其生存不断受到威胁，要么被一笔勾销，要么被边缘化。然而，超越性别这一焦点的转变已是不争事实，在理论和教学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新的立场、定位和空间——即地理学因素——所赋予身份的概念，催生了学院派女性主义的这种演变。

- 18 在描绘和进一步证实这一转变的同时，我将特别关注女性主义批评，并且暗中指出，学院派女性主义所涉及的其他领域也正在经历相似的变革。

在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突出强调性别，以之为文本分析的组织范畴的做法表现为两种形式：女性批评（gynocriticism）和女性本原批评（gynesis）的理论和实践。这两种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巨大，其定义则言人人殊。我在此援引伊莱恩·肖瓦尔特于1984年对它们所做的辨析：一、女性批评把女性作家当作一个独特的文学传统，对她们进行历史性的研究；二、女性本原批评，是她从艾丽斯·贾丁那里借鉴来的术语，它在理论上将女性本原解读为一种话语效果，去瓦解西方文化的主流叙事。<sup>1</sup> 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经常冲突，双方常常相互蔑视。然而，随着后结构主义在美国高校的传播，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逐渐和衷共济。<sup>2</sup> 不论它们是



各树一帜还是相互融合,女性批评与女性本原批评都强调性别差异,突出社会性别是身份的构成成分。对女性批评而言,不管父权制现在有什么变化,也不管它在历史上有什么变化,只要父权制存在,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女性作家纳入一个共同的传统,而这个共同传统的基础就是性别。对女性本原批评而言,语言内部根深蒂固的阳性/阴性区分观念——实际上是语言对性别二元对立的依赖——支撑着女性主义以各种方式去拆解主导叙事和话语。

学院派女性主义涉足的各个分支学科都突出强调社会性别。女性批评与女性本原批评与此类似,它们的深刻见解在高校内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但是,它们对社会性别的强调也产生了一定的盲目性,<sup>3</sup>使它们严重落后于身份理论与主体性理论前进的步伐。目前这两种理论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内方兴未艾,这些领域包括:女性主义本身、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研究、后结构主义、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文化研究、人类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和地理学。我在本章中的目的是要描绘这些进展,说明它们给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带来的挑战,指出目前与这些进展保持同步的各种新兴的女性主义批评形式,并且为女性主义提出预警:它面临着丧失其独特政治目标与能量的潜在危险。我最终想说明,超越性别并不意味着对它弃之不顾,而是以一种崭新的空间化方式向其回归,这种崭新的空间化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定位式女性主义。

## 身份地理学

我试图用“身份地理学”这一术语来暂时标明身份研究中的一块崭新的、快速变化的磁力场。这片跨学科的新领域所代表的是,一片有着共同关注内容和共同修辞用语的地带,它处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所谓的本质主义者与建构主义者、身份政治与联合政治之间的交界地带。文化的构成变化不已,如果想在勾画和重新勾画文化形态的过程

中给身份定位,那么,空间——空间性的修辞语言——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sup>4</sup>

这门新的地理学涉及一个转变:从利用有机主义、稳定中心、核心事物和整体性等说法进行自我寓言,转向一种空间化的身份变迁话语。身份地理学涉及从浪漫主义话语向后现代话语的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因为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隐喻而稍做停留。现代主义强调自我的分裂,强调零散化,这既是在回顾有机整体性话语,又是在展望空间化流变话语。<sup>5</sup>这种新的地理学并不将身份当作发展模式的个人目标,相反,它将身份看作一种充斥历史意识的地方、一种关系结构、一种定位、一种立场、一块地域、一个交叉点、一个网络、一个汇集了多重情境知识的交叉路口。它阐述的不是身份的有机展开,而是地域与边界的地图绘制,内部/外部或中心/边缘之间的对话地带,不同立场之间的交叉,以及动态交往的空间——“接触地带”、“中间立场”、边境、荒界。此外,这种地理学话语经常强调的并不是井然有序的线性增长运动,而是坚定立场的缺失匮乏,流动性的无尽变化,跨国流散人口的流动迁移,“全球族群景观”的互动融合或网络空间的无限循环。它多变的形象适应了加速变化的景观、信息高速路的技术以及迁移文化的全球化。<sup>6</sup>

这门新的地理学也并非静态空间——或领域,它表现出某种辩证法,反映出当今世界上围绕着身份问题而出现的各种相互对立的运动。一方面,那些更在意差异,更在意自己有别于他人的人群——不论这种差异是基于历史,还是基于生物学,或是两者兼有,他们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要么把它当做一种统治形式,要么把它当做一种抵抗形式。另一方面,人们又很务实地,或满怀乌托邦理想地,去寻找丰饶的边界地带,寻找间隙空间,不断变化与运动的场所,自我与他者融汇和杂合的场所。差异性与同一性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内在于身份一词的双重含义当中。身份是通过参照他人与自身之间的差异而建构出来的。例如,基于性别、种族或性征而认同于某一群体,此种行为主

要依靠的是划分“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系统,在这一系统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界定了某人归属的群体。相反,身份一词也暗示了同一性,如同 *identical* (同一的,同样的) 一词所显示的那样。身份(同一性)肯定了某种共性,一种共有的立场。<sup>7</sup> 差异对同一、静止对流动、肯定对质询、纯洁对杂混:身份的地理学游移于差异的边界和间隙的地带。

这种新型的身份地理学反映出这些方向不一的运动,它发出的不是一种声音,它常常相互矛盾。它派生出的比喻性说法,通行于文学研究内外的各个领域,尤其受到后殖民研究的影响。对后殖民研究而言,产生于空间运动的旅行、游牧、流散以及文化杂合等问题,具有物质现实性、政治紧迫性和语言修辞说服力。<sup>8</sup> 但是,这一套地理比喻的知识谱系,其核心内容则是过去 30 年来发展起来的各种身份话语和主体性话语,它们是 20 世纪末政治与文化变迁的产物。这些发展多由有色人种和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所开创,现在它们常常是北美高校内部冲突的中心,甚至在那些积极推动社会进步事业的人群当中,情况也不例外。有些人安身立命之本即在于,将身份理解为复杂的交叉与定位的产物。当反思自己在高等教育和高等院校中经常处于双重乃至三重边缘化状况时,这些人就成了先驱领袖。更广泛说来,相互交叠或并行不悖的学院派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等话语,在诸如文学研究和地理学这样迥然有别的学科之内,它们的杂合与冲突产生了构造身份的新方式,远远超出了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在此方面的成就。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为这个新型身份地理学的历史产生过程提供一个完整的谱系,也不是对它进行“厚描”。<sup>9</sup> 我亦无法完全揭示出它的复杂性和内涵。更确切地说来,我要描绘出这个新型立场地理学中六种相互关联但互不相同的身份话语。它们严重瓦解了或复杂化了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最初所提出的规划。这六个话语是:多重压迫话语、

多重主体立场话语、矛盾主体立场话语、关联性话语、情境性话语和杂合话语。作为文化形态,这些话语的顺次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高校内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和进步的社会运动。但它们并不代表女性主义话语的发展阶段。更确切地说,它们经常相互交迭、多样并存,尽管它们的发展过程不同,受到的思想影响不同。我尝试着对它们进行图解性表述,这不是为了给它们分门别类,而是为了勾勒一幅有用的轮廓图,从而指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策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如何陷入了理论的僵局。

本节要详尽阐述的第一个话语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女性主义从“多重压迫”或“双重危机”角度来描摹身份的修辞语言。<sup>10</sup>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它集中关注压迫,认为压迫是身份最主要的构成成分,进而补充列举了多种迫害形式,依据的是种族、阶级、宗教、性征、国别、健康状况以及现已成为套话的“等等”和“诸如此类”。有时候,这种话语表现出一种无休无止的否定态度,这明显体现在,它没完没了地罗列压迫因素,而且,它还暗中将痛苦程度进行了等级划分。但是,这种话语也形成了一种辩证分析方式,按照这种分析,多重压迫创造了它的对立面:围绕着差异而产生的多重阅历和力量。奥德莉·罗德在《年龄、种族、阶级和性别:女性重新定义差异》(1980)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理论概括。而在《查米:吾名之新拼写》中,为了提供一个更为详细的例证,罗德描绘了像她这样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女性(不断进取的女性,女同性恋者,西印度群岛移民后代的美国黑人,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却通过苦读勉强跻身中产阶级行列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阻碍,所遭受的种种排斥。多重压迫体制下的这些不利条件,都被她变成了创造性的力量源泉。由此便诞生了这本书的副书名,“自传神话”。她用这个词来表明,多重压迫促使作者在人生经历中进行对抗性的自我创造,将多重危机转变为多重力量。<sup>11</sup>总而言之,多重压迫话语坚定地认为,仅以性别来定义身份,容易让人忽视

其他形式的压迫,从而改写了那些压迫。

第二个立场话语是由多重压迫话语逐渐衍生而来,它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反映了向地理学话语转向的发展进程。我这里所指的身份概念,把身份当作多重主体立场的汇集地,在它看来,身份是人种、族群、阶级、性征、宗教、国别等各不相同而且经常互相冲突的文化形态共同交集的地方。<sup>12</sup> 根据这种范式,自我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的。它所占据的位置包含了多种立场在内,其中每一个立场均依赖于它与其他立场之间的互动来体现其独特性。与多重压迫概念一样,身份的构成成分来自一系列的概念范畴。但与多重危机概念不同的是,其定义的关键点,并不完全专注于压迫和迫害,而是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差异组合,这些差异组合可能与压迫相关,也可能与之无关。诸如“有色人种女性”、“白人女性”、“华裔美国女性”、“黑人女同性恋”、“中产阶级女性”或“第三世界女性”之类的概念,单拿出来,不足以界定一个比较复杂、具有多面性的身份。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帝国鼎盛时期的一位白人女性,以及英国女王的臣民。她不仅是中上阶级人士,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女同性恋倾向和女同伴侣的已婚女性。她是作家,但不是一位母亲。在青少年时期,她曾遭受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害。她的身份处在有权与无权等彼此各异的文化形态的交叉口。总而言之,多重立场话语滋养了一种对身份的互动分析,认为身份是相互依赖的各种他性系统的产物。

身份的第三个话语进一步地发展了多重主体立场的概念,将其理论化为矛盾主体立场。这一话语在 20 世纪 80 年代零星出现,在 90 年代逐渐流行。<sup>13</sup> 它将关注点集中在矛盾上,认为矛盾是主体性结构和身份的现象论经验的基础。这样,女性可以在遭受社会性别压迫的同时,也会享受到人种、阶级、宗教、性征或国别带来的特权。相反,男性可能因性别而享受特权,但因为性征、人种、阶级或宗教而受到压迫。例如,在奈乐·拉森的《流沙》中,主人公海尔戈·克兰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其

父母来自两个不同的种族：母亲是丹麦裔美国人而父亲是美国黑人。在美国境内的母系家族为她提供金钱（但并不与她接触），减缓了她的生活压力，帮助她受教育并获得资产阶级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使她无法融入芝加哥和哈莱姆的黑人下层阶级。但是，在白人社会，不论是对她友好的人还是对她怀有敌意的人，都认为海尔戈是黑人。她被美国的白人亲戚发配到哥本哈根，而那里的丹麦亲戚喜欢的却是她的异国情调。后来她被黑人资产阶级接纳，但前提却是，海尔戈要否定母亲为白人，而且还要压抑缺乏“家人”的痛苦。她的身份在人种、阶级、性别、国别和性征这些相互冲突的体系经历了种种矛盾，造成了一种病态的歇斯底里，这最终导致，她在美国南部腹地充任传统的母亲与牧师妻子角色时，深感压抑窒息。这些扑朔迷离的矛盾凸显出，按照不同的“他性”标准，强权与弱势之间是移步换形的，而且还暗示，全球的权力分配状况，仅以强权与弱势这两个固定的范畴不能涵括无遗。<sup>14</sup>

第四个立场话语，关联性话语，强调身份的认识论立场。即，它强调主体性不仅仅是多重的、矛盾的，而且是相关的。<sup>15</sup> 要理解身份的一个参照系，例如性别参照系，就必须联系起其他参照系，如性征和种族。这种相对新颖的话语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的关联性概念衍生而来。它认为身份是一种流变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变动不居的本质。身份取决于参照点。随着参照点发生游移，身份的外观也随之变化，尤其当身份与权力结构相关联时，就更是如此。人类学家鲁斯·贝哈阐释了这种关联性原则。她本人的家庭背景因素从多方面决定并贯穿了她在西班牙和古巴所从事的研究。对于自己的家族所经历的权力与特权的流变，她进行了反思。<sup>16</sup> 贝哈是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拉美裔女性。她出生在古巴，古巴革命之后，她随家人移居美国，当时她才五岁。她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长大。她的母系家族是德系犹太人（来自波兰），她的父系家族是西班牙系犹太人（来自土耳其）。因为1924年的《移民与排他法案》极大地限制了犹太人、东

欧人和其他非白种人的移民,因此他们无法进入北美的希望之乡。作为反犹太主义的难民,他们移民到了古巴。那时,古巴急切地欢迎犹太人和其他“白种”移民,力求“浅化”古巴人种的混合肤色,以此来保持古巴内部的种族等级体系,在这个等级体系中,古巴黑人处于最底层。贝哈解释说,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看来,犹太移民并非“白种人”,但在古巴,他们却因为皮肤相对“白”于黑人或混血古巴人而受到欢迎。作为犹太人,贝哈一家被美国拒之门外,但作为反共分子,他们在冷战期间最终被美国接纳。地缘政治的考量弥补了他们先前不够“白”的肤色。

犹太人中的族群、文化和阶级区分,让这种种族流动性变得更加复杂。贝哈的父系与母系家族之间的冲突体现了这一点。母亲这一方的德系犹太人“肤色较浅”,经济富裕,教育程度较高,来自更为“欧洲化”的丹麦。而父亲这一方的西班牙系犹太人则“肤色较深”,来自中东地区,教育程度低,享有的特权少。与这种权力差异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土耳其家族的历史记忆。她的土耳其祖先于1492年被西班牙驱逐出境,与西班牙文化有着悲喜交织的联系。维系这种联系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她的家族讲拉地诺语(土耳其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与西班牙语的混合语言)和唱西班牙老歌。贝哈的母系家族和父系家族在波兰和土耳其受到歧视,却能在古巴摆脱贫困,而且,更为“欧化”的母系一方远比源于中东的父系一方更为成功,尽管后者与西班牙文化有联系。虽说在德系犹太姻亲面前,她的父亲总有自惭形秽之感,但他念过夜校,当了会计,有经济能力雇佣一位古巴黑人家佣来煮饭和照料孩子。 23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网络内,贝哈展开了她的研究。为了一个研究项目,她再次前往一个西班牙村落,那里是她首次进行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地方,但这次她研究的却是,在纪念犹太人惨遭驱逐五百周年之际,农民对政府出台的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和解政策有何反应。多年以前,她没有向村民透露自己的犹太身份,她为此感到羞愧,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这次她也无法告诉别人,她的祖上是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为了另一个研究项目,她回到了哈瓦那,去讲述她家里的古巴黑人女佣的故事。贝哈写道,让她这位美国白种人类学家去讲述她家里的黑人女佣,这是一件“不知从何说起”的事情。作为一位拉美裔女性,贝哈曾将这位黑人女佣与祖国和祖国文化联系起来,但当她的家庭变为“白人”并成功地移居希望之乡后,她们却将她留在哈瓦纳。随着犹太流散故事与黑人流散故事逐渐相互渗透交集,贝哈的人类学思考开始进行自我反思,最终提出质疑,权力关系、社会范畴和族群从属性是否固定不变。阶级、人种、族群、宗教、国别和性别——所有这些因素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赋予某些人以特权而排斥另一些人。总而言之,立场的关联性话语强调,身份具有不断变化的性质,因为身份是由不同的参照点和历史的物质条件构筑而成的。

第五个立场话语是情境性话语。它体现了文学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向:文学研究越来越深地涉及后殖民、旅行和人种学的问题。和关联性话语一样,情境性研究方法认为,身份不是稳固的,但后者特别强调身份从一个环境流动到另一个环境的方式。<sup>17</sup>换言之,地理学的比喻并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它还是身份建构的核心内容。每一种情境都是表示出强势与弱势的不同参照系之间进行互动的舞台。某一情境可能会强调人的性别,而另一情境则可能突出他的种族,再换个情境则可能重视他的性征、宗教或者阶级。因此,尽管一个人的身份是多重主体立场的产物,但身份的这些参照系在各种情境下受到重视的程度并不相同。一旦场所改变,与身份最相关的建构成分就开始活跃起来。身份的其他参照系并不会消失,它们只不过在这个特定的场合内没有那么突出而已。一位白皮肤、中产阶级、信奉基督教、受丈夫虐待的女性,具有一个由种族、阶级、宗教和性别构成的多重主体立场。当她受到虐待的时候,被着重强调的是她的性别,而她身份的其他建构成分仍然隐现于结构背景内。梅丽莎·斯蒂尔引述了一位混血学生所说的话,这些话



说明,这个学生完全理解了上述的情境变化:“如果我妈妈今天早上用西班牙语冲我叫喊,我感觉自己是西班牙人;如果我昨晚出去听饶舌音乐,我觉得自己是个黑人。”(“New Colors” 47)

作为身份的一种情境标志,空间的重要性支撑起拉森作品《流沙》的叙事结构。海尔戈从南部黑人大学来到芝加哥,再到哈莱姆,随后到哥本哈根,又回到哈莱姆,并最终回到南部的“家”,这次回乡导致她的死亡。上述每一个地点强调的是她身份的一个不同方面,并依据她的位置变化,要么抬升她,要么限制她。更有甚者,在许多地理定位中,不同的场合强调了身份的不同元素。例如,在哈莱姆,她体验了阶级意识的脆弱性。一方面,她要依赖富有的黑人,这在他们的奢华晚会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另一方面,她跻身于有产阶级,混迹于街头和爵士俱乐部里的那些熙熙攘攘的下层黑人民众,既让她倾心,又让她反感。总而言之,情境性身份集中关注的是,在不同的场合,突出的是主体的不同方面。 24

立场身份的第六个话语,杂合话语,最直接地产生于种族、后殖民和流散研究。杂合这种比喻性说法所强调的,不是科学干预有机过程而产生的那种杂交,而是由地理移民产生的文化嫁接。相应的,这种身份理论常常大量使用于汤婷婷、萨尔曼·拉什迪和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等作家的叙事作品。她们都探讨过杂合状况,杂合状况成于于移民、流放或生存在边境——即安莎杜娃称之为“文化结合部”( *Borderlands ix* )的地方。作为一种身份话语,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比喻意义上,杂合经常依赖于跨越空间的移动,即从地球的某一地移居另一地。这种跨空间的迁移促成了跨越不同文化的运动,从而有效地将身份构筑为文化嫁接的产物。另外,杂合有时将身份塑造为在单一空间内的不同文化的重叠。这个单一空间常常被想象为边境地带、一个混杂与冲突的场所。“要想在边境地带生存下去,”安莎杜娃写道,“你必须心中没有畛域之分或者甘当十字路口的角色。”(195)在这两种情况下,身

份均不是“单纯的”、“正宗的”，而是一种异质性的混合物，产生于边境地带或差异的缝隙之中。这种嫁接经常表现为痛苦的分裂，左右摇摆的忠诚，或不知何去何从。有时，它会产生或者彰显为一种新生或再创造。此外，该话语经常游移于以下两种语言之间：一种语言哀叹，由于流散而失去了自身的源头或正统性；另一种语言则拥抱融合所带来的异质性和文化之间的转换。<sup>18</sup>正如我将在第三章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这些摇摆不定所暗含的暴力、矛盾、荒谬，甚至幽默，都明显地体现在安莎杜娃讲述美国后现代性的诗行中，字里行间不无讽刺意味：

生活在边境意味着

在罗宋汤里放点 chile (红番椒)，  
吃全麦 tortillas (墨西哥玉米饼)，  
带着布鲁克林口音说 Tex-Mex (美墨混合语)，  
在边境检查站上被 la migra (边境警察) 截住；

(194)

《女勇士》一书，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杂合文本。在该书中，汤婷婷把自己描述为成长于两种文化间隙中的美籍华裔女孩，她同时生活在中美不同的父权制之下，中美不同的家庭以及社团专制之下。起初，杂合的经历压制了汤婷婷萌生的身份意识，使之沉默。上小学时，她曾殴打另一位华裔女生强迫对方说话，之后她又卧病在床两年，这种惩罚来自她对自己双重身份的沉默。然而，她逐渐摆脱了沉默，开始言说，在中美故事之间进行沟通，开辟出联系的渠道。她改写了花木兰的故事（花木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汤婷婷笔下，她成为一位女侠，为了不忘家族仇恨，她将仇人的罪行刺在背上，最终达到了报仇雪恨的目的）；花木兰的英雄壮举成就了这位华裔作家的美国使命。她还自居为蔡文姬：中国古代女诗人，早年被匈奴人掳走，后来，这段俘虏经历造就

了她熔铸两种文化的诗篇。然而,这种融合来之不易,作者要对不同的身份、历史和定位进行痛苦的分裂、重叠和嫁接,此外,她还要回忆其间的种种经历。<sup>19</sup>

## 女性主义批评实践

所有上述六种身份话语——多重压迫、多重主体立场、矛盾主体立场、关联主体性、情境主体性和杂合——瓦解了传统形式的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后两者将一种差异——自然性别和 / 或社会性别——凌驾于其他所有差异之上。女性批评,顾名思义,在探讨作家之时,往往以性别为首要挑选原则。而上述六种身份话语则认为,性别不是决定身份的惟一因素,从而质疑了女性批评的研究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女性批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面临过这一挑战,当时它采取了多元化的应对办法,化身为多重女性批评,考查女性书写作品中的非裔美国、亚裔美国、奇卡娜、女同性恋、欧裔美国传统。<sup>20</sup> 这些新的女性批评的典型做法是,将性别与身份的另外某个构成因素结合起来,以便遴选作品和修治文学史。这种做法改变了女性批评原来只强调性别的状况。但不管怎样,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具有足够弹性的话语来适应更为复杂的主体性。女性批评,不论它如何更生再造,它都预设了性别为女性批评实践的基础,因此,它的步调与身份和主体性的定位式话语始终无法保持一致。

这门崭新的身份地理学,它对女性本原批评的挑战就更大了。它越来越让人去质疑女性本原批评的典型特征是否可信,即它对主体性提出的那种共时性的超历史论断——特别是女性本原批评中的精神分析和解构主义批评。我想,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酷儿理论中的述行性和表面性等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女性本原批评以往所凝聚的能量。<sup>21</sup> 将主体性比作述行性,这种讽喻手法经常可以接受如下

观念：身份的建构成分是流动变化的，特别是因为它突出的建构主义特征。一种“述行”可能与性别互动，另一种与阶级互动，还有一种可能与性征互动；这里的性别、阶级、性征都是表面性的东西。再者，述行性身份可能促使多重角色同时互动。然而，虽说女性本原批评在某些方面面向酷儿理论嬗变，但是，女性本原批评只关注性别而罔顾其他这一典型特征，使自己丧失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的阐释力量，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此外，述行一词所具有的比喻力量——以及它所暗示的意向性——弱化了扎根于文本中的历史因素和物质因素，而这两种因素是讲述立场方位的地理学言论处处坚持的。<sup>22</sup>

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学研究形势，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进行了自我调整，尽管如此，新的身份地理学还是对它们构成了严重挑战。尽管女性批评已经多元化，女性本原批评也显得更为兼收并蓄或更具述行性，但在太多时候，它们仍然需要将男性书写，西方人文主义，“已经就木的白人男性”或“父亲之法则”看作一个单一的背景，以其为参照，来解读女性发出的各种声音。尽管性别不再被刻意突出，不再是惟一的阅读过滤器，但是，性别差异仍被当做分类的基础。像这样一再强调性别的做法，未免僵化。在新的身份地理学看来，身份的其他构成成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对于相互依存的各种“他性”系统的互动分析，取代了专注于二元对立差异的做法。各种相互关联的和身处一定情境的主体，一直在各个场域的间隙中流动，已经现形的那些异质性成分总是能够证明，想象中的正统性并非固定不变。在接触地带、中间立场或全球族群景观之中发生的交融混杂，让标识彼此差异的、原本清晰的界线变得模糊不堪。

那么新的身份地理学培养了什么样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呢？一、女性主义批评从没有，也不应该，局限于有关身份和主体性的讨论。可是，既然这些问题对许多女性主义批评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新的身份地理学对于继续探讨女性作品的生产与接受以及性

别文本性究竟有何意义。二、由于新的身份地理学的影响,一心关注身份与主体性问题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在此要从元批评的角度来凸显这种变化,以便阐明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并且鼓励女性主义批评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前进。为了便于说明,我要概述一下叙事学研究中的三个不同关注焦点——作者、人物和内在的文化叙事——是如何根据新的身份地理学在被重新塑造的,而且是更为自觉地被重新塑造的。<sup>23</sup>

首先,作者。女性批评,即便是多元化的女性批评,其关注焦点总是集中在女性作者身上。仅仅以女性为其研究对象,不论是否具有自我反思性,这种决策必然将性别当作惟一的选择原则。后结构主义批判了那种以作者为作品表现性来源的批评方式,女性本原批评承袭了后结构主义的这种余绪,更加关注性别的文本效果,而不是作者的性别。但是,对于那些融合了女性批评与女性本原批评的女性主义评论家而言,其目的一直是,借用南茜·米勒的话,“在作品中去发现性别化的主体性的表现;在表述中找到其建构的印记。”(Subject 80)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如此强调作者的性别,结果遏制、压抑和边缘化了作者身份的其他方面。新的身份地理学认为,我们在分析女性作家的時候,应该依据社会环境的实际变化,而不是根据男性/女性或男性本原/女性本原之间的固定二元对立。这样一来,只关注女性性别的批评方式因失去说服力而丧失合法地位。相反,在探讨某位作家之时,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应当同时解读构成其身份的那些互动的、关联性的、情境性的成分。作家多重的和矛盾的主体立场需要加以解释说明,而杂合性的存在瓦解了女性批评以性别为惟一指针的倾向。 27

聚焦于作者的多元身份,不等于说,在解读叙事文本之时,要重新树立决定论式的作家生平与作家意图的霸权。不能把作者的认识论立场当作绝对的、直接的预测因子,以此来决定文本的定位式主体性。然而,作者与文本紧密相连,套用米勒的节肢动物比喻,就像蜘蛛与网那

样不可分离( *Subject 77—101* )。此外,在阐释叙事权威性的形成过程以及叙事权威性带来的种种问题之时,作者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考量因素。这样一来,如果从文本内部解读主体性,就需要追溯身处多重情境之下,置身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者与产品、作者与文本、书写者与叙事声音之间的间接联系。

为了更具体一些,我将分析四位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在文学批评领域所经历的变化,他们是: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劳伦斯和简·里斯。<sup>24</sup> (20世纪的文学研究十分重视现代主义运动,这几位现代主义者已成经典作家。我之所以选中他们,就是为了来驳斥那些认为新的身份地理学仅适用于非权威作家和运动的看法。)女性批评处理他们最为典型的方式是,强调乔伊斯和劳伦斯是男性作家,而伍尔夫和里斯是女性作家,并由此而泛泛地归纳出英国文学中的男性现代主义与女性现代主义。女性本原批评则会关注女性本原在他们的文本中是如何发挥话语作用的,以此来鼓励人们去分析,文本中的女性他者如何成为破坏性的踪迹、断裂或两难之境,从而撕裂了文本中所呈现的或建构的那个象征秩序的主导叙事。相形之下,新的身份地理学集中关注的则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而这正是性别差异话语所遮蔽的。在伍尔夫和里斯面前,乔伊斯是男性作家,他的文本肯定了父权制的特权,而伍尔夫和里斯都感觉自己因为性别原因而无缘于这种特权。但不同于英国女性伍尔夫,里斯是生长于多米尼加的殖民地属民,她父亲是威尔士人而母亲是克里奥尔人。她以生活在英国和欧洲文化边缘的海外居民的身份来从事写作。乔伊斯在这方面更像里斯而不是伍尔夫。他是爱尔兰殖民地的属民,在英语语言和文学研究传统的边缘写作,而这种文学传统正是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的典型代表——所颂扬的主导话语。乔伊斯去国离乡,长期居住在巴黎和苏黎世。他的殖民地属民定位与里斯的殖民地属民定位有着重大差别:在里斯的创作生涯中,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帝国权力统治下的

家乡。乔伊斯的流放者身份也有别于同样离开故土的他的一些家人或其他爱尔兰属民,后者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改变自己被殖民的地位。伍尔夫和劳伦斯均出生在英帝国特权的中心地带,但两人都(借用伍尔夫第一部小说的题目)“远航”而去,驶离了它的“文明”中心——劳伦斯的方法是借用和物化男性原始主义的形式,而伍尔夫则以性别为基础,断言家庭就是局外人的社会。 28

更为复杂的是,伍尔夫出身于英国社会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家庭,这就使得她在作品中发出的声音具有一种优越的阶级地位带来的权威和睿智,这与乔伊斯和里斯在作品中的声音截然不同:乔伊斯成长于急速没落的绅士家庭,而里斯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生活拮据,其生存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她出演一些小角色的收入,历任丈夫脆弱的阶级地位,或者情人的慷慨解囊。在性别的层面上,作为女性作家,伍尔夫不敢言说其女性欲望,正是因为男性中心主义欲望的严格审查,而劳伦斯却在小说和文章当中不时地提倡男性中心主义欲望。但在阶级层面上,劳伦斯的父亲是一位矿工,母亲是一位“下嫁”的中下阶层女性,因而他在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他对伍尔夫所属阶级的迷恋和自己被排斥在外的失落,以及他对工人阶级男性怀有的那种受压制的性向往。在性征方面,乔伊斯站在享有特权的异性恋者的立场上(不论与女性、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认同会令他多么兴奋),而里斯则站在受害他者的立场上去体验和书写异性恋欲望。然而,比起伍尔夫和劳伦斯,他们的异性恋立场却几无差异,因为,伍尔夫和劳伦斯两人都遮遮掩掩地处双性恋和同性恋欲望的边缘,只是程度不同。

多重主体性产生的环境错综复杂,我之所以刻意对其加以描绘,就是为了强调,像男性/女性或男性本原/女性本原这类二分法,不足以描述差异和身份的全貌。在某些方面,上述作家定位相同;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立场又不同。相对于其他作家,或者相对于他们在特权系统以及他性系统的不同立场(这些立场经常是矛盾的),每一位作家的定位

都不是固定的。从这种不断变化的认识论角度当中，产生了关联性的身份观念，它否认了女性批评常常建构的一个宏大叙事：女性现代主义与男性现代主义截然对立。它还否认了女性本原批评存在的基础：有关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各元叙事。

第二，人物。和作者一样，在叙事的时空中穿梭的人物，相对于其他人物，相对于不同的权力关系体系，他们的立场也是不一而足、变化多端的。与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不同的是，新的身份地理学鼓励对身份的不同构成成分进行互动的分析，不过分强调其中的任一成分。以里斯的《藻海无边》中的安托瓦内特为例——这是里斯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简·爱》中柏莎·梅森故事的改写。这部小说的场景先是在牙买加岛，接着转换到附近一个热带岛屿上的“蜜月房”，最后移到英格兰的桑菲尔德庄园。在种族、性别、阶级和殖民主义等因素交叉形成的等级制度中，安托瓦内特处在一个矛盾的主体立场上，她时而处于强势地位，时而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切取决于她所在的社会关系和具体情境。她出身于克里奥尔种植园主家庭，这个家庭剥削新近解放的奴隶的劳动，一直饱受经济和政治奴役的劳工为了报复揭竿而起，让这个孤立无助的家族大为恐慌。她的家族虽然有土地，却没有现钱，既受邻近乡绅的排斥，也遭到仍然没有土地的黑人的鄙视，这些黑人在公共领域里被剥夺了发言权，从而激化了他们的心理力量，诱发出恐白妄想症。由于母亲再婚，年轻的安托瓦内特终于成为遗产继承人，让一位英格兰来的绅士倾心于她，成为自己的丈夫，后者虽然具有绅士地位，但因为是地主的小儿子而没有财产继承权（待到兄长去世，他才能有钱有地）。罗彻斯特之所以诱惑安托瓦内特与他结婚，源于他自身相对的弱势地位：作为地主小儿子，他要听从父亲的嘱咐，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成就这桩婚姻的契机是，安托瓦内特拒绝嫁给她真正喜欢的人：她的混血堂兄桑迪。

相对于安托瓦内特而言，小说中的其他混血人物和黑人，均在白种



克里奥尔人享有特权的种族制度中受到迫害。但是,相对于罗彻斯特而言,安托瓦内特是充满异国情调的他者,她的力量来自热带风光和兼收并蓄的加勒比文化,而要遏制这种力量必须将她弄到英格兰去,在那里她沦落为疯子与囚徒。不论是在女性批评还是女性本原批评的框架内,安托瓦内特的性别都是身份构成的核心成分,但是,新的身份地理学除了性别之外还强调了种族、阶级、性征、国别的流动性互动。

第三,文化叙事。与作者和人物一样,贯穿于文本中的文化叙事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舞台,上面活跃着形色不一而且经常相互矛盾的新的身份地理学。从空间角度来看,文本广阔的历史语境所造就的文化叙事,纵向地存在于人物所处的横向叙事的时空中,这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为之。<sup>25</sup> 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主要聚焦于性别文化叙事,新的身份地理学则去寻找通行的主体性和他性话语留下的蛛丝马迹。评论者的任务是,放眼广阔的文化史和政治史,去解码这些话语,并按照语境来理解这些话语。评论者的第二项阐释任务(这个任务也许更为重要)是,这些文化叙事在文本中是如何相互商讨的,还有,它们问世之后,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化作用。例如,这些文化叙事在文本中是相互冲突、势不两立的,还是说它们在合作中彰显了各自的特色? 就整体而言,作者或文本突出了哪些文化叙事,又边缘化了哪些叙事? 它们的作用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对于这些文化叙事,不同的读者会依据不同的认识论立场而产生不同的解读吗?

以《尤利西斯》的《独眼巨人》一章中布卢姆与“市民”的冲突为例。在文本的横向时空当中——1904年6月16日下午约4点半——布卢姆在基尔南酒吧遇到一群爱尔兰爱国者,就在此时,他知道了自己的妻子摩莉正与布莱泽斯·博伊兰发生肌肤之亲。那些爱国者以辩护的口吻宣称,古代爱尔兰文化优于英帝国的文化。他们的民族主义忠诚启发布卢姆发表了两点论断:一、他也是爱尔兰人;二、他与世界各地的犹

30 太人一样，所受到的迫害和爱尔兰人一样多。一方面，他反对了他们将国家等同于种族的本质主义观点。在国家身份经常被等同于种族身份的历史关头，他力主“国家就是居住在同一地方的同一类人群”。有“市民”以嘲弄的口吻询问他的国籍，他的答复是：虽然自己是犹太人，但爱尔兰是他的国家——“我出生在爱尔兰这个地方。”（12：1422—1423）<sup>26</sup>另一方面，当“市民”吐出一只牡蛎壳，表示对他的轻蔑嘲笑时，布卢姆挑衅地亮出了自己作为犹太人所承受的压迫：“‘我还属于一个被仇视、受迫害的民族，’布卢姆说，‘现在也是这样。就在此刻。这一瞬间。’……‘被盗窃，’他说，‘被掠夺。受凌辱。被迫害。把根据正当权力属于我们的财产拿走。就在此刻，’他伸出拳头来说，‘还在摩洛哥当做奴隶或牲畜那么地被拍卖。’”（12：1467—1468）

面对变本加厉的嘲弄，布卢姆突然改变策略，抛弃各种本质化的民族主义——不论是爱尔兰的还是犹太人的，转而去提倡，消灭非正义现象，在爱的基础上生活：“爱，布卢姆说道。我是指恨的对立面。”（12：1485）尽管布卢姆有个别拥护者，但他的暂时离去却让一些爱国者发出反犹太主义的抱怨之言。他们误以为，布鲁姆过于吝啬，他刚从赛马中赢了钱，却舍不得请大家喝两杯。布卢姆一回来，那位醉醺醺的“市民”就冲他谩骂侮辱，反犹太主义色彩更为露骨，就连谩骂者的爱国同伴都感到尴尬。布卢姆一边带着（仿）英雄式的胜利姿态离开酒吧，一边捍卫犹太人的人性和神性：“门德尔松是犹太人，还有卡尔·马克思、梅尔卡丹特和斯宾诺莎。救世主是犹太人，他的父亲也是犹太人。还有你们的主。”（12：1804—1806）

就纵向而言，西方反犹太主义、英国人反爱尔兰的固定形象塑造、男性至上主义、异性恋至上主义和东方主义等多种文化叙事，在文本中交织在一起，变现为相互依存的话语。布卢姆申明自己的爱尔兰身份，诱发了人们颂扬对凯尔特人的男权主义想象。这种想象沿循传统，将女性的力量和能动性贬降为神化或妖魔化的他者。那位饮酒、吐口水、粗

声咒骂的市民,以讽刺的形式体现了现代人对古代荣光的重建。(乔伊斯笔下的这位市民,影射的是爱尔兰爱国者迈克尔·库萨克,此人力图在爱尔兰复兴古代凯尔特人的体育运动,并因此扬名。)一位爱国者根据固定形象的老套模式来看待布卢姆,说他是女性化的、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东方主义色彩的犹太人:“一张老迈、满是脂肪的脸蛋儿迎着那执行职务的枪口扬起来,嘿,只要系上一条保姆的围裙,他最适宜配上一把扫帚了……软瘫如一块湿抹布。”(12:1476—1480),这段话里面浓缩了多重文化叙事。布卢姆本身是男性,他经常用东方主义的话语对待女性,以大男子主义的姿态凌驾于女性之上,但现在,他自己却被爱国者给东方化和物化了,这一过程预示,在“刻尔吉”一章中,布鲁姆在夜街受到贝洛·科恩夫人奴役,成了一个被鸡奸的、野兽般的他者。

在“独眼巨人”这一章,布卢姆与“市民”的对抗开启了一系列文化叙事,对于这些文化叙事,小说中既有激进的批判,(在我看来)又有重新刻写:粗俗不堪、醉眼蒙眬的爱尔兰人;女性化的、同性恋倾向的、放高利贷的犹太人;阳痿的男同性恋者;化身为家庭主妇和护士的羞辱。文本之所以能够批判这些相互交叉的本质主义思想,原因在于,它呈现了自己要去颠覆的那些模式化形象。然而,伊里加蕾式的戏仿,不管它有多大的破坏力,都不会取代它所打破的霸权,因为,文本进行模仿,就必须(重新)激活它要揭露的文化叙事。在这些叙事当中,有哪些受到文本其余部分的质疑? 有哪些又被突出强调? 读者是站在怎样的认识论立场上阐释这些叙事? 各类读者心中的反犹太人、反爱尔兰人、厌恶或恐惧同性恋、或父权至上的成见,是被文本的戏仿消除了还是加强了? 随着文本在不同时空中呈现出新的生命力,它发挥了什么样的文化作用?

不论答案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没有足够的弹性来探索《尤利西斯》中多重交叉的文化叙事是如何相互沟通的。新的身份地理学质疑那种孤立地解读性别的方式,这类解读完全

不考虑以反犹太主义、同性恋至上主义以及爱尔兰的殖民化为基础的文化叙事。相反，新的身份地理学主张互动式解读，来显示这些文化叙事作为共生的、相互依存的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 女性主义和定位式批评

上文中提到，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一心关注孤立的性别与二元差异，而罔顾其他，如此一来，像我刚才描述的那种解读作者、人物和文化叙事的方式，在它们那里也就无从实现了，而这种解读方式，一直是女性主义者在叙事学研究和现代主义研究中着力培养的。尽管我已提出，我们必须超越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的阅读策略，但是，我还想总结一下本章标题中超越一词的问题，以及它对未来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意义。<sup>27</sup> 正如吴勇兴所说，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超越一词，经常暗指一种线性的变化模式，摆脱先前的形态或立场，认为它们不再发挥作用，或不再具有进步性。<sup>28</sup> 相反，我倒认为，时刻变化的批评实践是一个不断重写的过程，这是对历史进行空间化的隐喻：过往的事物仍然有一种共时的存在，不管它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它依然影响着新生事物。我们仍然有不可抗拒的（认识论的和政治的）理由去从事女性主义批评，这项批评工作扎根于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又受到新的身份地理学的修正。

首先，任何知识在它的产生过程中，都会突出某些概念，而压制另一些概念。套用保罗·德曼的名言，洞见必然连带着产生盲目。集中关注某一系列现象，必然会忽略其他现象。突出一种语境，就得遮蔽其他具有潜在启发性的语境。历史分期（如文艺复兴、维多利亚时期）、地理/国家实体（美国、中国、西部非洲）、文类（小说、戏剧）、运动或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历史上产生的群体身份（同性恋者、美国黑人、犹太人），诸如此类的文学研究范畴已经得到认可和传播，成为文学分析

和教学中的焦点。有鉴于此,性别也应当成为一种合理合法而且必不可少的范畴。女性批评在解读女性作家之时,往往从女性文学传统入手,从而揭示出她们作品中惯常出现的模式:母女关系,对婚姻情节的抵制,种族与性别共同造成的双重身份危机等等。如果我们单纯依据维多利亚小说、现代主义或哈莱姆文艺复兴等范畴,去解读女性作家,上述这些模式就不会凸显出来。女性本原批评认为,性别不同于主体性的其他构成成分,它致力于考察性别的语言过程和效果,凸显身体和欲望在塑造语言和被语言塑造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二元对立,这些问题在那些无视性别因素的诗学中便经常被忽视。 32

第二,我们不应忘记,认识论总是政治性的;知识总是某种情境的产物,它因时因地而产生。一味主张直接超越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这种做法有一定的风险。它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过于强调社会变革的阶段性和政治风险的社会变革。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得以安身立命的二元差异——男性/女性和男性本原/女性本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是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支撑着男性至上主义和父权制的各种文化形态。我并不认为这些文化形态是产生性别压迫的固定不变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无论它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无论它们适应什么样的特定历史时期,目前它们依然是一种有形的存在。那些从未对女性作家表示太多兴趣的评论者,无论他们是否为女性主义者,都会过于轻易地利用各种直接超越的倾向,以便证明,他们有理由冷眼看待女性的文本能动性。使用超越一词,有一定的风险,这是因为,它与一种退步的后女性主义话语暗通款曲,后者暗示,女性、女性群体或女性本原等范畴暗含的政治主张,已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后者还暗示,这些术语反映了一个天真的历史阶段,而现在我们已经跨越了这个阶段,步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时代。此外,超越一词也鼓励,用千变万化的批评理论和实践领域中不断涌现的最时新的“当红”范畴,去取代过时陈旧的性别范畴。我们必须去抵制

这些取代行为——不论它们是否反映了新事物的号召力，不论它们是退步的还是进步的，也不论它们是否迎合了种族、国别或酷儿等重要范畴的迫切需要。<sup>29</sup>

正是由于父权制的形态具有持续的物质现实性，而且还因为，催生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这些教学和学术规划仍然具有合法性和迫切性。目前不断出现的一些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依旧忽视女性作家的文化生产者地位，女性的存在不断地面临着被抹除和被挪用的威胁。只要女性作家和女性问题依旧受到边缘化或受到轻视，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话语就有继续存在的政治必要。不论是广义的女性研究，还是具体的女性主义批评，性别一直是它们关注的中心。女性主义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政治规划，联系松散，见解各异，只有一如既往地关注性别问题，才能确保它继续存在下去。从政治上说来，将女性主义与其他进步思想浑然融为一体，这类主张是不成熟的。这种举动容易削弱女性主义分析的效果，而且，这种操之过急的举动也会导致女性生活特性再次遭到忽视和遗忘。正如我在参加一个女性研究项目时所体会的那样，如果女性主义者在她们所从事的传统学科之外还拥有自己的一块阵地，从而让自己的活动在传统学科的内部得到认可，那么，她们最有可能促进传统学科的转型。换言之，整合常常需要分离状态的并存。具体到女性主义批评，这就意味着，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持续保持活力，不断壮大，这是综合分析身份的多重构成成分得以持续发展的前提。

第三，随着新的身份地理学风行文学研究领域，我们必须提出疑问，这也是玛丽·海伦·华盛顿所提的问题，“谁从这些变化中受益？”<sup>30</sup>多重立场话语是否有助于让那些边缘化的、遭受压迫的人群更多地参与进来？无论在高校内外，这些人的声音最难被人听见，他们产生的文化形态也最难被人看见，最难传播开来。强调身份的变动性质，究竟是提高了还是抑制了行动主义、联合政治和缔结联盟不可或缺的能量与

远见？霍米·巴巴赞颂杂合性，说它“总是能够提供力量”，桑吉塔·雷却对此多有批判。正如她所说，多重定位的话语会取代“在性别、性征、人种、族群、后殖民性和移民等问题上（实际存在）的多重脱节现象吗？”（“Rethinking Migrancy” 11, 13, 着重字体为笔者所加）雷激烈反对后殖民研究在分析民族主义之时表现出的忽略性别的倾向，并解读了一位女性作家的文本来支持她的观点：民族主义一直是一种性别化的话语（“Gender”）。

“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是属于女性主义的？”南茜·米勒问道。“如果我们不‘强调性别’的话，那一切不都变成文化研究了吗？”<sup>31</sup> 如果女性主义评论家不再强调女性和社会性别变革，转而支持一种泛泛的进步主义，那么我们还能相信，有谁可以挺身而出，去抵制那些在性别问题上造成倒退和导致反弹的历史力量呢？正是因为女性主义者是女性的代表，其输赢攸关全局，因此，她们才最有可能充当思想与行动的守护者，防止女性和性别再次被遮蔽、被轻视。如果连女性主义评论家都不肯极力主张使用性别范畴的话，谁还会这么做呢？

尽管上述认识论和政治的紧迫性足以说明，我们仍有必要继续突出性别的概念，但我坚信，有关身份与主体性的新理论——新的身份地理学为其中的翘楚——反映了我们这个后现代、跨国移民、融合化和网络空间化倾向日渐明显的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反过来又促使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做出重大调整，修正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早期实践，这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了与时俱进，它们需要更加灵活、更具弹性的批评实践，不再把自然性别或社会性别的差异当作一种先验的、固定不变的、根本性的或首要的预设，完全孤立地加以理解。女性主义者应当警惕，不能将男性作家或男性气质当做固定的陪衬，不能将它们当作概念上的他者，从而利用其静态性质来确认女性的多样化和差异。相反，未来的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规划应该质询这类预设想法，以慎重的态度去考虑性别与身份的其他构

成成分之间的互动。新的身份地理学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它迫切需要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发生改变，加盟其中。

呼吁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跨学科身份研究的新形势，这实际上就是在寻求一种更为自觉的定位式女性主义批评。在它的批评实践当中，灵活多变、注重关联和因地制宜的新型身份地理学所提出的种种主张，将应用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实际活动中。<sup>32</sup>与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一成不变的分析模式相反，定位式女性主义批评则要求，研究方法要随着知识生产和传播地点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能要问，我们的听众或阅读对象是谁，在我们发表言论或著书立说的特定时空，涉及到什么样的政治？对于我们在评论过程中所从事的文化工作，我们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我们的读者敌视或厌烦性别概念，我们就要强调，这是一个不可或缺、亡羊补牢的办法。相反，如果听众或读者已经认识到性别的重要性，或者她们只关注性别而罔顾其他，那我们就要强调，认识女性的身份或主体性，绝不能仅仅依靠性别。按照这种定位，分析性别与身份的多重成分之间的地理互动，是认识论和政治的迫切需要。

定位式女性主义批评不仅要注意批评活动的场合，还需敏锐地意识到，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应当讲究策略，对于身份的构成成分——性别，有时要刻意强调，有时要轻描淡写。正如朱迪思·巴特勒一语双关指出的，“身体很重要。”<sup>33</sup>关于身体的叙事或铭写也会凸显性别的差异，这就要求相对地突出性别因素，使之有别于身份的其他方面，以便详加审视——文学作品中常有类似情况出现，例如，伍尔夫在《往事小记》中记述了她哥哥总是用手指探触她的私处，另一个例子是，在 H.D. 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阿丝菲黛尔》中，当霍米奥娜对士兵的行进步伐产生心理抵触之时，为了捕捉她的心理联想活动，H.D. 试验着使用怀孕的符号话语。<sup>34</sup>然而，即便像这样偶尔突出性别，也不要淡化性别与其他社会分层体系之间的互动。在伍尔夫生活中出现的那种性骚扰（例



如它具有隐秘性和“文雅风度”),最终与性别在当时阶级制度之内的作用密不可分,那是英帝国鼎盛之际的维多利亚时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尤其是68—73)中,塞丝在奴隶丈夫的绝望注视下,遭到教师手下人的强奸和“挤奶”,那泌乳身体的性别标记与种族标记密不可分。甚至在文本描写女性身体惨遭蹂躏之际——此时性别当然占据突出的位置,定位式女性主义批评仍需关注性别与身份的其他构成成分之间的交叉关系。

总而言之,定位式女性主义批评的任务常常是相互矛盾的,需要不断地沟通协调以下的两种倾向:一是对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差异的关注,这是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个则是多面化的审视模式:性别仅是判断身份的标准之一。一方面,它必须保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强劲有力和与众不同的声音,在文学研究领域继续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它必须确保女性主义在新型的、更复杂的身份与主体性地理学的形成过程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这些新的地理学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正在多变的形势下逐渐形成。



# “超越”肤色对立： 女性主义话语中的种族叙事

1992年4月，洛杉矶的四名警察殴打一位名字叫罗德尼·金的黑人，法庭却判他们无罪，从而引发了一场暴乱。这一事件凸显出，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种与族群关系处于爆炸状态。一连几个月，电视台不断重播殴打场面的录像。录像画面捕捉了这一事件中“黑白”对立的双重含义。它形象地折射出多种二元对立：警察的“白肤色”与罗德尼·金的“黑肤色”，权势者的野蛮与弱势者遭受的迫害、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二元对立。欧裔美国人对黑人持有的种族偏见，由来已久，白人与黑人的二元对立在这段历史上时有表现。但是审判之后的暴乱——它也通过媒体不断地进入全民意识当中——却讲述了另外的故事，这些故事补充而不是替代了美国的黑人与白人的故事。

这些叙事不仅将黑人与白人对立起来，还将非裔、拉美裔、亚裔（尤其是韩裔）的美国移民相互对立起来。被骚乱人群从车上拖下来的人并不只有雷吉纳德·丹尼。比如，来自危地马拉的移民费德尔·洛佩兹就被一伙愤怒的暴徒抓住、殴打、浇上汽油并差一点放火点燃。后来被指控袭击丹尼的那两个男性黑人——达米雅·威廉姆斯和亨利·华生也在这伙暴徒之列。和丹尼一样，洛佩兹被几位勇敢的黑人救了下來

(Gross, “Body”)。尽管媒体倾向于强调黑人的暴力行为,但这些怒火中烧、四处抢劫的人却并不归属某个单一的文化群体。与1965年瓦兹起义的情况不同,在这一次暴乱中,亚裔、非裔、拉美裔和欧裔的移民店主面对的暴民形形色色。这些人因愤怒、怨恨和欲望而聚集在一起。这些情感是由多重政治因素决定的,有人种的、族群的、阶级的、性别的,还有移民的。在这些暴民当中,黑人与拉美移民尤其喜欢袭击韩裔店主,并将目标锁定在韩国城。这些人之所以成为替罪羊,乃是因为,韩裔美国移民被媒体塑造为“模范少数族裔”,是实现美国梦的新典范,他们的“成功”就是在暗中责怪,其他少数族裔之所以贫困依旧,正是由于自身的“失败”。更有甚者,在原本联系紧密的一些种族群体之间也出现裂隙,阶级和移民身份上的差异通常会使之进一步扩大——在墨西哥移民和中美洲移民之间,韩裔移民和其他亚裔移民之间,这种情况尤其明显。长期以来,支配美国种族主义意识的是黑人与白人的二元对立,也就是随笔作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评论员理查德·罗德里格斯所谓的种族“黑白棋盘”,但是,在无罪宣判之后的这场骚乱中,这种格局却从跨种族、跨文化角度被重新塑造(“Changing Faces” 14)。<sup>1</sup>

37 当然,这些跨族群、跨人种、跨文化冲突的叙事,并不说明,美国白人针对有色人种有系统的种族歧视已无足轻重。伊莱恩·吉姆(《家》)和刘大卫(《洛杉矶》)分析了洛杉矶事件期间韩裔美国人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正如他们所指出的,白人种族主义在制度和态度上的表现,对于媒体塑造韩裔移民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那些深陷重围的韩裔移民被媒体描绘成皮肤近乎白色的模范美国人,他们保卫自己的财产,以免受到野蛮的非裔和拉美裔美国移民的侵犯;另一方面,他们又给描绘成狠心的店主,应为其他美国人的贫困负责。媒体一心关注这次暴动中人种之间、族群之间以及族群内部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一种意识形态作用:阻碍人们意识到白人种族主义结构加剧了种族他者之间的冲突。美国各地的城市中心地带——在这些地方,

白人种族主义发挥主要作用——社会经济情况日益恶化,这已成为媒体塑造移民群体形象的关键背景:在一个日益两级分化的跨国经济中,他们与贫穷的美国黑人竞争越来越少的资源。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事件也急切地说明,还有一种解读方式的存在,它补充说明了,而不是取代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后果。随着我们迈入 21 世纪,迈向一个日益全球化、流动化和网络空间化的世界,这种对跨族群、跨人种、跨文化的冲突与联系的解读,主要关注美国人口构成变化的意义。(这里用的跨族群、跨人种和跨文化等词,并非仅指有色人种。如果仅用它们指有色人种,那就是在强化种族主义观念:白人或者欧裔美国人是一种“天然”身份而非社会建构而成。)<sup>2</sup> 在许多人看来,洛杉矶代表了“美国褐色化”的前沿阵地。“美国褐色化”一词含义暧昧,它令人联想起非黑人少数族裔的兴起,有色人种移民大量涌入美国,欧裔移民的人口比例下降,人种和族群杂居现象已成普遍,所有文化群体(以及群体内部的个人)彼此渗透或者说日渐趋同,以及“传统的黑白二元对立”的固定界限消于无形(Rodriguez, “Changing Faces” 14)。洛杉矶事件就像一则寓言,它暗示出,需要一种更复杂的话语去补充二元划分的种族范畴,这个话语既承认白人种族主义继续产生影响,同时又能跳出旧有窠臼,不仅仅分析白人分化和征服有色人种的策略。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超越善与恶、受害者与加害者等固定概念的语言,一种能超越黑白二元对立的话语,一种能够解释洛佩兹女儿的声明的语言——她说,她并不憎恨袭击她父亲的那些人,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愤怒。”(Gross, “Body”)<sup>3</sup>

随着人种和族群史无前例地成为教学、组织、会议和写作的关注中心,女性主义者要从洛杉矶的人口布局和动乱中学习很多东西。<sup>4</sup>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女性主义越来越需要应对种族主义问题:种族是身份的核心建构成分,它既是统治的基础,也是抵抗的基础。女性主义 38  
在分析性别和种族(以及身份的其他建构成分)的时候,将二者当作互

动的社会分层体系。这种分析方法已经广泛发展,与此同时进行的是,有关女性文化史特性多变的认识,正在快速扩展。然而,在种族主义问题面前,在从事有意义的跨种族互动方面,美国女性主义面临的困难更多。洛杉矶事件体现了二元性思维发生了动摇,这就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一些有创意的可能性,让她们更有效地思考和讨论种族这一棘手问题,并采取有效行动。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种族的界线》一书的引言中写道,“对于种族这一问题,无论是动笔论述,还是开口谈论,都要面临重重困难,哪怕我们怀着批评或自省的态度,也是如此,”对“那些非‘有色人种’”而言,尤其如此(2)。作为欧裔美国女性,我不可避免地受益于美国的种族分层体系,因此,我格外意识到,对我而言,讨论这些问题该有多么困难,因为这一过程会受到我自身立场的影响,也受到读者的不同立场的影响。在美国这个社会,“种族主义是美国人用以理解社会分化最明显的方式。”(Rodriguez, “Changing Faces” 14)在目前高校“为种族而种族”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白人学者讲授和论述种族问题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sup>5</sup>正如安·杜西勒谈到黑人女性时所指出的,白人学者在描写黑人女性(以及其他有色人种女性)时经常出现以下失误:要么没有将真正的黑人女性纳入讨论范围,要么只将黑人女性看做种族凝视的对象,而不是文化生产者。然而,假如因为我的白皮肤带给我种族特权,我就得在种族问题上保持沉默,这种看法我无法接受——不仅在美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种族问题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重要性。陷阱无处不在——我自身由于种族特权而产生的无知;其他人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强行审查、要么拒不聆听、要么一味谴责、要么退缩不前等等。然而,我请求你们听我说完。我本着对话的精神,去反思杜西勒针对那些视角不同和种族身份各异的人群而提出的所谓“互补性理论阐述”(“Occult of Black Womanhood” 624)——我相信,这是高校和女性主义运动得以成长和变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的种族和族群话语过多地陷入一些陈陈相因的文化叙事,这些文化叙事围绕着白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建构而成:受害者与加害者、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奴隶与主人、被统治者与统治者,“我们与他们”,“好人对坏人”。因此,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讨论常以失败告终,由此而产生受挫、愤怒、受伤、喊叫、沉默、退缩等消极情绪,并且让人深信,各方各派都不可能聆听对方的见解并互相学习。许多女性主义者都怀着良好的意愿,付出了种种努力,以打破这些陈陈相因的模式,但是,这个屡见不鲜的死结,即玛丽·路易丝·费罗斯和谢瑞恩·拉扎克所说的“差异僵局”(“Seeking Prelations” 1051),仍然经常出现。在种族等级制中,女性主义者的定位各不相同,种族和种族主义又是整个社会之内各种权力关系的产物。在多种决定因素的作用之下,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这些讨论,也就重现了她们以往在这个议题上表现出的无知、愤怒、愧疚和沉默,而未能有所超越。<sup>6</sup>

给人更多希望的是,有色人种女性之间尝试着沟通彼此的差异。她们开始审视两个边缘群体或更多边缘群体之间的关系,强调指出,对于美国的种族问题,需要持有更广阔的视角,不能仅仅视之为欧裔和非裔美国移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新举措开始富有成效地瓦解白人/他者以及白人/黑人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由于这些人结盟的基础在于,她们都与白人女性不同,因此,她们常常再次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即白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的对立,或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对立。人种和族群背景不同的非白人女性,她们在文化和历史方面具有巨大的差异,甚至出自同一人种和族群背景的女性之间也有此类差异,这使得她们之间的结盟非常困难,常常冲突丛生并且持续时间很短。<sup>7</sup>

在种族问题上,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群体暂时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是,愤怒、对话失败和退缩等消极情绪,还是如影随形,它们可能突然爆发,也可能慢慢地侵蚀女性主义教学、会议和组织的活力。种族主义在整个社会之内的存在当然削弱了许多女性主义者推动对话的努力。

但是,我们用以思考人种和族群问题的文化叙事,不仅反映了而且塑造了种族主义的物质现实。一般用来塑造这些叙事的二元思维结构,产生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语言和叙事的性质。在他看来,语言和叙事本性好斗,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基础是不断斗争的矛盾对立。<sup>8</sup>历史上产生的有关种族的话语形态,经常表现为叙事形式,它们或隐或显地贯穿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中,也贯穿于各种对立的价值观、文本及各类文化产物当中。有关种族的这些文化叙事从而既反映又塑造了种族政治。和《种族主义的剖析》的编者大卫·西奥·戈登堡一样,我认为种族主义思维不是固定的、“单一的和铁板一块的,或者简单地不同环境下均表现同一种态度的情结。”(xii)相反,我认为它是一套不固定的修辞和叙事形态,它产生于和对应于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并且发挥了建构作用。这样一来,理解那些支撑我们种族话语的叙事,就变得极端重要。为了取得突破,女性主义在反对种族主义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审视权力和特权,还要质询有关种族的文化叙事,这些文化叙事影响了我们的眼界、言谈、写作和行为。正如三好将夫所说,“话语与实践相互依存。实践紧跟话语,而话语由实践产生。”(“Borderless” 726)正如种族主义的实际后果会影响有关种族的思维模式一样,关于种族的语言一样重要,同样产生实际后果。

种族方面的二元思维模式常常增强阐释的力度,在确认某些支配系统方面尤其如此。看一看下面的例子,就知道这一点:罗德尼·金被殴事件以及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的《一位奴隶女孩生活中的事件》(1861)中反映出的“黑白”对立,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边境/荒界》(1987)中的“棕白”对立,莱斯利·马蒙·史尔戈的《讲故事的人》(1981)中的“红白”对立,以及小川乐的《欧巴桑》(1981)中的“黄白”对立。我既不想解构也不想置换这些二元对立的思维,但我的确认为,如果拒绝新的视角,这些二元对立就会走入死胡同,必须用我所说的关联性叙事来补充。在这种关联性叙事中,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对立斗争被



极大地复杂化了,就像在洛杉矶事件中一样。有许多故事是二元叙事容纳不了的,在它们面前,正统的二元叙事就会失去深刻的洞察力。最突出的情况是,二元叙事这种工具过于迟钝,无法捕捉矛盾主体立场的间隙性,也不能表现我所说的“新的身份地理学”中的变化、移动和迁徙的主体性。<sup>9</sup> 女性主义分析的身份,形成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的交叉点上,这就要求女性主义分析必须承认,特权和压迫通常不是绝对的概念,它们随着划分强势和弱势的标准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探索女性主义话语超越二元思维的方式,我将列举四个关于种族的文化叙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它们在争议不断并且受到多重制约的领域内流传:北美的女性主义的会议、课堂、宣言、团体、联盟、集会、游行、聚会、文章、文集和著作。前三种叙事——我称其为否认、控诉和忏悔叙事——发生在白人与他者的对抗性二元对立之中。尽管它们对一个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叙事,但是它们也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再次陷入死胡同。单凭自身的力量,它们无法跨越疆界,步入思想土壤肥沃的边境地带。第四种叙事形式——关联立场叙事——超越了二元思维。它出现的时间较晚,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前三种叙事的极力压制,但20世纪90年代后,它逐渐获得更多的关注。

我在此想呼吁读者尤其注意的是,关联立场叙事补充了而不是替代了否认、控诉和忏悔的叙事。我这么做是为了重新启动那已经停滞的,有关种族主义和种族互动的对话。为了鼓励自我反省和跨种族疆界的对话,我建议女性主义者也可以在校外寻找有关种族的文化叙事,这些叙事形成了超越白人与他者二元对立的话语——不仅在洛杉矶动乱的多层寓言中寻找,也在新闻媒体和电影等表现种族问题的流行文化文本中寻找。文化实践有时要比女性主义理论超前,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加以证明。我将探讨新闻媒体对于人种和族群问题的全球化论述,以及两部当代影片对关联性身份的虚构化探索——

它们是米拉·奈尔的《密西西比马萨拉》，和尼尔·乔丹的《哭泣的游戏》。尽管新闻和电影是大众文化商业化的和意识形态性质的机构，只是间接性的文化实践，但两者有时都会打破白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两者围绕种族问题发挥重要的文化作用，女性主义者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 否认、控诉和忏悔的文化叙事

有关种族问题的三种类型的女性主义叙事——否认、控诉和忏悔的文化叙事，一方面是历时性的文化形态，反映了创造它们的女性主义者的认识论立场以及它们兴起的历史条件。换言之，它们是多娜·哈罗威所说的“情境知识”，处在各种他性系统的交叉点上。<sup>10</sup>另一方面，它们还作为种族问题的理论框架共时性地发挥作用，标志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对这些叙事的“厚描”（呼应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能详细说明，它们作为种族分层地形中不同立场的反映，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如何布局的。然而，我拟在此处用不加遮掩的结构主义术语来分析这些叙事。我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固定的分类，而是将其用作一种战略图式，来处理目前在许多有关种族和种族主义的女性主义话语中典型存在的理论僵局。

否认型叙事主要出自白人女性，对她们而言，种族不是压迫的原因。否认型叙事肯定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它只关注性别，暗中否认种族的重要性。诸如《义重如山姐妹情》（1970）和《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女性》（1971）之类的文本，体现的是一种令人振奋的主张：以“女性”概念为最重要的多棱镜，透过它来洞察人类经验。这些叙事认为，在人类知识的结构与宝库中——即平常所说的象征秩序中，女性的生活一直遭到忽略、轻视抑或扭曲。如此说来，女性主义可以到处找到同盟军，她们立足于女性之间的共性，去反抗女性所在的父权制社会。这

种洞见所体现的,恰恰是一个盲点,因为她们没有看到,人种和族群范畴也应是判断身份的标准——我必须强调,作为女性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这种洞见最初是有贡献的并且持续发挥贡献。在定义女性的他者属性时,它否认了其他因素——例如人种、族群、阶级、性征、宗教、国别和年龄——也参与了“他者化”的形成过程。

这种框架背后的否认型叙事,反映了种族特权享用者发言立论主要依据的认识论立场。这类叙事形式不一,但其中隐含的一些叙事片段可暂且重构如下:“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所以我怎么可能是种族主义者呢?”“我受了压迫,所以我怎么可能是个压迫者呢?”“我的经历与你的一模一样。”“我们都是姐妹。”“向我敞开心扉,我肯定能理解你。”“你是女人还是黑人(犹太人、奇卡娜等等)?”“哪一个身份更让你痛苦,女性还是少数族裔人士?”“作为女性,我们都受过压迫。”这些话还暗含着一个未曾宣之于口的推论——其他的压迫都与女性主义无关。<sup>11</sup> 如此等等。

控诉型文化叙事主要出自信奉女性主义(有人更喜欢称之为妇女主义)的有色人种女性之手。她们被女性主义运动内外的种族主义边缘化。控诉型叙事产生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是对否认型叙事的对话性回应。这类叙事否认女性一词的普适性,它控诉白人女性主义者忽略、轻视或扭曲了“异类”女性的生活,这些女性之所以异于白人女性,是另外一些他者化形式造成的。这类控诉的出现,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进步,发轫者主要是有色人种女性、女同性恋和犹太女性。它们将女性主义理论与其他压迫制度联系起来,从而导致女性主义发生了重要的观念重组。就结构而言,它们与所有女性主义者针对男性提出的控诉并行不悖——但稍有不同。许多从事控诉型叙事的女性主义者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间隙空间——在种族上,与自己所在的文化群体中男性有关,但是,在性别上,又与他们有别;反之亦然,她们在性别上与其他女性主义者有关,但在种族上有与之有别。就学院派

女性主义而言,艾丽斯·沃克的《寻找母亲的花园》(1974)和《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1979),巴巴拉·史密斯的《走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1977),奥德莉·罗德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所写,后来收录在《姐妹外人》(1984)中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白人女性主义者压制女性之间差异的风潮。这种抨击是必须的,至今依然,它有助于以种族和族群身份为基础的各种女性主义的形成,并促成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结盟。控诉型叙事产生的重要后果有,它促成了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等概念,也促成了各种分析非白人女性之间共性的话语。

控诉型叙事反映出种族主义的物质和精神影响。它的核心信息可概括如下:“你是种族主义者。”“我和你不一样。”“你还没正视你的种族特权。”“我既是女人又是黑人(犹太人、奇卡娜、土著美国人等),在我看来,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没有区别。”“性别与种族和阶级无法切割。”“你永远也无法理解我的经历或观点。”“你正在压迫我,可你还没意识到。”“你漏掉了有色人种女性,还误以为你自己的经历与其他女性的经历相同。”“你不应该书写(讲授、谈论等等)有关有色人种女性的主题,因为我们有色人种女性必须要自我言说。”“你必须让有色人种女性进入你的课堂、书籍和文章中。”“你有责任自学与我们相关的东西;我们没有责任、时间、精力(等等)来教你。”“我不想浪费时间与你不交谈;我要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有色人种姐妹。”如此等等。

忏悔型叙事绝大多数出自白人女性之手。她们意识到自己享受到种族特权,或者说,她们认为享受这种特权绝非天经地义。忏悔型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是对控诉型叙事的回应。许多白人女性主义者认为,控诉型叙事的抨击不无道理,于是,她们迫不及待地加以接受,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即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女性主义者这一整体。<sup>12</sup>并非所有控诉都得到忏悔型回应。一些女性的回应方法是重新构造否认型叙事。然而,白人女

性主义者的愧疚故事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开始蔓延,表现形式不一而足,其中一些更具建设性。就积极方面而言,忏悔型叙事促使女性主义做出重大举措,重新调整论述方式,承认一些女性与其他压迫制度合谋,呼吁社会变革以应对各种异己性事物。<sup>13</sup> 不过,有的时候,像这样去凝视白人女性主义种族歧视这个美杜莎,带来的是瘫软无力、僵化的愧疚、永久的自责、捶胸顿足、绞手不安、急于忏悔——简言之,它所带来的愧疚表演,往往表现得过火,竟致喧宾夺主,反而把愧疚的对象重构为他者。还有些时候,这种愧疚会导致全盘接受“其他”女性——在学院派女性主义中,这就意味着一窝蜂地去容纳对方、罔顾其他,甚至变为对方,就像比迪·马丁和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曾经指出的那样(“Feminist Politics” 207)。一旦发展到极端,这种全盘接受往往导致有色人种女性的异化,使她们再次沦为白人女性主义一厢情愿去审视的他者。<sup>14</sup> 忏悔型叙事为控诉型叙事所催生,它对女性主义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它让白人女性将批判矛头指向了自身,指向了人种和族群的特权所编织的网络,而在此之前,她们对这个网络是习焉不察的。

虽然一些种族特权享有者的确想放弃历史赋予她们的权力,但其成功与否,很值得怀疑,忏悔型叙事反映出了她们所享有的种族特权。在这类叙事当中,有些话是人们所熟知的:“我是种族主义者。”“我很愧疚。”“我很愧疚,这让我无心他顾,只想着我的愧疚。”“女性主义是一场白人的、中产阶级的运动。”“整个西方文化都具有压迫性。”“白人肯定有什么糟糕的地方。”“我想帮助有色人种女性。”“我必须聆听有色人种女性的控诉而且不还嘴。”<sup>15</sup> “白人女性(总是)漏掉有色人种女性。”“我再也不会漏掉有色人种女性了。”“我希望有色人种女性喜欢我,肯定我,成为我的朋友。”“有色人种女性比我更正宗,比我更受压迫,比我更好,而且永远正确。”如此等等。

否认、控诉和忏悔这三种文化叙事,其发源地各有不同,这与种族之间社会权力分配不均有关。它们是女性主义运动中就人种和族群问

题所讲述的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组成部分,这么说未尝不可。也可以说它们属于一种元叙事。最简单地讲,这一元叙事的结构是:“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们都是女人,”白人女性主义者如是说。“你是种族主义者,你和我不一样,”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如是说。“你说的对,我是种族主义者,”白人女性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元叙事是触动所有女性主义种族话语的固定结构。这么说有简单化之嫌,因为它没有看到,这些文化叙事表现出许多细微差别。此外,这些叙事都一如既往地女性主义话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这种元叙事构建策略透露的是,白人与他者之间暗含着二元对立,而这种二元对立是在论述种族关系的受害模式中运行的。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多次,这就是我想说的。它本身代表了一条死胡同。它正妨碍了一个内涵更为宽广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的发展,后者的核心任务在于,消除种族主义,让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走向全球化。

44 无论是这种元叙事,还是这条死胡同,在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笔下都有明显体现。这是她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讲授美国有色人种女性课程时的一段经历。我在这里大幅引用她的文字,以便充分展示她叙事中存在的否认、控诉和忏悔的“声音”。<sup>16</sup>

一开始,班里爆发的是愤怒——有色人种女性的愤怒,白人的愤怒与愧疚,夹在两者之间的犹太女性的挫折感与复杂情绪……以及我不得不在她们中间进行调停而感受的愤怒与挫折(注意这里的否认与控诉型叙事)。很快,我的身体成了承受这些紧张与愤怒的载体,我害怕去上课。我的一些学生也害怕去上课。但渐渐地,有色人种女性变得更为果敢,直面白人,认为后者应该对那些不为人知的、“隐蔽的”、长期存在的压迫方式负责(控诉)……每当白人或犹太女性试图转移焦点,不再专注有色人种女性的感受,而一心表达自身的情感:困惑、无助、愤怒、愧疚、恐惧变化、恐惧其

他不安全因素(忏悔),这时,有色人种女性一次又一次地将焦点重新拉回到有色人种女性身上(控拆)。当几位白人女性在课堂上站出来,要么客气地请求、乞求,要么激动地要求(有一个人还泪流满面)有色人种女性有所指教,当白人女性试图与有色人种女性进行长时间的对话时(忏悔),那些有色人种女性表现出一种厌倦感:她们几百年来一直就种族主义问题教导白人。她们以雄辩的语言表示,与白人结盟是件可疑的事情,而在此时,大多数白人女性却需要有色人种女性的肯定、接受和认可(控诉)……问题在于,尽管白人女性和白种犹太女性似乎在倾听,她们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听到”有色人种女性,从而无法理解这是一个专论有色人种女性的课堂与空间(否认与控诉)。正如一位有色人种学生所写的,“我认为,对我而言最困难的事是必须得理解,班上的那些白人学生……(无法)理解我们的生活经历”(控诉)。尽管学到了许多重要的知识,但这种不能聆听的情况,再加上困惑、愤怒以及对合作的怀疑,几乎让我们一班人四分五裂(死胡同)。( *Making Face xx* )

安莎杜娃的这段文字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她毫不隐晦地揭示了她课堂上艰难的种族互动。这些否认、控诉和忏悔交织在一起,在教学过程中产生了挫折感、愤怒感、愧疚感和交流不畅,无疑使我们更深刻地意识到种族间的裂隙。但我认为,尽管这些叙事具有教育意义,而且不可避免,这是人种和族群立场不同造成的,在课堂上明显表现出来,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差异僵局”,即许多女性主义者在讨论种族与种族主义问题时遭遇的阻力和死胡同——理由如下。

一、这些文化叙事不断创造出新的版本,其中白人仍然处于中心地位,是定义的核心,与其相对的他者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因此,这些文化叙事重新铭写了它们原本要替代的那种模式。

二、它们要求将白人(或西方)建构为一个铁板一块的、一成不变

的范畴，希望这一范畴甚至能在人种和族群的层面抹平白人之间巨大的文化与历史的差异，但是白人之间的暴力恰恰凸显了这些差异——看看英爱冲突；德法冲突；波斯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冲突；欧洲人与犹太人或吉普赛人的冲突，即可知晓这一点。而且在欧洲，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一直被当作替罪羊种族，而非替罪羊民族。在 20 世纪的欧洲，除了大屠杀和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民族暴力（因国别而产生的种族观从中推波助澜），两次世界大战本身就足以质疑将白人与西方看作铁板一块的做法。<sup>17</sup>

三、这些叙事版本中暗含的白人/他者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就有民族中心主义的倾向，缺乏全球化的视角。它没有说明种族他者化的进程如何成为全球现象，而不仅仅是高加索人或西方在对付有色人种时的产品（详见下文分析）。

四、这类叙事版本不利于形成新的叙事版本，以探讨不同他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的黑人女性与亚裔女性之间的关系、韩国女性与日本女性之间的关系、古巴裔美国女性与非裔美国女性之间的关系、印度的印度教女性与穆斯林女性之间的关系、卢旺达的胡图族女性与图西族女性之间的关系。从白人或西方种族主义角度，不能解释所有非白人或非西方女性之间的疆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种族主义”一词总是被想当然地暗含了一个修饰词“白人的”。一说到种族主义，就想起白人，这种建构反映了白人种族主义在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建构依赖的是生物学上的区分，而且，它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往往掩盖了其他类型的种族主义（不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这类种族主义都是存在的）。

五、这些文化叙事常常建立在一种误导性的人种和族群纯洁性观念的基础上，这种观念否认全球范围内生物与文化的不断杂交融合的现象。人群与文化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划分到以人种和族群为基础的固定范畴中。这种纯洁性主张常常建立在“纯粹”与“不纯粹”二元对立



的基础上,在这种对立中杂合就是一种污染。正如安莎杜娃在《和谐》一文中指出的,“种族纯洁性,和语言的纯洁性一样,都属谬误。”(146)她专门抨击了奇卡娜/诺的行为:他们“拒绝接受那些姐妹,只是因为她们出于某种原因不能被‘认证’为百分之百纯种——仿佛这种人果真存在一样”(146)。种族主义思维的一个支柱是,人群与文化确实占据了种族纯洁性的空间,而且必须用他们来占据。安莎杜娃颇有预见地呼吁建立“新美斯提莎意识”,她将自己所处的间隙空间塑造为一个令人恐惧不安但最有回报的边界地带,足以超越纯粹主义的身份政治僵局(*Borderlands* 尤其是 77—98)。<sup>18</sup>

六、这些取缔白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暗中却突出了人种和族群因素,以其为最重要的压迫概念,统领所有其他的他性系统,这样一来,这些文化叙事重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女性主义者所力图实现的概念霸权(前者以阶级为首要概念,后者以性别为首要概念),也重复了他们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这三套说辞在某些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但它们实际上妨碍了人们去分析,在构筑身份和体验压迫的过程中,不同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如何相互交叉的。尤其是,它们压制了人们正确理解相互矛盾的主体立场。<sup>19</sup>它们也无法解释,在某一位既隶属于主导文化,同时又隶属于边缘文化的女性的身上,例如,在往返于伦敦和加尔各答之间的一位肤色相对较黑的婆罗门女性的身上,特权身份与他性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作为婆罗门,她是印度种姓等级制度中的特权人物;作为女性,她又遭受压迫。她经常出门旅行,这说明她属于富裕阶层。但是,在英国人眼里她是黑人,她会因为自己穿梭于两个大陆之间而具备的后殖民身份感到困惑。作为一名肤色较黑的女性,她在印度看重肤色的环境和英国的种族主义环境中受到不同的歧视对待。“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这类概念不足以解释她在不同的权力关系结构的交叉点上的立场。

最后,这些二元性的说辞几乎掩盖了位置对立的“白人”女性和

“有色人种”女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共同之处。有时，一味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不利于女性主义概念本身，这样做不仅抹煞了全世界共同努力改善女性地位的观念，也否认了多重女性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即使在多元环境下，女性主义所仰仗的前提依然是：性别与其他范畴同为社会等级制度的构成元素，共同发挥作用。我从未主张我们不再认可差异，不再把差异视为女性主义的必要成分和力量源泉。但是，在确认女性之间差异的同时，作为补充，也应探索女性之间的共同之处，无论这种共同性在物质上表现出多么大的差异。例如，在美国，一位被黑人男性强奸的白人女性和一位被白人男性强奸的黑人女性有着同样的被强奸经历，她们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了解的东西，例如，强奸带来的心理上的、性方面的、家庭的和法律上的后果。但是黑人与白人之间跨种族强奸的不同历史以及黑人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影响了这两位女性的共同经历，这样一来，她们在有共同性之外还有差异。要想理解这种差异，首先需要将强奸看作女性共同面对的性别问题。<sup>20</sup>

“（我们与她们之间的）共同立场，” S.P. 莫安提在批判文化相对论时写道，“帮助我们确定差异，理解其最深层次的回响可能源自何处。”（21）在他看来，“简单地承认跨文化差异，”只能导致“一种情感上的善举，因为，在它的逻辑中，没有任何东西必然使我们关注对方”（23）。我们与她们之间最主要的共同之处，他认为，始于认定对方具有能动性。按照他的定义，能动性就是，“人类社会中的所有‘人’和‘文化’在原则上所拥有的理解和评价人类行动的能力，它根据人类的行动对人类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意义，去理解和评价人类行动。”（23）白人与他者这种二元对立不赞成寻找这类共同之处，它往往否认对方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全世界的女性有很多共同之处，”王家湘如是说道，她是北京的一位女性研究的活跃分子和教师，在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上，她是一位活跃代表（Crossette, “Women’s Advocates”）。鉴于多

重支配体系将女性分隔开来,寻找共同性往往显得乌托邦般不切实际。这种对结盟的渴望代表了乐享差异和跨差异联系的欲望,这种对差异的欣悦之情并非是压迫性的,而是茁壮成长于挫败了他性的病态状况的亲密空间内。<sup>21</sup> 这种欲望强调了在安莎杜娃的《边境 / 荒界》中作为愈合形式存在的那种能动性:“但是仅是站在对岸、大声疾呼问题、挑战父权制的白人传统是不够的。对立的姿态使我们囿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决斗、囿于你死我活的战斗,如同警察与罪犯之间的那种,双方都被简化为暴力的代表。这种对立姿态朝着从文化统治中解放出来迈进了一步。但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我们前往新意识的某一点上,我们将不得不离开对岸,两个殊死较量的战斗者的分裂以某种方式愈合,这样我们能同时站在两岸。”(78)<sup>22</sup> 47

## 关联立场的文化叙事

“关联立场”是我的命名(因为尚无更好的名称),这种文化叙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于女性主义理论话语中,脱胎自有关人种、族群和种族主义的控诉与忏悔型叙事。这种文化叙事的生产者有男有女,来自不同的人种和族群。他们认为身份依据不同的情境得以建构和定义,并且身份坐落在各种不同的他性系统和社会分层体系的交叉点上。控诉型和忏悔型叙事给女性主义话语带来了重大进步,关联立场叙事便是建立在这些进步的基础上,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对多重压迫和相互交叉的压迫体系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由有色人种女性最先倡导;二是关注定位、关系结构和立场的新话语。它还扎根于女性主义的客体关系理论,这一理论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心理分析,强调身份的认同,尤其是女性身份的认同,如何依据自我对他者的欲望,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割裂,而逐渐形成。此外,关联立场叙事还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身份批评和主体模式的影响,强调语言建构的身份具有非一元

性、不确定性、流浪性和杂合性。<sup>23</sup>

但关联立场的文化叙事超越了上述这些理论基础,抵制并消解了白人/他者二元对立的固定性。关联立场叙事解构了“殖民主义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霍米·巴巴语),这一特征指的是“在对他者进行意识形态建构时过于依赖‘固定性’的概念”(“Other Question” 18)。在关联立场叙事的框架内,身份总是取决于所选取的参照点,随着变化的大环境而改变。身份既非本质内核,也非绝对之物,它是流动的场所。观察点不同,对其形成和运作的诠释也会不同。例如,相对于白人而言,莱斯利·马蒙·史尔戈和宝拉·戈娜·艾伦是只有部分白人血统的有色人种女性、土著美国人。相对于有色人种女性而言,她们是土著美国人。相对于土著美国人而言,她们是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相对于对方而言,她俩是以迥然有别的方式描绘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的文化特征的两个个体。关联立场叙事构建了一个多重的、流动的身份,其定义和运作因环境而改变。这种叙事超越了静态立场的女性主义话语,后者常常被(再次)挪用为控诉和忏悔的叙事。

- 48 情境身份的流动性也暗示了疆界是可以逾越的。这种概念将客体关系理论调整来适应文化共融主义的理论化需求。这种由不同文化融汇而成的情景在接纳全球移民的美国尤为明显(但并不仅局限于美国)。不论如何否认,连字符已经成为美国人标识身份的必需之举。甚至对美国的印第安人而言情况亦是如此。更有甚者,具有不同连字符前缀的美国人,从不同国家或地区归化入籍,相互之间不断地产生影响。关联立场叙事更适合处理不同人种、不同族群之间的可以逾越的边界。这种叙事还超越了基要主义身份政治的本质论,与此同时,它并不否认身份的物质现实性,而后结构主义的解构分析和表演理论却倾向于否认这一点。<sup>24</sup> 它强调个人是由多个群体身份建构而成,因而不能被简单地划归任一集体,因此,这种叙事能够弹性地处理他者性和矛盾

主体立场在全球的各种变化形式。

关联立场概念不应与多元主义混淆。后者如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指出的,经常会倾向于压制对结构性权力关系和支配体系的分析。莫安提正确地指出,美国对多样性的颂扬在太多的情况下平顺了差异,仅将差异再现为孤零零的个案或个例,从而流于空洞的“客套话”(“On Race and Voice” 203)。我并不是想暗示,在表现差异时,所有的立场都是独一无二且“地位平等”。关联立场叙事既不鼓励多元主义,也不提倡以某种单一集体性为基础的身份政治。相反,它承认权力在多重支配体系内并不总是单向流动。受害者也能成为加害者,推动变化的主体也能成为旧势力的同谋,具体取决于我们考虑的是哪一种权力参照系。这种叙事坚持辨析不同的身份建构成分,从而更加复杂地分析权力关系,而这些不同的身份建构成分在R.拉达克里希南看来是一个“整体”(Disaporic Mediations 189)。它同时也复杂化了组织策略:如果每个人都属于多个群体的话,那么我们围绕哪些集体来组织政治实体呢?虽然如此,关联立场叙事仍然打开了一扇门,使得横跨人种和族群界线的对话、从属、同盟和联合成为可能。

琼·乔丹的自传文章《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1982)可作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释我为关联立场叙事所做的理论概括。这篇文章是一个着意进行自我反思的叙事,适合教学之用。我们可随之与乔丹一起发现,如何解读关联身份的复杂性,在这种身份中,任一支配体系均不能单独决定经验的整体。乔丹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西印度群岛后裔的美国黑人,在纽约一所公立大学教书。在饱受烦劳教学的折磨之后,她疲惫地住进了位于巴哈马群岛的喜来登英国殖民者酒店,希冀享受一个放松的假期。然而在那里她仍然不能逃避一切,享受快乐,因为酒店充斥着令人联想起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历史的标志物,而她——作为一个黑人、西印度群岛后裔、大学教授、单身母亲和旅行者——在这些体系中占据了矛盾的主体立场。她好奇,自己与替她打

- 49 扫房间的女佣奥利弗有何共同和不同之处？就种族而言，她们是有联系的；就阶级而言，她们又有隔阂。她反思：“‘奥利弗’和‘我’都生活在一个冲突当中，尽管这一冲突既不是她也不是我造成的，尽管我们俩因此都在冲突中受了伤害，但是，在她的世界里，我可能是她需要消灭的怪物之一，而在一定意义上，在我的世界里她也是个怪物。”（47）

乔丹和奥利弗之间的联系与隔阂引发了对建立在种族、阶级和性别之上的流动身份的反思。乔丹想起了她和一位犹太学生共有的联系。这个学生带给她一本阿齐亚·叶齐尔斯卡的小说《面包给予者》，书中讲述了一位犹太女性的移民故事，这个故事与乔丹的自身经历产生了共鸣。那个学生对意第绪语的热爱足以匹敌乔丹本人对西印度群岛语言的热爱。但当他说到他并不在乎削减对大学生的援助时，种族的鸿沟突然出现了，因为这种削减直接影响到乔丹的儿子和许多其他的美国黑人。乔丹在这个白人学生的无所谓态度中经历了她自身的他者性，与此同时，尽管她和奥利弗隶属同一种族，地理和阶级仍然将她们割裂开来，乔丹的他者性与奥利弗的他者性交织在了一起。

乔丹反思，这些变化的立场，在需要时，在只有部分共性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基础，形成挽救生命的联系。她回忆她曾经帮助两位女性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其中一位是白种爱尔兰裔美国女性（凯茜），她父亲生前酗酒如命，还时常虐待她。另一位是南非的黑人女性（索库图），她丈夫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曾是乔丹的朋友。当时这个爱酗酒的丈夫几乎将索库图殴打致死。强势与弱势、特权与压迫的二元对立，随着人种、族群、性别、阶级和国别等参照系流动。就种族而言，乔丹和索库图是有联系的，这不仅因为乔丹曾积极地参与过反种族隔离运动，还因为她“在成长的过程中深受爱尔兰孩子的恐吓，他们让我知道了‘黑鬼’这个词”（48）。但就性别而言，那两位爱尔兰裔和南非籍的女性之间具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远甚她们各自与乔丹的相似之处，因为她们有被虐待的共同经历。虽然因为双方的种族差异而略显羞涩，凯茜对索库图

伸出了援手,给后者提供了乔丹所不能给予的帮助。在从巴哈马群岛返家的旅途中,乔丹回忆道,“我走在她们后面,那个年轻的爱尔兰裔女性和那个年轻的南非女性。我看见她们像姐妹一样走着,拥抱着彼此,说着悄悄话,对彼此充满信心。我感觉,真正能令她们俩人最终获得解放的,并不是她们是谁,而是她们的共同之处,以及她们准备怎样对待这种共同之处。”(49)

和她之前的女性主义者一样,乔丹在《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中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将种族、阶级和性别理解为多重的且相互交叉的压迫体系。但是她反对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质疑将种族、阶级和性别当作“自动产生联系的概念”(46)。人与人之间的“最终联系”,她写道,“不可能是敌人……换言之,决定这种联系的不仅仅是你是谁,还有我们能为对方做些什么。”(47)她打破传统讲述了一个新故事——一个新的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话语,提出了流动身份的问题,这种身份依据情境和参照点的不同而变换侧重点,她还图绘了不同人群在反抗复杂的压迫系统时形成的相互联系。她的态度暗示了打破僵局的可能性,这种僵局曾令安莎杜娃的教室四分五裂,也曾挫败许多女性主义者试图跨越人种和族群边界的努力。 50

乔丹并非惟一一位在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中提倡和践行身份的关联思维的人。各地的其他学者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声。关联立场的叙事在以下学者的作品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萨拉·舒乐瑞,威廉·波豪尔,R. 拉达克里希南,米娜·亚历山大,帕普萨·莫莉娜,詹妮·波恩,玛丽·路易丝·塞吉维克,阿义达·霍达多,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米妮·布鲁斯·普拉特,帕特里夏·威廉姆斯,比迪·马丁和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在此仅列举一些代表人物。例如,马丁和莫安提,在《女性主义政治:家与其有何关系?》(1986)一文中,使用了普拉特在《身份:皮肤、血液、心脏》(1984)一文中的自传性反思,来论证“身份在本质上具有关联的性质”(196)。普拉特生活在华盛顿

特区的一个黑人占绝对多数的社区中,她是一个白人、女同性恋者、南方人,其父亲和祖父都是生活在小镇里的典型男性家长。她意识到她与非裔美国邻居的任何交流都囿于种族定位的政治。但她的女同性恋者的身份,在将她永远拒于她父亲的世界之外的同时,带来了重新绘制“社团”地图的希望。马丁和莫安提担心,“白人”或“西方”女性主义倾向于“保持西方与东方,白人与非白人的二元对立。”她们发现,普拉特的文章抵抗了“捏造的西方同质化,和看似具有话语和政治稳定性的西方/东方等级区分”(193)。虽然没有理论概括出关联立场的字样,但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教师已经开始假设关联立场的存在,在这种立场中权力以多层面的方式循环,而不是沿着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单向流动。

## 当代新闻媒体对白人/他者的超越

尽管关联立场叙事在当代女性主义话语中已经零散出现,但否认、控诉和忏悔型的叙事仍然统治着女性主义的教室、会议、组织和研究。我相信,这种状态之所以形成,部分是由于美国种族两极分化加剧,而且民族主义/分裂主义情绪在上升。这种发展反映出城市中心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健康状况,以及日益增长的针对移民、穷人和反歧视运动的种族主义回潮——这一切症状在1994年的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当时旨在取消对非法移民援助的加州187号提案获得了多个种族的压倒多数的支持。<sup>25</sup>

但我也相信,女性主义者陈陈相因的否认、控诉和忏悔叙事,也部分由于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性,在高校中尤其如此。我是说,尽管有跨学科的存在,高校的女性主义倾向于自给自足——

51 这是一种对学术话语圈的发展有害的褊狭性。高校文化的这一方面既说明它为什么在许多方面有洞察力,但也解释了它何以在一些文化实



践存在盲区。在美国,人口变化和社会变化协力在大众媒体上产生了日益增多的关联叙事——数量远胜在女性主义话语内产生的关联叙事。大众媒体每日用关于人种、族群和种族主义的不同叙事冲击我们——这些叙事,有些围绕着白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构造,但更多的是建构在这种二元对立之外。我建议,我们女性主义者,无论我们的种族立场如何,都应暂时走出我们的学术框架,去看一看我们身边的事物,去寻找新鲜思路,将我们从思考种族与种族主义问题的老生常谈中解脱出来。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强有力的先锋派,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落后于时代。

电视、报纸、杂志和电影中有大量的叙事,在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框架之外,反映人种/族群之间的冲突与沟通。这并不是说,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以及否认、控诉和忏悔的叙事,没有广泛渗透进流行文化中。它们当然存在。(1988年启用威利·霍顿的竞选广告和1994年推广187号提议的广告就是证明。)甚至美国多元主义用以倡导“多样性”的比喻——例如,将美国文化比作绚丽的马赛克拼贴画、生拌色拉、炒菜、炖菜、管弦乐队、拼花被、交响曲或彩虹等等——亦对某些形式的身份政治所倾向的本质论作出过贡献。这些比喻对感官十分依重——尤其是视觉感官——而感官在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中都有十分显著的作用。像马赛克本身一样,这些比喻倾向于将每个人的差异用石头固定下来,从而将其安全地放置在无法逾越的边界之内。甚至多元文化这一被广泛使用的术语,在其最常见的意思上,也成为意指非白人种族的一个暗码,从而隐秘地重新铭刻了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sup>26</sup>

尽管如此,大众媒体仍然创造、反映或报道了一些拒绝固定化、展示关联思维并在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之外运作的叙事,对于这些叙事我们高校的女性主义者应该给予重视。我在鼓励高校投入大众和流行文化的同时,心中不无惶恐。首先,女性主义理论家极少从这些源泉中寻找理论力量。相反,这些文化形态更像一个供其批评的场所。其次,

这些文化文本都被高度调和过,受制于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的需求,并倾向于将“事实”和故事打包成商品出售,以求获得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新闻媒体常常追求故事的轰动效应,猛打“种族牌”来挖掘其全部的(经济)价值,对洛杉矶动乱所做的报道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如吉米·瑞弗兹和理查德·坎贝尔在《被破解的新闻报道》中所写的,新闻媒体并非客观地报道事实,而是充当“建构现实……强制执行规范和判定特异行为的一个关键的社会力量”(7)。而且在好莱坞的娱乐工业中,观众越广泛,电影越有可能用白种人的观点来定义种族问题,有色人种(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就越不可能塑造反映其自身社会现实的作品。<sup>27</sup> 这样的调和,尤其是受经济利益驱使的调和,似乎使得大众文化不太适合成为理论洞察力的一个源泉。

- 52 然而,一些研究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拒绝将媒体简单化地等同于与权力结盟的霸权力量。<sup>28</sup> 相反,许多评论家坚持认为,大众媒体文本可以被解读为,各种意义进行激烈角逐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生产者、消费者和支持各样主张的人群,按照不同的程式和政治立场,来阐释事件和故事。例如,电视评论家赫尔曼·格雷,在谈论电视对种族的再现时,描绘了“一些可能的策略,来对电视的驯化力量进行反霸权性的解读、定位和干扰”(“Endless Slide” 194)。他还以电视剧《考斯比一家》为例,声称像该剧那样的再现,其意义“并非是提前安排好的;相反,观众们以不同的方式定义和使用这些再现,并为不同的目的服务”(“Television” 376)。尽管我承认大众和流行文化是调和过的话语表达,但我认为它们是合适的场所,可以在其中超越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来艰难地分析有关人种和族群问题的意义,女性主义者可将这些意义用于进步的政治和理论目的。

举个例子,让我们看看报纸如何报道那些用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无法解释,或只能部分解释的人种和族群事件(有时还与宗教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从洛杉矶事件之后,我从各种国家和地区的报纸上

剪下许多故事报道。将这些故事(不论其已在多大程度上被调和)简短地列一目录,这个目录就能有力地显示,我们应该拓宽对人种和族群分歧的理解。<sup>29</sup> 这些故事可以潜在地令我们将他者化的过程理解为一个全球现象,它包含,但并不能被简化为,白人针对非白人所采取的种族主义政策。一些事件涉及的双方均不是“白人”,但也反映了二元对立的思维。还有些事件反映了两个以上群体的种族他者化的过程。所有的事件都显示,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冲突,是多么倾向于依据人种或族群的参照系发生变化,而不论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是造成这种冲突的原因,还是它产生的结果。我暂且将这些报道列举如下,不是为了证明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普适性种族主义,而是因为我完全意识到,每一例事件都有其历史特异性,都是多层面、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以目录概览的形式列举这些报道,这么做的战略目的是,借助这些全球事件本身的纯粹重量,强迫我们在美国的语境中放弃对白人/他者二元对立的排他性关注。

- 1993 年间在欧洲、亚洲、非洲、南美和中东地区发生的 48 起种族战争(报夹)
- 塞尔维亚人将蓄意强奸,集中营和对被围困的平民进行无情轰炸等手段用于“种族清洗”波斯尼亚穆斯林——其背景是一场三方的种族/宗教战争,源于长达数世纪的冲突。二战中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数以万计的塞族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历史是其近期的明证。
- 导致数以百万计人口饿死的索马里部族战争。
- 卢旺达的多数派胡图族和少数派图西族(但后者享有传统的优势地位)之间的长期冲突,这一冲突导致 1994 年 4、5 月间约 50 万人惨遭屠杀,而这之前的 1993 年已有约 10 万图西族和胡图族人在布隆迪遇害。

- 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徒摧毁位于阿约达的一座 16 世纪的清真寺(据说是穆斯林征服印度时摧毁的一座印度教寺庙的遗址),由此导致数千人死亡,尤以在孟买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集体杀戮为最。
- 在以色列 — 巴勒斯坦冲突中,排犹主义的受害者成为加害者,迫害他的堂兄弟闪米特人。两个受害群体均猛烈攻击对方,而和平的努力总是被双方的暴力颠覆。
- 南非的人种 / 族群 / 政治的大熔炉,涉及祖鲁人、科萨人、南亚人、“有色人”、南非白人、犹太人以及具有英国或欧洲血统的其他白人。
- 苏联解体后出现的 76 个民族冲突地区,包括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敌对冲突。
- 北爱尔兰的新教与天主教的暴力冲突,源自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对爱尔兰人的人种和族群歧视。
- 科威特人对进入该国充当家佣的亚洲女性的虐待行为。
- 斯里兰卡的信奉佛教的泰米尔人和信奉印度教的僧伽罗人之间的冲突。
- 日本人对韩国人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曝光的二战期间日本人将韩国女性用作“慰安妇”,将其关押在日本军营里供日本士兵进行性剥削。
- 在德国和东欧重新抬头的排吉普赛人、排犹太人、排“外国人”的情绪。
- 扎伊尔的加丹加人与卡塞人之间的种族冲突。
- 伯利兹的西班牙 — 印第安混血的美斯提若人与英国 — 印第安 — 非洲混血的克里奥尔人之间的不和。
- 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发生的起义,其中,土著印第安人和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 — 印第安混血的美斯提若人之间的冲突对起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 在缅甸发生的长达数十年的复杂的多部族战争,参与其中的有缅甸族、克钦族、佤族、果敢族,伯朗族,掸族和其他部族。
- 在加拿大的第一民族、有英国血统的欧裔加拿大人和讲法语的魁北克人这三派之间爆发的、威胁加拿大国家统一的冲突,而且这一问题由于东亚、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移民的大量涌入而变得益发复杂。
- 在洛杉矶和布鲁克林存在的非裔和韩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在洛杉矶存在的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之间、以及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在迈阿密存在的非裔和古巴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在纽约布鲁克林克朗高地存在的非裔和犹太裔美国人之间的冲突。分析这些问题时不仅要考虑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结构基础,还要考虑 1994 年的一项调查,其中显示“与白人相比,少数裔人士对其他少数裔人士抱有更多的负面看法。”(Holmes)<sup>30</sup>

这个目录的目的并非要过分关注人种和族群冲突。新闻媒体倾向于报道,甚至是夸大宣传人种和族群暴力,同时倾向于忽视在文化鸿沟间搭建桥梁的努力。这种对暴力的关注有一个少见的例外,那就是道格拉斯·马丁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有关纽约的韩裔美国杂货商协会的故事,该协会给美国黑人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类似的例子还有:斯里兰卡裔美国诗人印迪安·阿米萨纳雅甘,在《纽约时报》上呼吁,要求“铲除种族划分与妖魔化之间的不幸联系”;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一个关于马来西亚的纪录片,其中不仅收录了 1969 年种族暴乱的片断,也记录了一些中国人和马来人合资开办商业学校的努力,这种努力超越了分裂马来西亚社会的种族仇恨和不信任;美国有线新闻网电视台制作的关于一个北爱尔兰村庄的专题片,该村庄是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家乡,他的炸弹曾炸死一个小男孩,如今,这个村庄在那个男孩的家乡演出了一个圣诞话剧,以示和解之意。美国新闻媒体对

全球种族暴力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对国内暴力的一种商业化的移位,主要的始作俑者是白人种族主义机构。这些调和后的报道产生了一个隐蔽的效果,就是它们满足了白人对种族他者的偏执多疑,同时又缓解了白人对美国境内存在的种族主义的内疚之情。

但是作为各方角力的意义场,这些新闻报道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产生了有力干扰。对这些报道背后的一些事件的厚描,显示了白人和西方种族主义的持续影响。例如,作为殖民主义统治者,比利时人于20世纪30年代给多数派胡图人和少数派图西人颁发了族群身份证。因为这两个族群之间的外貌差异已经无关紧要,所以“拥有多少头牛成为族群区分的基础——拥有10头或更多牛的人就是图西人,”比利时人则雇用这些图西人充当自己的代理人(Bonner, “Once Peaceful Village”)。但是卢旺达的屠杀不能单独用比利时人的殖民主义来解释,因为今天的许多卢旺达人仍然相信,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有生理上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具有阐释力,事实上具有足够的力量来解释谋杀的合理性。一位女性这样告诉记者,“他们说,‘你是图西人,所以我们得杀了你。’”(Bonner)当权力岌岌可危时——卢旺达的局势正是如此,人们往往转向人种或族群的他者化,用之来解释冲突并将其合理化。不论它是冲突的因还是果,人种和族群的分歧是全球存在的一个现象,人们在这种现象中互相竞争资源。全球范围内的这种他者化的例子,动摇了以往固定地用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来解释所有人种和族群冲突的做法。

一些理论家和评论家将人种和族群看作是西方文化的建构,尤其是后文艺复兴时代的征服和后启蒙时代的帝国主义的产物。我同意他们的建构主义观点,人种和族群的划分并非是非自然界的绝对真理,而是文化的产物。我也承认西方科学,尤其在19世纪时,将人种和族群的区分系统化到一个非同寻常的、简直偏执的程度。这个发展给帝国主义、奴隶制、各种合法的种族隔离、反移民法案以及其他形式的人种和族群

的等级划分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据此认为,西方首创了这种人种和族群的等级划分并将其制度化,或者认为西方是唯一践行这种他者化的文化,那么这种观点就极具民族中心主义之嫌,其本身就是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的一个具体表现。<sup>31</sup> 举几个反例。依据法兰克·迪考特的说法,中国人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就发展出了完备的种族差异和等级观念。许多人相信,印度种姓制度得以起源的等级区分,其建立的基础或重要的伴随条件是雅利安人对南亚次大陆的德拉威人入侵之后产生的肤色差异。这种观点可以在印度语中表示“种姓”一词的词汇“varna”中找到支持,该词还可意指“颜色”。<sup>32</sup> 一句索马里谚语曾被用于报道部族冲突,而这个谚语,在更宽泛的层面上,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所有变化中的集体:“我的部族对抗敌人,我的家族对抗部族,我哥哥和我对抗我的家族,我对抗我哥哥。”(Ozanne, “Old Clan Rivalries”)

我并非支持,在民族中心主义的基础上,对冲突采取一种同质的、普适的、静态的、超历史的、原始的或生物学决定论的观点。每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显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形式,要理解它,只有对特定社会进行共时和历时的厚描。但是人类社会的“我们对抗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全球共有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因为人类的一些基因特性使然,而是因为对资源、权力和位置的争夺是人种和族群他者化过程的核心要素。<sup>33</sup> 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境下具有强大的阐释力,但它并不能囊括每日在我们的报纸和电视荧屏上大量出现的全球人种和族群叙事。在这些问题上将我们的思维国际化,有助于打破我们在分析美国境内的人种和族群问题时出现的话语僵局。

## 流行电影中的关联叙事

和报纸一样,当代流行电影也是一个常常瓦解白人/他者二元对立的种族关系的再现平台。和许多其他的大众文化产物一样,电影将

“人种”和“族群”当作社会建构物，对它们进行打包、商品化、市场化和传播。作为一个矛盾的场所（和小说叙事一样），电影潜在地颠覆和重新铭刻种族主义——它既努力突破，又不免包含有普遍存在的对差异的焦虑感。它既允许表达对禁忌的愤怒，又指定了其表达方法。它既对跨差异的联系抱有乌托邦式的渴望，又强调它的不可能性。我不想寻找某一特定电影的单一意义——尤其是惟一的意义。相反，我将电影文本看作一个充满张力的场所，其运作的形式既可以是退步的，也可以是进步的，一切均取决于阐释的主体和目的。我在此想讨论两部这样的电影。两者对性别的洞察力有限（在此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当然更为先进），但均对关联身份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探索，女性主义者可从中受益良多。米拉·奈尔的现实主义爱情电影《密西西比马萨拉》（1991）和尼尔·乔丹的后现代电影《哭泣的游戏》（1992）均游离于主流的好莱坞电影业之外，但仍然都“流行起来”，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流行和成功。<sup>34</sup> 这种成功——和最近另几部电影的成功一样，如《喜宴》、《油炸绿番茄》、《秘密与谎言》和《霸王别姬》——反映了人种和族群在当今市场具有的刺激效应和“卖座”程度。但它也反映出，这两部电影中的关联叙事和对跨种族联系的乌托邦渴望，触及了观众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希冀寻求新的方式，在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之外来思考种族问题。

56 在从关联叙事的角度解读电影中的违规越界行为的同时，我并不打算在此详细地分析这两部电影中的层次丰富的文化叙事，也不打算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这些文本再现的生产与消费，亦不打算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其中的性别政治，更不打算将这两部电影树立为关联思维的完美典范。相反，我阐释的目的在于，令女性主义者更为明了人种和族群关联思维的潜力，同时我也充分认识到，这两部电影中的性别政治和种族政治仍有值得商榷之处。<sup>35</sup>

《密西西比马萨拉》讲述了发生在一位印度移民女性和一位黑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地点设在密西西比的格林伍德，时间是1990



年——故事以喜剧结尾,但套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及其近期的一个化身《西区故事》中的旧情节。米娜是位性情温顺的24岁年轻女性,与父母一起在一家汽车旅馆里生活和工作。她承受着来自父母双方的压力——母亲督促她嫁人,而父亲则希望她上大学。迪米特里厄在母亲去世后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开着卡车经营清洗地毯的小生意,并照料父亲威利·本和弟弟德克托。生活在美国的米娜和迪米特里厄都是离散移民的角色:她从未去过印度,而他也从未去过非洲。

米娜和迪米特里厄的世界是两个给人鲜明印象的世界。电影在两者之间来回跳跃,为普通观众展现了人种志和纪录片的风格,这种风格早在奈尔的前几部电影中就已经出现。米娜隶属于联系紧密的印度难民社团。乌干达的黑人民族主义独裁者艾迪·阿明当政期间,印度移民被宣布为不合法,他们因而被迫逃离乌干达。整体说来他们在经济上比大部分的乌干达黑人要富裕得多。来到美国后,他们试图固守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同时也像多数的美国移民一样,经历了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冲突。但他们生活节俭,互帮互助,开办起诸如汽车旅馆和酒铺之类的生意,从而实现了美国梦,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迪米特里厄的世界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南部黑人社区,其中的每位黑人角色各有不同,代表了黑人在应对几个世纪以来的白人种族主义时出现的代际、性别和个性化的差异。在迪米特里厄的社区里,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得到充分的展示。白人饭店老板和银行家屈尊纡贵的种族主义作风,构成了影片的背景,颇具威胁性和羞辱性;而与之抗衡是黑人家庭的力量,迪米特里厄和威利·本等人的辛勤劳作,以及内涵丰富的黑人文化,这种黑人文化显然扎根于非洲传统,但又与之有所不同。

电影推翻了“他者”概念的一元性质,从而瓦解了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但同时它丝毫未触及白人的权力结构,仍将其展现为铁板一块。白种美国人被想当然地认为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偶尔会出现一些提喻式的人物呼应这一观点,这些人物的功能是提醒观众,存在一种一

成不变、充满敌意、饱含种族主义歧视的权力结构，而且这种权力结构建立的基础是对全体有色人种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但这种权力结构并非电影的叙事中心。电影的焦点在于两个不同人种/族群之间可能存在的种族主义观点、不信任态度以及对爱的渴望。彼此相爱的米娜和迪米特里厄构成了一种密西西比马萨拉——马萨拉意指各种香料的混合物——而这马萨拉又因为印度移民社区的愤怒而被粗暴地割裂。对于印度移民社区而言，在美国（和在非洲一样），跨种族婚姻是对家族荣誉的玷污。印度移民社区和黑人社区都对这一对恋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印度移民反对米娜，因为她与黑人发生性关系，令她的家庭蒙羞；其他黑人对迪米特里厄怀有敌意，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例如他们认为迪米特里厄不喜欢黑人女性；认为他渴望浅肤色的女性，就像丽莎·博内特（在《考斯比一家》中扮演丹尼斯的女演员）那样的；认为他与外国人搅和在一起很愚蠢；认为他竟敢野心勃勃地想拥有自己的生意。印度移民社区比黑人社区拥有更强的集体经济力量。他们对迪米特里厄进行报复，取消了所有让他清洗汽车旅馆地毯的订单，而这又导致那个白人银行家取消了给迪米特里厄的贷款，作为应对，迪米特里厄对一位印度裔汽车旅馆老板提起了诉讼。

在电影的早些时候，一位印度移民曾向迪米特里厄兜售过“有色人种”团结一致反抗白人种族主义的观点。但如今，这种团结一致却解体成为亚裔和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剧烈对抗。“联合起来我们就站着，分裂了我们就倒下，”迪米特里厄的朋友泰龙讥讽地说道，他厌恶地离开，去了洛杉矶。电影对种族问题采取的关联立场暴露了印度文化中常见的种族主义态度。印度文化不仅对美国黑人抱有偏见，对如米娜一样的其自身文化群体内部的肤色较深人士也抱有偏见。亚裔和非裔美国人均被白人社会建构为他者，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揭示了他者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群体都将对方视为他者。这代表了对白人/他者二元对立的一种部分置换：他者的概念爆炸成为成分混杂的许

多部分,而白人的概念却仍然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的。

然而,电影的关联叙事角度使得它不仅仅是反映印度的种族主义这么简单。电影开场在乌干达。阿明于1972年决定在全国驱逐亚裔乌干达人,这营造了电影开头的恐怖和痛苦气氛。米娜的祖父移民到乌干达,在铁路上工作。她父亲出生在那里并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成为律师——他的生活实现了许多移民的非洲版的美国梦,这种进步令许多乌干达黑人处于不利地位(正如在美国一样,其他族群移民的成功常常成为关键因素,阻止美国黑人这个整体获得实质性进步)。米娜的父亲最为伤心的是失去了最亲密的朋友,他的黑人“兄弟”奥启洛,后者告诉杰伊他必须离开,因为“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黑皮肤非洲人的非洲。”米娜和母亲在与奥启洛分别时都失声哭泣,但杰伊却拒绝与奥启洛说再见,奥启洛的背弃和家园的丧失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远甚于他的物质财富和地位的丧失所带来的打击。

随着这个爱情故事展开,米娜和她父亲都被乌干达的回忆所困扰。闪回的片断强调了1972年事件如何塑造了1990年的故事。米娜对迪米特里厄的迷恋开始于美洲豹舞厅,那个黑人舞厅的视觉和音响效果与电影中的一些乌干达场景虽然稍有不同但极其相似。米娜对迪米特里厄的爱恋引发了对奥启洛的回忆。她生日那天,他们在比洛克西市做爱时,背景播放的就是乌干达的音乐。而且米娜还回忆起她以前在乌干达过的一个生日,当时她父亲对乌干达的政治局势太过关注以至于忘记了唱《生日快乐歌》。当迪米特里厄唱起《生日快乐歌》时,她对父亲、奥启洛和乌干达的渴望交汇在一起,却因为噩梦般地回忆起一具落满苍蝇的乌干达黑人尸体而突然中断。迪米特里厄安慰她,但她却无法向他讲述乌干达的事情,就像他的家人问她为何离开时她只能保持沉默一样。她只能向他解释自己是“混杂的马萨拉”:生于非洲但具有印度血统,在伦敦当了十五年的难民,在格林伍德居住了三年。

米娜的父亲同样无法向迪米特里厄解释清楚,他只能告诉迪米特

里厄，他禁止两人往来是为了“让她免受挣扎之苦。”迪米特里厄并不知道这一家人在非洲的经历，也不知道那时的杰伊因为批评印度的种族主义和拥护乌干达黑人而相当出名。他指责杰伊试图像白人一样行事。迪米特里厄对在英国殖民主义之前就已经在印度文化中长期存在（又被英国殖民主义加强）的种族主义情绪一无所知，因而他并不理解杰伊在阻止两人关系的时候其实是在“像印度人一样行事”，即遵循他自身传统中的种族主义元素。但迪米特里厄是按照自己在美国的种族定位来说这番话的（同样的，杰伊也不能理解他的立场），他表达了美国黑人的愤怒，对移民团体接二连三的美国化的愤慨，托尼·莫里森将这种美国化的过程描述为学会说“黑鬼”的过程——换言之，学会将美国黑人看作种族等级体系的最下层并借此提高自身地位的过程。迪米特里厄拿杰伊的肤色来嘲弄他，因为杰伊的肤色只比他自己的稍浅一点。迪米特里厄还愤怒地谴责印度移民社区摧毁了他为之辛勤工作的一切。在美国的环境里，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少数族裔（甚至是“模范少数族裔”）中的一员，杰伊有资本“像白人一样行事。”像米娜之前所做的那样，杰伊无法告诉迪米特里厄在乌干达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至少部分地左右了他的行为。相反，关于乌干达的记忆如洪水般涌向沉默的杰伊，尤其是奥启洛的背弃。背弃的画面在电影中被详细地再次回放：“去伦敦，去孟买。”“乌干达是我的家。”“不再是了。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黑皮肤非洲人的非洲。”

杰伊试图向米娜解释他无法告诉迪米特里厄的话：“34年之后，一切还是归结于我的肤色。人们同类相聚。我现在只是试图让你免受这个痛苦。”米娜则提醒父亲：在他鲁莽地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出言反对阿明之后，是奥启洛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他救出了监狱。这个跨越乌干达种族樊篱的爱的举动证明了她和迪米特里厄的跨种族之爱同样合理，并且还预示了她后来决定离家出走与迪米特里厄共同生活的举动。杰伊随后重返乌干达，去从新政府的手中要回他曾经失去的房产。

期间,米娜所说的奥启洛的兄弟之情得到了证明。杰伊得知奥启洛因为帮助他这个印度“兄弟”而在1972年牺牲了性命。在电影的结尾,一个乌干达黑人孩子伸手去抚摸杰伊的脸庞,而杰伊则抱起他,两人一起观看一名女性愉快地跳舞,她的身旁簇拥着一群仰慕她的乌干达人。这个乌托邦式的种族和文化交融的时刻渐渐消褪在电影的片尾字幕里,其间穿插了两次米娜和迪米特里厄拥抱在一起的明亮画面——她穿着闪闪发光的印度长裙,而他则戴着非洲帽子穿着非洲衬衫,两人似乎站在一个超越了种族纷争的永恒时空中。就像所有的乌托邦时刻一样,这一刻留给我们的是一个萦绕于脑际的疑问:它能在种族隔离、等级划分、交流不畅和沉默不语的“现实”世界中持续多长时间?在描绘文化和历史差异引发的冲突时,这部电影入木三分,这一描绘力度本身就质疑了这对恋人未来生活的幸福结局。

59

在《密西西比马萨拉》中,文化身份、特权和压迫保持流动的开放性,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中给予重新的定义。尽管基于白人霸权的权力仍然固定不变,其他的权力结构不再单向流动,而是在两个被认为是种族他者的族群间流动。与大多数乌干达黑人相比,印裔乌干达人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处于弱势。在乌干达,印度人拒绝跨种族的婚姻。米娜的生日宴会的背景音是阿明的电视演讲,他抨击亚洲移民的种族主义歧视。通过这样的安排,奈尔凸显了印度移民的种族主义。而且,正如杰伊在被捕前几分钟自己指出的,在乌干达的亚裔人一直专注于为自己的“同族人”积累财富。“阿明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他这么告诉他的亚洲朋友。然而,在被从家乡驱逐出去之后,他们也成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一位乌干达黑人士兵对米娜母亲的残暴行为就是证明。在美国,作为移民,他们成为种族主义话语或文化不敏感话语的承受者,这些话语既来自黑人社区也来自白人社区。但和其他移民团体一样,他们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的速度,超过了美国黑人的改善速度。印度移民社区利用其经济力量摧毁了迪米特里厄的生意,

但迪米特里厄对南亚移民在乌干达的历史一无所知,这使得他误解了杰伊反对他与米娜交往的举动,低估了它的复杂性。

电影质疑了种族的整体概念,探讨了这一反讽情境:尽管迪米特里厄与那些驱逐杰伊离开非洲的乌干达黑人属于同一“种族”,但杰伊比迪米特里厄更加非洲化。反过来,电影将乌干达和格林伍德平行并置,从而突出强调了杰伊是如何将他在乌干达身受其害的种族主义又重复施加于迪米特里厄的身上。作为一名女性,米娜存在于一个种族的间隙空间:因为她比父母的肤色黑,米娜需要更丰厚的嫁妆才能在印度移民社区找一个好丈夫;但在黑人社区,她的稍浅的肤色以及长长的直发使她成为令人又爱又恨的欲望对象,肖似丽莎·博内特那样的浅肤色直发女性。相对于白人社区而言,印度移民社区和黑人社区都承受着针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但相对于对方而言,他们的特权和他者性的状况依据不断变化的判断参照点而不断变化。

《哭泣的游戏》在抨击白人/他者二元对立的固定性上甚至比《密西西比马萨拉》走得更远。《密西西比马萨拉》关注的是两个相对于铁板一块的白人社会而言都是他者的群体之间的联系(或联系破裂),而《哭泣的游戏》则质疑白种人(及其衍生品,如欧洲和西方)的一元概念,大量列举了一系列令人炫目的,不断变化的他性。性别和性征增补了人种、族群和国别,也成为流动身份的组成成分。电影将场景首先设置在北爱尔兰而后转移到伦敦,讲述了爱尔兰共和军绑架一名英军黑人士兵(乔迪)的故事,以及乔迪与他的爱尔兰共和军看守(弗格斯)之间发生的友情以及乔迪死亡之后的余波。乔迪受到一名爱尔兰共和军白人女性(加德)的色诱从而被俘。他逐渐改变了弗格斯持有的善恶的固定概念,与后者建立起牢固的人际关系。弗格斯不得不把那位被捆绑士兵的阴茎从裤子里掏出来,以帮助他小便,因此开始了他们之间跨越种族、文化和政治疆界的友谊。当乔迪送给弗格斯一张乔迪身着板球球服与漂亮女友迪尔的合影,并要求弗格斯承诺在自己死后去找迪尔

时,他们之间的联系得以牢固确立。在指挥官下令将乔迪射死而弗格斯无法执行命令时,这一友谊达到最高峰。乔迪在试图逃跑时死于英军车队的车轮之下——弗格斯既救了他,也杀了他。

在实践对乔迪的诺言时,弗格斯在伦敦逐渐占据了那个黑人士兵的位置。他想保护迪尔的尝试变成了爱情,这种爱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置换,转移了他对那个他既无法保护又不能公开爱慕的男人的爱。当他发现迪尔其实是个有异性装扮癖的人,虽然看起来是个女人其实是个男儿身时,他的爱先是变成了厌恶,随后又变成了一种欲望和保护欲交织的持续矛盾感。他取代乔迪,扮演迪尔的“绅士”,并最终在迪尔杀了加德之后(加德因为弗格斯没能完成爱尔兰共和军的处决任务而前来刺杀弗格斯),他顶替迪尔以谋杀罪入狱。在电影结尾处,弗格斯在探监时间向迪尔讲述了乔迪曾经告诉他的一个故事,这个关于青蛙和蝎子的故事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殖民地臣民变身为关押者,随后又变为俘虏;女人变身为男人,随后又变为女人。异性恋变身成同性恋,然后又回到(至少在表面上)异性恋。没有哪一个身份固若金汤,也没有哪一个等级体系一成不变。每种立场都在历史的解构和形成过程中产生变化。

这部电影的激进关联视角显示了他者性的立场如何随着相应参照点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人种、族群和国籍的问题上,乔迪和弗格斯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引用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对矛盾主体立场的常用评价词,两人均“(含混地)没有霸权意识”。弗格斯是殖民地的臣民但也是白种人;乔迪是位黑人但也是帝国军队中的一员。作为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少数派,弗格斯所属的群体,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受到乔迪所保护的新教多数派的统治。但乔迪告诉弗格斯,“他被派遣来的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惟一个他们当面叫你黑鬼的地方,”他们还叫你“滚回你的香蕉树上,黑鬼。”(191)<sup>38</sup>从爱尔兰共和军的角度来看,乔迪是占领军的一员;但从乔迪的角度来看,他自己是爱尔兰种族主义和

爱尔兰共和军的受害者。乔迪报名参军,是因为他需要一份工作,而他在种族主义的英格兰很难找到其他工作,而弗格斯到伦敦后却能够立即在一个全部是白人的建筑队里找到工作。从关联话语的角度来看,两人都占据了对方的种族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位置。

乔迪与板球的联系涵盖了所有这些矛盾之处。乔迪身着白色板球球服的照片和超现实影像重复地闪现在银幕上,他的黑皮肤与白球服形成鲜明的对比。板球既是殖民主义者的贵族运动,也是被殖民者热衷的运动,作为一种比喻,这些板球的画面将上述两方面并置起来。乔迪对板球的热爱源于他的父亲,后者在安提瓜岛教会他打板球,在那里,“板球是黑人的运动。”(191)但在陶特汉姆,这家人后来从安提瓜移居此地,板球却是白人的运动。弗格斯更喜欢爱尔兰曲棍球,他将板球与殖民者联系起来,这一联系在影片中得到视觉上的强调——他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观看英国男学生打板球。<sup>39</sup>与板球类似,弗格斯的枪也起到比喻的功用,强调了他的立场的关联双重性。作为殖民地臣民和爱尔兰共和军士兵,弗格斯相对而言处于弱势地位,无力将英军从北爱尔兰驱逐出去。但他的枪带给他巨大的力量,对于他要影响、要处决的个人而言,它具有生死予夺的权力。他与乔迪和迪尔的关系促使他放弃的正是这种权力,而当迪尔用他之前恐吓乔迪的那把手枪杀死了加德,他顶替迪尔揽下罪名时,他也是在为这种权力赎罪。

《哭泣的游戏》中,由人种、族群和国别构成的变化的权力关系,因为性别和性征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复杂。弗格斯认为自己是异性恋。他受到乔迪的误导,因为乔迪清楚地指称迪尔是女性,但同时他也对乔迪关于迪尔的不明确身份的晦涩暗示充耳不闻。弗格斯排斥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装扮癖。他占据了异性恋的特权地位,渴望固定的、有清晰界线的范畴:男/女、异性恋/同性恋。但正如他关于爱尔兰受害者和英国压迫者的本质主义观点在与乔迪结交后轰然崩塌一样,他必须面对由迪尔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别、自然性别和性征等二元对立概念的



移位。

迪尔是一位在种族和性别身份上均不明确的间隙人物,生存在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的固定范畴之间,其在电影中的功用是扰乱所有呆板的定义。身为这样的角色,她很像是一个现代的“悲剧穆拉塔”<sup>40</sup>,在霍顿斯·斯皮尔斯看来,“悲剧穆拉塔”这样的角色具有“既不/也不”的潜力(“Notes”)。迪尔的社会性别是女性,她先是乔迪的“女友”,后来又成为弗格斯的“女友”。迪尔的男儿身的曝光令弗格斯大为震惊,这不仅因为弗格斯憎恶同性恋,还因为弗格斯相信绝对的性别差异。然而不管他如何尝试,他无法不爱作为女人的迪尔,必须强迫自己记得“她”也是“他”。他要求迪尔剪去长发,卸去妆容,穿上乔迪的白色板球球服。这个举动既是一种计策,以保护迪尔免受爱尔兰共和军的伤害;也代表了他试图强迫迪尔放弃其女性身份认同的努力。他似乎以为衣服和外表能够建构起一个与迪尔的男儿身相匹配的男性社会性别。这种对迪尔的社会性别的侵犯,虽然其动机是为了保护迪尔,却再现了弗格斯早些时候对乔迪的暴力行为,后者的衣服现在正穿在迪尔身上。在隐蔽的层面上,让迪尔穿上乔迪衣服的行为或许用行动表现了弗格斯不敢承认的事实:他自身对乔迪的同性恋爱欲。<sup>41</sup> 电影的最后一幕从加德被杀的场景——杀死她的是剪短了头发、身着乔迪的板球球服的迪尔,突兀地转换到监狱的探视间——这里是妻子们探视被监禁丈夫的地方。迪尔占据了弗格斯的妻子的位置,她的女性社会性别得以重新主张,这给他们的关系带来了异性恋的表象。这是迪尔第三次变化她的外貌,这个变化再次质疑了一成不变的社会性别、自然性别和性征的身份二元概念。

然而,弗格斯和迪尔在探视间里的关系相当传统,在伪装的表面之下保持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爱意。这种传统性本身显示了对固定身份和固定角色的令人沮丧的回归,电影随即转入片尾,片尾曲《支持你的男人》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回归。弗格斯重述了乔迪先前讲述的青蛙和

蝎子的故事。这一举动瓦解了白人 / 他者以及英国 / 爱尔兰之间的二元对立,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迹象,标记着电影隐秘地回归到本质主义的固定概念。这个故事是乔丹从奥逊·威尔斯的电影《阿卡丁先生》(1995)中改编而来。故事讲述了蝎子怎样乞求一个心怀恐惧的青蛙将自己背过河,但后来它还是蜇了青蛙。面对青蛙的诘问——为什么蝎子要蜇它,因为这意味着双方都得死,蝎子只能回答,“我情不自禁,这是我的天性。”(196)这则寓言用了天性一词——威尔斯原来用的词是性格。天性一词的使用似乎与电影将身份当作文化建构物的表演自相矛盾。<sup>42</sup>这则寓言在电影的最后时刻出现,唤起天性与文化的二元对立,似乎想借用谚语的传统性,来中断电影叙事对固定身份和一元叙事的关联性解构。另一方面,这则寓言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坚持,坚持让天性 / 文化这个二元对立的两极永远处于嬉戏状态。不管弗格斯和迪尔在结尾时看起来多么传统,他们并非像其外表显示的那样。这一点在电影中得到了微妙的强调——《支持你的男人》是由乔治男孩演唱的。此外,乔迪最初讲述这个寓言的初衷,是为了说明跨差异的联系有实现的可能。作为在杀气腾腾的背景下的一个言语行为,乔迪的讲述旨在乞求弗格斯按他自己的“天性”行事。乔迪本能地知道弗格斯的“天性”不是一个杀手,而是一个具有爱的能力的人,能够跨越传统的种族和性征的疆界去爱。

电影对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的男 / 女二元对立的解构,也可以被理解为仍然陷入了恐女症的欲望体系。加德是电影中惟一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角色。她的身份一开始时是一位被当作性工具的白人女性,色诱一名黑人男性,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后来她的身份转变,成为享有操控别人的权力的白人女性,这一点在她用弗格斯的手枪砸乔迪的脸时显露无遗。乔迪对弗格斯的回答——“女人是麻烦”(199)——清晰地唤起了关于邪恶女性的模式化文化叙事。加德在外貌上的转变——从一位身穿传统的爱尔兰毛线衫的白肤金发女性,转变为一个

老于世故的黑发女性——可以理解为对伪装和表演的一个隐喻,电影中的所有角色在建构身份时都离不开伪装和表演。但这一外貌的变化还有另一个作用:用来揭示加德的模式化的恶毒。在电影的余下情节中,加德一直是个一元化的邪恶人物。像夏娃、潘多拉和玛塔·哈里一样,这个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是个既危险又有诱惑力的女人,用她的性吸引力和社会性别来引诱男人走向死亡。就像《密西西比马萨拉》仍将白人的概念处理为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一样,《哭泣的游戏》隐秘地将男性主体/女性他者的二元对立完整保留。影片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只有死了的女人才是好女人。有异性装扮癖的迪尔填补了“女人”的位置。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转移(先以照片的形式,后以肉体的形式)巩固了他们的友谊,这是对伊芙·科索斯基·塞吉维克的思想的一种同性恋版的发展,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中认为,交换女性的做法对男性联盟的形成至关重要。<sup>43</sup>

不论《哭泣的游戏》对固定的二元对立的解构多么不充分,它和《密西西比马萨拉》一样倡导用爱来跨越差异的桥梁,实现一种存在主义的飞越。尽管《哭泣的游戏》结尾的调子比《密西西比马萨拉》略显阴郁,它对跨文化联盟的呼吁仍然具有空想的乌托邦性质。基督教爱与牺牲主题的典故,在电影中比比皆是,制衡了分裂的力量。当乔迪请弗格斯给他讲个故事以缓解被俘的紧张时,内心矛盾的弗格斯引述了《哥林多前书》(13:11)中保罗关于爱的著名言论:“我作孩子的时候……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202)弗格斯挪用了引文的语境——保罗对爱的拥护——来暗示,他作为爱尔兰共和军的士兵,再不能从事“孩子的事”,例如爱别人,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他对乔迪的爱使他无法执行向乔迪开枪的命令。作为受难、牺牲和启示的人物,乔迪和迪尔呼应了基督的故事,成为工具,帮助弗格斯重新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开篇处表达的,关于爱的必须性的观点。弗格斯没有直接引述那段诗文:“我若能说万人的方

言,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13:1)之后,弗格斯为乔迪和迪尔做出了颇具象征意味的牺牲:他履行了对在劫难逃的乔迪做出的承诺,顶替迪尔进了监狱。<sup>44</sup>

他们的种族身份(黑人或白人)和国别身份(英国人或爱尔兰人)交替将乔迪、弗格斯和迪尔建构为在一方面享有特权而在另一方面却被边缘化的人物。他们跨越种族和国别的边界去爱的能力,表明他们有能力在黑人/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同性恋/异性恋的固定身份的二元对立之间占据一个间隙性的边境地带。迪尔,作为在所有这些二元对立之间移动的、兼具男女两性特征的角色,充当了这种爱的标志与代表。和《密西西比马萨拉》中的爱情浪漫叙事一样,《哭泣的游戏》中的爱情宗教叙事(它同时也是同性恋叙事)可以被诠释为对政治批评法的一种放弃。但它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对联系的渴望,这种联系抗衡了用人种和族群的界线分离人群的冲动。

## 结论

在我们有关人种和族群的话语中,否认、控诉和忏悔型的叙事不断出现。对于那些试图超越这些叙事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密西西比马萨拉》和《哭泣的游戏》中以特定的浪漫形式和宗教形式出现的乌托邦思想本身并不吸引人。然而,这两部电影均表达了跨越人种和族群的鸿沟进行联系的愿望——不论这种愿望的乌托邦色彩多么浓厚,认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内涵丰富且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们也给我们提供了叙事的例子,来佐证基于关联立场的主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权力不再单向流动,而是沿着复杂的路线循环。矛盾的主体立场使得跨越人种和族群边界的联系成为可能。我相信女性主义运动,作为一个学术话语和一个运动组织,要想继续发展,至少部分地需要继续寻找此类的关联叙事,寻找一个既承认差异又不会被差异消除的共同立场。

关联立场的叙事并不能——我急着加上一句——提供一种简单的治疗方法,来应对女性主义运动内部和外部的种族政治。思维概念单凭其本身不会消除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物质存在。我自己打造的这个女性主义品牌,推崇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因而不相信语言/象征秩序的变革仅凭其自身就能改变世界。但话语确实拥有权力,甚至会产生实际后果。文化叙事的确有助于建构并反映高校内外的权力关系。在一个语言和物质现实相互渗透的、更为宏观的辩证背景下,我们的思维概念的确实实施了文化工作。 64

种族变化和政治变化所必需的能动性,开始于——借用 S.P. 莫安提的话——人类参照更宏观的社会秩序体系反思自身行为意义的的能力。为了跨越“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 S.P. 莫安提认为,我们要能够想象那些非我族类同样具有能动性,要相信他们有能力像我们一样,反思和沟通其多重建构的身份立场的不断变化的局限性和特权 (“Us” and “Them” 19—21)。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我们需要弹性的、精细的身份立场概念,而不是假定存在一个总是已经建构好的、强权和弱势二元对立的固定身份立场。对二元对立的支配模式的排他性依赖——不论这些模式在某些环境中多么具有阐释力——很可能会延迟,而不是加快文化和政治的革新。

女性主义者在使用关联立场叙事时也面临一些风险。与“多元文化主义”和“多样性”话语一样,对矛盾主体立场的强调也能很轻易地崩解成为多元主义。S.P. 莫安提和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两人均曾提醒我们警惕这种多元主义,它模糊了社会秩序内的不同团体所享有权力的不平等 (S. P. Mohanty, “‘Us’ and ‘Them’” 25—26; Chandra Mohanty, “On Race” 203)。更有甚者,强调矛盾的无尽嬉戏也有风险,如拉达克里希南指出的,可能会使关联立场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一个目的本身” (*Diasporic Mediations* 189)。这种德里达式的延迟(延异)可能会阻挠具体的政治实践,后者需要站在坚实的土壤上提倡变化,施

展能动性。流动性置换了固定性,但正如《哭泣的游戏》中青蛙/蝎子的寓言所显示的,流动性也能导致溺水和洪灾。此外,关联话语有时与一种复杂的文化相对论话语接壤,后者可能会遮掩个人和群体之间存在的一些重要的权力差别。无限延异和解构的政治并不具有内在的进步性,它也可以退步地运作,取决于它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解构者在哪一点上停止了延异的链条。<sup>45</sup>

最后,关联叙事给人种与族群话语带来的洞察力,其本身潜在地带有一种盲目性。对关联立场的排他性关注可能会导致我们忽视否定、控诉和忏悔叙事持续存在的必要性。促成这三种文化叙事的历史条件继续存在,因而它们也有持续存在的必要。正如白人/他者的二元对立在罗德尼·金被殴事件及其后续发展中具有令人信服的影响力一样,也正如白人/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在洛杉矶动乱及其相关报道中具有重要的阐释力一样,白人女性/有色人种女性的二元对立也在某些场合下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关联立场的话语不应该分散对相关考古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关注,或分流其资源。这些目前正在进行的考古工作和理论工作具有重要的批评意义,旨在重新发现、反思和传播,被强势文化边缘化的民族的,常常被丢失或被压制的历史和文化叙事。<sup>46</sup>高校中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关注,需要在一些关键任务上进行持续不断的努力,安东尼·阿皮阿和亨利·路易斯·盖茨将之称为,生产不同人种和族群的“本土历史”的关键任务(“Identities” 625)。

然而,尽管有这些潜在的困难,我仍坚定地相信关联立场叙事能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话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且这种重要性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关联不一定非得是一个纯粹的概念,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也可以充当概念框架,支撑起一种政治目的论和实践。它能够有助于破除控诉与忏悔的僵局,这种僵局令我们那么多的课堂、组织和会议陷入瘫痪,并且程式化地出现在我们那么多的作品之中。为了超越不断重复的否认、控诉和忏悔的话语,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人种和族

群的新话语,它能承认差异,并将跨差异的联系定位在一个复杂建构的全球多元文化主义之中,避免了任何形式的民族中心主义。我们需要的话语,不会用隐秘的方式将多元文化一词和非白人等同起来,并以此(重新)建构一个多元文化的他者。我们需要的叙事不会重新将白人铭刻为中心,而把多元文化铭刻为边缘。

关联叙事能够提供基础,以建立拉达克里希南所说的,基于“关联话语这个正在形成的领域”之上的新型“联盟政治”(“Post-Structuralist Politics” 311)。这些叙事打开了通道,通向不同族群之间的真正联系,琼·乔丹认为这样的联系对于真正的变化至关重要。如她所论,这种联系既不来自于对普适性的诉求(否认型叙事)、对相似性的拒绝(控诉型叙事),也不来自于愧疚的表达(忏悔型叙事),而是来自建立在共同的经验和需求基础之上的联盟:“最终的联系肯定是,我们发现彼此之间的相互需要。换言之,决定这种联系的不仅仅是你是谁,还有我们能为彼此做些什么。”(“Report” 47)拉达克里希南和乔丹所呼吁的那种联盟,与《密西西比马萨拉》和《哭泣的游戏》之类的电影所寻求的那种联盟,都是建立在关联叙事的基础上。它们不是联接固定差异的桥梁。相反,它们超越了纯/不纯、压迫者/受压迫者的绝对范畴,将不断变化的特权和专属立场定位在全球的视野中进行运作。正如盖茨在《心脏与脊柱的自由主义》中所写的,“挑战之处在于,从身份政治,转向到辨析身份的政治……辨析身份的政治并不督促我们忽略或低估我们的集体身份。因为只有通过探索文化中人类生活的多重性,我们才能安于接受那些共同之处,而那些共同之处能令社团精神根深蒂固……我们也许会反乌托邦,但我们也有梦想。”(17)丽莎·阿尔伯莱希和罗斯·布鲁尔的给人希望的合集《权力的桥梁:女性多元主义联盟》篇首的格言警句说明了这些梦想是多么必需:“没有梦想,人类就会死亡。”(vi)

在范围和格局上均已全球化的女性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关联立场话语,后者能增补对人种和族群差异的厚描和有关这些差异的

本土历史,并因为这些厚描和本土历史而变得更为丰富。没有这些关联叙事,女性主义的教室、会议、组织和写作可能会面临着,提倡一种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的政治风险,这种身份政治能轻易地倒退,反映霸权种族主义的二元对立:纯/不纯、我们/他们、自我/他者。放弃联盟和联系的乌托邦梦想,这么做的后果我们无法承担。随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小,随着因人种和族群而变化的冲突在全球范围内增长,随着武器变得越来越致命,武器的获取越来越便利,随着跨国经济日益加剧贫富差距,随着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一个日益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人类的生存取决于我们能否认识到,差异之间的边境地带是欲望的丰沃空间,也是融合、互动和相互变化的流动场所。正如琼·乔丹在从巴哈马群岛回国的飞机上沉思的:“我张眼四望机舱内啜饮的百多名陌生人。我想甚至就在此地、就在此时,我必须实现我和这些来自各地的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再等别的云彩将我们这群形形色色的人联系起来就太晚了。”(“Report” 49)



## “超越”差异： 边境地带的迁移型女性主义

地球的未来也许取决于，所有女性辨识和发展新的权力定义和新型的跨差异联系模式的能力。

——奥德莉·罗德，《姐妹外人》

差异对我们所有人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与他者的差异经常牵涉到形成和维护群体的边界。这种维护工作残忍而血腥，这一点在全球各地都显而易见。

——亨里埃塔·莫尔，《对差异的热情》

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差异湮没了联系。

——琳达·戈登，《论“差异”》

我出生于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夹缝地带，而且我想探索那片空白空间，那个夹在两个地方之间的空间，那个行走于两个世界的过道。我想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

——戴安娜·格兰茜，《要求呼吸》

那个夹在两个地方之间的空间,那个行走于两个世界的过道:这就是我想为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超越”差异的空间。奥德莉·罗德在1980年呼吁的这种“新型的跨差异联系模式”,在我们跨越新千年界线的今天仍然迫切需要。对普适性的姐妹情谊的寻求,在20世纪70年代十分常见,罗德对这种寻求中暗含的排他主义感到愤怒。对她而言,新型的跨差异联系模式,要求我们承认差异中蕴涵了创造力的可能性。“我们如何重新定义所有女性的差异呢?”她问。“将女性们分隔开来的,并非是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差异的态度。”

68 (*Sister Outsider* 122) 然而,我想建议,正确地命名我们之间的差异,不应当成为我们发展新型关系的唯一模式。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道路,它们对女性主义同样至关重要,并且对地球的生存更具普遍意义;还存在其他的道路,可以瓦解人类学家亨里埃塔·莫尔所称的“残忍而血腥”的边界维护工作(*Passion for Difference* 1)。我相信罗德的观点需要补充,我们还需要关注诗人戴安娜·格兰茜在《要求呼吸》中描述的,发生在间隙空间里的联系过程。我所说的,是在差异间隙空间内发生的迁移运动,是罗德自己的短语——跨差异联系——中暗示的运动。

对差异的专注,如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琳达·戈登所说的,倾向于“毁掉”差异双方的互动和解。它掩盖了发生在差异之间的接触地带的混合与冲突。<sup>1</sup>继承了苏族人和德国人双重传统的格兰茜声称,为了“要求呼吸”,她必须哪一个传统都不能拒绝,而且要“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探索两者之间的边境地带,这个她生活于其中的地带(4)。和她类似,我在此书中的目的是要督促女性主义“超越”其对差异的理论探讨,转而对差异之间的间隙空间进行理论探索。我并不认为我的举动具有原创性,主要因为许多像格兰茜一样的诗人和小说家早已指明了方向。更确切地说来,我想审视近期对边界、旅行、迁移、全球流动、杂合和克里奥尔化等概念所做的理论工作的意义,从而给女性主义的差异论争

提供借鉴。这些概念主要在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人类学和地理学等领域(包括这些领域的女性主义版本)内形成发展。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运动的地理学,一个在不断变化的权力关系的框架内进行跨文化接触的地理学。目前尚无系统的研究,来探讨这些概念在女性主义探讨差异的理论工作中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是它们在探讨差异话语本身如何成为一个理论和行动的“僵局”中所具有的意义。对于女性主义而言,这种迁移型边境地理学的阐释力,同时沿着两个方向运动:对日常生活中现存的(积极和消极的)交融事例进行描绘;对可能出现的联系、联盟与和解进行乌托邦式的展望。这两个方向都是可行路线,来替代目前越来越细致的重申差异的做法,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目前已经出现的——借用玛丽·路易丝·费罗斯和谢瑞恩·拉扎克的表达——“差异僵局”(“Seeking Relations” 1051)。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将这种僵局表述为,“在对差异的热切关注”中由“二元思维模式”产生的联盟女性主义的“危机”,而我在第二章中将它描述为重复出现的否认、控诉和忏悔型叙事。在回顾美国的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成就和局限性之后,我将以剧作家安娜·德维阿·史密斯的戏剧理论和表演为例来审视“超越”这一话语的欲望;描绘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对跨文化交往与杂合进行的理论工作;在这一话语内定位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边境/荒界:新美斯提莎》;并在最后,在完成上述工作之后,在结论中重新讨论我在超越一词中蕴涵的特定含义,以及未来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

69

## 女性主义对差异的热情

亨里埃塔·莫尔所述的“对差异的热情”,25年来一直是北美女性主义的理论、政治组织和行动实践的基石,这其中包括学院派女性主义教学和学术工作。<sup>2</sup>用“热情”一词,我不仅指承认差异的存在,还指将

差异作为一个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阐释原则，来分析所有关于性别的问题。这种热情并非女性主义所固有，亦非一直显而易见，也并不一定在其他国家或跨国的女性主义中存在，而是在美国呈现出一种极其特别的形式，反映出美国历史上人种和族群形态的特异性。<sup>3</sup> 如萨义德在《理论旅行》中指出的，理论在历史上形成，穿越时空旅行，成为被移植、被翻译的现象，在适应某一具体情境的过程中经历重大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理解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产生，及其随后在美国享有的霸权，以及它在旅行至世界其他地方并受其影响的过程中，经历的翻译和调整。

美国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两大柱石——男女差异和女性内部的差异——同步发展，互为补充。两者常常处于竞争，而不是和谐的状态，但又互相依存。在《论“差异”》一文中，琳达·戈登（仅举一例）早已概述了差异话语的轮廓，我在此综述，只是为了突出强调它对差异给予的特别关注。广泛说来，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注重自然性别或社会性别的差异。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转变为对女性内部差异的强调。随着第二波、第三波女性主义术语的出现，这一转变得到日益明显的突出。<sup>4</sup> 结果就是发展出一个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它最大的影响在于革新了学术和出版领域的知识。

20世纪60年代晚期，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的爆发，学界忙于定义女性内部的共同立场。北美女性主义的第一轮差异话语正是起源于这一早期的定义激情。它迅速演变为对自然性别/社会性别体系的全面批评，和论述男女差异的理论。女性主义者在男女差异的产生原因上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差异可能源自生理差异、历史原因，或者是天性与教育相结合的产物。但在这些生理、历史和文化的解释中，一个预设普遍存在，颇为流行：性别差异是分析和实践工作的基本概念。<sup>5</sup> 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引入美国高校。这一理论的移植过程，既加强又改变了上述对男女差异的强调。<sup>6</sup> 各种

形式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构成理论,将关注点转移到象征秩序,转移到文化调和的过程和文本再现的政治,转移到作为话语体系的产出物(而非生产者)的个人所具有的“经历”,转移到女性/男性、女性本原/男性本原和身份认同等概念的令人费解的不稳定性。拉康、巴特和德里达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差异的热情”。他们通过瓦解语言和思维的二元对立结构,来解构西方的人文主义。而这种二元对立结构最突出地(甚至是超验地)体现在男性本原/女性本原的性别对立中。我冒险将丰富多变的法国批评理论暂时同质化,以强调它在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高校内女性主义的影响——伊莲娜·西苏、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露丝·伊里加蕾的著作尤其具有影响力,并认为这种影响加强了已经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差异话语(有时甚至将其本质主义化)。<sup>7</sup>

有关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差异的美国和法国女性主义话语的兴起,将一种早期的女性主义的人文主义形态扼杀于萌芽之中。这种人文主义旨在从理论上研究对雌雄同体的渴求或雌雄同体的持续存在。用雌雄同体一词,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指的是某种形式的性别混合或聚合,或者男性本原/女性本原的相互作用。这种女性主义的雌雄同体概念显现于许多有着广泛影响力的文本之中,诸如伍尔夫被重新发现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诗《潜入残骸》(1973)、卡罗琳·海伯伦的《认知雌雄同体》(1973)和桑德拉·贝姆对现存的雌雄同体行为进行的心理学研究等等。雌雄同体的概念强调了潜在的或真实存在的男女之间的同一性:男性和女性均具备能力,融合或结合男性本原和女性本原的元素,形成一个整体,既不是纯粹的男性,也不是纯粹的女性。但随着性别差异话语的影响日益增长,雌雄同体这一词语也越来越成为禁忌,甚至连里奇这样的曾经拥护者也转而否认它。“这些是我无法再选用的词汇:人文主义、雌雄同体”,里奇在《自然资源》中这么写道。而在四年前,她的诗人——潜水员还曾潜入文明的残骸中,去探索被埋藏的雌雄同体自我。里奇坚持差异,放弃了人文主义的雌雄同

体。“这些词汇不知羞耻，大言不惭 / 在那些狂怒、坚忍的老奶奶面前。”（*Dream 66*）里奇以及其他有影响力的理论学家，诸如玛丽·达里和伊莱恩·肖瓦尔特等，抨击雌雄同体这一词语。她们想借此强调这一历史必需性：在男性 / 男性本原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女性主义的政治组织，必需围绕自然性别 / 社会性别差异的性质和后果这一核心。<sup>8</sup> 这种政治紧迫性，再加上后结构主义差异话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最终确立了美国女性主义对自然性别 / 社会性别差异的强调。<sup>9</sup>

美国的第二个女性主义差异话语则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它起源于这一观点：女性的压迫和解放永远不可能单从性别的角度就能理解。这种对“双重危机”或“多重压迫”的坚持尤其常见于黑人女性。它几乎自第二波女性主义伊始就存在，不过那时它多以象征的形式呈现并且经常被忽略，在由白种和 / 或异性恋女性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内，情况尤其如此。<sup>10</sup> 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对同性恋的憎恶，以及阶级偏见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有关自然性别 / 社会性别的女性主义差异话语中十分普遍——既有特意写明的，也有无意流露的；既有对这些问题不敏感的，也有对其一无所知的；既有采取高人一等态度的，也有表达善意的。对这些主导话语的挑战，一开始时比较零散，但逐渐强化为有组织的、常常很激烈的冲突。其中，有色人种女性、同性恋女性、犹太女性、第三世界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要求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并将之当作女性主义的首要任务。罗德在收录于《姐妹外人》的一系列影响广泛的文章中，雄辩地对这些差异进行了理论探讨。她认为种族、阶级和性征的差异不应该被忽略，不应该被简化为女性主义的“他者”所面对的“问题”，而应被当作女性主义的一个创造力源泉来对待。早期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共同身份，其理论基础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具有普适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强调逐渐让位于对女性内部差异的审视，而且这种审视常常更具冲突性、更为痛苦。鉴于美国的种族等级划分具有久远且野蛮的历史，这种差异话语常常围绕着“肤色”问题进行深

度挖掘。美国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的二元对立(有色人种女性/白人女性)就反映了这一点。种族主义在美国背景下具有的急迫性,有时导致了其他形式的差异被边缘化或被掩盖,这种情况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如此。<sup>11</sup>

美国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两条主线——自然性别/社会性别的差异和多元文化的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交织在一起,而且其交织的方式既不稳定也无规律。其苗头在1980年海斯特·艾森斯坦和艾丽斯·贾丁合编的《差异的未来》一书中即有所崭露。该书对两种形式的差异话语均有所关注。它的书名颇具预言的意味,不过其内容却明显地倾向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的差异。到1992年,克里斯蒂娜·克罗斯比已经能够在《处理差异》一文中,采用一种更为全面的态度,来处理后结构主义、唯物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对差异进行的理论研究:“‘差异’已经成为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一个给定命题;女性主义已经得到修正并被多元化……如何处理差异这个事实似乎是今天女性研究的唯一课题。”(131)<sup>12</sup>这一课题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的影响在学院派女性主义的舞台上随处可见。在这个舞台上,实践行动体现在对知识的变革与传播上。不论是在女性研究的各个分支还是其主流形式中,自然性别/社会性别的差异话语都是其存在之必需。性别已经成为一个合法的研究领域,横跨多个学科,其流行程度在25年前几乎难以想象。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的多元特性不仅渗透了女性研究,也普遍存在于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和同性恋研究中。

困扰我的问题是,差异从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一个课题转变为唯一的课题——换言之,差异发展成为唯一享有特权或唯一合法的透视镜,女性主义只能通过它来审视性别的文化意义和物质意义。在对差异课题的这种专注中,有什么被失去、被遗忘或被压制吗?在女性主义急于描绘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视,差异作为女性主义理论的惟一关注点所具有的局限性。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在1992年发

出的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对今天的辩论仍然适用：“我感觉我们正面临一个危机关头。我们的女性前景正变得日益破碎。想要改善这一局面的愿望虽然模糊却很执着。受到这种愿望的扼制，我们最好的精力转向自省。我们的政治围绕着内部斗争运转，而不是联合起来对抗建构我们这个世界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这种对差异的过度关注使得我们容易受到新保守主义的恶意抨击。”（“View from Women’s Studies” 800—801）和凯斯勒—哈里斯一样，我也并非在此呼吁，让女性主义回归到提倡普适性的女性气质、姐妹情谊或社会性别。我完全赞同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的基础原则：性别必须被置于它与其他的社会分层体系和身份的多重构成成分的互动关系中来理解。我还接受许多论差异的女性主义文章中提到的基本前提：为了建立持久的联盟，至少在美国，既要寻找共同之处也要审视差异。<sup>13</sup> 然而，我提出的问题是，差异话语在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会怎样禁止或阻止我们审视对跨差异联系的渴望，这种渴望同样重要并且真实存在；又会怎样禁止或阻止我们审视，不断变化的文化形态如何必然产生杂合（也称克里奥尔化、融合、或跨文化主义）的日常现实？

为了阐释清楚，我拟分析阿根廷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亚·鲁冈（她从1967年以来就生活在美国）的 theoretical 文章《论多元女性主义的逻辑》（1991）开篇处引人入胜的抒情散文。过去20年间涌现了许多雄辩的文章，呼吁我们更多地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鲁冈的文章便是其中的一篇。但是该文的开场白暗示，作者在呼吁读者关注差异，尤其是女性内部的种族差异时，她明白她为了这种政治需要压制了什么。

写作本文时我身处暗处：从这里我看到白种/盎格鲁女性身处“另一边”，“光明的一边。”从我身处的暗处我发现自己的肤色是暗的，但我的关注点并不集中或停留于暗处，而是聚焦在“另一边”。



对我而言,写作立场能造成很大的差异。我是站在我们作为可能的嬉戏伙伴的立场,或者“夹缝”空间、朝圣之所,抑或真正的间隙空间的立场写作;还是站在种族、有色人种的立场,“内部”空间,或者从突出强调明暗对比的“另一边”的对岸写作,这其中的差别极大。

我居住在“另一边”的对岸,充满愤怒、痛苦、紧迫感、困顿感。我用话语来敲打隔墙,却刺伤了自己的耳朵。我正是想,从“另一边”的对岸这一角度,来探索多元女性主义的逻辑。 (“Logic” 35)

像诗一样,鲁冈的话语需要仔细推敲。它的二元对立的修辞用语并不是建立在其题目暗示的逻辑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意象的修辞模式上,这些意象被中间的模糊的分号隔开,又被引号加以突出强调,引号在肯定二元对立的固定性的同时也瓦解了它。鲁冈解释,她有两个写作立场。其一是她能看见明暗对立——即白皮肤的盎格鲁女性与深肤色的有色人种女性的二元对立——的地方。从这一立场,她所见的是女性内部的种族差异。它将女性无可挽回地分隔成“两边”,具体说来就是将白种/盎格鲁女性划分到“另一边”。那一边令她的“深肤色”自我感到恼怒,感到受了围困,促使她用话语来抨击种族禁锢的隔墙。这样的话语在重击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的耳朵”。实际上,这个立场是她抨击(白种)女性主义的虚假多元主义的立场。此类女性主义尚未“理解”(种族)差异的重要性。这是“种族、有色人种”的立场。在这里,“明暗”之间的差异——种族差异——被鲜明地蚀刻。

然而,分号之前的内容,也即这段导言说明的问题,却是鲁冈不得不在随后的文章中压制的东西:“我们作为可能的嬉戏伙伴的立场,或者“夹缝”空间、朝圣之所,抑或真正的间隙空间的立场。”这个场所具有开放的可能性、伙伴关系和跨种族嬉戏,但是在文章中,鲁冈认为这个场所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是她无法负担得起的一种奢侈品,因为现

实情况是种族权力将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分隔开来。在随后的文章中，白人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的二元对立是绝对的，没有间隙空间。怒火和产生怒火的种族主义使得在导言中可能存在的间隙空间成为不可能之物，使她感觉犹如被困于一个有回音的房间中，她自己的声音被反弹回来攻击自己。这个导言抒发了一种失落感，缅怀她不敢冒险尝试的乌托邦式嬉戏，这种怀旧情绪抗衡了将间隙空间看作玷污种族纯洁性的杂合之地的观点。

但是我们必须得将差异之间的间隙空间看作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梦想、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不可能实现的抒情诗、没有现实基础的梦想、没有历史指涉对象的神话吗？种族差异的间隙空间中的“伙伴关系”和“嬉戏”具有无可否认的乌托邦性质。权力是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一现实在差异群体之间构建了一个“落差”，使得间隙空间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梦想，并被冠以名目繁多的形容词：幻想的、天真的，甚至是背叛的（背叛自己的性别、种族、国家、宗教、阶级等等）。但是，在这个权力不平等流动的世界中，如果认为幻想的事情就是不相干的事情，从而不予以考虑，这会有什么后果呢？葛洛莉亚·安莎杜娃写道，“没有什么发生在‘现实’世界里，一切均作为意象首先发生在我们的头脑中。”（*Borderlands* 87）乌托邦式的渴望具有一种心理现实性，而后者是社会变革的一个基本组成成分。它还给予我们动力，去追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提供抵抗的力量。“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的最著名的演讲以此开篇，发出了渴望社会正义的呼声。此外，伙伴关系和嬉戏并不是在间隙地带惟一可能的积极互动。除它们之外，还有对相互理解的渴望，对在需要的基础上建构跨差异联系的渴望，和对联盟或联系的渴望，不管这种联盟或联系多么短暂。正如琼·乔丹在《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中提出的预言性的警告，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联系：“我必须实现我和这些来自各地的陌生人之间的联系。再等别的云彩将我们这群形形色色的人联系起来就太晚了。”（49）

梦想与展望,不论其与“现实”世界多么不同,能够产生强大的实际效果,并常常充当一种抵抗的力量。它们并非一种奢侈品。事实上,我们负担不起将其摒弃的后果。

## “超越” 差异的嬉戏

74

对差异的热情与对杂合的热情共生共存。对他者的不纯洁性的抵制,和渴望与他者交融的欲望密不可分。在《论多元女性主义的逻辑》中,鲁冈在导言中渴望跨越的屏障,就是保罗·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中所称的“种族绝对主义”。鲁冈在导言中渴望跨越这种屏障,而她在正文中抵制这种跨越,不一致的行为包含了上述的相互矛盾的激情。在随后的一篇文章《纯、不纯与分离》(1994)中,鲁冈指出,对杂合的恐惧与渴望,建立在纯与不纯的种族主义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在这篇复杂难懂的文章中,她拿用鸡蛋做菜的比喻来解释这种对立。将蛋黄和蛋清分开代表着对纯洁性的渴望,和对有色人种他者的恐惧。做蛋黄酱时将蛋黄与水和油混合起来的动作,则象征着杂合的不纯洁性。尤其是当水油混合物凝成乳状时,它拒绝绝对的融合,保留了杂合的不稳定性,产生了“蛋黄状的油和油状蛋黄”的状态(459)。鲁冈在导言中解释道,“本文的写作来自一种杂合的想象力,一种最近得以清楚表达的拉美裔女作家传统,这些作家强调混杂文化与多元性,认为其与抵抗和解放的可能性息息相关。”(458)鲁冈认为有色人种群体——具体来说,拉美裔女作家——享有杂合的有利空间。她将盎格鲁/白皮肤与渴望纯洁性和操控力的欲望联系起来(“the categorical eye” 460),将拉美裔/有色人种,与混杂文化和抵抗联系起来。在超越纯粹差异的同时,她最终却重新铭刻了差异,又回到了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绝对樊篱。

但是,如果我们在本文中采取鲁冈不愿意采取的立场,和吉尔罗伊(以及其他)一样意识到,所有的群体,包括被种族歧视的他者,不论

其在权力关系的语境中有多么不同的动机和结果,都参与差异和杂合的对话,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鲁冈坚持将她对混杂文化和多元性的关注与后现代主义区分开来,认为后现代主义书写“反对身份政治并且倾向于贬低族群的政治重要性”(475)。<sup>14</sup>但是,如果我们借鉴后现代主义针对所有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意义嬉戏所做的理论工作,从一个彻底的定位式角度来理解这些嬉戏如何与某一给定的社会秩序,包括它的权力结构,进行具体的互动,那又会怎样呢?在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主导地位之下,隐藏着种族或性别的绝对主义。在抵制这种绝对主义时,我们或许能够开始与差异嬉戏,并借此“超越”差异。

作为此类嬉戏的第一步,我们需要,在讨论身份认同时,重新启用受到压制的同一性原则。人类学家迈克尔·陶斯格在《模仿与他性》(1993)一书中说道,在对围绕自我/他者、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建构的人种学形态进行批判时,模仿的冲动常常被忽视。他声称,人种学对差异的铭刻与人类普遍具有的“模仿能力”——即“抄袭、模仿、树立典范、探讨差异、融入并成为他者的能力”——密不可分(xiii)。他性——以及它在权力机构中的显现——不能与模仿分割开来理解。陶斯格的研究说明,女性主义对差异(男女间的差异;女性内部的差异)所做的理论研究,过于经常地将差异和同一性分割开来。<sup>15</sup>我相信,这与亨里埃塔·莫尔的想法不谋而合:同一性在女性主义工作中没有受到足够的理论重视,因为女性主义一直关注差异这个爆炸性的问题:

与这种对差异的热情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它的配对物“同一性”,后者不被提起,也未受到理论重视……那么,考虑差异就需要考虑身份认同与/或同一性……认同和差异与其说是概念类畴,不如说是辨析与区分的过程。对我们所有人而言,这些过程以不同的方式与归属感,即成为某一团体的一员的欲望,紧密相联,不论这种归属多么短暂。归属感唤起了欲望,而大部分对差异的热

情正是寄寓在这种欲望里。( *Passion for Difference* 1—2 )

莫尔指出了身份这一术语本身的矛盾性:该词的字面意思是“同一性”,但却被用来仅仅定义我们与他者的差异之处,它在身份政治中的用法就是这样。如我在第一章中讨论的,身份一词具有双重且相互矛盾的内涵。一方面,身份意味着同一性,如在单词 *identical* (同一的) 中,并涉及对共同品质的理解。例如,女性、奇卡娜、犹太人、日本人或者同性恋者的身份,源自其与那个群体中的其他人的认同。这要求突出身份的某一方面并淡化其他方面,以便强调在那个群体中大家所共有的特征。另一方面,身份要求我们理解我们与他者的差异,以便让我们对同一性的认知能够起作用。女性的概念需要相对于男性的概念才能获得意义;认同自己是奇卡娜,就意味着认为自己不是奇卡诺,不是日本人,不是盎格鲁人;一个犹太人就不是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或道教徒;在 1997 年时,女同性恋者身份的确立源自其与异性恋和双性恋者的对比。当然,所有这些概念均非先天固定的,它们均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并经历变化。但是,任何身份概念的形成,都既要求认识到自己与一些人的同一性,也要求认识到自己与另外一些人的差异,这两种认知同等重要,相依共生。正如莫尔指出的,“判断差异是勾画身份的一种途径。与他者的差异经常牵涉到形成和维护群体的边界。”(1) 对于在女性主义理论内部享有霸权的差异(尤其是女性内部的差异)话语而言,这句话就意味着,我们在提倡仅以性别来划分集体身份的同时,还要关注以性征、人种、族群、国别、宗教或阶级(等)为基础的集体认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差异话语倾向于压制对同一性的关注,这种同一性存在于人种、族群、性别、阶级、宗教或地缘政治差异之间的间隙空间。

那么,用“与差异嬉戏”或“超越差异嬉戏”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并不是要在假想的同一性或(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的玫瑰色光环中将差

- 76 异的概念摒弃。相反,我想在审视差异的时候重新纳入同一性的概念,承认模仿和他性的纠结关系。这意味着在差异的间隙地带往返穿梭,理解该空间如何充斥着杂合与隔离的(积极和消极的)磁性能量。尽管这样的嬉戏可能包含了德里达式的延异,但我不想暗示,“与差异嬉戏”或“超越差异嬉戏”仅仅意味着变化的表意过程的不稳定性,在这个过程中词汇在一系列的延迟中仅仅指向其他词汇。对表意过程的理论嬉戏,如果完全与语言的指涉功能脱节,在我看来,既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在政治上也是退步的。确切说来,我表述的意思是,身份的文化标记物之间的相互嬉戏,取决于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来回摆动,这种摆动在复杂的权力关系的背景下呈现出具体的历史表现形式。

奇特的是,玛丽亚·鲁冈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一种嬉戏和旅行的概念,不仅远远超越了种族或性别绝对主义,还超越了对差异的排他性关注。在《嬉戏、“世界”旅行和爱的感知》(1987)一文中,她设想了跨越种族(及其他区分)进行嬉戏的可能性。她承认个人同时占据多个“世界”且频繁地“穿梭”其中,并由此形成个人的不同身份认同。她以之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嬉戏概念。在定义她的嬉戏概念时,她拒绝了对抗性的模式,而倾向于一种非竞争性的,并因而具有潜在“爱意”的互动,这种互动需要“敞开心扉,接纳令人吃惊之物,正视自身的缺点,允许自我塑造或重塑,以及塑造或重塑我们嬉戏于其中的‘世界’。”(401)她声称,白种/盎格鲁女性与有色人种女性要想实现充满爱意的互动,这样的态度是必不可少的。在该文及《面对面的会谈》(1990)中,她还将嬉戏与W.E.B. 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联系起来。有色人种女性必须具备这种能力才能意识到模式化再现和自我定义的“双刃剑”,才能认识到她们旅行于其中的不同“世界”所产生的“复数自我”,才能有目的地实践她们的多维度自我的声音与语言。“我是自我的复数集合体”(398),这个认识架起了一座桥,允许鲁冈想象自己到他者的世界中旅行:“不了解他者的‘世界’就不了解他者……通过到其他人的‘世

界’里去旅行,我们发现在一些‘世界’中那些傲慢观点的受害者其实是主体、活生生的人、抵抗者、梦想的构建者。”(402)甚至就在这篇文章中,鲁岗仍然倾向于后退到纯粹差异的二元对立中去(盎格鲁/拉美裔,白种人/有色人种,压迫者/被压迫者)。她难以想象一个白种/盎格鲁他者也可能是一个“世界旅行者”,也可能是“自我的复数集合体”,或者也可能受益于来访的旅行者。尽管如此,她的嬉戏和旅行概念,对于试图超越差异僵局的女性主义者而言,具有高度的启示性。

这样的嬉戏既是表演性的又是对话性的。正如陶斯格提醒我们的,模仿能力建立在对他的模仿式嬉戏或再现式表演之上。对一个文化群体的认同,是通过重复与该群体有关联的行为和信念来实施或体现的。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呼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群体由重复其所认同的群体标准模式的个人组合而成。此外,在差异体的接触区发生的文化交往,常常导致对他者的重复,不论这种重复是强迫还是自愿的,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种重复是一种表演,且常常带有一定的变化。正如霍米·巴巴所述,“文化接触,不论是对抗性的还是亲缘性的,都在表演中产生。我们绝不能草率地认为,对差异的再现,反映了种族或文化的扎根于固定传统的既有特性。从少数族群的角度来看,对差异的社会表达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协商过程,目的是令在历史变革时期出现的文化杂合获得正式认可。”(*Location 2*)这种协商发生的形式是“一种不安稳的运动”、一种“忽此忽彼、来来回回”的运动(1),体现了“差异和同一性”(1)之间的对话。我想再给巴巴的表述添上一句:不仅仅只有“少数族群”才参与这种协商。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也同样不断地在保持与他者的差异和模仿他者之间来回运动,而且常常更有力量这么做。

差异和同一性的表演性质,是近来许多酷儿理论的关键内容。这一环节与女性主义的差异僵局特别相关,因为它拆除或扰乱了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固定性。陶斯格和巴巴质疑文化差异,而酷儿理论则

诘问性别差异,审视社会性别和性征这两个他性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扭曲(杂合)的社会性别和非标准化的性征,对这些系统的冲击和越界。酷儿理论在1991年异军突起,成为一种运动和研究领域。<sup>16</sup>《性别麻烦》(1990)一书出版的时间虽然略早,却有助于这一现象的兴起。在该书中,朱迪思·巴特勒从两个方面探讨了性别的表演性质:一、性别通过一系列的重复表演建构而成,而这种表演是由性别意识形态,通过其规范性习俗,强加于人的;二、性别的戏仿表演,如穿戴异性服饰,瓦解了自然性别或社会性别差异的本质主义概念。第一种类型的表演多为强制,第二类则常是有意为之。不过,两类表演均瓦解了这一概念:性别身份是一成不变的或稳定的,而女性主义关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差异的话语正是经常建构在这一概念之上的。以伊里加蕾的理论中的解构性模仿为基础,比照巴巴的殖民模仿的概念,穿戴异性服饰的表演具体说来并不仅仅模仿了性别;它还“戏剧化地展示了那些表达意义的行为举止,社会性别本身正是通过这些行为举止才得以建构起来”(Gender Trouble x)。<sup>17</sup>

78 作为性别嬉戏的形式,诸如穿戴异性服饰、异装癖和奇装异服之类的表达形式,在酷儿理论中都在字面和比喻意义上成为,对被压制的雌雄同体概念的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具有明确的反人文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倾向。对性别差异和性征差异进行戏仿性的杂合和并置,这是一种越界行为,人类完整性的概念已经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从这种越界行为中获得的极度快感。和巴巴的殖民模仿概念一样,酷儿杂合行为——不论其实施者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异性恋者或者拒绝性征类属区分的人——质疑了差异的“天然”权威性,并强调所有的身份均是被建构的。酷儿们占据了男性/女性、男性本原/女性本原、异性恋/同性恋之间的边境地带。他们的举止迥异于常规,也因此超越了,以差异为基础的标准化的性别和性征意识形态的,固定性和天然性。“超越”差异的嬉戏,我再一次重申,并不意味着摒弃差异,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越界形



式部署到新建构的组合中。

## 安娜·德维阿·史密斯的朦胧地带

为了阐释“超越”差异的嬉戏,我现在探讨一下安娜·德维阿·史密斯的表演实践。这位美国黑人剧作家、演员、戏剧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伊始,一直投身于一个名为《在路上:寻找美国性格》的项目,并创作了多个剧本。她熟稔诸如人种、阶级、族群、宗教和性别之类的文化建构的表演性质,并一直对权力的问题非常敏感,不会撇开历史文献和实际影响来单纯对表意的过程进行嬉戏。她在写作和表演中都反对纯粹差异的霸权,但她并不否认差异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作为一种效仿和再现的形式,模仿是她的项目的核心内容,在舞台上和(文字及音像的)文本中,均展现了在差异之间的接触地带发生的差异与同一性之间的对话。她的工作对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与其说在于她对性别问题所做的工作(尽管她穿越性别边界的工作非常重要),倒不如说在于她的多元文化视野。

她有两部剧作最为有名:《镜中火》和《日暮洛城1992》,其主题分别取材于在布鲁克林克朗高地和洛杉矶爆发的多种族暴力和文化暴力。前一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黑人儿童被一位犹太教仪式派拉比的汽车意外撞死,随后一名犹太哈西德教派学生遭到报复性谋杀,而后一事件的导火索则是在录相中殴打罗德尼·金的四名警察被宣判为无罪。史密斯相信舞台代表了将一种差异与另一种差异联系起来的欲望。她形成了一种写作和表演的方法,能够在强调接触地带的同时并不湮没差异。她采访了数十位,事实上是数百位,与这些事件有关的人员,仔细观察他们的举止、言谈、服装和肢体语言。作为剧中惟一的演员,她仅仅通过使用这些人的词汇就展现了一批代表性的人物,表现了他们的身体和语言。舞台隐喻了差异的间隙空间。她的身体在表演中描绘

了对多种族冲突的不同观点,其本身就是一个接触地带。她的表演演绎了她本身与他者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她所表现的差异变得不再稳定。这是因为,如果她这位美国黑人女性能够压制其本身的种族/性别标志并在表演中成为所有这些他者——男性/女性、富人/穷人、白人/黑人/韩裔人/奇卡诺、教授/牧师/说唱艺人/卡车司机,如此等等,那么这些差异怎么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呢?之间的深渊又怎么会是不可逾越的呢?

在她为这两个剧作的文字版本所写的导言中,史密斯将表演理论概括为一种旅行形式、一种来来往往的迁移,这令人联想起鲁岗的进入到他者的主体性中“‘世界’旅行”概念,和巴巴提倡的超越差异的“忽此忽彼”运动。史密斯写道,“表演的精神就在于从自我旅行到他者。”(*Fires* xxvi)她反对“方法派演技”的基本理论。她曾经接受过方法派演技的训练。这种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创的表演方法,教育演员要通过思考自身的感受来表达他者的情感——例如,通过回忆自己的伤心事来表现别人的忧伤。“对我而言,”她接着写道,“对角色的追寻是在不断运动中的。它是一个追寻的过程,在自我和他者之间不断地来回移动。”(xxvi—xxvii)史密斯拒绝“以自我为基础”的表演方法,因为它强调差异。在这么做的同时,她“越来越相信,和使用自我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来了解他者的方法相比较,表演的行为即使不能告诉我们更多他者的信息,至少也是同样多的信息。了解他者的参考框架将是他者。”(xxvii)

史密斯旅行至,并寄居于,那些反复强调其差异的他者之中,具体表现了同一性与差异之间的对话。在这么做的同时,她尝试突破身份认同的严格界线。“我们许多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她在《日暮洛城1992》的导言中写道,“是从自身种族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一事实本身,使得我们除了那些最为邻近自身的声音之外,不能再倾听更多的声音。”(xxv)她的项目就是要,通过她对边境的朦胧地带的表演,迫使人

们听见并看见他者,从而鼓励所有的观众到他者中去旅行。她承认边界的重要性,但也强调越界的紧迫性:

种族的边界的确结出了硕果,(提供了)更为安全的地带……在那里我们得到支持,并可以支持别人的作品……这些边界对于身份认同的发展一直至关重要。而且面对否认身份认同的可发展性的流行文化和主流思想,它还是惟一能够想到的应对之策。另一方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极少有人真正看清种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广度。假如我们能够更频繁地跨越这些边界,我们就能发展出多方面的身份认同和一种更加复杂的语言。毕竟,身份认同在某些方面而言是通往角色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角色本身。它并不固定。(xxv)

从表演的角度来说,史密斯旅行至他者,寄居于他者,但并没有成为他者。她的戏剧仍然是一种表演,一种对他者的展现,一种对他者的模仿。而这种表演和模仿,就发生在表演理论家和导演理查德·谢克纳所称的,演员和被扮演角色之间的间隙性的、不稳定的并且常常令人不安的中间地带(*Performance Theory* xiv)。史密斯在表演中假装是一一对一的对应,她的表演并非天衣无缝的自然。她谨慎地使用服装、化妆、发型变化和偶尔的道具,来暗示从一个阶级向另一阶级、一个性别向另一性别、一个种族向另一种族等等的过渡。因为她本身肤色较浅,她的身体在表现“白”、“黑”、“棕”和“黄”的社会含义时,有时会呈现一种种族含混。但是在舞台上,在录像中,在书里的照片中,她在外表上仍然保留了她在美国的种族背景下的身份:一个扮演了许多他者的黑人女性。正如理查德·皮尔斯指出的,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时,观众们实际上是在观看她从一个言说者迁移到另一个言说者。在她穿上他人的服装、表现出他人的举止习气时,她也穿上了他人的身份。<sup>18</sup>

史密斯借用口音、言语模式和肢体语言来暗示她的迁移。这一点引发了争论，质疑她对他者的再现。她是否再现了一些模式化的差异形象，夸大了他者的文化表现力并且有时将他们刻画为笑柄，从而瓦解了她本身的良好意图？（史密斯对考奈尔·韦斯特和安吉拉·戴维斯等教授的模仿表演，温和地讽刺了学术界深奥抽象、装模作样和自命不凡的倾向。她本人就部分隶属这一职业群体。）或者她表演中的戏仿成分是巴巴所说的模拟的一种形式，其功用是引起观众关注表演者的人为加工，从而否定文化身份的天然性？塔妮娅·莫德莱斯基将史密斯的表演纳于吟游传统之中，“因为她的表演非常接近滑稽模仿，有时将时间拉回到过去，有时则不。”（“Doing Justice” 65）这样的模仿可能会跨越边界，莫德莱斯基部分同意巴巴的观点，但她担心这种模仿也会“将人们简化为模式化形象并剥夺他们的复杂性”（65）。

与上述观点相反，我认为史密斯对滑稽模仿的嬉戏，吸引观众去关注潜藏于文化身份本身之下的程式化和（固定）类型化。戏仿——以及它所引发的笑声——动摇、扰乱并通过反讽创造了，演员史密斯与她所扮演的独白人物之间的距离。这种模仿的一个效果就是，令人注意到人们常常紧抓不放的差异身份仅仅是表演而已。而表演，正如文化本身一样，能够变化而且确实变化。<sup>19</sup> 正如皮尔斯所云，“从一个角色到另一角色的戏剧化变化”——这种变化在她的舞台表演中尤其明显——直接表现了差异之间的空间。“我们看到，她从未真正地”完全寄寓于或“成为一个角色，但却总是在再现它，这种再现令人信服但与原型有所不同。”在她的“旅行”中，她总是保持了“她本真自我的一些东西。”<sup>20</sup>

结构上说来，史密斯的表演跨越了身份的边界。她在被突兀并置在一起的差异之间来回穿梭，而这些差异，常常在暗示平行的同一性的同时，强调不同立场之间存在误会的深渊。例如，《镜中火》一开场展示了一系列纽约市的种族场景。这些场景为克朗高地的黑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具体冲突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一个三幕的系列场景被

冠以“头发”的标题,分别展示了一位佚名女孩(黑人高中生)、阿尔·夏普顿牧师和里弗卡·斯耶戈(一位信奉犹太教仪式派的家庭主妇)的独白。三段独白都反映了头发作为身份的一种文化标记物的意义。那个佚名女孩谈到她就读的高中里流行的发型,反映出在波多黎各裔、多米尼加裔、北美裔黑人女孩之间存在的紧张感。她们要么模仿或拒绝模仿彼此的发型,要么模仿或抵制白人女孩的行为。夏普顿解释他为何将自己的头发拉直。这么做不是为了模仿白人,而是纪念他的继父詹姆斯·布朗,后者有一天曾带他到美容店将头发拉直。“所以这肯定不是 / 对白人的回应。 / 它是我和詹姆斯之间的事”他这般桀骜不驯地坚持(22)。随后的人物是里弗卡·斯耶戈。她决定遵从犹太教仪式派女性的传统,戴上假发将头发隐藏起来。她解释了她做出这一决定所经历的痛苦的矛盾心情:“我是说,我遭了很多罪,戴假发还是不 / 戴 / 假发。 / 这对我一直是个大问题。”(25)<sup>21</sup> 这三位言说者具有不同的性别和族群 / 人种 / 宗教身份,史密斯以这种方式表现了头发在三人所隶属的不同团体中造成的差异。对头发的共同焦虑,以及头发与其集体认同的关系,贯穿这三个叙事,成为一种平行的联盟和潜在的联系基础,演员和观众能够体会到这种联系,但角色人物本身却不行。史密斯,带着观众一起,来回穿梭于一个多重的自我,而角色人物本身没有进行这种旅行。

史密斯的嬉戏证明了固定的身份政治的力量,而与此同时,她的表演又通过囊括多重他者超越了那种固定性。在剧院表演(录像或书籍)的想象空间里,差异之间的间隙空间逐渐形成,超越了种族绝对主义,也避免了对占据特定历史空间的人群的狭隘理解。史密斯对身份认同进行了表演嬉戏,其背后潜藏的矛盾诗学,既包含对疗救性联系的希冀,也有对真正分歧的证明。这种在认同和差异之间进行的迁移性对话,构成了史密斯特有的朦胧地带,即由差异互动产生的一个中间地带。她用一个名为托莱特·贝伊的年轻人的富有预见性的独白结束了

《日暮洛城 1992》。托莱特是在洛杉矶动乱之后促成帮派停战的组织者之一。尽管他看似并不对女性主义者有启发意义，他的名字却命名了史密斯的表演所力图表现的空隙空间，表达了乌托邦式渴望的必须性和实际影响，而且这种渴望在我看来非常值得女性主义者去探索。部分引用如下：

那么黄昏 (Twilight)  
是  
白天与黑夜之间的  
那段时间。  
中间地带，  
我称之为中间地带。  
有许多次，当我把想法告诉兄弟们，  
他们说  
“托莱特 (Twilight)，  
这想法超前了，  
你现在不能做这事。”  
当我早在 1988 年谈论停战时，  
他们觉得这太超前了，  
然而  
在 1992 年  
我们将它变成了  
现实  
……  
我不能永远只在想象中  
和像我一样并理解我和我的族群的人认同

(254—255)

## 对文化杂合的理论探讨

对安娜·德维阿·史密斯而言,实现种族和解与文化和解的朦胧地带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性的,表达了一种乌托邦式的渴望。而要想在她的舞台间隙空间之外的“现实”世界里超越痛苦的冲突和误解,这种乌托邦式的渴望必不可少。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仅从欲望的角度来概括差异的间隙空间概念,那我们就错了。当然,作为一个不断出现冲突的场所,接触地带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对中间地带的渴望。在这个中间地带里,和平与理解可能实现,而且不必消除差异。然而,在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对立之外存在着文化互动的日常现实,其中权力以复杂、多向的方式运作,产生的效果有好有坏。不论疗救方法令人心仪与否,疗救的问题尽管很重要,却倾向于掩盖这一事实:不同的身份认同是在相互联系中体验的,并通过文化交往得以塑造。不论双方的力量多么不平衡,间隙空间是相互影响和文化杂混的场所。正如人类学家卡玛拉·维斯韦沃兰指出的,“因为身份认同不能被仅仅定位在一种文化或传统中,它同时存在多个方面,而不是仅有一个惟一的本质。”(*Feminist Fictions* 11)对差异的专注压制了身份认同的并发的、关联的方面——在这些常见的和不常见的方面,文化形态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差异体的杂混与差异体之间的冲突同等重要。

文化共融,又被称作杂合、克里奥尔化、种族混杂、混杂文化、文化交杂和杂混。<sup>22</sup> 但不论其名称如何,目前对这种现象进行的理论化研究工作,给女性主义提供了新的方法,来超越以往对差异的排他性关注。上面提到的那些术语包含的是不同形式的生理和文化上的杂合——发生了什么样的杂合,这些杂合如何发生,何时何地发生,产生了何种结果,这些问题是目前热议的话题。其中尤为引起争议的是,正在加速传播的“杂合话语”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影响。正如人类学家玛莉

莲·斯特拉森指出的，“评论界就如何看待不同‘身份’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问题进行的广泛争论，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杂合性概念，例如合并、整合和结合……然而尽管有大量的此类术语，仍然不断有评论者呼吁关注这个或那个作者遗漏的内容；最常见的就是对权力关系的呼吁”  
83 (“Cutting the Network” 520) 尽管杂合一词由过多因素决定，它似乎仍是英语里指称文化混杂最为常用的词，我也将在本书中使用它，虽然我打算把其他术语（以及它们的不同侧重点）也囊括在内。

杂合一词在英语中的“万有引力”证明了——即便是具有高度争议，甚至主要是负面色彩的——术语在对变化的意义进行重新修订时所获得的力量，这些术语充当了批判过去的一个场所。<sup>23</sup> 杂合一词在英语中起源于生物学，指植物或动物物种的杂交繁殖。它的常见的同义词——杂种、混杂、杂交、混血——多为贬义，暗示了它和纯种和嫡传相比是一种退化。<sup>24</sup> 农业植物学的兴起驳斥了这种负面的概念，通过杂交手段培育出的新的植物品种常常更为优秀。但正如罗伯特·杨在《殖民欲望》中追述杂合一词的历史时指出的，杂合成为 19 世纪西方种族主义关注的一个要点。杂合在意识形态上与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密不可分，它在人类学、宗教、政治、流行文化和人文学科等领域得到热烈的讨论。人类同源论者（认为存在单一人类物种的人）和多源发生论者（认为存在多个人类物种的人）经常将杂合当作种族理论的战场，要么认为混血儿会不育或退化，要么认为存在一个共有的人性。跨种族杂交成为一种禁忌性的威胁，既激起憎恶也引发欲望。尽管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常常禁止这种杂交，但在现实中，白人男子与其管辖下的有色人种女性杂交的事例却是比比皆是。<sup>25</sup> 杨这么写道：“在围绕这种杂交关系产生的各种理论立场中，两个种族及其杂合物，在欲望与厌恶的矛盾两轴之间运动：既有吸引（人群与文化相互混杂、融合，并因而改造自我），也有排斥（不同的元素之间泾渭分明，并保持对立的对话姿态）。种族的概念在此处具有浓重的辩证意味：只有相对于潜在的杂合来定



义,种族的概念才发挥作用,但杂合又有可能完全瓦解种族的筹谋。”  
(19)<sup>26</sup>

尽管杂合对种族主义话语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或许是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杂合在20世纪末爆发性地崛起,既成为反对单纯的“种族”思维的战斗口号,也被广泛地应用于后殖民研究、人类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领域,暗示文化杂合和互动交换的种种形式。举一个前者的例子。萨尔曼·拉什迪为其小说《撒旦诗篇》辩护时,声称小说抨击了有害的“鼓吹纯洁性概念的布道者”,赞美了杂合这一具有创造性的变化力量:

今天那些最激烈反对这本小说的人认为,与不同文化的交汇融合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和破坏他们自己的文化。我的观点正相反。《撒旦诗篇》赞美了杂合、不纯、混杂,以及不同的人群、文化、思想、政治、电影、歌曲等通过崭新且不可预料的组合产生的变化。它欣喜于混杂,恐惧于绝对的纯洁。大杂烩、乱炖、这加一点儿那添一点儿,这才是新事物产生的方式。大规模移民给世界带来的是极大的可能性,而我试图拥抱它。《撒旦诗篇》拥护的是通过融合的改变,以及通过联合的改变。它是献给我们的混杂自我的一首情歌。

84

纵观人类历史,那些鼓吹纯洁性概念的布道者——那些宣称拥有全盘解释的人——在混杂的人群中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数以百万计的人一样,我是历史的杂种。也许我们都是黑、棕、白,相互渗透,就如我笔下的一个角色曾说的,就像你做饭时的滋味。  
(“Good Faith” 394)

拉什迪对杂合的掷地有声的拥护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许多人虽然同意他对纯粹主义的批评,却认为杂合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

普遍的做法是依赖杂合理论，和它的更具语言学色彩的近亲“克里奥尔化”，来找到方法，超越目前更为常见的对差异的强调，去描绘文化交流的真正效果。然而，杂合的含义，并不比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个具有高度争议的术语，更少争议或者更稳定，而且它与后两者常常被联系在一起。杂合一词的含义游移不定，包含了差异和矛盾，这两者对于女性主义的差异僵局的重要性，赶得上“混合”这个笼统概念本身。为了精确，我们有必要画图来表示这些运动，展示围绕杂合的类型、功用、定向和政治所进行的辩论。（见图1）

杂合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意义体现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混合中：差异融合、差异混杂和已融合之物的混合。它们彼此不同但并非完全没有交集。其中第一类指两个或更多的不同事物融合之后产生全新的事物。第二类暗示，形成杂合物的差异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在杂合过程中有所改变，但仍保留了其原本的一些特性。第三类则从根本上质疑了纯粹差异的存在，将杂合看作所有文化形态的不断发展的前提。瑞纳多·罗沙东虽然在文章中没有区分前两种类型，但他的表述仍然有益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杂合可以暗示两个单纯地带的间隙空间，这种方式类似于生物学上区分两个不同物种，以及它们杂交之后产生的杂合伪物种的做法……另一方面，杂合可以被理解为所有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的前提。文化没有单纯地带可言，因为它不断地经历跨文化交叉的过程（文化之间的双向输入输出过程）。这种观点不是将杂合与单纯对立起来，而是认为杂合才是一直存在的常态……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阐释，文化纯洁性的意识形态区域——不论其是国家文化的意识形态，还是种族抵抗的意识形态——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Foreword xv—xvi）<sup>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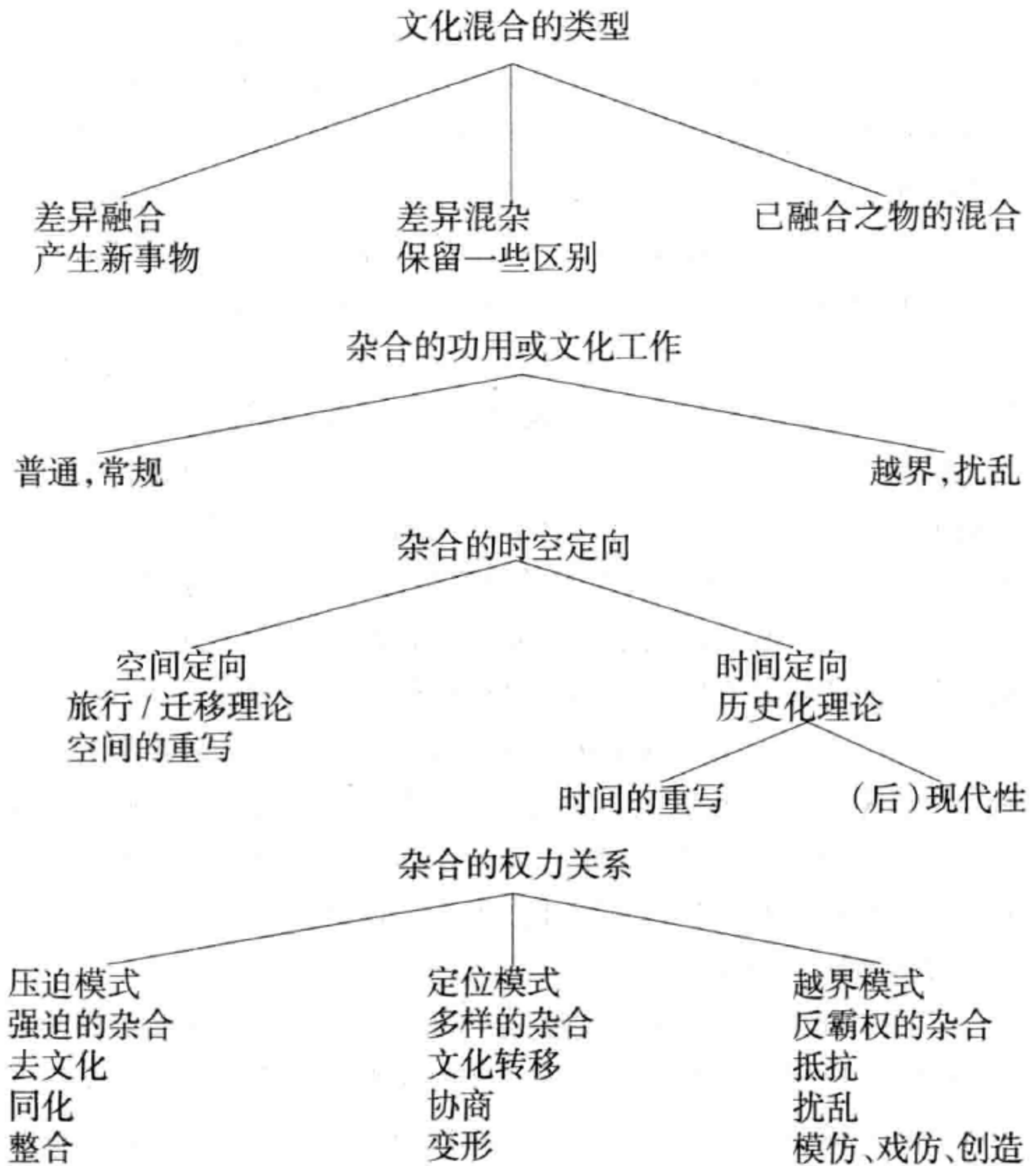


图 1 杂合理论

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和场地,语言为这三种类型提供了现成的例子。在融合型杂合的范畴内,许多截然不同的语言混合产生了全新的语言,如英语(由撒克逊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杂合而成)或意第绪语(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的混合物)。在混杂型杂合的框架内,不 85

同种类的语言各自贡献出一些不同的部分(例如,语法、词汇、句法),它们合并产生一种克里奥尔语,在这种语言中原始语言仍然清晰可辨,例如西英混合语、美墨混合语,以及洋泾浜夏威夷英语和牙买加英语。第三种类型则强调,任何语言总是一直处于杂合的形成过程中,从其接触的语言传统中不断学习和借用——不管其使用者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抵制这种融合,情况均是如此。M.M. 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中区分了“自然的”和“刻意的”语言杂合。这一区分提出了重要的能动性问  
86 题。他将自然的杂合定义为,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就能发生的差异杂合,认为它是持续进行的文化演变的一部分。他引进了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概念,把刻意的杂合描绘为语言杂混的有意识的产物,尤其是在艺术作品的方面。<sup>28</sup> 上述三种类型的语言杂合——不论其是自然的还是刻意的——均和权力的问题密不可分。事实上,使用不同语言和方言的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对融合的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标准”方言在语言学上常被定义为由军队支持的那种方言。)这三种类型的语言杂合可以很好地转化为,其他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文化混合的场所,例如宗教、大众传媒、体育、食品、时尚、认识论,以及各种艺术类型和身体本身。<sup>29</sup> 由于所有这些场所同时也是文化差异的明显标志物,关于杂合的讨论显然增补,而不是摒弃了差异的问题。

不论文化杂合包含哪些类型,杂合理论家倾向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待杂合的功用或文化工作。有些人将杂合看作是哪任何文化形态的一种普通的、普遍存在的、常规的组成成分——罗沙东称之为所有文化都会经历的、不可避免的文化转移过程(双向或多向的学习与借用)。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云,“我认为文化身份并非固定不变的,它一直是杂合的,”是具体的历史结构的结果(“New Ethnicities” 502)。还有人,如拉什迪,认为杂合具有越界、反霸权、抵抗和破坏性等特点。霍米·巴巴的杂合概念“殖民模仿”就是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他在《引为奇迹的符号》(1985)中指出,杂合出现在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

模仿行为中。在这种模仿中,两者之间的差距本身质疑了殖民权威的必然性:“杂合干预权威的运作,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显示,杂合身份不可能再现其存在的不可预见性。”(Location 156—157)在《理论的奉献》(1989)中,巴巴拓宽了他的概念,预见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通过互动产生的一种双重杂合(Location 尤其是 33—34)。但是与拉什迪一样,巴巴也认为杂合在根本上说来是对各种类型的纯粹主义和分裂主义的一种抵抗:“我想站在文化位移的、不断变化的边缘上,这一立场挫败了有关‘民族’文化或‘自然’知识分子的任何深奥或“真实可信”的看法,我想站在这个立场上询问,一旦后殖民世界的文化与历史杂合被当作范式的出发点,一个坚定的理论视角还可能有什么功用?”(Location 21)正如妮娜·韦伯纳在《辩论文化杂合》一书的导言中所写的,“目前对文化杂合的迷恋遮盖了一个难以描述的自相矛盾。杂合因其强大的干扰力而被称颂,但它在理论中却被描述为常规和普遍存在的事物。”(1)她质疑,我们怎么解释文化杂合同时既是“常规的”又是“越界的”呢(1)?<sup>30</sup>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两种杂合的观点并非相互排斥的,就像上述的三种文化混合类型并非相互排斥的一样。我们不需要非得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相反,我们可以根据立场来调配这些不同的含义,根据大背景和项目来决定该含义合适与否。

杂合的概念不仅可以按照类型和功用加以区分,还可以根据空间和时间的定向来区分。另外,许多人还用地理术语来呈现杂合的产生,强调旅行、迁移、流浪、全球漂流、越界、海/空/陆路、网络空间等等。87再有,还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谈论杂合,强调其跨越时间的发展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然而借用阿德里安娜·里奇的话,“地图上的一点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一点”(“Notes” 212),关于杂合的地理和历史的思维方式最终都是必需的,并且两者密不可分。但是两者在侧重点上的差别十分重要。

迁移理论强调由地理产生的杂合,探讨旅行在集体和个体的身份

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包括所有类型的旅行及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正如詹姆斯·克利福特在《旅行的文化》中所写的，对文化根源和传统的研究，还需要关注跨文化的路线，即一种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交流与其他文化产生的接触（我将在第六章中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个问题）。例如，在《黑色大西洋》中，保罗·吉尔罗伊将船作为黑人离散的主要比喻而加以强调——从航行在自非洲西海岸运送奴隶至西印度群岛及北美的中间通道<sup>31</sup>上的船只，到贸易商船的地缘政治路线，再到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黑人沿着奴隶贸易船在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形成的大西洋三角行进的商业和旅游航线。吉尔罗伊对海洋空间的强调，补充了在奇卡娜研究等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对陆地为主的边界空间的强调。考虑到近来亚洲移民浪潮更多地依赖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巴拉蒂·慕克吉在其小说《茉莉》中隐喻地表现了跨洲移民的超现实主义的中间地带：“那里有永远高高在上的飞机的影子世界。它们与泛美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公司共享航道和无线电频道，运送旅游者、商人和其他的人们。但是我们是难民、雇佣兵和外来工人；你看见我们睡在机场大厅，你看见我们打开最后一包家乡食物……第一百次拿出那封承诺给我们提供工作或栖身之地的航空信……我们是被抛弃的、被放逐的人，是陌生的朝圣者。”（90）另一位南亚裔美国作家米娜·亚力山大在《抵达时的震惊》中，使用重写本的意象，来全面考察由纵横交错的旅行产生的身份认同的杂合层次。她出生于印度喀拉拉邦，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苏丹度过，经常去埃及的亚力山大市旅行，夏天则返回喀拉拉邦。她先后在喀土穆和英格兰接受教育，嫁给了一位美国人，然后移居曼哈顿，在那里从事教学与写作工作。使她的位移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她的女性身体，及其在不同的文化定位下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对于一位南亚离散移民作家而言，”她写道，“位移不是单层的，而是多层的，它的激进性质”挥之不去，“因而头脑虚构出的庇护所不断地被不同的边界交叉穿越，像帐篷一样，被多重的身份之锚、种

族忠诚和非自我化过程所压垮。”(7)她总结道,“在我们将自我蚀刻在由知识和欲望形成的复杂的重写本上时,极少有什么东西我们能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69)<sup>32</sup>

其他人在强调历史形成的杂合时,则着力描绘,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新的文化的形成,如何在一段时间内发生,并形成一个由各种沉积层组成的时间的重写本。其中,征服的历史尤其产生了一个不同文化的沉积层。这种沉积在强权竞相争夺资源的冲突地区尤其得以强化。加勒比海地区就是一例,在那里克里奥尔语言和文化格外明显。在《阿兹特克重写本》(1997)中,丹尼尔·库珀·阿拉尔孔使用了重写本的意象(以及它与部分擦除、叠置和互文的联系),来从理论上阐释墨西哥历史上产生的杂合,以及现代墨西哥人和奇卡诺人对那段历史的建构。重写本暗含着部分擦除和叠置,阿拉尔孔从中找到了“权力、帝国和话语的联系纽带”(4)。换言之,他找到了一种方法,来历史地解释墨西哥人和奇卡诺人的混杂文化,这种文化在征服的历史上吸收了各种各样的中美洲、西班牙和北美文化(对之形成补充的还有来自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被迫的和自愿的移民)。 88

另一类型的历史化杂合,则强调杂合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的一系列特定条件产生的结果。拉什迪等作家,以及吉尔罗伊、阿君·阿帕杜埃、尤尔夫·汉内兹和伊安·钱伯斯等理论家认为,杂合要么与现代性,要么与后现代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声称,现代性的分裂效果和20世纪晚期文化的全球化,加强了文化间的接触以及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易、旅行、迁移和流浪。吉尔罗伊认为,黑人离散的主体是最早的“现代”主体,经历了后来成为现代主体的典型特征的身份分裂和自我塑造。在“黑色大西洋”中航行的各种族水手“在各国之间来回移动,跨越现代机器上的各种边界,而这些边界本身就是语言和政治杂合的微缩系统。”(*Black Atlantic* 12)阿帕杜埃发明了“全球族群景观”这一术语来定义“在由人组成的景观中”受制于权力运作的杂合

后现代时刻，“那些人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流动的世界：观光客、移民、难民、被放逐者、外来工人和其他迁移的群体与个人”（“Global Ethnoscapes.” 191—192）在强调后现代性与杂合的结合时，汉内兹这么写道：

20世纪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人类最终告别了，以往那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可信地称作文化马赛克的世界，那个由具有清晰、明确分界线的不同部分组成的世界。因为文化交流的大量增加，世界正在日益成为一体，不仅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如此（就像在殖民主义的高潮时期那样），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持续进行文化互动和交流的全球居民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地球村。（“Scenarios” 107）

这种“持续进行文化互动的全球居民区”是（后）现代特有的现象？还是在人类历史上常规出现的现象？杂合理论家对此存在争议。然而，更具争议性的是杂合形成背后的权力问题。不论杂合的性质、功用或定向如何，其背后都有权力问题。在产生杂合的文化交流中，交流的双方是谁？他们隶属于或代表了哪些多重群体？他们之间的权力分配是相对平等，还是不对称？谁或哪一方享有更多的权力？杂合的产生是被强迫的还是受欢迎的，是被憎恨的还是被珍视的，是夺权的还是赋权的，是破坏性的还是创建性的（或两者的某种复杂且 / 或正处于演变中的混合物）？能动性在杂合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是如何被限制、被协商的？谁有决定权，安排议程表？谁从杂合中获益最多，在哪些方面获益？所有的群体（或个人）是否同等地被杂合，且以同样的方式被杂合？或者在交流的过程中一方比另一方改变得更多？同一交流过程可否在一方产生良性的杂合，而在另一方产生恶性的杂合？谁能使用杂合，尤其是当杂合是有益的时？杂合在某一给定社会中与阶级 / 等



级 / 性别之类的等级划分体系有何联系? 杂合的文化工作是什么? 所有这些权力的流动在时间、空间中如何改变? 用杂合这一术语来指称文化混合, 它所具有的修辞力量倾向于模糊这些权力问题, 因为杂合起源于生物学的物种杂交, 而这一起源暗示的是混杂在一起的各部分是平等的(不论其差异有多大)——在地位和比例上大致平等。但文化杂合却极少是这种平等处方的产物。正是这种权力问题引发了最为激烈的争论, 女性主义者在采纳杂合术语时应对这一点给予特别密切的关注。

关于杂合政治的观点沿着三个基本的方向发展。第一类认为杂合主要是压迫的一个产物。该观点强调文化接触是, 强势团体强迫弱势团体接受某种形式的去文化、同化和整合的过程, 从而要么驱逐该弱势团体的文化形式, 要么将其挪用进自己的文化主流之中。仅举几例: 1492 年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要么被迫改宗要么被驱逐, 这导致了在西班牙形成杂合性的文化同化和基督教化(常常只是部分的基督教化), 而离散到意大利、北非和中东各地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则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杂合形式的犹太信仰; 将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殖民地的奴隶贸易, 切断了这些黑人与其各自的文化传统的联系, 并形成了融合的文化形态, 例如巴西黑人、加勒比黑人和美国黑人; 美国 1887 年的《道斯法案》制定了一些后来声名狼藉的土地分配原则, 旨在将美国的印第安人变为英国式农夫, 为了辅助实施这一政策, 印第安人被迫参加印第安寄宿学校, 并被禁止在学校里讲本族语; 毕加索等现代主义者对非洲和其他“原始”艺术的挪用, 导致了西方艺术的巨变, 但同时也强化了这样的思想认识: 在西方主子将非洲面具的形象搬上画布之前, 非洲的面具并非“艺术”。在这种框架下, 杂合常常被认为具有负面意义, 是一种策略, 来遏制、规范、监管和控制那些弱势群体, 这些群体的本源文化要么对霸权力量构成某种威胁, 要么被看作是某种禁忌的欲望对象。中心 / 边缘、殖民者 / 被殖民者、第一世界 / 第三世界、压迫者 / 被压迫者等二元

对立，在这种分析模式中占据了突出位置。此外，这一模式还假定杂合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或是这种剥削的一个后果。

90 第二种政治分析模式并没有逆转到解构第一种模式的程度。它认为杂合具有瓦解权威，并移除权威赖以存在的二元对立的作用。作为混合原则的代表，杂合物通过拒绝“嵌入”既定的范畴，实现了扰乱、干预、动摇、质问、反讽、去自然化和越界的效果。杂合物超出了标准规范事物的范围，因而质疑了现状的必然性以及社会秩序的权力关系。在这种框架内，杂合代表一种解放性的、反权威的永久力量，开启了可能之门，而不是起到规范和限定的作用。如在拉什迪和巴巴的作品中一样，这种分析模式并不认为杂合就没有痛苦、混乱、苦难或压迫。相反，这种杂合模式强调，在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下，杂合实施的是进步的文化工作。它强调真正的多元主义和异质性，允诺活力、丰富和幸存。正如尤尔夫·汉内兹在《克里奥尔化的世界》中所写的，“克里奥尔化的观点……强调多样化本身是文化活力的一个源头；它要求我们将复杂性和流动性看作一种文化挑战，而不是需要逃避的某样东西。它应该指出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在分析意义体系的同时，不会忽视它们与权力和物质生活的联系。”（556）举一个叙事的例子。莱斯利·马蒙·史尔戈在《仪式》（1977）一书中触及了杂合与权力的问题。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位二战老兵大勇的故事，他是一位“混血的”印第安人，在糟糕的战后时期寻求康复之道。他首先求助于严格遵循传统的治疗师库悟司，但后者并不能对他有所帮助；古老的仪式没有起作用。相反，成功地为大勇开启康复疗程的医师是博托尼，一位兼容并蓄型的人物：他游历很广，说一口好英语，生活在一座旅游城市的郊区，收集旧日历和其他美国文化的残余物，并将印第安人过去的传统方式与新的现实情况弹性地结合起来。与库悟司的仪式不同，博托尼的仪式融入了一个活生生的、不断演变的传统。这个传统形成于跨文化的接触，它的印第安特性包含了弹性和融合的流动性，而这正是大勇为了在这个压迫性的世界

里生存下去所必需的能力。<sup>33</sup> 如同大勇的故事所证明的,认为杂合对社会有益的观点,倾向于聚焦个人,而认为杂合是压迫产物的观点,则常常主要考虑系统结构。

对杂合和权力的第三种态度并不认为文化混合必然具有政治效果,而是要求对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的情况进行定位式的“厚描”。第一种模式常常认为拥有主导权力的一方才具有能动性;第二种模式声称杂合产生的不同政见者具有能动性;第三种模式则强调各个群体都具有能动性,虽然它们的能动性不一定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自由施展。(用“能动性”一词,我并非指行动的自主性或自由,而是人类创造意义并根据社会秩序的整体状况采取相宜举动的主体性。)在第三种模式的框架内,权力在接触地带,多方向而不是单方向地流动。与格兰西的观点一致的是,霸权在其标准化的体系内遏制了矛盾,而矛盾是产生抵抗和变化的动力。此外,并非所有的接触地带都围绕着以下两点建构:要么是弱者被强者剥削,要么是他者抵制主导集团。第三种模式包含了上述两种压迫与越界的情节,但并不拘泥于它们。它同样可能在克里奥尔化过程中发现好的产物,哪怕产生这种克里奥尔化的条件都是负面的。美国黑人音乐和舞蹈形式的产生即是一例。它们是杂合的文化产物,产生自苦难的经历,却反映了黑人的生存力与创造力的胜利。第三种模式更可能强调他者的异质性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而不是认为他者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文化转移、沟通、变形等术语代替了去文化、同化和整合。<sup>34</sup> 这些术语强调了参与文化交换的所有派别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异质性。它们采取的原则,是莫安提在《“我们”与“他们”》中所主张的原则:“‘文化’因而最好被理解为在(潜在)可定义的情况下阐释了人类选择的意义,即具有潜在的自觉能动性的个人和集体的选择……我们需要具体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能动性是所有文化中的人们都共有的一种基本能力。并且在理解‘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中,最需要得到详细阐释和说明的,正是我们之间的这块共有空间。”(20)

我提出了上述三种看待杂合与权力问题的模式。我的目的并非提供—些立场供读者用于不同的用法，而是对那些经常被不同作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混合使用的分析方法做一个区分。例如，在《帝国之眼》中，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关注了，在以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为特征的接触地带发生的文化交换，她只讨论了殖民主义背景下的杂合问题。然而，她在该书的副书名“旅行写作与文化转移”中强调了文化转移这一术语。她从人种学中借用这个术语，来强调被殖民者的能动性：“人种学者用这个术语（文化转移），来描述从属或边缘群体如何在主导或中心文化传输给他们的材料中进行筛选和创造。尽管从属群体无法轻易掌控主导文化传输给他们的内容，但他们确能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吸纳的内容和目的。”（6）此外，她承认，主导文化本身在文化转移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渠道出现杂合：“中心文化的再现模式是如何接受和挪用边缘文化的？这一问题引出了另一可能更为异端的问题：在再现方面，我们如何看待殖民地对中心城市的文化转移？……帝国的中心城市倾向于认为自己决定了边缘地区（例如，在派遣教化的使团或提供发展的现金流方面），同时它习惯性地对边缘地区决定中心城市的渠道视而不见。”（6）普拉特以这种方式，将接触地带内权力的杂合分析的第一、三种模式糅合起来，绕开了第二种模式。再举一例。尽管提到霍米·巴巴，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他的杂合越界的概念，但其实，他的复杂且还在演变中的杂合理论，涵括了全部的三种模式。<sup>35</sup>我并不是想用这三种政治模式来将理论家分档归类，而是想做一些区分，以便于准确清晰地描述，杂合是如何在任一给定环境下多元运作的。

对约翰·哈特尼克所称的“杂合话语”的批评，主要围绕着权力问题和摒弃身份政治会带来危险等，也即我所说的对“差异话语”的排他性强调。妮娜·韦伯纳和塔里格·摩都德合编的《辩论文化杂合》中，收录了许多这样的评论文章。其中，乔纳森·弗莱德曼的态度最具否定性。他批评该术语包含阶级歧视，主要是由拉什迪、吉尔罗伊、巴巴

和安莎杜娃之类的“移民精英”和“世界公民”推广起来的。彼德·范德维尔和约翰·哈特尼克的态度稍为缓和,但他们仍然反对将杂合浪漫化,或者将之从时刻变化的政治运动中分离出来。范德维尔的结论是,无论杂合对文化变化而言多么必需,“文化研究中颂扬的杂合几乎没有革命的潜力,因为尽管它宣称要推翻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但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Enigma of Arrival” 104)。哈特尼克反对将杂合时髦化和市场化,质疑“为什么现在用杂合言说,而不是用一种更为明确具体的激进语言?将这一问题陈述地更为直白一些:为什么一些‘后殖民’话语似乎很成功地避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讨论?”(“Adorno at Womad” 122)在他看来,“对杂合进行的理论研究,在一些情况下(如在斯图亚特·霍尔、吉尔罗伊和巴巴等人的作品中)变成了一种借口,可以借之来忽视尖锐的组织问题,实现一种消极而安逸的——虽然它在语言上十分复杂——学术上的清静无为主义。”(122)依据这些观点,杂合话语的危险在于,它是否在教室或出版作品之外,对政治实践作出了任何建设性的贡献。与这种批评相关的还有这样的忧虑:杂合话语,不论其目的如何,会不会最终再次铭刻新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或其他主导群体的霸权,因为它们有权力塑造文化交往的进程?对杂合话语的流行持批评态度的人,大多仍然认可差异话语在认识论或政治上的必需性,尤其是在一些最为二元分化的差异形式上(例如西方/非西方,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白人/他者)。<sup>36</sup>

这些批评很少予以考虑的是,杂合这一术语的意义多变,且常常自相矛盾,并具有十分广泛的可能性。罗伯特·扬借用巴赫金对自然杂合和刻意杂合所作的区分,来描述这种语言学的漫游。他声称杂合“同时在两个方面运作:一是‘自然地’运作:霸权化,创造新的空间、结构、场景;二是‘刻意地’运作:离散化,作为一种颠覆、翻译和变革的形式来干预……克里奥尔化的杂合过程需要融合,即创造产生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新形式虽然是旧形式的一个组成成分,但它可以用来对抗旧形式。

相比之下，‘无种族的混乱’的杂合过程则不会产生稳定的新形式，其产物更类似于巴巴提出的运动的、不稳定的、间隙性的杂合：激进的异质性、连续中断、形式的永久演变。”（*Colonial Desire* 25）和扬的双重模式相比，我对当代话语中的杂合概念的图绘，提出了更多的类型（融合型 / 混杂型 / 已融合之物的混合型）、功用（常规型 / 越界型）、定向（空间型 / 时间型）和政治模式（压迫型 / 对抗型 / 定位型）。但是我同意他的这一表述：“没有惟一的或正确的杂合概念。”（26）然而，所有杂合概念都被用于同样的目的：杂合被用来抵抗各种各样的种族绝对主义、文化纯粹主义和基要主义身份政治。“此处杂合是一个关键术语，它在哪里出现就意味着本质主义在哪里不可能存在，”扬这么写道（26）。正是在此处，杂合与深陷差异僵局的女性主义尤其相关。

### 女性主义混杂文化： 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边境 / 荒界》

为了探索杂合话语对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增补意义，我现在来分析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边境 / 荒界：新美斯提莎》。詹姆斯·克利福特在《旅行的文化》一文中强调，我们“需要想象新的定位方法，如‘边境’”。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是一个杂合与斗争、管控与越界的具体地点。近来，由于奇卡诺作家、活动家和学者的努力，美墨边境已经获得了“理论”地位（109）。安莎杜娃的《边境》发表于1987年，已经成为这些奇卡诺 / 奇卡娜文本中影响最为深远、引用最为频繁的一部作品，在众多从事多元文化、后殖民、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研究的学者和活动家中获得了“理论地位”。它对多个学科产生的影响力，并非缘自它对差异的表述，而是缘自它对差异的复杂呈现。它广阔的吸引力的核心在于，它用各种方式愤怒地、讽刺地、神话地、乌托邦式地和后殖民地探索了杂合，旅行的身份认同，以及强势与弱势在“本土”和陌

生地域的矛盾相互作用。《边境》是一个自觉的“文学”文本,在历史的背景下对作者的心灵进行自传式的叙事。它作为“理论”的地位本身就是杂合性的:它作为归纳性理论所具有的阐释功能和体系建构功能,被它作为想象文本的丰富暗指和不系统的独特性所复杂化了。作为一个明确的女性主义文本和同性恋文本,一个表现杂合、玩味杂合和体现杂合的文本,《边境》给多元文化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案例,来分析杂合话语在遭遇差异问题时是否有用。<sup>37</sup>

在分析该文本之前,我想强调安莎杜娃在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她在《此背谓我桥》(1981)和《做脸/铸魂》(1990)中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作为这些书的编者和作者,安莎杜娃坚持强调差异,尤其是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女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差异。和鲁岗的《论多元女性主义的逻辑》十分相似,这些书强调了美国的种族主义在种族化的性别身份认同形成中的影响,从而转移了对性别身份的异质性,以及权力在国内和跨国背景中的多方向流动的关注。正如她在《做脸/铸魂》的前言中所写的:

“多样化”和“差异”是含混、模糊的术语,白人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对之所作的定义并不相同。通常白人女性主义者希望将种族差异缩至最小,并以这种观点宽慰自己:我们都是女性和/或女同性恋者,并且遭受相似的性别压迫。她们通常恼怒于“差异”的现实(而不是其概念),希望将种族差异模糊化,想抚平差异——她们似乎想要一个完全的、总括性的身份认同。(xxi)

安莎杜娃使用的模糊的限定词(“通常”,“似乎”)并没有妨碍她本人将“白人女性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两者进行总括性地均质化。这是对差异话语的一种维护,它压制异质性,并偏爱固定的二元对立。

《边境》的作者安莎杜娃并未摒弃对差异话语的信奉。事实上,即使在她告诫自己要接受自身的盎格鲁成分时,即使当她在多首诗的开篇用题献的方式向她的白人盟友,如大屠杀的幸存者艾琳娜·柯蕾普费兹和出身工人阶级的女同性恋诗人朱迪·格伦,短暂地做出友好姿态时,“白种人”和“盎格鲁”的概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得到剖解的整体概念,并受到她的道德谴责。但她朝向副书名所指的“新美斯提莎”迈出了富有远见的、历史的、同时也是自传性的旅行,这个旅行指出了“超越”差异的一条路径:既证明差异的力量又不局限于此;对业已存在的美斯提莎既表达了乌托邦式的渴望,也表达了认可;在各种形式和类型的文化、种族、性别和美学的杂合之间迁移,以实现对固定性的一种表演性抵抗。《边境》中美斯提莎的范围和流动性,部分解释了它的广泛影响;读者通常会忽视其中迁移变化的,且常常相互矛盾的杂合形态,而是关注其推崇或批判的某些具体概念。<sup>38</sup>然而,对我的目的而言,这种流动性本身对女性主义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边境》覆盖了关于杂合的辩论涉及的整个范围,为女性主义证明了杂合概念的多重含义。

《边境》对纯粹差异的拒绝首先体现在其语言特色上。它交替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这乍一看似乎遵循了传统的双语文本的模式,但是仔细观察之后,读者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克里奥尔化的文本,远远超越了从一种“纯正”的语言翻译为另一种的范畴。《边境》打破了语言之间的疆界,同时保留了它们各自不同的风味。有时,文本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将同样的思想表达两遍(如题目),这种重复和双向翻译没有偏向任一种语言。但有时,安莎杜娃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达的是不同的内容,似乎语言边境上的自由突破了翻译的纪律。还有有的时候,安莎杜娃将不同的语言声音编织在一起,将英语与卡斯提亚西班牙语、北墨西班牙语、美墨混合语和“零星的纳瓦特尔语”<sup>39</sup>(前言)糅合起来。在《如何驯服野舌头》一章中,她进一步将这一特色推进,包含了八种不同的语言(55)。该书中的英语将标准英语和她称为“工人阶



级英语和俚语”的成分结合起来(55)。文本中看似“西班牙语”的语言其实是一种杂合语言,它以西班牙语为基础,但反映了它在新的历史和地理定位中的多元文化形态。安莎杜娃并不同意奇卡诺人认为自己所说的是“糟糕的西班牙语”的说法,她将这种语言称作奇卡诺西班牙语,并将它描述为“一种杂交语言”、“一种混杂方言”、“一种活生生的语言”、“一种自然发展的边境语言”和“一种新的语言——边境上的语言,在这种文化交汇的边境上,语言异花授粉并得以新生”(55, 58, preface)。《边境》的语言就这样包含了其他理论家归纳的三种基本的文化杂合类型:不同语言和方言的混杂;差异融合成一种新的语言,奇卡诺西班牙语;处于持续的形成过程中的语言总是业已融和。此外,该文本的“众声喧哗”反映出巴赫金称为“自然的杂合”的日常语言混合和“刻意的杂合”的作者的加工。不懂奇卡诺西班牙语的读者,体验到文化上的贫困感,和被排斥在外的感觉——对某一差异形成的疆界之内的生活不得其门而入。这有力地逆转了奇卡诺人在只使用英语的公共文化中时常感受到的无能为力。《边境》显而易见地欣喜于文化克里奥尔化的活力、创造力和越界政治。

95

这种在语言上“超越”差异进行嬉戏的做法,为该文本的文类杂合铺平了道路。《边境》将个人、家庭、社区、国家、跨国和神话的记忆和思考的零星片断串连起来,是一个非线性的、(后)现代的精神自传。安莎杜娃在自我反思时曾这样评论该文本的兼容并蓄的形式,将之比作“由多个主题与一个中心内核组合而成的一个装配物、蒙太奇和串珠作品,它的中心在疯狂的舞蹈中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66)以正式术语来说,《边境》包含了多重的二元对立:诗歌/散文、抒情/叙事、历史/理论、神话诗学/现实主义模仿。它甚至在承认这些文类的差异的同时仍在坚持将之融合。对德里达所称的“文类法则”的越界,其前提是存在对区分差异的期待,对作为一种种族通婚形式的跨种族杂交所具有的禁忌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实验,常常以这种方式与差异嬉

戏或超越差异嬉戏，以此来反映对笛卡尔的主体性和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扬弃。《边境》隶属这种杂合传统，同时它也构建了具体的奇卡诺文化模式。<sup>40</sup>

为了与其建构在差异与混合的对话之上的复杂结构相适应，《边境》采取了由散文和诗歌杂混而成的一个（后）现代的、辩证性的混杂叙事形式。该文本的前半部分题为《跨越边界》，其中包含了七篇散文。它们叙事了个人的、集体的和神话的历史，并提供注释，说明资料的来源，从而赋予这些历史一种合法性。这些文章从奇卡诺人在美国西南和墨西哥北部的地理边境上遭遇的压迫讲起，渐渐转移到她对历史、心理、性别、精神和审美的边境进行的探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美斯提莎意识”所带来的痛苦与欣喜。随后，在《风》的标题之下是六个单元的诗歌。它们与第一部分中的散文叙事形成对应，是对痛苦记忆和精神追寻的一种更为简略的抒情表达。尽管这两部分的美学叙事模式不同，它们再次涵盖了相同的领域，宛如翻译或语言移植一样。这六个单元的抒情诗系列始于对可怕的交往冲突的记忆，继而在最后几首96 首诗中转而拥抱既能致伤也能疗伤的混杂文化。第一部分中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散文也包含了抒情诗的成分，反过来，第二部分的诗歌模式中也包含有散文的元素。这一点使得该文本的二元对立差异进一步杂混。以正式的术语来讲，正如它对语言的嬉戏一样，《边境》涵盖了三种类型的杂合：它混杂了不同模式的声音与形式；将它们融合成一种新的形式，类似于那种延展性的、常常为杂合的20世纪长诗；<sup>41</sup>并且解构了诸如历史和神话、诗歌和散文之类的二元对立的纯粹性。

《边境》的边境语言和边境形式构成了一个语言和审美的基础，来双重叙事作者在地缘政治、心灵、精神和性别的边境内的生活。该文本并不按时间顺序叙事，而是讲述了一个求索的心理故事，一会儿是散文的形式，一会儿又是诗歌的形式。讲述的内容从分析差异压迫的病理，转到治疗方法的创造力。治疗的方法在于，对边境上存在的多元族群

及其历史的意义,进行修正主义式的神话创造。和将“自传神话”作为其自传副书名的奥德莉·罗德一样,安莎杜娃也以“自传神话”的形式,而不是纪实历史的形式,来描写她的生命故事。正如她在前言中警告读者的,“这本书讲述了我的存在,和我关注的对象。我关注自我的内在生活,以及那个自我在逆境和凌辱中的挣扎;关注原型意象的融合;关注意识在那些融合的潮流中采取的独特立场;关注我几乎本能的冲动,去交流、去言说、去描写边界上的生活——阴影中的生活。”既然这一自我是在地缘政治、种族、阶级、性别和性征的意义中得以界定,安莎杜娃的个人叙事也就同时具有多重的集体的涵义。但《边境》仍是一个通过探索实现自我疗救的幻想故事,而不是机制改革或革命的蓝图,亦非是对奇卡娜这一整体的历史分析。在她的文本中呈现的文化交往,其空间是内部的、语言学的,是自我的空间、身份认同的空间。<sup>42</sup>

这种探索叙事主要依赖于,在杂合的不同意义和政治之间来回迁移。虽然该文本的边境意识常常被仅仅等同于在第一二部分的结尾处表达的“新美斯提莎”意识,或者被等同于一种浪漫化的无痛杂合,但整个文本的边境意识其实是变化的、流动的、矛盾的。<sup>43</sup>该书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旧”美斯提莎变为“新”美斯提莎,从满怀羞愧地将自我看作一个“杂种”的种族,变为自豪地认同这个富有创造力的混杂文化。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安莎杜娃不仅展示了迁移的主体性,还显示了对待混杂文化的机动态度。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美国的高校中发展起来的更为抽象的各种杂合理论类似,不过在时间上要比它们更早,安莎杜娃抵制单一模式的文化杂合。相反,她的叙事包含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各种杂合模式:杂合的三种类型、它的常规和越界的两种功用、它的空间/时间定向、它与权力相关的反乌托邦、乌托邦和定位模式。最难得的是,她没有简单地认为,混杂文化就能超越差异和差异结构造成的痛苦。

这个叙事性探索的旅程始于“地理边境”(前言),讲述了发生在美

- 97 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地缘政治接触区里的压迫经历。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最早居住在那片土地上,美国人在 1847 年将其征服。这个差异的空间/时间的重写本或者重叠物“并非一片宜人的居住地带,”她在前言里这样解释。它是一个“矛盾的地方。憎恨、愤怒和剥削是这块土地的鲜明特色”。这里,杂合政治是反乌托邦式的;跨文化接触主要是剥削性的并充满敌意。这里,边境生存意味着将土地、人群和身体割裂为两个部分。除了融合,罗伯特·扬写道,杂合化过程“还可以指将一个单一实体强制分割为两个或更多部分,将单一物体切割为两个,将相同变为差异。”( *Colonial Desire* 26 )《边境》的散文部分在开篇伊始,就用诗歌对这种发生在接触地带的割裂,进行了感情强烈的描写:

1950 英里长的开放性伤口

分裂开一个 pueblo ( 乡镇 ), 一种文化

沿着我身体的长度划过

在我的肉体上楔入栅栏支柱

分裂我      分裂我

me raja ( 分裂我 )      me raja ( 分裂我 )

这是我的家

这个带刺铁丝网的

狭窄边缘。

( 2 )

她接着用散文写道,“美国 — 墨西哥边境 es herida abierta ( 是一个开放的边境 ), 在那里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摩擦并流血。”( 4 ) 征服和压迫在人群中造成差异并强化差异,将交往和由之产生的杂合,变成一个创伤场地,一个对他者施加权力和抵制他者的空间。在其极端的形式下,边境变成屠宰场。该文本的第二部分开篇的三首诗歌,从字面上反映

了这一点：《白翼季节》、《杀鹿》和《马》。在第一首诗中，“白人们带着枪 / 再次光临 / 用铅弹枪 / 填满寂静和天空”，他们来猎杀鸽子（102）；在第二首诗中，白人狩猎监督官强迫一个奇卡诺家庭杀掉他们养作宠物的小鹿（104—105）；而在第三首诗中，北美外国佬杀掉了一匹野马（106—107）。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地缘政治边界，构成了绝对的盎格鲁 / 墨西哥之间的差异，其中奇卡诺人占据了不安和脆弱的间隙空间，在种族和文化上混合了白皮肤与棕皮肤、盎格鲁人与墨西哥人，他们不属于两者中的任一方，甚至对自己的身体也不能感到安心。对这种痛苦的杂合，安莎杜娃提出的解决办法并非种族绝对主义——即主张“纯粹的”奇卡诺身份认同。相反，她坚持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这个任务要求她用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自身的奇卡诺和墨西哥根源。她必须得学会接受自己的社会位置：她在崇尚父权并恐惧同性恋的家乡是个被排斥在外的异类。这个接受的过程鼓励她用修正主义的眼光，来审视杂合与异质性的各种变化形式，正是这些形式构成了墨西哥人与奇卡诺人的历史与文化。（《边境》基本没有关注盎格鲁或西方文化的杂合。）正如她在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节中所解释的，“在我们前往新意识的某一点上，我们将不得不离开对岸，两个殊死较量的战斗者的分裂以某种方式愈合，这样我们能同时站在两岸。”（78）她下面的看法反映了将杂合看作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力量思想：

美斯提莎意识的作用是打破将她囚禁其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双重性，用她的身体并且通过她作品中的形象来演示，这种双重性是如何被超越的。白种人与有色人种、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弥合裂隙，这个裂隙来源于我们生活、文化、语言和思想的根基。在个人与集体的意识中对二元对立思想进行大规模的除根运动，这只是一场长期斗争的开始，但它能够，在最好的情况

下,结束强奸、暴力和战争。(79)

当然,这种渴望超越二元对立从而实现疗救的愿望,带有政治乌托邦型杂合的色彩,尤其是当我们反乌托邦地认识到文化间的关系还与“结束强奸、暴力和战争”相差甚远。然而,叙事的方向是从痛苦转向接受,从位于“带刺铁丝网的狭窄边缘”(3)的家中经历的痛苦,转向接受“心理冲突,一种双重的身份——我们不认同盎格鲁—美国人的文化价值,我们不完全认同墨西哥人的文化价值。我们是两种文化的优势协作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墨西哥特性或盎格鲁特性。”(63)优势协作体的正面特性,在她看来,来自对杂合的多种形式和功能的迁移性探索。

早期的杂合理论认为杂合是物种的混合。与这种理论相呼应,美斯提若在字面意义上指混合的种族。安莎杜娃将对混杂文化的思考扎根于,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种族混合,这种混合产生了墨西哥人。她将这段历史与墨西哥人和奇卡诺人心理上的羞耻意识联系起来。对安莎杜娃而言,这个描摹墨西哥特性的根本性文化叙事,其核心是征服和跨种族杂交的故事。其中,(阳性)西班牙血统被(阴性)印第安血统所玷污,而印第安人也被欧洲人所羞辱。这个源头叙事的核心故事是,西班牙殖民征服者赫尔南·科蒂斯,俘虏了一位被称为马林切的阿兹特克族女性,后者成为他的翻译、配偶和孩子的母亲。这位混种墨西哥人的母亲还被贬称为青卡姐,即娼妓之意。她跨越了叛徒和受害者的界线,既是与敌共眠的背叛本族人的娼妓,又是被暴力征服的女性。她的背叛与被强奸的事实,换喻地将暴力征服神话化,而暴力征服正是墨西哥种族杂合的根源。美国对墨西哥北部的暴力吞并,切断了该地的本土居民与其墨西哥根源之间的联系,再现了最早的西班牙征服,并造成了将奇卡诺文化与墨西哥文化割裂开来的文化杂合。这个征服叙事,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渐渐超越了这一种族杂合文化叙事中的羞耻感。在第一部分的第七节中,安莎杜娃改写了修正主义的墨西哥哲学家何

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话,认为此类的种族“‘横渡’,或称种族的融合,产生的并非低等之物,而是一个杂交物种,它易变,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和丰富的基因池。”(77)如果基因杂合具有积极的后果,我们就可以重新评价印第安人和以马林切为代表的女性,喜爱而不是奚落这个产生墨西哥特性的被种族化的母体。 99

墨西哥特性的这种文化杂合,安莎杜娃反思道,来源于一种类似模式的强制征服,它甚至可以上溯到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像阿拉尔孔在《阿兹特克重写本》中一样,安莎杜娃起初将当代边界考虑为空间上的重写本,后来转而将墨西哥(和奇卡诺)文化当作时间上的重写本来探索,因为其征服史涉及到一系列的文化叠印。墨西哥人融合了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但阿兹特克帝国本身代表了对托尔帕克和其他印第安人的征服,也代表了一个靠暴力实现的阶级分化的社会,既包括有权的精英也有平民。<sup>44</sup>她深入挖掘了墨西哥的种族融合的故事,追踪了以女性形象出现的文化偶像的含义,具体而言就是 la Virgen de Gaudalupe,即棕肤的圣母玛利亚。这个女性“就像我的种族一样,是旧世界与新世界的结合体,是两个民族的宗教与文化在我们的心灵中产生的结合体”(30);她是青卡姐、“被我们抛弃的,遭到强暴的母亲”;她是 la Llorona(哭泣的女人),那位像美狄亚一样为了惩罚丈夫的背叛而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却又四处寻找他们的哭泣的母亲(30)。安莎杜娃发现,这些女性还可以上溯到阿兹特克神话中的丰饶女神,尤其是其中的“好母亲”托娜斯和“恶母亲”科阿提酷。就像基督教中的处女/妓女的双重性一样,“好母亲”和“恶母亲”是这一双重性的阿兹特克版本。这一版本是对中美洲的一位丰饶女神,蛇神科阿提酷,的一种丑化改写。蛇神科阿提酷联接了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在《边境》中,她是安莎杜娃的缪斯女神和边境地带的保护神。<sup>45</sup>要想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实现“新美斯提莎意识”,就必须重现这种杂合性的重写、这种持续进行的融合,以便融汇合并一系列对墨西哥身份与奇卡诺身份都很重要

的女性人物。

通过再现这些扎根于印第安文化的多重文化人物中存在的权力关系，安莎杜娃得以摆脱羞耻心，坦然面对构成了墨西哥身份的西班牙与印第安杂合，以及构成奇卡诺/奇卡娜身份认同的墨西哥与盎格鲁杂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美斯提莎意识”具有乌托邦色彩，超越了二元对立思维，而这种思维是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但在另一层面上，这种新意识拒绝成为一种浪漫化的终点，一种通过自我赋权实现和解的停滞状态。相反，安莎杜娃把它看作是由不断的运动、含混和矛盾组成的一个迁移状态，沉浸在“文化碰撞”中，并最终与她的女性主义和酷儿特性不可分割。

安莎杜娃将新美斯提莎意识与性别和性征联系起来，并由此迁移进另一类型的杂合：本质上越界的，永远不稳定的，间隙性杂合。巴巴和扬均对之做过理论概括，拉什迪和汉尼弗·克尔西（如在《郊区的佛》和剧本《欢乐洗衣店》中）等作家，也论述过此类杂合。在《边境》中，作为女性主义者、女同性恋者和雌雄同体者的美斯提莎，成为打破各种纯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概念准则。作为一种间隙性的力量，新美斯提莎同时还是贱民、酷儿、异类和被驱逐者。她“像乌龟一样……（必须）将‘家’驮在我背上。”（21）盎格鲁与墨西哥之间的二元对立边界，或者上述两者之一与奇卡诺之间的二元对立边界，被打破了。打破它的是存在于这些文化内部、相互之间复杂互动的各种差异——“多重身份认同”的差异、矛盾性的关联主体立场的差异。在与盎格鲁人和墨西哥人的关系中，奇卡诺人受到蔑视。但在奇卡诺文化内部，男性享有特权而女性则被剥夺这种特权，而且尽管被丈夫虐待，母亲—妻子仍要比单身女人或女同性恋者更受尊重。作为一个同时生活在奇卡诺和盎格鲁文化中的女性和女同性恋者，面对这两种不同的父权至上、歧视同性恋者的文化形态，安莎杜娃是一个流动的角色，挑战了划分差异的所有边界的固定性。“我，和其他同性恋者一样，”她写道，“合二为一，既是



男性也是女性。我是 hieros gamos (神圣婚姻) 的化身:对立的品质在我体内融合。”(19)为了幸存下来,她必须养成“对矛盾的宽容、对含混的宽容。”(79)跨越了传统的边界,“她发现她不能将概念或想法拘泥于严格的边界……她学会在墨西哥文化中做印第安人,在盎格鲁视角下做墨西哥人。她学会在各种文化中穿梭往来。她拥有一个多重的性格,她以多重的模式运作。”(79)作为雌雄同体的、同性恋的印第安—西班牙—奇卡娜—盎格鲁人,她在所有这些差异间迁移穿梭,她不断变化的杂合状态质疑了这些差异表面上的稳固性。她在最精彩的那一散文章节中写道:

作为一个美斯提莎,我没有国家,我的祖国将我驱逐;然而所有国家都是我的祖国,因为我是每位女性的姐妹或潜在恋人。(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我没有种族,我自己的族人将我抛弃;但我属于所有的种族,因为在所有的种族中都有我这样的同性恋者。)我没有文化,因为,作为女性主义者,我挑战源自男性的印多—西斯帕尼亚语文化和盎格鲁文化的整体文化和宗教信仰;然而我也有文化,因为我正参与创造一种新文化,一种阐释世界与我们在其中的作用的新说法,一种用意象和符号将我们与彼此、与地球联系起来的新的价值体系。(80—81)<sup>46</sup>

《边境》在穿越混杂文化的多种形式时,实现了对固定的僵化边界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正是叙事的主题。对安莎杜娃而言,差异间隙空间最终扰乱了差异本身的绝对性,显示了差异如何在历史上形成、消除,又重新形成;差异如何在时空的变化中相互混合或融合;以及差异如何结合在一起进行压迫和解放,制造痛苦和愈合伤口。和差异一样,她所探索的混杂文化,其形成方式也是关联性的——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具有不同的变化。它在文本中的流动性本身,就标志着它对于创造

性的生存必不可少。尽管《边境》的幻想视野不断地让人想起乌托邦模式的杂合,但我相信如果我们仅仅将它看作,不可能实现之杂合的简单浪漫版本,那么我们就错了。安莎杜娃强调的是,日常生活——在物质、语言、心理和精神等各个维度——坚决主张了杂合的现实性。这种美斯提莎状态既作为一种压迫的标志强加于她,又作为一个潜在的自由场所而受到她的欢迎。第二部分的结束诗中,有一首概述了整个文本的多重杂合,以及理论景观的多重杂合,描绘了理论在杂合的压迫与解放、痛苦与狂喜、历史与地理形态、生理与文化维度以及多重含义和混合的舞台等场所中的快速迁移。该诗界定了一种多元文化的酷儿特性,将人种、族群、性别和性征纳入其对冲突与混合的表达之中。它的迁移性语气——在悲剧、喜剧和讽刺性语气之间来回迁移——呼应了文本在意义上的迁移。我部分引用如下:

生活在边境意味着你

既非 *hispana india negra española* (西班牙裔拉美人、印第安人、黑人、西班牙人)

也非 *gabacha* (白人女性), *eres mestiza, mulata* (你是美斯提莎、黑白混血儿), 混血儿

被围困在阵营之间的战火中

因为身上兼具了五个种族

不知道回到哪一方,逃离哪一方;

生活在边境意味着

知道你身体中的 *india* (印第安)成分,已被背叛 500 年,  
不会再与你交流,

知道 *Mexicanas* (墨西哥人)称呼你为 *rajetas* (叛徒),

知道否认你身体中的盎格鲁成分

和否认印第安或黑人成分一样糟糕；

Cuando vives en la frontera (当你生活在边境时)

人们从你身上跨过,风儿偷走你的声音,

你是 burra (驴)、buey (牛)、替罪羊,

新种族的祖先

一半一半——既男又女,两者皆不是——

一个新的性别；

生活在边境意味着

在罗宋汤里放点 chile (红番椒),

吃全麦 tortillas (墨西哥玉米饼),

带着布鲁克林口音说 Tex-Mex (美墨混合语),

在边境检查站上被 la migra (边境警察)截住；

.....

生活在边境意味着

磨房,长着剃须刀般锋利的白牙齿,想要磨去

你橄榄色泛红的皮肤,碾碎谷仁,你的心

捶打你挤压你翻滚你

闻似白面包但已死亡；

在边境生存

你必须生活 sin fronteras (没有边界)

成为一个交叉路口

(194—195)<sup>47</sup>

## 迁移型女性主义

那么,这些实践对我们理论总结边境上的迁移型女性主义有何帮助呢?这个迁移型女性主义并不泯灭差异,而是穿越并超越它,到达文化交往的空间、融合的过程与跨文化的杂合。罗伯特·扬观察道,“鉴于文化互动的历史之长,分析它的模式如此之少真是令人吃惊。”( *Colonial Desire* 4 )他接着说道,19世纪的模式,例如传播论和进化论,“将这样的文化交往概念化为弱势社会的去文化过程,和它向西方规范靠拢的变化过程。”(4)随着殖民主义的结束,较近的模式“经常强调分离”,构筑“两个相互对立的集团,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自我与他者……这种二元划分具有潜在危险,可能会再次造成它所致力于消除的静态本质主义范畴。”(4)相反,他寻求一种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双方变化的模式,寻求“有关文化往来的叙事,这些叙事描绘并隐藏了文化往来的形成过程和解构过程中的复杂性。”(4—5)扬在文化研究领域所呼吁的,正是我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一直设法表达的。然而,我并不寻求扬所希冀的;我更喜欢将“理论化”用作动名词,而不是名词。正在理论化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开放的过程,不断穿越各种各样的边境,而不是某一模式的封闭产物,这种封闭产物势必在人类的经验领域上树起边界。作为一种跨越边界的行为,迁移型女性主义需要抵制这一倾向:理论将思维与生活的片断和流动性加以固定化、系统化、组织化、分类化和稳定化的倾向。即使讨论流动与变化的理论也是如此。

如今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完全绝望的境况下被迫迁移、逃难、无家可归。对于挪用迁移的语言来比喻性地表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做法,我并不完全感到心安理得。迁移的比喻可能是有家可归之人和相对稳定之人的奢侈品。迁移的吸引力,无论是知识上的还是物质上的,毫无疑问对那些身处相对享有权力或特权的空间,如高校中的人而言

更为显而易见。(我强调权力的相对性,因为学院派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极端脆弱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论战与大学缩编中被边缘化并不断遭受抨击。)尽管我尽了这么多努力来整合权力问题和差异现实,我做的可能仍然非常不够,可能会受到(公正或不公正的)批评,认为我是又一个享有特权(白人、中产阶级、双性恋等等)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在文章中暴露了我对女性内部差异的含意的无知或不敏感。

然而,我仍然顽强地相信女性主义的思考需要超越纯粹差异,尤其要超越女性内部的差异,不过也要超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我用超越这一术语并非是提倡一种后差异时代的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一样,这个概念暗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谈论差异话语(谈过了,做完了)。尽管建立在这样的差异话语之上,北美高校中的多元文化女性主义 103 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全面理解差异的基础上定位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任务并未完成。鉴于高校中有色人种的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公开的同性恋者仍然面临威胁,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常常流于装点门面、词汇挪用、追赶时髦、缺乏信任和妒火中烧。为了取得任何持续性的效果,对差异的热情需要持续。

那么,我用超越这一术语是想表达,在各种尝试理解差异和图绘差异间隙空间的努力之间进行的,霍米·巴巴式的“忽此忽彼、来来回回”的运动。亨里埃塔·莫尔和迈克尔·陶斯格也将这种运动概括为同一性与差异之间,模仿与他性之间的对话。它亦是伊芙·科索斯基·塞吉维克在《暗柜认识论》中所提倡的在社会性别对话的“普适化”与“具体化”之间的运动。它还是妮娜·韦伯纳在《辩论文化杂合》一书的介绍部分所提倡的“普适主义的锡拉岩礁与差异主义的沙西德漩涡”之间的协商(1)。妮娜·韦伯纳坚持认为,“我们认识到社会团体热衷于维护边界、区分差异”(22),虽然与此同时我们使用杂合概念,来瓦解“用高压手段强制形成统一性的政治,这种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构成基

础是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真理。”(21)她声称,有一种“政治,以差异的合法性为其出发点,”还有一种政治肯定“文化翻译与自反性、种族内部交流与跨文化移动、杂合与克里奥尔化等问题”的存在(22,6)。

与此相似,我认为女性主义,和其他的进步运动一样,应该拒绝在差异话语或杂合话语这两极之间做出选择。我提倡在这两者间进行一种对话性的协商,允许它们纠正对方的偏激。单独强调差异话语,会滋长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分裂割据,压制对联系的乌托邦式渴望,并导致对跨文化融合的日常现实视而不见。二元主义的差异话语以差异的名义来压制异质性。单独强调杂合话语,则会滑入一种浪漫化倾向,一方面忽略集体身份认同的存在,另一方面忽略构建这种集体身份认同的权力结构。以其对不断运动的强调,这种话语的效果将是瓦解集体性和稳定性,而集体性和稳定性对于有组织的政治对抗而言是必须的。因此,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协商,拒绝单独强调任何一方。

我强调对文化杂合的理论分析,并非要压制女性主义的差异问题,而是通过关注差异边境上的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与融合,这一较少被承认的话语,来为女性主义提供有益补充。我仔细探讨了玛丽亚·鲁冈、葛洛莉亚·安莎杜娃和安娜·德维阿·史密斯的作品,因为它们均表演性地沟通了差异和边境之间的对话,具体展现了女性主义所面临的关键问题的一个方面。尽管鲁冈和安莎杜娃两人都在实践中摒弃了简单主义的种族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压制了种族双“方”的异质性,两人又都强调了自己作为拉美裔女性所具有的混杂文化,肯定了具有拉丁美洲人血统和墨西哥人血统的族群的特殊杂合过程。鲁冈表述了对差异的需求与对“‘世界’旅行”的渴望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动态变化,超越纯粹差异的嬉戏,和杂合的越界性质。安莎杜娃以令人眩目的流动性,在差异接触地带的多重生命形式中移动,在不同的杂合形式(混杂、融合、总已融合)、功用(常规型、越界型)、定向(时间型、空间型)和政治(压迫、抵抗)间迁移。史密斯拒绝接受白人/他者、加

受害者 / 受害者的固定二元对立,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质疑鲁冈和安莎杜娃有时不免倒退回去的种族绝对主义,发展出了她自己版本的“‘世界’旅行”和美斯提莎意识,这些版本潜在地将所有的社团涵括进她的多元文化的美国。她将差异当作一种旅行至他者的方式,既彰显出他者之间的差距,也突出了为实现相互的理解与和解而进行努力的紧迫性。尽管方式有显著不同,这三个文本均定位在戴安娜·格兰茜在《要求呼吸》中寻求的“那个夹在两个地方之间的空间,那个行走于两个世界的过道。”

我肯定了,对差异间隙空间的乌托邦式渴望所具有的现实影响,以及差异间隙空间内的表演性嬉戏。我也论证了,间隙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被渴望或被抵制的、超越权力现实梦想。与差异双方的空间相比,差异间的接触地带同样真实,同样是文化形态——包括身份认同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权力理论和赋权理论、我们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概念,需要强调关联互动的空间,而且强调的程度至少要与对差异空间的重视程度相当。我仔细地图绘了有关杂合的文化理论的全貌,因为在有关杂合政治的辩论中,杂合一词所涵盖的意义范围和流动性本身,就给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精确言说发生在差异之间的边境——超越了差异僵局的边境——上的迁移运动。





## 第二部分

### 女性主义 / 全球主义



### 地缘政治素养： 在“本土”将女性主义国际化 ——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例

那么，“去西方化”可以被看作是从“本土”开始的。

——凯瑞·卡普兰，《旅行问题》

因此，世界性就是在这些作品及其阐释中复原它们在全球背景中的位置，这种复原只能通过一种途径实现：欣赏的视角一定不能是某个狭小的，构筑得如同防御工事般的世界小角落，必须得是宏大的，开了许多窗户的，人类文化整体的这个房子。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的政治》

可以说，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最新进展常常涉及到，在速记中被简称为“女性研究国际化”的内容。紧跟女性主义差异话语之后，“将女性主义全球化”的要求源自多重历史条件的汇聚：跨国人口、商业、文化和信息加速流动；草根阶层女性主义运动在世界许多地方崛起，制订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规划；女性主义研究在全球扩展，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

高等教育和出版体制的一部分；并且所有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协力促进下，都致力于明确女性的基本权益。性别问题，通常与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跨国或全球化研究、地区研究的其他问题综合在一起。在这些新型的跨学科领域内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可能“最为热门”，开创了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新领域。

108 但将女性研究国际化或将学院派女性主义全球化，其含义是什么呢？在基本层面，它应该指对女性主义地方主义或纯粹地方主义的抵制，用这一术语我指的是对下述观点的（清醒的或无意识的）预设：“本土”女性主义的性质及产生它的自然性别/社会性别体系可以在“他乡”复制。在全球背景下，女性主义由一元化变为多元化，认为世界不同区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女性主义形式，以契合其特定的自然性别/社会性别体系和社会大环境。将女性主义国际化当然意味着承认世界其他地方的价值，并致力于了解更多的关于它们的知识。与这种对女性主义具有多种地方形态的认识齐头并进的，是以下两种研究：一是在全球环境下对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图绘女性主义如何从一地旅行至另一地，也即女性主义如何在全球流动，如何跨越差异边界并在移植过程中变化。

这样的全球化策略的困难和危险性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除非学者的研究领域本身就是比较性的，否则从本专业出发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性及其社会性别体系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才能获得足够的有关其社会与历史的背景知识。女性主义的拼凑物或大杂烩，在艺术领域如此漂亮并富有启发性，但在理论和学术领域却非如此。从各处拼凑一些点滴的女性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的做法，严重不顾及它们的历史背景，忽视了文化形态的多种本土决定因素。<sup>1</sup>此外，由谁进行国际化，和从哪种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国际化，都是重要的问题。斯皮瓦克在《国际框架内的法国女性主义》一文中，问了那个著名的问题：“谁是国际女性主义的支持群体？”它是否会重复这一模式：“‘西方’前去

‘了解’‘东方’,从而导致‘西方化的东方人’做出一些征兆性的努力来‘了解她自己的世界’……逆转并取代……西方与东方的铁定对立?”(*In Other Worlds* 135)斯皮瓦克曾批评过西方女性主义对《简·爱》的膜拜,在这个广为人知的批评中,她警告读者警惕,女性主义对目前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所进行的“全球化”。她用这个术语指称西方女性主义在“发现”和挪用第三世界时,再次表现出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将第三世界当作遥远的文化,它虽然受着剥削,但拥有丰富、完整的文学遗产,等待着将它译成英文版本后得到再发现、阐释和讲授——这种做法甚至在拓展文学学科帝国的同时,导致‘第三世界’成为一个能指符号,允许我们忘掉‘全球化’。”(“Three Women’s Texts” 798)

尽管女性主义全球化的这些策略、问题和批评相当重要,但它们均非我所关注的问题。我试图探讨的是,获取女性和社会性别体系的跨国知识的努力,背后隐藏的认识论问题。即,如果我们将女性主义国际化的话,我们对女性和社会性别的思维范畴将会如何变化?我的意思是,我们如何看待任何一种——不仅仅是“他乡”的,还包括“本土”的——女性或社会性别体系。国际化的思维会如何改变女性主义思维整体?知识革命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在它的范畴内将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实践国际化,这意味着什么?从国际化的角度来看,“本土”和“他乡”指的是什么?既然两者均不固定,均非铁板一块,均非没有问题的范畴,它们的变化含义会对全球化的阐释行为有何影响?我将会探讨这些问题,首先将地缘政治思维对于女性主义的重要性概要介绍,接着仔细研读地缘政治范畴如何改变对一位有影

109

## 地缘政治轴线

立场与定位的建构主义话语,有时会求助于“轴线”的比喻,来命名构成个人身份、文化形态和社会等级体系的各种成分。任何特定身份或实践可以被解读为不同轴线的交叉点,例如人种、族群、性别、宗教、阶级、性征、年龄和诸如此类的轴线。任一轴线均不以纯粹形式存在,但任一轴线都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与其他轴线交叉互动。在《暗柜认识论》中,伊芙·科索斯基·塞吉维克令人信服地论证:性征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轴线;不论性征与社会性别问题的联系多么密切,它们两个并非同向延伸,因而需要分开讨论。作为身份认同的一个历史形成并且不断变化的轴线,性征,对任何“少数派”性团体——具体说来也即异性恋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而言,具有特别的含义。但是性征也具有塞吉维克称为“普适性”的方面,她用这一术语指的是,构成性征范畴并影响任一特定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文化概念、制度和实践。正如“种族”,在一个以种族来划分等级的社会中,是每个人——而不仅仅是种族少数群体——的主体性的一个构成成分一样,性征也具有其概念上的说服力。<sup>2</sup>我想以类似的方式论证,地缘政治概念也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轴线。地缘政治的思维,意味着在考察每个人和每种文化形态时都要询问,构成身份认同和文化的地理政治轴线是如何与其他的差异轴线交叉、互动的。正如我们已经学会了探讨性别、种族、阶级或者性征对身份认同的影响一样,我们也需要探讨地理政治轴线如何影响任一给定的文化身份认同或实践。

但什么是地理政治轴线呢? 和任何术语一样,地理政治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尤其会根据不同的(跨)学科定位和关注点而产生变化。该术语结合了 *geo*,表示“土地”的词根,和 *politics*,权力关系的模式和对权力关系的研究。对有些人而言,地理政治意味着国际化或跨国的权力关系;在这些术语中,地理政治身份认同主要指不同形式的国

家身份或出身。然而,女性主义者长久以来一直坚持认为,政治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政府,更别提国家形态了。因此对我而言,地缘政治意味着,权力问题及其在地球这个空间领域内的表现。<sup>3</sup>对学院派女性主义,以及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研究,我建议使用一个具体的空间轴线。在这里我用空间一词指的,并非是一种静态或空虚的特性,而是人类社会的空间组织,也即历史上在具体的空间定位中,或经历空间定位的变化时,产生的文化意义和体制。<sup>4</sup>地缘政治思维意味着询问这一问题:一个空间实体——本土的、地区的、国家的、跨国的——如何转变所有的个人、集体和文化的身份认同。我们习惯于批评非历史性的分析,即没有考虑历史特异性和历时变化的思维形式。我们为什么没有针对非地理性或非定位性分析的批评范畴呢?差异分析的地缘政治轴线,反映了地理概念的紧迫性,要求对空间的各种含义保持警觉,关注其与时间含义在形成身份认同时的交叉。

110

地缘政治轴线与种族轴线完全交织在一起,就像性征轴线和社会性别轴线的关系一样。我们当然需要理解它们的勾联互动,但是要想有效地了解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将它们区分开来。举例来说,在托尼·莫里森的《宠儿》和巴拉蒂·慕克吉的《茉莉》中,身份问题主要集中于种族问题。在其美国环境中,莫里森笔下的(前)奴隶塞丝和慕克吉笔下的印度移民茉莉的深色肤色引发了种族主义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建构在卑贱、异化、兽性和/或异国情调的思想认识之上的。尽管针对非洲和南亚裔女性的种族歧视的形式大不相同,但在一个以白人为主导的体制内,种族的轴线对她们均形成压迫。这两本小说中的地缘政治轴线,虽然与种族轴线有着明显的关联,但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条轴线。这一点最简单地表现在,两位女主人公的不同出身所蕴含的意义上:塞丝是位出生在美国的奴隶,而茉莉是出生于印度的非法移民。在考虑种族轴线时,诸如“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的范畴,强调这些女性之间的种族平行性,但同时也倾向于抹煞她们之间的地缘政治差异,

和她们的定位运动中不断变化的复杂性。<sup>5</sup> 塞丝和茉莉两人均迁移过不同的地方,各地的地缘政治意义赋予她们不同的身份——塞丝是非洲离散者的后裔,是从美国南方逃到北方的奴隶;茉莉从印巴分治前的拉合尔市,迁移到旁遮普地区一个名为汉拿波的村落,再到外省城市祖伦巴,非法移民入口佛罗里达,移民聚集的纽约昆斯区,雅皮世界曼哈顿和美国乡村的“心脏地带”爱荷华的巴登。地缘政治空间的本土、地区、国家和国际维度,与种族和性别交织在一起,但又可以与后两者清晰分辨开来。要理解这些复杂的相互影响,我们必须首先将它们区分开来。强调突出地缘政治轴线不仅需要保持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敏感,还要保持对地缘中心主义的敏感。

那么我们如何用地缘政治的思维,来将空间看作身份认同和社会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并辨析其政治意义呢?这种思维的一个维度是去他乡“旅行”,这个运动可以将“本土”陌生化,使我们了解,我们想当然的事情其实是文化的产物,而且并非必然发生。另一个维度是从“本土”开始,将他乡的问题带回本土,在熟悉的境况中发现有时被忽视的他乡的痕迹。第三个维度则隐含于前两者中——即,打破本土与他乡之间存在的地缘政治疆界,明确本土和国际以什么样的方式总是已经勾联互动。这样的地缘政治策略,在多位理论家的作品中早已有大量的实践。我将回顾其中几位的观点以便清楚阐释。

爱德华·萨义德的“世界性”概念,主张将文本放置于全球,而不是纯粹的本土背景中,加以复原。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尤其有助于我们挑战在概念上局限于某一单一地缘政治定位的倾向。<sup>6</sup>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他对简·奥斯丁和其他英国经典作家的分析,既检验了铭刻于他乡旅行中的英帝国痕迹,又考察了殖民地他乡在英帝国本土的无处不在。例如,在奥斯丁那本典型的英国小说《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萨义德发现“一个帝国主义地图贯穿始终,成为语言与文化实践的一个重要部分。”(82—83)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生活方式,



依赖于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贸易、蔗糖和殖民种植园主阶级,这些事物被不断捎带提及,贯穿小说始终。这一帝国主义的基础,并非小说情节的细枝末节,而是对之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安提瓜岛的混乱状态使得托马斯爵士离开英格兰,而他的离开又导致了曼斯菲尔德庄园陷入混乱状态。萨义德得出结论,“奥斯丁在此处,比在小说中其他地方,最为清楚地将国内与国际的权威同步起来……她清楚地认识到拥有和统治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意味着要拥有和统治一片殖民地产,两者间有着紧密的,尽管不是不可避免的联系。其中一方的家庭宁静和令人向往的和谐,需要另一方的生产力和规章纪律才得以保证。”(87)这种对《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地缘政治解读显示,即便英国本土之外的空间,在这个主要关注“本土”冲突的叙事中,出现得似乎十分偶然,但它们的政治含义总是已经在国内的、本土的和家庭的空间中在场。正如凯瑞·卡普兰所云,“‘去西方化’可以被看作是从‘本土’开始的。”(*Questions of Travel* 166)或者,如西蒙·吉甘迪在《图绘英国特性》中论证的,西方“本土”的自我塑造(例如在关于英国特性的国家身份认同中)依赖于殖民主义“他乡”的存在。

对萨义德而言,地缘政治思维由一些高度二元对立的术语塑造成形,这些术语将帝国主义西方,与被殖民并进行抵抗的他乡对立起来。萨义德的欧洲中心主义,限制了他完全发展出他所提倡的地缘政治“世界性”。然而,他的工作为后继者打下了基础。<sup>7</sup> 对我的目的而言,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的关联策略:在他乡寻找此处的印记,在此处定位他乡。作为一种分析过程,这样的“世界性”需要打破全球与本土的二元对立,要看到全球总是已经在本土里,而本土也总是已经在全球中。正如罗兰·罗伯森所云,“全球化的概念要求我们看到,传统上被称为全球与本土的东西同时存在并相互渗透”,他用“全球本土化”这一术语来表达这种“相互联接”的概念(“Glocalization” 30)。他声称不论是对村落、地区还是国家而言,没有纯粹“本土”的文化。相

反,本土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而且全球力量总是在塑造本土文化(30)。<sup>8</sup>全球本土化对地缘政治思维的意义在于,它关注了斯皮瓦克所谓的“国际框架”,和影响所有本土文化形态的“跨国”状况(“Scattered Speculations”尤其是262)。<sup>9</sup>

112 从《零散思绪》中斯皮瓦克对“跨国文化研究”的呼吁中得到启发,女性主义者英德帕·格鲁沃和凯瑞·卡普兰,在其《零散霸权》的引言中,理论概述了一种超越了中心/边缘、第一世界/第三世界、西方/非西方等简单二元对立的跨国女性主义。她们声称跨国女性主义并非一种从非历史的角度探讨全球性别压迫的理论。这种立场在她们看来与“全球女性主义”紧密相联,后者将社会性别与其他差异体系隔裂开来,属于一种具体形式的种族优越论。与之相反,跨国女性主义,在各种各样的经济、法律、文化、政治和性征的权力结构的基础上,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性别与零散霸权的关系。”(17)它承认各地的社会分层体系具有多维模式;并强调人在所有的定位中都具有能动性。她们声称,与在差异中寻找相似之处的比较研究不同,跨国女性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寻找全球框架内的联系与共谋关系。这样,针对任何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性别形态的研究——换言之,任何关于性别的本土知识——应该受到跨国知识的影响。她们认为,全球总是在本土中在场,反之亦然。地缘政治思维需要追踪这些构成权力多向流动和权力的不对称关系的空间关联。

格鲁沃的跨国女性主义方法论,远非仅仅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霸权与非西方抵抗的元叙事情节。在《家园与闺房》一书中,她将旅行话语置于国内文化的范围内审视,并研读了19世纪印度和英国作家的旅行文本,以此来探讨“家园”与“国外”的地缘政治联系。她声称“‘接触地带’无处不在,并隐含于具体的话语空间中,这些空间用差异来表现和操控文化交往叙事。”(4)这个研究探讨了帝国范围内的文化转移问题,交往的双方都将他们在他乡发现的,或在关于他乡的旅行话语

中发现的文化本土化,将之吸收为自身的“内部”文化。“有关内部文化——即在国家疆界之内的文化——的许多其他叙事,”她写道,“也必须被定位在跨国的框架内,后者不应被简单化为,关于中心和边缘的话语叙事,或者有关全球化的话语叙事。”(242)以格鲁沃为代表,跨国地缘政治思维承认任何“内部”场景都是一个吸收、挪用和改造他乡输入的文化形态的场所。在这种大前提下,对权力关系的地缘政治分析,把由权力的多向流动造成的分散霸权,以及本土与跨国的社会分层体系,纳入考虑的范围。

地缘政治思维必须关注帝国和后殖民背景下的复杂权力问题和杂合的文化转移形式。但是它不应当被局限于,仅仅追踪研究西方征服、帝国主义和对非西方他者的统治造成的后果,因为这种含蓄的限定会导致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认为地球上其他地区没有此类的地缘政治行为。此外,它还将地缘政治研究过窄地局限于,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问题的研究,而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并未覆盖研究的全部范围。格鲁沃和萨义德一样,继续在西方帝国的框架内做研究,而詹姆斯·克利福特则拓宽了对全球/本土之间的相互联系的研究。他认为这种联系在所有文化中均不可避免,并且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对该问题的研究包含发生在帝国主义交往的接触地带内的全球/本土之间的相互联系,但不应仅仅局限于此。在《旅行的文化》一文中,他声称人种学一直以来太过专注于辨认稳定的、本土化的文化中心,从而忽略了以下这点:所有的文化都在不断变化,对发生在它与其他文化接触的边境地带上的互动做出反应。他呼吁要从他称之为“寓所的人种学研究”转变到“旅行的人种学研究”上来。他解构了将人类学家看作旅行主体,将他的研究对象看作静态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转而建议读者认识到运动和旅行是所有文化的构成部分。他者也进行旅行。他者也观察人种学家,其视角常常是已经旅行过的,或者至少是受到边境地带的文化交往影响过的。他注意到,“在许多的传统人种学研究中,人种学家

把实际上是地区的 / 国家的 / 全球的联系也本土化了,把‘文化’的外部联系与移植都边缘化了。”(100)关注本土与国家与国际的此类联系,会纠正失衡问题,并最终使得人种学能够审视寓所与旅行的互动关系。

阿君·阿帕杜埃的“全球族群景观”概念延伸了克利福特的程式,从人口统计的角度审视了全球人口流动的变化与迁移模式。他声称,没有“纯正”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是文化间交流的产物。他用“全球族群景观”一词来指称“移动的群体和个人”形成的变化的景观。这些群体和个人的旅行打破了家乡与他乡的固定对立。“这并不是说,”他解释道,“没有相对稳定的团体和网络,如亲属、朋友、或工作和休闲关系,以及出生、住所和其他从属形式。但是由这些稳定性构成的经线,无处不在地被人类运动的纬线所击穿。”(“Disjuncture” 7)在阿帕杜埃的框架内没有纯粹的内部空间。

在借用格鲁沃与卡普兰、克利福特、阿帕杜埃等人作品中出现的对旅行和跨文化接触的强调,来发展形成地缘政治思维的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同时,有必要强调,修正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本土或内部的权力关系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和进一步从事此类研究的必要性。作为“寓所的人种学研究”,这些工作有效地扰乱了家的概念,令内部空间不再那么顺理成章,并表明了它远非“稳定”,而是一个充斥着强烈的他性、压迫、边缘化和女性抵抗的场所。<sup>10</sup>此外,旅行和运动还常常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现象,同时又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如克利福特本人在《旅行的文化》一文中承认的)。克鲁沃将内部等同于“国家文化”的做法,掩盖了国与家的区别,因其过于关注对跨国关系的强调,所以在处理家庭、本土、地区和国家关系间的紧张状况时就略显不足。

本土空间,对于女性主义者形成地缘政治素养而言,仍然具有持续的重要性。一个例子就是,克利福特和乔治·马科斯合著的《书写文化》(1986)一书的封面照片。那张照片曾引起广泛的讨论,照片的说明文字是“野外考察的斯蒂芬·泰勒,由玛莎·G. 泰勒拍摄”。它聚焦的是一

位在印度乡间,完全沉浸于书写其野外记录的白种西方人种学家。他坐在一户寓所的门前台阶上,背对着坐在他身后门廊内的一位若有所思的印度人,那人正凝视着这一幕人种学书写的场景。克利福特和马科斯用这幅照片来阐释“人类学的一个转折期的起点”(3),即研究重心从人种学的研究对象(人),转移到写作的过程(书写)。在《旅行的文化》中,克利福特更新了转折期的说法,呼吁读者更多地关注该照片中暗含的,通过旅行实现的跨文化接触。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则注意到,克利福特和马科斯在讨论这张照片时忽略了内容——即两位印度女性的在场。她们站在门道内,几乎隐身于寓所内部,她们也在凝视那个白人男性的写作。<sup>11</sup> 女性主义地缘政治思维由此得出的教训是,套用格鲁沃的话,“接触地带无处不在,”甚至包括寓所之内。简言之,在我们努力形成一种系统的方法论,来理解差异的地缘政治轴线时,大量的关于家庭成员、家园住所和家庭生活的女性主义理论不应该被抛弃。我建议我们应该通过理解在家庭中出现的地缘政治维度,来增补和修订已经做过的工作。

114

同样的,我并不打算在地缘政治思维中摒弃比较学的研究分析,虽然斯皮瓦克、格鲁沃和卡普兰在定义其跨国方法论时都曾部分地暗示过这种做法。<sup>12</sup> 无论比较学科在西方的源头是什么,在我看来,比较思维并非本质上欧洲中心主义的,也没有已经枯竭无用。克利福特这样为比较研究辩护:“我在此致力实践的比较视野,并非一种总结的形式。相反,我的比较知识概念产生于旅游路线,总是标志着‘入口’,是包含地理定位的历史和包含历史的地理定位。”(“Traveling Cultures” 105)在我看来,苏珊·施奈德·兰瑟的论述,有效地支持了修正主义女性主义的“跨文化比较实践”,该实践摒弃了将西方作为比较基础的特权行为,以同样仔细的态度既研究了差异的具体特性,也研究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平行特点(“Compared to What?” 尤其是 296—300)。此类的“比较特性……既欣然接受差异,也欣然接受相似性”,并且不将它们均质

化(297)。我想补充的是,跨文化比较实现了一种概念的“旅行”,对“家乡”实现了去自然化,令我们看到了许多原本以为是“自然”的文化建构。不同定位的突兀并置,常常会带来令人惊诧的阐释效果,并使得地缘政治轴线对其他差异轴线的影晌成为关注的焦点。比较研究和跨国方法论的“全球本土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两种实践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地缘政治的方法论。

### 非常规解读: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伍尔夫

在我将女性主义理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学院派女性主义重叠起来形成的“本土”基地内,以及在美国,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是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和作家。我拟从地缘政治理论这一不为读者熟悉的领域出发,来重新审视她生活和写作中的一些广为人知的细节,将其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来分析在“本土”将女性主义国际化的实践,并从中发展出阐释地缘政治差异轴线的策略,该轴线贯穿伍尔夫作品始终,并总是与其他的差异轴线——如性别、性征和阶级等——相互联动。这么做需要既关注她写作时的地缘政治维度,又关注阅读行为与实践的地缘政治维度。最近有一个研讨会的名字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国际研讨会”。正如该名称所反映的,伍尔夫是国际的,是真正跨国的一个文化现象。<sup>13</sup>但解读国际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究竟有何意义,并且应该有何意义呢?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空间和地缘政治维度是如何铭刻在其作品中的?她的作品与在场是如何全球流动,经历不断的文化移植的?她是如何在不同的国家土壤中扎根和成长呢?她的英国出身是否会构成阐释的优势场?或者,在离开了英国土壤后,伍尔夫会否失去她被置于本国环境中解读的权利?是否存在一个全球的伍尔夫,一种跨国现象或意义组?或者,国际化的努力本身会不会擦除不同文化阐释的特异性?历史——即时间的流逝和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对伍尔夫的空间传输产生了什么影响？谁才是地缘政治的伍尔夫，而她又与分别或互动地通过性别、性征、阶级、种族和宗教等透镜来阐释的伍尔夫，有何关系？

对学院派女性主义而言，这些问题具有特殊的紧迫性，因为伍尔夫的空间移植不仅跨越国家边界，还跨越体制疆界。北美高校已经成为女性主义实践的关键场所，而伍尔夫自己常常在其中处于焦点位置，在她当时所处的英格兰的背景下，伍尔夫很可能对这一情况深感吃惊（如果不是反感的话）。对于名望，她也许会喜欢，我想她会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些名望，虽然学界对此存在一些相反意见。但是对于政治和大学体系呢？她太习惯于牛津剑桥的思维，将大学看作是修建来维持父权与阶级霸权的高墙深院。如今的概念认为，大学允许或者甚至滋养以女性主义质询和学术实践形式表现的激进思维，这对她而言是非常陌生的。伍尔夫在将其非同寻常之处隐藏于“普通读者”的面具后面的同时，将她的对抗意识定位在局外人的立场上。这其中一个是突出的姿态就是置身于学术圈之外——确实，尽管在其蔑视中夹有一丝嫉妒，但是她确实鄙视精英学术与教学的环境，及其极端保守的浮夸。<sup>14</sup>然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国际性本身，牢牢地将其定位在了她所鄙视的这个机构的中心位置。对于美国学院派女性主义者而言，伍尔夫对于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抵抗计划一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在她的跨大西洋移植的过程中，伍尔夫从学术圈的外部转移到了内部。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伍尔夫就已经成为一个场所（引人瞩目的景观和常被引用的对象）。地缘政治角度的伍尔夫研究，存在两个重要且相反的模式。其创立者分别是两位北美学者：休·肯纳（原籍加拿大）和美国的阿德里安娜·里奇。两人都承认伍尔夫位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交叉点上。但肯纳抨击伍尔夫缺乏国际性，而里奇则责备伍尔夫的国际性具有虚幻色彩。她们在 1984 年发表的文章最能说明问题。先看肯纳：

116

(弗吉尼亚·伍尔夫)并非国际现代主义的一部分;她是英国风尚小说作家,从她所在的布卢姆伯里“村庄”为她的英国读者写一些村落谣言(当然这些英国读者是有教养的:这是狄更斯时代和她的时代的主要区别所在,而且布卢姆伯里这个村庄拥有一座很好的图书馆)。她与读者的共性在于某种难以言喻的精明意识;乡土作家的力量总是在于此。正如福克纳和威廉姆斯博士属于美国的乡土一样,她也属于英国的乡土:身处乡土之内却精明地了解远处的大事,甚至像《尤利西斯》的顺序这样的事。对于上述三位乡土作家而言,他们承认国际现代主义并从中汲取其所需是很正常的事情。(“Modernist Cannon” 57)

作为对比,里奇这样写道:

我将在欧洲发表这些言论,但一直以来我都是在美国搜寻它们。几年前,我本想谈论女性的集体压迫、世界各地女性的集会运动……以前所有的政策在尝试认识父权制的普遍阴影时的失败……

作为一个“恰巧”是白种美国公民的女性主义者,我本想谈论上述话题。虽然我意识到我的政府已经屡被证实具有暴力和恃权傲慢的能力,但是因为我自认与那个政府并非一体,我想也不想地引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三个基尼》中的语句:“作为女性我没有国家。作为女性我不想要国家。作为女性我的国家是全世界。”<sup>15</sup>

我 1984 年来此地时并没有谈论这些……作为女性我有国家;作为女性我不能仅仅通过谴责政府,或者说三遍“作为女性我的国家是全世界”,就能将国家与我剥离。暂且撇开种族忠诚不谈,而且即使民族国家现在仅是跨国巨头公司为其利益服务的掩护,我



仍需要理解地图上的一点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一点,而我,作为一个女性、犹太人、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在其范围内如何被创造并试图去创造。(“Notes” 212)

肯纳拒绝将伍尔夫归类为现代主义作家的观点颇为罕见,即使现代主义研究的保守派精英分子也很少持有这种观点。不过,他将现代主义与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却十分普遍。但他,以及与他持有相似看法的人,用“国际主义”一词表示了什么含义呢?我们需要对“国际”这一术语去自然化,理解它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构成,而不是想当然地假定这一概念具有一个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意义。肯纳将“国际现代主义”的特点总结为一种多语种现象,建构在不断地旅行和运动,长期居留国外以及多种语言和文化的杂合之上。其他学者也强调它的都市性质:它所关注的中心是英国、欧洲和美国人马尔科姆·布莱伯里所谓的西方的伟大“文化首都”,尤其是伦敦、巴黎、纽约、柏林、圣彼得堡,和较小一些的维也纳与罗马。<sup>16</sup>在这些评论家看来,现代主义的国际性意思是说,随着作家们背起行囊,各种影响轴线在大西洋和欧洲大陆交叉运作。这些作家经常生活在永远的流放之中,和其他同样从家庭和国 117  
家中异化出来的艺术家一起,形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在物质和审美上的越界,将他们建构为跨国精英,他们相互间的共同性,要大于其与自己国人之间的共同性——如果你愿意比较的话,这是对中世纪时欧洲文化精英超越其本土特性的一种改组重现。

肯纳等人将建构于 19 世纪的“西方”概念接受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因而认为现代主义的国际主义化是具有深刻西方背景的现象,现代主义作家从具有伟大传统的重写本中汲取养分,这一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罗马、希腊时代和中东地区的文明摇篮时期。<sup>17</sup>从这一角度来看,现代主义经常重返西方传统的经典文本,使之重新焕发活力,并以此为手段,瓦解了比它稍早的一些流派——浪漫主义、维多利亚现实主义和颓

废派。为了打破这些稍早流派的束缚——据说是这样——许多作家在“原始”形式和非西方文化中寻找灵感，由此产生了对非洲艺术、亚洲宗教和美洲土著仪式的大规模挪用。英国和欧洲各帝国不仅提供原材料和市场；它们的差异本身给现代主义者提供了终止 19 世纪西方霸权的工具。国际现代主义需要一种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文化窃取，需要人类学家米歇尔—拉尔夫·特鲁诺所称的由他者居住的“野蛮狭缝”，西方可以对比着它来将自己的文明定义为具有普遍性。<sup>18</sup>

在这样一个国际现代主义的地形图中，伍尔夫似乎是个家庭型的人，将自己局限在她的英国特性之中（也因而被其限定）——简言之，她是肯纳所驳斥的“乡土”作家。不同于许多现代主义者，她不需要离开家园才能写作。她从未在国外长期居留，而且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相比，她的旅行主要是短期的假期旅行，其原因可能在于，国外旅行在她的生活中早早地就和重病及死亡联系在一起。她姐姐史黛拉的欧洲大陆蜜月旅行，正巧赶上她母亲朱莉娅的致命疾病；她全家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的旅行，直接导致了她的哥哥索比的死亡；后来，瓦妮莎在去土耳其的一次旅行中突然生病，这导致伍尔夫焦急万分地独自前往君士坦丁堡；伍尔夫去西班牙和意大利度过了自己的长长的蜜月旅行，但随后几年却困扰于严重的精神疾病。<sup>19</sup>从美学角度而言，伍尔夫也主要是待在“家里”，处于英国的传统之内，仅仅偶尔将小说置于不列颠之外，或在文章中论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诗章》、《尤利西斯》和《荒原》中使用的多语种混用的语言、风格和互文性引用策略，在伍尔夫的作品中找不到相似之处。在国际现代主义的批评建构中，伍尔夫似乎拒绝跨国界的越界行为，颇为安心地逗留在英国的疆域之内。

然而，阿德里安娜·里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提出的女性主义理论，却认为伍尔夫展示了一种危险的国际主义。她所说的国际主义与肯纳等人的国际主义颇为相关，而不是截然不同。这种国际主义表现了西方的民族优越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物，它将一切西方的

东西当作普遍事物的衡量标准。里奇之所以要批评伍尔夫的国际化,原因在于,她和许多其他的女性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看到了定义一种定位式政治的迫切需要。这种政治不会擦除女性内部的差异,来服务于一种虚假的全球姐妹情谊,这种姐妹情谊潜在地会掩盖国内与国外的不同女性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在《通往定位政治的笔记》(1984)一文中,她探讨了北美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理论与组织问题——即从强调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差异,转变到理解女性之间的具有分裂性的差异。她在这篇文章中与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分道扬镳,这一行动暗中隐藏了一种自我批评:她曾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呼吁实现伍尔夫式的全球女性主义,但如今她摒弃了这种观点。<sup>21</sup>

里奇和肯纳,在关于伍尔夫的国际性是缺乏还是太多的问题上,持相反的观点。他们的相反观点至少有一个共同之处:两人均对伍尔夫的复杂作品,及国际和地缘政治在其中所占的位置,进行了探索式的(错误)阅读。国际现代主义的支持者,将伍尔夫限定在国内的范围内,他们完全忽视了以下这点:就伍尔夫而言,本土在多种渠道上与国家和国际有共谋关系。仅举一例,这样的忽视导致了马尔科姆·布莱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用带着轻视语气的句子结束其为伍尔夫所做的传记条目:“伍尔夫夫人的现代主义,在有些方面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家庭化的现代主义,但是它含有困扰与恐惧的尖锐底音,这些阴郁的洞见毫无疑问与她1941年的自杀有关。”(639)<sup>22</sup>在他们看来,家总是已经被家庭化的,不属于国际的范畴。但是对伍尔夫而言,正如许多伍尔夫评论家已经指出的,地缘政治权力关系始于“家中”的家庭父权结构。

里奇反对《三个基尼》中存在的超验性的全球主义,但她将伍尔夫的一些引起反响的语句从其上下文中剥离出来,才得出这个结论。在该文本的这个部分,伍尔夫并不是在提倡建构这样的一个全球女性主义:在其中,性别压迫将世界各地的女性联系起来,统一在共同的姐妹情谊之下。相反,她表达的是一种和平主义者的“对全世界的和平与自

由的渴望”，这种渴望要求与“国家的自我表扬”和军事防卫自觉地保持距离（109），从而含蓄地拥护一种替代爱国主义的，国际化的抵抗型身份认同。她认为女性在一定意义上，是这种和平主义的潜在先锋，因为她们作为一个群体面临着多重的排挤，这使得她们在国家身份认同上与男性存在显著差异。近来许多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强调了这一点。<sup>23</sup> 伍尔夫认为，爱国主义导致了战争，而不是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和平取决于摒弃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全人类均具有的共同人性。她经常被引用的那名掷地有声的话，“作为女性，我没有国家”放在其上下文中来看，表明了其对民族主义的拒绝和对激进人文主义的拥护。和她的其他作品一样，《三个基尼》并未擦除本土差异，而是“厚描”了性别与其他社会分层体系在国内环境中的互动（克利福特·吉兹称之为“本土知识”）。她的作品——尽管常常是唯物主义的——展示了一种早期的女性主义的定位式政治，而不是，如里奇所暗示的，对这种政治的批判。

119 尽管肯纳和里奇在评论伍尔夫的国际性方面仍然具有影响力，一种不同类型的地缘政治伍尔夫研究已经开始显现，它超越了肯纳式的国际现代主义的制约框架，也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专注于女性内部差异的北美女性主义。一种方法是考查伍尔夫的文本在穿越或移入新的国家文化时的接受情况。例如，在《中国之行：东方、西方与伍尔夫》一文中，美尔巴·卡迪—基和李凯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去世之后进行外国作家研究的中国学者，关注伍尔夫的风格，忽略她的政治性，这与西方研究者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认为，解读地点的历史条件是复杂而有力的因素，决定了伍尔夫作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解读（还可参见Chapman）。这样的接受研究有两个缺陷，虽然不是不可克服，但仍然是有问题的。一是，它倾向于对伍尔夫评论做现象性的总结，却不考虑这些观点是如何反映了地缘政治定位。二是，它突出强调的一些阐释，常常暗合了有关国家身份或利益的某种预设概念，从而将原本异质

的阐释阅读实践同质化。(肯纳和里奇关于伍尔夫的不同观点本身,就应该让我们警惕这一事实:同样的国家定位并不能确保相同的观点。)对影响接受的地缘政治决定因素的忽视或过分强调,都会妨碍我们追踪伍尔夫的地缘政治移植。

受到后殖民研究的挑战,一些评论家已经开始着手,从另一个角度来从事地缘政治的伍尔夫研究:研究伍尔夫的生平和作品中存在的帝国问题。比较著名的一例是简·马库斯的文章《大不列颠统治〈海浪〉》。该文引发读者争议伍尔夫对帝国话语和帝国权力的批判以及她在其中的东方主义式参与,尤其是在《远航》、《达洛威夫人》、《奥兰多》、《海浪》和《三个基尼》等文本中。举例来说,和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对经典英国作家所做的解读一样,凯茜·菲利普斯在《帝国背景下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书中声称,英国的帝国主义在伍尔夫的全部作品中均有表现。不过,和萨义德不同的是,凯茜·菲利普斯将伍尔夫的立场定义为完全批判性的。和萨义德持更相近立场的玛丽安娜·德科文则认为,《远航》中帝国所占据的位置更具矛盾性,它既抨击又加强了那些被批评的话语,因而撕裂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在这些对伍尔夫和帝国所作的地缘政治解读中出现了两个问题。<sup>24</sup> 其一是隐现于西方帝国主义范畴内的二元对立分析仍然具有吸引力,导致了对中心/边缘和主体/他者模式的过度依赖,从而太经常地在急于谴责中心的同时,否认了多元他者的能动性。其二是,这样的二元对立倾向于使伍尔夫的评论者陷入无果的争辩之中,讨论到底该赞扬伍尔夫是帝国的批评者,还是该批评她也参与了帝国主义并从中受惠。<sup>25</sup> 伍尔夫生平、作品和接受中的地缘政治轴线,比帝国主义政治更为广阔,和对伍尔夫和帝国关系的讨论同等重要。对于一个出生于英帝国鼎盛时期,并在其日落西山之际去世的英国作家而言,帝国的故事显然是处于中心地位的。但它并非全部的地缘政治故事。

为了将对伍尔夫的地缘政治解读,拓展到国际接受和西方帝国问

120 题之外,我想借助格鲁沃、卡普兰、阿帕杜埃、斯皮瓦克等人的跨国和多  
重并发的研究方法,以及克利福特呼吁的旅行人种学。这些理论在关注  
权力问题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将伍尔夫从单纯国内或单纯英国的领域剥  
离出来的方法,以便分析世界是如何总是已经嵌入本土之中的。我尤  
其想借用克利福特的话语,希望我们的研究重点从将伍尔夫的文本当  
作寓所的人种学研究来解读——对家庭情节的解构、对家庭生活的修  
正——转移到将它们视为旅行的人种学研究。正如人种学借用小说的叙  
事形态,来讲述关于其他文化的故事一样,小说写作也常常凸显了作  
家对某一特定文化形态的人种学凝视。因此,在借用克利福特的人种  
学理论来讨论文学叙事时,我们可以问以下问题:旅行和运动的比喻出  
现在伍尔夫文本中的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在其中?谁或什么移入  
和移出了家庭场所?在哪些方面本土总是已经暗含在权力关系的地区  
、国家和全球轴线之中?而且反之亦然。寓所之外的权力体系如何不  
断地使得家庭失去稳定性?伍尔夫文本中的静与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如  
何?而这一过程又是如何铭记于她的地缘政治方面?家庭与旅行的场  
所在哪些方面会因性别、阶级、性征、种族和国别等而发生变化?这  
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伍尔夫写作中的自觉政治和实验性嬉戏,它  
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构成文本的地缘政治无意识?

这些问题可以令我们重新调整关注点,来审视伍尔夫常常被引用  
的一些片断,例如在《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中关于布朗太太在火车  
车厢内的描写。布朗太太是伍尔夫用来表示人类性格的神秘性的象征  
人物,为什么伍尔夫会在小说中让她乘坐火车,而不是坐于室内呢?或  
者想想伍尔夫在《往事小记》中描述过的,她记忆中最早的那个前俄狄  
浦斯时刻:“黑底上有红色和紫色的花朵——我母亲的衣裙;当时她要  
么坐在火车上,要么坐在公共汽车里,而我就坐在她腿上……也许我们  
要去圣埃维斯;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是从伦敦返回。”(64)套用阿帕杜埃  
的说法,“人类运动的纬线”被完全编织入母亲稳定性的经线之中。

甚至在伍尔夫最为家庭化的小说《到灯塔去》中,对圣埃维斯的小说再现,也不是设定在现实生活中的康沃尔郡,而是在遥远的苏格兰的西北部,赫布里底群岛中的斯凯岛。<sup>26</sup> 在后来从斯凯岛寄给姐姐瓦妮莎的信中,伍尔夫强调了该岛的异国感:“这里,我们在斯凯岛上,而它感觉就像南海——极其遥远,四周环海,居民说盖尔语,没有铁路,没有伦敦的报纸,几乎没有居民。不论你相信与否,据我判断它与意大利、希腊和普罗旺斯属于一个层次(据说以它自己的方式)”(Bell, *Woolf* 2: 205—206)这样的观察令我们联想起不列颠和所有的国家一样,在其国家疆界内部有中心与边缘,有内部征服与殖民的历史,有“外国人”和“他者”。

麦克纳布夫人,应该注意到这是一个爱尔兰名字,这在一本英文小说中是清楚的地缘政治标志。<sup>27</sup> 为什么我们主要从阶级的角度来解读她呢?她当然是伍尔夫笔下的相对不寻常的工人阶级角色之一,她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展现。但是,在《时间流逝》的第五节中,121 麦克纳布夫人在首次出场时愚蠢地步履蹒跚、频抛媚眼、手不释杯,这种描写令人不安地联想起,英国人将爱尔兰人看作酗酒者,将凯尔特人看作低等民族的固定模式描写,暴露了文本的地缘政治无意识。<sup>28</sup> 与这一人物刻画模式相对抗的,是麦克纳布夫人在《时间流逝》的第八、九节中的第二次出场。这时,麦克纳布夫人有了明显的变化。叙事者从符号化的固定模式人物的外部,“旅行”到麦克纳布夫人的意识内部。她的意识得到了叙事者富有同情心的再现,而再现的方式则是自由间接引语,与叙事者在再现另一阶级的英国人物时使用的是同一种方式。这种转变可以被理解为伍尔夫的“旅行”,她从将研究对象当作“他者”,“旅行”到开始能够想象多重建构的他者也具有能动性。前者彰显差异,而后者则试图在差异间架起桥梁。<sup>29</sup> 那么我们也许能问,伍尔夫跨越这个桥梁的次数为什么如此少呢——她在大多数情况下既拒绝现代主义原始主义的“野蛮狭缝”,又拒绝尝试去想象地缘政治他者的能动性和

主体性？<sup>30</sup>

尽管《到灯塔去》具有“外国”场景和外国仆人，但伍尔夫在其中的旅行主要是，通过拉姆齐夫妇，进入到维多利亚时期中上阶层家庭内部的黑暗中心。<sup>31</sup> 正如许多女性主义评论家已经指出的，伍尔夫对莱斯利和朱莉亚·斯蒂芬的小说再现，解构了性别的二元对立，通过对家庭进行修正主义式的改头换面的刻画，重写了俄狄浦斯式的家庭罗曼史。但是小说中的地缘政治维度就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关注。我拟从小说的开头部分摘出两个广为人知的画面做一个简短分析，以之来提供一种跨国主义的角度。第一幕是在小说的开篇，拉姆齐先生向夫人寻求同情之前的叙事介绍部分。拉姆齐夫人像圣母玛丽亚一样坐在窗前，怀里抱着儿子，窗框像画框一样将她圈起。第二幕是拉姆齐夫人离开家人的独处和恢复精力的时刻，这是她在帮助一个又一个的劳心伤神的家人之后忙里偷闲挤出的时间。

克利福特提出的“寓所的”和“旅行的”人种学研究的对立概念，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伍尔夫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典型化性别情节所做的修正。而格鲁沃和卡普兰对跨国“全球本土化”的分析，有助于辩认英国家庭中的性别与阶级关系的地缘政治维度。拉姆齐夫人代表了寓所的空间。她是养育全家的静态的、多产的存在，是防止船只失事的那束灯光。拉姆齐先生则代表了旅行的空间，是一个动态人物。在他最终走到妻子身边寻求同情之前，他像船只抢风航行一样在窗前走来走去，同时吟诵着诗歌。他是移进移出家庭空间的人，可以享受外部世界的公众名望，而拉姆齐夫人却无法得到这些。这两位看起来差异巨大。但是正如克利福特的寓所与旅行的辩证概念所暗示的，静态与动态，内部与外部，是共谋的、相互渗透的。

拉姆齐先生吟诵的诗歌是丁尼生的《轻骑兵冲锋》（1854）。它将克里米亚战争的地缘政治范畴带入到家庭生活的中心地带，间接地将国家的地缘政治与家庭的地缘政治联系起来。伍尔夫后来在《三个基



尼》和《幕间》所做的正是此事,而且方法更为直接。对于“在国内”的英国公众而言,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这场战争涉及的地缘政治结盟,远比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西方与东方争锋相对”的经典情节复杂得多。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与奥斯曼帝国联盟对抗俄罗斯。这是英国长期战略的一部分:英国长期支持奥斯曼帝国,以抵制俄罗斯帝国向伊朗和印度扩张。丁尼生在阅读了1854年11月1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社论之后,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诗。社论的创作基础是该报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发来的快讯。拉塞尔详细报道了大量士兵的痛苦与伤亡,以及军事领袖们经常出现的愚蠢或无能。这份报道伴着早餐的餐盘,出现在受到高度震惊的百姓面前,打破了国内与国外、私人家庭与公共侵略之间的划分。更有甚者,拉塞尔的详细快讯迎来了现代媒体在战时的一个新角色,它所进行的文化工作就是一个多世纪之后电视镜头所担当的文化工作:电视伴着晚餐给美国大众提供了越南战争的生动画面。拉塞尔的报道煽起了对战争的争论与热议。这股热潮给弗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出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她从士兵们遭受的痛苦中创建了她著名的事业,并间接地将士兵的痛苦与国内她所属阶层的女性遭受的痛苦联系起来。她给那些女性开出的药方就是,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将护理创建为一个职业的过程中做些有意义的工作(见图2和图3)。<sup>32</sup>

丁尼生以英国骑兵在巴卡克拉瓦的自杀式冲锋为基础,创作了那首诗,颂扬“高贵的六百人”的英雄主义,并同时质疑了其领导者的判断力。因为一系列的错误和误解,在没有任何有益的军事目标的情况下,那些人就派他们的士兵冲向俄罗斯人的枪口,送这些士兵走上了不归路。几乎无人从这场冲锋中幸存下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称之为“某个丑陋的错误,”这个短语稍加改动后成为“有人犯了错误”的诗行,反复出现在这首诗中。<sup>33</sup>部分引文如下:



图 2. 当时的一幅漫画：卡迪甘伯爵，克里米亚战争中他是 1854 年巴卡克拉瓦轻骑兵进击的领队。引自 A.J. 巴克的《自吹自擂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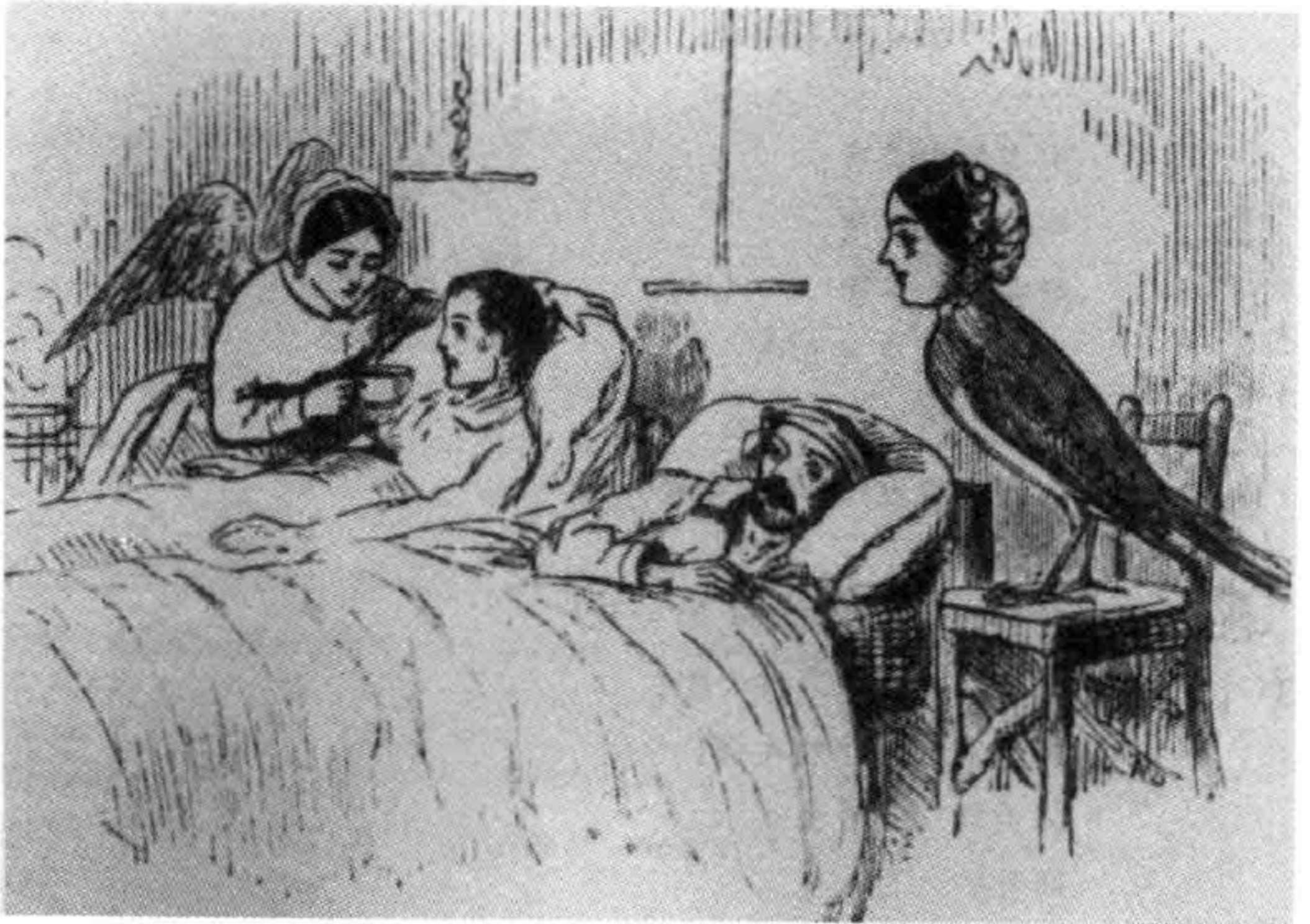


图 3. 当时的一幅绘画：受伤的士兵与夜莺，克里米亚战争中  
南丁格尔的护士被称作夜莺。引自 A.J. 巴克的《自吹自擂的战争》。

“冲啊，轻骑兵！”

可有一人惶恐踌躇？

没有，纵然士兵们知道

有人犯了错误：

他们无意反驳，

他们不问为什么，

他们只知慷慨赴死：

六百名轻骑兵

冲进了死亡之谷。

.....

炮在他们右边，

炮在他们左边，

炮在他们前面

发出阵阵雷鸣；

顶着炮弹的暴雨袭击，

他们勇敢地冲锋，队形整齐，

.....

他们的光荣能有褪色的一天？

啊他们的冲锋真够大胆！

赞美他们那次的冲锋！

赞美那一队轻骑兵，

高贵的六百人！

( 289—290 )

123

124

丁尼生的读者，不论在当年还是现在，都在争辩这首诗是愚蠢的颂扬之曲，还是故意的讽刺之作。<sup>34</sup> 但是对伍尔夫而言，不论丁尼生本人有没有这层创作意图，它都显然是对诗本身夸夸其谈式的爱国主义的一种讽刺。拉姆齐先生狂乱地挥舞双手，打着手势。他先是大喊“我们勇敢地冲锋，队形整齐”，接着又用更为绝望的语调喊“有人犯了错误。”拉姆齐先生冲向莉莉和班克斯，几乎撞倒了莉莉的画架( 17, 18 )，这一幕是对诗歌场面的一种戏仿。他冲向妻子，在阳台上跺脚并咒骂她“该死的”，大概是因为她说第二天的天气会允许他们去灯塔( 31—32 )。而当她编织时，他又再次来回踱步：“‘有人犯了错误，’他说，大步迈着，在阳台上来来回回”( 33 )。叙事者用暧昧地介于外部再现和自由间接引语的词汇来表现他的意识，并使用上述诗歌的音韵、节奏，甚至直接

从诗中借用意象来描绘拉姆齐先生：

他哆嗦着，他颤抖着。他所有的虚荣、对自身光彩的所有满意，如雷声翻滚而过、如苍鹰在穿越死亡之谷的人们的头上盘旋，都被粉碎了、破坏了。顶着炮弹的暴雨袭击，我们勇敢地冲锋，队形整齐，闪电般穿越死亡之谷，发出阵阵雷鸣，直接冲向莉莉·布里斯科和威廉·班克斯。他颤抖着，他哆嗦着。（30）<sup>35</sup>

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或者，更确切说来，丁尼生对该影响的表现——出现在亲热的家庭气氛中当然带有仿英雄主义的色彩。和蒲柏最好的作品一样（如果不是乔伊斯的），它通过将战争英雄主义与愚蠢的男权主义的幻想并置起来，讽刺地实现了降低权威性的作用。<sup>36</sup>当然，这里的可笑之处在于拉姆齐先生犯了错误——他错误地冲撞了莉莉和班克斯，错误地咒骂了他所极其需要的女人，而且后者很快就被未曾预料的死亡从他身边带走。但是对克里米亚战争及描写该战争的那首诗的戏仿，并不仅仅是要瓦解要命的男性英雄主义和妄自尊大。借用伊里加蕾的概念，女性主义的戏仿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理论干扰，<sup>37</sup>那么伍尔夫对战争和战争诗歌的夸张重复的引用，则揭示了家庭、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相互渗透。家中的男权愚蠢，既是国外的军事愚蠢与国家愚蠢的原因，也是其表现。反之亦然。国家间的地缘政治战争——因其领袖的愚蠢与无能而更为加剧——既是国内性别政治的原因，也是其表现。这是《三个基尼》得出的核心政治教训，这一国际主义的教训已经被多位评论家点明，但是肯纳却完全忽略了它，而里奇在急于驳斥伍尔夫时也误读了这一点。<sup>38</sup>

125

在安抚拉姆齐先生受伤的心灵时，拉姆齐夫人实现的功用，类似于丁尼生的诗歌对英国人所起的那种功用，不过两者之间仍有差别：她的角色强调了家庭领域如何使得战争可能发生，尽管表面看来家庭正是

战争的反面。借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语句，“这么多世纪以来，女性扮演了镜子的角色，这面镜子具有魔法和醉人的力量，能将映射于其中的男性形象以其自然尺寸两倍的大小反射出来……不论其在文明社会中的用途如何，镜子对于所有的暴力和英雄主义行为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为何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如此强调女性的卑微的原因，假如她们不那么卑微，他们就不会被放大。”（35—36）我将这段引文从其论证男女关系的原文中脱离出来，强调以下这点：地缘政治的伍尔夫研究，超越了对亲密关系的心理学——政治学研究，表明了本土永远不是纯粹的本土，而总是隶属于，借用詹姆斯·克利福特的话，“地区/国家/全球的复杂联系”。伍尔夫对家庭生活的再现，在其内部包含了国际和地缘政治的内容，所以，对属于家庭生活的隐私范围内的亲密关系，她的理解具有一种跨国的底蕴。

甚至拉姆齐夫人的那一刻独处也成为这种地缘政治联系的一部分。在为家庭空间提供养分之后，拉姆齐夫人“离开家”去进行假想的冒险。她变成（我们都知道这一段）——

黑暗的一个楔形的核心……这个自我摆脱了牵挂，可以自由地进行最不寻常的冒险。当生活暂时消失……她的世界在她看来似乎变得无边无涯。有那么多她尚未去过的地方，印度平原；她感觉自己正在罗马掀开一座教堂的厚重的皮帘。这个黑暗的核心可以去任何地方，因为没人看见它。他们无法阻止它，她想到，感到欣喜若狂。那里有自由，有平静，而且最令她心仪的，她能凝聚在一起，栖息在稳定的平台上。（62—63）<sup>39</sup>

拉姆齐夫人是维多利亚式的稳定与家庭关系的泉眼，而她在想象中进入陌生的中心地带冒险：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平原、禁忌的罗马天主教，这些对于一个无神论的英国女性而言当然是陌生的领域。这些被

提及的地点如此转瞬即逝,这些幻想如此草草结束,以至于我们在这种跨国的想象中只感受到一种浓缩的感觉。为什么是印度呢?为什么是平原,而不是恒河,或者孟买?又或者,这会不会是美国的印第安人的平原,该处长久以来对许多盎格鲁美国女性而言象征着自由?为什么是罗马的教堂?教堂本身是“厚重的皮帘”吗,或者它的门廊是一道婚姻的“皮帘”以供突破?突破到哪里?黑暗的内部吗?忏悔室吗?这个黑暗的核心定位了哪些秘密?为了成为体验“冒险”的地域,陌生地带要求有一个家庭化的黑暗的核心——另一类的“黑暗的中心”——她既旅行又作为一种“稳定的平台”待在家里。对伍尔夫而言,家庭——本土——总是已经全球化和跨国化。反之亦然。

126

伍尔夫将家庭生活加以国际化(或国家化)并暗指全球的做法颇为常见,不过她的一些暗示比别人的更为明显。对于更为隐蔽的暗示,我们需要从密码学的角度来定位地缘政治的伍尔夫,使视线远远超出某一给定文本的故意嬉戏。<sup>40</sup> 托尼·莫里森认为种族是美国文学机器中无处不在的“鬼魂”,必须使其现于天日(“Unspeakable Things” 11)。和她一样,地缘政治的内容在伍尔夫的文本中要经常去自然化,从我们习以为常的内容中移植出来。伍尔夫文本中的地缘政治鬼魂在哪里,它们是如何纠缠文本的?为了举个例子,我想对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换喻——牛桥大学和冯汉姆学院的食物、一年 500 英镑、一间自己的房间——进行一些非常规的解读。通常这些转喻只被和性别联系起来阐释。它们虽然都非常肯定的是本土的例子,但也经常包含了一些尚未得到认可的地缘政治和跨国内容。

首先,食物。牛桥大学的午餐是加了浓郁酱汁的比目鱼和鹌鹑,佐以红酒,而冯汉姆学院的晚餐则是“家常三品”:浇了肉汁的牛肉、蔬菜和土豆,甜点是李子(10—11, 17—18)。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这种食物的差别,与性别和阶级联系起来解读。显然,女子学院缺乏男子学院的“金银”,给其学生提供的食物要差一个档次,这喻指女性创造力受到了

较差的实际和比喻意义的滋养。但是这些食物的地缘政治内涵呢？那些“精美的”酱汁和葡萄酒难道没有暗示法国食物吗？难道 1066 年和那些相关内容不是文本中的政治无意识吗——即法国对英国的征服，以及与阶级密切相关的英格兰的法国化（阶级越高，两种物质文化就会以真正后殖民的方式结合得越紧密）？至少，在我看来情况如此。作为一位美国教师，我不断致力于为我的学生再创造出英国文化含义的全部内涵。当我在英国剑桥向一群英国女性主义者提及这种解读可能性，同时解释我经常拿这个当例子向我的美国学生说明，他们在阅读中（比喻性地）跨越大西洋是多么重要，那些英国女性望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她们从未想到这样的解读。她们只是将食物中暗含的阶级密码转化为性别密码。我的再造一种英国阅读框架的努力，可能最终只是反映了我的地缘政治立场：对英国文本的美国式阅读。我对征服和殖民问题的敏感，可能部分源自于英国的东西在其前北美殖民地所持续具有的霸权引力，尤其是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一间自己的房间》旅行到美国后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文本。地缘政治意识不仅寓寄于文本之中，也等量地寓寄于阅读过程之中。

127 不管怎样，在伍尔夫使用的一年 500 英镑和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两个换喻中，地缘政治的鬼魂则显得更为清晰可辩。她将之用来喻指女性为了能够自由写作而在物质和心理上的需求。一年 500 英镑的遗产，作为经济自由的一种衡量标准，其前提是存在与阶级相关的银行储蓄制度。这种银行制度随着东印度贸易公司和各种商业与农业体制的发展而在英国兴起，它们从遍及全球的英帝国殖民地带来财富。一年 500 英镑代表了更大资本投资的利息收入。靠利息生活而不动用投资本金，在那时是（现在仍是）阶级的一个标志，在伍尔夫生活的英国，它与帝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

伍尔夫的这个换喻来自她自身的生活，这种自传性来源，通过各种各样的浓缩与置换，肯定了这一换喻的地缘政治基础。正如简·马库



斯所指出的,1909年伍尔夫的姑姑,贵格会改革派教徒卡罗琳·艾米莉亚·斯蒂芬,留给伍尔夫一笔2500英镑的遗产,这笔钱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遗产,使得伍尔夫一年能有约400英镑的利息收入。马库斯称卡罗琳的父亲是“一位重要的‘帝国主义的建筑师’”。卡罗琳曾于1904年秋,在伍尔夫发作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之后,将伍尔夫接来与自己同住。正是在卡罗琳位于剑桥的名为“门廊”的房子中,伍尔夫写完了她的处女作。<sup>41</sup>《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一年500英镑包含了个人与政治的无意识,浓缩了卡罗琳的经济、精神和创造力的遗产,以及英国的银行制度与殖民主义,伍尔夫的祖父曾经有助于将这种银行制度与殖民主义合理化。这些相关的链条浓缩地表现在伍尔夫看见钱包里的一张十先令纸币时的思绪:

我从钱包里拿了一张十先令的钞票给了那个侍者。我注意到这个事实,因为它仍然让我惊奇不已——我的钱包具有自动生产十先令钞票的能力。我打开钱包,钱就在里面。社会给我提供鸡肉与咖啡、床铺与寓所,所需的回报仅仅是几张我姑姑留给我的纸片,而她这么做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与她共享一个姓氏。

我的姑姑,玛丽·贝顿,我必须告诉你,是因为摔下马而死的,当时她正骑马出去呼吸一下孟买的夜晚空气。(37)<sup>42</sup>

这些十先令的自动出现,“她留给我一年500英镑的生活费”的事实,这位叙事者解释道,与她获得遗产之前为了获得经济收入而从事的“乞讨性的零散工作”形成对比(37)。不需自身努力就自动出现的“自由”生活费用,允许伍尔夫—叙事者说“一年500英镑代表了思考的权力”,而且不必担心别人喜好与否(110)。伍尔夫用修辞的方法,将女性在知识与创造力上的独立,表达为帝国主义体系下投资银行制度结出的果实,这个果实既有字面的,也有比喻意义的。这个例子证明了克

利福特的本土 / 国家 / 全球联系和斯皮瓦克、格鲁沃和卡普兰等人所称的跨国合谋。

“通过旅行路线产生的比较知识”，套用克利福特的话，也说明了伍尔夫文本中运作的地缘政治轴线。伍尔夫的换喻——一间有门锁的，自己的房间——具体陈述了女作家的需求，她们渴望一个能摆脱干扰与家庭义务的现实空间，以及形象的“为自己思考的能力”（110）。艾丽斯·沃克将这位英国作家“带回家中”，进行了比较思考。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一文中，沃克创造了著名的交互式引文，她在引用自《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内容中，用括号标出非裔美国黑人女性的具体状况。在其中一个段落，沃克这样写道：“弗吉尼亚·伍尔夫进一步写道，当然她在其中没有提到我们的菲利浦（·惠特利），‘任何一位具有巨大天赋的16世纪女性（插入“18世纪”，插入“黑人女性”，插入“生来就是或被迫成为奴隶”）肯定会疯掉、自杀或终老于村庄外的某个孤零零的村舍中，半是妖巫，半是巫师（插入“圣人”），是别人恐惧与嘲弄的对象。’”（235）这些尖锐的并置既证明了沃克对伍尔夫的借用，也凸显了一种种族的评论，彰显了伍尔夫的自由作者的形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未被承认的对她者的奴役。<sup>43</sup>但是除此之外，沃克还实现了对伍尔夫进行落地式的地缘政治研究。她在跨越国家边界的互文空间里“旅行”，阐明她的主旨：像菲利浦·惠特利一样的美国黑人奴隶在写作时面对的物质条件，与同时期开始写作的这位中产阶级英国女性相比，更为艰巨——首先是缺乏人身自由，更别说拥有一间带锁的房间（235）。

在沃克的比较主义角度的基础上，我想将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与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笔下的“商店门廊”，做一个并置比较。<sup>44</sup>在伍尔夫1928年写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时，赫斯顿离开了哈莱姆和她在巴纳德学院的人类学教室，返回美国南部去收集黑人民谣。在她的人种学及小说作品中，门廊话语充当了一种换喻，喻指语言艺术，戏剧化和修辞性的表达力，充满韵律的不对称性，杂合的

原创性,以及门廊话语诗学的种族健康状态,这种诗学在深深扎根于西非口头传统的,美国南部乡间黑人文化的内部融合发展起来——赫斯特在《黑人语言表达的特点》(1934)一文中对这种诗学进行了具体的理论总结,她的这篇文章应该和伍尔夫的《现代小说》(以及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起被视为现代主义的宣言。

然而,在歌颂门廊话语诗学的同时,赫斯顿点明了,这种话语在种族政治方面虽然进步,但在性别问题上却是多么落后。商店门廊是一个绝对的男性空间,这个场所里充斥着黑人男性,他们都被排斥在白人的世界之外。数十人聚集于一起竞相发话。男性集体凝视经过的女性,或者从门廊穿过但却在门廊中没有位置的女性。在《她们眼望苍天》中,詹妮喜欢门廊聊天并渴望参与其中,但是她的专横丈夫具有强烈的社会地位意识,不断地让她闭嘴并禁止她去门廊,他还明确表示门廊不是女人该去的地方。这样,门廊就代表了该文化内的一个男性专属的语言和性别权威。正如在文雅的英国文化氛围内,莱斯利·斯蒂芬的图书馆、牛津、剑桥和大英博物馆之于伍尔夫的意义一样,门廊代表了非裔美国黑人的口头传统: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创造力和欲望的场所,而女性的文化生产者却基本上被排斥在外。伍尔夫声称,男性作家都有其单独的房间,因而女性也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赫斯顿则暗示女性需要在公共门廊里有一席之地,来实现其创造天赋。《她们眼望苍天》的叙事框架主要发生在詹妮的门廊上——不是商店门廊——而是詹妮向她的朋友菲比讲述自己的故事的那个门廊。将赫斯顿的门廊与伍尔夫的房间放在一起进行地缘政治的解读,就会凸显门廊诗学的相互矛盾的种族政治与性别政治。<sup>45</sup>这种并置阅读揭示了两位作家共有的,对创造力的公共表达的渴望,和她们的渴望受挫的现实,以及她们的渴望的不同之处。

我刚才简短地岔到美国作家上去,并非是要指责,伍尔夫将一间自己的房间作为女性写作的前提条件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毕竟,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提出的并非普适性的要求,而是十分具

体地谈到了在英国的环境中女性与虚构作品之间的联系。相反，我的目的是要凸显，伍尔夫和赫斯顿的两种方案中由地缘政治造成的差异。这种非常规的解读需要将两者联系起来，依靠空间上的并置实现深入分析，并寻找两者结构上的平行和定位上的具体差异。伍尔夫的“房间”提升了我们对赫斯顿的“门廊”中的种族政治与性别政治的互动关系的理解。反过来，赫斯顿的“门廊”强调了伍尔夫的“房间”所具有的，原本被忽略的地缘政治维度。作为读者，我们在《一间自己的房间》和《她们眼望苍天》之间进行跨国旅行，并因而能够在每个文本中看到一些原本可能会视而不见的成分——如果我们的本土阅读没有被地缘政治思维提升的话，我们就可能对之视而不见。

为了给这种比较性的并置加上第三方，我想讲述一个尚未结束的故事。几年前我曾有幸与一位非凡的女性共度了一个非凡的晚上——曼菲拉·蓝菲乐是南非的一位人类学家和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后来她被任命为开普敦大学的校长。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废止之前，她曾到大学去演讲种族隔离、女性主义、南非的未来等题目。她的论点当时在国内并不受欢迎。她认为，要想避免复制旧政权的压迫性权力结构，或者避免重蹈许多非洲国家在独立后变成独裁政权的覆辙，新南非必须将女性主义的问题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她明确呼吁，对英国、欧洲和南非黑人的父权体制如何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同流合污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那天傍晚我们坐在火炉前聊天时，她提到她渴望写本自传，讲述有关这场运动的故事，讲述她对青年旅馆和小镇上的青年人所做的研究工作，她的伴侣史蒂芬·白克的牺牲，她作为单身母亲的经历，她的职业生涯等等，并在这么做的过程中重新探讨上述的父权体制同流合污的问题。她感叹，没时间这么奢侈。我督促她还是要写，并称赞这些故事中体现的强有力的政治实践。我问她是否读过弗吉尼亚·伍尔夫。<sup>46</sup>我告诉她，她的论点与《三个基尼》有很多共同点，与伍尔夫要连根拔除国内外的地缘政治暴力的多重成因的热情有共通之处。蓝菲

乐想更多地了解英国的父权制形态,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在南非与本土的父权形态融合时的存在和文化移植。我问她可曾读过《到灯塔去》或者汤婷婷的《女勇士》,后者也是一个将有关性别的故事与歧视性的父权制形态编织在一起的文本。她很好奇,也渴望一睹为快。于是 130  
我后来将这几本书寄给她。之后我们的道路再没有交集。她读了那些书吗?它们可以移植到南非的语境中吗?在她的地缘政治奋争和个人奋争中,它们对她有,或能有什么意义吗?她对伍尔夫(或汤婷婷)进行的具有本土导向的阅读,会如何照亮沃克、我和其他人的盲区呢?

在追寻地缘政治的伍尔夫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的旅行远远超越了肯纳和里奇对伍尔夫的过于简单化的评论:他们(一方面)认为伍尔夫缺乏国际化,或(另一方面)认为她过于国际化。我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他们对“国际”一词所作的各自不同但同样狭隘的定义。我试图表明,将伍尔夫定位于国际的过程,需要的不仅仅是判断其作品中的帝国政治,也不仅仅是描绘不同的国家对伍尔夫作品产生的不同解读——当然这两个角度都是探讨国际化的伍尔夫中的至关重要的部分。它还需要追踪“人类稳定性的经线与人类运动的纬线”是如何“被编织在一起的”,旅行的地理是如何早已经嵌入到家庭的地理之中的,以及立足于自己的时空中的阅读将如何反映出地缘政治的定位。

## 地缘政治素养:简要总结

斯皮瓦克声称我们需要养成“跨国人文素养”(“Scattered Speculations”)。她接着说道,“跨国女性主义既非打着革命旗号的旅游观光,也非单纯地寻找证据。”(284)将女性研究国际化或全球化,这需要我们了解他者并向他者学习。它所需要的远不止仅仅记录全球多元文化的异质性。它还要求避免对自我/他者中心主义的重新铭刻,斯皮瓦克称之为对第三世界他者的“全球化”,而我则更广泛地将其称为各种类型的地缘中心主义,

这种定位式乡土观念在全球各地都有发生,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西方对非西方的文体再现之中。它需要我们在思考差异时在范畴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一种始于“家中”的思想工作。本书要求读者询问,地缘政治轴线如何补充和变异了各种形式的文化形态与认同,不仅是我们的,还包括他者的。它要求用空间和地理的思维来完善时间的、历史的分析。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的开篇,做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总要历史化!”(9)对于这一要求,我们需要加上:“总要空间化!”——即,总要询问定位细节和地理细节如何具体影响了某一给定的现象及对该现象的诠释。除了对男性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异性恋中心主义(仅举几例)保持警觉之外,我们还应同样警惕地缘中心主义。诸如“非地理的”和“地缘中心主义的”之类的批评术语,并没有和与它们平行的“非历史的”和“民族中心主义的”等词汇一样,享有相同的传统流行性。这一事实说明,要养成常规的地缘政治思维习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想说来,这样的思维应该包含一些相关的策略,我对伍尔夫的非常规解读就是对这些策略进行理论化和实践的一种尝试。首先,需要确立地缘政治轴线的分析概念,并不是要将其孤立开来,而是要看到它与构成文化形态和认同的其他轴线的不同之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与其他轴线的互动关系。其次,需要将权力关系空间化,并追踪其结构和效果,从而理解权力的循环是多向流动的,并以复杂的方式播撒其霸权。第三,需要研究除我们的(生平与学术上的)“本土”基地之外的其他地点,从而不仅熟悉我们研究他者的方式,也了解他者研究我们的方式。第四,需要彰显融入本土中的全球化成分和嵌入全球中的本土成分——全球化的跨国影响。第五,需要追踪文化是如何“旅行”的,在移植和跨文化交叉的过程中如何获得新的形式和意义。最后,需要养成一种比较/联接的观点,将不同的定位并置起来,以便形成新的角度来看待家乡和他乡的本土形态。总而言之,这些思维和研究的形式具有养成地缘政治素养的潜力。

# 讲述接触： 文学研究与人类学交界处的 跨文化交往与叙事诗学

每个故事都是旅行的故事——空间的实践。

——米歇尔·德·塞多,《日常生活实践》

我将打开故事并告诉你那里有什么。之后,像所有掉落到沙子上的东西一样,它将被我遗忘,被风儿带走。

——玛乔瑞·修斯塔克,《尼撒:一位桑族女性的生活与话语》

随后尼撒就说起了“从前啊”,这是她讲故事的固定开场白。作为一个故事讲述者,她用这个信号向听众表明,随后的故事是一个完整的实体,有独立的轮廓形状,一旦她的话语结束,风儿就会将其带走。与故事同时开始的,还有她对故事的表述与消逝的反思。她向北美人类学家玛乔瑞·修斯塔克讲述的这些故事,描绘了她过去在桑族的采猎社会中的生活。在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中,桑族人勉强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变化和可能的灭绝。面对心怀好奇,但却在各方面都与故事中

的生活状况相差甚远的西方读者，修斯塔克以尼撒的翻译者和编辑者的身份，再现和重新陈述了尼撒的生活，以及她对自己生活的讲述。

讲述故事的场景具有“打开”故事本身性质的潜力，这一点令我颇感兴趣。我所说的“讲述故事的场景”，既指尼撒向修斯塔克讲述故事的述行场景，也指修斯塔克将尼撒的话语再现为文本供我们阅读的书写场景。前一场景是文化交往的场景，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构成这一场景的框架，对不平等文化之间的交往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是决定这一场景的多重因素。但是，在这一场景中，修斯塔克作为人种学者的学术目标、心理构想和物质打算并没有完全抹去尼撒的主体性。尼撒不止是人类学家的他者。“把我的声音固定在机器上，这样我的话语就能清晰地播放出来，”她这样指示修斯塔克。“我是个经历丰富的老妇人，  
133 我有许多话要说。”（Shostak, *Nisa* 51）尼撒展现了相当大的能动性和技巧，抓住机会将那些“风儿会带走”的话语诉诸文本，同时也抓住人类学家渴望倾听她话语的机会获得了物质上的收益——宝贵的牛。这一场景是交换的场景，并非一边倒的权力表达。它具有双重的规划框架，是合作与互动的文化产品——当然双方绝非对等，更别提平等，这一点从两位故事叙事者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暗示：尼撒是名而修斯塔克则是姓。尽管尼撒的故事被高度调和了，但她的故事仍在那儿，在场。它们没有被清空，并非转瞬即逝，也没有被风儿吹走。

第二个讲述故事的场景是我们阅读的文本的生产过程，包括尼撒的表述行为和修斯塔克对尼撒话语的翻译、排序和语境处理。这是人种学交往的场景。其中，两位女性各有自己的规划和能动性，她们之间进行的跨文化交往成为了书写的场景：人类学家将口头的表述转换为固定的文本表达，将尼撒用桑族语讲述的故事转换成我们阅读的英语故事。和佐拉·尼尔·赫斯顿 40 年前对人种学传统所做的试验一样，修斯塔克去除了人种学者隐形的、无所不知的、客观的视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人种学研究的二元对立：主体 / 客体、自我 / 他者、文明 / 野蛮。



与之相反,她突出了自身的存在,除了叙事尼撒的故事之外,还叙事了人种学交往的故事。她将不同的声音编织成为复调的、对话体的多重故事:尼撒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讲述自身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修斯塔克的誊写、翻译和塑造成形;年轻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一个新婚的西方女性,她试图从那位五十多岁的更有经验的女性身上了解女性的性别意义;而人种学者的权威口吻,在大多数情况下以第三人称叙事,将尼撒的故事与人类学理论和其他对桑族的研究结合起来。正如第一个讲述故事的场景一样,修斯塔克对尼撒的生活与话语的(再)呈现是协作的结果。正如詹姆斯·克利福特指出的,“尼撒的故事是通过合作生产呈现的,产生它的文化交往不能被改写为主体—客体的二分对立。除了阐释和再现他人的生活与话语之外,它还实现了更多的东西——更为开放的某些东西。”(“Allegory” 107)<sup>1</sup>“尼撒讲述了她的故事;我试图阻止风儿带走其中的美,”修斯塔克如是反思(“Wind” 234)。<sup>2</sup>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讲述故事的场景——文化交往和人种学交往的场景——是如何“打开了故事并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在人类学与文学研究的交界处,它们对于叙事诗学有何暗示?我相信,它们打开和暴露的差异——具体说来就是地缘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能够改变我们的叙事理论。对叙事进行比较研究可以阐明叙事传统的文化影响和历史演变——即,大部分西方叙事具有的对抗性的、线性的且常常目的明确的结构;这样的线性结构在一些流浪汉小说、书信体、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叙事形式中被打散;一些非西方叙事传统的插曲式的、松散的或非对抗性质的结构。<sup>3</sup>然而,我在此想讨论另一个问题——即,地

134

缘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在为叙事提供起因、动机和材料方面所扮演的作用。换言之,什么样的运动变化提供了叙事驱动力,提供了使得故事能够发展、听众愿意聆听、读者欣然翻页的动力?

叙事理论主要在心理分析的范式内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最初主要起源于罗兰·巴特认为所有叙事都有俄狄浦斯情结的论断,以及

其他人随后对该观点的肯定、改造或反驳。<sup>4</sup> 叙事理论一直被欲望问题主导：俄狄浦斯欲望；前俄狄浦斯欲望；对情节的渴望；越界或打破情节的渴望；去 / 来的欲望；爱与死的愿望；去探知、解谜、调查的欲望；去压迫或抑制的愿望；对秩序或无序的渴望；对父亲、母亲或其他人的欲望。不论是观察、颂扬、批评还是修正——许多以精神分析为主导的叙事理论，都在俄狄浦斯欲望和后俄狄浦斯不满情绪的范式内，解读叙事的欲望。<sup>5</sup>

为了打开这个故事，我想暂时停用精神分析法，并替之以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产生的空间化——因为人类学在叙事的起因、动机和材料等方面具有潜在的洞察力。<sup>6</sup> 我并不想将有关叙事生产的讨论集中在家庭罗曼史的范围内——即，家庭的场所以及成年后对这一场所的重温。相反，我想探讨，当我们把叙事的动机定位在自我与他者的交往时——更具体些，两者跨文化交往时——我们对叙事的理解会发生什么变化。<sup>7</sup> 实现此类交往的叙事，和 / 或以此类交往为表现主题的叙事，具有人类学的特点，因而鼓励我们在人类学的范式内进行解读。欲望仍然是这些接触故事的一部分——对他者、不同者、异己者的欲望；对联接或跨越差异的渴望；对差异的渴望（差异标记了自身的缺乏或者是自身受压抑之物在他者身上的投射）；受好奇心驱使的欲望；进行虚构、幻想、梦想和创造的欲望。当然，俄狄浦斯或前 / 后俄狄浦斯的结构很有可能存在于这些欲望之中，但我坚持认为欲望的各种异质形式并非都能简化为俄狄浦斯或前 / 后俄狄浦斯情节（plots）。我反对将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仅仅看作是欲望的运作。相反，我想将跨文化交往放置在包含欲望问题在内的更广的框架之内考虑。

## 跨文化定位与叙事空间化

我需要“对跨文化交往”作个定义，因为“跨文化”一词简单得具

有欺骗性,掩盖并重复了“文化”一词本身具有的所有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我并不认为“文化”是一个稳定的要素,一种“单纯”或者甚至可以定义范畴的实体,或者一种与历史绝缘的现象。相反,我认为“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总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并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和融合中形成(和再形成)的。任何文化,换言之,总是早已具有跨文化和融合的性质。我发现,一个有用的策略是,用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似性来定义某一给定文化,即这个群体的成员或多或少所共有的东西,例如历史、物质条件、传统、信仰、故事、行为模式、观点、价值、认识论、幻想、梦想和欲望。<sup>8</sup>我还相信文化经常假定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或者甚至是本质性,以此来掩盖实际上的异质性和正在进行的文化重组与变化。更有甚者,文化倾向于在自身与其他文化之间树立边界,通过确立与他者的差异,来保护性地定义自身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边界常常被树立起来,要么实现对被夺权他者的统治,要么保护自己免受更强大他者的侵害。这种边界模糊了文化交换、融合和相互影响的共融边境。(在此我想明确区分边界和边境两个术语,尽管它们常常被互换着使用。我用边界指将一方与另一方分隔开来的一条固定的线,它通常象征性地标记了不同的主权和忠诚感。我用边境一词指不确定的、具有潜在变化性的一个广袤地带,跨文化交流与交换在边境上横向或纵向地循环流动。)<sup>9</sup>

135

那么,当不同文化的人们相遇,并产生互动时,就发生了跨文化交往,他们跨越差异,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联接——不论这种联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是拥护还是拒绝。当双方来自极端不同的社会时,这种交往相对比较容易识别,正如尼撒和修斯塔克的例子一样。但当这种交往发生在同一社会内部,或者涉及的文化问题是除“人种”或“族群”之外的其他身份认同构成成分——诸如阶级、性别、性征、宗教、国别、年龄等等——它就不那么容易发现了。我认为“社会”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不断变化、融合而成的现象,它同时包含和掺杂

了许多“文化”。例如，当代美国社会包含了都市同性恋文化、郊区白种女性文化、韩裔移民都市文化、正统犹太文化、女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化、粉领工人阶级文化、哈雷摩托车主文化、乘喷气式飞机游走各地的富裕阶层文化、中西部的农场文化等等。具有等级划分的社会——这即使没有包括所有的社会，至少也包括几乎所有的社会——全部都天生是“多元文化的”社会，而不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具有怎样的同质化的身份认同。再进一步，一个社会内所有个人都是“多元文化的”。个人隶属于数个相互重叠的“文化”，他们的身份认同（不论这种认同是否由其本人定义）部分建构在重层的且不断协商的从属关系上，与阶级、性征、宗教、性别、种族、国别、年龄等等有着密切关系。<sup>10</sup>

在这个由相互交叉的文化构成的矩阵内，同一社会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的跨文化交往会涉及多重差异的交集，尽管他们隶属于同一群体这一事实会倾向于遮掩或压制这些差异。例如，假设生活在纽约市的两个黑人彼此交往——一人贫穷而另一人有体面的工作，一人是基督徒而另一人是穆斯林，一人是女性而另一人是男性，一人是同性恋而另一人是异性恋，一人有西印度/非洲血统而另一人的祖上来自南非，  
136 一人开着宝马而另一人则开着外表普通、极其破旧的美国车。不论白人种族主义或非洲离散概念能给他们的认同带来多少共同之处，他们的交往仍必将具有复杂的多元文化性质。我们单独用种族概念无法完全阐释上述交往。或者再举一例，想象一下两位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女性彼此交往——一位隶属中下阶级，45岁，正统犹太教徒，戴假发，遵守犹太教的饮食规定，家庭妇女，五个孩子的母亲，住在布鲁克林克朗高地的一个租来的褐砂石公寓中，周围有许多令她感到害怕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人邻居；另一位则隶属中上阶级，28岁，不信教，未婚，住在她自己购买的曼哈顿上西区的一座分户式产权公寓中，与多种肤色的文化人群有复杂的社会交往。面对反犹主义，她们共同的犹太人特性是她们之间的纽带。面对男性对女性的仇恨，她们相同的性别会产

生可能的联系。但是这两位女性之间的交往同样具有复杂的跨文化性质。我们单独靠宗教、种族或性别的概念不能完全理解它。

这样的跨文化交往产生的故事具有无尽的复杂性,这一点令我兴趣盎然。它们远远超出了俄狄浦斯或后俄狄浦斯情节的框架。跨文化交往故事在美国颇有市场,催生了电视和电影行业的许多作品。许多流行的黄金时间电视剧——从《纽约重案组》、《凶杀组》和《布鲁克林南街》,到《芝加哥希望》和《急诊室故事》,驱动其叙事情节发展的推动力都始于一种文化交往,这种交往带动了复杂的情节和动人心弦的小插曲,其基础是两条叙事主线(故事讲述者当下的故事,过去某一插曲的主题故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相互碰撞和吸引,以及这两条主线之间的交错杂合。访谈节目,从日间的《奥普拉脱口秀》到夜间的《瑞弗拉脱口秀》,经常将跨文化交往当作一种戏剧化叙事的形式搬上舞台,以刺激和吸引电视观众每日收看。最近有大量的电影直接聚焦于差异双方交往时发生的故事,这证明了跨文化情节所具有的市场销路。自我与他者的交往给许多电影提供了叙事的背景、动力、幽默感和戏剧性情节。《鸟笼》、《家庭事务》和《今晚大事情》仅是其中的几例。稍早些的流行大片有《密西西比马萨拉》、《哭泣的游戏》、《喜宴》、《钢琴课》、《大峡谷》、《为所应为》、《丛林热》、《为黛西小姐开车》、《与狼共舞》、《风中奇缘》、《E.T. 外星人》、《欢乐洗衣店》、《上帝也疯狂》、《异星兄弟》。我还可以列举更多。但我想说明的是,以跨文化混合和冲突为基础的情节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至少部分地在经济上维持了一个具有广泛全球市场的强大文化产业,而这一产业对于生产象征秩序和抵制象征秩序这两个方面均很重要。然而,叙事诗学领域还尚未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研究,也未对叙事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的运作方式予以完全考虑。正如萨彬娜·索内所写的,“跨人种/跨族群交往本身太过复杂,太过纠结于各种相互矛盾的考虑与欲望,以至于它似乎需要一种抽丝剥茧式的叙事,一种阐释性的虚构故事。”<sup>11</sup>

137 由跨文化交往产生的故事要求我们在解读策略上出现重大的转变,从主导大部分叙事理论的、以欲望为中心、以时间为线索的范式,转向一个更为空间导向的框架。值得指出的是,在《对话的想象》中,M.M.巴赫金将“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发明了一个新词“时空体”来描写叙事的坐标,意指在给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但大部分的叙事理论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巧妙地将巴赫金的“时空体”变为了“时间型”。<sup>12</sup>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指出,“小说是对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的叙事”,而且“在小说中,对时间的忠诚是必需的。”(30,29)对于保罗·利科而言,时间和叙事有一种互惠的关系,而空间则被完全摒除在外:“我的第一条研究前提是,叙事和时间紧密相联……事实上,我认为时间是影响叙事语言的那个存在结构,而叙事是以时间为其最终指示物的语言结构。”(“Narrative Time” 165)<sup>13</sup>詹姆斯·菲兰基本上避开了叙事的空间成分,强调他所谓的“发展”——即,“叙事是一种动态的事件,无论是叙事的讲述还是叙事的接受,都必须沿着时间移动”——是“作者引发、维持、培养和消除读者对叙事的兴趣”的基础(*Reading People* 15)。在心理分析的框架内,彼得·布鲁克斯甚至更为完全地偏向时间而不是空间:“我们可以把情节看作是……仅仅沿着时间的序列和进程发展其命题的逻辑……而且情节是我们试图从人类的时间性中获取的那些意义的主要排序力量。”(*Reading xi*)对于许多叙事理论家而言,随着一系列的因果事件展开的人物性格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位置。对角色的讨论往往完全以时间为导向,表达一些发展的主题,历时的变化可以按照有机的顺序或者反常的无序顺序来图式化,并能通过心理分析的透镜加以分析。俄狄浦斯或后俄狄浦斯欲望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性心理发展的叙事,它们沿着发展路线塑造了对叙事的解读——尤其明显的是在成长教育小说的叙事中,这种叙事以家庭罗曼史的历时发展情节(对这种罗曼史的重复与不满)为其中心内容。

与之形成对比,跨文化叙事强调空间,和沿着空间而不是时间的运动——叙事的“空时”而不是“时空”,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空间常常起到比喻修辞的功用,喻指文化定位——喻指在空间和历史产生的身份认同与知识。它将作品看作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理,象征或标记了人物在大社会中的具体文化定位。以时间为中心的解读模式,滋养了人物与地点的二元对立,将场景降级为妨碍叙事运动,妨碍人物性格沿着时间发展的描写。(那些“为了情节而阅读”的人,引用彼得·布鲁克斯的话,跳过维多利亚小说中大段的场景描写的现象即是缘由于此;叙事理论家和评论家重视行动轻视场景的倾向也是缘由于此。)相比之下,空间模式将人物放置于场景内定义,在铭刻于空间结构的文化定位内或通过这种文化定位来描述人物。人物的成长或发展与其说是欲望嬉戏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文化互动与定位变化的结果。因此,在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北方与南方》中,女主角全家从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南方农业社会搬迁到北方的工业社会,这使得女主角,在围绕一系列跨文化冲突建构起来的叙事中,得以有机会扩展她的心理视野。

138

然而,正如以时间为中心的方法不应该压制对空间的考虑一样,空间模式最终并不应该替代时间模式。而且,空间既非静止不变,也非先验性的存在;相反,它是历史上产生和建构的。空间——至少是叙事中的空间——并不独立于时间存在,就像历史不能独立于地点存在一样。正如亨利·列斐弗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断言的,空间是历史的产物,它在空间化的故事中反映并建构了文化意义。<sup>14</sup> 修斯塔克与尼撒的跨文化交往——发生在叙事的述行场景和文本场景中——发生的时刻受制于历史的分析,而交往发生的空间则鼓励地理的阐释。正如巴赫金所云,叙事分析需要考查“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内在相互联系”( *Dialogic Imagination* 84 )。因为一直以来叙事的空间维度相比较而言被忽视了,因而我拟暂时强调空间而不是时间,来考查叙事的哪些方面将会由此凸显出来。

在我看来,这种对空间的强调令我们能够看到,跨文化交往,作为一种空间运动的形式,在产生叙事并构建其发展框架中所起的作用。简·里斯的《藻海无边》可以充当一个启发性的例子。十分肯定的是,这是一个有关欲望的形成与畸变的故事,它的时间框架也很清晰,故事发生在1832年英国殖民地废除黑奴制后不久。但是,对小说叙事的空间结构的强调,可以从新的角度阐明文本的跨文化动机。与其考虑叙事运动的时间发展并对之做心理分析,不如关注它的空间定位变化。该故事从一个空间移向另一个空间,在每个空间定位内都给角色标记出一个身份认同:安托瓦内特逃离的没落种植园,是痛苦的种族与阶级交往的场所,并最终随着矛盾爆发成为一片火海;在法国修女院中,安托瓦内特与其他富贵精英的“白种”克里奥尔孩子一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为嫁给一个英国人做好准备;在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种族混杂的首府,安托瓦内特拒绝嫁给她的“深色肤色的”堂兄桑迪·考斯威;安托瓦内特在坐落于葱郁的热带森林中的家里度过蜜月,那里是来自马提尼克岛的“黑人”女性塞拉斯汀的管辖范围,在那里安托瓦内特先是沉醉于她的英国丈夫的爱情,接着排斥它,又最终尝试重新获得它;在阴郁的罗彻斯特庄园中,被囚禁的安托瓦内特变成了野兽般的伯莎·梅森。上述的每一个空间都代表了一个跨文化交往的场景。当然,将它们串联起来的是欲望。但是给小说叙事提供动力、声势和欲望舞台的,却是以空间来定位和表达的,自我与他者交往的故事。这个故事寓寄于它的空间之中,它的具有象征性的地理中,以及它的空间运动中。

- 139 尽管传统上认为空间是静态的,但我认为,对基于跨文化交往的叙事进行空间化阅读,实际上会培养对一种不同类型的叙事运动的关注,即对空间运动、旅行和旅程的关注——不是指在家庭的单一范围内历经不同的性心理阶段的旅程,而是指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旅程。叙事如何从一个文化地点到达另一个呢?是什么推动着它运动、旅行?



跨文化交往的兴奋感、愉悦感和 / 或痛苦感在此类运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每个空间如何反映出空间化意义的文化生成? 或者, 如何决定了人物的性格或变化? 或者, 如何提供了环境条件, 迫使人物调动其能动性?

以托尼·莫里森的《宠儿》为例。在甜蜜之家种植园中, 教师的到来使得他与奴隶塞丝之间出现了痛苦的, 具有极端压迫性的跨文化交往和人种学交往。这种交往, 在莫里森看来, 整体上概括了西方科学的种族主义起源, 而在具体的层面则概括了人类学的种族主义起源。教师测量塞丝的头颅, 并记录下她的动物特征和人类特征, 这产生了旅行的叙事: 她决定去追寻自由; 她在牲口棚被捕, 沦为一头“动物”, 遭到教师党羽的强奸和挤奶; 她横渡河流逃亡; 她先逃到一位贵格会教徒的冰冷厨房里, 接着逃到她婆母位于 124 号的温暖、自由的壁炉旁; 追捕者一路追踪; 塞丝逃到谷仓杀死自己的孩子; 以及在此举之后的一系列场所变换。保罗·D 的旅行上演了一个平行的故事, 只不过性别上有所不同。他穿梭过许多空间最终来到 124 号, 在那里他仍然无法停止移动。他从一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 在镇上四处游荡, 直到他能面对过去, 就像塞丝不得不在各种对宠儿的欲望形成的空间内持续移动一样。对于塞丝和保罗·D 两人而言, 每一个运动都带来又一次跨文化交往, 和定位于不同空间的插曲, 而这些不同的空间则象征性地记录了愈合的不同方面。

我举《宠儿》这个例子另有深意。毫无疑问, 该小说存在着大量深入的俄狄浦斯和前俄狄浦斯解读, 尤其是在解读小说中母女情结的爱与恨、教养与毁灭的复杂关系上。欲望在小说中无处不在, 并且以各种形式出现——母女之欲、夫妻之欲、男女之欲、姐妹之欲、人兽之欲、人神之欲; 对自由的渴望, 对波士顿缎带和天鹅绒的渴望, 对人类接触的渴望, 对记忆与遗忘的渴望; 以及作为一种知识的欲望, 这种欲望包含了主导种族 / 性别对从属种族 / 性别知识占有和身体占有。我并不

想否认在《宠儿》中存在着欲望,该书的书名就点明了欲望的重要性。但是我确实想指出,单独进行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的欲望解读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解读完全建构在性别和家庭关系之上,撇开了身份认同和社会分层体系的其他建构成分。它们需要被一种全新的阅读来补充,一种建构在跨文化交往的空间情节的基础上的阅读。这一框架促使我们理解文化之间的边境上存在的危险与痛苦,文化之间的边界上存在的进攻与防御的动态变化和形成任何跨文化交往的复杂立场。

- 140 在辨识跨文化交往和空间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空间化的叙事解读,这种解读甚至可以“打开”俄狄浦斯的故事本身,告诉我们那里有什么,以及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阅读倾向于遮掩什么。请想一想完整的俄狄浦斯叙事,弗洛伊德从中截取了男性欲望的范式故事,表现在儿子对母亲的禁忌之爱和对父亲的夹杂恐惧的敌意。俄狄浦斯在科林斯长大,那是个海港城市,与中东和埃及都有贸易往来。俄狄浦斯逃离家园,希望能由此避开神谕的命运。在漫游前往忒拜的途中,他遇见了把守路口的斯芬克斯,他并不知道忒拜才是他真正的家。斯芬克斯本身是一个违规的、越界的角色。首先,她吞食掉所有回答不出她的有关人类的谜语的人——什么动物早上四条腿走路,中午两条腿走路而傍晚三条腿走路?第二,她是一个有翼的生物,长着女人头和狮子身。作为融合的象征,她很可能是个源自埃及的进口物,在埃及供奉动物、半动物和类人生物等非人类的神庙中常有斯芬克斯的形象。因此,斯芬克斯是他者的化身。俄狄浦斯与她的相遇,是由旅行产生的一种原型化的自我与他者的交往遭遇:人类遭遇异类,希腊人遭遇外国人(希腊文称之为 *barbaros*),男性遭遇女性。他者不仅仅提出了谜语,她本身就是一个谜,俄狄浦斯必须解决这个谜才能继续旅行。他的回家之旅,回到神秘的忒拜国腹地的旅行(忒拜是他本该熟悉的家,因为旅行而变得不熟悉),是他与斯芬克斯遭遇之后的一个直接后果。俄狄浦斯欲望的故事在跨文化交往的更广框架内徐徐展开。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欲望在俄狄浦斯的故事中不起作用。我们当然可以像常见的那样,将它解读为相互关联并最终融合在一起的各种欲望的嬉戏:儿子想取代父亲当国王并娶母亲的欲望,当上了国王后的儿子想了解真相的欲望,四处漫游的盲眼老人渴望家庭的宁静的欲望。俄狄浦斯是个家庭至上的人,这没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全新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故事,强调空间以及由这些运动引起的跨文化交往。在这个故事中,俄狄浦斯不仅在斯芬克斯的形象中找到了异化的他者,还在他对斯芬克斯的谜语的答案中找到了他自己:即,人类(男与女)在婴儿期爬行,在生命的中午直立行走,而在生命的黄昏使用拐棍。我们别忘了,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俄狄浦斯的拐棍是他的女儿安提戈涅,这个精气衰弱的老人是倚在女儿身上的。作为他的拐棍(阳具),安提戈涅是一个内向投射的女性他者形象,现在成了俄狄浦斯自身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对俄狄浦斯故事的空间化解读试图说明,建构在对母亲身体和父亲法规的肉体和智力认识之上的侦探叙事,并非是惟一可能的叙事原始文本,虽然有些叙事理论可能这么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将旅行写作与侦探叙事同等对待,从中获得叙事认知的原始情节。<sup>15</sup>

## 论接触地带的人种学理论综述

141

现代和后现代的人种学,再现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旅行写作的谱系传承和职业化过程。<sup>16</sup> 目前研究这一领域的形成、存在的问题和可能性的人种学理论,对于形成跨文化交往叙事诗学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因为人种学本身是一种旅行写作的形式,而且人种学范畴内旅行写作的基本叙事是在差异文化的接触地带发生的跨文化交往故事。我拟简要回顾人类学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这一跨学科边境,辨析其中的理论模式,以期对描绘跨文化交往的叙事诗学有所裨益。第一个理论是

由詹姆斯·克利福特在《旅行的文化》中提出的。在该文中,克利福特认为(我已经在第四章讨论过),人种学太过专注于确认稳定的文化中心和没有变化的文化实质,因而没能指出,在文化间的边境地带,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是如何促使所有的文化不断变化的。他承认,人种学一直是空间化的研究,但建议人种学家别再仅仅关注静态的、本土化的文化空间,而要将焦点聚集在旅行的空间和跨文化联系上。他呼吁人种学研究要从寓所的研究转向旅行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认为人类学家是观察主体,他旅行去研究一个静态的他者。克利福特解构了这其中的二元对立,建议研究者认识到运动和旅行是所有文化的一部分。他者也旅行,并常常以旅行过的视角来观察人种学家。“在许多传统的人种学研究中,”他注意到,“人种学家将实际上是地区/国家/全球的轴线本土化了,并将‘文化的对外联系和迁移’排挤到边缘的位置。”(100)他所聚焦的“文化交往场所”,和我提出的推动某些叙事的跨文化交往场景是一致的。读者因而可以摆脱寓所的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场景(本土化的家庭情节),转向自我与他者互动的主体之间的空间。

一些更为激进的人类学家,已经以各种方式质疑了,将自我与他者的交往仅仅建构在差异基础上的概念。例如,詹姆斯·弗古逊和阿吉尔·库塔便批评这种对差异的强调。他们深受后殖民研究的文化杂合理论影响,不认可这种强调的前提假设:在人种学交往之前存在着单纯的、相互之间截然不同的文化。(他们认为,单纯的文化差异是人种学交往的一种意识形态后果,它模糊了文化互动的模式。)阿君·阿帕杜埃则认为,对种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的建构,是他所谓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交易”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文化交流”和“文化交易”,在一个机动性日益增强、跨国化状况日益突出的世界中,产生一种“全球族群景观”,其中的身份认同永远不是单一固定的,却永远是多重的、重叠的、变化的,是融合的过程和产物(“Global Ethnoscape”;

“Disjuncture” 7)。另一种对凸显差异做法的批评,强调跨文化交往中各派的共同之处。亨里埃塔·莫尔在《对差异的热情》和迈克尔·陶斯格在《模仿与他性》中均指出了这一点。陶斯格声称,与跨文化交往中的差异经历或对差异的坚持相比,模仿或摹仿的实践同等重要。他认为,人种学太过于强调他性,而完全忽略了人类“模仿的功能”,以致掩盖了跨文化交易中的对话性的模仿、镜像和学样过程。

对于利拉·阿布—鲁戈和提林·纳拉严(以及其他)而言,当交往的双方在一个或多个构成身份认同的方面享有共同之处时,同一性便通过认同政治进入到种族交往的场所。以内部人、“混血儿”、土著人和本土人等各种名称命名的人种学研究,打破了早期人类学关注外来他者的模式(Abu-Lughod, “Writing”; Naraan, “How Native”)。在对自己家乡的自我反思式的实验性人种学研究中,佐拉·尼尔·赫斯顿很早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她在《骡子与男人》中将“人类学的望远镜”对准了她自己的文化,而在《告诉我的马》中,她则带着更大的疑问将目标对准,牙买加和海地的非洲离散人群的其他文化形态。<sup>17</sup> 与此相似,传统人类学的西方自我与非西方他者的二元对立,也被西方女性人种学家的矛盾的主体地位所扰乱,当其研究对象是非西方女性时情况尤为如此。西方女性人种学家在地缘政治上享有特权,但在性别上处于边缘化地位。她“扰乱了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而人类学的等级政治恰恰建构于这组二元对立之上(Abu-Lughod, “Writing” 137—138)。修斯塔克坚持她与尼撒的共同性别,这有主张一个普适性的“女性特征”之嫌,这种普适性的女性特征会掩盖,性别在与阶级、种族、国别等等互动变化的过程中呈现的不同形式。但是修斯塔克坚持的以性别为基础的联系,也展示了“混血儿”人类学的叙事策略:文化差异因为身份认同的一个共有方面而得到调和。纳拉严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复杂化,她挑战了文化成员的本质化观点,认为有必要理解,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凝视对象的双方“在相互渗透的社团和权力关系中不断变化的认同”(“How

Native” 671 )。 “考虑到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她写道，“自我的某些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将我们和我们研究的人群联系起来，另外一些方面则强调我们之间的差异。” ( 680 ) 她认可身份认同的多重场所——包括诸如教育、性别、性征、阶级、种族和籍贯等因素，并认为在人种学家与研究对象的交往中，某些因素会使他们结盟，而某些则不会。

在对多元人种学交往的叙事中，纳拉严认为能动性在人类学凝视的双方都起作用。米歇尔—拉尔夫·特鲁诺和 S.P. 莫安提，对这种拒绝客体化的观点做过理论阐述。特鲁诺认为，从文艺复兴时期起，人类学开始成为建构“野蛮”他者，从而将欧洲征服合法化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各种女性主义人种学家和“种族”人种学家，是打破人类学起源时便具有的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先锋。他呼吁一种新的人类学，以消除他称之为“野蛮夹缝”的他性空间，在主体与主体交往的前提下开展研究，并能理解他者并非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多样的，存在于特定的历史与地理空间。“‘我们与所有的他们’的二元对立隐含于创造了西方的象征体系之中，”他写道，“这种对立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各种形式的第三世界主义则是它的镜像，它们仅仅是将这一二元对立的两个名词的顺序颠倒了过来。单一的他者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大量的多元化的他者。尽管存在整体化叙事的倾向，但这些他者之所以成为他者各有原因，包括资本的原因。” ( “Savage Slot” 39 )<sup>18</sup> 莫安提以相似的风格拥护不同人类文化之间的共性，认为这个共同立场建立在能动性和主体性的基础之上。他声称，“超越对跨文化差异的简单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他们’和‘我们’最终做的是同样的事，他们和我们具备同样的能力，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历史能动性。” ( 23 ) 他建议，为了理解“‘我们’与‘他们’的区分”，需要先承认，人类能动性的“共性”或者“共同立场”是建构差异的基础，也是建构他性的本土特异性的基础。( “‘Us’ and ‘Them’ ” 20—21 )

这些人种学理论研究了差异人群交往的接触地带，在几个方面对

跨文化交往产生的叙事有直接影响。首先,它们强调了我已经提到的叙事的空间维度的重要性。第二,它们支持身份认同的地理空间而不是历史发展,前者已经在叙事研究中变得日益重要——我用地理空间一词指的是身份认同的地点和空间建构,是各种形式的多元化、关联性、情境化的立场。<sup>19</sup> 第三,它们暗示了叙事能量——驱动故事的马达——的空间源泉,它迥然有别于叙事理论中的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情节的镜像的、时间性的欲望循环。第四,它们指出了讲述跨文化接触故事的可能叙事模式——例如以下的主题:与静止或寓所形成对比的运动或旅行的在场(克利福特);差异的融合性混合与冲突(弗古逊和库塔;阿帕杜埃);文化借用、同化、挪用和戏仿的各种模仿形式(陶斯格);通过多重身份建构成分建立起来的联系和分离的纽带(阿布—鲁戈、纳拉严、修斯塔克、赫斯顿)以及在主体与主体的交往中异质性多元他者的互惠的能动性(特鲁诺、莫安提)。

我想进一步指出,这些互动模式来源于,在人种学交往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进行的辩证的或对话的摆动。旅行——作为一种穿越空间的运动形式——使得自我在地理上、心理上或文化上的间隙空间与他者相遇。该空间的人种学交往需要在他性与模仿之间、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来回地进一步运动,其中同一性和差异性的两极,包含于身份一词的双重含义中(*identity*,既表示“与……相同”也表示“与……相对不同”)。<sup>20</sup> 这种来来回回的运动——即霍米·巴巴所称的,在间隙性的“‘夹缝’空间”发生的“忽此忽彼、来来回回”的运动(*Location 1*)——也构成了叙事中的一个(而非惟一的)推动力量。它可以充当马达,推动叙事前行。它有助于解释跨文化交往场景在叙事文本中的动态变化及实现的运动效果。这种故事的某些部分当然会潜藏有某些种类的欲望。但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矛盾紧张关系,不能仅仅用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欲望情节来解释,不论这些情节可能在叙事中占有多么重要的比重。由此,一个对话的、空间的叙事模式,可以替换某些叙事理论引以

为特色的、对发展和时间予以排他性关注的模式。他性与模仿之间的互动摇摆增补了心理分析理论的家庭罗曼史情节下潜藏的去/来、爱与死的运动力量。

## 《印度之行》中作为叙事马达的接触地带

为了将抽象理论具体化,我拟重新解读一个常被从欲望的角度解读的文本——E.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1924),以之来表明我的观点。<sup>21</sup>毫无疑问,该小说展示了东方主义的欲望,这个欲望在殖民主义的语境下重现和重塑了家庭罗曼史中的同性恋欲望与异性恋欲望。福斯特对朋友萨德·罗斯·马素德——他将小说献给了这位印度穆斯林——的难以启齿且没有实现的欲望,以双重形式在小说中重现:其一表现在殖民地大学校长菲尔丁先生与穆斯林医生阿齐兹的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关系上,其二表现在想了解“真实的印度”的英国旅行者阿德拉·魁斯特的神经质的、性欲受压制的渴望上,她最终却只能屈从于殖民者的种族和性别偏执,指控阿齐兹在马拉巴山洞这个神秘的子宫/坟墓中侵犯了她。然而,这种心理分析的解释并不足够——哪怕我们在对这种欲望的三角关系进行弗洛伊德式的家庭罗曼史解读之上,再加上后殖民同性恋的解读,这也不够。正如俄狄浦斯的故事本身可以从跨文化交往场景的全新角度解读一样,我们对福斯特的小说也能做此尝试。

暂时将空间优于时间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该小说叙事的组织原则是一系列的跨文化交往场景,而决定这些场景的主要力量就是殖民主义语境。小说开场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话语,叙事者遥远的声音将故事在地理和地缘政治上定位于昌德拉普及其周围地区的殖民主义空间。在这个定位式开头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一幕幕的跨文化交往场景,它们在联系与分离、接触与拒绝接触、认同的差异面与同一面之间对话式地摇摆——从一开场阿齐兹在凯林达少校家受到种族主义的怠



慢,到结尾处阿齐兹和菲尔丁骑马分道扬镳,这个结尾象征性地呈现了这两个男人,一个英国人一个印度人,在这一历史时刻不可能成为朋友,尽管两人都“想”这么做。[“不,还不是时候……不,在那儿不行”(322)]。交往场景叙事的时而是分离的边界的树立,时而是融合的边界的形成,时而则是两者之间的对话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交往将英国人与印度人对立起来,但也有个别重要的交往将性别、宗教和阶级等差异并置起来。不论福斯特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事实上是助长了——东方主义的殖民话语,他对英国种族主义的讽刺以及他想超越它的渴望潜伏于大部分的跨文化交往场景中。

145

阿齐兹和阿德拉在马拉巴山洞的遭遇——及其几乎未被掩盖的跨种族引诱、侵犯和偏执的母题——常常主导了对该小说的讨论。我想排除这一场景的中心地位,认为它只是一系列场景中的一环,而且这些场景的叙事动机包含了欲望,但却不能仅凭欲望来完全解释,尤其不能用东方主义化的俄狄浦斯欲望来完全解释。小说伊始的头两个跨文化交往场景对于整个叙事链条的完整性起了决定作用。这两个交往相互联系,它们并置的跨文化对称人物不是阿齐兹和阿德拉,甚至也不是阿齐兹和菲尔丁,而是阿齐兹和穆尔夫人。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认为,驱动整个叙事向前移动并潜藏于大部分的随后场景中。

第一幕场景——阿齐兹在凯林达少校家遭遇英国种族主义——为它的对立面做了铺垫,即第二幕场景——阿齐兹与穆尔夫人在清真寺里相遇。两幕场景合在一起呈现了种族主义边界的树立,以及这一边界在对共同立场的肯定中的短暂消融——借用陶斯格的话,即从他性转向模仿;借用莫安提和特鲁诺的话,则是从主体与客体关系转向主体与主体的关系;借用阿帕杜埃的话,则是从本土种族景观转向全球族群景观;借用纳拉严和阿布—鲁戈的话,两人共有的在性别或种族上的被边缘化地位成为两人之间的纽带。阿齐兹对在凯林达少校家遭遇的种族主义感到屈辱和愤怒。他离开之后很快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漂亮

的清真寺，它宁静祥和得宛如头顶的明月。“这就是伊斯兰，”他想到，“他自己的圣地，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不仅仅是一个战斗口号，更多，多得多……伊斯兰，一种追求精美持久生活的态度，他的身体和思想的家园。”（19）阿齐兹转向纯正的差异——作为家园、作为寓所的伊斯兰（借用克利福特的话）——来寻找愈合创伤之道，抚慰他在那个英国人的阳台上经历的残酷的差异之痛。一位英国女性的突然出现令阿齐兹勃然大怒——她怎么在这都敢擅自闯入清真寺？此处的跨文化交往是多重的，沿着多重的差异轴线展开：英国人 / 印度人、基督徒 / 穆斯林、殖民统治代理人 / 被殖民的臣民、男人 / 女人、年轻人 / 老年人。

然而，以差异开始的这段经历，最终以阿齐兹对相似性和共有立场的强调结束。当他发现她已经按照教规除去了脚上的鞋时，阿齐兹的愤怒变为惊奇：“几乎没有哪个女士愿意费这个事，尤其是当她们以为没有旁观者时，”他这么告诉她，以此表示对自己之前的尖锐谴责的道歉（20）。她回答，“那没有什么区别。上帝在那儿。”（20）这一论断引发了一连串的谈话，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让阿齐兹当作认同的证据——不是对伊斯兰的认同，而是他们之间的认同。和他一样，虽然有蛇，她也不害怕走夜路。和他一样，她失去了配偶并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他一样，她不喜欢凯林达夫人并愿意向他承认这一点，这就打破了种族和地缘政治的忠诚。“我们处境相同，”他告诉她。“你理解我，你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在提到她所理解的伊斯兰信仰时他如是说。当她表示异议，认为“我只知道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别人时，他得出结论，“那么你是一个东方人。”（23）在这个短暂的、顿悟的、乌托邦的时刻，宗教、地缘政治、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多重边界在阿齐兹的同一性经历中全部消融。

阿齐兹在这一刻感受到的与穆尔夫人的盟友关系，使他提出了一个后来证明是灾难性的建议：他将在马拉巴山洞为穆尔夫人和她未来的儿媳妇阿德拉·魁斯特举行一次野餐会。当然，我们可以认为，他在

超越差异的欲望驱使下做出的这一举动很天真,小说后来发生的事情严重地瓦解了他的举动,并表明了殖民主义环境的强大影响。他后来也批驳了这一立场,在小说结尾处告诉菲尔丁,只要英国统治继续存在,这样的友谊就不可能实现(322)。我不想否认,小说讽刺性地拆除了阿齐兹在清真寺场景中热情搭建起来的友谊之桥,不过我想指出,小说中随后的跨文化交往场景仍然是他性和模仿之间的对话,因而继续质疑了族群、人种、地缘政治、宗教、性别和性征等身份认同的固定性。不论福斯特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强调了,在英帝国统治的时间框架下跨越差异边界的“友谊”不可能存在,小说还在更为隐蔽的层面,图绘了作为一种融合性边境的跨文化交往空间,这个空间改变了主体与主体接触的双方。

比如,请回想一下穆尔夫人在马拉巴山洞之后的经历。马拉巴山洞是一处黑暗的内部空间,声音在其中回响盘旋并且没有起点或终点。它似乎是一处存在于时间之外的纯粹空间,令人联想起耆那教,该教在印度次大陆上与印度教和佛教有着紧密联系但比后两者都更早。她在这个耆那教的山洞里听到的声音,拔起了她身份认同中的英国之锚,她由此进入了类似于那些弃绝世界的耆那教圣人所持有的一种思想意识,这用她以前的英国观点来看是一种超越了人类情感与伦理的虚无主义空间。穆尔夫人失去了她的英国锚链,被印度化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因为“印度”本身是个多种文化交汇的十分异质化的融合主义空间,她变为模仿“印度”的某一方面,具体来说就是耆那教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以及它对“日常”生活中的悲喜的弃绝。<sup>22</sup>相应的,印度人在审判之后将她变成了一个女神,把她和她的禅语“神即是爱”融入他们的万神殿中,并在许多年后,又将其融入了主导小说最后一幕跨文化交往的克里须那节。

对穆尔夫人的印度化进行补充的,是阿齐兹的令人费解的部分英国化。这发生在他的路途上,当时他离开昌德拉普,前往某个印度土邦

的王庭,那里相对而言完全印度化的环境可以给他提供一个隐退之所。尽管他拒绝与菲尔丁的一切接触,尽管他“对英国人怀着一种真正的仇恨”(293),阿齐兹的诗歌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女性从面纱或隔绝中解放出来。早先他曾在两人相熟时告诉菲尔丁他“主张面纱”,但现在他写的诗歌“全是一个题目——东方的女性地位”:

“面纱必须被取消”是它们(诗歌)的主旨,“不然我们永远不能自由”。而且他(异想天开地)宣称,假如女性与男性一起在普拉斯战场奋战的话,印度就不会被征服。“但是我们不把我们的女性展示给外国人”——他没有解释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在写诗。夜莺和玫瑰仍将留存,伊斯兰被击败的伤感仍然存在于他的血液中,无法被现代性所驱除。非逻辑的诗歌——和它们的作者一样。然而它们都表达了一个真实的观点:没有新家就没有祖国。(293)

戈德博尔是位信奉印度教的婆罗门,对印度的民族主义无动于衷。他喜欢这些诗歌,从中赞许地看到了阿齐兹的“国际性”(293)。但是阿齐兹对西方式女性解放的热衷(去除面纱),似乎与他在审判之后的做法相矛盾:他在审判之后转而拥护印度身份认同和印度祖国,并拒绝一切英国的事物。正如穆尔夫人的印度化一样,阿齐兹对英国性别建构的“模仿”令人联想起陶斯格的跨文化交往理论。文化模仿在对话性的交换中补充了文化差异,每个主体都接受并改变了另一主体的某些元素。

就像穆尔夫人的性格改变一样,阿齐兹对某些西方现代形式的吸纳也有很大的反讽效果。首先,正是一种不同形式的面纱——阿德拉的性欲压抑(这部分反映了福斯特本人对马素德的秘密性欲和被压抑的渴望)——使得她想象到阿齐兹侵犯自己。不论西方的意识形态多

么强调自身的现代性,它似乎并没有将其女性解放出来。第二,正是阿齐兹去除他已逝妻子的面纱的行为——他向菲尔丁展示了她秘不示人的照片,以之作为一种亲近的姿态——结束了小说的第一部分《清真寺》,直接引向灾难性的小说中间部分《山洞》。第三,在这一段中存在着叙事者的编辑声音,它对阿齐兹的融合态度屈尊俯就地进行评判(“异想天开地”、“非逻辑的”),从而显示了福斯特本人也难逃小说如此强烈讽刺的男权至上的种族主义。小说大部分章节采取的是作者隐身的全知叙事,此处相当不同寻常的破例,以及对自由间接话语的使用,表明福斯特无法想象,反殖民主义运动居然会将女性的地位当作一个衡量社会整体自由的标准。尽管福斯特抨击在印度存在的英国种族主义,但他无法完全认同甘地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尽管福斯特使用性欲受压抑的阿德拉来反映他自身的隐秘欲望,但他无法看到现代性、女性自由和人类全体自由之间的“逻辑”关系。<sup>23</sup>

尽管如此,这些各种各样的反讽虽然削弱了小说中展开的殖民主义语境下双方互惠的融合,但并没有完全瓦解福斯特对英国与印度、男性与女性、英国国教与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之间的边境上的主体与主体交往的叙事。在殖民主义情节强调身份认同的差异面的同时,模仿过程将身份认同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础上。欲望当然在这些场景中起了作用:对不同的,甚至是奇异与神秘的他者的欲望;对自身所在群体的安全性的欲望;得以表达的欲望;被压抑的欲望;以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表现出来的欲望;围绕着一系列相似但却不相同的概念(异性性欲和同性性欲、异性恋和同性恋、雌雄同体和双性同体)表达的欲望;以及酷儿欲望。福斯特跨越了文化、性别和性征差异的边界,重写了家庭罗曼史中俄狄浦斯欲望的情节。但是和俄狄浦斯的原始故事一样,涵括这些场景的更大框架是跨文化交往的空间化情节,这一情节由空间旅行——去印度和在印度的旅行——而启动,经由一幕幕的场景讲述了旅行者与异质的、多重建构的他者之间的接触。

148

## 交界学科：人类学与文学研究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和修斯塔克的《尼撒》所处的边境地带，夹在具有表面差异的两个学科之间：小说和人种学，文学和社会科学。这些表面差异并非虚幻，和修斯塔克与尼撒、穆尔夫人与阿齐兹的差异一样真实。小说创作和人种学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读者对其文本的认识论基础有着不同的想法和期待。尽管如此，这些跨文化交往的故事呈现了另一层面的交往，在这个交往中两者既有差异的共生共存，也有相互的融合借鉴。福斯特 1912 年至 1913 年间从英国去印度旅行（之后他开始创作《印度之行》），并于 1921 年至 1922 年间再次返回印度，充当达瓦土邦主的秘书近一年时间（之后他完成了这本小说），因而福斯特的小说创作充分浸染了人种学研究的精神。<sup>24</sup> 修斯塔克在北美的忏悔型女性主义正处于高潮的时期，从美国旅行去博茨瓦纳的卡拉哈里沙漠，去寻找一种共通的女性语言和声音。她对桑族文化所做的人种学研究，在形式上完全采取了描写女性发展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以及西方的女性自传的文学模式。

福斯特和修斯塔克两人，都深受西方长达数个世纪的旅行写作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将自我与他者对立起来进行文化叙事。但是他们创作的文本都抵制了，潜藏于这一传统之下的“野蛮夹缝”结构。在尝试对昌德拉普（位于恒河附近的一个虚构城市）和卡拉哈里沙漠的生活进行“厚描”时，两人都打破了镜像化地呈现异国化或客体化的他者的传统倾向。福斯特呈现了一个异质化的印度，抵制了均制化的笼统概括，并且他对英国的种族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修斯塔克试验了多重叙事者，对传统人种学的全知隐身叙事者进行了含蓄的批评。尽管两人做了这些尝试，但他们均未能完全摆脱他们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使用的镜像体系的影响。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矛盾地保留了构成

殖民主义心理的东方主义欲望和理性主义现象学的潜流。<sup>25</sup> 修斯塔克的《尼撒》反映了盛行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西方女性主义对共同的姐妹情谊的女性主义欲望,并同时重新铭刻了人类学倾向于对非西方他者进行非历史性再现的传统。作为一个跨越巨大差异的女性内部联盟的场所,修斯塔克所呈现的桑族文化是自我封闭的,作为一种行将消失的原始生活方式而与外界隔绝。她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与它的殖民历史隔裂开来,将它与更为强大的非洲邻居的当代文化冲突隔裂开来。<sup>26</sup>

我将福斯特的人种志式小说和修斯塔克的小说式人种志并置起来。它们的交往换喻地代表了我所说的这两个学科间的互动故事。讲述文学研究与人类学之间的接触,有助于“打开”故事本身的性质。扩展一下我本章的题目,讲述接触的故事产生了相当大的叙事能量和动力,而且讲述接触的故事非常说明问题,对于理解那一创造性马达很有启发意义。人种学总是已经包含了对接触的讲述,反过来,交往的叙事也总是已经带有人种学的特点。因此,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作为高校内的不同学科“文化”的代理,它们的交往产生的故事体现了互动、相互影响和在知识的边境内新兴的融合。这样的跨学科不会擦除话语学科之间的差异,相反,它靠这些差异为生。人种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边界必须继续存在才能被穿越。它们之间的间隙边境需要一种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变化的对话式共生。<sup>27</sup>

作为一个应用人种学理论的文学学者,我在跨学科的边境上找到了理论基础,来论证将叙事诗学空间化的研究角度。这个研究角度强调了旅行、运动、场所、文化差异和跨文化接触地带在故事产生过程中的重要性。它抵制了将空间与静态联系起来,将时间与动态联系起来的传统。相反,它假定差异间的跨文化空间是一块促使事件发生的动态疆域,是旅行和变化的空间——真实意义上的、心理的、语言的和象征性的旅行与变化。它还反对将故事简化为序列,简化为由欲望和发展的话语主导的一个时间运动。我已经声明,时间范式对叙事诗学的

主导,已经导致我们过于强调,构成叙事的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欲望情节。为了改善这一点,我强调了跨文化交往场景所起的运动作用,认为它是一种共有的、重要的、并常常被忽视的叙事动力的源泉。某种类型的欲望当然会潜藏于故事的某个部分。我在此的目的并非否认欲望作为叙事动力的重要性,亦非否认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欲望情节和人物发展,也非否认时间作为叙事的一个轴线的地位,更非否认历史和时间变化的重要性。我尝试的是,在我们对叙事的讨论中为空间和地点清理出一片场地,在对叙事动力的讨论中暂时中止欲望的时间话语的霸权地位。在彰显叙事理论中常被掩盖的内容时,我强调了以下观点:接触地带的跨文化交往背后潜藏的同—性与差异性的矛盾紧张关系,不能仅仅用俄狄浦斯和后俄狄浦斯欲望情节来解释,不论欲望在这样的边境地带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我建议用一种对话式的空间叙事模式,来置换一些叙事理论对时间和发展模式的排他性关注。最终,我们必须检验空间与时间、地点与发展、交往与欲望的对话,因为它们共同推动叙事向前发展。正如阿德里安娜·里奇在《通往定位政治的笔记》一文中所写的,“地图上的一点同时也是历史上的一点。”(212)



### “路线 / 根源”： 边界、边境和身份的地缘政治叙事

我们需要用比较的思维来考虑美国城市中的部落、西班牙语人群聚集区、贫民区、移民社区的独特的路线 / 根源——其受围困的历史既包含重要的社区“内部”，又包含被管制的旅行性“外部”。界定和保卫家园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宣称拥有“家园”（或者有时是被贬黜至某个“家园”）会有怎样的政治危险？

——詹姆斯·克利福特，《旅行的文化》

人总是在路上，似乎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园——这也许对我而言是好事。我认为人不应该扎根在一个地方，这一点很重要。

——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后殖民评论家》

借用米歇尔·德·塞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用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思考身份认同是一种“空间的实践”。它涉及地图与图绘、路线与运送、边界与越界。然而，作为一种关联性空间定位的形式，它包含了路线与根源这两个相对立的范畴。要理解“旅行”的概念，先要理解“静止”的概念。路线是从这里通往那里的道路，是两个扎根点之间的

通道。身份认同常常要求主体觉察到某种形式的迁移——不论这种迁移是实际意义的还是比喻意义的。离开家园凸显了“家”的概念，令人认识到家与他处的截然不同。<sup>1</sup> 无根的状态——即斯皮瓦克表达的“总是在路上”——只有与其对立物，扎根的状态，即被系缚于单一地点的状态，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此外，路线暗示了旅行，即物理和心理上的空间迁移，而旅行又包含了越界和差异间的接触。根源、路线和跨文化交往均依赖于叙事将其具体呈现。我打算探索有关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叙事诗学，即路线与根源的共生关系，以及它们在与不同的性别、性征、阶级、宗教等具体情况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交往。我拟首先从身份叙事的角度来探讨路线与根源之间的对话张力，之后则以两个文本为例进行阐释分析——它们是朱莉·达什的先锋派电影《大地的女儿》（1992）和任璧莲的后殖民嬉戏小说《莫娜在希望之乡》（1996）。

## 跨文化去 / 来与地缘政治叙事

克利福特的《旅行的文化》补偿性地强调了旅行，彰显了文化和个人认同的一些方面，那些方面过去常常因为对本土或“寓所”的传统强调而被抑制——这篇论文后来被当作主打文章收录入克利福特的论文集《路线》中。与他相似，保罗·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中对根源与路线两者的重要性均予以肯定，不过他对那些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方面进行了更为充分的探讨：“平等地看待根源与路线的重要性，如我在第一章中所建议的那样，就会瓦解非洲中心主义，或者它所努力回应的欧洲中心主义。本书更为关注流动、交换或者间隙的元素，它们质疑了中心化的欲望本身。”（190）斯图亚特·霍尔肯定了试图“发现、挖掘、曝光和表达”“给我们，‘作为一个民族’，提供稳定的、不变化的、持续的参照与意义框架的共同历史经历和共有文化密码”的文化认同观点，不论这种扎根的状态在多大程度上掩饰了“我们实际历史的动态划分

与兴衰变迁” (“Cultural Identity” 393)。但是霍尔显然更为重视与上述观点相对立的文化认同观点,它们强调破裂、中断、运动、“不断地变形”和“历史的持续‘嬉戏’”(395)。在对无根状态的强调中,斯皮瓦克似乎完全摒弃了根。“如果有什么事情令我完全不信任,事实上不仅是不信任,我对之感到轻蔑和不屑,”她在《后殖民评论家》中对采访她的人如是说道:“那就是人们的寻根行为。因为任何有寻根想法的人应该,而且已经,你知道,去种植芜菁甘蓝了。”(93)斯皮瓦克对寻根行为的蔑视,显然反映了她从事研究工作的德里达式框架;它或许还与她来自富裕家庭的流浪知识分子的优势身份也不无关系,她有足够的资金可以一直离散性地待在全球的旅行通道内“总是在路上”。与她对根的鄙视相抗衡的,则是有些人将对根的依恋视为生存的关键。举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本例子,在亚历克斯·黑利的《根》中,这种对根的依恋显而易见是一种心理上和物质上的必需。

尽管大多数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对路线和无根状态进行了补偿性的强调,克利福特、吉尔罗伊和霍尔等理论家最终呼吁,在路线 / 根源之间维持一种来来回回的对话运动。例如,吉尔罗伊认为,种族主义的影响产生了“树立一个连贯的、稳定的种族文化的需要,以之作为一种手段来确立黑人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以及这种合法性所依赖的民族特性的概念”,可是“黑色大西洋”的杂合性和异质性却因此被抵消了(*Black Atlantic* 97)。同样,霍尔写道,“我们可以认为加勒比黑人的身份认同的‘框架’是由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轴线或矢量搭建的:相似和持续的矢量,以及差异和断裂的矢量。我们考虑加勒比黑人的身份认同时,必须始终参照这两个轴线之间的对话关系。前者使我们在过去找到某种根基和延续性。后者提醒我们,我们共同经历的正是一种深刻的非连续性:这些被迫成为奴隶,被强行运输、殖民和迁移的人群主要来自非洲。”(395)换言之,根源与路线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根源意指了以稳定核心和连续性为基础的身份认同;路线则暗示了以旅行、变化和

分裂为基础的身份认同。

作为一个持续的形成与再形成的过程,身份认同主要依赖于叙事,不论这种叙事是有根状态还是无根状态产生的结果。当然,镜像的、视觉的、形象的、比喻的事物均有助于认同的产生。但是如果我们将身份认同看作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形式(没有固定的起点或最终的产物),那么我们就需要检验叙事诗学介入这一过程的几种方式。首先,身份认同可以通过团体和个人讲述的自身故事来建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有关民族身份的理论术语,“想象的共同体”,涉及一种心理状态或意识,其中叙事和故事讲述扮演了核心角色。他提出的民族之间的想象的身份认同边界,与所有集体认同得以建筑其上的那些感知概念颇有相似之处。个人通过记忆、反思和与他人互动形成一种自我意识,而这些都要求某种形式的故事讲述才能得以形成。第二,个人与团体的身份认同的持续产生过程本身就构成一个故事,这个心理和文化的建构过程定位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并在其中移动。第三,关于统治、抵抗、欲望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文化叙事,构成了一张互文性的网,在这张网中,个人和集体的自我在非对称的权力关系内得以编织成形。正如卡罗琳·海伯伦对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所作的评论:“我们通过文本生活。它们可以被阅读,被吟唱,或者通过电子设备体验,或者来到我们身边,就像母亲的呢喃一样,告诉我们传统的要求。不论它们采取什么媒介,这些故事塑造了我们所有人:它们是我们用以产生新的文本、新的叙事的必需材料。”( *Writing* 37 )

那么,身份认同的地缘政治维度如何与叙事相联系呢?根源和路线是如何被叙事的?构建身份认同的个人、集体和文化叙事有哪些典型的叙事模式?在前几章中,我已经讨论过文化认同的形成是以怎样的方式依赖于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对话关系:与他者的认同建立在相似性的基础上,但这种联系只有在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不同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在此框架内,身份认同叙事要求某种形式的跨文化交往,与差

异他者的某种形式的接触。从根源与路线的共生关系来说,要想体验对根源的认同,就要求在跨文化交往的接触地带内对路线进行某种比喻或实际意义上的认识。反之,通过路线发展起来的认同需要体验到连根拔起的感觉,和走出“家园”边界的感觉(不论家园是被如何定义或诟病的)。扎根于“家”的地缘政治认同,强调家庭圈子内部的同一性;通过离开家园形成的地缘政治认同则凸显与他者的互动,这种互动促成了杂糅混合体的形成。

描述这些复杂的模仿与他性的运作的叙事模式似乎无穷无尽。我既不想提出一个整体化的元叙事,也不认为构建一个深层结构来规范异质的叙事再现具有可行性。我的目标是图绘这些模式中的一个,即对话的叙事模式。它在以下两个极点之间进行互动的对话:一是通过描绘差异来建构边界,二是通过交换、混合、变形来建构可渗透的边境,从而导致边界的消融。接触地带的交往叙事常常一方面显示了在自我与他者的坚实边界之间的矛盾摇摆,另一方面则展示了对固定边界的越界。援引我对叙事动力的心理分析模式所作的补充,我将这种摇摆称为跨文化去 / 来,它潜藏于许多的交往情节中。

为了定义这个跨文化去 / 来,我首先分析一个故事——一个地理的历史,它来自童灿·威尼楚库的《地图上的暹罗》。该书描述了泰国的绘图概念和国土概念如何在 19 世纪与西方认识论的接触中逐渐演变发展。在英法殖民力量进入南亚之前,童灿声称,泰国人没有固定的边界概念来将一个地区或国家与另一地区或国家划分开来,也没有技术手段来测量这些固定的边界。相反,不同民族、地区和国家的人群之间的地区是重叠的领土空间,它们构成了广阔的边境地带,人员和货物在和平时期可以在这些边境上自由持续地移动。英国人的边界概念——认为边界是一条假想的线,在测量的基础上构建,并强迫实现分离——起初令他们感到十分陌生。泰国人对地图的认识比英国人具有大得多的流动性。只有当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紧张时,用以区分差异的边界

概念才会出现。这些边界只是暂时的，由军队强制实现。一旦相对友好的关系得以重建，它们就会消失。边境空间会根据不同群体相互间的权力关系而扩展或收缩。在和平时期，边境地区十分广阔，实现大量的文化流动和融合杂混。而在战时，边境地带就变成了边界，在那里，交往产生的是差异间的对抗而不是融合。

155 逐渐的，在19世纪中叶，孟固王（《国王与我》一书即以他为原型）接受了英国人用固定边界来绘制地图的概念。他这么做，不是因为英国人将西方的思维模式强加于他，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样的概念对自身的意图有利。一方面，他可以巩固暹罗政权对地方力量实施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可以加强暹罗对西方的抵制。自相矛盾的是，他对英国认识论的这种融合性接受，在暹罗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暹罗成为一个既有别于西方，又有别于周边南亚民族的场所。正是与西方的这种部分模仿的关系，催生了童灿所说的暹罗“地缘体”，也即泰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它与绘有边界的地图和一系列有关泰国历史的故事紧紧联系在一起。

童灿的故事以复杂的方式叙事了我所说的跨文化去/来的矛盾性对话。应该指出，弗洛伊德认为，在去/来游戏中，小孩子第一次对表意或再现原则进行了表演。正如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对该游戏所作的解释，孩子不断地扔一个玩具，快乐地期待它会返回，这一行为重复了母亲离开又回来的快乐。这一游戏的快乐来自于孩子的能动性：他对玩具的存在与消失所实施的掌控，玩具的这种摇摆性的运动象征了母亲的运动。彼得·布鲁克斯等叙事理论家，在弗洛伊德对去/来的嬉戏和与之相关的在爱与死的本能之间的摇摆中，找到了一个理论来阐释，驱动叙事这一再现形式的无意识能量，以及通过叙事再现建构起来的俄狄浦斯主体性形态。

我用跨文化去/来替代这个心理分析的游戏，借此将交往的地点从儿子欲望中的母/子二分体转移出来——它就类似于一种寓所的人

种学——来讨论更为广阔的跨文化交往。在这种交往中,不论双方的权力关系是否平等,它们都通过协商来确立差异间的边境。<sup>2</sup>借用克利福特的旅行人种学概念,我的目的是将产生故事的交往定位在差异间的关联性空间中——各种各样的历史产生的差异: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同一社会内部的差异;等级划分产生的差异,而等级划分的基础可以是多重的差异轴线,如性别、人种、族群、宗教、性征、阶级、种姓、国别等等;以及在人与动物、人与机器、或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间隙边境浮现的差异。

童灿讲述了传统暹罗认识论的收缩与扩展。他的叙事方便了我所建议的这种叙事研究的转向。跨文化去 / 来的摇摆,需要改变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的可渗透和不可渗透的边界。自我与其他自我在交换中都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sup>3</sup>有时,个人或群体树立起樊篱,将自己与他人分割开来,以保护自身的差异。“与他者的差异”,亨里埃塔·莫尔写道,“经常牵涉到形成和维护群体的边界。这种维护工作残忍而血腥,这一点在全球各地都显而易见。”(*Passion for Difference* 1)这样的文化建构,既来自霸权群体,也来自被边缘化的群体。前者保护差异,认为这是自身优越性和权力的一种体现;后者坚持自身的差异,以之作为一种抵抗和获得它所渴求的赋权的途径。这样的群体间的接触地带常常是偏执、加害、愤怒与误解的场所。消解这些支撑群体认同的边界的努力,有时仅被忽视、有时则被压制、有时则被认为是一种形式的污染、混种或对群体团结的背叛。然而,另外一些时候,个人或群体间的边界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而是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一种可渗透边境。在那里,双方互相模仿和适应,差异混合、交融、形成新的存在形式。这样的边境地带具有潜力成为联接与和解的场所,不论这种联接与和解多么短暂。

156

但是且慢。在援引泰国传统的边境认识论时,我将固定的差异边界的树立与压迫和抵抗联系起来,同时将融合与和平以及差异间的和解联系起来,但这一点值得商榷。融合并非总是和平的产物,正如那个

泰国传统故事所暗示的那样，有时融合也会是绥靖的痛苦的余波。文化杂合和克里奥尔化在所有的文化表达形式——语言、食品、艺术、风俗、宗教和其他社会实践——都留下烙印。它们经常产生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被强迫的同化，和强势权力对文化差异的强制擦除。融合虽然有时受到欢迎，但有时也是被强迫实现的。融合既能丰富交往双方的文化，也能削弱其活力。在定位跨文化叙事诗学时，我需要避免过于简单的理想化，将杂合当作乌托邦式的万灵药，因为差异有时能产生非常残暴的效果。<sup>4</sup>

童灿故事的第二部分集中讨论了那个国王对暹罗国家认同的建构。这一部分提供了例子，来证明必须对浪漫化的融合观点进行纠正。正如童灿详细展示的，孟固王接受了英国的固定边界概念，部分原因是为了制服暹罗境内躁动的地方力量。与其邻居缅甸和柬埔寨相比，暹罗能够更好地抵制西方强权。在那些地方群体被吸收进暹罗的国家文化之后，他们交往了什么？内部殖民方便了对外部殖民的抵制。接触地带两侧均存在等级划分，这使得差异交往的故事更加复杂，还得考虑其他反映跨文化的异质性和交往的故事。

接触地带的跨文化诗学需要将童灿故事的两个部分都考虑在内。首先，在以下两者之间去/来：以对差异的进攻性或防御性论断为基础的收缩的边境，和以对文化混合与模仿的认知为基础的扩展的边境。第二，对循环于接触地带并使得文化杂合模式复杂化的权力关系问题保持警惕与关注。（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使用的“循环”一词，因为我想避免对权力进行简单化的分析，不要将之简化为一个单向的流动，以免重复中心/边缘和压迫者/被压迫者的二元对立。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在诸如爱德华·萨义德关于接触地带的大部分理论中都显而易见。它经常忽视他者的异质性、能动性和主体性，以及在边境的两侧都运作的等级划分体系。）边境的这两个维度显现于克利福特在《离散》一文中所作的观察：“边境很特别，因为它们的前提是一个由地缘



政治界线所定义的地区：它的两侧都被专横地划分开来并进行巡逻，但同时这两侧也被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越界和交流的实践联系起来”。（*Routes* 246）地缘政治认同的叙事诗学要求我们关注与根源和路线相关的两类边境行为：寓所和旅行的人种学、静止与运动、持续与断裂、差异与杂合。 157

### 《大地的女儿》中的路线 / 根源

现在我来分析朱莉·达什 1992 年的获奖电影《大地的女儿》。它令人意外地在电影院和录像带店里都大受欢迎。这个完全出乎预料的商业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它的反现实主义、实验性的神话诗学叙事。<sup>5</sup> 该电影打破了用权威的电影之眼来线性叙事的传统，用蒙太奇的手法呈现了各种转瞬即逝的图像，并将片断的场景并置起来，讲述 1902 年发生在伊博兰丁的一个家族聚会的故事。佩让特一家是乔治亚海岛的格勒人，第二天大多数家族成员都要加入美国黑人从南向北的大迁移。家族中两个在外多年的成员也返回家中，参加聚会野餐。黄玛丽在剧本中被描绘为“新女性”和妓女。她和情人杜鲁拉一起回到伊博兰丁。黄玛丽的表妹维奥拉也多年在外，到北方担任基督教的传教士。她带回了斯尼德先生，这位衣冠楚楚的摄影师急于拍摄下整个聚会。娜娜·佩让特是家里的女性家长。她担忧家族精神的毁灭，因而运用个人魅力将全家人捆绑成一个整体，交由逝去的先祖保佑。《大地的女儿》既涉及了根源，也涉及了路线——以黑人种族特点为基础的家庭和社团联盟；造成黑人离散的分散与迁徙。

该片的模式是非现实主义的，在“双重叙事，多重视角的摄影操作”和“共享空间（广角、深聚焦的镜头使得每个人都不会成为其他人的背景）”的环境中，围绕着托妮·凯德·邦芭拉在前言中所称的“多层展开”来组织情节（*Daughters* xiii）。电影通过图片并置展开故事，推出一系

列的虚光照和静态画,以表示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当然,电影中仍然存在以传统的对抗性情节及争端解决为基础的线性叙事。电影的中心冲突围绕着娜娜的曾孙子艾里和他怀孕的妻子尤拉展开。尤拉曾遭强奸,艾里担心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尤拉拒绝指认强奸犯,只对黄玛丽和特鲁拉坦白说,如果她指认了,艾里就肯定会被施以私刑,由此暗示出强奸犯是个白人男性。与此同时,“放荡的”黄玛丽受到除了娜娜和尤拉之外的所有佩让特家女性的冷遇。这样的大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艾里夫妻俩之间的痛苦分歧。维奥拉是一名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她谴责黄玛丽的罪孽,也谴责娜娜的非洲宗教实践——包括娜娜对祖先的信仰、纪念死者的瓶子树以及各种充当护身符的物品,例如娜娜母亲的一绺头发,那是娜娜的母亲被卖到河下游之前留给她的纪念品。

愤怒的潜流翻滚着,整个家族危险地四分五裂,直到尤拉在沙滩上呕吐之后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吐露了自我憎恨的隐密情感,并  
158 宣称所有的黑人女性都有此感受。黑人女性怀疑她们的母亲都是在性奴隶史上被糟蹋的堕落女性,因而将自身的羞辱感和自我憎恨投射到黄玛丽之类的她们所谴责的女性身上。尤拉呼吁疗救性的宽容与自爱,她的呼声为影片的高潮铺平了道路。在高潮部分,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维奥拉在内,都参与了一种联盟性的仪式。娜娜将一个盛有自己和母亲头发的小袋子,以及黄玛丽的圣克里斯托夫纪念章,缠绕在维奥拉的《圣经》上,并要求每位家族成员亲吻它,以示他们承诺为了家族的存续而做出集体的、精神上的努力。

这个电影创造了一段神话。它呈现了一个寓言,讲述了一个族群的离散身份的艰难形成过程,这个族群被粗暴地从其非洲家园连根拔除,但却仍然作为非裔美国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幸存下来,坚持把根扎在非洲传统之中。《大地的女儿》是用电影来重新发现根源,来重新见证过去的迁徙路线。这是非裔美国人为了存续下来所做的一种努力,因为他们在将来甚至会进一步地离散。与这个根源与路线的集体

故事相平行的,是达什的个人探索之旅。它在精神上(而不是形式上)很大程度地受惠于黑利的《根》,展示了个人与集体的离散身份的相互交叉缠绕。达什这么描述这个工程:

我自己家族的故事点燃了《大地的女儿》故事的灵感火花,并为其中的一些角色提供了基础原型。但是当我向我的亲戚求证家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历史,或者我们往北迁徙到纽约的情况时,他们通常不愿意谈论此事。当谈话内容太具体,涉及到他们本人或太接近他们不想透露的一些记忆时,他们就会结束谈话,将我推开,让我去问别人。我当时就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意象,想要讲述的故事,必须得像它触动我的家人一样地触动观众。它必须得令他们忆起往事,回到他们的家族记忆,回到我们的集体记忆。  
(*Daughters* 5)

和娜娜手缝的盛装记忆的袋子一样,达什的电影也拼接起“各种记忆碎片……通过它们我们逐渐了解了我们的母亲、祖母和家族历史,并最终了解我们自己。”(88)

以其对黑人文化生活的颂扬,这部电影可以很轻易地被划入非洲中心主义的更大课题之中,这个课题号召黑人认领自己的非洲文化根源。吉尔罗伊的整体观察也适用于这个具体例子:“现代黑人政治文化一直更为关注身份与根源和扎根状态的关系,而不是将身份认同看作是一个运动和调和的过程,后者更适合通过路线的角度来切入。”(*Black Atlantic* 19)例如,邦芭拉的前言就将该片的实验形式与其“非洲中心主义的立场”联系起来,这个立场“更多地是与非洲电影的故事讲述传统保持一致”( *Daughters* xiii)。她没有将达什的电影形式,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或西方先锋电影的其他传统联系起来,而是将其完全与黑人电影运动和其他的第三世界进步电影联系起来(xiii)。当然了,这部电影

159 已经被放在这个框架内解读,而且被仅仅局限在这个框架内阐释,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中将这个框架称为“种族绝对主义”,霍尔则把这个框架与文化身份的“根源”角度联系在一起。该电影对黑人的身体和肖像,尤其是黑人女性的身体和肖像,进行了深情款款的视觉和音乐再现,这种再现实施了一个疗救的仪式,使各种各样的黑人观众对这个离散家族产生认同之情,因为保佑这个家族的非洲祖先是他们共同的祖先。作为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平衡,这部电影歌颂了黑人的差异之处和非洲特性。然而,这样的解读削弱了该电影对融合主义的思考,而融合主义实则是离散人群身份认同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种由迁徙,由与“根源”相对的“路线”产生的杂合。这种解读还压制了该电影在以下的对立两点之间进行的对话性的复杂嬉戏:同一性与差异性、固定边界与可渗透边境、身份认同的根源与路线——简言之,也即我在上文理论概述过的跨文化去/来,和权力在接触地带叙事诗学中的循环。

这部电影的实验形式,与一些西方电影打破现实主义叙事和好莱坞传统的做法,颇为相似,要想找到论据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但是,甚至电影画面的线性排列本身也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令我们不能单纯从非洲中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该电影。电影蒙太奇的视觉画面充斥着标志差异的固定边界,而每个边界都在电影结束之前渐渐变成某种可渗透的边境。不过,我指的不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这条边界固定不变,没有被穿越,除了偶尔提到的白人对格勒人世界的暴力入侵。我指的是伊博兰丁的那些居民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强调了黑人的异质性,并瓦解了那些认为存在同质化黑人身份认同的观点。边界存在于男与女之间,已婚女性与诸如妓女、同性恋或“新女性”等所有这些“堕落”的女性之间,浅黑肤色女性与深黑肤色女性之间,基督教、非洲宗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非洲和美国之间,科学与信仰之间,出生与未生、活着与死亡之间,年迈与年轻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sup>6</sup>

电影中的许多场景聚焦于差异的交往。当差异的边界固定不变时,这种交往常常是痛苦的:佩让特家的女性拒绝接受黄玛丽的礼物;艾里嫌弃尤拉;娜娜和艾里为了尤拉的处境发生争执;艾里砸碎了娜娜的瓶子树;斯尼德先生——这个醉心于西方科学的衣着过于讲究的“费城黑人”( *Daughters* 79 )——拍摄那些格勒男人;如此等等。在元叙事的层面,朱莉·达什的蒙太奇处理手法——拼贴和编辑的电影手法——通过高度强化的并置(即,将表现差异交往的一系列视觉图片并置起来)强调了这些边界。例如,在电影开始不久,比拉尔·穆罕默德拿着他的自制《古兰经》做晨祷的形象,迅速溶解为维奥拉拿着她的《圣经》的形象(77)。在电影快结束时,斯尼德先生拍下维奥拉母亲的一幅肖像,这一场景消融变为黑奴社区的长者们的图像,同时娜娜的画外音令人想起非洲游吟诗人身为家族记忆的储存者的重要性(146—147)。蒙太奇——最早、最为创新地使用这种技术的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认为它是一种辩证法——强调了记忆的非洲形式和西方形式之间的正题和反题。

然而,作为一种辩证法,蒙太奇还暗示了合题——差异之间的杂糅混合:随着一个画面消褪为另一个画面,不可侵犯的差异边界也随之消融。达什在剧本中使用了四个技术术语来说明与蒙太奇有关的摄像技巧——“切换”、“镜头摇入”、“消融”、“渐强或渐弱”。这些技巧具体地展现了固定边界和模糊边界之间的辩证关系。举个例子,斯尼德先生的照相机和非洲游吟诗人被并置起来,代表了不同的记忆手段。对奴隶时代的闪回“切换”回到哈噶的小儿子宁加身上,他正拿着一只海龟,海龟的背上画着用非洲符号表示的求救信号。随后摄像机“镜头摇入”麦克老爹,他正在解释这个游戏与奴隶时代的联系,那时先祖们将海龟用于双重用途:用它与非洲的家人交流;用它象征他们不论漫游到哪里都将家人带在身边。另外一组“切换”和“镜头摇入”显示娜娜和哈噶正在观看播放的照片。作为嫁入佩让特家族的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

哈噶蔑视娜娜的巫术,包括她的瓶子树,其上悬挂的每个瓶子象征着一位逝去的先者。“你是个天生的傻瓜,哈噶·佩让特,”娜娜说道。“谁也没说过那些逝去的灵魂住在这些玻璃瓶里。瓶子树令我们想起那些来过这里的人和那些逝去的人。你研究它们的颜色和形状。你每天欣赏瓶子树,就好像欣赏你所爱的人一样。”(147—148)最后一个“切换”又将斯尼德先生带给我们,他正在汗流浹背地调整他的相机。一方面,这一系列的画面强调了记忆的非洲形式和西方形式的差别。但在另一方面,这组画面还将这两种形式混杂成一种电影形式的去/来,在两者间摆动从而将两者编织成一体。娜娜·佩让特是电影中最为“非洲化”的角色,但是她也是传达融合信息的人。她从不拘泥于事物的表面。她能理解相机和瓶子树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但实施的是相同的记忆行为。括号内的舞台指令强调了娜娜对此的觉悟:“娜娜很好奇,斯尼德先生能够用他的相机捕捉并留住‘记忆’。娜娜依靠的是她的‘记忆碎片’和‘瓶子树’。”(148)

这部电影的蒙太奇信息重复了交往的叙事,它从再现差异转变为再现杂合,从边界慢慢转变为边境。在这种边境上,差异融合互动,和解与共同体成为可能。在线性叙事的强大的乌托邦漂流中,大部分的断层——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得以联接起来。杂合与和解的迷人符号就是在电影的集体仪式的高潮部分出现的那个融合性物体。娜娜·佩让特发明了它,将它握在手中并要求全家人来亲吻它。这个物体显然不是单纯的非洲物体,而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合,换喻地象征了美国黑人经历的那许多地点。维奥拉的《圣经》象征着她的浸礼会信仰,也在更广的意义上象征了许多新教派别的黑人基督教精神。黄玛丽的圣克里斯托夫纪念章,用这位旅行者的保护神的形象,令观众联想起天主教。在所有这些之上,娜娜放上了她一直在缝制的“护身袋”,并说道:“这只‘手袋’,来自我,来自我们,来自他们(伊博人)……就像你们所有人一样……来吧孩子们,来亲吻这只盛装了全部的我的手袋。”(159)

在这只手袋内,她的奴隶母亲的头发与她自己的头发混合在一起。这是感应巫术的一种施法行为。但它也在一个方面象征着奴隶制的罪恶,它将孩子与母亲分开,并在另一方面象征了这个被撕裂的血缘关系的重聚。为了完成这个精神融合的形象,娜娜还抓住比拉尔·穆罕默德的肩膀,将这个穆斯林也带入了佩让特家族。比拉尔还是个小男孩时就被从非洲偷走,在法属西印度群岛卖掉,并随后被带到伊博兰丁,那时奴隶贸易已经被官方结束了很长时间。这个场景切换到比拉尔在海边做晨祷的图像,他面朝着麦加,面朝着非洲。 161

然而,这也是童灿在暹罗的例子中描绘的和平时期的积极的融合情况。它与边境上消极的权力流动有何联系呢?对娜娜的具有再生的融合力量的仪式,和电影的人种学视角形成补充的,是电影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的再现。电影将之再现为,在黑人奴隶与白人主子之间的严酷边境上生产的一种杂合产物。对压迫和强迫归化所产生的杂合的呈现,平衡了电影中神话般的融合主义的乌托邦色彩。褪去乌托邦的美丽色彩,格勒人的世界是离散的,他们被迫从非洲的各处家园中迁移和离散。娜娜的拼缝手袋有力地代表了这一点。它里面盛装的护身符,以她母亲的头发的形式,换喻地代表了失去的并被侵犯的母亲。奴隶母亲与其子女的联系,充当了一种缺席的在场——缺席的原因不仅因为死亡,还因为奴隶市场的存在;在场不仅表现在她身体的一部分的存在,还表现在她精神的存在。非洲故土也是如此——它是一个从未被经历,却永远被渴望的,缺席与在场。黑奴及其自由的后代被与故土分割开来,但他们通过精神和文化与故土联系在一起。

蓝色是电影中使用的的一个主要的视觉修辞手法,展现杂合的再生维度和压迫维度是如何编织在一起的。对海岛奴隶时代的闪回展现了靛蓝的生产。这种染料非常珍贵但却有毒,危害了奴隶的身体健康。尽管达什十分清楚靛蓝不会染到工人的身体上,但在电影中奴隶们的手上都染着蓝色,在1902年的画面中,娜娜·佩让特的手上多次出现

这种显眼的印记。达什向她的历史顾问解释道，“我把这个当作一种奴隶制的象征，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有关奴隶制的典型形象，而不是传统的鞭痕或锁链。”（*Daughters* 31）这些蓝色的印记喻指了奴隶制的种族经济和人性的枷锁。然而，引人联想起奴隶制的靛蓝不仅仅出现在手上。娜娜在电影中始终穿着一件褪色的靛蓝长裙；而黄玛丽，在决定在伊博兰丁住上一阵（她没有在野餐会的第二天和家人或特鲁拉一起离开）之后，就意味深长地穿上了一件与娜娜的长裙类似的蓝裙子。尤拉的当时尚未出生的孩子是电影中的主要画外音的解说者。她像鬼魂一样在一些画面上闪入闪出，系着鲜亮的靛蓝蝴蝶结和腰带，与之相搭配的是她白色长裙上的浅靛蓝纽扣。这些靛蓝色的高光物品，象征了在重生的未来中也有痛苦过去的在场。靛蓝的美包含了受害与能动、侵害与幸存的两个方面。作为电影的主要符号，靛蓝起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成为真正铭刻在身体上的强迫杂合的标记，另一方面它的深色的美象征了充满活力的克里奥尔化。《大地的女儿》指出，美国黑人是一种离散的文化身份认同，它将由奴隶制产生的融合改写为再生，这种再生并不抹除奴役的历史，而是将它吸纳成为自身创造力的条件。

电影在叙事和修辞手法上对根源与路线进行了对话式的嬉戏，由此产生了一种融合主义。这种融合主义也在达什与观众的关系，尤其是与她的美国黑人观众的关系，这一元层面上起作用。<sup>7</sup> 娜娜的疗救性的仪式不仅将佩让特一家捆绑在一起，还起到了榜样的力量，将电影的黑人观众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姓氏（佩让特 / 农民，Peasant/peasant）从语言学上点明了他们与这些观众的联系。作为电影图像，《大地的女儿》将“记忆的碎片”缝织在一起，这些碎片呈现了美国黑人经历的许多跨文化差异。为了实现这一点，达什借用了多种电影传统，将这部电影本身变成了一个边境，其中记录片、人种学、历史学、先锋电影和故事片等多种流派冲突混合。作为一个当代的电影人，达什为其观众所做的是，正是斯尼德先生——他掌握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现代科技——为佩让特



一家所做的事情：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份记录。达什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记录一个行将消失的文化的习俗、手艺、音韵、食品、发型、宗教和家庭关系。她重复了维奥拉在电影中的角色，维奥拉是斯尼德先生的当地信息员，她能够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事物。（和克利福特在《旅行的文化》一文中提到的当地信息员一样，维奥拉曾经旅行过。正因为如此她才能解释她所看到的现象，她现在既是内部人也是外部人。）斯尼德先生的相机，再辅以维奥拉的解释，替代了达什自己的电影眼和她的人种学凝视。维奥拉和斯尼德先生在电影中的功用是为佩让特一家记录、记忆和解释。而作为一个文化项目，达什的电影为它今天的观众，尤其是（虽然并不专门是）美国黑人观众，提供的功用也是如此。

这种将达什与她电影中的角色斯尼德先生和维奥拉平行起来的做法，提出了某种似乎自相矛盾的问题，不过跨文化去 / 来和根源 / 路线的对话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斯尼德先生和维奥拉是电影中受讥讽的主要人物，达什与他们的同盟关系需要一些解释。达什在讥讽那位摄影师和那个家族内的人种学家时，也在某种意义上讥讽了自身的行为，暗中削弱了电影追寻根源的努力。斯尼德先生和维奥拉在电影中最初代表差异双方的对抗性遭遇：斯尼德对西方科学的拥护和对现代科技的掌握，遭遇了娜娜的“扎根工作”和格勒传统；维奥拉的原教旨主义基督教，遭遇了海岛上的伏都教和伊斯兰教。斯尼德的西装革履、维奥拉的长裙和表链饰物，标记着他们是资产阶级，是摒弃了自身的非洲农业之根，努力模仿白种美国人的都市美国黑人。电影中的幽默主要围绕着这两位“受过教育的”、似乎高人一等的黑人出现。他们在乡下亲戚面前表现出了真正的笨拙、不合时宜和彻头彻尾的愚蠢。与娜娜的更大的文化适应性和更为强有力的精神信仰相比，斯尼德对科学的信仰，和维奥拉对基督的毫无想象力的依赖，显得十分幼稚。随着这种差异的对抗逐渐演变，娜娜完全占了上风，而斯尼德先生和维奥拉则完全形象扫地。一方是与非洲之根保持接触的自爱的黑人，另一方是

“被西方化的”黑人，他们要么将非洲之根看作异族风情，要么对之加以  
163 谴责。两派之间的边界被永远固定了。或者看似如此。对这部电影的  
非洲中心主义阐释就会做出这样的论断。

然而，电影中有几个主要的元素，暗中瓦解了电影与根源的排他性联系，尤其是瓦解了认为非洲是黑人特性的唯一根源的本质主义观点。<sup>8</sup>首先，娜娜的融合主义（她主持的那场仪式是这种融合主义的一个象征）将“被西方化的”美国黑人又重新融入家族之中。通过亲吻娜娜的手袋，斯尼德先生和维奥拉放弃了自身的稳定性——摄影师比较急切，而维奥拉则显得较为恐惧和不情愿。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两人都能将格勒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带回北方。第二，达什通过对摄像机的操纵和充满爱意的人种学呈现将自己与现代性认同起来，这种认同强调了电影将非洲记忆形式和西方记忆形式巧妙融合的做法。起初的差异边境最终成为跨文化混合的空间。尽管斯尼德和维奥拉所遭受的讥讽似乎暗示观众，要谴责一切西方的东西，但达什却并非如此，她认为美国黑人应将西方的记忆科技用于自身，在与非洲记忆形式的杂糅混合中改造它们。

第三，电影展示了对白人特性的一种解构主义的嬉戏。霍米·巴巴称之为“殖民主义模仿”，指被殖民者的模仿实践：被殖民者借用某些西方模式，通过对建构主义进行述行表演，暗中瓦解了“天生的”西方优越性。<sup>9</sup>巴巴之所以引进这一概念，部分是将之作为一种方式，来超越弗朗兹·法依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提出的被殖民者的内部种族主义、由此引发的自我憎恨和种族主义病理。在强调被殖民者的能动性的同时，巴巴将某些文化模仿的形式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天生种族差异和白人优越性意识形态的杂合抵抗。从这些角度来看，维奥拉和斯尼德对西方宗教和科技的改造，表明黑人也参与了“西方”这一概念的形成。奥德莉·罗德宣称“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Sister Outsider* 110—113），但维奥拉、斯尼德和达什自己所代表的殖

民模仿表明,人种学和摄影技术这两个工具可以被挪用来重新发现和保留行将消失的历史。

我们也可以对电影中的白色的功用进行同样的分析。白色在电影中多次出现,其中许多女性的衣裙是耀眼的白色,这与其皮肤的黑色 / 棕色 / 棕褐色的丰富色彩形成对比,与最黑的肤色的对比尤其强烈。该电影呈现了一场黑与白的视觉盛宴:不仅表现在肤色和服装上,还有在阳光下闪耀的白色沙滩,海洋中白浪衬着深色背景的变化色彩,倒映两岸浓密的绿荫而呈现出黑色的河水。电影的明暗对比手法——它在明与暗的对立之间不断地嬉戏——解构了明与暗的绝对二元对立,强调了融合的互动。更有甚者,年轻女子身穿的白色长裙尤其具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韵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德华时代的韵味,最明显的是那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衣着。白色蕾丝花边、衣褶、钮扣、缎带和刺绣强有力地“西方”的服饰挪作己用,成为她们的“节日服装”,穿来庆祝这次的相聚与别离。甚至娜娜的靛蓝长裙的上衣也以精美的蕾丝花边修饰,类似于比利时和爱尔兰等地女性的传统编织方法。当身着爱德华时代样式服装的黑人孩子在海滩上舞蹈时,她们间接地在巴巴理论的意义“模仿”了在别处的海滩嬉戏的白人孩子——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中斯凯岛上的拉姆齐一家的孩子,或者年少时的弗吉尼亚·斯蒂芬,童年时她在康沃尔过夏天时喜欢在圣艾维斯的海滩上跑来跑去。弗吉尼亚留存下来的照片显示,她的穿着与达什电影中伊博兰丁的孩子们的穿着十分相似。电影中女性的发型源自非洲传统,但她们的服饰绝对是西式的、中产阶级的,而不是非洲风格的。在神话史诗般地再现格勒人生活的电影中,达什认可了这些服饰的合理存在,通过这么做,她挑战了西方白人特性的天然权威,强调了格勒人的克里奥尔化的创造能动性,以及由此衍生来的非洲离散人群,即吉尔罗伊所说的“黑色大西洋”,的融合主义。

《大地的女儿》暗示,黑人离散身份是由许多文化成分组成的。它

并非一个纯粹的、静态的或绝对的差异，而是一个持续的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它总是已经是融合性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穿梭旅行的产物。重访黑人离散生活中的所有的路线，才能找到黑人的根。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在肯定非洲黑人和美国黑人在生活经历与身份认同上具有联系的同时，也清楚地区分了两者。“非洲”在电影中主要作为一个无差别的、被渴望的他者，存在于那些出生于中间通道和奴隶制的美国黑人的想象中。美国黑人特性是有差别的、异质的、多元文化的。它的克里奥尔化并非大熔炉，而是像那些女性在海滩煮的秋葵汤——文化形态的融合主义汤锅中有各种各样的原料，它们相互混合，相互改变，但并不失掉自身的特色。

被达什的文化炖汤遗留在外的，主要是美国的其他族群的离散、传播和迁移。电影的主要框架是，通过追踪黑人的“路线”来寻找美国黑人的“根源”。在这个框架内，电影呈现了美国黑人的异质性和多元文化特性。但是电影聚焦的是1902年伊博兰丁的一次家庭聚会，这使得电影有充分的理由，主要反映黑人与白人的种族问题。我说“主要”是因为电影中有三位角色暗示了其他的“他者”：夏甲、特鲁拉和圣朱利安末代子，后者是位切罗基族印第安人，是这个岛上他这一族的最后一人。意味深长的是，这三位都没有参与娜娜的疗救仪式，这一排外行为意味深长地揭示了电影的政治无意识。夏甲和特鲁拉拒绝亲吻将家族捆绑在一起的那只手袋。圣朱利安末代子当时不在现场。这一排外行为背后的蕴义大部分被隐藏起来了，可以从跨文化去/来，或根源与路线的对话，这一角度来解释。

特鲁拉拒绝亲吻手袋的原因没有被阐明。当家庭成员一个接一个地走向娜娜时，特鲁拉忧伤地离开了现场，独自走向田野。第二天早上全家人离开时，这种忧伤再次出现，特鲁拉在船上悲哀地凝视着岸上穿着蓝裙的黄玛丽。为什么特鲁拉不能参与那个仪式呢？为什么这对恋人要被分开呢？特鲁拉在电影中从未开口说话，其主要功用是一个奇

异的、外来的被凝视对象。这个角色的种族身份不明朗,在电影的所有角色中,她的肤色最浅。在黄玛丽被明确地呈现为双性恋者时(她兼是母亲、妓女和女性的情人),特鲁拉是黄玛丽的伴侣和情人。同性恋必须要从这个家族中驱逐出去吗?浅肤色的女性在这个美学原则是“以黑为美”的电影中没有立足之地吗?电影没有说明。在她与胡克斯的对话中,达什透露她原本将特鲁拉设计为亚裔美国人(66),只是到后来才把她变为非裔美国人。这个早期构思的种族身份是否还在她的“黄”皮肤上留下了蛛丝马迹?(黄玛丽是位深肤色的女性,但她同行的旅伴的肤色却通常被称作“高黄”。)特鲁拉的亚裔美国人起源,肯定在最漂亮的一幕沙滩场景中留下了痕迹:那时特鲁拉、尤拉和黄玛丽发现一把东方的伞被冲到了海滩上。她们打开有些破损的伞面,撑着它散步并坐在伞下。亚裔美国人的“路线”——不仅在美国重要,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不同种族混合中也很重要——隐藏在电影对美国黑人“根源”的聚焦当中。

圣朱利安末代子并没有参加家族聚会,但最终他以未来女婿的身份成为家族的一员。他与夏甲的女儿艾奥拉相爱。在电影的结尾处,他戏剧性地骑马出现,并说服艾奥拉上马与他一起留下来,而不是与她的家人一起迁往北方。他通过融入美国黑人的血统来确保自己血脉的繁衍。这个婚姻换喻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印第安血统。这个血统在多数情况下被隐藏或遗忘,但也常常被加以神话化。切罗基人最初的家园在美国南方,他们与19世纪逃跑或被解放的黑奴有着尤其密切的联系,通常是家庭关系。作为一个离散民族,切罗基人被迫西迁至俄克拉荷马,但还有少数留在原地。达什的暗示是他们变“黑”了,融入了美国黑人家庭。达什通过婚姻将圣朱利安末代子与艾奥拉结合起来,这种情节安排尽管有确凿的历史依据,但仍然有一些令人困扰的言外之意。达什(我相信她是无意的)参与了她所讽刺的行为:主流文化迷恋于“行将消失的”文化,尤其是美洲的那些“高贵的野蛮人”,从而忽视

了美国印第安人在这个大陆上的真实存在、痛苦和创造性的幸存，包括俄克拉荷马地区的切罗基人，他们被迫在那里重新安家。在对美国黑人的根源与路线表示关注的同时，她却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根源与路线表现得很不敏感。

夏甲拒绝参与仪式的理由得到了清楚的阐释，但我怀疑，这一举动的全部政治内涵并未被清楚揭示，隐藏在了对奴隶贸易的被压抑的记忆中。夏甲认为自己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她大胆地宣称，“我受够了娜娜的老故事。受够了看她用植物根茎做这些药水……还有她谈论的伏都教。”（130）她完全认同于西方的规范和认识论，摒弃文化杂合，虽然甚至连维奥拉和斯尼德先生都学会了接受这种文化杂合，因为它具有将家庭和社团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达什给这名女性命名为夏甲，并用她来体现黑人对格勒人和非洲传统的这种特殊态度，这一决定令人迷惑。《圣经》上的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小妾、以实玛利的母亲。撒莱的嫉妒心导致这对母子被驱逐到沙漠里，在那里（依据后来的经外教义）他们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夏甲的名字象征了女性的奴役地位、不公正的驱逐和北非人与中东人的流浪道路（“路线”）。为什么达什给这位拒绝参与根源故事的女性起这个名字呢？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阿拉伯人广泛参与了输送黑奴去美洲殖民地的奴隶贸易，这一历史使之无法“契合”进这部电影从黑白角度来对待问题的种族认识论。对于这段历史的暗示出现在夏甲对她女儿的痛苦呼唤上。当时她在船上无助地看着马儿飞奔而去。“艾奥拉！艾奥拉！”她尖叫道。“我……拥有……她！”（163）在黑人英语中“艾奥拉”（Iona）和“我拥有她”（I Own Her）发音相同。这组同音词直接指向岛民从奴隶时代起就有的“‘原始’命名习惯”，在电影较早前维奥拉曾向斯尼德先生解释过这一点：“奴隶制结束已经五十年了，斯尼德先生，但在这里，我们仍然给孩子们起这样的名字‘我自己的/麦恩’（My Own/Myown），‘我拥有她/艾奥拉’（I Own Her/Iona），‘你需要她/尤尼塔’

( You Need Her/Unita ), ‘我爱慕她 / 尤多拉’ ( I Adore Her/Eudora )。 ” ( 138 ) 这些名字反映了奴隶制拆散家庭的可怕罪行。在黑奴被解放之前, 这些名字借助词汇的力量将家庭成员凝聚在一起, 而在黑奴解放之后, 这些名字则颂扬了自我和家庭的“主人身份”。然而, 艾奥拉决定和圣朱利安末代子留在伊博兰丁, 这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家庭离散, 由她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所造成的离散。夏甲从呼唤“艾奥拉”转而呼喊“我拥有她”的行为具有双重含义: 既表达了奴隶制时代母子分离的痛苦, 也点明了人身拥有的不合法性, 因为她渴望控制艾奥拉的未来。在这样的背景下, 用夏甲的名字来隐密地呼应《圣经》中的夏甲——阿拉伯人( 包括那些参与西非奴隶贸易的阿拉伯人 ) 的先祖, 这一呼应行为就能产生一定的意义。扎根于美国奴隶制历史中的, 是多个民族的多元文化的“路线”, 而非仅仅是《大地的女儿》所叙事的黑白对立。在讲述非洲离散的故事时, 朱莉·达什和保罗·吉尔罗伊在《黑色大西洋》中的做法一样, 大多逗留在黑白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叙事, 从而压制了对跨文化混合与杂糅的更为多样的叙事。

## 《莫娜在希望之乡》中的路线 / 根源

我现在要转而讨论任璧莲在其畅销小说《莫娜在希望之乡》( 1996 ) 中对文化的路线 / 根源的后现代嬉戏。与达什的电影形成对比, 这部小说似乎在“路线”的嬉戏张扬中摒弃了一切的“根源”, 在变动不居的文化身份地带拥抱无根的状态和无常的变化。小说的四个卷首引语搭建了舞台, 供任璧莲对吉尔罗伊称为“种族绝对主义”的现象展开嘲讽抨击。第一条引用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的话: “我正在变成中国人, 我知道。”第二条引用戴维·穆拉的话。这位日裔美国人说, 在伊利诺斯州的斯科奇长大的自己, 学的意第绪语比日语都多。第三条引文令人想起奥维德: “一切都在变。宇宙本身变动不居。”第四条选自《易经》, 将

167 “元吉”与那些“涣其群……涣有丘”的人联系起来。但正如达什对根寻找引向了异质离散人群的旅行路线一样，任璧莲对族群、人种和地缘政治身份的可变性的着迷，也不断地碰撞沿着多个轴线展开的种族主义，并挑战了集体主义身份认同的强大延续性。和《大地的女儿》一样，《莫娜在希望之乡》也要求读者密切关注根源与路线的互动。叙事在跨文化去/来中来回移动，在身份认同的固定性与可变性、边界与边境、差异与杂合之间协商。

不过，任璧莲的文化之网比达什撒得更宽，远超出了二元对立的种族格栅。她不仅再现了亚裔美国人的异质性，还在更广泛的层面再现了亚洲人的异质性，以及具有欧洲、犹太和非洲血统的美国人的异质性。作为一位华裔美国作家，任璧莲考查了中国人的根源和离散，但这并非小说的主要关注点。相反，小说情节围绕着差异的多元文化大杂烩发展，那些差异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一个多样的美国。驱动叙事的是差异问题本身，在这个主要由移民潮及其子孙后代构成的国家中，差异不断演变嬉戏。文化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它们会抵制变化？它们到底是如何变化的？它们是如何延续的？它们如何反映并塑造了这一美国神话：美国是希望之乡、自由之乡、勇敢者的家园，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美国人”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小说的场景设在富裕的纽约郊区斯卡斯希尔（显然其原型是纽约近郊的斯卡斯代尔镇），开篇的时间是1968年。当时张家刚刚从市里搬到郊区这片“希望之乡”来，那时“种族意识觉醒的羞红还尚未染红郊区漆黑的夜空。”（4）但小说的感觉完全是后现代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变化的比喻，全球族群景观因为不断的人群迁移和跨文化混合而产生变化。

《莫娜在希望之乡》挑战了基要主义身份政治的虔诚。它的语调活泼但充满了不敬，与前面引用过的斯皮瓦克的引文倒是十分一致：“任何有寻根想法的人应该，而且已经，你知道，去种植芜菁甘蓝了。”（*Post-Colonial Critic* 93）<sup>10</sup> 没有哪个团体能逃脱任璧莲机智的讽刺话。



和《大地的女儿》的抒情诗般的神话创作不同,《莫娜》通篇充满了幽默的反讽,用美国青少年的口语化的闲谈漫话来确立叙事距离,将说俏皮话的作者、没她世故的叙事者和天真得很睿智的主人公间隔开来。小说叙事了张莫娜的成长经历,追踪了她从八年级到高中毕业的生活,并附有一篇后记,介绍她大学毕业并生了孩子之后正准备与高中男友结婚时的事。<sup>11</sup> 亚裔美国女孩莫娜和她最要好的朋友,名叫芭芭拉·古奇斯顿的富裕犹太女孩,一起在斯卡斯希尔长大。莫娜的移民父母在斯卡斯希尔开了一家名为煎饼屋的饭店(这是对华裔美国人不是在洗衣店工作就是在中餐馆上班的固定形象的一种嘲弄)。在她寻找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成年美国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莫娜爱上了一个来自日本的男孩,谢尔曼·松本。在被对方拒绝之后,莫娜随即决定皈依犹太教,又爱上了塞思(已经高中毕业的犹太男孩,为了表示反叛,他在父母的后院搭建一个圆形帐篷居住)。她还试图帮助阿尔弗莱德(在她家餐馆打工的无家可归的美国黑人厨师)及其朋友,并在与父母的冲突升级后离家出走。莫娜对父亲偏爱中国员工、歧视黑人雇员的做法感到愤慨,她冲破对家庭的忠诚观念,告诉阿尔弗莱德他为什么没能得到他本该得到的提升。使这个充斥着秘密与坦白的剧情更加复杂的是,阿尔弗莱德秘密地住进芭芭拉房子里,他与芭芭拉的表妹艾维发生了一段秘密恋情。地下铁路时期留下的一个旧隧道使他可以悄悄出入那栋房子而不被人发现。芭芭拉的父母从国外消暑回来后发现了这个复杂的秘密,于是莫娜的父亲解雇了阿尔弗莱德,而后者立即就凭着莫娜告诉他的消息起诉了张家。莫娜的母亲扇了她一巴掌,怒斥她背叛家庭(“张家堡垒”),而这导致莫娜离家出走,躲到她姐姐卡莉在哈佛的宿舍里,向父母谎称她去了法国。后来莫娜又去了加利福尼亚,去拜访她言行怪异的姑姑特丽莎。从加州返回后,她说服阿尔弗莱德撤回诉讼,为自己和芭芭拉怀疑他偷窃的种族主义行为道歉,宽慰地回到家中,却发现她母亲对她不理不睬。这时,在这个事情完全没有被解决的关口,小说

168

结束了。后记提供了一些片断的家庭故事，以及和解与婚姻的传统喜剧场景。只有在此处，得以复原的社会与家庭秩序呈现了跨文化的状态。阿尔弗莱德娶了艾维，而莫娜则嫁给了塞思，之前他们的女儿爱欧已经出世。就在婚礼开始之前，与莫娜疏远已久的母亲出现了。她的到场代表她接受（如果不是祝福的话）这位中国/犹太/美国女儿。母女关系的情节压倒了婚礼的情节，莫娜与海伦相拥在一起，身旁站着的爱欧鼓掌相庆。爱欧是文化和生理杂合的产物，她象征了新美国，象征了未来。

小说的情节设计精细，错综复杂，不太可能在生活中真实发生。在借用流行的家庭喜剧和人种/族群固定形象等陈腐的文化内容时，它明显地违背了逼真模拟生活的传统。线性发展的有关年轻人的爱情、反叛和成人的家庭故事将叙事凝聚在一起。但是潜藏于情节下面的叙事动力却是身份认同的问题，尤其是族群、人种、宗教和地缘政治的身份认同，这些身份还因为性别与阶级的影响而进一步复杂化。<sup>12</sup>一幕幕的场景要么上演了跨文化交往的表演，要么将这些差异置于对话和行动的焦点上。我在第五章中曾探讨过场景在跨文化情节设计中的功用，正如我的讨论所指出的，这个故事移动的所有地点均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交往：张家餐馆、古奇斯顿的家宅、塞思的圆形帐篷、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旅游区、哈佛大学宿舍、加州公寓等等。有关青少年成长的传统比喻、简单透明的叙事声音以及线性的时间顺序均大量借自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但是反讽、嘲讽性夸张和对固定形象的模仿给这个小说添上了一层确凿的后现代时髦色彩。该文本既表现又实践了集体身份认同的表演维度。

169 该小说对根的表面上的摒弃，质疑了潜藏于所有的集体认同之下的“我们”与“你们”的二元对立。它远远超出了白人与他者或者白人与黑人的二元对立的种族格栅，而是强调了它所呈现的每一个团体内部的异质性。我们见到的是各种类型的犹太人、各种类型的黑人和亚

裔人,他们之间的差异足以质疑常见的“华丽马赛克”这一种族概念的可行性。更有甚者,小说充满了定位式的思维,通过呈现每个人占据的相互矛盾的多重主体立场,在差异和社会等级的多重轴线上来回跳转。犹太人与黑人在过去三十年间的爱与恨的关系,在芭芭拉和阿尔弗莱德的关系上,是一种嘲讽性、比喻性的在场——芭芭拉有强烈的社会良心,但也有其不承认的种族主义心理和盲点;阿尔弗莱德依赖于芭芭拉的慷慨,对此又感到怨恨,并且他不把芭芭拉所遭遇的反犹经历当回事。从阶级的层面来看,芭芭拉最有钱,尽管她的社会地位低于恩格斯一家,后者是一个典型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阿尔弗莱德被具有西印度群岛背景的妻子踢出家门后无家可归。一开始,他很感激地接受了芭芭拉的帮助,这种帮助虽然是善意的但却不顾及对方的感受,但是他不断地使用一些常见的反犹话语(怀疑反犹大屠杀、称呼她父亲为“犹太爸爸”、取笑她的鼻子)。而且他重申了美国种族主义的黑白对立,不断地将莫娜当作白人。当阿尔弗莱德及其男性朋友嘲笑芭芭拉的“鼻子整容手术”时,莫娜解释道,有许多亚裔人做眼部手术以便令自己看起来像“白人”。通过这种方式,种族和性别对犹太女性和亚裔女性的影响就被暴露出来。在她们身处的文化中,女性面临着外部的和内化的男性凝视,这种凝视以白人女性为美。相对于斯卡斯希尔的犹太人和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而言,莫娜的父母只是开餐馆的移民。但作为老板,他们又对大多数为黑人的后厨雇员表现出相当大的种族歧视,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中国人。他们的不安全感还与他们在上海时的贫困背景有关,而且这种贫困状况因为战争、革命和离散而更加恶化。没有哪个人物能逃掉人种、族群、性别或阶级的模式化过程——在“他者化”的过程中要么是施害者要么是受害者。每个人在某个点上都会竖立起差异的屏障,将他者隔离在外。

莫娜正处于这个身份认同漩涡的中心,试图弄明白自己是谁,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尽管采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小说很明显地戏仿

了一本美国小说的典范作品，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马克·吐温用一位天真的少年叙事者（莎剧中的智慧小丑的美国版）充当载体，来表达作者的讽刺，对各种不人道之事的批判和要求改变的呼声。<sup>13</sup> 莫娜相信美国的自由之梦，不断地以为梦想就是现实，她并不理解，在意识形态和它所掩盖的现实境况之间存在距离。当她被学校指派去帮助日本访问学生谢尔曼时，她这么回答后者关于她是否是美国人的问题：“我当然是美国人……出生在这里的人都是美国人。还有一些人是转变而来的。你可以成为美国人。”当他否认这一点时，她回答道，“你当然能……你只需学习一些规则和言论。”“但我是日本人，”他回答道。而她对此的回答则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变成美国人……就像只要我愿意我就能变成犹太人一样。我只需转变一下就行。”（14）正如哈克的纯真，对马克·吐温而言，包含了真理和核心价值的内核一样，莫娜的解释反映了1968年时日本人和美国人在公民身份的概念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在那时的日本，公民身份取决于父系的血缘关系：只有父亲是日本人的孩子才会被认为是日本人。<sup>14</sup>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美国，除了血缘关系之外，出生在国家的疆界之内也可以赋予公民身份，这种可能性瓦解了生理上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它不是地缘政治身份认同的决定因素。

作为任璧莲对种族绝对主义的讽刺性抨击，莫娜对“转变”的美国力量的天真信仰，代表了对生理和历史可以决定身份认同的双重否认。她从字面上来阐释自己家的移民历程和美国对自由的允诺，这令她的母亲深感沮丧。当她母亲震怒于她皈依犹太教的行为时，莫娜说，“是你把我们带大，让我们说英语。是你说的，你会像竹子一样柔韧顺变，而不是像贝尔电话公司的电线杆一样。你说过我们不再是纯粹的中国人了，父母必须得接受我们变成其他的人。”“我是让你变成美国人，不是犹太人，”她母亲反驳道。莫娜的回答则是：“犹太人也是美国人……美国人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随便成为什么人，而我恰巧选择成为犹太

人。”(49)在莫娜与母亲最后决裂的时刻,海伦批评莫娜参加犹太教赎罪日的礼拜仪式:

“那就够犹太的了,”她说。“别再想什么礼拜了。别再搞怪了。你知道这些麻烦都从哪里来吗?所有的麻烦都源自你成了犹太人。”

“妈”,莫娜说道。“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如果我想去寺庙,我就可以去。事实上,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清真寺……”

“忘记什么自由的国家吧,”她说道。

“你什么意思?这是美国。我可以记得任何我想记的事,我可以成为任何我想成的人,我可以——”

“你想成个人物,你可以离开这个家,不要再回来了,”海伦说道。(248—249)

莫娜重复的是大众媒体宣传的一些套话。她象征了“路线”的原则,代表了美国的变形和美国式自由的文化叙事: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身份。毕竟,“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告诉他们这是美国,一切皆有可能,”芭芭拉这么建议莫娜处理她父母对中国方式的强调(84)。甚至这家的姓氏张(Chang)稍加改变就能成为变化(change)一词,暗示了金钱、贸易、交换以及与“路线”相联系的文化交流。莫娜的皈依具体体现了她的“转变”的想法,并给她带来一个新的姓氏——从“张”变为“张戈维兹”。新的姓氏起初是个玩笑,是朋友们用来称呼她的绰号,后来在后记中严肃地出现:莫娜希望自己、塞思和爱欧都将姓氏改为“张戈维兹”以反映他们独特的美国式杂合。

这个姓氏会公开地宣告她的杂合性,并将这一杂合性合法化,莫娜对这个姓氏的渴望代表了她的成长历程暂告一段落。为了达到这个终点,她既历经了对母亲的反抗,也抵制了娜奥米,那个象征对种族之根

的追寻的人物。娜奥米是卡莉在哈佛的室友，是位高挑美丽、极其迷人的黑人女性。她出身于资产阶级，不同于工人阶级的阿尔弗莱德及其朋友。娜奥米不仅“要”她的根，她还必须找到它们，并在这个过程中坚持让别人也找到自己的根，而且这个根要迥然有异于她的。娜奥米先是将卡莉，随后将莫娜纳入其羽翼之下，教她们正确地尊敬自己真正的根，并政治上正确地看待白人帝国主义。在艾丽斯·沃克的短篇小说《日常用品》中，沃克将那个信奉黑人种族主义的女儿用作笑柄，借以讽刺本质主义种族主义的权威性。正如沃克的笑柄人物一样，娜奥米代表了种族绝对主义，吉尔罗伊曾在强调文化的异质性与杂合时抨击过这种种族绝对主义。在娜奥米的影响下，卡莉在大学里选修中文。然而，卡莉回到家中却发现无法理解父亲的工人阶级的上海话，而且父亲认为她的中文课纯属浪费时间。娜奥米让卡莉，“别理你的父母”，与你的“祖先”“保持接触”。困惑的卡莉问道，“但是我的父母难道不是我的祖先吗？”（129）“你怎么会又做回中国人了呢？”莫娜问她姐姐；“‘我还以为你厌倦了做中国人。’……卡莉确实厌倦了做中国人，但是做中国人、做中国人……她并不理解做中国人的意思，直到她遇见娜奥米。”（168）娜奥米对祖先遗产的崇尚甚至驱使她去烹制“正宗的”中国菜，连莫娜都认为她的菜“太真了”，能吃到是个“奇遇”（186）。娜奥米强调与众不同的种族正宗之物，这种强调与张家的融合主义形成对比，作者在平淡的叙事中对这种对比进行了莫大的讽刺：“例如，娜奥米学会了做一种正宗的茶熏鸭，将茶叶放在锅里炒，再把鸭子放入其中熏制16个小时。（与此同时，莫娜向她提供了海伦最近最喜欢的一道鸭菜食谱，即：韦斯彻斯特风味的北京烤鸭。全部的秘诀就在于把鸭子放入百事可乐中浸泡一整夜。）”（186）

张家在厨艺上的文化嫁接颂扬了文化杂合，而吉卜·基德为该小说的布面装订版设计的封面成功地传达了这种文化杂合的精髓。基德没有将美国身份认同表现为一个熔炉，其中原本不同的文化被同化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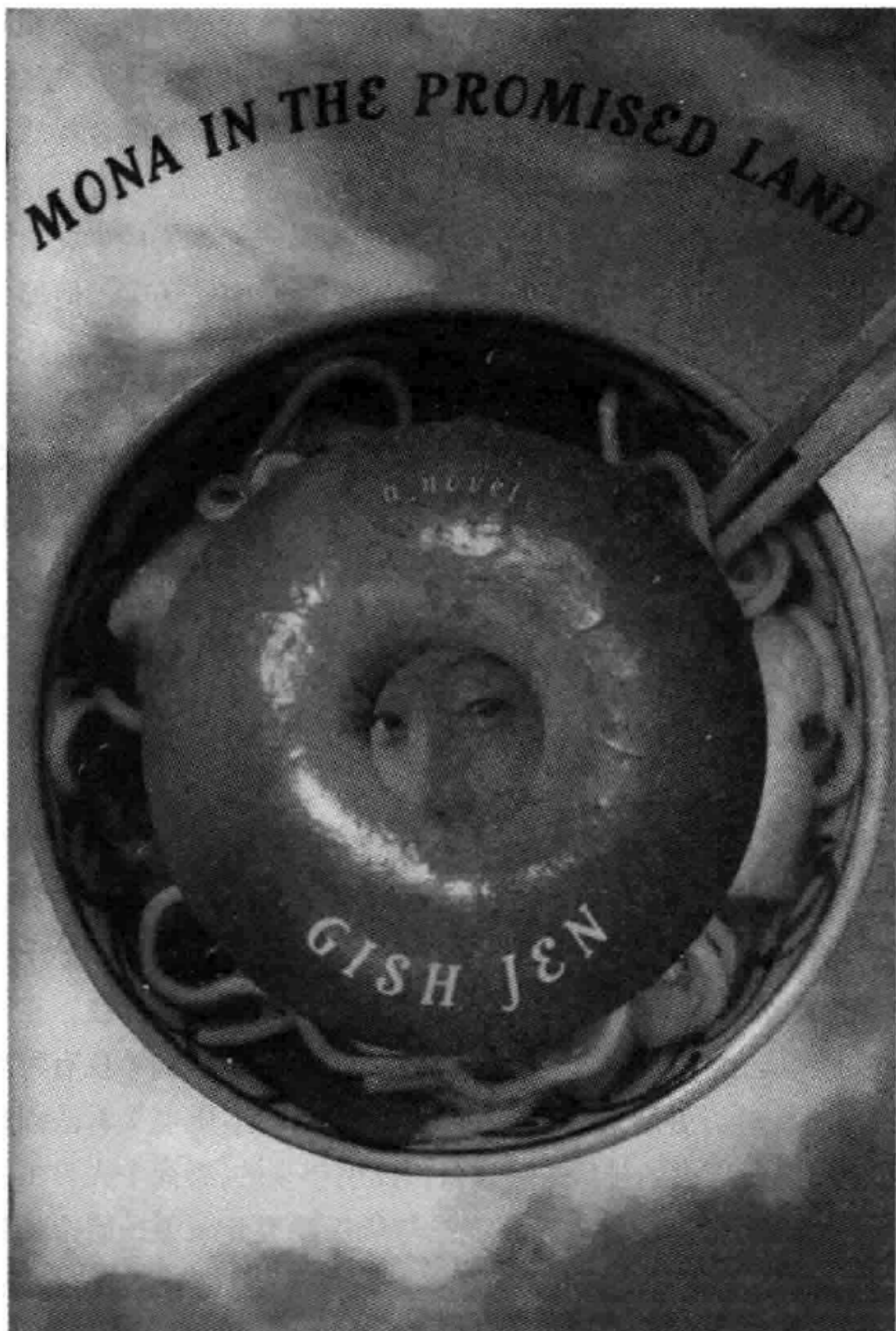


图4:吉卜·基德为《莫娜在希望之乡》(任璧莲著)的布面装订版设计的封面

同质的文化,而是将之展现为一锅微沸的汤,包含的原料既互不相同又不能截然分清(图4)。这并不是由紧抓其根不放的各个不同种族组成的一个“华丽马赛克”,而是包含了个体异质性和杂合的融合场所。这幅照片拼贴画将一个面包圈(它是全麦的吗?)叠加在一份汤面之上。面包圈的孔洞处露出一位东亚女性的双眼和鼻子。作者的中文名字出现在面包圈上,令人以为这肯定是个中国女性和中式汤菜。但那个汤其实是日本的乌龙面,而不是中式的,至于那张脸——是谁的?它的“非白种人”的种族标签显而易见,但它的文化标签呢?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或者“原汁原味的”美国人?封底的照片显示这个女性其实是任璧莲自己,但在封面上她的眼睛显露的面积刚够换喻地表明其东亚的生理特征。这份汤玩味了大家熟悉的“熔炉”的意象,和近来喻指美国多元文化的炒菜的意象。但和小说一样,它趣味地展示了一种新杂合的可能性,以及身份认同的总是已经杂合过的特性。这个封面设计为后面的以变化和转变的力量为主导的篇首引文和叙事铺设好了舞台。<sup>15</sup>

然而,为了平衡小说将身份认同当作一种选择表演的后现代嬉戏,任璧莲将被压抑历史的回归呈现为身份认同的决定因素。转变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或许是美国神话的一部分,但是不论莫娜多么拥护千变万化的变化之路线,她的故事还是揭示了文化根源的持续存在。在一幕又一幕的跨文化交往和辩论中,讽刺是双向的:受嘲讽的不仅有种族绝对主义,还有对历史后果的盲目无知。对血缘的本质主义看法固然是笑柄,但莫娜对历史的排斥——以及由此引申来的,崇尚个人自由的美国意识形态,乃至后现代主义将能指与所指割裂开来颂扬能指的自由嬉戏的倾向——也受到了极大的嘲弄。第一章《莫娜被掀倒》中路线/根源的对话充当了整部小说的一个具有先兆性的缩影。在此章中,莫娜在向谢尔曼·松本解释时首次表达了变化的美国原则。但是这一章中发生的事情不断地瓦解她对变化的自由的天真信仰。其中最具有预见



性的一个事件是,莫娜在课余学习的历史课将这个华裔美国女孩与那个日本来的男孩组成一组,仿佛他们之间有天然的联盟关系一样,完全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惨痛历史,以及中国人因为1937年至1938年的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而对日本人普遍持有的仇恨心理。莫娜对这个改变了她父母的生活的历史事件基本上一无所知。她深深地迷恋上了谢尔曼,督促他成为美国人。而他的应对则是计划让她成为日本人,这样他们就能结婚并返回日本。这样的转变梦想随着莫娜的母亲进入厨房戛然而止。当时,谢尔曼正在讲述广岛日本人所付出的牺牲,并向他贴在海伦冰箱上的一幅印有日本国旗的图片鞠躬。海伦的反应再次肯定了历史对身份认同产生的强有力的持续影响,并(同时反讽性地用美国个人自由的言论)质疑了美国个人自由的神话:

当海伦进来时,她的脸通红。映着身后的白墙,她本人看起来就有点像日本国旗。然而莫娜感觉她最好还是别这么说。一开始她母亲一动也不动。接着她一把将那面旗从冰箱上撕下来……她将那张纸揉成一团,冲着谢尔曼嘶叫道,“这里是美国,你听见了吗!”(15)

在回答莫娜的困惑时,海伦“解释说二战也发生在中国。‘希特勒,’莫娜说道。‘纳粹。大众汽车。’她知道日本人有错,因为他们轰炸了珍珠港。海伦解释了那之前的事情。‘什么蓝鲸大屠杀?’莫娜问道。‘是南京’。”(15)莫娜被割裂了与自己的历史根源的联系,她对欧洲之外的二战情形所知甚少。海伦的历史教育是她在学校里学不到的,这种教育暗示了,在美国的中日后裔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史的多种因素决定,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被轻易地忘记。这一章的结尾肯定了海伦传达的信息。当谢尔曼和莫娜激情难耐之时,莫娜解开了衬衫的扣子以鼓励谢尔曼继续。这种主动的性行为冒犯了谢尔曼的男子气

概和日本性格。他生气地做出反应，暴力地将她掀翻在地，并在后来给她的信中称“你永远不会成为日本人。”(23)莫娜被撇下来独自思考“转变”的可能性，但她拒绝放弃。在这个充满多重嘲讽的文本中，读者从海伦的历史教育中比莫娜学到了更多的知识。历史根源十分重要。

174 这种双向的讽刺既瓦解也强调了根源与路线两者的重要性。这种讽刺甚至也存在于对娜奥米的描写中。她和海伦一样急于向莫娜灌输历史知识，但因为她们所讲述的历史建立在对黑人特性的一种正统的本质主义的理解之上，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历史教育都被暗中瓦解了。但是她们所教授的关于种族概念的内容，虽然受到讽刺，却也提供了一个场合，来讥讽莫娜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实际后果茫然无知。作为任璧莲讽刺的对象，娜奥米从生理的角度来解释种族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她们所反对的霸权种族主义如出一辙。但是莫娜尝试理解她们的行为却向读者揭示了(尽管莫娜自己并不明白)种族构成机制的强大影响。中立的叙事者为双向的反讽铺平了道路：

但碰巧的是，和卡莉一样，莫娜很快就开始崇拜她。娜奥米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尽力按照娜奥米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例如，用白种人这个字眼。娜奥米从来不像阿尔弗莱德那样说他们来打你的屁股。她用一种更为柔和的方式谈论他们，显得他们似乎不由自主地被一种隐形的、全天候适用的特别胶水粘在一起。它也将莫娜、卡莉和娜奥米粘在一起，因为她们都是有色人种。莫娜以前从未想过自己是有色人种，尽管她知道她自己不是白人。黄种人，现在娜奥米这么说。你是黄种人。黄种人、黄种女孩。这个想法得让人适应一阵子，尤其是莫娜的肤色只在夏天最为明显地泛出棕色，而在其他的季节里并没有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典型。但是，娜奥米也不是那么黑，她的肤色更接近手提袋的颜色。假如她是个柜门或者染发剂的一种，那么人们会给她的颜色起个准确的名字。

但因为她只是个人,所以她就被称作黑人,就像莫娜和卡莉被称作黄种人一样。而因为黄色是一种颜色,她们就是有色人种,这就是她们在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的方式。(171)

在使卡莉和莫娜认可“黄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标签是天然生成的时候,娜奥米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种族是一个文化建构——一种使身体的某些部位(而不是其他部位)上的差异具有社会意义的音素符号。(我借用了语言学的术语“音素”。它指在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内包含意义的声音。我用它来暗示,正如声音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人的身体有着千差万别的不同,但是文化仅对其中个别的具体生理差异赋予具体的含义,就像语言只赋予某些声音特殊意义一样。)卡莉因为肤色而遭到其他种族的客体化,对她而言,皮肤是承载强有力的种族文化密码的身体部分。而对莫娜而言,充当种族音素符号、令她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体部分,却不是皮肤,而是眼睛、体毛和乳房(75—76, 92)。<sup>16</sup> 随着喜剧的螺丝拧紧,任璧莲强调了这一点。她讽刺性地使用了帝国主义的语言,并用青春期的身体变化来质疑生理种族主义:

莫娜是整个年级中第一个行经的女孩子。而且,她根据远东的人口问题猜测自己发育正常。但是她看起来并不像,比如说,芭芭拉。如果她的朋友是个发达国家的话,那莫娜肯定就是第三世界。莫娜仍需发育才能长成芭芭拉那样的体形:后者的乳房,比如说,是名副其实的殖民地,有明确的趋势要独立。与之相比,莫娜的乳房压根没有这个倾向。不盈一握。……甚至她的乳头看起来似乎是节食过的,小小的棕色突起——连乳晕都没有……后来莫娜会意识到在大众看来东方人多么具有异国情调的性吸引力,而她对此的全部反应会是,我的没有乳晕的突起怎么办?……而且没有浓郁紧密的阴毛,哎呀。她怎么会有呢,她甚至连腿毛都不用

175

刮……腋毛也不用——事实上她自夸那里长了几小缕。要是她不用把手放在头上，别人就能注意到就好了！毛发、毛发、毛发，她想到。尤其是面毛、体毛。（76—77）

尽管莫娜相信转变的能力，尽管她难以接受“黄种人”和“有色人种”的概念，尽管她拒绝接受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来看待人，她的确体验了种族主义思维及其机制化的影响。因而，当她忘记自身的地缘政治起源（父母来自中国）时，她就面临着困境。压制这些具有决定力量的历史根源，使她容易成为种族体制下的隐身人，并容易依据她所处的那个体系对自身的身體音素意义产生自我厌恶感，因为那个体系推崇的是“白种人”的眼睛、毛发和体态。

莫娜倾听阿尔弗莱德及其朋友的心声，并在事后观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莫娜（以及读者）学到了另一个教训：多种族的美国社会中存在着针对黑人的有害的、难以打破的种族歧视。奴隶制的历史及余波，和反犹大屠杀及南京大屠杀一样，不能被忽视，尤其是当它再被阶级关系复杂化时。娜奥米所受的教育和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使得她在哈佛，在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度假地，在出版界都成为（具有异国风情的）备受推崇的人物。但是阿尔弗莱德只是一个专业厨师，靠每次的薪水才能维持生活。他的这份工作无法保护他在餐馆免受歧视，也无法阻止芭芭拉怀疑他从古奇斯顿家偷走她父亲的银瓶。当芭芭拉和莫娜拿莫娜皈依犹太教的事情举例，说明阿尔弗莱德也享有美国的自由时，阿尔弗莱德的回答触及了美国黑人的种族状况的根本。莫娜在别处是讽刺的工具，在这里却变成了讽刺的对象。她建议阿尔弗莱德“转变”：“你也可以有大房子、四隔间的车库、园丁”（137）；“我们永远也不会有大房子，也不会有大车库，”阿尔弗莱德解释道。“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犹太人，哪怕，比如说，我们长着莫娜小姐想长的那种鼻子。我们是他妈的黑人。”（137）古奇斯顿家和张家的种族歧视行为验

证了阿尔弗莱德的观点。隐现于全部文本中的对《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呼应,在以下平行结构中变得格外强烈。在《哈》书的令人不安的最后一部分叙事中,汤姆和哈克拿吉姆的自由胡闹。这一滑稽行为与本书中芭芭拉与莫娜密谋用一个残余的地下铁路地道将阿尔弗莱德隐藏在古奇斯顿家中的行为遥相呼应。任璧莲对那个经典文本中的复杂问题进行了互文性的嬉戏,这一嬉戏既把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再现复杂化了,也证明了种族歧视的持续存在,以及美国黑人在新伊甸园这块“希望之乡”中格外遭受的歧视。

甚至该小说主要的变化隐喻——莫娜对犹太教的皈依——也常常受到反讽,显示了基要主义的集体身份认同思维的持续性。主持莫娜皈依的那位拉比遭到解雇,并基本上被迫丢掉了拉比的职位,这凸显了在“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上的种族主义的宗族传统。书中简要描述的埃勒维兹·英格爾的故事也点明了相关的主题。这个女孩成长于一个典型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却发现自己去世的母亲是位犹太人。虽然她并没有像莫娜那样一连几个月地学习犹太教条文,但仅凭她的身世,她就立即受到犹太社区的欢迎。读者在莫娜的困惑中学到的教训是,即使一个人和犹太身份没有历史的联系,但母系的血缘关系就能使她真正成为犹太社区的一员,而信仰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此外,莫娜的杂糅姓氏“张戈维兹”体现了她的中国身份与犹太身份之间的联系,细想起来这个联系并非完全偶然。任璧莲在莫娜这个角色的身上将犹太身份与亚裔美国人身份联系起来,其目的是要点明将亚裔美国人(尤其是来自中、日、韩的那些人)当作“模范少数族裔”对待的那种霸权态度:这些人在当今的移民潮中扮演的角色,正是犹太人在二十世纪早期的移民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刘大卫指出的,亚裔美国人在大众传媒中经常充当荣誉“白人”的角色。其中少数人的成功榜样被用来掩盖其他亚裔美国人所遭遇的痛苦,并被隐蔽地用来指责其他少数族裔的人应为自身的“没有成功”负责(详见其《洛杉矶》

一文和本书第二章)。任璧莲在开篇就点出这种历史产生的联系。叙事者宣告刚刚迁到郊区的张家是“新犹太人,尤其是模范少数族裔和伟大的美国式成功的代表。他们知道自己属于这片希望之乡。”(3)任璧莲可能还考虑到犹太人与“海外华人”的传统联系:在东南亚,海外华人常因其与商业和教育的联系,而被称为亚洲的“犹太人”。<sup>17</sup>不管怎样,该小说直接展示了亚裔美国人如何使得美国的黑白二元对立的种族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这一种族关系与黑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上的)联系,因为他们共有关于奴役、大规模迁移和离散的叙事。在《黑色大西洋》中,吉尔罗伊回顾了这种特别的联盟关系及其不同的具体表现。《莫娜在希望之乡》进一步补充了他的叙事,暗示了亚裔美国人(尤其是华裔)如何通过其“模范少数族裔”的地位悄悄地排挤了美国黑人,这些亚裔美国人是荣誉白人,或者说几乎如此,但是和犹太人一样他们从未被完全同化。

最终,任璧莲的多向讽刺再次肯定了根源与路线的历史产物,既有抹之不去的建立在对差异的信仰之上的传统集体认同,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和文化杂混。随着小说在跨文化去/来之间来回移动,既肯定差异又认为在融合的边境地带不存在纯粹的差异,种族绝对主义和绝对自由的概念均分崩离析。莫娜假想给霍若维兹拉比打电话,“就打个招呼,或者问问为什么她现在是犹太人了,却比以前感觉更像中国人了呢?”正如莫娜所好奇的,“对此有没有某种伟大的解释——比如,黑格尔的?”(66)在小说稍后一段中,拉比给她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强调了根源与路线两者的现实性:“想摒弃旧的自我是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没有静止不变的事物。万事都在变化,一切变化都有损失。”(268)她从拉比和她母亲那里学来的教训是,她甚至不打算完全摒弃旧的自我。“张戈维兹”的变化最终不是意味着改头换面或完全翻转,而是一种杂合性的混合。和安莎杜娃的“新美斯提莎意识”一样,莫娜的杂合身份常常令她感觉一无所属:“不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

徒,也不是黑人,也不是正宗的犹太人,也不是来自唐人街,也不是……我无所适从。”(231)但也和安莎杜娃一样,莫娜的多重身份构成了精力与创造力的一个关键来源。

## 地缘政治比较学

以上我比较了《大地的女儿》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中的根源与路线、边界与边境的对话表演,认为其在元层面上展现了文化身份的地缘政治构成中的他性与模仿的相互影响。寻根溯源的抒情电影和拥护无根状态的讽刺小说,乍看起来似乎标志着差异。分别从美国黑人和亚裔美国人的角度对地缘政治、人种和族裔所做的再现,看起来似乎有无法弥合的巨大差异,更何况其中还杂有性别和阶级的影响。每个文本潜在实现的文化功能似乎同样差距很大。达什的电影旨在治疗,将黑人观众与祖先的过去和一个离散的想象共同体联系起来。任璧莲的小说力图打破所有的种族虔诚,包括对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虔诚。但是对两个文本及其潜在效果的进一步思考则显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在两者间形成了一种模仿关系。达什对根源的叙事最终与路线的故事密不可分,与身份认同产生的迁移主体性和融合主义密切相关,而且身份认同随着人们旅行至不同的地域而总处于变化的过程中。反过来,任璧莲有关路线的故事却不可避免地回归到根源,验证了历史遗产的必需性,而集体的身份认同正是由这些遗产塑造形成。此外,正如差异只能放在同一性的背景中来理解一样,这两个文本的叙事在根源与路线之间摇来摆去。差异之间树起了边界,而这些边界又在杂合的边境上消融。这说明她们的叙事“超越”了差异但并没有擦除它。“我们需要用比较的思维来考虑各个族群的独特的根源 / 路线。”克利福特在本章开篇引用的那句卷首语中如是说(“Traveling Cultures” 108)。我分析了《大地的女儿》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中再现的地缘政治定位和

起源,目的是为了追踪每个文本内的根源/路线的相互影响,以及两个文本在再现和实践跨文化交往时相互之间的影响。

178 在这些文本叙事的交往中,以及在本章叙事的文本交往中,种族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部分地反映出,长期以来种族在美国一直充当着主要的透视镜,社会等级划分的机制通过它得以被理解。即使当权力和地位的非对称关系十分复杂,单一的种族等级话语显然不足以解释时,情况依然如此。如我在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我们需要坚持用关联性的、情境化的身份认同分析方法,来理解《大地的女儿》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中再现的种族与性别、阶级、宗教之间的互动。种族认同的产生包含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以及第三章理论概括的各种杂合形式。但是朱莉·达什和任璧莲的并置,不仅仅只是证实了种族对于理解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被迫或自愿移民北美的大背景下理解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她们之间的比较还质疑了“有色人种”之类的概念的有效性,这些概念忽视了由空间定位产生的差异。不论是在真正还是比喻的意义上,人们打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空间定位对其身份认同具有建构作用。正如我在第四章中讨论的,身份认同的地缘政治轴线与种族轴线紧密相联,但前者延伸的范围并不与后者完全重合。地缘政治比较学要求一种空间实践和地缘政治思维,来分析文化认同产生过程中的空间定位和旅行路线的含义。同样,地缘政治思维也适用于边界问题和越界问题——各种类型的边界与越界。那些发生在边界和边境上的故事,以及关于边界和边境的故事,叙事了所有门槛的动态的双重性。正如马丹·塞拉浦指出的,“所有的边界,包括国家的边界,既是屏障也是交流与交换之地。”(“Home and Identity” 98)我相信,所有的差异之间的边界亦是如此:它们是运动的场所,其中,路线产生根源,亦回归于根源。



## 第三部分

### 女性主义 / 后结构主义



## 沟通大西洋两岸的歧见： 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女性主义

我最早写作本章时，正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感到变化之风在高校和世界各地流动——渴望 90 年代会有所不同，并展望 21 世纪。在美国，由里根政府主导的 20 世纪 80 年代压制了那些致力于社会正义的积极努力，将那些拒绝遗忘的人边缘化，并进一步加深了主流人群与社会边缘人士之间的鸿沟。当然，80 年代不断有批评的声音——参与性的、政治性的声音，但我那时感受到的是一种质的转变，转向承诺、使命和社会责任。对学者、老师和学生而言，这种变化意味着伦理与政治的问题、能动性与实践的问题、目的与意义的问题（再次）具有日益增长的合法地位。这（再次）意味着，对我们学术工作的紧迫感和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回归——或者至少，在文化生产和社会变化的领域学术工作应该具有重要性，必须具有重要性。

塞莱斯特·施耐克和丽莎·鲁迪克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1989 年的一次会议命名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女性主义参与”。她们的这一举动十分大胆，把“参与”这一术语（重新）引进批评话语之中（补充一句：考虑到这个词在求偶示爱和政治实践的文化文本中的历史，它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是个绝妙的词汇），并用之后一词来修饰“后结构主义”从

而使这一后学现象双重化。“之后”用看似中立的口吻宣告，我们已经超越了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过去，虽然它仍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其在场却与以前有所不同：它作为我们最近之过去的一个重要遗迹在场，但在现在的新环境中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受她们的题目的启发，我自己的题目宣称，从历史上来说，我们这些高校中的人士正处于一个后 / 后结构主义的时期。我尤其想表达的意思是：在后结构主义作为最权威、最有声望的学术话语发展了近20年之后，这一逐渐成形的霸权正日益受到广大评论家的质疑——这些人中，有的拥护回归到经典文本和固定意义的理想国度，有的则抨击在后结构主义话语的绝对困境中难以摆脱的学术精英化和排他性的权力关系，还有人坚持认为芭芭拉·克里斯蒂安所称的“理论的角逐”需要撤退，让位给目前女性、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人民在文学和评论场景中的持续且日益增加的在场，另外一些人则在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写作但却日益批判后结构主义，一方面批判它脱离历史、无动于衷和不参与政治实践的倾向；另一方面批评它的大一统的整体化正统做法和“大师—学徒”的心理动力学。

后结构主义内部的变化——我相信至少部分是外部批评引发的结果——尤其有助于定义这个后 / 后结构主义的时期。两本出版日期相差近十年的书籍浓缩地展现了这种变化。我指的是凯瑟琳·贝尔西在1980年出版的阐释与拥护后结构主义的《批评的实践》，和托马斯·卡瓦纳1989年出版的后结构主义选集《理论的界限》。这两本书——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书——构建了这个十年。<sup>1</sup> 贝尔西具体表现了后结构主义的反人文主义方面，颂扬“作者死去”带来的解放效果，并追捧她所谓的诸如罗兰·巴特、雅克·拉康和皮埃尔·马舍雷等理论家的“科学”的批评。她对后结构主义“批评实践”的呼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I.A. 理查兹在新批评早期提出的“科学”的要求。其目的在于将批评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科学的批评……拉开了自身与想象的文

本连贯性之间的距离,分析那些构成文本原材料的话语和生产过程(这个生产过程使其成为一个文本),并认为文本中包含的并非‘知识’而是各种不连贯且偏颇的意识形态。”(128)

在我们这个十年行将结束时,卡瓦纳在其《理论的界限》一书的介绍部分提到了早先存在的后结构主义对“这种美妙新科学”(5)的信仰,但却论证说后结构主义理论已经超越了适当的界限。它没有解放阅读的多重性和无限性,而是相反地僵化为一个霸权性的正统理论,令阅读失去活力,成为对同一性的重复。他自我批评式地写道,“我们把这个话语当作激进他者的话语引入,却似乎仅仅产生了最为绝对的同一性和正统性。”(5)他声称,理论在突出语言再现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将对“作者”的关注转移到“文本”上。借用弗洛伊德的话,卡瓦纳说道:理查德·马钦和克里斯托夫·诺瑞斯“表达得很好,‘曾经作者占据的位置如今站上了文本’。”(7)在“放逐语言的模仿功能”时——即指涉性和“真实”——理论使其自身成为“上演自由表演的场地,这种表演丝毫不受任何先在叙事的限制,”它被“从所有可能的认证中割裂,其意义定位于作品本身,独立于理论家的话语之外。”(10)在现实的情况下,这种“作为理论家的评论家的自我肯定的表演”导致在高校内形成一种“大师与其学徒的辩证法”。以“美妙新科学”的面目上场的学科现在成为“一种晦涩难懂的科学,只有通过勤奋的研习才能有望了解,”这个体系要求忠诚,并通过吸纳与排斥来实施控制。“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他写道,“这种政治要求无情地驱逐所有那些不加入或反对大师与其学徒之间进行的互为支撑的对话的人。”(12)更有甚者,这种在理论的述行场地实行的政治,已经使得“‘现实’本身……在最好的时候也变为毫不相干的事,”“被绝对地排斥于支撑某一理论的象征体系之外。”(15)为了使“理论”回归到它所应该遵从的界限内,卡瓦纳号召结束这种正统状态,以及“阅读的自由、‘现实’的难以捉摸的在场,和在各种优势话语之外言说的声音所带来的挑战”(17)。事实上,卡瓦

纳拥护对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前所压制的一些概念进行后结构主义的恢复。

我想说明的是，卡瓦纳是从后结构主义的框架内铭刻后 / 后结构主义时刻。他并非惟一这么做的人。他代表了后结构主义内部出现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征兆性地出现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中，出现在对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福柯式分析中，出现在不断扩散的对后殖民主体与文本的阅读之中，出现在一些人试图将女性主义、美国黑人、亚裔美国人、土著美国人、奇卡诺 / 娜和拉美裔美国人，以及同性恋的理论及批评所产生的他性分析吸收进来的尝试中。卡瓦纳本人并不承认引发了他的批评方向的那些非后结构主义的批评——事实上他似乎对之茫然不查。但我惊讶于他的批评与芭芭拉·克里斯蒂安的批评有许多共同之处，后者在其 1987 年的文章《理论的角逐》中从一个非后结构主义者、美国黑人和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有力的理论抨击。她，和卡瓦纳一样，反对后结构主义理论内存在的“学术精英统治者”的“霸权”（227）。她，和卡瓦纳一样，相信这种行业内的权力结构导致理论家重复其所宣称反对的东西：“因为我感觉到，这种对文学批评理论的新的强调，就和它所抨击的世界一样，是霸权主义的。我发现它所创造的语言并没有阐明我们的状况，而是将之神秘化了，从而使得一小撮了解这种特殊语言的人士能够掌控整个批评局面。”（229）她，和卡瓦纳一样，集中讨论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作者与“真实”的擦除，认为这一点格外危险：“现在我被告知……作者死了，无关紧要了，仅仅是叙事从中渗出的容器，他们并不努力也压根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相反，他们生产出的文本就像天使一样是脱离肉体存在的。”（229—230）卡瓦纳担忧，评论家在进行表演性的自我展示时，置换了其所讨论的文学文本。与他类似，克里斯蒂安痛恨“理论批评”“使得我们这么多人”从阅读文学的重要工作中“分散了精力”（231）。卡瓦纳唯恐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强行施加正确思维的正统之物。与之相呼

应的是克里斯蒂安对其“成为铁板一块的倾向”及形成一种“独白式的”“权威话语”的愤怒(233)。

当然,卡瓦纳和克里斯蒂安的批评具有重要的差异。具体说来,卡瓦纳对这一政治的分析聚焦在大师与学徒的动态关系上,而克里斯蒂安则强调理论精英的产物,将之置于“有色人种、黑人女性、拉美人和非洲人的文学开始向‘中心’移动之时”的时间背景下(229)。对克里斯蒂安而言,正典性的问题至关重要,而对卡瓦纳而言,我们读谁的文章、为什么读,这些问题甚至还没有进入考虑范围之内。克里斯蒂安对后结构主义整体表示怀疑,而卡瓦纳则试图为“理论”确立其职责界限,丝毫没打算推翻后结构主义。但是我将这两位对后结构主义表示批评的评论家放在一起,目的是说明,当政治“参与”的问题再次提上日程时,他们的共同之处有助于阐释这一后/后结构主义时期的特点。两位不同的评论家会不谋而合,这反映了时代的某些方面。 184

用“时代”一词,我首先指的是本行业内的具体历史环境。在该环境内,各种批评学派的内部动态已经出现变化,并且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经过冲突与融合,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互文背景。其次,我想表明高校之外的世界也给本行业带来了变化。在全球范围重新兴起的激进主义迫使高校内的人们重新思考历史的经验,并迫使他们认识到公共领域如何入侵并占据了私人空间——不论这种“历史”意识是形成于自身直接经验,还是来自大众媒体对全球事务的再现。变化的可能性弥漫在空气中。随之而来的是这一认识:变化并非总是“好的”。后/后结构主义时期是个尤为自省的时期,许多人和克里斯蒂安一样发问,“‘在我们做文学批评时,我们是为谁而做我们正在做的工作’?”(235)我们还可以接着问,为何如此?目的如何?

对于女性主义学者而言,后/后结构主义时期再次提出了“女性主义参与”的问题——它的性质、起源、舞台、方向、目的、盟友、效果、矛盾等等。在全球显现的女性主义——其形式多种多样,和女性的各种

境遇一样种类繁多——既被围困又在崛起。对美国的女性而言，近来最高法院、州议会和反对给予女性堕胎选择权的激进分子对女性的生育权提出了威胁，这种威胁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和支持团体组织的政治行动，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一二十年前争取到的权利可能会失去。在蒙特利尔，14名女性因为选修工程学而被当作“女性主义者”枪杀。这个惨案明确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作为女性并不安全，因为她们是女性。这个恐怖主义行动令许多人深感不安，其原因并非仅仅在于凶手是一个孤僻的疯狂男人，还因为他对女性的憎恨，他将女性主义者当作替罪羊的态度以及他对暴力的采用在我们的文化中很普遍，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因而处于身体和情感的危险之中。在这个显然并非“后女性主义”时期的当今世界中，他暂时代表了冰山最为显眼的—一个顶端。

对高校内的许多女性主义者而言，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事件使得政治参与的问题成为必要。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如何参与，在什么舞台参与？我们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哪里投入我们的精力与时间？我急于添加一句：尤其是考虑到现在我们的精力与时间变得越来越宝贵，越来越零碎，越来越有压力，因为压力与消耗常常使得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拉锯战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享乐则成为一种空谈。我们的影响最好在哪里体现呢？

我自1975年起就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女性研究项目组的成员。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急切地讨论这些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问题。对于像威斯康星项目这样的，具有良好基础和充足资金的大型项目来说，一些重要的代际问题总会使问题复杂化。国家和地区激进女性主义的重新兴起，突然之间使得许多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喜欢上了政治参与，而女性研究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从政治参与中发展而来的。当然，这儿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早期的女性研究中，高校中没有老一辈女性主义者，可供年轻一辈在“成长”为



学术实践者的路上学习和突破。相反,那时有的是高校男性老校友的联系网络,这些男性曾是我们的老师也是学校的资深教师,常常带有令人望而生畏的敌对情绪(令人感激的是,当时在资深的男性和女性教职员中还有少数对我们表示好奇和同情的盟友)。那时在高校之外有女性主义运动,我们中有许多人都参与其中,将街道上的亲身实践带回到大学和学院中来。现在,来到威斯康星学习女性历史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大批研究生,面对的是一个由女性主义教师构成的稳固网络,其中的大多数人本身就是女性。对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而言,政治参与的问题最早就由她们的女性主义教师队伍塑造成形。随着不同代系的女性主义者加入政治参与的论辩中来,紧张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高校外的女性主义实践行动的再次兴起,已经改变了这种代系间关系的构造。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主要在学术和理论的意义上传播女性主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绝大多数的教师将自身的亲身实践带到了学术工作中来。如今,许多学生再次参与到高校外的基层组织与游行之中。有些人督促女性主义教师再次走上街头,不仅要求教师以个人名义“政治上参与”,还要求她们在大学和学院之外组织女性研究项目来“政治上参与。”在这个后/后结构主义时期,“女性主义参与”的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学院派女性主义在哪些方面以及以何种方式可以参与政治。<sup>2</sup>

我强烈反对给这些问题提供规范性的答案。我想重复克里斯蒂安从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艺术运动中汲取的教训:她认为行动派存在着“独白”思维或称“铁板一块”的危险。我反对,任何单位(比如一个女性研究项目)强制规定任何个人的政治实践的性质和内容。我也同样反对,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将某一方向或立场抬高为“政治上正确”或“真正女性主义”或真正“激进”立场的集权倾向。对我而言,女性主义参与的问题,就和女性内部的差异,以及女性身处其中的具体历史情况的差异一样复杂,一样具有多个层面。而且,正如我们

从有色人种女性的女性主义理论中能日益明显地看出的那样，女性本身也处于多样的环境中；性别从来不能以其“单纯”的形式体验，而总是与人种、民族、宗教、阶级、国别、性征、身心健康状况和历史时代等其他范畴交织在一起。环境的多样性，女性身份认同构成成分的多样性表明，任何单一性的理论或实践注定会将某一种背景条件，某一种女性主义规划或某一种女性凌驾于其他的之上。

186 对我而言，高校是我的“女性主义参与”的场所。我不接受以下经常出现的二元划分：学术 / 政治、知识 / 实践、象牙塔 / “现实世界”。我秉承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的建会声明：女性研究是女性运动的学术武器。我的写作、授课、出席的会议、从事的行政工作都是我的政治工作。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些任务，我绝不能提倡对所谓“惟一”的女性主义真相进行舆论宣传的“策略”。我亦不能屈从于在高校内普遍流行的这一认识：政治与学术必须分开，知识必须是“客观的”、“脱离价值判断的”。在强调知识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的政治性的同时，我认为我的学术工作是社会政治组织产生的一个结果，并反过来对后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我而言，成为具有战斗力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意味着要辩证地、对话性地参与到我的领域、学科、科系、机构中去。有时这种对话已经具有公开论战的性质，有时则更具协作性。弹性、流动性和公开性一直都和对女性主义的忠诚同等重要。

一直以来，我都感觉我是在边界上工作。正是跨越边界的来来回回的对话运动激发了我在创作和政治上的努力。我意识到，这意味着学院内的女性主义研究是，而且必须永远是，一个矛盾的场所。我们总是面临着滑向功利主义、拉党结派、同流合污以及消极协作的危险；总是面临着打破目前微妙的平衡，从而巩固而不是挑战了知识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危险。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基本矛盾是，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成功地”留在我们所致力于改造的舞台之内。这使得我们基本上不属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三个基尼》中想象的“局外人的社会”，

而是与我们正试图改变的象征体系与制度体系形成一个对话的关系。<sup>3</sup>

在描述了我所称的“后/后结构主义”时期以及“女性主义参与”之后,我想更具体地转向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先要说明的是,我对女性主义参与的看法是以“能动性”和“身份认同”的存在为其前题,而这两个术语已经被解构为人文主义者的幻想,并在很大程度上被从体面的后结构主义话语中清除。我一直强调,作为一个高校内的女性主义者,我的身份认同是有意识地建构而成的,并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得以维持。这种身份认同绝不是固定或单一的,而是分裂的、多向流动的,并以我意识到或意识不到的方式进行构造(与重构)。尤其因为语言是我这一行业的主要工具,这一身份认同当然是由语言建构和重新建构的,完成于由各种相互竞争的话语构成的一个体系之内。而且,我的学术身份既通过我工作中的言行得以表达,又通过我工作中的言行不断地得以(重新)创造——也即,它具有能动性,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去行动,去参与”。不论语言在这种能动性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在高校内的所做所为具有现实性,不可能仅仅被简化为词汇。能动性涉及到行动,这种行动既与语言不可分割,亦不会被简化为语言。卡瓦纳发现“现实”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缺失,但对于身处与他人的复杂关系网络中的我而言,“现实”存在于我所实现的事情——一本女性主义的书籍、一个女性研究的项目、一个被唤醒的学生、一个被雇佣的女性,如此等等——它也存在于我每日在我的职业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边境上所必须从事的艰难协商之中。这些是“现实的”行为,是一个处于永久(重新)建构中的身份认同的肉体外壳。

187

然而,同样要说明的是,我刚刚拥护的“身份认同”和“能动性”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对我的思维的影响,尤其是在我对语言角色的认识上的影响。尽管这种对身份认同和能动性的肯定混合了后结构主义与非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但它部分地总结了我所称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的后/后结构主义时期的特征。后结构主义宣称“身份认同”和“能动性”

是人文主义的虚假建构。将这两个术语用于正面的意义，这一做法打破了后结构主义宣称所试图强制实现的缄默。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和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声称的“过程中的主体”，就是要借用后结构主义的洞察力，来审视启蒙运动话语所产生的那些概念。<sup>4</sup>

“身份认同”和“能动性”并非惟一正在经历这样的互文性重构的术语。后结构主义还将一些其他的术语列为评论话语的禁忌——例如“自我”、“作者”、“作品”、“经验”、“表达”、“意义”、“权威”、“起源”和“指涉”。后结构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话语——后结构主义的大师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但一般而言，后结构主义者都认为上述术语存在污点，因为它们与人文主义有所关联，而在他们看来人文主义已经破产死亡并且天真得无可救药。这些术语都据说在错误地假定语言的透明性的情况下运作，天真地没有认识到语言的物质性和干预性。

罗兰·巴特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的几篇文章既代表了这种观点，又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观点的影响。《作者之死》发表于1968年。文中宣称，“作者”是一个建构，它在评论话语中的“帝国”必须被推翻。他写道，“作者仍然主宰着文学历史手册、作家传记、杂志专访”以及“急于将人与作品结合起来”的那些人的“意识本身”（50）。<sup>5</sup>传统概念认为预先存在一个“个人”，他试图表达某种意义，现在这种概念应该被“现代书写者”取而代之。这个书写者“与他的文本同时出生，”他不会原创意义，而是“容纳了……那个巨大的字典，”那个“引文的织物，由文化的千种来源编织而成。”（52—53）在《写作：不及物动词？》（1966）中，巴特进一步抨击了这一意识形态：写作是一个表达的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能动者”“先于”写作过程存在（*Rustle of Language* 19）。相反，他写道，“与写作基本同时建构”的“主体”替代了在写作之前就已存在的“能动者”。在他1971年的文章《从作品到文本》中，巴特补充道，在谈论文学（或者更准确说来，“写作”）时，我们应该从讨论“作品”转为讨论“文本”。“作品”，他写道，是“一个传统

的概念……其产生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牛顿式，”这种概念聚焦于一个固定的“意义”、所指( *Rustle of Language* 57, 58 )。“作品”，他接着写道，作为“作者”的“表达”，“陷于一个从属的过程，”作者“众所周知地是他的作品”以及他“宣称的意图”的“父亲和主人”( 61 )。另一方面，188  
“文本”是“一个方法场”，是一个“无法缩减的”能指的“复数体”，一个从许多其他的互涉文本中匿名编织而成的“织物”。“作者”和“能动者”的“死亡”，在巴特看来，使得“主体”、“文本”和“读者”的“出生”成为可能，文本在读者的阅读行为中得以最终建构。从“作者”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读者”，不再试图解码一个作品的固定的、预期的意义，而是无尽地嬉戏能指的循环：能指指代的仅仅是其他的能指，而不是“经验”的“现实”。

巴特的公式对批评话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众多的术语成为了禁忌，只能在驳斥它们时使用。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来，如果一个评论家使用作者、自我、表达或经验等之类的话语，这证明他是个门外汉，是个还没有学会行话的外行。从后结构主义的立场看来，评论家应该说文本而不是作品，主体而不是自我，书写者而不是作者。许多研究生在其职业生涯的前期都结结巴巴地学习这种外国语言，希冀不会带有太多口音。掌握得最为熟练的人常常得到“最好的”工作。我曾听一位年轻的女性主义评论家提道，她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曾被教导永远不要使用“自我”一词，那个教授划掉了她第一篇研究生论文中所有的自我并替之以主体。当然，用一个术语替换另一术语的行为，涉及的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行话转换。从作品到文本，从自我到主体，正如巴特表明的那样，这需要在更大的哲学话语范围内对术语背后的概念进行重组。但是这些语言上的转换，我相信，还受到被禁之物的(心理)政治动力的影响。某些术语——如自我、作品和作者——已经成为禁忌，被玷污了，不够纯洁。它们当然确实反映了不同的哲学立场，但是它们还充当了语言标识物，来指示谁置身于目前的后结构主义场景之外(也因

此有了外部 / 内部的概念)。<sup>6</sup>

此外,在这些对禁忌术语的忧虑和后结构主义自以为正确的翻译背后,隐藏着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动态背景。在这种背景中,“具有理论复杂性的”术语是由欧洲的母亲(尤其是法国)制造的,以便让文化上还显得“稚嫩”的前殖民地正确地消费。两百余年来,欧洲一直对北美的文化不屑一顾,认为它“实用主义”、“天真幼稚”、“过于简单”。而与此同时,美国的知识分子也一直在用各种形式的挑战、自我辩护和后殖民主义的自卑情结来对此做出回应。在美国文化舞台上出现的关于后结构主义的争论,可以部分地放在欧洲帝国主义和它的不满情绪这一大背景下来诠释,因为具体的美国文化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度过了其困难的成型期。

189 不论这些评论叙事在这个后 / 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政治无意识是怎样的,我刚才讨论的那些禁忌术语正在回归——这些被压制事物的回归对女性主义批评有着重要的意义。被普遍用来描述这一过程的词汇是恢复。作者得以复活;能动性再次出现在日程上。自我和经验甚至有一天也会恢复名誉(这可能走得太远了)。然而,在恢复的过程中,这些术语不是以其原来的模样再次出现的。它们在后结构主义的风暴中受到毁坏打击,现在变得更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将后结构主义话语的一些方面和其他的丝线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质地的织物。具体到女性主义批评而言,这种现象常常表现在试图弥合美国女性主义与法国女性主义之间的分歧的努力上,这一对对立的女性主义应该更准确地被称作后结构主义和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sup>7</sup>到目前为止,这两种女性主义的互文交错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处处可见。例如,帕特里夏·耶格尔的《拒绝成为甜心的女人》自觉地为女性主义恢复了被后结构主义所压制的一些关键术语。其中,标题为《双语女英雄:从“文本”到“作品”》的第二章挑战了巴特的主张,成为“对其他女性主义评论家的一个简短宣言”,“号召我们放弃对罗兰·巴特定义

的‘文本’概念的追随,开始将女性写作考虑为多元化的‘作品’或‘文本’,它们担当的是再创造文化的工作。”(29)但是在将女性文本考虑为解放的“作品”时,耶格尔一直强调女性写作的文本性与互文性,这种关注和术语使用受巴特见解的影响匪浅。

南茜·米勒的论文集《即将变化的主体》既引领,也代表了她所称的美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内的“政治互文性”(111)。她以身份认同政治和主体(米勒通常不用自我一词)为主题的理论文章自1982年以来陆续发表。这些文章认为,“作者之死”和文本与读者的至高无上地位,压制了女性写作的能动性,也压制了按性别区分主体性的重要性以及文化产物的产生条件。米勒同意巴特的观点,认为文本确实是一个编织而成的织物。但是,她反驳道,织物也有一个织造者,他在具体的历史物质条件下进行生产。阅读女性的写作需要诠释“身份认同问题——即所谓的主体危机……”是如何“被女性作者的历史身体、政治身体和比喻意义上的身体变得复杂无比的。”(*Subject to Change* 107)后结构主义对作者和“随之的主体能动性”的擦除,她接着写道,“过早地结束了关于她们(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因为女性的身份认同与出身、制度、生产的历史关系与男性的不一样,女性并没有(我是指女性这个集体)感觉到太多的自我的重负。”(106)她声称,这种对自我的排斥并不适用于女性,因为“只有那些拥有它(主体地位)的人才能够假装没有它。”(52)然而,在为女性主义批评恢复能动性、身份认同、主体性和“作者”等概念时,米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保留了后结构主义对文本性的强调。

然而,后/后结构主义的恢复姿态本身,在本行业内有一种政治性,需要在这个尤爱自我反省的时刻加以检验。恢复一词意指“从疾病或倦怠中康复”,“重新获得健康或力气”,“从损耗中复原”。在这个术语中暗含了一种疾病和匮乏的概念。诸如身份认同、自我和能动性等术语在需要恢复时,它们被假定为处于一种虚弱或疾病的状态,而后结构

主义是助其恢复的力量。换言之，恢复这一术语的潜台词铭刻了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对立，微妙地重申了卡瓦纳所批判的那种霸权。恢复潜在地具有同化乃至整合的含义，而不是两个具有同等效力的学术术语之间的更为平等的辩证关系。在本行业具体的政治下，这可能意味着，致力于恢复后结构主义起初压制的那些术语（及其内嵌意义）的后结构主义者，将会重新获得他们的权威地位，享有声望和权力。

保罗·史密斯的《辨别主体》（1988）阐释了这一恢复过程和恢复政治所具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和卡瓦纳一样，史密斯从后结构主义框架的内部对“理论”进行一种后/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尽管他似乎完全不知晓米勒的具有评论重要性的文章，但他却有针对性地将关注点具体集中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几次潮流中的主体危机。他声称，后结构主义在其各式话语中创造了一个“抽象的”、“被动的”主体，这个主体倾向于“在出现抵抗的可能性时就阻止它”（xxx）。霸权意识形态的概念阻止大家认识到主体“同时存在于社会形态的内部，并对社会形态实施有目的的干预。”（5）例如，史密斯在批评解构时说道，德里达的被解构的主体擦除了人类能动性和抵抗的可能性。“德里达对人类能动性的看法，”他写道，“颇有局限，不能被用于分析任何一种对抗性的政治”；它“要求主体性以某种方式被阐释，从而使得它不能对其自身的阐释负责，更别提对人类的历史负责。”（51）事实上，“德里达的作品常常嘲弄责任这一概念本身。”（55）史密斯对解构的解读，有助于解释在解构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关于保罗·德曼二战期间的反犹写作的重要性的争论。许多人想知道，拒绝承担过去责任的行为，是否和解构主义对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和能动性的擦除存在联系？

在《辨别主体》中，史密斯呼唤一个新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它将恢复主体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史密斯将这样的主体称为“人性主体”。他特别指出女性主义批评是向“负责任”的后结构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先行军——不是因为女性主义是“惟一与之抗衡的话语与实践，或者甚



至可以说,是惟一有足够能力与之抗衡的话语与实践,”而是因为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论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对改变的方向提出了建议,他认为这些建议放在后结构主义这个更广阔的范围内会产生更多的成果。具体而言,他认为女性主义内部的不一致——以他所称的“人文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是一个具有生产力的场所,它能够建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并形成“负责任的”批评方法。他梳理了他眼中的两个女性主义的分支,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现在已经达到了“合作”的阶段,而不是“有问题的紧张状态”(138)。

史密斯对后结构主义的批判十分有力。他将女性主义批评定位为急需变化的先行军的做法,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态度诚挚。但是他对女性主义批评的讨论也暴露了,我在上文中提过的恢复一词所具有的等级差异的潜台词。对以美国为主的“人文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他的讨论勉强占有两页篇幅,仅提到两位评论家,引用了三个段落来例证它的令人沮丧的倾向。而在另一方面,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他的讨论占据了该章的绝大部分,约有13页的篇幅,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和立场进行了具体的综述。尽管他批判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但他在分析他们作品时的尊敬态度,与他对“人文主义者”几乎不加掩饰的鄙夷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他说道,提倡“对女性经验进行积极正面的评价”;他们“对人文‘主体’性质的基本假设乍看起来熟悉得令人泄气,其依靠的是一套明确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135—136)他们对“身份认同”、“表达”、“交流”、“真相”等人文主义概念的依赖,无可避免地折衷了他们的想法,使其回归到“男权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体制,即同一性的体制”(137)。史密斯意识到存在反面观点——被父权排斥在外、不能享有除“他者”之外的身份认同的女性,需要主张其身份,并且一直在这么做。他承认“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实用主义张力”“仍然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138)。他表明了他对“美国”女性主义的同情,断言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是“对近期多种形式的女性

主义理论的一个无情的批判——甚至是摒弃”（134）但是他的确无法令自己接受“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想法。<sup>8</sup>

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史密斯对后结构主义霸权思想的重申是他个人的习性使然，或者甚至认为他对欧洲理论的推崇反映了他从男性角度讨论女性主义的立场，那么这就有些误导读者了。事实上，我认为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他精确地再现了后结构主义者经常用来打发他们认为的“人文主义”作品的那种语言。该语言后来又被许多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学会，使用在那些他们认为是“人文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身上。后结构主义者频繁地使用诸如“人文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未经世事的”、“天真幼稚的”、“过于简单的”、“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的”、“以经验为基础的”、“表述性的”等词汇来形容非后结构主义的作品。但是这些词汇，即使它们曾经有过描述事物的能力，现在也早已丧失了这种能力。相反，就像帮派的标记一样，它们成为后结构主义的时髦修辞手法，被用来在后结构主义俱乐部里悄悄建立起评论家的地位。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高校内引以为患的知识对搏。此外，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傲慢相对应，一些非后结构主义的评论家常常毫不了解并排斥任何新生的事物，这种态度同样也不可取（我对这种态度的反对不亚于我对一些后结构主义者拉帮结派的反对）。但是，具体到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复杂多面的范围内来，这种后结构主义的轻视性语言造成了极大的不和，许多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它背叛了重构知识过程中的共同的女性主义目标。<sup>9</sup>

史密斯对这些轻视性语言的使用，有助于揭示后/后结构主义时期的恢复模式的问题。恢复也有可能是重新铭刻原有的等级划分，给予后结构主义理论特权，并轻视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贡献。我为这一问题归纳了四种具体表现形式。第一，恢复常常将后结构主义理论混淆为所有的理论，从而去除了其他的理论框架的合法性。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美国女性主义被贴上了“经验主义”

的标签,以与“法国女性主义”形成对比,后者被构建为前者的反面,也即具有“理论性”。这样一个错误的二元对立将一种理论抬高为“惟一的”理论立场(同样的,有些人会用“我做‘理论’”这样的表述,来描述其从事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或批评理论研究)。这种二元对立没有认识到,理论观点和语言具有潜在的多样性。例如,阿德里安娜·里奇、奥德莉·罗德、艾丽斯·沃克所写的文章,与伊莲娜·西苏和露丝·伊里加蕾的文章具有同样强大的理论性。为了让我的学生理解这一点,我喜欢在教授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的同时,讲授罗德的《作为权力的性欲》。正如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在评论“理论”的不同修辞模式时所指出的,“有色人群一直在形成理论——不过,其形式迥异于西方的抽象逻辑的形式。而且我倾向于说明,我们的理论的形成过程(我在此刻意地强调理论形成的过程而不是理论本身)常常是以叙事的形式发生的,存在于我们创造的故事中,存在于谜语和谚语之中,也存在于对语言的嬉戏之中。”(“Race for Theory” 226)

第二,有一种恢复的姿态将其表面看来接纳的内容加以悄悄排斥,借以主张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和“真正的”文化激进主义。在许多学科中被广泛地称作“左派”的这种修辞举措,强调了他者的退步倾向,从而瓦解了他者的合法地位。渐进的“阶段”式的理论程式常常屈从于这种对正统性的诉求——不论是贝蒂·弗里丹的排斥同性恋女性主义的《第二阶段》,还是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将女性主义分作三个阶段(从人文主义阶段,到本质主义阶段,再到神秘的个人主义阶段)的文章《女性的时间》,情况均是如此。划分阶段的理论程式常常给共时性的理论观点披上历时性的外衣。在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辩论的框架内,非后结构主义者常常被认为不值一谈,因为他们深陷“人文主义”的罗网中,而“人文主义”是要被推翻的主要暴君。以这种方式,后结构主义将自己确立为革命的先行军,政治上正确的激进思维。<sup>10</sup>

第三,史密斯的作品呈现的那种恢复性分析——而且我强调,他并

非惟一这么做的人——假设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铁板一块的人文主义，这与形成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哲学的流动的、多面的传统几无相似之处。我感觉，后结构主义的反人文主义工程，倾向于用哈罗德·布鲁姆的典型手法，将其先辈构建成一个稻草人，我不打算提供证据来证明这一感觉，因为那显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在女性主义的框架之内，后结构主义者对所谓的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常常极不准确，很少建构在实际阅读（我敢说“经验主义的”阅读吗？）的基础上，尤其是对有色人种女性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史密斯——还有莫依、克里斯·威顿、凯瑟琳·贝尔西、丽塔·费尔斯基、艾丽斯·贾丁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讨论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批评时忽略了以下这一点：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相对于人文主义采取了一种自觉的修正主义式的立场。<sup>11</sup> 例如，阿德里安娜·里奇 1971 年的文章《当我们死而复醒：作为重写的写作》，和沃克 1974 年的文章《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均对人文主义发动重要抨击，并将这种抨击当作女性主义重构文学传统的奠基姿态。这些文章，以及许多其他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文本，强调了意识形态和语言在对女性身份、能动性和书写的父权建构和女性主义重构中的角色。这项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强调了，有必要对女性的文化生产与接受进行唯物主义的分析。经常对人文主义提出的指责——本质主义和相信女性身份业已存在于男权的建构之外——常常并没有同时提供对这些文本的仔细阅读。对女性“经验”的强调常常伴随着这一认识：这个经验主义的身份认同与女性的斗争密不可分，这种斗争既发生在父权制规范的女性气质的范围之内，也是对其的一种抵抗。这项工作的语言不是后结构主义的，这一事实不应当妨碍我们认识到，正如南茜·米勒所写的，它挑战了“人文主义话语对普适性的信心”（*Subject to Change* 70）。

第四，恢复的概念本身忽视了这一事实：许多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从未放弃后结构主义现在试图恢复的那些术语概念。在多样的

女性主义理论立场的框架内,诸如作者、身份认同、能动性和语言之类的概念经历了重大的修正,但保留了其在批评话语中的合法性。许多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效仿克里斯蒂娃、伊里加蕾和西苏,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这一观点常常认为癔症患者沉默的肢体语言具有意义,它宣称,女性无法通过语言(或叙事)加以再现,女性以往的书写铭刻的只是她们在阳具理性中心主义话语中的他者性,以及,简言之,女性在象征体系内被剥夺了主体地位。但是其他的女性主义评论家,或明或暗地拒绝接受这种认为女性书写是受害者的观点,并检验了女性能动性的各种形式(这些能动性常常是在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巨大制约之下施展的)。这一观点在以下作品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伊莱恩·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芭芭拉·克里斯蒂安的《黑人女性小说家:一个传统的形成》、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以上仅是几例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颇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文学历史。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些从事肖瓦尔特所称的“女性批评”的女性主义评论家日益从后结构主义中,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中,借用术语概念和阐释策略。但她们对诸如作者、身份认同、自我、能动性等等概念保留了修正后的版本。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终点之后的写作:20 世纪女性写作中的叙事策略》(1985)可算此类作品中的典范,尤其是她借鉴了叙事理论、心理分析和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读女性在主导文化规范的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写作策略。帕特里夏·耶格尔的《拒绝成为甜心的女人:女性写作的解放策略》用副书名呼应了迪普莱西的标题。该书以西苏对新的女性话语的宣言为样板,解读了女性过去的“性别”话语的差异。阿丽夏·奥斯翠克的《盗用语言:女性诗歌在美国的崛起》借用了西苏号召女性去“飞翔/偷盗(voler)”的著名双关语。不过,奥斯翠克的“盗用”并不是乌托邦式的修辞手法,而是,在她看来,女性诗人们早已经实现的事情。在《重构女性:美国黑人女作家的崛起》(1987)中,

黑泽·加比“探讨了黑人女性知识分子如何重构了 19 世纪的性别意识形态,产生出一个新型的黑人女性话语”(6)。尽管加比批评一些前辈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如芭芭拉·史密斯和黛博拉·麦克道尔,批评她们具有她称之为“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话语”的倾向,但她声称“我的基本前提是黑人女性的小说,不应被解读为对历史的消极呈现,而应被理解为在历史内的积极影响。”(95)<sup>12</sup> 上述以及许多其他的评论作品都肯定了某种形式的能动性,表现在常常高频率地使用以下词汇:修正、重构、策略、项目、干预、插入、定位、情境化和协商。

上述最后一个词协商正是一个合适的词汇,我想提议用它来替换那个有问题的术语恢复,用它来描述后/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女性主义批评。协商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双方的讨论与安排”(如在“协商一个条约”中)和“设法清除或通过障碍”(如在“成功越过(negotiate 亦有越过的意思)一个山口”中)。它还至少蕴含了双方平等、相互尊重的可能性,这是恢复一词所没有的。米勒在她有关主体的三篇文章中,实现的是协商而不是恢复(*Subject to Change* 65—121)。例如,在《改变主体》一文中,她将里奇的理论贡献与巴特的相提并论,并在几位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和非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之间进行对话式的分析(102—121)。同样的,玛格丽特·霍曼斯在《承受语言之重:19 世纪女性写作中的语言和女性经验》中,也在拉康式的心理语言学,和女性批评对女性作家的经验与语言铭刻的分析之间进行了一次协商。<sup>13</sup>

在我看来,此类的协商不仅仅是在后结构主义和非后结构主义这两个极点之间来回移动,不仅仅是在将不同的话语之线编织在一起,甚至也不仅仅是将矛盾的观点用对话的形式加以悬置——虽然协商肯定做过所有上述的事情。在这后/后结构主义时刻的协商,需要我们自觉地投身于将历史理论化和将理论历史化的工作中去。至少从柏拉图和希罗多德的时代起,“理论”和“历史”就在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中被当作一组二元对立加以呈现。依据各种复杂的因素,它们之间或多或少地

存在着两极对立。(当然,在实践中,“理论”和“历史”事实上并没有那么二元对立。)“理论”常被认为是一套相互联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具有阐释力。“理论”被认为基本上是共时的,它对“真相”的阐释力在于,它有能力解释千变万化的现象背后隐藏的固定不变的结构。它倾向于进行大一统的概括和乌托邦式的论断。像几何定理一样,它表现为一种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抽象法则。另一方面,“历史”一直经常被呈现为基本上历时的,它对“真相”的阐释力在于它有能力搜集“事实”并将之排序。它常被认为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再现,其目的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轴内解释变化的过程。它具有经验主义的倾向。像编年史一样,它与经验之事联系密切,以之作为自己重构过去的必需砖瓦。

195

这样一组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当然是时候加以解构了。我认为,本行业的后结构主义分歧的“双方”有许多冲突与误解均由它引发而来。而且这组二元对立建立在对“理论”和“历史”概念的误解之上。因为“理论”不能抽象地脱离产生它的故事。它也有一个“历史”,即它产生、变化、消失与回归的具体时间与空间。这个“理论”的“历史”以某种方式存在于“理论”的抽象表达之中,不论它看起来变化多大。反过来,“历史”不能与理论截然分开。它永远不可能完全像“所发生之事”或“事实”,因为它是以一种选择性的、塑形的眼光来重新呈现过去。“历史”所讲述的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故事就是这样,它的叙事的排序原则反映了作者的或明显或隐晦的理论。不论是明显还是隐晦,它都需要某种类型的“理论”来成就其阐释力——例如时代划分的理论、有机变化的理论、随机变化的理论、状态的理论等等。

我日益在许多女性主义评论家的作品中发现这种协商——我将把他们称为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这种协商通过检验历史和理论的交叉在场,而实现了历史的理论化和理论的历史化。将历史理论化,这需要评论家自觉地检验自己在建构一个文学的历史化叙事时的潜在

前提——它是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一个文学流派或运动，一个流派的演变，还是其他。它要求评论家在阅读文本并叙事历史时抵制住诱惑，不要误以为每个文本的语言都是透明的媒介，能够毫无疑问地传达意义。相对于后结构主义而言，将历史理论化尤其意味着，评论家要愿意使用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深刻洞察力，将写作和阅读当作建构于复杂的文化叙事套系之内的过程来分析。

史学家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她们要求史学工作者理解，书写“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阐释性的行为，阐释的基础是各种或明显或隐晦的理论观点。文学史家也日益如此行事。女性主义评论家已经将以下行为当作惯例：在书或文章的开篇就点明本研究使用的主要理论观点，并自省性地阐明本人的角度在该领域的论辩中所处的位置。此外，她们常常坦承，自己对文学文本的阐释只是许多可能的阐释中的一种——这并非是一种多元主义的姿态，而是认识到不同的评论框架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历史学家传统上执着于搜寻“惟一”的故事，现在他们承认存在多重的故事，其中每个故事都反映了作为叙事者的评论者的阐释理论。这种在“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协商，要求评论者熟悉各种理论传统，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传统。在后/后结构主义时期，后结构主义理论存在于本行业日益延展的地形图上。鉴于它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存在，它不可能被不假思索地打发掉（虽然有些女性主义者曾尝试这么做），正如有关女性作家、社会性别和有色人种写作的新知识不能被那些以白人、男性、经典文学为其专业的评论家所忽视一样。作为教师和这一行业内的一员，我们都有责任去阅读——并且常常要教授——我们自身的研究领域之外的东西。而对非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评论家而言，这就意味着与后结构主义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

反过来，对于参与其中的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评论家而言，对理论的历史化至少呈现两种形式。首先，它意味着要理解理论产生的



历史境况。尽管“理论”很抽象,但其形成与传播也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例如,“作者之死”、主体的擦除、能动性的解构等概念都留有欧洲起源的印记,并随着被引入美国而产生变化。在我看来,后结构主义特有的绝望感,反映了本世纪在欧洲大陆上打响的两场世界大战的余波,以及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认为西方人文主义已经无可救药地破产的危机感。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在法国文化舞台上的直接前身——推崇“超验自我”的概念,即不顾世界的无意义仍能飞跃实现能动性的“我”。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摒弃了这一超验自我(及其存在主义的行为),转而拥护在他们看来,一种更为激进的对西方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改革。

然而,在美国文化中,胜利的愉快心情和美国的全球权力,滋长了传统的美国个人主义的深度发展,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有此倾向。1968年是世界许多地方的激进活动的分水岭,但法国和美国在这一年的情况却各不相同。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始发于,如果不是诞生在,巴黎人筑起的街垒路障上,“五月风暴”事件至少部分是源自对萨特及存在主义的反驳。但在美国左派中,萨特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一事实或许解释了美国女性主义对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她的他者属性、正统性、内在和超验等概念的改造。此外,“自我”的意识形态——自我是个人主义的、独立的、自立的——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因为人种、阶级、性别、宗教、民族、性征(以及其他原因)而被剥夺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地位的人群,传统上感觉被排斥在“美国梦”的承诺之外。不论自我被如何重新定义,对“自我”话语的挪用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美国边缘人群的文化和政治活动的一大特色。

197

那些跨越大西洋来到异土扎根的后结构主义核心概念,因为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些文化与历史差异,改变了性质与功用。例如,互文性失去了它的匿名性,因为许多美国的评论家将作者与能动性的概念重

新引入话语杂混与冲突的讨论之中。正如米勒所写的，“美国的女性主义评论家整体上抵制住了‘作者之死’的神话，这种抵制的理论基础是：在通用方面——如作者或读者——进行交换的故事文本，事实上表达了斯皮瓦克所称的，男性‘规范性心理传记’的明显的、分化的结构。”（*Subject to Change* 107）<sup>14</sup> 米勒自己的“政治互文性”的概念，以及被重构的作者在她的女性主义阅读实践中所具有的重要性，至少部分反映了能动性和“自我”话语在美国的持续重要性，不论能动性和“自我”已经被怎样重新定义。与此类似，耶格尔使用法国女性主义理论，来解读早已存在的女性诗歌中的“解放策略”，这一举动也展示了美国的女性主义对“作者之死的神话”的抵制。

第二，将“理论”历史化能够将某一给定理论加以改造，把它从大一统的抽象概念改造为一种阐释工具，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框架之内。某一给定理论不再是“科学性的真理”，而被改造成阅读的工具，而且这种阅读也将历史性的分析考虑在内。例如，解构主义正在被日益应用为一种阐释性的策略，应用于那些也进行历史分析的阅读之中。和新批评一样，解构主义正在成为评论家的一种技艺。在女性主义的框架内，霍曼斯的《承受语言之重》还运用了拉康的心理分析学，从而展示了上述的协商过程。正如她在引言一章中所解释的，她发现拉康的语言理论是一个特别连贯的例子，说明了“早已存在于19世纪欧洲文学文化的中心地带”的“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神话”（5）。因此，他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19世纪的语言意识形态大有用处，当时的英国女性必须置身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写作。“拉康的语言理论并非一个普适性的真理”，霍曼斯写道，“它仅是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重新讲述，早已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中的一个神话。虽然我不相信这个神话是真理，但我相信女性作家会受到这个神话的影响。”（5—6）《承受语言之重》探讨了几位19世纪的女性如何克服她们所经历的语言忧虑，而这种忧虑就来源于拉康本人表述并因而帮助阐释的“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神话”。对

霍曼斯而言,女性作家既是“作者”也是“能动者”。面对着一个剥夺她们的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她们与语言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

这两种将“理论”历史化的形式需要我们摒弃“理论”的“真理”地位。在强调“理论”的历史特异性并将它改造为一种阐释工具的同时,这两种形式均抵制了“理论”宣称自己是科学定律,是共时性“真理”的倾向。某一给定理论被历史化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具有阐释力的概括,一个环环相扣的思想体系,能与许多其他的体系和谐共存,并且所有这些体系都要接受有用性的检验。在这种认识论的框架内,失去了阐释力的理论能够被淘汰。评论者不再被大师的话语所具有的霸权力量所左右,相反,他们在与“理论”关联的情况下施展自身的能动性——她或他本人的主体性,表现了她/他在文化内的具体定位。 198

在本章结尾,我想回忆我曾与一位优秀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评论家所做的激烈讨论。她坚持认为,拉康与德里达的理论使得语言不可能呈现女性,因为表意体系在本质上是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她告诉我,后结构主义是一架已经起航的飞机,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继续航行。受到她的飞机意象的决定论的触动,我试图表达一个不同的观点——即,这只是关于语言的一个“理论”,如果这个理论对女性没有“益处”,我们应该摒弃它。在我笨嘴拙舌地借用那句著名的“如果它对犹太人有益处……”时,我想表达的是:“理论”只是个“理论”,不多也不少,新的“理论”一直在替换旧的,而且没有哪个“理论”能宣称是绝对的“真理”。

在从那次激烈的争论冷静下来之后,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后/后结构主义时期的具有政治参与性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我已经发现必须避免搭上任何一班“飞机”,而是要试图在一些相互交叉的“飞机”之间进行协商。在拒绝被锁入后结构主义的“飞机”内部的同时,我重申了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卡瓦纳批评的大师—学徒关系所不具备的。对我而言,在各种相互竞争且常常引起分歧的话语之间进行协商,这最有

成效地代表了女性主义在后结构主义之“后”的高校中的参与。协商暗含了一种对话的交换，而恢复隐秘地将“理论”凌驾于“历史”之上。本行业内的这两种内部动态，以及这个时代的全球趋势，产生了后/后结构主义（我意识到，我之所以给它命名，可能是为了轻轻助推它艰难的诞生）。它需要我们解构“理论”与“历史”的极端两极对立，并重构话语，将这两者用各种具有创意且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 创造历史： 关于女性主义、叙事与欲望的思考

……女性总是在创造历史，在生活中演绎它并塑造它。

——杰达·勒纳，《多数派找到其过去》

……所有的历史化都是叙事化——将之置于故事的形式之中。

——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深入教学机器》

“完整历史”的梦想，证实了历史学家具有掌控所有纪实材料的欲望……这一梦想当然一直是编史工作的北极星。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与批评》

浮出表面的是某种不同的事物，迥异于我们通常所知的那种一元的、封闭的、演变的历史叙事……我们现在得到的是这样的（多元的）历史：既有胜利者的历史，也有失败者的历史；既有中央的历史，也有地区（和殖民地）的历史；既有被经常颂扬的少数人的历史，也有未被铭记的多数人的历史；而且我还想加上一句，既

有男性的历史，也有女性的历史。

——琳达·哈钦，《后现代主义的政治》

200 在当代美国女性主义中，围绕着历史问题（尤其是女性主义者书写女性主义的历史时遇到的问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欲望，我便从这种欲望入手来开始我的思考。一方面，存在着一种紧迫感，去重新拥有和抓紧一种新近被重新建构的女性历史。在高校内外，这种紧迫感推动了女性历史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也促使历史学科之外的其他女性研究领域内的女性主义者纷纷投身考古、档案和口述历史的工作。另一方面，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焦虑感，担忧我们女性主义者的行为——包括我们自己历史的产物——会具有以下的可能危险性：重蹈以往的思维和行动模式的覆辙，一开始就将女性从主流的历史叙事中排除、扭曲、压制或擦除。第一种冲动是向外导向的，已经将惊人的能量与冲动汇入一些相互关联的项目之中，这些项目致力于解构现有的历史，并重构女性的新历史，以及性别在所有历时变化的文化形态中的地位。第二种冲动是向内导向的，已经成为上述这股新热情的制动闸，并在清醒的自我反省中坚持认为女性的历史书写工程存在问题。除了少数例外，这股反思的冲动并不表现在女性历史的学科领域本身，而是表现在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话语之中。女性主义，尤其因为它试图构建的是自身产物的故事，被困于行动的欲望与对行动的抵制之间。这一困境有潜在危险，会重新产生露丝·伊里加蕾等后结构主义者所称的同一性体制。

在本章中，我拟分析法国后结构主义（包括其女性主义的分支）和美国女性主义之间的交往引发的辩论，以及这种交往的历史，以此来探讨上述向内导向和向外导向的两种行为的政治必需性和可能的创造力。此外，我还希望展示法国后结构主义与美国女性主义如何在发展自己的洞察力时却对对方的洞察力视而不见，并最终说明这两者对于

更为重要的女性主义“创造历史”的工作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将先探讨隐藏于这一问题中的认识论问题,接着论证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政治必需性与对这种历史书写的质疑均有其合理性。此外,我还将讨论、叙事和质疑女性主义历史的这对相互矛盾的需求,如何反映了对权力的渴望和对权力欲望的恐惧,一方肯定女性的能动性,另一方则压制它。最后,我将提议,女性主义者可以从事一种对话性的,而非独白性的女性主义历史书写工程——此处的历史为复数的多元化历史——在这个工程中,各种相互竞争的历史背后隐藏的政治不应该否认我们有必要讲述的有关女性主义的故事。

## 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创造历史

女性主义者“创造历史”的各种矛盾的欲望反映了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植于“历史”一词的双重指涉中:一方面,历史可以指涉过去;另一方面,历史可以指涉有关过去的故事。前一种历史——已经发生的事情——假设存在一个现实基础,其整体性永远不能被完全重新建构。历史的第二种意义——有关发生之事的叙事——强调了叙事过去之事的叙事者的作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叙事作为一种知识模式的性质:它选择、组织、排序、阐释并以寓言表达。<sup>1</sup>历史的这两种维度又转而反映了我标题中的双重指涉,“创造历史”。女性主义的“创造历史”的欲望既包括渴望实现重要且持续性的变化的欲望,也包含成为这种变化的历史记录者的欲望。作为一种启发式的行为,历史书写依据现在与将来的需要来组织过去。叙事行为给过去赋予意义,潜在地干扰了现在和将来的历史建构。对女性主义者而言,这意味着书写女性主义的历史具有现世行为的功用,并能对塑造女性主义的未来自有所贡献(取决于它的影响力大小)。<sup>2</sup>

历史书写的启发和干预维度——即编史行为是一种代表未来的现

世行为——提出了认识论的问题。不论在高校的内部还是外部,不论在女性历史的学科之内,还是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女性研究的范围之内,认识论的问题对于理解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内部导向和外部导向的冲动至关重要。对于那些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展开工作的学者而言,历史书写的目标就是,在充分浸淫于各种经验主义数据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对过去的客观叙事,并对这些数据进行不偏不倚的加工,将之组合成一个准确的序列。实证主义相信历史书写就是要生产出客观的真相。尽管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种认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使得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如今纯正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可能已经不再流行。但是这一概念——历史书写是由一位全知的隐形叙事者用无缝的叙事重构过去,并且是我们可能实现的最好的对过去的重构——仍然持续地影响许多的研究项目,包括女性主义的研究项目。<sup>3</sup>在这个框架内,历史书写的启发和干预维度难以得到研究者的承认,甚至被其公开地否认,但却在实际上悄悄地发挥作用。

对于那些在主观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展开工作的学者而言,只能通过历史的书面或口头的文本化过程,历史的真相才能得以见闻于众。<sup>4</sup>因此,过去受到三重因素的影响:其一,受到文本的影响。文本本身是对“真正”发生之事的重构;其二,受到这些文本的零星的、部分的留存状态的影响。文本化的过程取决于文件记录的政治,以及历史学家在进行侦探式的搜寻时的运气、技巧和毅力;其三,受到历史学家的诠释性的、意义生成的凝视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历史书写的成功与否,取决于的并非是其客观程度,而是其阐释的说服力。而阐释,正如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作出的卓越理论论断,则引入了语言的影响:隐喻、修辞和叙事的意义生成过程。在主观主义认识论的内部,经常有学者公开地承认,历史话语的这一维度正是引发其思考,乃至终身努力的源头。<sup>5</sup>

随着各个学科领域的女性主义者参与到“创造历史”(既包括书



写女性主义的过去,也包括书写女性主义在今天和明天的表现)的过程中,上述两种认识论在女性研究中都有所表现。有的女性主义者在实证主义的框架内工作,强调被挖掘之事的“真相”;有的女性主义者在主观主义的框架内展开研究,突出叙事的阐释功能;还有的女性主义者则将两种方法论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种编史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多样性,反映了女性研究在形成初期就具有的一组矛盾,而且不论承认与否,这些矛盾仍然持续地影响和渗透女性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工作。一方面,女性研究的发展,源自抵抗有关女性的霸权话语的需要,该霸权话语忽略、扭曲或者轻视女性的历史、经验和潜力。女性研究因而形成了补偿性、对抗性的历史,来讲述女性的“真相”——而不论这个真相是涉及女性在所谓的文艺复兴中的地位,19世纪女性写作的生产过程,还是黑人女奴所遭受的性暴力。这种致力于发现女性历史的“真相”,并以之来摧毁正史中对女性的“神话”与“谎言”的努力,是在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框架内运作,它相信历史的真相可以被客观地获得。 202

另一方面,女性研究在早期强调,霸权的知识产生自男性中心主义并为它服务,这一强调必须使用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方法论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有价值导向,产生自特定的视角或立场。许多女性主义者声称,任何知识都不是价值中立的,包括女性主义的知识。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被广泛引用来,将女性研究推广为,知识体系内的一个产生巨大的革命性影响的“范式转移”。<sup>6</sup>在这种认识论的框架内,历史书写的目标不是发现真实的历史,而是从女性主义的范式中构建出女性经验的故事。女性主义的历史在对抗霸权历史时,求助的不是客观的真相,而是由女性主义视角产生的故事。<sup>7</sup>

这两种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均产生自女性研究的迫切的政治日程,并因为它而仍然具有通用性。这一政治日程就是颠覆由男权中心主义主导的历史,重建以女性经验和性别问题为焦点或为有机部分的历史。为什么这一日程是政治性的呢?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会塑造未来可

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人类知识的宝库包含了建构象征秩序的砖瓦。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尤其是在这个被称为信息时代的时期。尽管我自己的工作和同情心主要倒向主观主义的认识论,但我相信两者对于我们的事业都是必需,有助于修正一种方法论可能产生的极端情况。一方面,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基要主义式的真相论断,以致模糊了历史叙事的阐释视角。另一方面,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在极端情况下会陷入完全相对主义的瘫痪状态,历史的真实情况在故事与话语的嬉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sup>8</sup>

203 如果我们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与向外导向的、以行动为主的“创造历史”欲望联系起来,而把主观主义的方法论与向内导向的、自省性的对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质疑结合起来,这可能会方便理解,但是却会误导读者。当然,女性主义历史书写存在复制霸权话语主流叙事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担忧假定主观主义的模式,强调叙事者在对过去进行诠释性排序时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将女性主义的历史书写(不论其发生在女性历史还是其他的女性研究领域)与实证主义联系起来,这可能会掩盖在这些历史中存在的多种方法论——有些是实证主义的;有些是主观主义的;还有一些兼而有之,两种方法论都矛盾地潜藏于其整体的努力之下。此外,我们要是把除了后结构主义的质疑行为之外的其余一切,都划归一个破产的、天真的人文主义,这就太简单地复制了后结构主义的轻蔑姿态。

与之相反,女性主义的方法论应该力争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进行协商,在对真相的搜寻和承认所有接近真相的途径都受到话语的影响之间进行协商。正如拉卡普拉所云,“极端的纪实性客观主义和相对论的主观主义不是真正的平行选项。它们是相互支撑的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集合体。”(*History* 137)他坚称,他对实证主义编史方法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摒弃了经验之物。相反,他呼吁在经验与修辞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式的、相互激发的”关系,将这两者当作历史

书写的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Intellectual History” 433)。

这种相互作用包含了修珊娜·费尔曼和德瑞·劳波在《见证的危机：文学、历史与心理分析》中所提倡的那种对话。他们将反犹大屠杀当作检验标准，来理论概括那种承认历史是对真相的一种再现和见证的历史书写观点。一方面，历史书写见证了“与真实的邂逅”(xvi)。另一方面，这个真实并非透明的存在，而是“被文本重新铭刻、翻译，激进地重新思考过，并在根本上重新加工过”的历史(xv)。这个“经验主义的背景，”他们声称，“不仅需要被了解，还需要被解读。”(xv)我们在阅读这个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本才能接近的真相时，必须同时关注文本化的过程和阐释过程。既然过去的真相总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历史书写就应该不仅要“邂逅真相”，还要反映出这些影响的介入形式。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所云，“过去需要了解，但……它必须被当作历史，当作某种必须被讲述的事情，才能留存下来。它是被叙事的。它通过记忆留存。它通过欲望留存。它通过重构留存。它并不仅仅是一个事实，一直等着来支撑我们的身份认同。从这里产生的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历史化的、非动态的、不矛盾的过去。”(“Local and the Global” 38)

## 捍卫对(女性主义)历史的质疑

一旦认识到女性研究中存在的两个相互矛盾但相互依靠的认识论，我们就需要讨论质疑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必要性。但是质疑的需要是如何超出了相互竞争的认识论的问题范围，进入到女性主义书写历史，尤其是书写女性主义的历史，这一政治问题中的？并且，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女性主义内部发展出了怎样的质疑模式？ 204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想转移到严格意义上的女性历史学科之外，找一个不那么严格符合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例子，即在1992年10月发表于《新共和》杂志上的文章《姐妹战士》。该文的作者，克里斯蒂

娜·霍夫·萨默斯，是克拉克大学的哲学教授，被大量炒作的耸人听闻之作《谁偷走了女性主义？》亦出自她的手笔。<sup>9</sup>《姐妹战士》被标榜为“一次女性研究会议的实况转播。”它叙述了一个偏颇的“历史”，即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召开的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的1992年年会，并简短地介绍了学院派女性主义在美国的历史。萨默斯明确地说明，她的写作视角是“较老的‘第一波’女性主义，其主要目标是公平。”（30）她以一位女性主义者的身份从事这项编史的工作，而这个工作的隐秘规划是，抨击她所称的较新的“主张女性中心主义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它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占据着各个大学的中心舞台。”（33）尽管她自称女性主义者，但大多数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都会发现，她的文章与近来女性研究所遭受的一些抨击颇为相似，例如来自查尔斯·塞克斯和迪奈希·迪索萨之类的媒体英雄的抨击，来自诸如美国国家学者协会等组织的抨击等等。萨默斯使用了史学家的话语——先是讲述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的会议，接着讲述女性研究的发展——来全面谴责当代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的研究。她讲述的过去的故事，反映了她试图干预现在的企图：她想阻止女性主义内部她所反对的发展趋势。

萨默斯的历时性话语，很容易就被戳穿为乔装打扮的共时性话语。她对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会议和女性研究发展的叙事，很快就溃退为对一个妖魔化的女性主义的比喻性呈现。她将转喻的修辞方法应用于编史的工作之中。关于女性主义过分之一处的那个生动的轶事，被用来转喻千变万化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现象。通过用部分转喻整体，她叙述的个别例子牵连了整体都有罪过，并以此概括了整个女性研究的特征。这个转喻性的诽谤从标题就开始了。“姐妹战士”的标题预示了她在文章中对“主张女性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抨击。该标题令读者联想起主张非洲中心主义的饶舌歌手索佳大姐，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期间曾公开批评索佳大姐的激进种族言论，刻意与这位歌

手保持距离。这一隐射暗示了,正如自由派的克林顿刻意与黑人的种族中心主义保持距离是正确的举措一样,萨默斯,作为自由派的女性主义者,与提倡“姐妹情谊”的性别中心主义的女性主义保持距离也是正确的。不论读者对索佳大姐有何观感,萨默斯将学院派女性主义比作非洲中心主义的类比手法,与1988年老布什与杜卡斯基竞选总统期间用“威利·霍顿”广告引人联想起种族主义偏执症的手法如出一辙。<sup>10</sup>

通过在文章的前三分之一篇幅里大量叙事会议的细节,萨默斯确立了她作为历史学家的权威。她仔细地铺陈会议的场景,并叙述了会议伊始的一些事件,提到了首位发言者埃丽诺·斯米尔的迟到,以及在她到达之前救场的专家小组成员等细节:“为了打发时间,一大堆的专家小组成员被介绍给我们……仍然不见斯米尔。一位名叫安吉拉的小组成员走上讲台……埃丽诺·斯米尔终于到了,看上去疲惫不堪。”(30)这个叙事细节的功用是产生罗兰·巴特所称的“拟真效果”,也即真实性的效果,这是客观历史通过堆积“事实”所取得的效果。<sup>11</sup>细节带来逼真性,而逼真性又使她的观点显得真实可信,似乎是从数据中客观地归纳而来。例如,她报告说,“当会议终于进行到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时,我和露易丝都舒了一口气。提供的饮料有混合啤酒——虽然很快就没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小集团一直在督促国家女性研究协会在所有的会议上取消肉、鱼、蛋和奶制品。”(30)萨默斯利用她对会议叙事的真实效果,诱使读者相信她对全国的女性主义会议和教室的描述。女性主义的转喻在余下的文章中随处可见,成为描述常态事物的特点:那些女性研究的项目主管手拉手站成“一个医疗魔环”并“保持了树木在扎根和安静时刻的姿态”;罗格斯大学的女性研究的入门课程要求学生“在课余实施某种‘骇人的’、‘解放性的’行为,并随后在课上与全班分享体会;伊莉莎白·米尼克的“鲁莽宣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可与哥白尼动摇地球中心说的行为相提并论……我们正在动摇男性中心说”;如此等等(31—32)。“哎哟尖叫和集体治疗,”她宣称,“不是学院派女性主义中

205

的特例,而是其常态。”(30)

从实证主义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出发,我可以这样回应萨默斯的抨击:她的历史并不“真实”,她是一个“糟糕的历史学家”。之后,我可以提供一些相反的故事,它们比萨默斯的故事更准确,更具客观真相的价值。我还可以指出,在对材料的处理上,在评估和例证她的轶事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学院派女性主义及其复杂和多元的形态上,她没有展示任何学术技能。比如,我可以问以下问题:为什么她会忽略女性主义学者在专业学会及其会议中的存在和广泛影响力呢——例如,现代语言学会、美国历史学会、美国心理学会、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等等?除了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的会议之外,她难道不应该检验女性主义在传统学科的会议上的表现吗?学院派女性主义已经渗透并改变(假如算不上革新)许多传统的学科。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尤其是在人文学科的领域内。但是由于与美国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形成有关的一些历史特殊原因,发现上述变化过程的最佳位置,不是主要在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的会议内,而是在某一学科内部的女性主义会议、期刊和研究内,后者大多受到跨学科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知识的影响,但是仍在其本源学科内保留了方法论的和实质性的“大本营”。

从主观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我可以这样回应萨默斯的历史:她的偏见影响了她的叙事,这一点表现在她的每个要点上——她宣称比“第二波”女性主义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她转喻地用部分来替换整体;206 她将女性主义划分为“第一波”和“第二波”两个阶段,其中后者被呈现为一种倒退和对前者的背叛;她不仅在标题上令人联想起种族主义偏执症,还在整体上令人联想起历史上扎根于反犹话语的阴谋理论[“这些女人统治着高校内最大的一块发展区”;“她们的代表人数高得不成比例”;“她们静悄悄地从事着数百个资金充裕的项目”(30)]。的确,她对学院派女性主义展示出的轻蔑,似乎就是通过纯与不纯的二元对立运作的。她哀叹理性的女性主义受到污染,被非理性极端行为破坏

与扭曲。对萨默斯的实证主义和主观主义批评都有价值。萨默斯的理论不仅极其不准确,而且绝非价值中立。

作为历史话语,萨默斯的《姐妹战士》很容易评论。但是她自视为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应该给我们警示:对于那些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攻击者,我们非常愿意应用我们的批评凝视,但是我们也必须同样准备好,应用这种凝视来审视女性主义的支持者的历史话语。完全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回应萨默斯的危险在于,在提出一个相反的“真相”时,这样的批评可能很容易忽视这一点:它可能潜在地将编史话语用作当前女性主义辩论中的一次以多打少的高压攻势。我们有必要进行自省性的质疑,这种必需性提醒我们应该意识到,女性主义历史能够以多种方式来叙述女性主义的过去,并且这些历史可能会以各种方式质疑或动摇其他的女性主义历史。

萨默斯讲述的有关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历史”,不仅仅提供了一个例子,可供我们进行认识论的分析,它还提醒我们,在女性主义的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上,都有许多的女性主义者竞相讲述女性主义的历史,并且她们会依据现在与将来的政治需要来塑造女性主义的历史。从整体的编史工作的角度而言,詹姆斯·斯科特在《胜利者与失败者讲述的历史》中,提出了相互竞争的历史反映出的政治问题。在该文中,他使用了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讲述的不同历史:马来西亚 1972 年引进农作物两熟制,关于这一“绿色革命”的“真相”,有地农民和无地农民讲述了不同的历史。斯科特将“绿色革命”中“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比作两组木匠比赛修大厦。假设他们都拥有大致相当的技艺、训练和材料,他注意到他们修建的房子“是,打个混合的比喻,用同一语言讲述的不同故事。”(169)他写道,“事件并不会自我阐释……它们不会为自己说话。”(167)双方讲述的事件颇为相似,但他们赋予这些事件的意义却相差甚远。那些人分别在绿色革命中受益和受损,他们的叙事反映了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

与此类似，雅尼娜·德隆巴德，在对伊丽莎白·拉波弗斯基·肯尼迪和麦德琳·戴维斯的《皮靴子与金拖鞋》所做的评论中，对女性主义的历史做了同样的总体评论：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假如在女同性恋的争取自我呈现的内部斗争中有胜利者的话，那就是以白肤色为主的、受过教育的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自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之后她们有条件接近扩音器和媒体，包括出版社。

她们将 20 世纪的女同性恋生活描绘为……在 1969 年之前是“同性恋的黑暗中世纪”。这一描绘已为读者所熟悉：女同性恋者在肮脏的酒吧间里勉力维持一种阴郁的生存状态，她们的大量酗酒、酒吧间的争斗以及男女角色的扮演等等，暴露了她们内化于心的对同性恋的恐惧和男性至上的心理。（“Buffalo Gals” 24）

207

德隆巴德表扬了《皮靴子与金拖鞋》，认为它规避了占霸权地位的女同性恋叙事，从新的角度构建了，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同性恋平权运动开始之前的，布法罗市的女同性恋圈子的历史。

斯科特和德隆巴德分析了胜利者与失败者分别讲述的对抗性历史，他们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再现的政治问题。书面历史在文化的地形上一直屹立不倒，胜利者与失败者能够通过什么途径来靠近书面历史的文化建构？谁控制着历史的产生、接受和传播的渠道？斯科特和德隆巴德两人均认为，在思想体系中具有流通性的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并不是因为“失败者”不创造自己的历史叙事，而是因为被边缘化、“被迫保持缄默”或臣属的人们产生的历史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以口头的形式、没有记录、没有保存、难以定位、或者难以让“圈外人”理解。<sup>12</sup>

这当然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落脚点：霸权话语的历史，讲述



的是“胜利者”的故事,即,有权力的男人和男权思想的故事。但是我们女性主义者是不是也应该用自省的眼光看看我们自身,认识到女性主义者讲述的女性主义的历史也不能免受编史政治的影响?女性主义同样也有其“胜利者”和“失败者”,也有其等级划分体系和争夺的战场。谁讲述的女性主义的历史得以流传?它是为什么利益服务的?谁讲述的故事被打败、被边缘化了?为什么?对于男权主义书写的历史,女性主义者质疑它是不是擦除和扭曲了女性的生活,同样的问题也应该被应用来审问女性主义书写的历史。

但是这些问题应该被置于怎样的框架呢?已经出现了哪些女性主义自我质疑的角度?在美国,首先提出这些问题的女性主义者,是那些感到自己在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研究中被白肤色、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主义者边缘化的人,尤以有色人种女性、同性恋女性和犹太女性为代表。她们挑战“女性”的意义,和假设存在一种统一的女性主义主体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使得学院派女性主义实现了早期的激进突破,将一元和多元的“女性”概念确立为合适场所,完全适合进行知识的探究。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起初的重点是性别差异——女性的经验、历史、传统和文化所具有的与男性不同的性质。但是如果说性别差异主导了早期的女性主义话语,那么被女性主义的内部霸权所边缘化的那些女性发出的愤怒批评与机构质疑,则如同海啸一般,引发了女性研究在侧重点上的逐渐变化。

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及整个80年代,女性内部的差异已经日益成为美国女性研究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的中心焦点。促成这一现象的有以下作家的开创性文章:艾丽斯·沃克、奥德莉·罗德、芭芭拉·史密斯、阿德里安娜·里奇、约翰内塔·科尔、邦妮·齐默尔曼、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切丽埃·莫拉加、葛洛莉亚·安莎杜娃、艾丽斯·柴和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我在此仅例举几例。还有一些论文集,例如《此背谓我桥:激进有色人种女性的

写作》(莫拉加与安莎杜娃主编)、《女人皆白种,黑人皆男性,但是我们有勇气:黑人女性研究》(葛洛莉亚·霍尔等主编)、《好犹太女孩:一个同性恋选集》(伊芙琳·贝克主编)、《同性恋研究》(玛格丽特·克鲁克尚克主编),以及《第三世界女性与女性主义政治》(莫安提等主编)。

这些从女性主义内部发起的挑战,它产生的影响是质疑了将性别作为决定女性生活的惟一因素的做法。<sup>13</sup> 其他形式的他异性和社会分层体系,与性别体系交叉在一起,打破了单一从性别角度对女性生活进行分析的做法。多重压迫、交叉、定位、立场和矛盾主体立场的话语,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美国学院派女性主义中铁板一块的一元化“女性”概念。

肖娜·格拉克和达芬妮·帕泰主编的《女性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1991),将这一质疑的框架直接应用来分析,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方法论。这两位编者解释道,口述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迅速被女性主义者采纳,成为一种理想的女性主义方法论,能够“以易于接近的形式(呈现)之前被压制或忽视的女性话语。”(2)这两位女性主义者,在《女性的话语》中,描绘了一系列使用口述历史的学科。她们发现,女性的口述历史的工作,比她们“原本想象的”“更成问题”,需要超越“对女性经验的颂扬,转而从更为细微的角度理解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工作的复杂性。”(2,3)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差异,以及口述历史交流的权力关系结构,促成了以下两点之间的调和互动:一是女性生活的现实情况;二是由研究者建构的,供在学院以及整个媒体内传播的女性主义历史。举个例子,相互竞争的叙事权威的问题,是凯瑟琳·博兰和桑德拉·黑尔所著文章的主题。博兰的祖母精神矍铄,她不喜欢博兰对自己的生活所作的女性主义阐释,而与此同时,博兰在重述祖母的生平故事时,也不愿意将所有的叙事权威都交给祖母(63—76)。黑尔是一位工人阶级出身的美国白种人类学家。尽管她被授予了“荣誉苏丹人”的称号,她却没能如愿获得一位苏丹的女性主义领军人物的生

活故事,因为那位出身于相对精英阶层的第三世界女性希望利用这个研究者,以便在苏丹的派系政治中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121—136)。她们在文章中分别讲述了各自在巴西和约旦河西岸所做的研究,在这两篇文章中,帕泰和格拉克提出了伦理与政治的问题: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国家、民族、阶级差异,如何不可避免地质疑了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过程与产品。<sup>14</sup>

第二个主要的质疑框架来自后结构主义。欧洲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就零星开始进入美国,主要集中在大学的法语系;到20世纪80年代则全面加速进入美国所有的人文学科。它将研究重点放在性别差异的理论与语言意义上,尤其关注语言在构建女性特质时的作用。受到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伊莲娜·西苏、露丝·伊里加蕾、路易·阿尔都塞和米歇尔·福柯等理论家的影响,美国的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女性主义的本质化或整体化姿态,以及它扎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根源。<sup>15</sup> 209

尽管并非所有的质疑形式都是后结构主义的,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都以质疑为目标。作为对詹明信的“总要历史化!”(*Political Unconscious* 9)的命令的呼应,我们可以将后结构主义的紧迫任务——如果有这么一个任务的话——概括为这句反宣言:“总要问题化!”正如拉达克里希南所云,“后结构主义思维”具有“永不疲倦的质疑能力和警惕礼节”(“Feminist Historiography”192)。“后结构主义,”朱迪思·巴特勒写道,“严格说来并非一个立场,而是对那些确立‘立场’(包括女性主义的立场)的排他性运作的批评质疑。”(Butler and Scott, *Feminists* xiv)在“违背个人主义、小说话语和亲身见证的惯例”写作时,琳达·考夫曼肯定了后结构主义批评的基石:“我想不断地质疑知识的地位——甚至就在我们正在建构它的过程中——这是一项永远的工程。”(“Long Goodbye”129, 143)而且正如佩吉·卡慕夫所称,“侵蚀站立之根基的行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实践而言必不可少(“Replacing

Feminist Criticism” 42 )。

对于许多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言,假如女性主义的最基本概念不敞开接受质疑的话,女性主义注定要重复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象征秩序的二元对立结构。尤其对于受到福柯的早期著作影响的女性主义者而言,一元的女性、多元的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等都是文化的建构,是话语的“果”,而不是先于话语存在的“因”。女性主义定位与立场的形成,不应该仅仅因为它们的女性主义的,就得以豁免元理论的质疑。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警告道,如果我们不断寻找她所称的“女性主义的课题”,那我们就犯了错误(2—3)。“女性主义批评”,她写道,“应该探讨男权中心的表意体系的整体化要求,但也要保持自我批评,警惕女性主义中的整体化姿态。”(13)<sup>16</sup>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避免擦除异质性和差异(人文主义的普遍课题正是建立在异质性和差异之上的),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质疑必不可少。

在许多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看来,历史叙事本身应该被质疑,因为它天真的认识论,它的意识形态,它与象征秩序的联系,以及它没能认识到自身的讽喻基础和修辞根基。在女性历史的学科领域内,乔安·斯科特或许最早拥护后结构主义的质疑,拥护将历史话语从指涉领域转移到修辞领域(借用保罗·德曼的术语),从能动者的叙事转移到话语效果的分析(借用福柯的术语)。在《性别与历史政治》一书中,斯科特向女性主义历史学家提倡“自觉地批判自身的合法性与排外主义的政治,以此拒绝绝对主义的或整体化的姿态。”(9)她认为后结构主义的编史方法,是惟一能够避免退步的客观主义方法论的途径,那种客观主义方法论只能将那些需要质疑的性别差异概念展示得更为具体。“从这种(客观主义的)立场书写的女性历史,”她写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最终支持了性别差异不可改变的观点,而正是这些观点为歧视提供了合理性。”(4)为了避免这样的重蹈覆辙,她倡议一种“更为激进的女性主义政治,”其基础是后结构主义的“更为激进的方法论”(4)。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呼吁,反对已成胁迫性话语的“古典历史”,并提倡一种“新的历史”,这种新历史是共时的而不是历时的叙事。和福柯一样,斯科特希望女性主义的编史工作能从对过去的重构中转移出来,转而分析意义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构和运作的:“故事讲述的不再是发生在女性和男性身上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对之做出回应;相反,故事讲述的是,女性和男性的主体意义与集体意义,作为身份认同的概念,是如何被建构的。”(6)<sup>17</sup>

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对历史叙事的质疑,可以被置于更广的史学辩论的领域内,两个主要的代表是怀特和拉卡普拉。这个辩论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广泛层面的(后)结构主义对叙事本身的批评:在许多理论学家看来,叙事与模仿和表征主义有着危险的联盟关系。例如,巴特在《历史的话语》一文中抨击历史话语是意识形态的叙事,它隐身于表征主义的面纱之后,从而将自己的身份隐蔽起来。这种历史的话语将“叙事(确立)为现实的一个优势的能指。”(140)将历史学家建构为“客观的我”的做法产生了一种幻觉:历史在自我叙事,现实自己在说话(131—132)。历史话语省略了能指(叙事)、所指(概念)和关涉(“现实”事件)之间的区别。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堆积事实,不是为了再现现实,而是意图产生“拟真效果”(139)。巴特在《拟真效果》一文中对这个表意的实践有更为详细的界定。“历史”与“叙事”将自身的建构伪装或自然化为一个有序的话语,通过这么做而部分实施了意识形态的功能。<sup>18</sup> 克里斯蒂娃和西苏将性别引入对叙事话语和历史话语的此类批评中。她们以不同的方式将叙事——尤其是表征性叙事——与确立和强制实施“父亲之法则”的俄狄浦斯话语联系起来。<sup>19</sup> 后结构主义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始于巴特的结构主义工作,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对所有形式的叙事的广泛怀疑,它怀疑叙事话语与社会秩序有联盟关系,并且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胁迫的乃至专制独裁的功用。<sup>20</sup>

其他的理论家与其说对叙事有敌意,不如说是怀疑叙事具有模

糊它的修辞根基的倾向。例如，保罗·德曼认为叙事——包括历史叙事——是一种时间性的寓言，一种对存续时间的比喻表达法，它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对修辞的依赖。不论它将自己呈现得多么具有历时性，叙事仍然能够被解构来表现它的讽喻形态。“修辞的比喻充当了历史体系的基础，”他在《阅读与历史》中写道(67)。<sup>21</sup>尤其是在与历史话语的关系上，德曼的态度表明，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叙事，与其说是由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决定，不如说是由以下的这些比喻性结构决定：线性发展或倒退、拯救或谴责、阶段主义、机体论、二元论或者甚至摩尼教式的极端二元冲突、辩证法、世界观、两性战争或种族战争、阶级斗争、性退化，如此等等。就像萨默斯的阶段主义的历史叙事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历时性会潜在地崩溃成为共时性。

后结构主义理论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策略，尤其是那些强调语言效果和文本调和的策略，来质疑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历史书写。但是，后结构主义的质疑不应当被拔高为，惟一能够对女性主义分析和历史书写的基本概念进行持续质疑的途径。例如，乔安·斯科特简化地将客观主义方法论与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二元对立起来，认为后结构主义具有一种独特的激进性，这种激进性源自于一种独特的“对它的可变性、易变性以及建构的政治性质的强调。”(*Gender 5*)她忽略了那些，在后结构主义之前或与它同时期，应用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者，她们用该方法论强调意义的建构性质和意义生成的政治性。与许多后结构主义者一样，斯科特毫不怀疑地接受这一观点：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一直深陷“天真”的人文主义泥潭之中。

我已经分析过的另一种质疑框架——立场话语和女性内部差异——同样重要，尤其是它强调身份认同的互动的、相互关联的多元侧面。此外，这两个框架绝非相互之间截然分开的。它们的“起源”场所不同——一个主要源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和精神分析；另一个主要源自北美的女性主义研究。但是，将这两种话语混合起来

的做法——这种混合趋势在美国伊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创造出一个重叠的舞台,使得语言调和的质疑与立场的质疑经常互为有益的补充。

不论批评的框架是什么,对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质疑代表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必需的制动闸,以扼制女性主义“讲述真相”过程中的过分之举。我们需要承认,任何历史只代表了一种历史,如果它假设自己是惟一的历史,那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如果我们能轻易地察觉以下这一点:萨默斯对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的会议以及女性研究项目的传播做了启发式的叙事,试图通过这一叙事将她自己的女性主义确立为惟一正确的女性主义的将来,那么我们当然也必须时刻准备着将评论的目光转向女性主义内部,质问我们自己的女性主义历史如何也会有此类的表现。我们在对女性主义进行女性主义的历史书写时,谁是胜利者和失败者?

## 捍卫女性主义的叙事历史

对历史书写进行没完没了的质疑会带来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本身就捍卫了对女性主义进行的女性主义叙事。第一个危险是瘫痪的问题。不停地只关注一点,可能会导致无限循环和对不确定性的崇拜。持久的自省——尤其是这种自省关注的是语言建构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危险的不作为,或者更确切地说来,虽然有所作为,但是其方向是不断地向内回归,从而阻止了精力向外导向,不能产生社会变革。正如达芬妮·帕泰在质疑跨越差异边界的女性主义口述历史时所写的,“我们要是让自己被这些问题淹没,那就错啦。从事跨越种族、阶级和文化的研究是一个麻烦事,但这一事实不应该成为理由,令我们仅仅关注自己的困难以及我们与困难的斗争。”(150)的确,因为研究者具有能够施加影响的优势立场,就放弃受到多重压迫的女性的口述历史,这将会导致

我们的注意力从那些需要将故事讲述出来的女性身上转移开来，再次重新关注历史学家的有问题之处。<sup>22</sup>

这一危险在后结构主义内部比较常见，已经得到了广义上的后结构主义内部和外部的许多人士的关注。<sup>23</sup> 托马斯·卡瓦纳在努力定义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界线时声称，放逐语言的模仿功能会导致文学研究不具备“关涉性”，并使得所有对“现实”和“经验”的关注都失去合法性（*Limits of Theory* 10, 15, 17）。保罗·史密斯在对德里达的解构所具有的政治局限性的相关批评中声称，德里达对主观性的不断擦除，限制了能动的可能性，“因为它不能被调整来适用任何对抗性的政治。”（*Discerning* 50—51）“存有欲望的主体/个人在解构中没有容身之地，”他写道，所以因而“不能对其自身的阐释负责，更别提对人类的历史负责。”（50—51）上述几位学者站在后结构主义框架的内部，试图使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回归历史和政治。尽管他们的努力主要针对文学研究与理论，但他们对历史书写所做的辩护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关心女性生活的真实情况，没有目的明确的能动性和政治责任，女性主义的历史书写就会潜在地失去其作为颠覆话语的存在理由，失去其对抗性的锋芒。

米凯莱·巴勒特将这种后结构主义对真相和主观性的擦除，应用来直接分析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者在该文中的代表是英国期刊《m/f》：

（后结构主义理论）对话语实践的排他性强调……在某些方面（是）合适的、有价值的。……然而，《m/f》期刊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抨击了女性主义的口号，这种批评却肯定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乃至到了具有破坏性的地步。女性解放运动的口号——“人是政治性的”、“女性的选择权”、“对我们身体的控制权”——一个接一个地被论证为建立在错误的认识论基础上。……这种批评实



践……没能理解这些口号在特定的历史斗争中的产生基础。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问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政治策略正被提出来替换原有的呢……基本上说来,解构“女性”概念的举措能否为女性主义政治提供根基,这一点尚不明了。(72)

巴勒特暗示,政治斗争取决于搭建一个历史的基础,从那里开始采取行动。<sup>24</sup>不断地质疑我们站立之根基的行为,产生了这样的政治问题:我们失去了说话、组织社会变革或在共同目标基础上建立联盟的定位或立场。这也同样适用于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的历史书写。 213

第二种危险也代表了,后结构主义在高校内体制化之后,在后结构主义内部出现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倾向。不断侵蚀女性主义话语根基的行为,其本身具有成为一种霸权姿态的危险,它对任何不批评话语根基的行为都予以一概的否定。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所谓的本质主义质疑和人文主义质疑,不仅不会使得女性主义的多元化声音成为可能,反而有可能会在学院派女性主义内部构建一种新的、排他性的正统观念,一种新的主张等级划分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进行理论质疑的人常常占据了最为显要和权威的立场。正如卡瓦纳所云,“我们把这个话语当作激进他者的话语引入,却似乎仅仅产生了最为绝对的同一致性和正统性。”(5)(后结构主义)理论在学院内的霸权——这种霸权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但也十分具有影响力——将理论确立为“一个场所,其中上演的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表演”、“从所有的指涉功用中解放出来”的“自我辩白的表演。”(*Limits of Theory* 10)后结构主义理论扎根于“大师—学徒”体系,这个体系要求理论娴熟和忠心耿耿,所以后结构主义理论可以在成熟/幼稚这组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实施一种接纳与排外的政治。“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卡瓦纳总结道,“这种政治要求无情地驱逐所有那些不加入或反对大师与其学徒之间进行的互为支撑的对话的人。”(12)尽管卡瓦纳没有进一步地点明,大师/学徒、理论/

经验之类的二元对立还可能受到性别和种族的影响,这种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学院内现存的权力结构。

虽然站在后结构主义的框架之外,但芭芭拉·克里斯蒂安在《理论的角逐》中的分析与卡瓦纳的颇为类似。她写道“我们很难忽视这种新的接管,(因为)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商品,它有助于决定我们在高校机构内的任职和提升。……评论家们不再关注文学,而是关注其他评论家的文本,因为渴望获得关注的评论家已经取代了作家并把他自己想象为中心。”(225)她对文学批评的评论可被借用来评论历史书写。给予理论特权的做法常常会奖赏那些质疑女性主义的人,并使得他们不是将研究重点放在过去发生之事上,而是放在其他历史学家的文本上。在高校内部,这种权力结构运作得更为隐蔽,因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可能会隐藏其意识形态的力量,模糊其自身对意义的无限延异的中止(它坚持自身的程式具有“真理性”,并认为它对一切被认为“人文主义”或不够自我反省的其他理论所采取的轻视态度也具有“真理性”)。<sup>25</sup>关联到女性主义历史书写上来,这意味着那些不断从事质疑的人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会将其批评(如卡瓦纳所云,这种批评不受任何关涉性考虑的拘束)确立为一种霸权,确立为女性主义本身的惟一意义。

第三种危险隐含于对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无尽质疑行为的本身。214 这种批评延展开来,威胁了女性历史书写这一涉及多学科的整体工程,对女性主义的历史书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当然,对女性历史的书写并不仅仅聚焦于女性的经验,而是从这个补偿性的中心开始,随后扩展到质疑性别体系的形成与运作,以及性别体系与建立在种族、阶级、性征、宗教、国别等等之上的其他社会组织体系的交叉互动。大部分的书写女性历史的工作致力于重现和/或重新分析女性经验与性别体系中,被湮没、被遗忘、被遗漏,或被从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的那些方面。后结构主义试图将女性历史书写的方向重新引向话语分析,这一做法具有一种轻视的意味,将历史书写打发为,借用乔安·斯科特

的字眼，“有关发生在女性和男性身上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对之做出回应……的故事。”（*Gender 6*）<sup>26</sup>

正如莫利·海特在谈及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的形式时所说的，“身为一位女性主义的文学学者，似乎越来越意味着要跟上当前的各种批判的声音。我们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消灭母亲，然后骑着我们刚刚装上阳具的木马严肃地驶向未来。这就是现代性。”（“‘Except thou ravish me’” 125）盖尔·格林的反思甚至更为发人深思：

我在这一切中感受到一种弄巧成拙的倾向，一种评论的内向爆破，带着一种戛然而止的声音。我还想知道，用如此猛烈的自我审视来封闭自己，这是不是一种形式的自我擦除，一种与我们对苗条的痴迷类似的事物，一种向我们和他人保证我们将占用更少的空间的途径——一种职业和教学法上的厌食症。（“*Looking History*” 16—17）

不论我们对现实的了解总是已在多大程度上被调和过了，但是，将注意力从女性主义历史的真相上转移开来，这一做法，在更广的范围内，就是转移对历史真相的注意力。这种转移的政治后果，有可能要将学院内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书写结构，倒退到女性研究兴起之前的状态。这一危险使我们重新面临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学院派女性主义兴起初期的政治紧迫性，不论随后的发展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区分和拓宽了那些早期的宣言，以适应积极实践的女性主义编史工作的需要。书写女性的过去，这提供了一种途径去认领过去，去主张自己具有阐释的权威，能够为了现在与未来而阐释它的意义。“现在的新气象是，”杰达·勒纳在《多数派找到其过去》中写道，“女性正在全面认领其过去，并在塑造其用来阐释自身过去的工具。”（166）这样的论述的前提是，在现在与未来创造历史的行为部分取决于对女性过去的历史

书写。

女性主义者书写女性主义的历史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性的历史，假如这一历史的关注点完全从有关（调和过的）过去事实的故事和分析中转移开来，完全转移到话语分析、建构主义和对女性主义编史工作的批评上去，那会产生怎样的政治后果呢？这样一个完全的转移，会将书写历史上的多元女性（与作为话语效果的一元女性相对立）的舞台，拱手让给非女性主义者和反女性主义者。就像对选举的联合抵制一样——其原本意图是令大家关注选举过程中的不合法之处，这样一个从书写女性的“真实”生活和性别历史结构的战场撤退的行为，会将历史叙事的战场完全交给主流的父权体制，但是这一撤退将会给学院的结构带来多少关注，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相信这一点至关重要：女性主义者要申明我们的权利，坚持我们的存在：在高校内，我们是新知识的生产者和教授者。这种新知识应该包括讲述女性和男性的过去生活的故事，以及对女性主义的历史中的事件和意义的新的阐释。难道我们希望世界上的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们都能随心所欲地构建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故事？当然，批评她的历史话语是一个被大家认可的事业——这事实上是受到了后结构主义质疑的很大影响，而且这也是我刚才尝试做过的事情。但是与之同样合理、同样重要的是，其他版本的学院派女性主义的历史应该被书写，这些历史（不论其如何被调和）应该尝试捕捉有关女性研究的形成、传播与内部矛盾的“真实”的事件、想法和意义。正如安妮特·科罗德尼所云，我们必须“担负起复原我们的历史的责任，以免其他人替我们书写历史。”（“Dancing” 464）<sup>27</sup>

女性主义的生存——女性主义作为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在未来的生存——部分取决于我们在随后的世代中自我繁殖的能力，以及将我们的学识传续下去的能力，这样我们就不用每个世代都打造自己的车轮。正如伊莱恩·肖瓦尔特所云，女性作家被剥夺了渠道，无法了解女

性书写的历史：“每一个时代的女性作家都发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历史，从而被迫重新发掘过去，一遍又一遍地塑造着本性别的意识。”（*Literature* 10）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的历史，或者更具体一些，女性主义的历史，是固定不变的“真相”，必须被当作珍贵的传家宝代代相传。我也不是在暗示，以后的世代应该完全克隆自其女性主义母亲（和偶尔的父亲）。事实上，这样的固定性会导致停滞和反叛。历史，作为多重阐释行为的结果，一定是流动的，依据现在与未来的启发式需求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此外，在政治运动的家庭罗曼史中，新一代的女性主义者不可避免地会抵制老一辈的权威，并在其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力量，以便清理出一片空间，迎接新的历史具体情况产生的新故事。<sup>28</sup>这种流动性和对变化的需求（甚至是冲突性的变化）不应当将历史书写的政治，模糊为一种记忆形式。集体记忆的丧失和无数有关过去的故事的丢失，对女性的长期附属地位的形成起到极大的作用。对广泛意义上的女性历史，包括女性主义的历史，进行不间断的、累积性的构建，这是抵抗和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正如莱斯利·马蒙·史尔戈在《讲故事的人》中所云，“有了这些故事我们就能生存下去。”（247）

我是有意在此调用史尔戈对故事讲述的政治紧迫性的颂扬。永久质疑的最后一个危险就是它含蓄地攻击了叙事这个整体和作为一种叙事行为的历史书写这一具体方面。后结构主义抨击叙事在本质上具有独裁和整体化的倾向。这一批评含蓄地谴责叙事性的历史书写是同一性体制的一部分，是对象征秩序的再现而不是越界。然而，许多少数族裔女性坚持认为，叙事在其集体生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种看法应该提醒我们，停止将叙事整体谴责为一种反动的或整体化的认识模式的行为。例如，路易丝·厄德里奇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痴迷于叙事。……为什么我们人类必须得叙事呢？我不知道，但我们确实必须如此。……我家里的人把一切事情都编成故事。他们喜爱讲述好故事。大家坐在一起，故事就来了，一个接一个。”（Schumacher，

“Marriage” 29—30) 在某种意义上, 托尼·莫里森回答了厄德里奇的问题: “叙事是知识得以被组织的途径之一。我以前一直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传达和接受知识的途径。现在我对这一点不再这么确定了——但是, 对叙事的渴望从未减弱过。现在对它的渴望仍与过去在西奈山、加略山和大沼泽的中心地带对它的渴望同样强烈。” (“Memory” 51)<sup>29</sup> 吉姆·切宁在书写她母亲——著名的共产主义组织家——罗斯·切宁的历史时, 回忆道: “极其轻柔的、耳语一般, 我对她说道, ‘妈妈, 给我讲个故事’……啊是的, 我会用上我所有的写作技巧, 记下她讲述的故事并讲述她的故事。” (*Mother's House* 17) 诗人艾琳娜·柯蕾普费兹在《记账者》中直面她的反犹大屠杀记忆中存在的痛苦缺口:

历史这么繁杂 看似  
一个布满缺口的不在场 至多也只是一种阴影  
渴望 某种更大的  
定义 它却永不会到来  
因为被焚烧的 化作空气  
与灰烬 别无其他。

(90)

然而, 她的长诗是一种持续的努力, 去见证已经成为“空气”的历史, 并重新找到已经失去的知识。其中, 诗歌与叙事协作并举, 虽然这种协作时断时续, 而且并非那么尽善尽美。要在现在与未来充分地生活, 这种努力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先决条件。<sup>30</sup> 遗忘反犹大屠杀就让它有再次发生的危险。

少数族裔的女性与口头传统有着很强的文化联系。但是并非只有她们才坚持认为叙事是一种对生存必不可少的知识模式。例如, 在既是诗歌也是散文和随笔的文章《风雨交加夜》中, 厄休拉·莱金声称, 讲

故事既是记忆、见证和生存的手段,也满足了对记忆、见证与生存的需要。叙事抵挡了对“风雨交加夜”的恐惧,对历史的莫名恐惧,和死亡本身产生的恐惧感。盖尔·格林写道,“这是正确的:故事,有关自我的故事,有关女性和女性自我的故事,在创造女性主义意识中具有并将继续具有极大的力量。”(“Looking History” 11)在《巴别塔之乐》中,杰伊·克莱顿将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回归故事”,看作是现代作家回归叙事的一个先行军。他所称的多元化的“本土叙事集体”(他借用了让-弗朗西瓦·里昂塔德的术语)不断扩散,成为对产生于启蒙运动及其之后的“宏大叙事”的一种后现代抵抗。在这点上,叙事充当了一个本土化的场所,能够生产出多元的意义。叙事能够服务于意识形态和专制的目的,克莱顿声称,但是对于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女性主义群体)而言,叙事还能充当一种意义生成的抵制话语。<sup>31</sup> 217

克莱顿对叙事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基础,供我们站在其上有力地捍卫叙事作为一种阐释话语的功用。女性主义者可以用它来讲述有关女性主义自身的历史的故事。叙事历史是女性主义者可以使用的几种越界策略之一,以抵制或颠覆主导文化的各个部分所讲述的女性主义的故事。为了对抗讲述女性主义的他异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女性主义者可以讲述一些相反的故事,描绘她们所受到的排斥,肯定她们的能动性(不论这种能动性多么受到约束,或者与主导话语有多大的共谋关系),并持续地(重新)构建她们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认同。莫里森曾捍卫过叙事对美国黑人的重要性,她的话语可以被借用来描绘女性主义者书写女性主义的历史的工程:“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叙事的主题,是我们自身经验的见证者和参与人,而且,这一点绝非偶然,我们还见证和参与了我们与之相接触的那些人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并非‘他者’。我们提供了多种选择”(“Unspeakable” 9)。正如吉安娜·波马塔指出的,女性主义者书写的女性主义的历史可能会关注时事与空间。<sup>32</sup> 但是叙事话语还可能代表了这样一种“选择”:它描绘的不是惟一的“女性主义

的主题”，而是许多的“女性主义的主题”、许多的身份认同与故事，并将之阐释为一种欲望的铭刻，从而强调女性主义在创造历史中的在场。

## 欲望问题：历史中的欲望与对历史的欲望

到目前为止，我对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探讨没有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欲望。欲望与女性主义者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对女性主义历史的书写）的危险性与必需性有着怎样的联系？从劳拉·穆尔维，到特瑞莎·德·劳拉提斯、里奥·伯萨尼、海登·怀特、彼得·布鲁克斯和杰伊·克莱顿，叙事理论家们纷纷撰文，肯定或者否定交织在一起的叙事和欲望的知识模式。例如，布鲁克斯在《阅读情节》中检验了“叙事作为一种人类欲望形式的性质，”在这种欲望形式中“叙事的需求”充当了“一种主要的人类驱动力，它试图引诱和降伏听众，在一种永远难以言说的欲望驱使下降伏听众。”（61）另一方面，克莱顿在《巴别塔之乐》中则拒绝将叙事中的欲望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降伏过程。相反，他认为叙事欲望的力量不好也不坏，其本身既不具备监管功能，也不具有解放功能。他呼吁将叙事欲望加以历史化，分析它在特定的环境中作为一种积极或消极的力量是如何运作的，而不论其是一种约束的结构还是赋权的方法。<sup>33</sup>

218 为了考查叙事与欲望的这种联系对于女性主义编史工作的意义，我们先将欲望从单纯性爱的领域分离出来（它在理论话语中最为常见地被局限于这一领域，克莱顿是个重要的例外）。在《圣经》的意义上，“知道”意味着在肉体上包含或占有。它将感知与性爱结合起来，充当了一个基石，心理学因而得以将俄狄浦斯欲望建构为主体性的一个基础。布鲁克斯的《阅读情节》尤其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让我们想想，《圣经》中还有另外一种被压抑的知识的诉求：它驱使着夏娃品尝从分辨善恶的知识树上摘下的苹果。夏娃对知识的渴望预示了对读写能



力的强烈欲望,对接近书本和教育的强烈欲望。该欲望是一股强大的潜流,流淌于历史的长河中,这其中既有知识女性,也有为了获得基本的读写能力而奋斗的女性。<sup>34</sup> 在《一位奴隶女孩生活中的事件》中,哈丽雅特·雅各布斯有力地构建了另一种形式的欲望:对自由的渴望。与此同时,希拉·罗博特姆等女性主义者已经发出了所有被压迫团体的呼声,她们渴望“打破这个自我映射的世界,它不仅将自己包围起来,还同时将自身的影像投射到历史上。”( *Women's Consciousness* 27 )

随着它将自身的影像投射到历史上,女性主义内部的争论、分歧和矛盾,反映出不同模式的欲望政治,和欲望与历史叙事的关系。一方面,女性主义的向外导向的、毁灭性的、投射性的凝视具体表现了一种对权力的欲望,即渴望推翻父权制霸权,并在历史中留下自身印记的欲望。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批评性的内向凝视,惧怕自己对权力的欲望,担心自己会重蹈它所试图超越的权力结构的覆辙。<sup>35</sup> 对创造历史的坚持,对叙事这种具有潜在革新性的知识模式的坚持,表达了渴望将权力转移给那些从未享有权力之人的欲望。对创造历史的质疑则反映了赋权的危险性:它会重新将权力凌驾于他者之上。前者肯定了能动性的政治重要性和可行性,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女性主义的课题。”后者认为能动性的概念天真幼稚,它没有意识到主体性总是已经建构于意识形态之中,建构于象征体系的霸权话语之中。

这些相互矛盾的欲望和截然不同的能动性概念,在琳达·戈登和乔安·斯科特的论辩中表露无遗。在《符号》期刊 1990 年的一期中,这两位著名的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互相评论了对方的著作(《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家庭暴力的政治与历史》与《性别与历史的政治》)并回应了对方的评论。自从《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权利:美国生育控制的社会历史》(1976)出版之后,戈登的观点已经众所周知:她反对将女性历史概括为“受害者”的范式,提倡一种复杂的社会控制概念,这种概念鼓励我们分析女性在其面临的具体限制条件之内是如何灵活机动的。在回应

斯科特的批评时,她写道,她用“性别来指称一个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女性通过矛盾的、模糊的、冲突的关系被贬降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关系得以维持,但仍会遭到抵抗。在这种抵抗中,女性绝不是总把自己定义为他者;在这种抵抗中,女性虽然遭受限制但仍然坦然面对,并做出选择和采取行动。”(“Response” 852)另一方面,斯科特得以闻名是因为她拥护将后结构主义当作历史书写的基础,尤其是福柯的胁迫话语体系概念,和主体是话语的效果而不是其自主的成因的概念。斯科特提倡“对能动性进行一种新的概念定义,”这种新定义“将把能动性看作是一种话语效果,而不是自主的个人主体的意志之中内在固有的一个特性或特征。”(“Review” 851)<sup>36</sup>

斯科特表扬戈登的《主宰自己命运的英雄》描绘了一片尚未被大量探索的女性经验地域:“她使得那些曾有亲身体会的人回忆起冷遇、虐待、损害、乱伦的经历。”(“Review” 848)她更感兴趣的是戈登对以下问题的分析:上述女性经验的部分元素,在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时间内,如何被建构为“社会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建构“常常被认为导致了家庭的破裂,而挽救这些家庭的工作,大体上说来,应该正是”那些社会工作者的责任(849)。但是她对戈登的“阅读策略”的看法有问题,在她看来,戈登“没有打算仔细分析那些社会工作者的叙事。”(850)

此外,在斯科特看来,戈登文章的次重点,即她对这些受迫害女性的能动性所做的辩护,并不令人信服。斯科特相信,这种能动性并非“自主的个人主体的意志”,应该被看作是“一种话语效果,在这个个案上是社会工作者对家庭、性别和家庭暴力的话语构建的效果。”(851)尽管戈登在文中并未将能动性与自主性等同起来,但斯科特还是将戈登的作品与人文主义女性主义联系在一起,后者将女性看作自主的主体,抵制实施社会控制的力量。“该书的主要成就”,在斯科特看来,在于它呈现了“这一过程的故事”,即“为个人或集体的具体行为建构可能性或局

限性”的过程(852)。但是她认为“该书的成就会更大……假如它换用一种更为复杂的概念框架来明确表达的话。这种更为复杂的框架拒绝过于简单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对立思维(要么统治、要么自主行为),因而超越了该书的题目所暗示的内容:有关英雄及其能动性的个人主义概念。”(852)戈登的题目,在斯科特看来,给该书打上了不成熟的标记,“更多是一种愿望,而不是历史的真实;更多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程式,而非能被资料来源证实的某物。”(850)

斯科特对戈登作品的不瘟不火的表扬与批评,以及她对戈登的评论的回应,扼要重复了后结构主义对女性主义历史书写的质疑中出现的许多传统主题。首先,对以女性经验的故事为题材的历史颇为轻视。这暗中抨击了叙事本身,认为它是逊于历史书写的一种模式。其次,在语言和话语分析中坚持质疑一切。还有将能动性主体性简化为话语效果的倾向。这反映了福柯等人对监管性话语形态建构的强调,排除了赋权的概念,并轻视对立的形式。还有,指责对方天真幼稚,并担忧它复制同一性体制。最重要的一点是,赋予后结构主义理论特权地位,将之看作女性主义行动的惟一激进立场。斯科特或许是无意识地重复了心理学中那个熟悉且令人难以回答的防御思路(如果你不同意我,那是因为在抵制)。在她回应戈登评论的那篇文章的末尾,她将戈登的言论简化为一种对后结构主义的抵制:

这种对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抵制从何而来?在这个女性主义的历史时刻,为何会有这种抵制——在这个时刻,假如我们想提出新的政治策略的话,我们需要理解集体差异和个人差异是如何被复杂建构的,也即等级和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既然女性主义的本性就是要动摇它所站立于其上的根基,对理论的抵制就是抵制女性主义自身所产生的最为激进的影响。(“Review” 859)

斯科特的基本规划是提倡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历史，而戈登的评论和回应则为多种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对女性主义的赋权效果作了辩护。她表扬了斯科特对客观主义的挑战，以及她的“学习语言”对于历史事业“至关重要”的观点（“Review” 854—855）。但是她并没有被斯科特说服。在她看来，斯科特的著作最为雄心勃勃的目的，是论证“语言是而且必须是历史的惟一课题，而且通过语言学的分析，性别问题将会得以显露。”（854）戈登认为该书的精彩部分是它对法国历史的分析章节，而斯科特对编史工作的批评则是它的薄弱之处——斯科特批评编史工作假设在语言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现实”（856—857）。最终，戈登并未被说服，她不相信后结构主义理论是惟一的，能够书写非客观主义的历史，并对意义的语言结构保持敏感的社会理论。戈登强调了主观认识论、语言学分析和使用多种社会理论（包括，但不仅仅局限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戈登拥护的历史不是那种被简化为反映“等级和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元叙事。相反，她呼吁将“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模式加以复杂化，添加一种新的模式，承认社会对权力关系的建构，但并不会将女性简化为话语的效果。相反，她提出了一种能动性的概念，这种概念强调女性在所遭受的限制之内进行协商——这并非是相信女性总是已经具有自主的赋权，而是相信女性在父权制的条款内为了生存而斗争，她们不仅仅是消极的受迫害者。在这么做的同时，她理论概括了一种历史书写，它承认主观性和语言建构，但是也认可叙事作为一种女性主义实践所具有的力量，并且不会将现实简化为语言。她认为，她所提到的“‘现实的’家庭暴力”超越了“对这些暴力攻击所做的各种对抗性的阐释。”（“Response” 853）“我之所以喜欢历史书写，一个原因是，”戈登这样结束她回应斯科特的文章，“它能从故事中提取意义，从日常生活的模糊的、比喻性的叙事语言中提取意义。”（832）

## 书写女性主义历史：兼收并蓄

《符号》刊载的琳达·戈登与乔安·斯科特之间的辩论,展示的不仅仅是能动性以及对能动性的批评之间的对立,以及权力的欲望与对这种欲望的抵制之间的对立。它还生动地展现了当代女性主义内部为争当“创造历史”的权威所进行的斗争。谁将为女性主义代言?以什么样的方式代言?戈登没有要求获得唯我独尊的权威。她表扬与自己的作品截然不同的斯科特的作品,这引入了女性主义编史工作方法论的多元化概念——也即我所说的兼收并蓄的女性主义历史。而另一方面,斯科特却坚持单一的方法论,也即她自身使用的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她否认女性主义的课题和能动性,这种否认最终成为一种述行行为,坚持其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驳斥其他的声音,认为它们天真幼稚、不符合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且不够激进。为了维护后结构主义的历史书写方法,斯科特采取的基本方法是批评一种女性主义的“政治,这种政治确立并强制保持主次之分,借着比其他课题更具重要性的名义来压制它们,将一些概念树立为规范概念,并排斥另一些概念。”(Gender 9)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对戈登的非后结构主义历史书写的抨击,恰恰是在强制实行一套主次之分的原则(后结构主义),并通过强调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来压制其他的社会理论。不论斯科特多么强烈地警告读者,要警惕主次之分与轻易排斥的政治,她自己对编史工作的理论概括,实践了轻易排斥的政治和对异质他者的压制。

斯科特并非惟一一位怀着这种矛盾的冲动,试图将后结构主义确立为通往革命真理的惟一道路的学者——尽管后结构主义经常提倡异质性、多元化、差异和开放性延异。其他的后结构主义拥护者,尤其是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拥护者,在试图塑造女性主义的未来时,太经常地将胜利者与失败者对立起来。这种表现了后结构主义的权力欲望的行为,与后结构主义对霸权的质疑极其不一致。但是,当然并不是只有后结

构主义女性主义者才拥护一言堂。在《理论的角逐》中，芭芭拉·克里斯蒂安排斥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斯科特维护它的程度。提倡兼收并蓄的女性主义历史，这需要我们保持警惕，不仅对异己观点保持警惕，还要自省地质疑自身的立场。

女性主义对“法国后结构主义”与“美国女性主义”之争的历史书写，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说明历史书写很容易不自觉地滑入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寓言性叙事，也说明对这种简单化分析的质疑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在探讨上述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传统的相遇、对立和融合的数十篇文章中，两者之间的冲突已经获得了一种近乎模式化的描述。主导这些叙事的寓言性比喻是“竞赛”，一种二元对立的斗争。以多种因素决定这种斗争的是知识历史中的一种（后）殖民主义话语，它探讨欧洲大陆的理论对天真的、经验主义导向的美国人的影响。<sup>37</sup> 我拟集中讨论三个这样的叙事以作例子。它们是伊莱恩·肖瓦尔特 222 的文章《女性的时间，女性的空间：书写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1983/1984）、陶丽·莫依的著作《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1985）和佳亚特里·C. 斯皮瓦克的文章《国际框架内的法国女性主义》（1981）。在这三个文本中，克里斯蒂娃奇怪地分别成为一种隐形的在场、女性主义的英雄和恶魔。

肖瓦尔特和莫依对上述冲突的叙事都使用了历史时间标记词。这么做产生的效果，我们可以套用巴特的词语将之称为“历史效果”。肖瓦尔特的文章里出现了以下的短语：“在这一历史的第二阶段”，“在1968年”，“自1975年以来”，“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过去的一两年间”等等。这些短语穿插在松散的叙事之中，产生一种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感觉，并确立了历史化的整体效果。与她相似，莫依对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讨论（第2章至第4章）仔细地遵从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到达美国后出版与传播的时间顺序，从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过渡到80年代早期。两位作者均借用了历史阶段划分的概括性话语，以之来

概括女性主义批评演变的各阶段的特点。和整体的历史阶段划分一样,这些编年史倾向于擦除某一给定时间点上女性主义批评内部存在的异质性。此外,虽然她们佯装叙事女性主义批评这一学科领域的历史,但她们的历史叙事渐渐转变为对其自身在这一学科内部的理论立场的隐喻呈现。因此,其叙事中的“历史效果”产生的效果(当然,这个效果毫无疑问并非她们有意而为之)就是干预了目前的论辩,阻止它参与塑造女性主义批评的未来。

肖瓦尔特的《女性的时间、女性的空间》的隐喻基础,开始于她对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的时间”的置换。虽然肖瓦尔特并没有在文中注明,但她的题目援引了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的时间”。肖瓦尔特的阶段编年史,暗中援引并废除了克里斯蒂娃总结的法国女性主义的辩证式进展。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法国女性主义开始于将女性插入历史的“男性的时间”的人文主义项目,发展到在“女性的时间”内对女性差异进行恐怖主义式的主张,而它前进的乌托邦方向则是超越了“男性的时间”和“女性的时间”的个人神秘主义。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的时间”是存在于历史之外的一个空间(历史是在阳具理性中心主义的象征秩序的范围内建构的,并由这种象征秩序加以建构)。而肖瓦尔特的“女性的时间”则是女性的单独的历史,它迥异于男性的历史,但和男性的故事一样,是历史的一个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的文学史的阶段划分不适用于女性作家,肖瓦尔特如是声称,因为父权制将女性从公共领域排除出去,这种历史环境使得女性的写作与男性的不同。与女性历史的学科领域内对传统的阶段划分的批评相类似,<sup>38</sup>女性批评在“女性的时间”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女性适用的阶段划分。因而,肖瓦尔特的标题及其相关的论证,在这场未加说明的竞赛中(竞赛发生于她与克里斯蒂娃之间,美国女性主义批评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之间),实现了阐释其立场的功用。

肖瓦尔特的确公开承认,甚至大方地指出,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对美

223 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演变历史十分重要。的确，在描述法国女性主义的到来时，她摒弃了将法/美冲突二元对立起来的做法，这种二元对立的  
做法在学界实在是太普遍了：“然而，在书写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时，我想避开将法国与美国的女性主义话语、枯燥的理论与粗糙的经验主义、蒙昧主义与本质主义置于敌对的两极的做法。在构思或支持此类有主次之分的二元对立划分时，我们不仅坠入旧的二元论的陷阱，还真正错误地呈现了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现实，它远比二元对立更为复杂，存在更为精细的区别”（36）。相反，她呼吁采取一种历史化的叙事，承认法国和美国的女性主义话语在美国已经被“辩证的可能性大大丰富了，”它们相互影响，确立起两种模式的女性主义批评话语：女性批评（历史导向的女性作家研究）和女性本原批评（对话语中的女性他者，尤其是男性文本中的女性他者，进行的理论导向的分析）。

然而，在她叙事的最后部分，当她开始详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批评如何在整体上“不可阻挡地……倒退回标准的批评时间”时，肖瓦尔特对女性批评的含蓄推崇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到该文章的结尾处，“标准的批评时间”、“男性的时间”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已经合并成为一个概念：“现代批评”。肖瓦尔特将它与“女性主义批评”对立起来。“女性主义批评与现代批评的关系如何？”她如是问道（41）。她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对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担忧与抵制催生了“现代理论”。矛盾的是，“现代理论”近来又向女性主义批评靠拢，依靠其能量与能力来“走出后结构主义为其自身修建的不确定、不干预和自我指涉的迷宫。”（42）她在结尾处对女性主义者发出一个警告：“既然生产理论日益成为现代批评的任务，女性主义批评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压力，要使自己越来越适应盛行的术语与体系，并在这个过程中摒弃政治上的主次之分以及对个人事务的关注，虽然这些特点以往曾经发挥了效用。”（42）

我感兴趣的不是肖瓦尔特的历史准不准确，而是她在女性主义内



部的自身理论立场如何启发式地主导了她的叙事。她最终将女性主义批评与现代批评对立起来的做法微妙地将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女性本原批评）与“现代批评”归为一类，从而将其从“女性主义批评”（其被暗示为由女性批评所代表）的范畴内清除出去。她在该文的前面部分所提倡的女性批评与女性本原批评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丰富”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女性主义批评与现代理论、女性的时间与男性的时间、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对女性主义批评的时间线性叙事，表面上认可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的合法性，暗地里却将一种女性主义凌驾于另一种之上。在这样的叙事中，历史成为共时的状态，叙事变成为隐喻。

莫依在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叙事中，未加掩饰地将法国与美国的女性主义对立起来，丝毫没有像肖瓦尔特在其文章中一样做出多元主义的尝试。<sup>39</sup> 和乔安·斯科特一样，莫依对后结构主义异质性的拥护铭刻了一种单一性的表演——她的历史意味着擦除别人的历史。莫依著作的开篇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寓言故事，旨在揭示我们需要为了女性主义“拯救”弗吉尼亚·伍尔夫，而拯救的方法就是将她置于后结构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解读。这个开场白公开地展示了法国与美国的女性主义之间的竞争性二元对立，抨击了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专论伍尔夫的一章，把它当作一个妖魔化的例子，说明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的人文主义的反动性质。莫依认为肖瓦尔特偏爱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甚于伍尔夫的现代主义。她将这种偏爱与“卢卡奇对现代主义作品的‘反动’性质所持有的斯大林主义观点”联系起来（6）。肖瓦尔特，以及由她所代表的美国女性主义批评，陷入了现实主义特有的“大而化之的人文主义美学”陷阱之中，天真地相信自我的单一性和语言的指涉性。“诸如肖瓦尔特和霍莉等女性主义者没能理解的是，”莫依写道，“她们所代表的传统人文主义事实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8）后结构主义，尤以克里斯蒂娃为其代表，提供了惟一的出路，

可供逃离这种“隐现于许多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隐秘的卢卡奇式的观点。”（8）

莫依的介绍部分就这样预告了随后的历史叙事的目的论的方向。进展的寓言支配了她对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历时性叙事。美国的白人女性主义者深陷同一性的体制之中，重蹈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覆辙，期待着后结构主义的启示，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专论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那四章按照时间顺序进展，开始于那些在20世纪60年代为社会和政治变革而努力的女性主义者，经过70年代的对“女性形象”的批评和女性批评，最终结束于70年代晚期的“理论反思”的模糊概念。它们为后面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铺平了道路。

莫依并不是真的讲述了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涌入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过程。相反，该书的结构本身暗示了它对后结构主义的提倡。第二部分包含四章，分别专论拉康、西苏、伊里加蕾和克里斯蒂娃。这一部分的历史时间标记要少得多。这一部分不是编年史，而是按照升序来排列莫依欣赏的理论家。尽管莫依对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批评，但克里斯蒂娃的工作最接近莫依的心中所想，因而在莫依的由进展的寓言主导的目的论叙事中占据了最为高潮的位置。该书的第二部分的功用，是挽救第一部分概述的美国白人女性主义，促使其改正反动的倾向。“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矛盾便是，”她写道，“尽管它经常强烈地、毫不隐晦地参与，但最终它的政治性仍然不够……因为它对性别政治的激进分析仍然与去政治化的理论范式纠缠不清。”（87）在莫依的将两者对立起来的叙事中，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胜利者，还是真正激进的女性主义的火炬手。甚至比肖瓦尔特的叙事还要明显，莫依讲述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崩溃成为斗争与进展的寓言。其中，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是胜利者，而她所称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失败者——莫依自己的历史叙事也试

图确保这种胜利局面。

斯皮瓦克的《国际框架内的法国女性主义》是一系列的理论反思，<sup>225</sup>没有尝试做历史叙事。它将一些零星的故事用作寓言，包含了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和对真正的不连续性和异质性的呼吁。斯皮瓦克讲述了一位苏丹女性书写阴蒂切除术的故事，她自己在孟加拉国“选择”英语作为职业的故事，她祖父家里的洗衣女工的故事，以及克里斯蒂娃到中国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为斯皮瓦克提供了契机，来探讨历史与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具体历史时期的社会秩序与生活与其中的女性面临的命运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片断的寓言功能在于扰乱了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尤其是法国与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之间的竞争。在包含第三世界在内的国际框架内，西方女性主义的大论战就显得具有同质化的倾向，尤其是它们均不能容纳被排斥的第三世界女性的“越轨行为”（141, 152）。这种“第一世界固有的对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152）寓言性地显现于克里斯蒂娃的《关于中国女性》一书中。该书写作的基础是克里斯蒂娃的一次简短的中国之行。在书中，她汇报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其“笼统宽泛的史学范围”，“完整的档案证据”，有“令人瞪目的概括”，“初步的研究的缺乏”（137—138）。斯皮瓦克严厉地批评了克里斯蒂娃的具有原始主义倾向的东方主义，因为以下原因而愈发严厉：克里斯蒂娃在西方提倡对单一身份认同进行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但在她的欲望面前——她想为几千年来的中国女性找到一个整体化的身份认同的欲望——这种批判性便消失了。当第一世界面对第三世界时，法国女性主义在批评人文主义时最具锋芒的洞见——它对不连续性、异质性和越轨行为的坚持——消失不见了。<sup>40</sup>

斯皮瓦克对克里斯蒂娃及整体的西方女性主义的批评，有助于我们看到，对美国和法国的白人女性主义的冲突的历史叙事如何隐秘地充当了理论辩论的功用，其目的是击败其他的不同观点。换言之，对女性主义历史的女性主义书写能够很轻易地转变为一种胜利者与失败者

的叙事,而不是一个传达了多样的、异质化声音的故事。按照斯皮瓦克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的精神,在任何的历史叙事中,将多元女性主义简化为单一的一元女性主义的做法擦除了差异,模糊了异质性,并有效地压制了那些弱势人群的声音。

然而,斯皮瓦克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论战叙事的解构,也陷入了她所批判的同样的陷阱之中。她用西方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替换了法国和美国白人女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正如肖瓦尔特和莫依在其叙事中一样,斯皮瓦克忽视了美国女性主义的多种声音——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女同性恋和犹太女性的声音——这些声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强调,在与他异性的其他体系相关联中,女性具有多元立场。肖瓦尔特点出了女性批评内的一些深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者,如艾丽斯·沃克、芭芭拉·史密斯、奥德莉·罗德和邦妮·齐默尔曼,但是她书写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历史,并没有承认这些女性主义者对女性批评发起了一次重要质疑,质疑它将女性加以同质化的做法。莫依则用一种双重排除的姿态解释了这些女性主义者在自己叙事里的缺席:

226 “一些女性主义者或许会好奇,我为什么在这个概述中没有提到美国的黑人或女同性恋(或黑人兼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批评。答案很简单:这本书旨在关注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方面。到目前为止,女同性恋和/或黑人的女性主义批评带来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与美国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一模一样。”(86)而且斯皮瓦克自己也压根没有提到,就女性主义内部的种族主义、阶级歧视和异性恋注意,西方内部也存在“第三世界”和同性恋女性的挑战。她对叙事的(后结构主义式)拒绝放任她在西方女性主义范围内认同某些理论立场,同时放弃另外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太过复杂,不适用于她笔下的西方与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寓言性二元对立。

肖瓦尔特、莫依和斯皮瓦克的文本,对女性主义编史工作而言,具有什么样的教训意义呢?它们展示了用多元女性主义历史替代单一女

性主义历史的困难性和必需性。我们不应当寻求女性主义在整体或某一阶段的最完整可靠的历史。相反,我们必须承认,许多本土化女性主义叙事具有潜力,但这些叙事均不能代表女性主义历史的整体。这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鼓励许多人发出声音,来参与创造女性主义历史的双重任务,还必须承认在我们自己历史的内部可能存在其他的声音,它们(重新)讲述我们已经讲过的故事。琳达·哈钦,在她的后现代叙事历史的概念中,呼吁兼收并蓄的历史。在她看来,这种历史定位在“对叙事掌控权(以及主导叙事)既怀有欲望又存在质疑的矛盾之中。”(*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64)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书写中,“过去事件的叙事化过程不是隐蔽的;这些事件似乎不再自我陈述。”(72)并且,“自然与文化、世界与文本的无缝链接”总是敞开受到质疑。这种意识到历史学家也是叙事者的观点,使得兼收并蓄的多元历史有可能出现:“既有胜利者的历史,也有失败者的历史;既有中央的历史,也有地区(和殖民地)的历史;既有被经常颂扬的少数人的历史,也有未被铭记的多数人的历史;而且我还想加上一句,既有男性的历史,也有女性的历史。”(66)

然而,哈钦的“(多元的)历史”还需要再转一个弯,才能躲开对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建构。我们强调异质性必不可少,但还要扩展这种必需性的范围,它同样适用被边缘化人群书写的历史(不论其是否是后现代主义的)。我们需要拉达克里希南所称的“整体性”,不是对任何给定历史的整体化叙事,而是由关于该历史的不同叙事组成的一个整体:

我在此处的目的……是建议以下两点:一是任何话语或编史工作都没有足够的道德政治合法性来代表整体;二是“整体性”的概念不应当被理解为一种预先设定的范围,而应是一些必不可少且不可避免的“效果”或功用,它们产生自许多相互关联的对话、争辩和……构成这一整体领域的许多立场中的不对称关系。  
(*Diasporic Mediations* 189)<sup>41</sup>

227 对拉达克里希南而言,这样的整体性要求在后结构主义质疑和女性主义实践之间进行协商。没有后结构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编史工作……会有流于将权力的各种力量进行表面逆转的危险,这会使得某些整体的、基本的意义体系和历史体系不受影响。”(“Feminist Historiography” 189)但是,女性主义的编史工作也需要一种“积极的规划”、“一种明确的政治”,其基础是“将意义有目的地/能动地生产为变化。”(189, 203)他这样总结道,“正因为它仍然对创造和变革历史抱有兴趣”,女性主义编史工作才与众不同(202—203)。

然而,一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的霸权态度表明,后结构主义理论本身并不足以保护女性主义免于产生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历史。我上文讨论的乔安·斯科特、莫依,乃至斯皮瓦克的文本足以说明这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拥护的由多元历史组成的“整体性”,不仅要求女性主义者在生产多元历史时有“积极的规划”,还要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自省性质疑,这种质疑当然应该包括,但是绝不应该仅局限于后结构主义的质疑。

当然,提倡多元的女性主义历史也面临着多元主义的危险,可能会模糊高校内外的权力结构。这些权力结构,在女性主义的美妙新世界中,将一些历史建构为比其他历史“更为平等”。“多元主义,”琳达·戈登警告道,“永远不仅仅是对变化的一种承认,而是对不平等的一种伪装。”(“Review”858)哪些女性主义的历史变为了正典?哪些湮没无闻?哪些故事被媒体挑选出来加以传播?哪些被它们忽略?谁是故事的讲述者而她/他的立场如何?

然而,尽管有多元主义的危险,我相信,在女性主义编史工作的积极参与模式和自省模式之间进行协商,这有助于女性主义参与建构多元的历史,认识到任何一种单一的历史都无法覆盖真相的全部范围,并反思我们自身的干预过程。我在上文中为两种立场做了辩护,它们太经常地被视为相互排斥的对立之物:需要通过将历史书写当作一种政

治行为来创造历史；和质疑这种创造历史行为的需要，以期避免产生宏大叙事，再现胜利者的整体化历史并湮没失败者的故事。与其两者选其一，我提倡两者兼俱：积极参与的行为与自省的行为相互补充，并进行创造性的协商。对（多元的）女性主义进行的（多元的）女性主义历史书写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协商行动与反思之间、现实与其文本化之间的相互嬉戏。





## 第九章

### 渴望故事： 女性主义理论与诗学实践中的 叙事与诗歌

叙事是知识得以被组织的途径之一。我以前一直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传达和接受知识的途径。现在我对这一点不再这么确定了——但是，对叙事的渴望从未减弱过。现在对它的渴望仍与过去在西奈山、加略山和大沼泽的中心地带对它的渴望同样强烈。

——托尼·莫里森，《记忆、创造与写作》

现在的作家们不得不在（现代的）这种怀疑与冲突的氛围中进行创造。而诗歌的纤细纤维不适合承载这种观点，就像一片玫瑰花瓣无法包裹住巨大的粗犷岩石一样。……有可能散文将会接管——事实上，已经接管——诗歌过去所承担的一些职责。

——弗吉尼亚·伍尔夫，《艺术的狭窄桥梁》

叙事的必需性——事实上是对叙事的渴望——在上述引文中显而易见。与之产生共鸣的是罗伯特·卡斯瑞欧和彼得·布鲁克斯等叙事

理论家的作品。这两位理论家均认为，叙事是理解现实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模式。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对叙事的强调与一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并不合拍，例如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伊莲娜·西苏以及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人。这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暗示过，他们松散地称之为“诗歌”的事物是现代性干扰象征秩序的急先锋。另一方面，他们经常将叙事（而且经常是小说或散文）与一种退步的表征主义或模仿联系起来，换言之，与象征秩序的专制霸权联系起来。尤其对许多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者而言，抒情诗的模式和诗歌（尤其是先锋派诗歌），与被压制的女性本原、母亲和前俄狄浦斯情节联系在一起，而叙事和小说（尤其是模仿现实小说），则与压制性的男性本原、父系和俄狄浦斯情节联系在一起。这些后结构主义者并非主张废除叙事。相反，问题在于，对许多人而言，革命性的诗歌需要对叙事进行越界干扰。叙事或许是必不可少、不可避免，但它的话语模式需要被抵制。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诗歌对象征秩序的越界上。杰伊·克莱顿注意到在许多有色人种的小说家中出现了大范围的“叙事转向”，这一现象挑战了认为后现代就意味着摒弃叙事这一知识途径的流行看法（“The Narrative Turn”）。我想带着这一洞见，回过头来分析后结构主义推崇诗歌的问题。这种对叙事的渴求，与一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叙事的拒绝，形成一种分歧，它暗示了人种与族群问题上存在一个盲点，这个盲点令我们接受叙事是一种专制模式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并将它扩展为普适性的观点。在那些口头传统仍然充满活力的文化中，作家们更可能将叙事看作是止饥的食物，而不是需要抵制的暴君。正如莱斯利·马蒙·史尔戈在他自传性质的散文/诗歌《讲故事的人》中所写到的：

讲故事的人保存着故事

## 所有关于逃脱的故事

她说“有了我们的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脱逃几乎所有的事情，  
有了这些故事我们将得以幸存。”

(247)<sup>1</sup>

此外，在书面文学已经超过口头文学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文化中，一些作家也表现出“叙事转向”。这一点在许多有色人种作家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在其既是诗歌又是散文和随笔的文章《风雨交加夜》中，厄休拉·莱金声称，讲故事满足了对记忆、见证与生存的需要。她将叙事与安慰和幸存联系起来，这么写道，“给我讲个故事，姑婆，/这样我才能睡着。/给我讲个故事，山鲁佐德，/这样你才能活下去。”（188）她还在引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里莫·莱维的话时，强调故事具有“见证”的功用：“人即使在这里也能幸存。因而人必须想要幸存，想要讲故事，想要见证。”（193）莱金通过调用口头传统来为叙事辩护，而玛乔瑞·博洛夫则在《才智之舞》中声称，后现代主义将先前在现代主义对诗歌的推崇中受到压制的散文和叙事的元素带回了诗歌之中。<sup>2</sup>不过，博洛夫急切地接着说道，在后现代诗歌中，这种“故事的回归”并不意味着线性情节的回归。但是，这种常常零星片断的、拼凑画一般的叙事，揭露了诗歌的综合体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并解构了现代主义将诗歌与日常生活，永恒的诗歌时刻与历史时刻分割开来的做法。

对于这些有关叙事的争论，我想再加上这一假设：对叙事的需求还反映了立场与边缘化的问题。存在着一种历史上产生的文化冲动，它创造了对叙事的需求，用之去抵制或颠覆主导文化讲述的故事。对立的、越界的话语常常将叙事当作抵抗策略之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在他们自己看来，并不“边缘”，亦非“他者”。但是为了对抗主流社会生产出的反映他们的他异性的叙事，他们必须讲述一些其他的故

230

事,来描绘他们被排斥的状态,肯定自身的能动性(不论这种能动性是否与主流文化共谋,或者受到多大的局限),并持续地(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莫里森对美国黑人叙事所做的辩护,在更广的层面上,定义了许多其他群体也具有“对叙事的渴求”：“我们是我们自己的叙事的主题,是我们自身经验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而且,这一点绝非偶然,我们还见证和参与了我们与之相接触的那些人的经验。事实上,我们并非‘他者’。我们提供了多种选择。”(“Unspeakable Things” 9)在口头传统已经成为模糊记忆的高度文化发达地区,对于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叙事能代表“多种选择”,代表对“他者”的主体性的坚持。

我拟从以下方面来验证这一假设。首先,检验后结构主义将诗歌凌驾于叙事之上的做法;其次,检验当代长诗中的女性诗歌实践。20世纪的长诗继承了古代史诗传统,以及威廉·华兹华斯和沃尔特·惠特曼开创的自传体长诗的传统。它一直被认为是男性诗人的重要文类——从现代主义者到“自白派”再到后现代主义者,情况均是如此。<sup>3</sup>相比之下,在当前的女性主义潮流出现之前,女性诗人写作的史诗和长诗相对较为少见,在诗歌世界里取得一定地位的女性所写作的长诗就更为少见。在本世纪的前五十年,H.D.、米娜·罗伊、格特鲁德·斯泰因、格温多琳·布鲁克斯是20世纪女性长诗的主要拓荒者。<sup>4</sup>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股显著的女性诗人出版系列诗歌和长诗的热潮。女性和男性诗人所作的20世纪长诗,通过诗歌的系列化、片断化和并置,不论在多大程度上打破了叙事体诗歌的传统,叙事仍然一直是长诗的核心要素。我拟说明,女性长诗中,叙事与诗歌之间的辩证嬉戏源自对叙事的需求,产生这种需求的基础是排挤女性的西方传统,女性被剥夺了主体性地位和对神话与历史的话语权。其结果,我相信,是对叙事传统的一种改写,而不是将叙事与象征秩序的专制权力大而化之地联系在一起的做法。

## 对诗歌的越界功用的推崇

尽管解构主义抵制二元对立,但一些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仍然沿袭了早就存在的且相互重叠的一些二元对立:叙事与诗歌、小说与诗歌、散文与诗歌,表征主义与非表征主义、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人文主义与现代性。这样的二元对立常常以非历史术语的身份出现,不考虑历史上产生的模式、文类和话语之间存在的历时和共时的变化。此外,它们还会不准确地在模式(诗歌,叙事)和文类(抒情诗,小说)之间滑动,或者在更广泛的话语(诗歌,散文)与较具体的话语(诗,小说)之间滑动。在这些程式中相对比较稳定的就是二元对立的不可避免性,其中诗/诗歌/非模仿艺术持续地干扰叙事/小说/模仿艺术。尽管存在对过程——文本实践的运动——的强调,语言所具有的革命性潜力却被静态地固定在这种诗歌对叙事的越界场所之中。 231

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固定性扎根于结构主义,其连续性可从罗兰·巴特作品的演变中看到端倪。例如,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巴特写道,“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相互差别之大,足以省去表征它们差异的符号。”(43)“现代诗歌中没有人文主义,”他接着说道。作为现代性的场所,“(现代诗歌的)这个挺立的话语充满了恐惧,换言之,它不是将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散文的主题),而是将人与自然中最无人性的意象联系起来:天堂、地狱、神圣、童年、疯狂、纯物质等等。”(50)

在《神话学》(1957)中,巴特将“神话”定义为“一种表意模式”,一种与“表意意识”,历史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言语类型”(109—111)。他将诗歌,尤其是当代诗歌,树立为与神话相对的话语。因为神话具有胁迫性,巴特理论总结道,“诗歌占据了与神话相对的立场。”(158)作为“有动机的”言语,“神话具有一种强制性的、强迫人聆听的性质……我受制于它蓄意产生的力量。”(124)作为“质询言语”,神话召唤主体性并占据它。巴特用修辞耸人听闻地描绘了“我”与神

话的战斗：“因而要想从内部战胜神话是极端困难的：因为我为了逃离它的束缚所做的努力本身，反过来变成了神话的猎物：神话总是能够，作为最后的一招，指涉针对自己的抵抗。”（135）“革命的语言本身，”他提醒左派，“不可能是神话的。”（146）诗歌，他总结道，有助于他寻找“抵抗神话的最佳武器”（135）。<sup>5</sup>

在《诗歌语言的革命》（1974）中，克里斯蒂娃也许没有巴特那么危言耸听，但她呼吁逾越象征秩序的“革命性”丝毫不逊于巴特。在她看来，叙事和诗歌是所有话语的不可避免的方面，总是在场，但在其显著性上会有较大的变化。她将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符号学融合在一起，认为文本是一个“表意实践”，其中语言的两种形态——符号和象征（或克里斯蒂娃所说的“独断”）——参与辩证的相互嬉戏。她将诗歌、女性和前俄狄浦斯与符号联系起来，将叙事、男性和俄狄浦斯与象征（或独断）联系起来（23—30）。诗歌倾向于强调符号；散文则倾向于强调象征。现代性的革命潜力，她相信，尤其存在于先锋派的作家中，他们对语言的符号区域的实验，具有打破象征秩序和“父亲之法则”的希望。<sup>6</sup>

- 232 《诗歌语言的革命》相当详细地发展了这种辩证的符号学。它的一系列章节相互联接了文本实践、主体性、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结构、（男性）先锋派作家、和符号的革命潜力。与“诗歌语言”（以及“现代诗歌语言”和“诗歌实践”）相对，克里斯蒂娃将叙事，“不论其是戏剧的还是小说的，”与“逼真性”和“经典模仿”，与“外延”和“内涵”，与“科学体系和一神论宗教”，与“政治和社会所指”联系起来（58—59，88）。叙事文类——在这种文类中独断/象征的表意功能占主导地位——包括“神话叙事、史诗、史诗的剧本、甚至小说（包括小说的舞台及影视改写）、新闻报道、报纸专栏其他的新闻体文类……传说、传奇故事、神话、谜语、习语、案例、回忆录、故事、笑话。”（92）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按俄狄浦斯建构的家庭结构充当了“社会有机体”的基础，亦是“我”或者这

一称呼所指涉的“作者”的基础(90—93)。作为文本的独断功能,叙事是“家庭中父亲角色的一种投射。”(91)在《恐怖的力量》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说道,“总而言之,叙事是最为繁复的一种努力,由言说的主体做出,取决于其句法能力,目的是将其自我定位于自身的欲望与欲望的禁忌之中,也即定位于俄狄浦斯三角的内部”(165)。

克里斯蒂娃在将叙事与俄狄浦斯情结联系起来的同时,也相对地将诗歌实践和前俄狄浦斯与“容器”,即母亲的身体,联系起来。诗歌语言放纵了符号对象征秩序的越界,发起了一种“对象征的破坏”(62—63)。符号本身不能自成天地,相反,它存在于象征之内,与之处于永远的对立状态:“尽管绝对必需,独断并不是排他性的:符号不仅先于它出现,还经常将它撕裂。”(62)作为革命性的语言实践的急先锋,“诗歌是‘容器’对文化打响的游击战争,”卡尔文·白丁特在总结克里斯蒂娃的革命诗学时如是说道(“Kristeva and Poetry” 809)。<sup>7</sup>

在《美杜莎的笑声》(1975)中,西苏点明了克里斯蒂娃的程式中隐含的内容:即,这些二元对立,通过女性书写,与女性本原和女性的压制与解放联系起来。“只有诗人——而非小说家,后者是表征主义的盟友,”她写道,能够举起“反对理性的武器”并“打破父亲之法则”;因为“诗歌需要从无意识中汲取力量,还因为无意识,那个另外的无垠疆域,是被压制者,女性,设法生存下去的地方。”(250)西苏早期论乔伊斯的作品《乔伊斯的流放》以及她近来论巴西小说家克莱瑞斯·里斯佩克托尔的作品暗示,她在文章中所提倡的那种女性书写,正是她在这些作家的先锋派小说里找到的东西。西苏反对的并不是小说本身,而是小说与表征主义之间的联系,在她看来表征主义还与叙事联系在一起。乔伊斯和里斯佩克托尔的小说之所以引她赞赏,正在于其中的诗歌对叙事的抵制。

巴特、克里斯蒂娃和西苏都以各种方式将叙事和小说,与压制性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而诗歌则具有潜力来扰乱这种社会秩序。他们对 233

叙事的抵制在许多后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中找到了共鸣。例如，里奥·伯萨尼在《阿斯蒂阿纳克斯的未来》（1984）中声称，叙事在本质上是专制的，通过它与模仿的联系而与国家为盟，并永远受到难以驾驭的欲望的干扰。特瑞莎·德·劳拉提斯代表了一种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叙事的批评。她在《艾丽斯不》中提出，叙事与俄狄浦斯欲望结构密不可分，在这种结构中主体性被建构为阳性。其他的许多女性主义评论家一直关注前俄狄浦斯和/或诗歌，将之看作一个已经或者潜在地对俄狄浦斯叙事模式进行干扰的场所。<sup>8</sup>在这儿，我还要加上我自己的文章《诗歌对叙事的颠覆》。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女性写作中的叙事与诗歌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冲突性，并暗地里将诗歌拔高为更具颠覆性的模式。

《佩内洛普的网：性别、现代性、H.D. 的小说》一书的写作，令我重新思考了我自己对叙事以及对大多数后结构主义理论的抵制。在该书中，我声称 H.D. 为了超越伤感主义的女诗人的文化叙事，而在印象派时期形成了革新性的诗歌话语，刻意地避免带有个人色彩，并在表面上淡化了性别的痕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开始写作实验性的叙事小说，预见后来的女性书写。而她如此转变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令自己能够自我呈现为女性，在文本中明确地体现出性别的影响。叙事——因其对表征主义的坚持以及将主体性定位于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的做法——对这种实验话语而言必不可少。她的早期诗歌否认故事，而如今，叙事使得她得以铭刻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及自我参与社会秩序形成身份的过程。这些诗体散文中的叙事性自我建构，使得 H.D. 能够在她的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史诗和长诗中，将叙事体与诗歌体协调并用。在她的散文以及后期的诗歌中，叙事与诗歌是盟友，而非敌人——是不同声音的嬉戏，而非战争。

考虑到后结构主义将诗歌推崇为一种颠覆场所的做法，这种叙事转向的含义，在目前女性主义理论的有关身份政治的论辩中，有其必然的影响。一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例如艾丽斯·贾丁和佩吉·卡慕



夫,在笛卡儿的哲学主体的死亡和现代性对“身份”的扩散中,看到了女性主义政治的巨大潜力。但是其他人,如南茜·米勒,却认为,对于那些被社会秩序剥夺了主体地位的人而言,现在就擦除他们的身份问题还为时尚早。“只有那些拥有它(主体地位)的人才能够假装没有它。”( *Subject to Change* 52 )

我相信,对于那些被主导社会秩序剥夺了故事讲述者的权威声音与地位的人而言,要摒弃叙事同样为时尚早。后结构主义需要打破叙事所建构起来的“意义”与“连贯性”,这种需要可能起源于传统上控制读写意义的产生的那些享有特权的人。后结构主义抨击叙事的表征主义及其对“现实”经验的模仿指涉,这种抨击会具有以下的潜在危险性:它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在文化上擦除那些来自富含叙事传统的被边缘化文化的作者——如史尔戈和莫里森。此外,对于任何在霸权历史话语中缺席或被其边缘化的群体中的作家而言,否认叙事所具有的激进潜力就会,套用米勒的句子,“过早地结束了关于她们的能动性问题的讨论。”( *Subject to Change* 106 )

234

在为叙事辩护之后,我又急于加上一句:正如“身份”在女性书写中常常经历修正改造一样,叙事也同样经常要面临多种形式的解构和重构。例如,许多女性作家已经抵制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所称的“以普遍接受的方式实施的……情节的专制”(154,着重字体为笔者所加)——也即,在叙事中再现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的传统。第二,正如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在《终点之后的写作》中所展示的,女性作家常常重新配置传统的叙事模式,以便讲述一些文学传统上鲜有的故事,一些适合于历史上产生的,反映女性经验和梦想的叙事的故事。第三,其文化依赖于鲜活的口头传统的女性作家,将口头与书面的叙事传统编织在一起,从而已经革新了文字的叙事。最终,正如莫里森在《记忆、创造与写作》中所暗示的,“叙事仍然不嫌多,而且永远也不嫌多,就像画在帆布或岩洞墙壁上的物体永远不是单纯的模仿一样。”

(388)她声称,叙事并不排除其他模式的了解知识的途径——事实上它积极地要求其他模式的途径,例如比喻的、视觉的、音乐的和动觉的模式。我们可以在她提到的非叙事模式中辨认出诗歌的领域,甚至还能辨认出克里斯蒂娃将之等同于符号、“容器”、母亲的身体的那个语言领域。许多女性作家已经参与进来,站在修正的立场来重新建构叙事,在叙事和诗歌之间进行协作性的对话。

## 对历史和神话话语的主张

当代女性长诗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测试场地,来检测叙事和诗歌在女性书写中的关系。乍看来,两种文类的传统以及20世纪的诗歌实践都暗示,女性作家会轻易地中止叙事并强调诗歌话语。构成当代长诗的写作与阅读背景的文类包括史诗,史诗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女性在社团里占据诗人的角色。因而有人或许会认为,女性有充分的理由抵制史诗叙事的传统,因为在这种传统内女性常常被剥夺主体性,沦为男性征服的缪斯、战利品、动机,或者理想化的象征符号。<sup>9</sup>

此外,影响广泛的20世纪长诗,如庞德的《诗章》、T.S.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裴特森》和哈特·克莱恩的《大桥》,在并置诗歌序列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各样的结构模式打破了史诗的叙事传统。正如玛格丽特·迪奇指出的,“传统上这些公共长诗靠叙事或议论得以发展,而现代主义者对这两种模式的表达方法均无热情。他们想用意象、象征、片断的翻译、狂喜的肯定等模式来  
235 开始他们的长诗。简言之,他们把长诗当作延长了的抒情诗来写作。”( *Modernist Long Poem* 11 ) M.L. 罗森塔尔和萨利·M. 高尔进一步论证,现代诗状序列(他们用这一术语来指称其所推崇的那一类长诗)“通常包括叙事和戏剧的元素,还有推理的元素,但其结构最终还是诗歌的”并“日渐从叙事和主题的框架中解放出来。”( *Poetic Sequence* 9, 11 )

还有的评论家强调,我们仍然可以期待在现代长诗中看到史诗等的元素(见邓波、迈克尔·伯恩斯坦、詹姆斯·米勒)。因此,他们发现叙事至少隐蔽地在场,经常以内部探索叙事的形式出现,构成诗歌并置的基础。但是无论评论家的观点多么互不相同,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对诗歌的强调和对叙事的压制是20世纪长诗的一个持续的特点。<sup>10</sup>这一特点始创于克里斯蒂娃所赞许的那些先锋派实践,并因此要求我们在解读女性长诗时,要考虑到后结构主义将诗歌当作一种越界话语的关联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女性诗人发表的数十首长诗,当然肯定了对形成于史诗的传统之内的叙事的广泛抵制,并经常依赖于诗歌并置和排序作为其结构方法。但是,这些长诗中叙事的积极而频繁的在场,也同样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个传统上经常将女性的主体性遏制为他异性形式的文类里,叙事成为肯定女性身份和能动性的工程的一部分。在这些长诗中,叙事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为了能认识到这些形式,我们需要理解最广泛意义上的叙事文类。<sup>11</sup>有时,叙事的表现形式很直接——诗人讲述一个故事,即发生在可辨识的时间与空间的坐标内的一系列事件。有时,叙事的维度并不直接——读者从通常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诗歌序列中(重新)建构出一个隐蔽的故事。还有时,叙事含糊地游离于长诗和诗歌集(包含数首独立但相互关联的诗歌)之间,用一种组织原则来暗示从一个小节或一首诗发展到下一小节或下一首诗的进展。

不论叙事人是诗人还是读者,这些叙事的功用既可以是模仿也可以是非模仿性的,既可以大量借鉴也可以中断传统的叙事形式。在所有的情况下,叙事,借用托尼·莫里森的话,“不嫌多。”叙事与诗歌(以及相关的配对术语:散文与诗歌、故事与比喻、模仿与非表征、象征与符号)辩证共存——有时相互支持,有时相互冲突,有时既合作又对立,有时是多种声音的同时嬉戏,有时则分成截然不同的散文与诗歌的两部

分。叙事与诗歌，不论它们的协作具有怎样的变化形式和动力，准确说来不是一组固定不变的二元对立。我们不能将诗歌（总是）看作革命的力量，逾越叙事的（内在）专制。相反，它们的共存是协作性地交换一些迥然有别，但相互依存的话语。

整体说来，叙事在当代女性长诗中在两个主要的方面起作用：一、它代表了对历史话语的主张；二、它代表了对神话话语的主张。<sup>12</sup> 正如 236 希腊语中历史和神话一词的词根<sup>13</sup> 所显示的，历史与神话一开始并不是两极对立——一个讲述事实，另一个讲述虚构的故事。而且，这两个术语都与叙事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与那种和史诗传统联系起来的叙事密不可分。作为故事，历史和神话都是人类了解知识的形式，它们讲述跨越时间与空间（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时间与空间）的运动（不论这种运动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不论是分开还是合在一起，历史和神话都已经为西方的史诗提供了最主要的模式。

男性诗人写作的长诗常常使用历史和神话的话语，<sup>14</sup> 但是女性在其当代长诗中对这些话语的主张受到一个因素的影响：她们在过去被主要排斥在这些话语之外，近年来无数的女性主义学者指出了这种排斥并力图扭转它。当然，女性一直有其历史，但是只有在最近几年，因为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才开始以一种系统、持续和累积的方式叙事其历史——这个学科领域现在被模糊地称作“女性历史”。它既包含女性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也包含讲述这些故事的这个学科，在这个学科中女性是先锋的、主导的（但不是惟一的）声音。高校中“女性历史”的发展，与当代女性长诗中对历史话语的重新主张平行发展。驱使它们的是同样的原因：坚信女性生活在主导历史话语中遭到了系统的擦除或轻视；坚持女性必须参与历史构建，这样女性的故事以及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女性才将不会被湮没或遗忘。

在许多文化中，女性被排斥于神话之外的事实与宗教的权威密切相关，男性系统地宣称宗教权威是其男子特性的一个内在功能。女性

一直以某种方式,积极地参与本文化中的宗教。但是社团内的神圣权威的位置,在西方的传统中,一直由男性占据(只有少数例外),这至少部分是由于父权制压制母性的神,以及恐女症的观点,认为女性的身体受到了污染——既是崇拜也是畏惧的对象,既是欲望也是憎恶的对象。<sup>15</sup> 女性主义神学的发展,以及近年来要求将宗教领导人的职位向女性敞开的运动的进展,与当代女性长诗对神话话语的重新主张平行发展。驱使它们的是同样的理由:相信女子特性一直遭到贬低或压制;坚持认为女性需要经历和叙事神圣之物。

德里达对历史和神话的解构——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解构,以及对“现实”和指涉性的解构——是大多数的后结构主义对叙事的抵制和对诗歌的推崇背后的基础。但对于那些被排斥于历史和神话的话语之外的人而言,这些解构,在没有相应的重构的情况下,具有退步的潜在可能,令她们在历史的领域中保持缄默,而缄默已经是她们的历史关系结构的一个基本情况。德里达的延异——能指在不指涉所指的情况下的无尽嬉戏,指涉本身的无尽延迟——在解构文本再现时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但是就其概念本身而言,作为一个终点,它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那些依赖于对自身历史进行重构才能生存的人,这些人需要通过语言对其自身的“现实”经历进行重新主张。拉康的快感概念——无法再现的神秘/性愉悦——也同样引人联想起无法讲述、无法言说的启示性时刻。但是,对于那些需要(重新)主张宗教权威以便讲述其被挪用、抄袭或擦除的神圣故事的人而言,快感,作为目的论的乌托邦,并不足够。神话和历史对“现实”话语和神圣话语的主张都要求叙事——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需要抵制的知识途径,而是作为一种赋权的方式。

对(历史和神话的)叙事话语的这种超定功用的关注暗示了三个广泛的范畴,我们可以在其中解读当代女性长诗中的诗歌与叙事的相互嬉戏。第一类长诗是主张历史话语的长诗,不论其主张的历史是个

人的还是社会的,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或者两者兼具的。第二种类型是对神话话语的主张,不论它涉及的是对神话创造过程的修正,还是崭新的创造形式。第三种类型的长诗拒绝历史与神话的二元对立,从而建构起一种现实话语与神圣话语的交融或混合。这些范畴并非固定不变或刻意而为的类型,相反,它们是有用的描述项,方便我们探讨这些诗歌中的叙事话语的存在与功用。<sup>16</sup>

## 艾琳娜·柯蕾普费兹的《记账者》

为了举例,我拟讨论一首诗中的叙事和诗歌的对话协作关系,它对历史和神话的话语都进行了有力的主张:艾琳娜·柯蕾普费兹的《记账者》(1982)。这首长诗分四个部分,由截然分开的诗歌部分和诗状序列部分组合而成,将它们连贯起来的是诗人在离散(具体而言,即在反犹太屠杀之后的世界中的流放)中的幸存努力。<sup>17</sup>叙事和诗歌、散文和诗文、模仿和寓言、历史和宗教结合在话语形成的马赛克中。这些不同的组成成分对话地合作,共同来铭刻诗人的主体性。为了呼应克里斯蒂娃的“过程中的主体”(Revolution 37),该诗的文本实践建构了一个绝对处于过程和审判之中的主体——这个主体深陷于找回被遗忘历史(在波兰度过的童年时光)的过程之中;在反犹太屠杀中因为身为犹太人而受到审判,又通过“冒充”波兰小孩而得以幸存下来;如今她必须得重新找回她的犹太遗产和身份。

第一部分《从猴房和其他笼子》是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叙事诗,其中,两只雌猴在一个佚名动物园的永恒空间中讲述其囚禁期间的故事:第一只雌猴孩提时被迫与母亲分开,长大后被迫性交,之后又被迫与其孩子分开;第二只是一只孤单的猴子,短暂地受到一只反叛猴子的到来与死亡的触动。第二部分《不同的囚禁》的题目来自第一部分的最后一行诗(24)。第二部分包含三首诗。诗人讲述了她被单调乏味的办事员

工作所囚禁的故事,以及她对自由的梦想:“它是个故事,我告诉自己,至少/是个故事。”(31)第三部分《城市花朵》包含了八首诗,它们的中心是诗人在现代美国城市生活的“不友好的土壤”中种植花卉的努力:“它是神话的材料/旧的和新的……现在/我们必须萌发出橙色的花朵/带着我们囚禁状态的野蛮色调。”(56, 49, 57)第四部分《不友好的土壤》包含了三个长长的诗状序列。它们从诗人现在的纽约切里希尔的城市生活的启发式视角,转移到战前、战时与战后不久的波兰,去讲述诗人亲友的俘虏、死亡、逃跑和幸存的故事。该诗因而是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在时间上倒回从前,从一种囚禁转入另一种囚禁。它重复的节奏是从俘虏到自由、从绝育到再生、从死亡到幸存的叙事运动以及这些意象的交迭连锁。

《记账者》在其分开的两部分和总体的规划上都有很强的叙事动力,这种动力主张了历史、神话和宗教的话语。其中的许多首诗讲述或包含有强大的故事。第一部分中的猴子叙事者讲述了引人入胜的亲昵、分离、失去、反叛和死亡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预示了诗人在第四部分中(重新)讲述的她童年时发生的事情:她父亲在华沙犹太区起义中的死亡;母亲与女儿的分离,女儿先被留在一个天主教孤儿院,随后被送给一位波兰农民;母亲在林中为了独自生存下来进行的挣扎;她的朋友艾尔莎的逃亡,被美国人收养及最终的自杀;她姑姑的“冒充非犹太人身份”的举动,这样她才能帮助犹太区的犹太人,以及她在临终前勇敢地宣称其犹太身份的行为。

这些故事(以及其他的故事——办公室的工作、梦想、和园艺)连贯成为该诗的更大的叙事规划:对被遗忘的过去的重拾、对囚禁的逃离、对犹太身份和命运的重新主张。诗人在她的最后一首诗——致她姑姑的挽诗——中写道:“历史这么繁杂 看似/一个布满缺口的不在场至多也只是一种阴影/渴望 某种更大的/定义 它却从未到来。”(90)作为诗人兼史学工作者,柯蕾普费兹试图填补这一缺口,去找出

“被遗忘、被忽略的历史的……”（63）在做园艺的时候，她想到，“在土中……埋藏着的历史 / 无可挽回。”（95）但是她的诗——该诗的写作时间长达六年（1976—1982）——逐渐挽回了无可挽回之事，言说了反犹太屠杀及其余波的无可言说的历史。

这种被压制历史的回归既缓慢又痛苦，通过艰难的纪律才得以完成。它始于对寓言的间接置换：笼中囚禁的猴子的故事，动物像女人一样地言说和感受，并预兆了那些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的女人。其中存在着大屠杀故事的元素——囚禁、母女的分离、所爱之人的死亡——但是这个动物园的故事尚未触发有关波兰的记忆。诗人必须首先在第二部分中通过审视自己的文书工作的生活，来理解她与猴子的联系，随后开启了再生的间接过程，在第三部分中寻找坚定的都市花朵。第四部分第一首诗中记录的她在切里希尔的园艺工作和她母亲的来访（《管窥外界》）使得痛苦的童年记忆首次浮出水面。这之后紧接着是下一首诗《命中注定》（*Bashert*）中的一连串事件。这一标题在意第绪语中表示“不可避免、命中注定”，点明了诗人被困于历史之中的状态，以及她希望通过接受自身的犹太身份而得到自由的要求。她再不用为了生存而否认自己的身份，虽然她和艾尔莎以前在波兰曾被迫这么做过。现在，她能接受自己命中注定的命运，这一命运与其姑姑吉娜的死亡和勇气都紧紧相联，她在最后一首诗《孤独的行为》中对此作了颂扬。“历史，”她写道，“不断展开，并要求回应。”（81）她的诗就是那种回应，它令她得以逐渐地面对过去，那个已经被她和现在的时间遗忘的过去。因此，这首长诗的更大层面的叙事具有治疗效果。

对这一治疗过程作出贡献的还有神话和宗教的叙事，它们渗透进历史的叙事之中。《记账者》强调了犹太教，作为一个宗教，与历史的深厚联系。<sup>18</sup>《圣经》，尤其是《律法》，讲述了犹太人与上帝有关的历史。虽然没有明确的用典，但《圣经》引发的共振回荡在柯蕾普费兹的“历史”之中。伊甸园——及对欲望、驱逐和流放的叙事——存在于该诗的



城市与乡间的花园中,成为一个失乐园的意象,并且在诗人的孤独的劳作中得以不完美地恢复。“我一直是个梦想家……梦想着 / 一个完美的花园,”诗人在最后一首诗中如是深思(96)。逃离奴役来到希望之乡的出埃及记的故事,主导了该诗在囚禁与自由之间的摇摆。离散的位移自始至终呼应着诗人的无根状态。上帝要求用以撒献祭的旨意和约伯的问题,对应了诗人的有关损失和不公正的故事。先知们的孤独的纪律、富有远见的视野和道德热情,加强了诗人对现代图景的严厉刻画。诗人的政治历史令人联想起一些先知,尤其是阿摩司和以赛亚,对压迫的谴责和对自由的呼吁。在该诗的结尾处,诗人在历史的“致命伤”面前保留了存在主义的希望——“我需要希望。而且这么做了。”(95)诗人用世俗的话语重复了古代希伯来人上帝与他们的特别约定的信仰,这种信仰支撑着他们渡过了那许多次的流放。最后一点,该诗完成了卡迪什的仪式,即为死者的祈祷,这是幸存下来的人们应尽的义务。

柯蕾普费兹对历史话语和神话话语的主张,并不妨碍该诗具有强烈的诗性,甚至符号的特点。克里斯蒂娃认为叙事与诗歌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并进行越界的嬉戏。与她的观点截然不同,该诗成为包含各种划线、措词、语气、重复、节奏和诗节构造的一个马赛克,其中的各部分流动地相互协作而不是相互干扰。该诗的叙事模式并不是与象征秩序为伍;相反,它采纳了诗歌与散文的形式来构建神话和历史的的话语,它们打破了社会秩序对反犹大屠杀的沉默。从多样的形式中,浮现出诗人对过去的重拾和在现在的幸存,其中每种形式都是必不可少地服务于该诗的主题。

例如,《工作十四行诗及便条和独白》是第二部分的核心诗。这一部分讲述诗人的文书工作,它是一种窒息梦想的囚禁。这个囚禁 / 逃离的主题出现在多重的话语中。它们被分隔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诗歌”的形式,第二部分是简短便条的形式,第三部分则是一段“散文”独白,讲述的是一段对话。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工作十四行诗》。它交替

使用了多种话语,可以充当一个有用的例子,说明叙事和诗歌模式是如何在柯蕾普费兹的文本中协作的。《工作十四行诗》是一个高度系统化的诗状序列,包含9节,每节15行(第8节例外)。第1、4、7和9节的诗行很短,是高度抒情性的诗歌,聚焦于与诗人的主体性相关的一系列物品:冰山、火山、岩石和灰尘。重复是统一全文的手段,每一节均以相同的方式开头和结尾。例如,“冰山/我梦见 渴望/流动”(33)开始了第1节,随后的第四节开头则是“火山/我梦见 渴望/爆发。”(35)每一节均以“而且天亮了”的诗行结束。与它们形成对比,第2、3、5、6和8小节则是模仿性的散文,类似于日记的条目,记录了诗人在办公室里日复一日的活动与感受。每一节以总结这一天开始。例如,第2节的开始几行是“今天是新的一天。首先我打出了一些/必须寄走的信件。接着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复印”,而随后第3节的开头则是“今天我感觉很糟。复印机/完全坏掉 而且那个接待员/毫不妥协。”(34)意象话语和散文话语相互对话,但它们的对立是合作而不是冲突。这些模仿性的诗节将诗歌小节中的意象扎根于历史之中;而诗歌小节则将呈现的场景从单纯的物质场景中解放出来。每种话语都贡献了对方缺乏的维度。

《从猴房和其他笼子》(第一部分)和《命中注定》(第四部分的核心诗)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配对话语,它们对话地合作,讲述囚禁的故事。猴子一和猴子二的对白用意象的、省略的、充满空格的诗行讲述故事,这些诗行关注感觉、色彩和建立在头韵、句法平行和节奏韵律基础上的声音模式。克里斯蒂娃将这些元素与符号、“容器”和对母亲身体的欲望的语言残留联系在一起。例如,猴子一的独白一开始是一种前俄狄浦斯式的喜悦,这种喜悦仅仅因为囚禁的不育而被打破:

从一开始  
她就总是干渴 尽管

她会紧紧挤压我  
撬开我的唇：

水温暖  
水果 酸的 棕色  
苹果伤痕累累且松软。

渴望天黑 我会坐着  
并等待 吞食梦想  
关于无遮无掩的日光和天空

巨大的树叶 树干 黑暗  
且潮湿带着甜甜浓浓的汁液。

(5)

在叙事了分离、性交、生育和分离的生命周期之后，她的独白结束于对那种业已失去的母女交融的回忆。结尾的话语重复了孩子在母亲的臂弯里的摇晃：

而且我能清楚地看见  
天空 铁栏  
当时我们坐在一起  
在一块太阳地里  
而她 双眼紧闭  
摇着我  
摇着我  
按着水声的节奏

241

水滴落  
在小小的 石头池子中  
在外面。

(15)

这些诗节既阐明也表演了克里斯蒂娃式的符号态——它们不是对叙事的越界，而是强调了失去和渴望的故事。

《从猴房和其他笼子》是诗人在《命中注定》中的散文诗节的一个移置的诗歌版本。在两段（分别献给逝者和生者的）祈祷诗的开场白之后，《命中注定》的第一段散文序列（《波兰，1944：我母亲走在路上》）开始了又一个分离的故事，它将猴子一的诗歌独白扎根在了真实历史的就事论事的话语中：

我母亲走在路上。在波兰的某地。前往某个佚名的小镇寻求某种许可证。她带着她的雅利安身份证。她刚把我留在一位老农民家里，那人愿意让我冒充她的孙女。

她走在路上。她因为把我留下，冒着分离之险而感受到的惊恐，现在都已被咽下，和所有其他的感觉一样。

(77)

和在《工作十四行诗》中一样，此处的诗行并没有中止新闻记事。相反，两种话语共同作用，解构了动物与人类、囚禁与自由、分离与团聚的二元对立，为诗人的命中注定之事打下基础，使她能够在《命中注定》的最后一段这么宣称：“我不躲避这个遗产。我宣称它是我的。”（86）

从头至尾在《记账者》中柯蕾普费兹一直使用空格，这些空格展示了该诗在符号和象征话语之间进行协作对话的另一种方式。这些空格

一方面充当了语法停顿的句法标志物(象征态的功用),另一方面充当了抵制作为表意体系的语言的空间(符号态),并在两者之间不易察觉地移动。换言之,一些空格标志了语法的单位,而另外一些则充当了一种停顿,表现了诗人在试图言说大屠杀的不可言状的痛苦和渴望时的犹豫。这种符号的省略和象征的句法之间的相互嬉戏并非是一组固定不定的对立,而是一种流动的混合体。它既阐明也表演了该诗的双重话语。在《孤独的行为》的第二个诗状序列中,诗人为吉娜·柯蕾普费兹所做的卡迪什祈祷,展示了分别表示暂停或犹豫的空格是如何相互加强而不是相互抵制的。

历史这么繁杂 看似  
一个布满缺口的不在场 至多也只是一种阴影  
渴望 某种更大的  
定义 它却从未到来  
因为被焚烧的 化作空气  
与灰烬 别无其他。

242

于是我紧紧抓住 你遥远  
坟墓的知识 因为只有它  
提醒我 催促我 去塑造那个阴影。

(90)

## 结论

在《女性主义与诗歌》中,简·蒙塔菲瑞声称,“最终,讲故事的策略在克服‘排斥的悖论’上并不奏效。”(56)虽然加了几个限定条件,但她基本上遵循了法国理论家们将诗歌凌驾于叙事之上的做法,用之

来指导她对女性诗歌的研究。但我对一些当代女性长诗评论表明，女性诗歌所具有的越界和革命的潜力，并不体现在对叙事（不论叙事是模仿性的还是实验性的）的固定不变的摒弃上，也不体现在将叙事和社会 / 象征秩序负面地联系起来的做法上，这其中，诗人的任务就是去拆解、干扰和（借用克里斯蒂娃的程式）撕裂社会 / 象征秩序。相反，在当代的女性长诗中出现了诗歌和叙事的相互嬉戏，其中充盈着对故事的坚持、对叙事的坚持，这些叙事主张历史话语和神话话语是女性诗人的权利和必需之物。故事，不论其被如何（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是能动性中的一个前提条件。“这种渴望被了解的意志，”柯蕾普费兹写道，“能够改变历史。”（88）正如史尔戈所云，“必须得有故事”（“Conversation” 29）；“有了这些故事我们将得以幸存。”（*Storyteller* 247）而且还如乔伊·哈乔在其诗歌《神话书》中所写：

一旦我进入神话书中  
在你的花岗岩岛上的檀香木房间中  
我就不找出去的路。

（*In Mad Love and War* 55）

## 引 言

1 关于边界话语理论及对其的倚重,参见安莎杜娃;阿帕杜埃;贝哈;巴巴;布雷多迪;卡尔德隆;坎西利尼;钱伯斯;克利福特;费瑟斯通;吉尔罗伊;格鲁沃与卡普兰;霍尔;希克斯;凯瑞·卡普兰;科比;希岗涅;莫尔;皮瑞—托里斯;拉达克里希南;罗伯森;斯皮瓦克;童灿;维斯韦沃兰;耶格尔的《身份地理学》。

2 还见被广泛使用的罗布恩·沃霍尔与迪安娜·普赖斯·赫恩德尔主编的《女性主义》第一、二版本。

3 我尤其抵制按照以下概念划分不同的女性主义的传统做法:改革派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如此等等。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各种女性主义,其理论与政治实践常常相互重叠或矛盾,以至于这些概念对于学术分析而言大多数寥无用处,或颇具误导性。我认为,用两个共有原则来定义女性主义的工作方法颇为有用:(1)女性的压迫,(2)致力于社会变革。对压迫的来源与性质的分析不一而足。有关社会变革的性质和策略的理论亦是如此。将定位政治作为女性主义理论基础的讨论,尤见里奇,《论定位政治》;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143—187;普鲁宾;马尼;格鲁沃与卡普兰,1—36;钱特拉·莫安提,《女性主义遭遇》;史密斯与卡兹;克利福特,《记旅行与理论》;和达莱什沃尔。

4 对用美国的种族关系做为样板来理解全球的人种/族群关系的倾向,斯皮瓦克在其他地方表达了她的焦虑。例如,她说过,“别忘记第三世界整体,在那里你无法将一切事情都归结于黑白之间的对抗,因为那里还有黑人内部、棕色人种内部等等的对抗”。(*Post-Colonial Critic* 65)在我看来,将美国的种族关系简化为

“黑白对抗”也极其具有误导性。关于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讨论，还可参见古纽与耶特曼；格鲁沃与卡普兰。

5 我在这里主要谈论的是美国的高校，因为我意识到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与美国的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大差异。我还意识到，在我们跨越千禧年时，美国的高校体制正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终身聘用制的未来不太确定，非终身制教职的人数增长日益加速，校园作为主要的研究场所的地位正在消蚀（基金会和企业是快速增长的场所），“远程”和网络教育的现象正在增长，大有取代校园与教室里的住校教育之势。

6 尽管这些进步常常被仅仅归功于西方，但它们并非只在西方实现。例如，造纸术（书籍产生的必需品）是在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很早就在中国出现。而阿拉伯人是非常重要的航海先驱，早于欧洲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航海探险（见莱奇，尤见 81—85）。我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告诉我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资料，它们瓦解了传统的有关西方崛起的欧洲中心主义式论述，并强调了在欧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进行交换的重要性。

244 7 我特别受惠于叙事学研究，几乎每一章的前身，都是在由叙事文学研究协会主办的叙事学年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

8 有些章节之前发表过，在此又以修改或更新的形式出现（第 1、2、4、7、8、9 章），其他章节则在本书中首发（第 3、5、6 章和第 7 章的新增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曾在某处写道：书籍相互延续。我发现文章也是如此。聪明的读者肯定能发现每章中的一些松散部分会引向下一章中的全面探讨。仅供好奇者参考，各章的写作顺序如下：7、9、2、8、1、5、4、3、6。我的这些文章更受益于联系这些章节的线索的相关文章，这些线索包括身份问题、表演问题和叙事问题，尤其是（但并不仅仅是）与酷儿理论相关的这些问题。第 1 和 3 章中对表演的探讨点明了这个方面。

9 见巴巴，《理论的奉献》，19—39；斯皮瓦克，《后殖民评论家》，尤见 73、138—39；弗兰肯伯格与马尼，他们改造了劳伦斯·格劳斯伯格和诺玛·阿拉尔孔的这一术语；阿拉尔孔，《理论主体》；维斯韦沃兰，《虚构之事》，尤见 11、13—14、139—140。斯皮瓦克用一种理论 / 政治话语来干扰另一种的策略在其书中显而易见。例见《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国际框架内的法国女性主义》和《属下阶层的文学再现》。在《在他者的世界》中，她写道，“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必须变为持续的相互干扰”。（249）借用了克利福特的人种学结合主义的概念，维斯韦沃兰的《女性主义人种学小说》“展示了与个人对话者的一系列



遭遇”。(13)

10 还可见斯尼亚·古纽和安娜·耶特曼在其《女性主义与差异政治》的引言中对超越一词的加以限制的用法。特瑞莎·德·劳拉提斯在《酷儿理论》、伊芙·科索斯基·塞吉维克在《暗柜认识论》中均使用了相似的超越概念,它既包含“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又超出了酷儿身份概念中的那些术语。

11 尤见弗里德曼,《佩内洛普的网》、《乔伊斯:被压抑者的归来》、《女性书写中诗歌对叙事的颠覆》、《新现代主义研究》、《空间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阅读教学场景》、《歇斯底里、梦想和现代性》和《编织》。

## 第一章

本章在《“超越”女性批评与女性本原批评:身份认同的地理格局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未来》一文的基础上稍作了修改与更新。该文发表于1996年的《塔尔萨女性文学研究》。我感谢约瑟夫·布恩邀请我在他的1994年现代语言协会专题小组中发言讨论这些问题。我还要向道恩·奇特利表示感谢,其论文给我带来灵感,将地理学与当前的主体性理论联系起来。我还要感谢来自以下单位与个人的建议与批评:霍利·莱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英语系的草稿组、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富有启发性的观众、罗格斯大学的女性研究所、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乌特勒支大学与伊拉斯姆斯大学联合的女性学项目、以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文学科研究所等。

1 见肖瓦尔特,《女性的时间》。女性批评和女性本原批评均是新词。肖瓦尔特于1979年在《走向女权主义诗学》中首次使用女性批评一词指称女性书写的文学历史。但是这一使用广泛的术语很快就扩展了含义,将所有解读女性书写的方法论(而不再仅仅是文学历史的方法论)涵括进来。肖瓦尔特用女性本原批评一词来描述对女性本原的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解读。她这是借用艾丽斯·贾丁的新词。后者在1982年的《女性本原批评》一文中首次使用该词。贾丁用女性本原批评一词并不是指一种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而是指后结构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批评中对性别(具体而言:女性本原)的重点突出,其方法是“对那些主导叙事自身的‘非知识’、躲避或吞没它们的那些事物进行重新的概念重组”。(25)贾丁将女性本原批评一词定义为“对‘女性’进行话语表达的过程, 245  
在法国这一过程被诊断为现代性状态的固有特性;事实上是对女性本原、女性及其必然的(也即历史的)内涵所做的定价过程,它多少是思维、书写与言说的新的、必然模式的固有特性”。(*Gynesis* 25)肖瓦尔特在1984年用“女性批评/

女性本原批评”的二元对立来描述女性主义批评。这一组二元对立替代了她之前的“女性批评 / 对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批评”的二元对立。“对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批评”这种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形式在对早期英国文学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尤为常见(“Feminist Poetics”)。

2 关于将女性批评与女性本原批评结合起来的女性主义评论家,参见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卡斯蒂洛;迪普莱西,《粉红吉他》;弗里德曼,《佩内洛普的网》;亨德森;霍曼斯,《承受语言之重》;南茜·米勒,《即将变化的主体》;瓦乐瑞·史密斯;斯皮尔斯,《绝对正确的直道的永久倾斜》;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和耶格尔,《拒绝成为甜心的女人》。

3 我借用的是保罗·德曼的《盲点与洞见》中潜藏的认识论的对立。

4 有关身份政治的其他地理程式,尤见基思与派尔。他们注意到并质疑了社会科学中空间修辞的广泛应用(尤见1—40、67—83)。耶格尔的《身份地理学》、科比的《冷漠的疆界》和琼斯等人的《女性主义地理的开端》的出版均晚于本章的前身文章的出版时间。耶格尔呼吁以多重空间化的形式重新考虑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这些多重的空间化形式扰乱了诸如中心 / 边缘的传统二元对立的“领土想象”(38),解码了“空间密码学”的“幽灵效果”(7)并且以政治上进步的方式“重新扩张”了“社会的领土”(17)。科比应用了基于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跨学科分析方法,来“通过空间的透镜观看主体”并“促成和理解精神与社会、个人与政治的联系”。(ix)琼斯、纳斯特和罗伯茨等人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女性主义论文收纳进其主题之下,他们的主题是和女性主义地理有关的、对空间定位的关联性阅读。还可见杰拉尔丁·普拉特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地理修辞的批评。

5 其他的身份认同的新修辞还有借自表演的修辞,它对酷儿理论尤其重要(例如,假面、腹语术、穿戴异性服饰等等);还包括借自技术的修辞(例如,电子人的主体性、福柯式技术)。例见巴特勒,《性别麻烦》;哈拉维,《电子人的宣言》;德·劳拉提斯,《性别的技术》。

6 关于引用的术语,参见阿帕杜埃,《全球族群景观》;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帝国之眼》;理查德·怀特;和安莎杜娃。关于地理隐喻的例子,参见诺玛·阿拉尔孔;本哈比;巴巴,《文化的定位》和《民族与叙事》(尤见1—7、291—322);布恩,《游轮度假》;布雷多迪;巴巴;克利福特,《旅行的文化》与《路线》;克利福特与达莱什沃尔;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唐纳森;弗古逊与库塔,尤见6—23;格鲁沃与凯瑞·卡普兰,尤见137—153、231—254;古纽与耶特曼;

霍尔,《新旧身份、新旧族群》;海克曼;黑维特;希克斯;希岗涅;希岗涅与坦普尔顿;胡克斯,《女性主义理论》;哈钦, PMLA 的专刊;詹穆汗默德与劳合;琼斯、纳斯特与罗伯茨;凯瑞·卡普兰,《去领土化》与《旅行的问题》;奇特利;基思与派尔;科比;科希,《女性主体性的地理学》;劳伦斯;雷雍;洛尔,《批评的地形》与《异质性、杂合性、多样性》;三好将夫;皮瑞—托里斯;弗兰;杰拉尔丁·普拉特;雷;索佳;耶格尔,《身份地理学》;和扬。还可见《离散》期刊。

7 见本书第三章;还见基思与派尔,他们写道,“身份认同从差异中显现……差异在关联领域变为定位的差异……没有身份认同超出这个范围之外”(27—28);此外,与他们相反,人类学家迈克尔·陶斯格在《模仿与他性》中讨论了同一性、摹仿与模仿,认为其是跨种族遭遇中构建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成份。这一方面常常在差异和他性话语被忽略。 246

8 例如,苏珊·科希警告我们警惕对离散的历史现实的比喻性挪用:“迁移与流放不能仅仅被当作一个具有流浪感的比喻,还应是一个有着具体的历史与文化定位的事件。”(“Other Skies” ix)还可见基思与派尔的观点,他们认为比喻与实际的空间性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关注与质询(1—41,尤见23)。

9 我借用了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的这个响亮的术语。还可见米歇尔·福柯接受地理学家的采访,他们讥笑福柯缺乏对地理学科的关注,尽管他对权力和情境知识的讨论如此倚重空间的修辞;福柯一开始为自己辩护,声称应该由地理学家做其本学科的考古工作。但最终,福柯承认空间的修辞十分适合他谈论知识与权力的扩散之间的关系,而考虑到军事征服,地理学地位的增强要求我们予以格外的审视(“Questions of Geography”,收录于福柯的《权力/知识》)。我感谢卡琳·魏根提醒我关注这个访谈。耶格尔也讨论过福柯的空间隐喻(*Geography* 7—9)。

10 就我所知,弗朗西丝·比尔在其1970年的文章《双重危机: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中最早使用“双重危机”这一术语,该文发表于罗宾·摩根的《义重如山姐妹情》中。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奥德莉·罗德、艾丽斯·沃克、芭芭拉·史密斯等黑人女性,和一个黑人女性主义团体“康比河集体”,打造了多重压迫的话语,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又被许多其他的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发展。见罗德,《姐妹外人》;沃克,《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芭芭拉·史密斯;霍尔,斯科特与史密斯等;康比河集体;诺玛·阿拉尔孔;阿尔伯莱希与布鲁尔;安莎杜娃,《做脸/铸魂》;柴;迪尔;胡克斯,《女性主义理论》和《顶嘴》;霍达多;黛博拉·金;鲁冈;鲁冈与斯伯尔曼;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斗争的地图》和

《在西方的眼睛下》；莫拉加与安莎杜娃；里奇，《对文明的不忠》；以及罗密诺与阿格莱斯。

11 关于罗德的神话自传中的社会建构的身份认同（如种族、阶级、性征、社会性别）与自选的身份认同（如激进派、学生、作家）的讨论，见卡尔斯顿。她认为罗德的复数的身份认同使她在每个团体中都感觉是个外人，这种流动的形式预见了后来琳达·阿尔考夫提出的“立场”的概念。

12 例见阿尔考夫；安莎杜娃，《边境/荒界》；本哈比；波恩；科尔；德·劳拉提斯，《性别的技术》、《古怪的主体》和《女性主义研究》；哈丁；哈特索克；海克曼；亨德森；黑维特；霍达多；科比；马丁与莫安提；马尼；钱特拉·莫安提；S.P. 莫安提；弗兰；拉达克里希南；里奇，《论定位政治》；斯迈利；塞吉维克，《暗柜认识论》；以及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

13 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在《为了伊特鲁里亚人》中创造了那个著名的术语“（含糊的）非霸权”，这个术语代表了早期女性主义对矛盾主体立场的概括。还见布尔金、史密斯与普拉特的《为了你的一切而抗争》；马丁与莫安提论普拉特的贡献的文章（《女性主义政治》）；琼·乔丹的《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该文因为对种族、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矛盾嬉戏的探讨而成为女性主义课堂的经典教材；波恩；唐纳森；弗莱，《身为白人》和《白种女性女性主义者》；霍达多；莫莉娜；费特森；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拉达克里希南；以及雷。

14 其他关于拉森的讨论，请见沃尔，85—138；麦克道尔，78—100。

15 我在本书的第二章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还可见我的《关联立场认识论》；波豪尔；费罗斯与拉扎克；霍达多；琼斯、纳斯特和罗伯茨；琼·乔丹；钱特拉·莫安提；莫莉娜；拉达克里希南；以及帕特里夏·威廉姆斯，尤见其98—132。

16 见贝哈的《人类学家鲁斯的故事》、《女性主义越界中的欲望与欺骗》和《脆弱的观察者》。

17 就我所知，在文学研究中，情境身份还未得到这样的理论概括，尽管评论家（尤其是后殖民研究领域的评论家）很可能注意到身份认同在不同定位中的变化。人类学家阿君·阿帕杜埃，将日益增加的个人穿越不同文化空间的全球现象，当作其“全球族群景观”的分析焦点。在社会与政治理论中，“情境知识”一词十分常见；尤见哈拉维；海克曼（及《符号》上发表的对海克曼的大量评论与回应）；斯迈利；诺玛·阿拉尔孔。

18 关于杂合的更详细讨论，请见本书第三章。后殖民和近来美国的移民和/或种族叙事充斥着杂合的修辞，和杂合性的身份认同。例见厄德里奇；慕

克吉;谭恩美;拉什迪;史尔戈和任璧莲。对于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杂合概念的综述,参见帕帕斯特爵迪;扬;皮特丝;和韦伯纳与摩都德。

19 还见拉什迪的《撒旦诗篇》。它经常因为其杂合的主题与表现而被引用,例见基思与派尔,22—40;和巴巴,《文化的定位》,212—235。

20 例见宝拉·戈娜·艾伦;布蕾斯顿;布蕾斯顿与麦克劳林;加比;克里斯蒂安,《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和《黑人女性小说家》;弗朗西丝·史密斯·福斯特;林英敏;雷博勒多;桑切兹;斯普林菲尔德;齐默尔曼,《安全的女人海》。译注:Chicano 和 Chicana 指具有墨西哥血统的美国人,前者指男性,后者指女性。本文采取音译的方式,将前者译为“奇卡诺”,后者译为“奇卡娜”。

21 例见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麻烦》(1990),它是将主体性与表演性联系起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之一。巴特勒对“女性本原”或“女性”概念的激进挑战可以看作是对西方身份话语的终极干扰,因而可被看作是女性本原批评项目的一个继承者。然而,作为酷儿理论的一个重要先驱(酷儿理论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话语,巴特勒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股水流),《性别麻烦》预见了后来的酷儿理论家对身份的新地理学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贡献。

22 在《重要的身体》(1993)中,巴特勒坚持认为,她的表演性主体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充分考虑了“身体很重要”,并有意远离了认为身份是刻意选择的结果(类似于当天所穿的服装一样)的概念。在我看来,(建立在戏剧性表演基础之上的)意向论和(建立在福柯的监管话语的概念与阿尔都塞的询唤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之上的)话语决定论,在这两本书中,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矛盾之处。巴特勒保留了认为身份/主体性是话语的一种效果的概念。因而,一方面是物质环境的概念,另一方面是主体的能动性的概念。不论其如何辩论,这两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观点不相匹配。对表演性修辞的更为唯物主义的用法,见塞吉维克,《酷儿操演》与《暗柜认识论》,后者也是酷儿理论中的一个颇具影响的文本;德·劳拉提斯,专刊。

23 叙事学研究审视了许多其他的问题,包括读者反应,这对我的目的而言也十分有用,尤其是考虑到不同读者的多样的、变化的和复杂建构的认识论定位。新的身份地理学还与诗歌和戏剧的话语模式有关,但是诗歌和戏剧与叙事小说的差异很大,需要分开讨论。

24 对这些作家(尤其是里斯和乔伊斯)的女性主义或其他方式的批评,已经开始考虑身份的多重建构成分的含义。例见艾莫瑞;格雷格;多伊尔;德科文。关于里斯对其多重身份认同的自传性记叙,见她的《请微笑》。

248

25 关于叙事的水平或垂直维度，见我的《空间化》。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和迪普莱西的《终点之后的写作》，在提倡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文化叙事解读方面，影响颇广。还见科比；多伊尔；德科文；布恩；和斯皮尔斯的《绝对正确的直道的永久倾斜》。

26 我引用的是 1986 年的汉斯·沃尔特·加布勒版本，而且依据乔伊斯研究的传统，所有引文给出了章节与行数。关于乔伊斯作品中的人种、民族和爱尔兰殖民主体的讨论，尤见多伊尔和郑。译注：中译文参考萧乾、文洁若译本（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4 年）。

27 我受惠于迪普莱西，是她创造了我在这里拥护的“定位式批评”一词。以下几位对我的早期草稿提出了宝贵意见，对此处尤为重要：保罗·博伊尔、玛丽安娜·德科文、简·马库斯、南茜·米勒、阿丽夏·奥斯翠克、桑吉塔·雷、玛莎·内尔·史密斯和玛丽·海伦·华盛顿。他们大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雄辩地认为，女性主义分析（不论其受到多大程度的修正）是一种明显有别于其他形式的文化批评形式，具有持续的重要性。

28 与作者的谈话，1995 年 3 月 23 日，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吴勇兴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解读“超越”》（印第安纳大学），其主题是质疑女性主义话语中的“超越”。还有学者将“超越”讨论为一种间隙性的来来回回的运动，见巴巴，《文化的定位》，1—18；和本书的引言。

29 见考菲关于文化研究对女性学研究的置换的相关讨论，和豪克斯沃斯对社会性别概念的维护。

30 与作者的谈话，1995 年 3 月 24 日，讨论对本章的早期草稿的意见。

31 南茜·米勒，给作者的信，1995 年 12 月 4 日。

32 关于这一点，我尤其感谢我在罗格斯大学女性研究所宣读了本文之后引发的热烈讨论，尤其是理查德·米勒、里奇·斯克路德和鲁斯·吉尔莫等人的评论。关于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定位的政治”的讨论和批评，参见弗兰肯伯格和马尼；普鲁宾；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143—188；和本书的引言。

33 译注：也可理解为“身体问题”。

34 见伍尔夫，《往事小记》，尤其 68—69；H.D.，《日光兰》，尤其 107—117；弗里德曼《佩内洛普的网》，183—190。

## 第二章

本章重印自《符号》期刊第 21 期(1995 年秋季刊),有少量的参考文献更新,和个别措辞的改动;本章的早期几稿曾在以下会议上宣读:1992 年 10 月在纽约召开的凯罗琳·海尔布伦会议,1993 年在纽约的特洛伊召开的国际叙事学会议,1993 年 12 月在多伦多召开的现代语言协会会议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女性学研究中心。我感谢这些听众的质疑与鼓励,也感谢曾经阅读我的早期草稿的那些人(尤其是约瑟夫·布恩、爱德华·弗里德曼、琳达·戈登、林英敏、内莉·麦凯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英语系的草稿小组),还感谢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即《符号》的那些匿名读者。

1 尤见罗伯特·古丁—威廉姆斯的宝贵的论文集《阅读罗德尼·金 / 阅读城市起义》中的有关洛杉矶事件的信息和不同阐释。其中,有的证实了白 / 黑二元对立仍然持续存在,有的将那些事件置于更大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来理解,还有的反思了这些事件中的多种族方面。 249

2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常常认为“种族”只是种族他者才具有的特性。关于将白肤色建构为一个种族身份的分析,参见弗莱;弗兰肯伯格;米妮·布鲁斯·普拉特;尼尔森;多明盖兹;和杜西勒对“一个自许的对抗性女性主义批评”的批评:“该批评的实践者继续将白人特性看作是自然的、标准的和没有疑问的事情,以至于种族身份只是非白人的特性”。(607)

3 对黑白二元对立的清晰明确的批评,尤见乔;奥米与温奈特,《洛杉矶“种族暴乱”》;奥利弗;洛尔,《异质性》;和斯皮尔斯,《论一种可选模式》。在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收集和反歧视行动的背景下对多种族主义的崛起问题的分析,参见赖特;对日益增加的机动性、“全球族群景观”和身份认同的人种学观点,参见阿帕杜埃,《全球族群景观》。

4 自始至终,我认为种族与族群是相关但并不相同的概念。两者均反应了人类组织成群的倾向,这些群体相对于对方而得以定义。我认为“人种”与“族群”这两个概念均为文化建构,不过人种常常暗含了生理差异,而族群则暗示了文化的差异。但是,这种区分在实际的使用中不断地失灵(例如,参见迈克尔斯和伦斯伯格,他们汇报了斥资数百万美元的基因组项目,其目的是分析从全球四百多个“族群”中提取的 DNA 样本)。有不少文章综述了社会科学如何处理这些术语,关于这些综述的演变过程,见斯多金,《人种、文化与演变》;福特尼;彼德森、诺瓦克与格里森;斯泰潘;奥米与温奈特,《美国的人种构成》;班顿;和理查德·汤普逊。关于人种话语的分析,参见希金博瑟姆;菲尔茨;戈登堡;盖茨,

《“人种”》；迪考特；和罗博。关于认为“人种”是一个虚假的、危险的建构的意见，见盖茨，《“人种”》的引言；阿皮亚，《未完的争辩》；阿皮亚与盖茨，编者的介绍；希金博瑟姆；和拉达克里希南。还有人赞成继续使用人种概念，因为其具有意识形态力量和物质影响。关于此类观点，参见休斯顿·贝克的《凯列班的三重功用》和考奈尔·韦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将人种与族群合并起来的例子，见索罗尔斯与波豪尔；关于强调它们的区分的例子，见瓦尔德；奥米与温奈特，《美国的人种构成》。

5 我在此处改用了芭芭拉·克里斯蒂安的标题“理论中的种族问题”来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对种族的讨论中出现的权力动态与她所评论的20世纪80年代的学院派“理论中的种族问题”类似。还可见注14。

6 关于这种僵化讨论的描述，参见弗莱，《身为白人》；安莎杜娃，《桥、吊桥、沙洲或岛屿》和《做脸》，xix—xxi；霍达多；费罗斯和拉扎克；费特森；怀亚特；和埃尔斯沃思。在美国国家女性学研究协会的会议中，许多讨论部分富有成效，但也有一些讨论常常没有建树。例见桑多瓦尔对1981年的美国国家女性学研究协会会议的报告（《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阿尔伯莱希与布鲁尔关于1988年美国国家女性学研究协会会议的《权力之桥》，该会议的主题是联合政治；以及隆内克的有关1990年美国国家女性学研究协会会议的描述，当时有色人种女性代表中途退场，导致这次会议几近夭折；穆齐尔；美国国家女性学研究协会有色人种女性核心小组；奥斯本；鲁比与道格拉斯；塞尔斯；和史威卡特。女性主义课堂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关于课堂里的描述，见罗密诺；汤普逊与迪施。

7 关于将白种/有色人种的二元对立当作有色人种女性之间联盟的基础的做法，例见莫拉加与安莎杜娃；安莎杜娃，《桥、吊桥、沙洲或岛屿》和《做脸》；桑多瓦尔，《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隆内克；穆齐尔；美国国家女性学研究协会有色人种女性核心小组；奥斯本；鲁比与道格拉斯；塞尔斯；和史威卡特。关于不同群体之间联盟的困难之处的讨论，尤见桑多瓦尔，《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柴；哈里斯与奥多纳；尤塔；罗德，《我是你的姐妹》；和安莎杜娃，《和谐》。关于将白人女性涵括在内的有色人种女性内部的联盟努力，见莫莉娜。

8 见莱昂塔，尤其10—11和16。尽管论战叙事很可能相当普遍，但叙事并非都是论战式的。例见宝拉·戈娜·艾伦，《学院内的黄女人》。关于文化叙事的其他讨论，见詹明信，《政治无意识》；迪普莱西，《终点之后的写作》；和海尔布伦，《书写一位女性的生活》。



9 见本书第一章;耶格尔,《身份地理学》;科比;基思与派尔;琼斯、纳斯特和罗伯茨;皮瑞—托里斯;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布雷多迪,《游牧主体》;希克斯;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和洛尔,《异质性》。

10 在《情境知识》中,哈拉维只考虑了社会性别一项(见诺玛·阿拉尔孔、海克曼)。但是,对于包含有其他的主体性构成成分的定位政治与认识论的表达,尤见哈拉维,《电子人的宣言》;迪普莱西,《为了伊特鲁里亚人》;迪尔;哈特索克;里奇;米妮·布鲁斯·普拉特;马丁与莫安提;斯皮瓦克;阿尔考夫;黛博拉·金;霍达多;德·劳拉提斯,《性别的技术》;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康多;弗兰;弗兰肯伯格与马尼;马尼;格鲁沃与卡普兰;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拉索;桑多瓦尔,《美国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斯迈利;哈丁;拉斯莱特;杜西勒;费罗斯与拉扎克;科比,尤其 11—37;和我的《关联立场认识论》。还可见本书第一章。

11 玛丽·达利在 1979 年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会议上这么回答一个与种族相关的问题——大概是她不关心种族问题之类,这个臭名昭著的回答浓缩地代表了这种否认的叙事。达利在《妇科/生态学》中挪用印度、中国和非洲的女性经验来进行社会性别的分析,而不考虑种族、阶级和殖民主义的分析。正是这一点引发了上述的问题。见罗德在《致玛丽·达利的公开信》中的批判(《姐妹外人》, 66—71)。

12 关于女性主义忏悔修辞的讨论,参见苏珊·伯恩斯坦。在美国,忏悔叙事主要集中在种族问题上,而不是,仅举几例,反犹问题或异性恋歧视同性恋的问题。关于基督徒的优越感及犹太人的身份问题的女性主义讨论,可参见布尔金、普拉特与史密斯;费特森;贝克;和波恩。

13 例见阿德里安娜·里奇在《生自女性》中对她的一白一黑两位“母亲”的审视, 253—255,以及她随后在《对文明的不忠》中试图在同性恋/女性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全球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努力(1979)。

14 例见简·盖洛普的论断:对她而言,黑人女性现在占据了她以往给予雅克·拉康和其他法国理论家的权威位置(Gallop, Hirsch, and Miller 363—364)。还可见瓦乐瑞·史密斯、杜西勒、伊丽莎白·阿贝尔、让·怀雅特和玛格丽特·霍曼斯(《“有色人种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理论》)。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批判了这一倾向:白人女性主义者将有色人种女性放置于最终的权威和真实性的位置,从而将其当作一种物化的欲望对象或理论具身化的一种形式。比迪·马丁和钱特拉·莫安提认为,“对于固定位置的指派——教育者/评论家(有色人种

女性)和内疚而沉默的听众(白种女性)”妨碍我们“仔细考虑,在主导与压迫的结构之间与其内部出现的,复杂的历史关系”(“Feminist Politics” 199);此外,萨拉·舒乐瑞批评了这样的有色人种女性:她们使用“故意设计来引起种族不舒服的策略”并赋予自己和后殖民女性主义一种相对于白人女性的“偶像级地位”(“Woman Skin Deep” 92, 759, 764)。

15 一些女性学研究会议和项目使用以下结构安排,来提倡反对种族主义:有色人种女性被安排在规定的时间内谈论她们对白人女性的种族歧视,在此期间白人女性必须保持沉默,之后白人女性可以说话,但是只能谈论她们的种族主义。

251 16 我在此借用休斯顿·贝克在《现代主义与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深度探测的比喻,来描述构成美国黑人现代性的基础的各种种族主义叙事。

17 关于欧洲种族主义的讨论(不仅指认了主要的种族群体,还将欧洲人划分为许多不同的种族),尤见斯多金,《种族、文化与演变》;波里亚科夫;斯泰潘;和班顿。关于罗姆人(吉卜赛人)在欧洲目前的地位,见卡姆。

18 在对待文化共融与杂合的各种理论视角的背景下对此问题的更详细讨论,见本书第三章。

19 费罗斯与拉扎克汇报了在她们主持的一次女性圆桌讨论中出现的这个现象:其中,“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每位与会者都同时既隶属于某一附属群体,也隶属于某一主导群体”。(1051)

20 关于对女性内部的共性与差异性的女性主义认知的重要性的讨论,见约翰内塔·科尔;和琳达·戈登,《论“差异”》。还可见芭芭拉·克罗塞特在1994年的开罗联合国人口会议上对此问题的报告,以及本书的第三章。

21 见《争鸣》上发表的鲁斯·布洛奇、芭芭拉·拉斯莱特和萨拉·哈丁等人的论辩文章。在布洛奇看来,女性主义理论排他性地强调统治、剥削与权力的模式。她在文章中批判了这一现象,认为这种强调忽略了那些不能完全用受害范式能够解释的性别方面。在批评布洛奇所呼吁的“文化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的部分方面时,拉斯莱特声称,我们需要理解女性主义者对那些超越了统治模式的术语的喜爱。

22 安莎杜娃此处的疗救梦想,具体指的是她本人的盎格鲁、墨西哥与印第安(阿兹特克)元素的共融,而不是指不同团体的女性之间的联盟。然而,在《边境/荒界》中,她将诗歌题献给朱迪·格伦、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和艾琳娜·柯蕾普费兹,以此来暗示更广泛联盟的可能性。在《桥、吊桥、沙洲或岛屿》中,她

还承认“爱与友谊”以及仪式性行为(如,共同将面包掰开)是联盟工作的“良好基础”,只要它不遮掩权力的差异(229—230)。

23 关于关联性的类型区分(术语是矛盾主体立场话语、关联性话语、情境性话语和杂合话语),请见本书第一章。这种区分是在本文的《符号》版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对于较早的程式,请见我的《关联立场认识论》。在他的所有文章中(现在大多收录于《离散的沉思》,拉达克里希南将关联和关联性用作类似的意思。也见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对“关联性”一词的多少不同的用法(“Cartographies” 12—13)和《女性主义地理的开端》中的介绍部分,其中琼斯、纳斯特和罗伯茨强调了空间的关联性对于女性主义分析的重要性。关于多重压迫的综合和/或互动的分析,尤见艾丽斯·沃克;芭芭拉·史密斯;莫拉加与安莎杜娃;迪尔;罗德,《姐妹外人》;柴;黛博拉·金;胡克斯,《顶嘴》;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安莎杜娃;桑多瓦尔;和希金博瑟姆。关于立场和定位的修辞,见注10中的参考文献。关于客体关系理论,参见乔多罗;加迪纳,《论女性身份》;和杰西卡·本杰明。关于论述受到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研究影响的主体性的大量文献,参见贝尔西;巴巴;布雷多迪;德·劳拉提斯;斯皮瓦克;南茜·米勒;保罗·史密斯;瓦乐瑞·史密斯;希克斯;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洛尔;阿皮亚与盖茨;皮瑞—托里斯;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拉达克里希南;斯皮瓦克;和科比。

24 我在此处将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与其他类型的身份政治区分开来,尤其是与我所称的融合主义的身份政治区分开来。后者的基础概念是身份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具有其历史具体性,并容易变化和受到其他身份的影响。正如我在别处曾经写到的,我不相信女性主义者和其他的被边缘化人群能够放弃,身份的概念和建立在各种族群身份基础上的政治组织,而转去支持后结构主义认为身份是单纯的嬉戏与表演的概念(见本书第六章)。

252

25 在我发表这篇文章之后,这些分化仍在持续扩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6年选举中加州通过的209号提案,禁止该州的反歧视行动。国会抨击政府给所有移民提供福利而不论他们是否合法的事情也是一例。

26 多元文化的马赛克拼贴画的意象经常出现在族群研究中,替代了之前的具有社会同化倾向的“大熔炉”的意象,后一意象没有充分考虑到它可能会潜在地加强基要主义的身份政治。见彼德森、诺瓦克和格里森;和彻姆斯基。“多元文化”这一术语非常成问题。它的用法很多,但缺乏连贯的含义,很容易被整合来颂扬多元主义的多样性,而多元主义会遮掩潜藏的权力关系。在北美的环

境中，多元文化最常被用来意指被整体考虑的非白人的种族团体，但有时它也被用来指称所有类型的文化的多样性（包括白人与西方的文化）、一个本身具有多元文化的群体（如非裔或亚裔美国人）、或者甚至指具有混血遗产的个人（如路易丝·厄德里奇或莱斯利·马蒙·史尔戈）。见詹明信，《后现代主义》；皮瑞—托里斯；三好将夫；古特曼；罗密诺与阿格莱斯；和戈登与纽菲德。

27 对少数族裔电影制作者及娱乐产业的讨论，参见弗雷戈索；帕克森；和达什。对大众媒体的日益全球化的体制的讨论，见詹明信，《后现代主义》；和三好将夫。

28 例见菲斯克；格雷；和达西。

29 这些例子大多摘自 1992 年至 1994 年间的《纽约时报》、《威斯康星州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全国周刊版》。

30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准确的话，这个名为“给美国把脉”的路易斯·哈里斯调查可能反映出控诉叙事的胜利，这种叙事导致白人不断地自我审查自身的模式化思维。它还反映了常常由受害思想引发而来，对所有他者进行模式化思考的倾向。另外两个民意调查也有类似结果。

31 例见索罗尔斯，《族裔的发明》，ix—xx；和韦斯特，《现代种族主义的谱系》。认为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是欧洲人和欧裔美国人发明的观点，是绝大多数的控诉型文化叙事中隐藏的潜台词。

32 例见路易·杜蒙对印度种姓制度的经典的结构主义研究《阶序人：种姓体系及其衍生现象》（1966）；科伦达，尤见 23—36；古德；和罗博的较近文集《南亚的种族概念》，在该书中罗博考查了，在英国殖民占领之前就已在印度存在的，有关种族与种族主义的非西方概念。至于西方形式的种族思维对印度本土的差异概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争议颇多。不论其影响如何，在种姓制度中体现的职业等级划分是世袭的，传统上被当作生而具有的特性加以维护。这种生物决定论是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我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和斯瓦加米·苏巴拉曼提醒我关注中国与印度的肤色等级划分的形式。

33 对民族冲突的原生主义观点的批评，见理查德·汤普逊。对全球范围的他者化的讨论（即使文中没有如此点明），见阿皮亚，《“种族”的谈话》；拉达克里希南，《离散的沉思》，尤见 203—214；和盖茨，《“种族”》。

34 关于乔丹的其他一些电影，见《尼尔·乔丹读本》。奈尔曾在德里大学主修社会学，在哈佛大学主修电影纪录片。她引以闻名的获奖纪录片有《印度卡巴莱》（1985）和《早安孟买！》（1989）。见奈尔与塔拉普莱瓦拉；阿帕杜埃，

《全球族群景观》；和葛温德琳·奥黛莉·福斯特在其《关注非洲与亚洲离散的女性电影制片人》中对奈尔电影中的游牧主体性和种族主题的探讨(111—127)，该书的出版时间晚于我的文章。

35 对《密西西比马萨拉》的评论解读，见贝尔·胡克斯与阿兰拉达·丁瓦尼。他们保留了黑/白的二元对立，谴责该电影是反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是“对跨种族、跨民族‘欲望’的又一浅薄评论。”(41)胡克斯还反对《哭泣的游戏》中的种族政治。她认为该电影是一部挪用的电影，在将种族问题商品化的同时却否认其重要性，将他者妖魔化为“食人族”，并犯了“白人文化帝国主义”的毛病(“Seduction and Betrayal” 53—62)。虽然胡克斯与丁瓦尼对流行电影中的政治局限性保持了有用的警惕，但他们对电影文本的解读却常常是一维的，忽视了重要的图像和叙事上的细微之处，并展示了强求一致的危险性：他们完全通过一种(白人/西方的)主导体制的文化透镜来解读文本。我感谢梅瑞尔·施瓦兹将胡克斯与丁瓦尼的文章提供给我。

36 尽管胡克斯与丁瓦尼抱怨，电影表面的现实主义遮掩了其对印度文化的模式化嘲讽，但我认为他们没有体会出那种虽然自我嘲讽但也是颂扬性的幽默。这种幽默在多部“族裔”电影中均可见到，这些电影的制片人也是其所描绘的族裔群体中的一员。这些电影有《喜宴》、《喜福会》、《点心》、《长城》、《布莱顿海滩回忆录》、《星尘往事》、《月色撩人》、《秘密与谎言》、《家庭事务》、《欢乐洗衣店》、《灵食》。还可见《鸟笼》对美国同性恋文化的指涉。这样的幽默一直以来常是一种关键的生存策略。

37 莫里森是在1990年10月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的这一点；还可见她的《在暗处戏耍》，47。

38 在该电影的文化潜意识以及琼·乔丹的《来自巴哈马群岛的报告》中，被压制的历史是：19世纪的英国种族主义者将爱尔兰人看作“白猴子”，一个与非洲联系密切的“类人猿种族”。见埃尔西·米奇；郑。

39 尽管板球与之前的殖民主义者有着历史上的联系，但是板球已经成为南非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项国家性体育活动，被热情参与。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联合主办1993年的板球世界杯比赛时，孟买板球协会的主席(他也是军事印度教派的领导人之一)曾威胁要拒绝巴基斯坦人到孟买比赛。然而当印度队与英国队在孟买对决时，穆斯林和印度教的球迷联合起来支持印度的板球队(参见瓦格斯蒂尔)。见吉甘迪，《图绘英国特性》，9—13；阿帕杜埃，《消失的现代性》。

40 译注：穆拉塔（mulatta，阴性名词，其阳性是 mulatto）指黑白混血儿，本文采取音译。“悲剧穆拉塔”是一种模式化的文学人物形象，常为肤色非常接近白人的黑白混血女性。她们常常刻意隐瞒自身的黑人血统，冒充白人女性。正当事业、爱情等春风得意之时，却因为混血儿的事实被曝光而落得悲剧收场。

41 我感谢琳达·鲁格的这一洞见。在另一层面上，迪尔穿上乔迪衣服的做法预兆了她对受害者身份的拒绝，因为正是穿着这身衣服，她绑住弗格斯、拔出他的枪杀死了加德。（我遵从了电影剧本中的用法，用“她”来指称迪尔）。

42 我感谢莫里斯·贝佳指出这一点；还可见贝佳，《电影与文学》，126。我还感谢詹姆斯·弗兰和雅各·雷拉对多层面阐释这个寓言提出的建议。

43 该电影的多重共振显然支持对加德，以及电影中出现的其他的双性同体的人物进行其他的解读。加德（Jude）的名字与乔迪（Jody）的名字类似，瓦解了绝对的性别差异。它与《圣经》中的朱迪斯（Judith，她砍下了霍洛弗恩斯的头）和犹大（Judas，他背叛了耶稣）的联系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艾瑞克·罗特斯坦告诉我，“迪尔”（Dil）的名字或许是“黄水仙”（Daffodil）的缩写，该词自1945年之后成为指称“女子气的青年”的一个俚语。他还说那位冷酷的爱尔兰共和军首领马圭尔或许引人联想起19世纪的名为“莫利·马圭尔”的秘密社团，该团体成员以喜好异性装扮而闻名。他认为加德的男子气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对父权制的一种批评而不是反映。海伦·库珀也提醒我，加德的权力可以被解读为对女性的被动性的修正，而她的死则可以被解读为从加害人变为受害人的又一次转变。

44 我感谢丽贝卡·桑德斯给我指出这些宗教典故的重要性。乔丹使用非裔英国同性恋者的角色，来为一个白人、异性恋的男性提供其成长的象征场所。这种做法瓦解了小说的关联叙事。莎朗·坎贝尔认为这种做法在电影产业中十分常见。她写道，“不真实且具贬低性的黑人形象”经常充当载体，承载“信息”给“特定观众：白人观众”的“骡子”。她问道，“除了方便之外，跨种族的关系与故事情节有何联系呢？如果演员都是白人，这个电影还能起到同样效果吗？”然而，在关联话语的框架内，跨种族的联系是该故事的核心，而且迪尔和乔迪不是一维的人物，两人都有可以细微区分的主体性。

45 我感谢雅各·雷拉关于《哭泣的游戏》中的流动性及其与德里达和伊里加蕾作品的关系的洞见。我还感谢霍顿斯·斯皮尔斯提醒我关注解构的政治。

46 我感谢林英敏注意到这一点。

### 第三章

本章的前身是提交给以下会议的论文：1997年2月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召开的“女性内部差异理论研讨会：跨学科和跨民族的方法”和1997年3月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召开的“接触与权力主题会议：跨文化与跨学科交往边境上的越界”。我十分感谢两次会议对我的论文的富有启发性的质疑与讨论，尤其感谢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合作发言者鲁斯·贝哈，和与我共同协调组织麦迪逊会议的尼尔·怀德海与理查德·弗洛雷斯。

1 我在此借用了玛丽·路易丝·普拉特的影响深远的术语“接触地带”。她将之定义为“互不相同的文化相遇、冲突、搏斗的社会空间，经常处于非常不对称的统治与从属的关系中——如殖民主义、奴隶制或其如今在全球以不同形式继续存在的后果”（*Imperial Eyes* 4）。

2 第一波和第二波女性主义之间在差异问题上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客观存在，但是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3 我感谢艾丽·特里普，在向我描述其在非洲参加的一次非洲女性主义的会议时，指出这一点。在那次会议中，对女性内部差异的美国式强调受到了一些非洲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抵制，因为她们所经历的严重种族窒息要求她们强调其作为女性的共同之处，而不是可能会将其分裂的种族差异。再举一个例子。女性内部差异并不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首要关注点。该会议的一大成就是界定了全世界的女性所应享有的“人权”。见《符号》21期（1997年秋）对该会议的讨论，181—226。

4 第二与第三波女性主义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日程和代际冲突。第二和第三波女性主义在时间框架上相互重叠，不像英美的第一波与第二波女性主义在时间上间隔了重要的四十余年，这一点进一步加深了两者在术语上的竞争。关于各种观点，见西格尔；和海伍德与德雷克合编的论文集；卢舍与卡普兰；芬德勒；和丽贝卡·沃克。

5 以下文本（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在美国读者甚众，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的性别差异话语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具有影响力：被重新发现并被移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西蒙娜·德·波伏娃；凯特·米利特；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杰曼·格里尔；泰—格雷斯·阿特金森；朱丽叶·米切尔和希拉·罗博特姆（从英国移植而来）；激进女同性恋者组织；雪莉·奥特纳；盖尔·鲁宾；多罗西·丁内斯坦；阿德里安娜·里奇；南茜·乔多罗；玛丽·达利；卡罗尔·吉利根；伊莱恩·肖瓦尔特；和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有些人将阶级或性

征等其他差异也吸纳进来,但她们的重点是社会性别,而不是女性内部的差异。玛丽·菲尔德·贝兰基等编著的《女性的认识方式》(1986)是较近出版的一部经常被引用的上述谱系中的新成员。

6 伊莲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1974)的英译文于1975年发表于《符号》期刊。除此之外,美国白人女性主义者未能接触大部分的法国女性主义的作品,直到伊莱恩·马克斯和伊莎贝尔·德·科蒂弗农于1980年出版了《新法国女性主义文选》。之后,克里斯蒂娃、伊里加蕾、西苏和威蒂格等人的作品先后被翻译过来,扩充了广泛意义上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翻译范围。当时后结构主义理论正快速扩散,日益成为许多学科内的标准学术话语。

7 对于德里达、拉康、巴特、克里斯蒂娃、伊里加蕾和西苏等后结构主义者而言,这种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是理论根基。不过,它对阿尔都塞、福柯和里昂塔德等人的重要性要稍弱一些。欲了解在20世纪80年代借用后结构主义话语,来生产女性主义差异话语的,有影响力的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参见以下等人的作品:克里斯·威顿、陶丽·莫依、凯瑟琳·贝尔西、艾丽斯·贾丁、纳奥米·斯格尔、南茜·米勒、玛格丽特·霍曼斯、琳达·尼科尔森、特瑞莎·德·劳拉提斯、简·盖洛普、黛安娜·弗斯和卡佳·塞尔弗曼。

8 对双性同体的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批评,参见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263—297;达利,《超越父权宗教的质跃》和《妇科/生态学》;和雷蒙德。关于女性主义论辩,见《女性学研究》专论双性同体的专刊(1974年秋,2期)。关于该概念在女性主义社会学研究(尤其是心理学)中的广泛使用,见亚历山大·卡普兰;卡普兰与宾恩。南茜·托宾·贝辛(《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双性同体幻想》的作者)与我直接感受了女性主义从双性同体话语转移出去的后果。我们尚未完成一个有关双性同体与女性主义的两卷本选集的漫长工作,该术语就已经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基本上失去了合法性。我们无奈之下只有放弃该项目。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义对双性同体一词的使用与抵制的描述,见我的《双性同体》。

9 双性同体的概念也存在于一些法国女性主义的思想中,尤见于西苏的“预言的双性同体”的概念(《美杜莎的笑声》)和对以下一点的坚持:不论女性在拥有女性本原上享有多大的特权,女性本原并非女性独有的特点。

10 此类的早期分析包括罗宾·摩根的《义重如山姐妹情》中收录的弗朗西丝·比尔、埃莉诺·赫姆斯·诺顿、黑人女性解放团体和恩瑞格塔·瓦斯格等的文章,以及那些有关种族、阶级、同性恋主义、人口老化、娼妓、中国女性等问



题的文章；在薇薇安·寇尼克和芭芭拉·莫兰的《性别歧视社会中的女性》中收录的凯瑟琳·斯蒂姆森、西德尼·阿伯特和芭芭拉·洛弗等人的文章；艾丽斯·沃克的《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1974）和《自己的孩子》（1979）；芭芭拉·史密斯的《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1977）；和康比河集体（1977）。在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课程中经常教授的小说、诗歌和自传也包含了类似的观点（例如哈丽雅特·雅各布斯、瑞克里芙·霍尔、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艾丽斯·沃克、汤婷婷、奥德莉·罗德和宝拉·戈娜·艾伦等人的文本）。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整体上强调女性内部的阶级差异，以及由帝国主义产生的差异。

11 欲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的大量关注女性内部差异的理论文章，尤其是那些以种族或族裔概念为基础的文章，参见诺玛·阿拉尔孔，《〈此背谓我桥〉的理论主体与美国白人女性主义》；阿尔伯莱希与布鲁尔；宝拉·戈娜·艾伦；安莎杜娃；波恩；柴；科尔；柯林斯；迪尔；杜西勒；弗兰肯伯格与马尼；加林与弗古逊；戈登，《论“差异”》；古纽与耶特曼；黑维特；希金博瑟姆；胡克斯；霍尔、斯科特与史密斯；霍达多；黛博拉·金；劳德；鲁冈；鲁冈与斯伯尔曼；马尼，《多重思考》；马丁与莫安提；莫拉加与安莎杜娃；钱特拉·塔尔培德·莫安提；莫莉娜，《碎片》；夏恩·弗兰；里奇，《论定位政治》；沙蒂瓦尔—霍尔；桑多瓦尔；斯皮瓦克；齐默尔曼；和津恩与迪尔。 256

12 克罗斯比审视了她在这种对差异的推崇背后所见的基要主义的循环，但在超越这一困扰她的现象上却没有提供太多方法。关于女性主义理论内的差异话语的流行，还有一些其他的发人深省的基础性批评文章，参见加林与弗古逊；戈登，《论“差异”》；凯斯勒—哈里斯；古纽；和黑维特。

13 例见约翰内塔·科尔的《共性与差异》；葛洛莉亚·约瑟夫与吉尔·刘易斯的《共同的差异》，其中他们声称“然而，联盟建立的基础是要认识到这一点：不同阶级与不同性偏好的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在抵制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中，所站的立场不同”（3）。对于将这个对差异的观察，当作联盟的普适化的先决条件，我心存疑虑，因为这种对差异的预先关注，可能会妨碍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同盟关系。

14 鲁冈尤其抨击朱迪斯·巴特勒与多娜·哈拉维，认为她们对异质性的拥护，分裂而不是培养了对“种族、性别、文化、阶级和其他差异的罗网”的理解（“Purity” 475）。还见鲁冈与斯伯尔曼。

15 对陶斯格作品的借用还应包含对这一点的批评：他在对模仿的分析中

没有审视社会性别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他一开篇就毫不质疑地使用一位分娩女性的例子来代表“客体的客体化”、“真实的真相”，而且这一切的观察者还是作为模仿与再现的执行者的两位男子（作为人种学者的他自己和那位土著萨满祭司）。这样，他通过一系列的相互关联的二元对立（女性/男性、自然/文化、真实/再现）再次生产了他原本要批评的他异性。

16 这种对自然性别/社会性别/性征的强调，并不排除其他的差异轴线。例见特瑞莎·德·劳拉提斯的介绍，她的文章发表在《差异》论酷儿理论的专刊（1991）上，这个专刊的推出被视作标志酷儿理论形成的开幕式。在该文中，她将人种与族群的问题详尽地结合起来，对主体性和政治进行了定位式的分析。尽管《性别麻烦》仅仅审视了自然性别/社会性别/性征的纽带，但巴特勒的《重要的身体》（1993）包含了对种族的思考。而她在为巴特勒与斯科特的《女性主义者理论化政治》所写的介绍中，强调了要考虑多重立场。

17 尤见巴特勒，《性别麻烦》，x、1—34、43—56、142—149；伊里加蕾，《话语的权力与女性的从属》，68—85；巴巴，《论模拟与人》（“Of Mimicry and Man”）和《引为奇迹的符号》（“Signs Taken for Wonders”）（《文化的定位》，85—92、102—122）。对酷儿理论中的表演性的又一用法，见塞吉维克的《酷儿表演》。塞吉维克在《暗柜认识论》（尤其1—90）中将酷儿理论和性征用作一种差异轴线的做法，实现了差异性同一性的对话，提倡在有关同性恋的“少数化”话语（它强调异性恋与同性恋性征的差异，为这个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少数派争取权益）与“普适化”话语（它强调所有的性征都是被建构的，向所有的越界性的酷儿主体性开放）之间进行协商。

257 18 对本章草稿的私人交流，1997年8月8日。我感谢他的机敏的评论（引用在正文中）和对史密斯的舞台表演的描述，我本人没有看过她的表演。《镜中火》的录像突然从一个场景切换到另一场景，没有服装或背景变换上的过渡。

19 有关史密斯的讽刺表演所引发的对其作品接受的争议，见莫德莱斯基所做的综述与分析。由于篇幅限制，我不能展开讲述史密斯表演的不同场所，对她的话剧的不同接受，以及史密斯的文本所历经的修改——莫德莱斯基涉及了所有上述问题。对于她有关吟游表演的观点，我想加上这一点：史密斯僭越了剧院的传统。传统上，戏剧界允许男人扮演女人（例如，古典和复兴时期的戏剧，男扮女装），也允许白人扮演黑人或其他种族人士（例如，《帝王》、《蝴蝶夫人》、《西贡小姐》），但却认为由女性来扮演男性，或由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士来扮演白人，不能令人信服。

20 皮尔斯还指出史密斯超出了布莱希特著名的“陌生化效果”，因为她不仅仅展示了自我的社会和经济建构，也展示了自我的“多样性和延展性”以及表演性。

21 在两个剧的文字版本中，史密斯将独白者的台词线性排列成诗歌一样的形式。这种形式一方面标记了表演性的停顿、空白和言语韵律，另一方面提醒读者，她身为作者对文本进行的干预。史密斯删去了她的受访者的一些话语，但她坚持每个字都是出自受访者之口。

22 我感谢伊斯梅尔·阿卜杜拉介绍我了解阿拉伯语的杂混概念 (*tahjien*)。据他说，该词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蕴义。例如，他解释道，在苏丹，南北之间的地区、宗教和种族差异令人既拥护又抵制文化杂合。此处以下，西班牙语的混杂文化 (*mestizaje*) 和美斯提若 (*mestizo*) 二词将不再斜体，因为它们已经被日益吸收入英语之中。

23 我更偏爱融合主义这个术语，因为它扎根于宗教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其历史的种族韵味较少。但是，我发现许多人对该词无动于衷或不置可否，但是却能立即辨识出杂合一词并对它的讨论做出反应。我感到，在墨西哥、拉美、波多黎各和广义的西语圈子内，美斯提若一词及其具有的种族超定因素，也能因为同样的原因激起类似的反应。对各种术语的超定因素的评论探讨，见扬；和乔纳森·弗里德曼，《全球体系》。

24 《牛津英文词典》指出该词的拉丁词源是 *hibrida*，意指野猪与家猪的后代。英语中对该词的使用最早可上溯到 17 世纪初。一个例子就是 1630 年本·琼森将杂合与种族问题联系起来：“她是个野蛮的爱尔兰小孩，先生，而且是个杂种”。( *OED* 1354 )

25 鉴于地区、地缘政治和历史的巨大差异，对跨种族、跨民族和跨宗教的强奸、性行为、同居和 / 或婚姻的历史，需要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而且应由不同的人种、族群或宗教团体来完成这项工作。

26 扬在审视杂合与种族主义的相互交错的历史时，拒绝将白人与其他人种对立起来的简单二元划分，而是强调西方的态度和实践具有异质性。例如，19 世纪的英国人骄傲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杂合的混种民族，由凯尔特人、萨克逊人及其他人种混杂而成。但与这种对种族纯正性的拒绝同时发展的，还有歧视黑人、凯尔特人、犹太人、亚洲人和其他人种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欧洲大陆上兴起的雅利安意识形态 ( *Young* 1—28 )。还可见韦伯纳对杂合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历史综述 ( *Werbner and Modood* 1—28 )；乔纳森·弗里德曼，

《全球体系》。

258 27 使用“杂合”一词的人倾向于，在该词的这三种意思中的至少两个之间（如果不是全部三个的话）变来变去。然而，我大致将一些重要的文化杂合的理论家对该词的使用分类如下：拉什迪、扬和肖哈特将之用作差异融合之意，吉尔罗伊、童灿、南迪、汉内兹、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克利福特、阿帕杜埃、洛尔、霍尔、吉甘迪和郑明河将之用作差异混杂之意，而罗沙东、坎西利尼、巴巴、韦伯纳、克利福特、斯特拉森、弗古逊与库塔、皮特丝和怀德海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融合性的。对于各种观点，见韦伯纳与摩都德。关于此类辩论的综述，见韦伯纳；帕帕斯特爵迪和皮特丝。

28 尤见巴赫金，《对话的想象》，375—429。扬对其观点的借用，尤见20—24；和韦伯纳与摩都德，尤见4—6。

29 和声音一样，人类的身体在全球各地呈现出多样的关注点与色度。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讨论的，种族的概念充当了音素的功用，将某些生理和/或文化的差异挑选出来，当作承载意义的差别之处。因而，尽管人类的肤色有着无数种的深浅色调，但用来反映种族的文化建构的肤色音素，却只有少数几种。目前，在西方，这些类似音素作用的肤色有以下五种：白、黑、棕、红和黄，武断地表示了五种不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

30 韦伯纳将这一矛盾之处的起源，定位于从现代性（她将之与杂合所扰乱的固定的、有边界的认识论体系联系起来），向后现代性（干扰与杂合是其中的常规之事）的过渡过程中（1—28）。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将杂合太窄地定位于了“现代”中（不论现代一词到底有何含义）。我认为，或许由于杂合一词起源于物种混合的概念，她所指出的这一矛盾，存在于文化杂合概念本身及其目前的调用之中。关于认为文化杂合是一种常规状态的人士，见注27；关于认为其是一种越界和/或解放力量的人士，还可见帕帕斯特爵迪；郑明河，《自我之外/另一自我》；钱伯斯；和拉什迪。

31 译注：中间通道（the Middle Passage）指的是奴隶贸易船从欧洲至非洲，之后到美洲，再回到欧洲的“黑三角”航行中自非洲西海岸运送奴隶至西印度群岛及日后至北美的那段旅程。据历史学家估计，从1505年到1865年，大约有一千万非洲黑人经“中间通道”被运抵美洲贩卖为奴。在当今的加勒比文学中，“中间通道”成为一种隐喻黑人悲惨命运的象征。

32 还见亚历山大的《裂纹线》。从空间角度总结杂合这一概念的学者，见拉什迪；阿帕杜埃；钱伯斯；克利福特；布雷多迪；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皮

瑞—托里斯;郑明河。认为杂合与(后)现代性有着格外关联关系的学者,见坎西利尼;韦伯纳;汉内兹;拉什迪;慕克吉;童灿;维斯韦沃兰,尤见114—142;和韦伯纳与摩都德的《辩论文化杂合》论文集中的大多数作者。

33 文化杂合更具弹性与创造力,能够适应变化并从变化中受益。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桑德拉·贝姆(见卡普兰与宾恩,48—62)也对双性同体的男性或女性做过类似的论断。大部分我对文化杂合所做的论断都适用于性别杂合。性别杂合是个复杂的话题,值得进行专门的详细探讨。

34 关于“文化转移”的各种定义,见玛丽·路易丝·普拉特,《帝国之眼》(6);关于“变形”的定义,见吉尔罗伊,《黑色大西洋》,37。其中,他引用了塞拉·本哈比在《批判、标准与乌托邦》一书中对该术语的探讨;关于“沟通”的概念,见巴巴,《理论的奉献》(Location 19—39)。

35 见朱迪·普登,《图绘差异》。该文主要聚焦于巴巴的杂合概念,认为这一概念是对德里达的差异与延异概念的一种修正式混合。不过,尽管她批评巴巴的杂合作品缺乏一种连贯性,但在我看来,这些变化的意义代表了一种力量。对于那种试图将这一概念限定为许多可能形式中的一种的观点,这算是一种健康的抵制。

36 例见肖哈特;格鲁沃与卡普兰,《零散霸权》,7—8;乔纳森·弗里德曼, 259  
《全球体系》;斯皮瓦克,《深入教学机器》,255;雷,《迁移再思考》;和科希。格外遭到抨击的有巴巴、霍尔、吉尔罗伊和拉什迪等人的杂合理论概念。

37 关于在边境话语研究上取得“理论地位”的其他有影响力的奇卡诺美学作品,吉列尔莫·戈麦斯—潘纽的《新世界边界》和他的表演艺术可为一例,它们将杂合、表演性、戏剧与“‘世界’旅行”结合起来。关于拉美、墨西哥和奇卡诺/娜的边境书写的讨论,见坎西利尼;梅迪纳;沙蒂瓦尔—霍尔;希克斯;卡尔德隆与沙蒂瓦尔;沙蒂瓦尔;雷博勒多;和桑多瓦尔。

38 对《边境/荒界》的一些实质性讨论,例见格鲁沃,《自传主体与离散定位》;沙蒂瓦尔—霍尔;诺玛·阿拉尔孔,《〈此背谓我桥〉的理论主体与美国白人女性主义》;张;梅迪纳;昆塔娜;和托里斯。对该文本的简要讨论或顺便提及更为常见,例见雷博勒多;和沙蒂瓦尔。

39 译注:纳瓦特尔语(Nahautl)是墨西哥中部许多原住民群体所用语言的总称,是历史上阿兹特克帝国的语言。

40 沙蒂瓦尔—霍尔;沙蒂瓦尔;梅迪纳;雷博勒多;昆塔娜;和格鲁沃均评论过该文本的多语言、多文类、后现代或实验性的形式。格鲁沃认为《边境/荒

界》是对“现代主义”主体性的一次“后现代”解构，并认为它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主义者的一个写作特色（“Autobiographic Subjects”）。“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这两个术语之间的滑动忽略了以下这一点：蒙太奇、拼贴、文类杂合和去中心化的主体性已经发展成现代主义实验主义的特征。安莎杜娃的文本当然反应了她作为一个奇卡娜的立足点。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杂合探索文本，它还与现代主义作品，如 H.D. 的《三部曲》，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格鲁沃的文章对差异话语进行了排他性的强调，这遮掩了该文本的形式主义杂合并压制了其复杂性，而复杂性正是格鲁沃与卡普兰的令人赞赏的论文集《分散霸权》运作的背景。

41 见本书第九章对 20 世纪女性长诗的讨论。我将把《边境 / 荒界》划归这一“新”文类中，还有其他的杂合文本，如史尔戈的《讲故事的人》和查的《听抄》。

42 我感谢鲁本·梅迪纳帮我修改此处的论点，他自愿让我分享他对《边境 / 荒界》进行缜密评论的手稿：《葛洛莉亚·安莎杜娃：“混杂文化”的政治与诗学》。在他的论点中有这样一点：该文本的个人焦点和奇卡诺对墨西哥历史的挪用，略去了影响奇卡诺 / 娜（尤其是那些被困于边境的物质经济中的奇卡诺 / 娜）的环境条件的变化特性、墨西哥与奇卡诺 / 娜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印第安人在当今墨西哥社会的真实境遇。他的评论令我联想起女同性恋和有色人种女性对异性恋的白种女性主义者的抨击：异性恋的白种女性主义者倚重“个人问题即政治问题”的口号，但是并非每个人的“个人问题”都相同。用自传来生产理论，这么做存在一种危险。一个人的环境条件，即使与一个集体的历史联系起来，不一定就能被推而广之。

43 第一部分结束于第 7 节，标题是《美斯提莎的良知：论一种新意识》，它的最后一个小节题为《回归》。第二部分结束于第六节《回归》，内含四首关于美斯提莎意识的诗（一首用西班牙语，其余英语）。第一部分的第 2 节至 6 节和第二部分的第 2 节至 5 节在主题强调上大致平行，涵盖了以下主题：奇卡诺人与印第安人历史上遭受的压迫；在父权制的盎格鲁、奇卡诺、墨西哥和阿兹特克体系内的社会性别与性征问题的意义；一种对抗性诗学的形成过程，而激发它形成的是对湮没于历史、精神与欲望的重写本中的女性 / 母亲神祇的重新建构。

44 安莎杜娃对奇卡诺人将墨西哥与阿兹特克文化加以浪漫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她还承认同一文化内部存在差异，丹尼尔·库珀·阿拉尔孔在引用安莎杜娃时对她的这些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暗示安莎杜娃也参与了对中美洲原

住民的印第安特性的造神运动,他认为这种神话化手法是一种特色手法,许多当代的奇卡诺/娜书写都曾用这一手法,来对原初形态的过去进行启发式重构(尤见141)。由于《边境/荒界》的第一部分的注释提供了解读安莎杜娃的一个源地图,我们能够很有用地梳理出“墨西哥特性”这一概念及其含义的知识谱系,看这一概念如何在20世纪墨西哥人和奇卡诺/娜对国家与种族身份的构建过程中逐渐发展而来。

260

45 对于巨蛇女神演变为阿兹特克宗教和基督教中的两种不同形式的造神叙事,安莎杜娃或许有,也或许没有经验主义的基础。在该文本内,它与罗德的《查米:吾名之新拼写》、朱迪·格伦的《权杖王后》以及H.D.的《三部曲》、《海伦在埃及》和《秘密定义》之类的文本中反映的,一度遭到诋毁但最近重新被发现的女神的“新神话”,具有类似的功用。我相信梅迪纳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边境/荒界》基本没有尝试,将文本中出现的边境文化的物质效果,与美斯提莎的比喻和心理维度所关注的精神变化联系起来。格伦与H.D.(在《三部曲》中)使用了不同的,或许更为成功的策略,来阐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联系。

46 在一次私下交流中,索尼塔·萨克挑衅地质疑,像安莎杜娃那样的有色人种女性就被允许“没有国家”,可以游离在由女性主义者和女同性恋者组成的想象的女性团体之外,而那位被安莎杜娃的这个宣言明确呼应的英国女性,弗吉尼亚·伍尔夫,却因为在《三个基尼》中发出类似的以下声明而受到指责:“作为女性我没有国家。作为女性我不想要国家。作为女性我的国家是全世界”(109),这个差别究竟是因为什么?阿德里安娜·里奇将这一引文当作消极文本的样板,以之为基础来批判女性主义者对女性内部差异的擦除(“Notes”)。还见伊莱恩·张对安莎杜娃此段的讨论,张的态度不是批判性的(255),以及我在本书第六章对伍尔夫的那段引文的讨论。

47 或许是为了强调甚至与非西班牙语读者沟通的紧迫性,这首诗(与大部分的文本不同)添加了注释,将其中的西班牙语单词翻译为英语:“gabacha——奇卡诺用来称呼白人女性的词汇;rajetas——字面意思为‘撕裂’,即,已经背弃了你的诺言;burra——驴;buely——牛;sin frontera——没有边界”(195)。这之后的两首诗(其中,后一首有西班牙语和英语两个版本)关注了她的缪斯的宗教融合和la Raza(种族)的文化融合,而这深深扎根于印第安文化之中的融合“在几年或几个世纪之后”将会“升起,口舌完整/承载所有文化之精华”。(203)

#### 第四章

本章的前身是提交给 1996 年 6 月在克莱姆森大学召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国际专题研讨会的论文,该论文后来发表在《南卡罗来纳评论》1996 年的一辑专刊《国际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中。本章在该文的基础上做了重大修改。我感谢主编该专刊的韦恩·查普曼,也感谢戴尔·鲍威尔和克莉斯汀·芙洛拉的中肯建议。

1 不考虑具体环境就对女性主义一概加以国际化,这一做法的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玛丽·达利的《妇科/生态学》。鲜有人质疑郑明河的《女性——土著——他者》中的第三世界的拼装式方法论,但我认为它应该在这方面受到质疑,虽然该文的理论概括具有一定价值。

2 尤见塞吉维克,《暗柜认识论》,27—35。参见她对所称的“公理二”的讨论:“性征的研究并不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同向延展;相应地,对恐同心理的质疑并不与女性主义的质疑同向延展”。(27)塞吉维克将性征与社会性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轴线,这一做法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尤其是在酷儿理论家中,因为在自然性别/社会性别体系内对(染色体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本身就存在问题。例见巴特勒,《重要的身体》和比迪·马丁,《不平凡的同性和对平凡的恐惧》。然而,塞吉维克的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性征在文化研究中得以确立地位,不再仅仅是社会性别问题或同性恋问题的一个分支概念。

261 3 不可避免的一点是,地球之外的空间也将会日益受制于政治建构。但我的主要关注点是由人类社会居住并/或控制的空间。太阳系和“外太空”在人类的想象和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4 一些理论家区分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认为“空间”指涉某种预先存在的实体,在文化建构中它会转变为具有特定含义的“地方”。然而,我质疑这种区分,正如我会质疑“时间”一样,因为我认为,我们思考空间的任何一种方式都已经是一种形式的文化建构。在人类思维之外肯定预先存在事物,但是我认为我们无法跳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建构的思维模式来接近它。见本书的第五章和注释 14。针对地理学科内的男性主义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见罗斯。

5 尽管塔里格·摩都德没有直接的理论概括,但我相信这是他在《“差异”、文化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中,对保罗·吉尔罗伊的多少有些隐晦的批评的主旨所在。在该文中,他反对在英国进步地使用诸如“黑人”这样的种族概念,因为它会遮掩有加勒比海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血统的人群之间的族群差异。



玛丽亚·鲁冈将自己彻底地定义为“有色人种女性”，以与所有的白种/盎格鲁女性相对。在这么做的同时，她忽略了她身份认同中的地缘政治轴线，它扎根于她的阿根廷背景。因为地缘政治边境在葛洛莉亚·安莎杜娃的作品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边境/荒界》中的种族轴线并没有涵括它的地缘政治轴线。见本书第三章对她们作品的讨论，以及沙蒂瓦尔—霍尔对地缘政治边境和女性主义的理论总结。

6 见本章的开篇引文：萨义德，《知识的政治》，28。

7 他这样捍卫他对英国、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聚焦：其他的欧洲帝国主义（例如，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和奥斯曼帝国缺乏前三者的“独特的连贯性和特殊的文化向心性。”（*Culture and Imperialism* xxii）他甚至没有提到20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没提及其他的非西方帝国的存在（如，中国、蒙古、印度莫卧尔王朝、达荷美王国、祖鲁、桑海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等等）。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萨义德对“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元叙事，具有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重新铭刻了他所反对的那个西方的中心。《东方主义》仅仅审视了欧洲在中东的统治，而《文化与帝国主义》则在全球范围内审视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抵抗：“这两种因素——帝国文化的普遍的全球范围的模式，和抵制帝国的历史经验——使得本书不仅仅是《东方主义》的一个续集，还是对其他方面的一个尝试。”（xii）见吉甘迪在《图绘英国特性》中对“英国特性”通过殖民他者的参与得以建构的分析，这种方法避免了萨义德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的简化倾向。

8 罗伯森借用了日本商业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全球本土化”一词。该词在商业研究中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微观市场营销（28），罗伯森用它来指更为广泛的文化概念。还见费瑟斯通、拉什与罗伯森；安东尼·金；和霍尔，《本土与全球》。

9 斯皮瓦克将她的跨国分析概念，与比较分析和全球多元文化主义都区分开来。相反，她聚焦于“在国际框架内的交流”，并暗示“我们既需要对西方进行人类学的研究，还需要研究非洲、亚洲、亚太和美洲的各种文化体系，将其居民当作历史能动者对待。”（“Scattered Speculations” 262）在《女性主义与差异政治》一书的导论中，斯尼亚·古纽和安娜·耶特曼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方法论，来抵制全球与本土的二元对立，他们称之为“从有利害关系的普遍主义角度出发来思考”，意思是指那种被具体化并被嵌入权力关系之中的普遍性（xiv）。

10 对于“家”的概念的不稳定性和建构性的争论十分普遍。对于此类讨论（尤其是女性主义讨论）的例子，参见马丁与莫安提；安莎杜娃，《边境/荒界》；

格鲁沃,《家园与闺房》;米妮·布鲁斯·普拉特;乔治·罗伯森;塞拉浦;郑明河,《自我之外/另一自我》;劳伦斯;科比;布罗与英格拉姆;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尤见161—166;布雷多迪,《游牧主体》;亚历山大,《到达时的震惊》;卡罗尔·博伊斯·戴维斯,尤见113—129;巴莫尔;托马斯·福斯特;钱伯斯;和拉达克里希南,《离散的沉思》。我并非在此处图绘这些争论,而是给“家”打上了引号,以示它缺少固定的含义。

11 尤见鲁思·贝哈对贝哈与戈登的《女性书写文化》所做的介绍(3—6),克利福特与马库斯没在书中收纳任何女性人种学家,贝哈对这一点表示了痛苦与愤怒。克利福特与马库斯用这种极其不准确的话语,来解释他们的这种排斥行为:女性主义人种学“既未产生非传统形式的书写,也未产生对此类人种学文本的深度思考。”(21)贝哈并没有提及克利福特对泰勒照片的不全面的分析,但是对他的讨论的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在谈话中广泛传播。克利福特的《记旅行与理论》和发表了该文的1989年的那期《铭刻》期刊,都试图弥补上述对女性的排斥,强调了女性主义理论对文化理论的重要性。我感谢人类学家提林·纳拉严和玛丽娅·利波斯凯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12 斯皮瓦克受过比较文学的训练。她将她所称的“跨国文化研究”与“比较工作”区分开来,因为后者与欧洲中心主义有联系(“Scattered Speculations”)。还见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抨击,43—61。在《家园与闺房》中,格鲁沃呼吁“跨国式的研究方式,而不是比较的分析模式,因为比较的方法本身不包含地缘政治力量的概念,而后者是使比较分析成为可能的条件。”(17)她引用《公共文化》期刊的创刊声明说道,“许多关注遥远文化的比较研究最终以此结尾:一,‘通过西方在话语舞台的缺席而使西方成为一个例外’;二,将‘第三世界’均质化”(18)然而,她的确肯定了一些“比较工作”,它们要么“通过把它们带回家园的方式”解构殖民话语,要么指出了立场特异性、权力的流动和不对称关系(18—19)。还见巴巴在《文化的定位》(6)中对“批判性比较主义”的呼吁。

13 与国际弗吉尼亚·伍尔夫协会年度会议同时召开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国际专题研讨会,审视了伍尔夫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接受情况,以及她作品中的国际印记。见查普曼主编的《南卡罗来纳评论》为这次专题研讨会而出的专刊。

14 尤见伍尔夫,《普通读者》和《三个基尼》;以及我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阅读教学场景》。

15 里奇引用的是《三个基尼》的第三章(108—109)。在该章中,伍尔夫的

书信体的写作人物拒绝捐出一个基尼加入为和平献身的一个团体。相反,她描绘了她想让所有受教育者的女儿都加入的局外人协会,这个协会要求对爱国主义“无动于衷”并拒绝国家身份认同。在之前的文章中,里奇赞许地引用了《三个基尼》中的相关段落,伍尔夫在其中警告读者不要加入受教育者的行列(*On Lies* 131—134, 212—213, 278, 303)。还见凯瑞·卡普兰对伍尔夫的“全球女性主义”的相关评论,卡普兰将之与跨国女性主义进行了对比分析(*Questions* 161—162)。将葛洛莉亚·安莎杜娃对伍尔夫该段落的引用及索尼塔·萨克对里奇的评论置于这个背景下的讨论,见第三章,100和注释44。 263

16 参见布莱伯里和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名称及性质》;和布莱伯里,《现代主义之城》,载《现代主义》(19—56, 96—104)。还可见博洛夫对现代主义研究的综述,它将国际性当作现代主义的一个关键的定义性组成部分(“Modernist Studies”尤见158)。

17 对古典文学与人类学等学科在“西方”和“欧洲”等建构概念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讨论,尤见伯纳尔和特鲁诺。

18 例见托洛夫尼克的《逝去的原始风情》,尤其她在《将原始物品变为高雅艺术》一章中对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罗杰·弗莱的讨论,75—140。托洛夫尼克声称,和许多西方艺术家一样,弗莱非常崇拜非洲的雕刻与面具,但是却不愿称这些“原始”之物为“艺术”,直到它被移植到欧洲的背景之下。托洛夫尼克平行地分析了文艺复兴之后的旅行写作和西方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19 一个重要例外就是伍尔夫1928年和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一起去法国的长达一周的旅行,当时两人的关系正值最炽热的时期。1934年她哥哥乔治·达克沃斯去世时,伍尔夫正在爱尔兰度假。依据昆丁·贝尔的传记中记录的伍尔夫的旅行,我相信伍尔夫最常去的外国目的地是意大利,她至少在1904年、1908年、1909年、1928年和1935年去过意大利。贝尔还在20世纪30年代那一节中提到,伍尔夫“每年都出国短途旅行”(2: 189)。但是他写道,伍尔夫“一旦离开她自己的国家,从未感觉过自在”(1: 154)。不论怎样,伍尔夫没有表现出斯泰因、乔伊斯、康拉德、庞德、H.D.、劳伦斯、福斯特、里斯和米娜·罗伊等其他现代主义作家对旅行或国外定居的热情,对于这些作家而言,离开乡土是他们写作的前提条件与/或灵感。我感谢让·莫科夫特·威尔逊督促我完善这个对伍尔夫旅行的简短介绍。

20《远航》、《弗勒希》和《奥兰多》等小说的场景主要设置在英国之外(《奥兰多》的程度相对较轻)。伍尔夫的文章有一些谈论美国和俄国的作家,但是在

讨论庞德、艾略特、甚至 H.D. 等作家时，伍尔夫的关注点主要还是英国的文本。

21 尤见《共同语言的梦想》；《对文明的不忠》（*On Lies* 275—310）；和《异性恋霸权》（*Blood* 23—75）。

22 在其经典的文集《现代主义》中，布莱伯里和麦克法兰所列的简要生平汇编中收录了一百个条目，其中只有四位是女性：伍尔夫、斯泰因、多萝西·理查德森和伊迪丝·索德格朗。前三位的生平介绍里充斥着轻蔑性的评价，这与男性现代主义作家的条目中多为描述性的口吻大不相同。

23 例如格鲁沃与卡普兰的《零散霸权》中的玛丽·雷雍、利迪亚·刘、纳里尼·纳塔拉坚和诺玛·阿拉尔孔。

24 例见德科文，85—138；劳伦斯，154—206；特拉特内，79—96；卡明斯；多伊尔，139—173；和弗里德曼，《空间化、叙事理论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远航〉》。

25 在伍尔夫的评论家中，琼·卡明斯的《〈远航〉与〈幕间〉：帝国的阅读》是一个例外。我同意她的这一观点：和福斯特很像，伍尔夫既批判又参与了英国的东方主义。尽管我同意凯茜·菲利普斯在《批判帝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中的观点：伍尔夫在其所有作品中对英帝国进行了全面而有力的抨击，但我认为她过快地打发了她所称的伍尔夫的“令人不愉快的偏见”、对非西方人的“冒犯性的”提及和种族“不敏感”，忽略了它们的意义（xxxiv；xxxv），从而没有看到伍尔夫的作品是如何参与了她所批判的意识形态的形成。

264 26 卡明斯在第六次弗吉尼亚·伍尔夫年会上的论文即是围绕这个地点的选择展开。她认为伍尔夫对斯凯岛的选择，受到她所阅读的塞缪尔·约翰逊的《赫布里底群岛之行》的影响（“Lily Bricoe’s Journey”）。

27 “Mc”是典型的爱尔兰前缀，苏格兰与之相对的前缀是“Mac”。小说结尾处划船到灯塔去的赫布里底岛民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父子的姓中即有“Mac”。见卡明斯对麦卡利斯特父子的原始主义功用的探讨（“Lily Bricoe’s Journey”）。据特雷弗—罗珀所言，苏格兰西部很多地方都居住着爱尔兰东北部的移民。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在苏格兰西北部会见到人名中带有典型的爱尔兰前缀。“麦克纳布”这个名字还带有雪莱的麦布女王的底蕴，即雪莱在其政治激进诗歌《麦布女王》（1813）中塑造的那个仙后，她是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的宠儿。

28 见130—131。该处提到她的两次饮酒，以及她对音乐厅歌曲和闲谈的喜好。与乔伊斯、劳伦斯、里斯、福斯特和斯泰因等现代主义者不同，伍尔夫很

少尝试深度展现工人阶级或外国人士的内心世界。《达洛维夫人》中的露西娅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幕间》的伊撒就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例外,因为对她的爱尔兰身份的惟一提及,是她有一次偶然提到,她是“住在温布尔顿的两位老夫人的侄女。这两位夫人本姓奥尼尔,是爱尔兰古代王室的后裔,她们对这一点引以为豪”。(16)然而,伊撒对她在报纸上读到的,受到怀特霍尔街的警卫士兵轮奸的那位女性,表达出的强烈同情心(20),以及她对诗歌的充满内心情感和浪漫的引用,或许呼应了爱尔兰的受害者形象以及英国的这一文化叙事:爱尔兰人是一个缺乏理智,凭直觉感知,情绪化,并且有口头表达才能的“种族”。对英国的种族主义与爱尔兰人的讨论,见多伊尔;郑;和米奇。

29 伍尔夫尝试做的正是 S.P. 莫安提认为对联接“我们”和“他们”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想象他者的能动性。

30《远航》中雷切尔的溯河而上的旅行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她在途中订婚并染上登革热。正如德科文、劳伦斯和丽莎·威廉姆斯所指出的,伍尔夫显然重写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灵》,用上游的南美洲“土著”形成原始主义的背景,并将主人公的“原始主义”热情投射于其上。然而,在伍尔夫对原始主义情节的使用中存在一个令人迷惑的非常规之处:她没有记录西方旅行者观看村落中的土著的人种学凝视目光,而是记录了土著女性透视作为异域他者的英国人的凝视目光。在简短地描述了跨文化遭遇之后,伍尔夫不下十次地反复提到土著人的凝视目光(284—285)。那些土著女性仍然没有发出声音,她们的主体性仍然不可想象,但是她们的凝视逆转了帝国主义单向反射的传统情节。对没有具体的地理和文化定位的“野蛮人”的宽泛指涉的确在伍尔夫的作品中时常出现。

31 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远航》,它开始时是一段离开家乡的海上航行。但是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如上游的情景、罗德里格斯医生和“他的愚钝的、毛茸茸的脸”(338)]、雷切尔发现桑塔玛丽娜英国殖民地是家乡的另一版本。

32 对媒体(尤其是报纸和摄影)所扮演的角色的描述,见兰勃特与贝德塞;格林。关于弗罗伦斯·南丁格尔和克里米亚战争的讨论,例见巴克。他说南丁格尔是位出了名的“极其实际的女性……不惧虚荣和男性的虚张声势”(212, 212—223)。关于卡罗琳·斯蒂芬、朱莉娅·斯蒂芬和伍尔夫等人对南丁格尔的讨论,见马库斯,《弗吉尼亚·伍尔夫》,45, 80—81。也见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南丁格尔的提及:“奇怪的是,多亏了这两场战争——将弗罗伦斯·南丁格尔从其书房释放出来的克里米亚战争,和约60年后为普通女性打开了门

的欧洲战争——这些罪恶（缺少金钱与知识自由）才逐渐得到改善”。（112）

33 丁尼生的儿子宣称这个短语是该诗中的原创（Tennyson, *Selected Poems* 367）。还见塔克，他引用编者按，将轻骑兵描述为“被某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匆匆送往死亡，”而英国士兵“并不因为感觉自己是某个丑陋的错误的牺牲品而无法动弹”。（27）丁尼生的诗作首先发表于1854年12月9日的《考察家报》上。一年之后，他省略了那个引起争议的短语，但却用另一种版本将之重新恢复（他称之为“士兵的版本”）并寄到克里米亚，在那里这首诗广为流传（Marshall 135）。该诗在不同的出版版本中经历了多次改变。对该“丑陋的错误”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记述，请见皮吉特，68—79；吉布斯，212—224；和巴克，160—173。

34 例见金凯德，他声称该诗中隐含的嘲讽不证自明（219—220）；和莫顿·卢斯，他称该诗是“对军队荣誉的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全国上下都应该为此心怀感激，既感谢这种荣誉也感谢这首颂歌。”（266）丁尼生对该诗不同版本的修订加强了这种模棱两可的感觉。除了划掉“有人犯了错误”之外，他还改动了该诗的最后几行（见正文中的引文）。有人认为，和较温和的版本相比，改动过的诗行十分明显地具有讽刺意味。

35 小说叙事者还在第31、32和36重复或呼应了这些话。

36 我对《到灯塔去》里的克里米亚战争的解读，早于我读到菲利普斯在《批判帝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中所做的平行讨论（113—115）。菲利普斯在该文中将该段解读为一段讽刺文字，它通过荒谬的并置点明了丁尼生的愚昧的爱国主义与父权制的家庭生活、职业军人精神和帝国之间的联系（113—115）。我与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她用这一段来捍卫她的观点——伍尔夫对帝国的批判，而我用这一段来理论概括地缘政治轴线在伍尔夫的家庭场景中的位置。

37 例见伊里加蕾，《话语的权力》。

38 丁尼生这位大英帝国的公共桂冠诗人，在伍尔夫的私人家庭历史中也直接占据一席之地。曾有一段时间，丁尼生居住在怀特岛。伍尔夫的姨姥、摄影师朱莉娅·玛格丽特·帕特尔·卡梅隆，经常为诗人及其家人拍照，以致引起谣言，认为她与丁尼生有暧昧关系。伍尔夫的剧作《淡水：一个喜剧》（写于1923年，1935年出版）嘲讽了怀特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交际圈。如菲利普斯指出的，其手法主要是在家庭场景之中对印度的英帝国进行了滑稽模仿（116—120）。卡梅隆的姐姐萨拉·帕特尔·普林西普斯在其住所“荷兰小筑”举办前拉斐尔派的沙龙。丁尼生与卡梅隆正是在这样的沙龙聚会上认识的。

伍尔夫的母亲朱莉娅·杰克逊在结婚之前常在那里充当模特。帕特尔家是伍尔夫与英帝国的直接家庭联系之一。帕特尔姐妹中有三个人都嫁给了印度的英国官员,包括伍尔夫的外祖母。她们的母亲也是“外国人”,来自法国。见贝尔, 1: 15—18; 德拉布尔, 970—971。

39 我感谢特拉特内(50)提醒我注意到这段耳熟能详的引文中有印度的存在。

40 我在此处借用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达的《序言》,和亚伯拉罕与托洛克的“地穴论”的概念。

41 见马库斯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中探讨的卡罗琳·艾米莉亚·斯蒂芬对伍尔夫的重要性(尤见85)。他还将卡罗琳和莱斯利的父亲,詹姆斯·斯蒂芬,描述为使英帝国合理化的人(80)。还见贝尔对伍尔夫的遗产和她1904年在剑桥的住宅的描述(vol. 2: 39, 1: 90—91)。

42 我在写完这个分析之后发现,菲利普斯也讨论过这个段落(xxxviii)。她认为它暴露了伍尔夫自觉的愧疚和对帝国的批评,而我在该段中没有发现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两者中的任一点。在我看来,一年五百英镑的收入是伍尔夫文本中对帝国经济的一个未受到质询的暗指。

266

43 参照沃克和布奇·埃梅切塔对伍尔夫进行的开创性解读,见图兹琳·吉达·阿兰的《妇女主义与女性主义的美学》。在1996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会议上,几个讨论小组参照美国黑人作家和非西方作家,对伍尔夫进行了比较研究,比较突出的论文作者有丽莎·威廉姆斯、图兹琳·阿兰、切拉·库林顿、艾伦·阿吉罗斯、苏珊·霍华德、珍妮弗·马古利斯、西德尼·盖尔·瑞麒、徐之文、贝思·瑞洁尔·道合提和琼·卡明斯。这些作品代表了将伍尔夫的解读国际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44 见《他们眼望苍天》中的第六章。该书是赫斯顿对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在南部收集的民间传说的小说再现,她还曾先后将这些故事融入《骡骨》(1930年与蓝斯顿·休斯合作完成,1991年出版)、《约拿的葫芦藤》和《骡子与男人》中。在所有这些作品中,门廊转喻地充当了美国黑人表演性的场所。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赫斯顿曾经读过《一间自己的房间》。

45 我将赫斯顿与伍尔夫并置起来,而这两位作家极有可能并不了解对方的诗学。这种并置偶然地将两个“门廊”并置起来,它们都是创造力的起源地点:伍尔夫的写作生涯开始于她的姑姑卡罗琳位于剑桥的名为“门廊”的房子中,而赫斯顿的写作生涯则开始于她的家乡(佛罗里达的伊顿维尔的纯黑人社区)

的门廊中。参见喀拉·卡普兰的《谈话的情欲》。传统的女性主义解读认为，詹妮经历了从沉默到发出声音的过程，但卡普兰反对这种解读，认为詹妮一直拥有言说的力量（99—122）。但正如我在《新现代主义研究》中论证的，卡普兰的解读虽然令人信服，但是低估了小说“门廊话语”的关键一章（第六章）中精心设计的，在沉默、克制的语言和爆发的演讲之间转换的文学游戏。

46 事实上蓝菲乐的确完成了她的自传。该书于1996年在南非出版，但是目前显然在美国书店中还买不到。

## 第五章

本章的雏形曾在以下场合宣讲：1996年4月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召开的叙事学会议、1996年9月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人文研究所，和1996年10月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英语系。我特别感谢人类学家尼尔·怀德海（他第一个介绍我了解人类学中的相关解读），还有卡玛拉·维斯韦沃兰、提林·纳拉严、玛丽娅·利波斯凯和所有的听众，他们曾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从而极大地帮助我修改本文。

1 在《论人种学隐喻》一文中，克利福特将修斯塔克的书当作一个积极的例子，来说明实验性或后现代的人种学。在这种人种学中，人种学家解构了经典人种学书写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强调人类学项目也是一种形式的书写。但是奇怪的是，在对研讨会论文集《书写文化》（其中也收录了他自己的文章）所作的前言中，克利福特与马库斯居然这样解释，女性人类学家为什么在其作者名单中缺席：女性尚未写出实验性的人种学作品。对这种对女性的排斥行为的批评，尤见贝哈和戈登的合集《女性书写文化》。

2 尽管《尼撒》反映出两人的能动性互动协作产生的结果，但修斯塔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忽视了，渗透到桑族的当代生活中的那些更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修斯塔克对尼撒在家庭和社团内部的个人历史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学的传统倾向：在一种文化行将消失之前，将其“准确描绘”。但她的关注大多忽视了，存在于桑族人与其周围邻居之间的压迫性的跨文化交往。关于桑族人的政治地位的报告，参见达雷。

3 例见艾伦，《学院内的黄女人》；安德森，《解读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的〈复仇〉》；和贝克尔。我感谢童灿·威尼楚库和埃伦·拉夫提对南亚和东南亚叙事实践提供的参考。不论存在怎样的文化差异，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太轻易地假想“东方”或“西方”、“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存在本质主义或均质化



的叙事传统。目的论的线性发展并不是西方叙事专有的财产,也不是所有的西方叙事都是线性的。例如,修斯塔克强调,尼撒的故事,和整体的桑族故事一样,有着强烈的线性倾向,具有清晰的开头、中间和结尾(*Nisa* 40)。

4 见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295;《文本的愉悦》,10、44—45、47;和《S/Z》,62—63、187—188、209—210。对巴特的论断的变化或批评,例见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尤其19—106,和《恐怖的力量》,尤见165;布鲁克斯,《阅读情节》,尤见90—112;德·劳拉提斯,《艾丽斯不》,尤见103—157;和弗里德曼,《女性书写中诗歌对叙事的颠覆》。巴特对叙事采取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弗拉迪米尔·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正如提林·纳拉严提醒我的,普洛普认为民间故事叙事的首要“功能”就是离开家庭的行为:首先是当一位家庭成员离开时(功能一),接着是当英雄离开时(功能六)(26, 39)。

5 用“后俄狄浦斯”一词,我并不是指在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发展而来的事物。相反,我指的是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叙事理论,它们改造或批判俄狄浦斯的叙事模式,但却没有超出它的疆界。对欲望和叙事理论的综述,见克莱顿,《巴别塔之乐》,61—90;和马丁,《近期的叙事理论》,尤见40—41、120—122。布鲁克斯的《阅读情节》、《身体作品》和《精神分析与故事讲述》再现了一系列的欲望与叙事的互动。关于前俄狄浦斯和/或同性恋的叙事理论,参见赫斯基;迪普莱西,《终点之后的写作》;弗里德曼,《女性书写中诗歌对叙事的颠覆》;阿贝尔,《叙事》;和布恩,《游轮度假》。关于监管欲望的叙事理论,例见克里斯蒂娃;D.A. 米勒,《小说与警察》;和伯萨尼。关于侦察的欲望和侦探小说,见托多罗夫;布鲁克斯,《精神分析与故事讲述》,61—72和《阅读情节》,23—32、269—280;关于叙事与性交的联系,尤见布鲁克斯,《阅读情节》,尤其48、61;斯科尔斯;D.A. 米勒,《叙事及其不满》,ix—xv;而对上述联系的女性主义批评,参见德·劳拉提斯,《艾丽斯不》,107—109;温尼特;穆尔维;和布恩,《婚姻情节中的现代主义策略》。

6 随着人类学家在过去的20年间日益对本学科进行基础层面的批评审视,许多人大量从文学研究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借用术语,来审问人种学作为一种形式的书写文类(甚至是一种独特的形式)所具有意义。尤见克利福特与马库斯;克利福特,《文化的困境》;贝哈与戈登;贝哈,《脆弱的观察者》;维斯韦沃兰;和曼加纳洛。文学评论家很早之前就借鉴人类学的洞见,尤其是詹姆斯·弗雷泽和嘉西·魏斯登的“扶手椅”比较主义;以及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马塞

尔·莫斯和维克多·特纳的结构主义理论。我借鉴的是较新一些的人类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和土著形式的人类学。

7 精神分析与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可以融合的，但是却超越了本章的研究范围。见沃德·克拉克，他借鉴弗洛伊德的“移情”，来讨论人种学家与人种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跨文化交往。还有一种方法认为，婴儿期的自我/他者的交往具有核心的重要性，这种交往在多数客体关系理论的精神分析中都能见到，尤其扎根于D.W. 温尼考特的作品中。婴儿与母亲（他者）的交往，通过对融合与分离的渴望，开始了个性化的过程。这一交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情感与心理基础，在它的基础上形成了在家庭之外的差异接触的边境上发生的跨文化交往。

268 8 克利福特·吉兹对文化的定义比我的更为窄化和静态。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有序的意义和符号的体系，社会互动依据它而发生。”（*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144）见罗沙东对一个更为“过程性的”，而非静态的，文化概念的呼吁，在这种文化概念中，“变化，而不是结构，成为一个社会的持续状态”（*Culture and Truth* 91—108，尤其103）；和格德·鲍曼的这一陈述：“‘文化’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一个抽象之物……一种启发式的方法，来解释人们如何理解世界并相应采取行动。”（211）对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的批评，见阿布—鲁戈，《反文化书写》“文化是制造他者的根本工具。人类学是一种职业的话语。它阐释文化的意义，以便说明、解释和理解文化差异。它还帮助建构、生产和保持文化差异”（143）。在我形成“文化”与“跨文化”是转瞬即逝的概念中尤其具有影响力的人类学理论，见福克斯，《重新捕捉人类学》；贝哈与戈登，《女性书写文化》；克利福特与马库斯，《书写文化》；弗古逊与库塔的论空间、身份认同和差异政治的《文化人类学》专刊；克利福特的论旅行的理论和旅行的理论家的那期《铭刻》专刊；和维斯韦沃兰的《女性主义人种学小说》。

9 这个区分受惠于童灿·威尼楚库的《地图上的暹罗》一书。对童灿的影响深远的作品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六章。

10 我之所以说“部分建构”，是因为个人身份认同的独特性，永远不可能完全依据其与社会等级划分的范畴，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多重的群体从属关系，来加以界定。

11 私下交流，1995年10月11日。

12 对于叙事理论对时间的这种推崇，我简要地列举几位重要的例外。首先是米歇尔·德·塞多。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格言式的一章《空间故事》（115—130）声称，故事是“空间的轨迹”（115），它们标明或跨越边界，或者

将边界确立为互动的空间(126)。还有爱德华·萨义德。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反对叙事理论对时间的强调,拥护对空间和定位的讨论(84)。对用空间性来增补时间性这一社会科学范畴的必需性的讨论,见弗古逊与库塔;克利福特,《空间的实践》,收录于《路线》,52—91;索佳;费瑟斯通与拉什,《全球化》;罗伯森;弗里德兰与波顿;基思与派尔;琼斯、纳斯特和罗伯茨;哈维;和罗斯。关于文化理论中的空间与时间争论的综述,见凯瑞·卡普兰,《旅行的问题》,143—187。

13 利科对叙事的空间范畴做了最为详尽的研究。见《时间与叙事》和《叙事时间》。他在其中批评了结构主义者对叙事的态度,认为他们的理论在建立模式和范式的同时,消除了时间的元素。然而,结构主义理论的空间化,与人物在情节中移动穿越的定位式空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利科反对的是理论的共时性行为。我在《空间化》与《空间化、叙事理论》中提倡的空间化,审视的是叙事的阅读实践,而非叙事内部的定位式空间。时间序列的问题,对于大多数的叙事理论而言,仍然重要。相比之下,空间化或“场景”所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例见华莱斯·马丁,尤其122—129;查特曼,尤其45—145;莫尔森。描写(包括场景)和叙事的二元对立,是叙事研究的规范做法。对这一规范的批评,见罗恩。她在《叙事》上发表的文章引发了1997年12月的《叙事》来信选登栏目上的有趣的电子邮件交流,这一交流肯定了将场景或描写与背景联系起来的普遍做法,场景或描写莫名其妙地成为一种处于叙事之外或背后的元素。例如,莫妮卡·弗鲁德尼克注意到,“人物(述行人)要求一个场景(描写),而叙事(情节)则大多在行动(和时间顺序)的范畴内配置”(1997年12月1日)。玛丽—劳拉·瑞恩则回应道:“关于描写与艾柯的幽灵章节的关系,我想说(只要描写与叙事保持合理的距离)它是一种倒置的关系。描写是被文本化的,然而它们能够被读者跳过,而且不会对情节的理解造成严重的损害(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完全被剥夺了功用;它们可以为主题的发展或者巴特所称的‘拟真效果’贡献力量)。”(1997年12月4日)

269

14 与列斐弗尔不同,德·塞多区分了地点(lieu)与空间(espace),将地点与有序的稳定性的稳定性联系起来,将空间与运动的效果联系起来(*Practice* 117)。将空间当作身份认同的建构成分的其他讨论,例见库塔与弗古逊;格鲁沃与卡普兰;耶格尔;基思与派尔;科比;琼斯、纳斯特和罗伯茨;罗斯;桑内特;希岗涅与坦普尔顿;和弗里德兰与波顿。德·劳拉提斯在《艾丽斯不》中,也将空间分析融入了她对叙事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研究。她在其中声称,所有叙事的俄狄

浦斯主体都侵入了被比喻为女性的空间之中(尤见 12—36)。

15 侦探叙事被认为是叙事这一整体概念的必需部分,或者是生产精神分析叙事的必需部分,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尤见托多罗夫;布鲁克斯,《阅读情节》,尤其 23—29、90—112;拉康;艾柯与塞博克;和穆勒与理查德森, ix;对将俄狄浦斯叙事当作精神分析的“样本故事”的讨论,例见费尔曼,《超越俄狄浦斯》。

16 对旅行写作的研究在文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中都在迅速扩展。关于旅行写作与人种学的相互关系的讨论,例见玛丽·路易丝·费罗斯;格鲁沃,《家园与闺房》;凯瑞·卡普兰;劳伦斯;罗伯森等人;夏普;克利福特与马库斯;克利福特,《文化的困境》与《路线》;斯普尔;郑明河,《女人—土著—他者》;贝哈与戈登;和《旅行写作研究》(1997年春)。

17《告诉我的马》是以其在牙买加和海地的旅行与实地考察为基础的。它在联接的叙事(其基础是共同的非洲文化认同),和自我与他者交往的叙事(其基础是她的美国公民身份,当时美国在海地有一支驻军,而且赫斯顿支持这个政策)之间摇摆。赫斯顿这一时期的小说,《约拿的葫芦藤》和《他们眼望苍天》严重依赖人种学叙事,就像她的人种学不断地借用小说策略一样——这是一个互惠的交换,预示了后来的后现代人种学。见埃尔南德斯。

18 特鲁诺对“第三世界主义”的抨击隐隐地挑战了萨义德的作品。萨义德倾向于擦除“东方”和“西方”两者的异质性,而他的免责声明又反过来擦除了这种同质化倾向。在《再现被殖民者》一文中,萨义德批评了西方“对‘差异’和‘他者性’的顶礼膜拜与不断颂扬”,并且声称人类学,即便是其最为土著的形式,仍然“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213—214);在萨义德的理论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固定且无人质疑的范畴。

19 关于目前的身份认同的空间化修辞的综述,见卡普兰,《旅行的问题》,143—187;科比;和本书第一章。

20 见本书第一、三章。

21 在后殖民研究的框架内对福斯特小说中的东方主义欲望进行的一些令人信服的解读,例见夏普,113—136;舒乐瑞,《英属印度的修辞》,131—148;洛尔,《移民法案》,102—135;和巴克什。关于用酷儿理论将阿德拉解读为自传性文本再现实的观点,见皮戈福德。

270 22 在审判现场中,和佛教截然不同的耆那教与那些洞窟的联系得到强调(223)。马拉巴山洞与印度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的耆那教的关系,一直是该小说评论的一个关注点。例见,帕里;萨尼,99—138;甘古利,141—168;和品彻曼。

但是我曾经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它的强有力的回响能将穆尔夫人变为一个无欲无喜、超越道德干预的人,直到我阅读了吉塔·梅塔的略显嘲讽的小说《河经》(1993)。该小说讲述了一位富裕的商人转而过起耆那教修行者的苦行生活的故事,那种生活“远离疑虑”、“谬误”和“偏激”(41)。然而,我并不是说,小说中的马拉巴山洞或者它们的原型巴拉巴尔山洞,应该被简化为单一的一种意义或宗教。不论是马拉巴山洞还是巴拉巴尔山洞,它们都是摹写性的融合主义的场所,和投射各种相互冲突的人类欲望的空间。

23 尽管一些当代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提倡对女性的传统限制(如在伊朗和阿富汗),但多数其他的民族主义运动都直接将现代性,女性从“传统”中的解放,和民族解放联系起来。例见梅尔尼斯对20世纪40年代的摩洛哥的描述,和玛丽亚玛·巴对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早期的塞内加尔的描述。然而,西方对帝国主义的辩护常常认为,帝国主义具有消除诸如妻子殉夫和深闺制度等“野蛮”习俗的“解放”功能。因而,在(后)殖民背景内的女性主义,常常一方面希望摒弃文明/野蛮这种帝国主义二元对立,一方面又渴望实现女性地位的变化。关于社会性别在民族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运动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的讨论,例见帕克、拉索、萨默与耶格尔,《民族主义与性别》;格鲁沃与卡普兰;马尼,《多重思考》;和拉达克里希南,《离散的沉思》,119—132。

24 见弗班克的传记中对福斯特的埃及和印度之行的描述。关于福斯特自己的印度化经历和对之的抵制,见他的《德维山》中收集的作于印度的信件和日记。

25 有关殖民主义对殖民者的心理影响的讨论,尤见吉甘迪,《图绘英国特性》;和南迪。

26 对《尼撒》的有关评论和思考,见库塔与弗古逊;M.L.普拉特,《常见地区的野外考查工作》;戈登,收录于贝哈,《以我父亲的名义写作》。我感谢提林·纳拉严、鲁斯·贝哈、玛丽娅·利波斯凯和卡玛拉·维斯韦沃兰,他们帮助我将修斯塔克的作品融入到人类学讨论的背景中去。

27 正如卡玛拉·维斯韦沃兰在一次私下交流中指出的,这样的学科混合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抵制和后撤:在人类学领域,反对后现代转向,拥护对科学的回归;在文学研究领域,反对文化研究,提倡美学形式主义的恢复。

## 第六章

本章的雏形是在1997年4月在佛罗里达的盖恩斯维尔召开的叙事学国际

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本章在它的基础上扩充而成。我特别感谢内莉·麦凯帮助我赏析《大地的女儿》,并督促我写下对它的评论。我还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不断地给我解释有关中国和亚洲的事情。我的同一讨论小组成员,玛莉莲·布朗斯坦和萨彬娜·索内,也讨论了后殖民杂合的问题,对我产生了一定影响。

1 理查德·桑内特写道,“族群是建立在对差异的认识基础上的一种认同感,这种对差异的认识源自迁移的历史;这些农民迁移了,在异域他乡就变成了波兰人。”(198)还见斯图亚特·霍尔的《新族群》一文中对诸如“黑人”这样的身份认同产生的时空定位的讨论;还见克利福特的《空间的实践》和《离散》,收录于《路线》,52—91,244—278。

271 2 霍米·巴巴在《理论的奉献》中简要地用相关的方式使用了去/来这一术语。他在该章讨论了“在自由传统的正中心,空间书写的重要性和地址的问题所在:它是这种来来回回的运动,政治协商的象征过程的这种去/来,它构成了地址的政治”(Location 24—25),还见1,183。

3 作为一位女性主义的客体关系理论家,杰西卡·本杰明对母亲与孩子的互动运用了修改过的、去俄狄浦斯化的叙事,以确立一种主体间性的概念,在这种概念中交往的双方均是享有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个人。尽管性别差异对她的模式而言十分重要,但本杰明并未触及差异的其他形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权力和历史特异性的问题。

4 对有关杂合政治的争论的综述,见本书的第三章。

5 达什在1985年开始策划这个电影,1986年开拍,1991年参加了电影节放映,并最终于1992年在电影院里上映。关于该电影的制作和观众接受的描述,见《大地的女儿:一部美国黑人女性电影的制作》。该书包括电影剧本,达什的日记选节,达什与贝尔·胡克斯的谈话,以及托妮·凯德·邦芭拉和格雷格·泰特的评论。葛温德琳·奥黛莉·福斯特在《关注非洲与亚洲离散的女性电影制片人》中(47—71),对该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强调了该电影在电影制作和叙事上的非洲中心主义,及其对好莱坞传统的背离。

6 霍尔在《新族群》中,对英国近期的一些黑人电影对黑人异质性的再现,作了相似的评论。他“欣慰”地欢迎一度似乎具有政治必需性的那种电影的消失,在那种电影的再现中“要么黑人全是好人,要么所有的黑人都一模一样。”(444)他承认实现以下两个方面协调发展的政治方案不容易获得:一方面在黑人中“应对差异并通过差异而运作”,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团结和认同的各种形式,使得共同的斗争与抵抗成为可能。”(444)但他明确地倾向于对异质性的

强调,推崇路线甚于根源。

7 在与贝尔·胡克斯谈到她的目标观众时,达什说她的目标观众并不仅仅指向美国黑人或黑人女性,但她确实想象了不同层次的观众:“我首先希望黑人女性,第二是黑人社团,第三是白人女性。这些人是我这部电影优先考虑的观众。其他的人都在这之后。”(40)

8 我对路易丝·厄德里奇的《痕迹》也做过平行的评论。对之的评论起初将纳纳普什推崇为文化之根的具体化身,而将波琳贬抑为西方化的小丑(《认同政治》)。纳纳普什和波琳两人都具有的融合主义,瓦解了建立在基要主义的认同政治基础上的诠释。

9 见巴巴,《文化的定位》,尤见 33—39、85—92、102—122,和本书第四章的讨论。

10 对我所说的基要主义的认同政治的定义,见本书第二章的注释 24。正如我和任璧莲本人所讨论的,我相信在以下两者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绝对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认同政治,和建立在对认同的发展与变化的流动认识上的认同政治。

11 《莫娜在希望之乡》是任璧莲的第一本小说《典型美国人》的后续作品。《典型美国人》讲述了张意峰移民到美国,易名为拉尔夫·张,在快餐业发展生意并娶海伦为妻的故事。拉尔夫·张和海伦·张是莫娜的父母。莫娜的姑姑特丽莎在第一本小说中是个核心角色,但她在《莫娜在希望之乡》中仅仅短暂露面,不过仍很重要。

12 任璧莲并不质疑身份认同的性别轴线,并自始至终在异性恋的框架内发展小说。这一点与《喜宴》(李安)或《欢乐洗衣店》(汉尼夫·库雷什)形成对比,后两者主要探讨了多重形式的性征,以及它与族群、人种、国别、阶级和社会性别等问题的互动。《莫娜在希望之乡》十分详尽地探讨了性别歧视的问题,但却没有像它处理文化杂合一样来处理性别问题。

272

13 在任璧莲呼应马克·吐温的多处互文性的“内置笑话”中,有这么一处:芭芭拉把她家的钥匙扔给阿尔弗莱德,“他抓住它(钥匙环),当然了——这是男人的本能反应,不让东西从他们身旁掉下。”(152)他的这一抓呼应了《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的第十一章中的一段情景。当时,哈克试图冒充女孩求助,但却没能骗过他想欺骗的那位妇女。后者设计了几个测试来考验他,最后一个就是向他扔钥匙,以便从他抓钥匙的方式判断他是习惯穿裤子的男孩,还是习惯穿裙子的女孩。

14 现在日本国籍既可以凭父亲,也可以凭母亲的关系获得,但是出生地的地理位置并不会带来国籍,德国也是一样。

15 吉卜·基德为该书的平装本设计了一个不同的封面。封面上是相同的亚洲人的眼睛的剪辑画,但其周围环绕的是许多美国国旗形成的网格。这些旗帜的灵感或许来自安迪·沃霍尔的网格形的美国文化偶像,如坎贝尔汤的罐装包装画和玛丽莲·梦露。这些旗帜的重复出现,通过模仿与重复,实现了对“美国”的去自然化。和小说一样,这个封面质疑了“美国”的含义,但它并没有像第一个封面那样捕捉住小说对杂合的嬉戏。任璧莲可能在封面设计中起了怎样的作用,或者她更赞同哪一个封面,我们并不清楚。一般说来,封面的设计直接取决于市场力量,而不是作者的意愿。

16 正如法兰克·迪考特在《现代中国的种族话语》(1—17)中所讨论的,莫娜对肤色和体毛的想法,与中国文献中对种族差异的一些早期描述,有着有趣的平行关系。早在唐朝,中国就有阿拉伯商人出售黑奴。许多早期的中国文献将所有的非中国人都认为是“蛮夷”。它们将白肤色与中国精英人士联系起来,将深色或黑肤色与非洲人和中国农民联系起来,将过多的体毛、蓝眼睛和鬼一样“苍白”的肤色与欧洲人联系起来。

17 关于中国人和犹太人的联系,例见齐洛特与里德。

## 第七章

本章曾以《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恢复和协商的政治》的题目发表于《新文学史》(1991),其雏形是在1989年的现代语言协会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我感谢塞莱斯特·施耐克和丽莎·鲁迪克邀请我写这篇论文,也感谢琳达·戈登、伊莱恩·马克斯、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和朱迪思·瓦尔泽·李维特的鼓励与批评。

1 还有其他人以相似的方式框起了这个十年,例见哈拉里;艾森斯坦与贾丁;考夫曼;和科恩。尤见科恩的引言,其中以与本文类似的方式,论证了理论正在与目前的政治和历史力量的互动中经历大规模的修订(本文完成于我读到他的分析之前)。

2 有学者从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的角度来探讨这种代际间的紧张感,认为它是母/女相互作用的一种改头换面的形式。见伊芙琳·福克斯·凯勒与摩根。

3 伍尔夫在《三个基尼》中的热情呼吁——善意的男女都应该待在权力进



程的“外面”——在美国女性主义,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尽管她的论点是对家庭和国家中的父权制的一个重要批评,但我认为《三个基尼》也应被置于它的历史时刻和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解读。具体说来,法西斯的崛起和战争的风雨欲来是伍尔夫要应对的首要问题。此外还有英国的各阶层女性都极度缺乏高等教育的问题,这一点与美国的体系存在重要的差异。伍尔夫反对整合的警告在今天和在1938年一样具有说服力。但是,假如女性主义教育者相信她们只能“在体系之外”开展重要的政治工作的话,那么学院内的女性学研究也不会在美国存在。作为一位作家,伍尔夫完全将自己沉浸在了男性的文字传统之内,并对之进行对话性的改造,而这与我为美国的学院派女性主义者所描绘的矛盾立场十分相似。

4 尤见克里斯蒂娃,《从一个认同到另一个》,收录于她的《语言中的欲望》,124—147和《诗歌语言的革命》,尤其13—20。

5 关于巴特的《作者之死》和与之相关的米歇尔·福柯的文章《作者是谁?》的进一步讨论,见谢丽尔·沃克和我的《编织》。

6 关于成为禁忌的一些术语的概念,我感谢丽莎·鲁迪克为她与塞莱斯特·施耐克共同组织的现代语言协会会议提交的论文题目《“自我”、“精神”和其他禁忌词汇》。这种禁忌的感觉多少有些幽默,且神秘地体现在我提交给同一会议的论文题目的命运上。该会议将我的论文题目印刷为《……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政治》,而我的笔记清清楚楚地表明我的原本题目是《……能动性与身份认同的政治》。施耐克绝不会未经允许就修改我的题目。是她在我打电话告诉她题目时误听了?还是我误说了?还是那个后结构主义的电脑自动拦截了“身份认同”这个受污染的字眼?

7 法国女性主义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伊莱恩·马克斯和伊莎贝尔·德·科蒂弗农在其《新法国女性主义文选》中有力地强调了这一点。美国女性主义亦非铁板一块。常常被联系在一起的三驾马车:克里斯蒂娃、西苏和伊里加蕾,在她们之间也存在重要的差异。但是在以下两种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的更为巨大的差异却常常被忘却:这些心理分析和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和以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莫妮克·威蒂格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种擦除又相应地模糊了“美国”与“法国”女性主义的裂缝,因为它还压制了波伏娃对他者性和真实性的存在主义分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美国女性主义者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对伍尔夫的重新解读一样,对《第二性》(1949)的再发现对于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社

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 史密斯对“人文主义”女性主义所列举的简短例子包括,引自伊莱恩·肖瓦尔特(1969年的一篇文章)和朱迪思·可甘·加迪纳的只言片语,这些短语无法公正地体现她们的批评作品的复杂性和演变过程。在他的稍早的一篇文章《H.D.的身份认同》中,他引用了同样的一些短语。在该文中,他将对H.D.进行女性主义解读的分析当作一次批评“美国”女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机会。在没有在文本中点名的情况下,他还引用了我的《重生的普塞克》中的一些片断作为反例:“简言之,许多此类的早期(‘美国’)女性主义文学评论的目的,有时似乎是要发现‘女性’是某种‘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擦除了所有的外部变化之后显现出来’。”(136)他在《H.D.的身份认同》一文中再次将这一目的归咎于我,并引用了同样的片断。但不论是在《辨别主体》还是在《H.D.的身份认同》中,有一点没有说清楚(除非好奇的读者查阅了我的原文):史密斯多么激进地扭曲了我的话语来服务于他批评“美国”女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目的。我在引文中并非讨论“女性”或某种女性主义的“目的”。我是在诠释“那位女士”,即H.D.在其史诗《三部曲》中表达的她心目中的理想女神形象。我原文中的句子如下:“在历史的摹写本中,那位女士不变的本质在擦除了所有的外部变化之后显现出来。”(《重生的普塞克》,109)这句话说的是H.D.对摹写本的使用和她对(女性)神祇存在的信仰,这个神祇存在于数个世纪以来塑造圣母玛利亚和母性神祇的文化艺术品之中(109)。上下文清楚地表明,我所说的“不变的本质”并非对“女性”的一种本质主义论点或我自己的目的,而是对H.D.的诗歌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形象的解读。而且我用这个人物,在弗洛伊德和列维—施特劳斯的框架内,讨论H.D.对历史的变化与延续所持有的结构主义和摹写本的观点。我的话语被从上下文中脱离出来,用以展示“熟悉得令人沮丧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而且史密斯将这种价值观与对“本质”、“经验”和无媒介的“沟通”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他对我和其他的H.D.评论家所做的抨击,也是他在《H.D.的缺陷》一文中对H.D.的退步倾向所做的抨击。在这篇文章中,史密斯的反人文主义立场,讽刺性地使得他难以解读H.D.在其文本中的动态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不过,在其《重访庞德》一书中专论H.D.的一章中,他在庞德的语境下对H.D.所做的解读十分优秀(110—133)。

9 我想在此处区分以下两点:一是对“姐妹情谊”意味着完全的和谐的呆板指望,我相信大部分女性主义评论家从未有过或者早早就放弃了这种指望;二是对在广泛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内部存在一个共同“项目”的假设。我认为背

叛的感觉源自这种想法：一些后结构主义评论家对德里达、拉康和其他的男性大师更有认同感，而不是与其他的非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

10 当我在1989年的12月使用“政治上正确”这一术语时，我当然并不会想到，它将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挪用来回击在过去的20年间发生在学院内的对“西方文化”的正典传统的解构和重构。对提倡多样性的做法的抨击，奇怪地借用了左派的话语，而正是左派在几十年前发明了“政治上正确”这一术语，以之作为一种自我批评的形式，来应对其自身领域内的朝向正统观念、宗派主义和基要主义思维的倾向。左派用这一术语来提醒其各式各样的成员牢记开放性质询的重要性。但如今，这一术语被广泛应用在大众媒体上，来谴责学院内的多样的进步力量从事的所有项目。或许这一术语已经被它近来的挪用玷污，我不应该再使用它。但是我还尚未找到合适的替代术语，以适用我想批评的一些形式的后/后结构主义理论内的基要主义潮流。

11 在提倡在女性主义内部推行后结构主义时，陶丽·莫依、克里斯·威顿和丽塔·费尔斯基尖锐地批评了她们以各种名目称呼的“美国的”、“自由的”、或“人文主义的”女性主义。但是在我看来，她们并没有充分了解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实践在美国的历史。还见贾丁，《女性本原批评》。近来还有一些专论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书籍用“人文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术语来描述这一辩论的框架，并对“人文主义”使用了不同程度的轻视或尊重的修辞。例见考夫曼；尼科尔森；弗斯；和威德。

12 在第一章《“女性时代”：重新思考黑人女性主义理论》中，加比在对早期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批判中，提到了一系列令人联想起后结构主义的特色词汇（例如，“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的”、“经验”、“小说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等等），十分接近其他的后结构主义评论家的轻蔑口吻。不过，她对黑人女知识分子的讨论，和她的题目一样，肯定了她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13 欲知将其作品当作一种有意识的协商的其他女性主义评论家，例见塞吉维克，《男人之间》；鲍威尔；郑明河；和切斯曼。在《女性本原批评》中，贾丁将她的项目呈现为在“美国”和“法国”的有关女性本原和主体性的理论之间的协商。不过，我认为她的“美国”视角被其“法国”视角所淹没了。

14 我在《编织》一文中详细讨论了“互文性”的美国化过程。还可见盖茨的《表意的猴子》对互文实践的分析，他假设存在“作者”的有意识的能动性。 275

## 第八章

除了偶尔的修订之外，本章重印自发表在《失控的女性主义》上的同名文章。该书由迪安娜·依拉姆与罗布恩·威曼主编，1995年出版。我感谢两位编者邀请我写作本文，并感谢迪安娜·依拉姆和朱迪思·瓦尔泽·李维特的批评与鼓励。

1 例如，对“历史”的双重意义的黑格尔程式的讨论，可参见奥尔，12；巴蒂，7—8。对历史书写是一种叙事行为的强调，例见霍尔，《本土与全球》，尤见38；斯皮瓦克，《深入教学机器》（282，章首引文中引用）和《后殖民评论家》。斯皮瓦克在其中认为，德里达和莱昂塔并非“对叙事发起战争。但是他们意识到，叙事的冲动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19）

2 对于“现时主义”（presentism）的批评，参见巴特菲尔德；和斯多金，尤见其1—12。其他人，如拉卡普拉（《历史与批评》，43—44）和奥尔（15—16），认为历史的目的论性质是不可避免的。

3 尽管目前活跃的历史学家中极少有人完全在实证主义的框架内运作，元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实证主义的编史方法值得批评。拉卡普拉声称，G.R. 艾尔顿在《历史的实践》（1967）中的改良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仍然具体表现了许多目前活跃的历史学家的共识（*History* 136）。还可参见巴蒂；海登·怀特；哈兰；奥尔；拉卡普拉的《历史与批评》（尤见15—44、135—142）、《思想史及其途径》和《批评理论的深度探测》（尤见182—210）；以及在阿普贝、亨特和雅各布等人作品中出现的，对实用主义编史方法的拥护，其理论基础是在大多数人认可的基础上确立历史真相。

4 我从头至尾将历史的“真实”（Real）中的R字母大写，这是借用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对拉康的“真实”（Real）的重新配置。和詹明信与拉卡普拉一样，我反对“这一时髦的论断：因为历史是个文本，‘指涉物’就不存在。”（Jameson,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35）和詹明信一样，我相信历史的真实“不是一个文本，不是一个叙事，不论其是否是主导叙事。相反，作为一个不在场的原因，它令我们难以接近，除了在文本形式中。而且，我们对它以及真实本身的接近，必然经过它之前的文本化过程（和）叙事化过程。”（35）还可参见拉卡普拉，《历史与批评》（38）和《思想史及其途径》；克莱默，尤见其122—128；哈兰；海登·怀特；和奥尔。

5 参见巴蒂；奥尔；斯皮瓦克，《属下阶层的文学再现》；海登·怀特，《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以及拉卡普拉对历史的“纪实模式”的相关讨论（这种模

式要么意识到,要么否认,修辞是历史实践的一部分),怀特的“历史知识的修辞起源”的模式,和怀特自己的“对话”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历史学家进行“与死者的对话,这些死者通过其‘文本化’的余存得以重构。”(*History* 18, 21, 34, 36)对于怀特和拉卡普拉的影响广泛的作品综述,参见克莱默;雅各比。

6 例见考伊纳的《女性学研究学科》,该文收录于鲍尔斯和克莱恩的《女性学研究理论》。该文集收录了女性学研究学科内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认识论。

7 对于此类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例子可见:尤其在女性主义哲学学科内发展起来的立场理论(例如:哈特索克、哈拉维、海克曼);以及在一些作家中出现定位或立场知识的理论,如里奇、阿尔考夫、艾伦、凯瑞·卡普兰、布雷多迪、马丁与莫安提、黛博拉·金和斯迈利。尽管认为所有人类话语,包括历史,均为构筑话语的概念常常被与后结构主义联系起来,但是主观主义的认识论自从其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起源以来,一直是女性学研究的一部分。

276

8 更多的有关女性主义内的这些认识论问题的讨论,请见斯迈利;尼科尔森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其中的弗莱克斯、迪斯泰法诺、哈丁、本哈比、哈特索克和波尔多等人的文章。

9 详见《民主文化》关于萨默斯的《谁偷走了女性主义?》的专刊,约翰·威尔逊主编,尤见威尔逊关于右翼人士推销该书的记叙。

10 该书题目还可能呼应一些被广泛传播的女性主义文本的题目,如奥德莉·罗德的《姐妹外人》、罗宾·摩根的《义重如山姐妹情》和《四海一家姐妹情》。对于从自认的女性主义立场对女性学研究进行抨击的又一例子,参见勒曼。

11 见巴特,《拟真效果》和《历史的话语》,尤见140。

12 还见詹姆斯·斯科特的《支配与反抗的艺术》。该书声称,霸权与非霸权群体的成员不断地以公开或隐藏的形式进行阐释性的故事讲述。例如,一位农民可能会在地主面前讲述温驯的文本,而在其他农民面前讲述反叛的文本。

13 在《女性主义者理论化政治》中,巴特勒和乔安·斯科特误导性地挪用了最初对“女性”概念(一元或多元化的“女性”)的挑战,以为后结构主义服务。她们将这种挑战误读为是对差异的一种擦除,不论这种差异是建构在种族、阶级、性征、宗教还是国别之上的。

14 还见斯温德尔斯。她警告我们,不要把诸如《汉纳·卡尔威克日记》的文本,解读为一位工人阶级女性的完全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可靠表达。卡尔威克是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一位打杂女工。她在主人的命令之下写作自己的日记,而她的主人通过阅读她对辛苦工作的描述获得一种性兴奋。

15 对 20 世纪 80 年代具有影响力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本的选录,见马克思与德·科蒂弗农;盖洛普;贾丁;贝尔西;威顿;莫依。

16 见特瑞莎·德·劳拉提斯在《性别的技术》中对寻找“女性主义主体”的必需性的强调(不论这种主体性多么具有乌托邦色彩)。但是巴特勒用这一短语指的是,对拥有共同的性别身份基础的女性的拥护,而德·劳拉提斯则用这个短语来指称,一个以不同方式建构的女性主义主体性的“他乡”或“远处空间”。与卡慕夫和巴特勒一样,德·劳拉提斯主要回归到福柯,但是她对福柯的话语实践概念的依赖,因为她对以下一点的坚持而有所缓和:女性主义者必须认识到福柯对身份和经验的批评的局限之处。

17 还见斯温德尔斯;朱迪思·斯黛茜对后结构主义编史工作的呼吁;以及格拉克和帕泰在其引言中的简短肯定,陈述了“当代文学理论”在分析语言对口头历史的干预中的重要性。与以往的伯克夏会议相比,在 1993 年的伯克夏女历史学家会议中,后结构主义理论明显地占据了更为突出的位置。

18 见海登·怀特的《历史的话语》,以及他在《当代历史理论中的叙事问题》中对(后)结构主义对历史叙事所普遍持有的敌意进行的分析。还见瓦尔特·本杰明对传统的历史主义叙事的批评,以及他对将一系列时间并置起来的弥赛亚式的、革命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Illuminations* 253—264)。

19 例见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尤见 58—59、88、92)和《女性的时间》;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尤见 250)。

20 例见伯萨尼。他声称叙事在本质上是专制的,通过其与模仿的联系而与国家为盟(尤见 3—16、51—88、189—316);克莱顿对伯萨尼的批评,71—82;德·劳拉提斯的《艾丽斯不》(103—158),其中她发现,叙事与前俄狄浦斯的欲望结构密不可分,在这种欲望结构中主体性被构建为阳性[她在《性别的技术》中超越了这一立场,具体明确了“意识到女性主义主体性及其铭刻的各种模式”(xi)]。彼得·布鲁克斯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中的一个显著例外。在《阅读情节》中他认为叙事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模式。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在女性书写中,发现了对俄狄浦斯叙事的抵制,和将女性主体性定位于前俄狄浦斯叙事模式的倾向。例见迪普莱西的《终点之后的写作》;霍曼斯的《承受语言之重》;赫斯基的《母/女情节》;斯普兰内热;以及阿贝尔的《叙事结构和女性发展》。更多的讨论,请见弗里德曼的《渴望故事》和《女性书写中诗歌对叙事的颠覆》。

21 还见德曼的《盲点与洞见》(尤见 142—166、187—228)和《阅读的寓言》,

其中他反对叙事的关涉功用,拥护叙事的比喻功用。还可见卡斯瑞欧对德曼的讨论;福柯在《词与物》中对寓言与故事的关系的分析。对于后结构主义对历史与编史工作的大量质疑,见阿特里奇、本尼顿与扬。

22 格拉克和帕泰主编的《女性的话语》中的其他文章,也主张她们所反思的问题不应导致对口述历史的方法的放弃。还见修斯塔克。她记录那位桑族女性的自我叙事作品《尼撒》的生产过程的文章,一方面质疑了她自身的包罗万象的深思,一方面也证明了(重新)讲述那些生活方式行将湮没的人们的叙事所具有的迫切性(“What the Wind”)。

23 我意识到,我在此处有将后结构主义的复杂多变的话语均质化之嫌。但是我这么做是出于策略考虑,为了强调这些各种各样的理论的共同之处:不论它们在其他方面有多大的不同,它们都关注构成主义的话语,并都坚持质疑。

24 有些人根据具体的女性群体对此点稍加变化,例见沃尔,尤见第10;拉达克里希南,《离散的沉思》,62—79;德·劳拉提斯,《女性主义研究》;沃尔夫与佩内洛普,1—24;麦克道尔;莫安提在《斗争的地图》中将“第三世界女性”看作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塞吉维克的男/女同性恋的“少数化”话语的概念,酷儿理论的普适化话语需要该话语的增补(尤见《暗柜认识论》,86—90)。还见科恩,尤见vii—xx。

25 例见保罗·史密斯论女性主义的一章。其中,他认为,是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将整体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带回来探讨历史与政治的问题,但他当即就驳斥了人文主义女性主义(*Discerning the Subject* 133—152)。更详尽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七章注释8。

26 同样地,作为对文学历史的一个含蓄地驳斥,巴特勒解释道,“一个女性‘客体’令人难以理解地回敬(男性的)目光、逆转(男性的)凝视并争抢男性的地位和权威。她的突然闯入及其未及预料的能动性……无法十分吸引我的注意力。”(*Gender Trouble* ix)

27 也见引于盖尔·格林,《看历史》(11—12)。该文捍卫了女性主义历史的女性主义书写的紧迫性。

28 我相信代际问题是隐藏于学院派女性主义的许多冲突背后的一个(而非惟一的)原因。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可参见海伦娜·米奇;伊芙琳·福克斯·凯勒与摩格兰;米诺与朗基诺;西格尔;丽贝卡·沃克;芬德勒;卢舍与卡普兰;以及海伍德与德雷克。从历史的角度看待每一世代人的立场与观点的做法,有助于滋养多样的代系声音,而不是用一种声音压制另一种。

29 译注：西奈山：又称摩西山，位于西奈半岛中部。上帝在此向摩西显灵，并赐给他《十诫》。加略山是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大沼泽是许多英国传说与小说的故事背景地，它是英格兰东部最大的湿地沼泽地区，现已被人工排干，成为良田和旅游区。此三处都是在各种叙事作品中大量出现的地名。

30 更多的讨论，请见第九章。

31 还可见莫利·海特对叙事的双重功用的讨论，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必需性的讨论（尤见 127）。

32 波马塔有趣的史学文章青睐“具体”或本土的历史，而非任何总括性的历史；青睐空间历史或专题历史，而非时间叙事。

33 见彼得·布鲁克斯，《阅读情节》，尤见 37—61；克莱顿，《巴别塔之乐》，尤见 3—31、61—89；哈钦，《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尤见 62—92。

34 我在《知识的禁果》一文中详细讨论过此问题。

35 见巴蒂对“男性的历史主义”中固有的权力欲的讨论。“男性的历史主义”即指男性具有的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欲望（5—6）。

36 斯科特的能动性观点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早期作品。福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重新引入了他在早期作品中拒绝相信的自我和能动性的概念。

37 关于这种（后）殖民动态的讨论，参见我的《编织》。

38 影响深远的此类例子，尤见凯利，《女性有过文艺复兴吗？》和《性别的社会关系》。

39 不论肖瓦尔特在《女性的时间、女性的空间》、《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或《新女性主义批评》中将女性批评凌驾于女性本原批评的做法多么值得我们批评，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与许多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者对非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评论家的作品的态度相比，她更为彻底、更为尊重地承认了非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重要性。

40 还可见斯皮瓦克的《三个女性的文本》，在该文中她展示了西方女性主义如何过于强调讲述个别女性的觉醒的叙事，从而遮掩了在诸如《简·爱》之类的小说中存在的殖民主义政治。

41 我在此处借用拉达克里希南的论点，反对用阶级、性别、国籍、性征等任何一种的单一话语，来尝试建立凌驾于其他的身份定位轴之上的话语霸权。



## 第九章

本章是作者的《渴求故事：当代理论和女性长诗中的叙事与诗歌》一文的压缩版。该文发表于林恩·凯勒和克里斯坦娜·米勒主编的《女性主义测量：诗歌与理论的深度探测》一书中。本文献给女性主义者、科学家和精神导师鲁斯·布雷尔。她在1992年我写作本文时去世。

1 还可参见汤婷婷的《女勇士》；路易丝·厄德里奇的《痕迹》；谭恩美的《喜福会》[“噢，多好的故事！流溅得满地都是！”（11）]和《灶君娘娘》；史尔戈的《仪式》；莫里森的《宠儿》；和吉姆·切宁的《在我母亲家中》[“极其轻柔地、耳语一般，我对她说道，‘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啊是的，我会用上我所有的写作技巧，记下她讲述的故事并讲述她的故事”（17）]。

2 博洛夫用永恒的诗歌来概括现代主义。不论19世纪的叙事传统如今已有了多大的改变，博洛夫的这一做法忽略了叙事对于现代主义，包括许多现代主义长诗的巨大重要性。

3 20世纪长诗的文学历史收录的几乎全部是男性诗人。参见詹姆斯·米勒；迈克尔·伯恩斯坦；罗森塔尔与高尔；迪奇；加德纳；和贝克。对于重要的例外，参见凯勒；和坎博莱利。

4 她们的长诗包括H.D.的《三部曲》（1944—1946）、《埃文河边》（1949）、《海伦在埃及》（1952—1955，1961）、《智慧》（1957，1982）、《艾维谷》（1957，1982）、《冬之恋》（1959，1972）和《秘密定义》（1960，1972）；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温柔的钮扣》（1911—1912，1914）、《上升的腹部》（1915—1917，1953）、《父权诗》（1927，1953）和《沉思的诗句》（1932，1956）；米娜·罗伊的《盎格鲁杂种与英国玫瑰》（1923—1925），该诗直到1982年才在《最后的月亮旅行指南》中全文发表；以及格温多琳·布鲁克斯的《布朗斯维尔的一条街道》（1945）和《在麦加》（1968）。（上述作品后凡是给出两个时间的，第一个是写作时间，第二个是出版时间；H.D.、罗伊和斯泰因的作品出版时间有所延迟，这或许能反映出作者及读者对女性写作长诗感到的焦虑）。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的《致命的会晤》（1931）也可以被读作一首长诗，它包含了按季节组织起来的52首十四行诗。

5 在《神话》中，巴特并没有直接地将神话与叙事联系起来，但他在书中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去神话化。在此过程中，他分析了现在被称为“文化叙事”的运作。此外，他将神话与诗歌对立起来的做法，以及他挑选“神话”这一术语（语源上说来，该词在希腊语中表示“故事”之义）来表示意识形态的做法暗示了这一点：该书中潜在的二元对立是巴特的其他作品中也出现的那个二元对立：叙

事对诗歌。还可见他 1967 年的文章《历史的话语》（尤见 136, 140）。

6 克里斯蒂娃赞同诗歌形式、反对小说形式的做法代表了对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中的叙事 / 诗歌对立模式的一个有趣背离。在该书中,巴赫金认为,与诗歌相对,小说话语“与众声喧哗在根本上(具有)对话关系”(他所说的“众声喧哗”即越界话语)(399)。

7 白丁特声称,克里斯蒂娃对诗歌、诗歌实践和符号的推崇忽视了以下这点:诗歌还与文化和意义相联系(而不是仅仅与其相对立)。但是他并未涉及叙事与诗歌的对立。

8 尤见伯萨尼,3—16, 51—88, 189—316;克莱顿在《叙事与欲望理论》中对伯萨尼的批评及对叙事的捍卫;德·劳拉提斯,《艾丽斯不》,103—158。在《性别的技术》中,德·劳拉提斯超越了她在《艾丽斯不》中的立场,“具体指出了意识到女性主义主体性及其铭刻的各种模式。”(xi)对于将女性主体性定位于前俄狄浦斯的例子,参见迪普莱西的《终点之后的写作》;霍曼斯的《承受语言之重》;赫斯基的《母 / 女情节》、斯普兰内热;以及阿贝尔的《叙事结构和女性发展》。

9 我已经在《性别和文类焦虑》和《当“长”诗是“大”诗时》中,仔细地讨论过史诗传统中的性别变异,及其对 20 世纪长诗的影响。

10 有很少的几位评论家强调了诗歌与叙事这两种模式在长诗中的嬉戏,从而避免了强调诗歌甚于叙事。例如,凯勒提到了现代长诗中“诗歌、史诗和散文元素三足鼎立的根基。”(“Twentieth-Century Long Poem” 535)坎博莱利将长诗看作由诗歌、史诗和以“文类的不安分”为特征的纪实文件组成的一个异质混合体:“我所阅读的长诗的力量源头在于它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文类,并且它还同时抵制文类的标签。”(xiii—xiv)

11 “长诗”的定义千差万别。我用该术语来涵盖一系列的形式,包括自我定义的史诗和长诗、具有一定长度和广度的诗状序列、分开的多首诗的组合(其连贯性和 / 或进展要被诗人以某种方式标记为一个整体)、以及可供创新性阅读的与该文类接壤的文本(例如史尔戈的《讲故事的人》;安莎杜娃的《边境 / 荒界》;熊馥的《致那些在彩虹足够时还曾考虑过自杀的有色女孩》;以及沃兰《合适的定义 / 充耳不闻》。对有关定义的讨论,参见凯勒;瑞德尔推出的专论长诗的《文类》专刊;李;坎博莱利;和我的《当“长”诗是“大”诗时》。

12 一种更为少见的叙事功用可以在一种冥思的哲学 / 文学话语中隐约见到。这种话语尤以下列诗人的先锋派长诗为代表:苏珊·豪、伯纳蒂特·梅耶

尔、比弗利·达伦、凯瑟琳·弗雷泽和拉谢尔·布洛·迪普莱西。这些诗歌隐蔽地包含了一种对话嬉戏的叙事，对话的对象是将女性排除于外的传统哲学和语言学话语。关于豪与达伦，详见迪普莱西，《粉红吉他》，110—139；关于沃兰，详见我的文章《当“长”诗是“大”诗时》；关于迪普莱西和豪，详见凯勒，《扩展的形式》。

13 “历史”一词的希腊语词源是 *historia*，意指“通过探询了解或知道”；“神话”一词的词源是 *mythos*，意指“故事”。

14 例见艾伦·金斯堡，《嚎叫》；约翰·贝里曼，《向布雷兹特里特夫人致意》；罗伯特·洛威尔，《历史》；以及查尔斯·奥尔森，《马克西姆诗抄》。

15 此类呈现并不局限于西方传统。例如，它们还出现在儒家文化中。然而，它们也不是普遍的。一些美国印第安文化，例如史尔戈所属的拉古纳普韦布洛人，就鲜有恐女症的宗教信仰。

16 在比本章更为详细的那篇文章《渴望故事》中，我评论了一些不同类型的历史和神话叙事，涉及鲁斯·怀特曼、苏珊·豪、凯伦·布罗丁、丹妮丝·莱夫托芙、伯纳蒂特·梅耶尔、达芙妮·马拉特和贝茜·沃兰、迪安娜·格兰茜、安·卡梅伦、露西尔·克里夫顿、托伊·黛瑞格特、丽塔·德芙、帕特·帕克、迪安娜·沃克斯基、夏洛蒂·曼德尔、朱蒂·迦兰、葛洛莉亚·安莎杜娃、路易丝·厄德里奇、卡洛林·格拉西、丽娜·罗森瓦士和恩投扎凯·熊馘。

17 我向梅瑞尔·施瓦兹表示感谢。她将《记账者》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来研究的研讨会论文最早吸引我关注柯蕾普费兹。非常适合此类讨论的另一首长诗是特丽莎·阿永·查的《听抄》。

18 柯蕾普费兹在此诗中对犹太教的铭刻迥异于一些作家的做法，如吉姆·切宁、E.M. 布罗纳和 I.B. 辛格。从文化和宗教层面来说，柯蕾普费兹没有刻画许多犹太人的丰富的社团生活和遗产。她也没有联系犹太教的具体的宗教方面（尤其是其神秘或哈锡德教派的方面）。然而，她的诗包含了与《圣经》叙事的强有力的互文共振。

## 参考文献

- Abel, Elizabeth. "Black Writing, White Reading: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t Interpretation." *Critical Inquiry* 19 (Spring 1993): 470—498.
- .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Female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Mrs. Dalloway*." *The Voyage In: Fictions of Female Development*. ed. Elizabeth Abel, Marianne Hirsch, and Elizabeth Langland. Hanover, NH: U of New England P, 1983.161—185.
- . *Virginia Woolf and the Fi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Chicago: U Chicago P, 1989.
- , ed. *Writing and Sexual Difference*. Special Issue of *Critical Inquiry* 8.2 (Winter 1981).
- Abel, Elizabeth, Barbara Christian, Helen Moglen, eds. *Female Subjects in Black and White: Rac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7.
- Abraham, Nicolas, and Maria Torok. *The Wolf Man's Magic Word*. Trans. Nicholas Rand.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 Abu-Lughod, Lila. "Is Ther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Women and Performance* 9.1 (1990): 1—24.
- . "Writing against Culture." *Fox* 137—162.
- Alarcón, Daniel Cooper. *The Aztec Palimpsest: Mexico in the Modern Imagination*. Tucson: U of Arizona P, 1997.

- Alarcón, Norma. "The Theoretical Subject(s) of *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and Anglo-American Feminism." Anzaldúa, *Making Face* 356—369.
- Albrecht, Lisa, and Rose M. Brewer, eds. *Bridges of Power: Women's Multicultural Alliances*.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0.
- Alcoff, Linda. "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 *Signs* 13 (Spring 1988): 405—436.
- Alexander, Meena. *Fault Lines: A Memoir*.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93.
- . *The Shock of Arrival: Reflections on Postcolonial Experienc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6.
- Allan, Tuzyline Juta. *Womanist and Feminist Aesthetics: A Comparative Review*.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93.
- Allen, Paula Gunn. "Kochinnenako in Academe: Three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a Keres Indian Tale." Allen, *Sacred Hoop* 222—244.
- .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6.
- . ed. *Spider Woman's Granddaughters: Traditional Tales and Contemporary Writing by Native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Fiwcett, 1989.
- Amirthanayagam, Indran. "Rogue Elephants, Deadly Tigers." *New York Times* (19 May 1993).
- Anderson, Benedict R.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Books, 1983.
- . "Reading 'Revenge' by Prmaoedya Ananta Toer (1978—1982)." *Writing on the Tongue*. ed. A. L. Becker. Ann Arbor: Michigan Papers o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1989. 13—64.
- Anzaldúa, Glori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o*. San Francisco: Spinsters/Aunt Lute, 1987.
- . "Bridge, Drawbridge, Sandbar or Island: Lesbians of Color Hacienda Alianzas." Albrecht and Brewer 216—231.
- . "En rapport, In Opposition: Cobrando cuentas a las nuestras." Anzaldúa, *Making Face* 142—150.
- . ed. *Making Face/ Making Soul—Haciendo Caras: Crea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by Women of Color*.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1990.

- Appadurai, Arjun. "Disjunctiv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2.2 (1990): 1—24. Rpt. Appadurai, *Modernity* 27—47.
- .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Fox 191—210. Rpt. Appadurai, *Modernity* 48—65.
- .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 Appiah, Anthony. "The Conservation of 'Race'." *Black American Literary Forum* 23 (Spring 1989): 37—60.
- . "The Uncompleted Argument: Du Bois and the Illusion of Race." Gates, "Race" 21—37.
- Appiah, Kwame Anthony,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Editors' Introduction: Multiplying Identities." Appiah and Gates 625—629.
- , eds. Special Issue on Identities. *Critical Inquiry* 18 (Summer 1992).
- Appleby, Joyce.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4.
- Asian Women United of California, eds. *Making Waves: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by and about Asian American Wome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 Attridge, Dock, Geoff Bennington, and Robert Young, eds.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7.
- Bâ, Manama. *So Long a Letter*. Trans. Modupé Bodé-Thomas. London: Heinemann, 1981.
- Bahti, Timothy. *Allegories of History: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fter Hegel*.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2.
- Baker, Houston, Jr. "Caliban's Triple Play." Gates, "Race" 381—395.
- . *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7.
- Baker, Peter. *Obdurate Brilliance: Exteriority and the Modern Long Poem*. Gainesville: U of Florida P, 1991.
- Bakhtin, M.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U of Texas P, 1981.
- Bakshi, Parminder. "The Politics of Desire: E. M. Forster's Encounters with India." Davies and Wood 23—64.
- Bambara, Toni Cade. Preface. Dash, *Daughters of the Dust: The Making of an*

- African American Woman's Film* xi—xvi.
- Bammer, Angelika, ed. *Displacements: Cultural Identities in Ques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
- Banton, Michael P. *Racial Theor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7.
- Barker, A. J. *The Vainglorious War, 1854—1856*.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0.
- Barrett, Michèle.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Gender." *Feminist Criticism and Social Change: Sex, Class and Race i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d. Judith Newton and Deborah Rosenfelt. London: Methuen, 1985. 65—85.
- Barthes, Rol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Rustle of Language* 49—55.
- .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1967. *Rustle of Language* 127—140.
- .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 *A Barthes Reader*. ed. Susan Sontag.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2. 251—295.
- . *Mythologies*. 1957. Trans. Annette Laver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2.
- . *The Pleasure of the Text*. Trans.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3.
- . "The Reality Effect." 1968. *Rustle of Language* 141—148.
- .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 .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 . *Writing Degree Zero*. 1953. Trans. Annette Lavers and Colin Smith.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7.
- Bauer, Dale. *Feminist Dialogics: A Theory of Failed Community*. Albany: State UP of New York, 1988.
- Baumann, Gerd. "Dominant and Demotic Discourses of Culture: Their Relevance to Multi-Ethnic Alliances." *Werbner and Modood* 209—225.
- Bazin, Nancy Topping. *Virginia Woolf and the Androgynous Visio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73.
-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 1949. Trans. H. M. Parshley. New York: Bantam, 1961.
- Beck, Evelyn Torton, ed. *Nice Jewish Girls: A Lesbian Anthology*. Watertown, MA: Persephone Press, 1982.

- Becker, A. L. "Text-Building, Epistemology, and Aesthetics in Javanese Shadow Theatre." *The Imagination of Reality*. ed. A. L. Becker and Aram Yengoyan. Norwood, CT: Ablex Publishing, 1979. 211—243.
- Bedient, Calvin. "Kristeva and Poetry as Shattered Signification." *Critical Inquiry* 16 (Summer 1990): 807—829.
- Behar, Ruth. "Desire and Deception in Feminist Border-Crossing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orizing Differences among Women: Cross-Disciplinary and Cross-National Approache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 February 1997.
- . "The Story of Ruth, the Anthropologist." *People of the Book: Thirty Scholars Reflect on Their Jewish Identity*. ed. Jeffrey Rubin-Donky and Shelley Fisher Fishkin.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96. 261—279.
- . *The Vulnerable Observer: Anthropology That Breaks Your Heart*.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 . "Writing in My Father's Name: A Diary of *Translated Woman's* First Year." Behar and Gordon 65—82.
- Behar, Ruth, and Deborah A. Gordon, eds. *Women Writing Cultur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5.
- Beja, Morris. *Film and Literature*. New York: Longman, 1979.
- Belenky, Mary Field, Blythe McVicker Clinchy, Nancy Rule Goldberger, and Jill Mattuck Tarule. *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 Bell, Quentin. *Virginia Woolf: A Biography*. Vols. 1 and .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
- Belsey, Catherine. *Critical Practice*. London: Methuen, 1980.
- Bem, Sandra. "The Measurement of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2.2 (1974): 155—162.
- . "Probing the Promise of Androgyny." 1975. Kaplan and Bean 48—62.
- Benhabib, Seyla.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London: Routledge, 1992.
- Benjamin, Jessica. *The Bonds of Lo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the Problem of Domination*. New York: Pantheon, 1988.



- Benjamin, Walter.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50.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 253—264.
- Benstock, Shari, ed. *Feminist Issues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7.
- Bernal, Martin. *Black Athena: The 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Greece*.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7.
- Bernstein, Michael. *The Tale of the Tribe: Ezra Pound and the Modern Verse Ep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Bernstein, Susan. "Confessing Feminist Theory: What's 'I' Got to Do with It?" *Hypatia* 7 (Spring 1992): 120—147.
- Berryman, John. *Homage to Mistress Bradstre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6.
- Bersani, Leo. *A Future for Astyanax: Character and Desire in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4.
- Bhabha, Homi 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Bhabha, *Nation* 291—322.
- . "Introduction: narrating the nation." Bhabha, *Nation* 1—7.
- .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 . "The Other Question..." *Screen* 24 (November/December 1983): 18—36.
- ,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 Binder, David, with Barbara Crossette. "As Ethnic Wars Multiply, U.S. Strives for a Policy." *New York Times* (7 February 1993).
- Bloch, Ruth H. "A Culturalist Critique of Trends in Feminist Theory." *Contention* 2 (Spring 1993): 79—106.
- Boelhower, William. *Through a Glass Darkly: Ethnic Semiosi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P, 1987.
- Bonner, Raymond. "A Once-Peaceful Village Shows the Roots of Rwanda's Violence." *New York Times* (11 July 1994).
- Boone, Joseph A. "Modernist Maneuverings in the Marriage Plot: Breaking Ideologie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James' *The Golden Bowl*." *PMLA* 101 (May 1986): 374—388.

- . “Vacation Cruises; or, The Homoerotics of Orientalism.” *PMLA* 110 (January 1995): 89—107.
- Borland, Katherine. “‘That’s Not What I Said’: Interpretive Conflict in Oral Narrative Research.” *Gluck and Patai* 63—76.
- Bourne, Jenny. “Homelands of the Mind: Jewish Femin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Race and Class* 29 (1987): 1—24.
- Bowles, Gloria, and Renata Duelli Klein, eds. *Theories of Women’s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 Bradbury, Malcolm, and James McFarlane, eds. *Modernism, 1890—1930*. New York: Penguin, 1976.
- Braidotti, Rosi. “Embodiment, Sexual Difference, and the Nomadic Subject.” *Hypatia* 8 (Winter 1993): 1—13.
- .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4.
- Braxton, Joanne. *Black Women Writing Autobiography: A tradition within a Tradi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9.
- Braxton, Joanne M., and Andrée Nicola McLaughlin, eds. *Wild Women in the Whirlwind: Afro-American Culture and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Renaissa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90.
- Broe, Mary Lynn, and Angela Ingram, eds. *Women’s Writing in Exile*.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89.
- Brooks, Gwendolyn. *The Anniad*. 1949. Brooks. *Blacks* 97—112.
- . *Blacks*. Chicago: Third World Press, 1987.
- . “In the Mecca.” 1968. Brooks. *Blacks* 401—434.
- . *A Street in Bronzesville*. 1945. Brooks. *Blacks* 14—41.
- Brooks, Peter.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3.
- . *Psychoanalysis and Storytelling*.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4.
- .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New York: Vintage, 1984.
- Bulkin, Elly, Minnie Brace Pratt and Barbara Smith. *Yours in Struggle: Three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Brooklyn, NY: Long

- Haul Press, 1984.
-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3.
- .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0.
- Butler, Judith, and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1992.
- Butterfield, Herbert.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1959. New York: Norton, 1965.
- Calderón, Héctor, and José David Saldívar, eds. *Criticism in the Borderlands: Studies in Chicano Literature, Culture, and Ideology*. Durham, NC: Duke UP, 1991.
- Canclini, Néstor García.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Trans. Christopher L. Chiappari and Silvia L. Lopez.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5.
- Capel, Sharon. Letter to *New York Times* (7 March 1993).
- Carby, Hazel V. *Reconstructing Womanhood: The Emergence of the Afro-American Woman Novelist*. Oxford: Oxford UP, 1987.
- Carlston, Erin G. "Zami and the Politics of Plural Identity." *Sexual Practice, Textual Theory: Lesbian Cultural Criticism*. ed. Susan J. Wolfe and Julia Penelop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3. 226—236.
- Caserio, Robert L. "'A Pathos of Uncertain Agency': Paul de Man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0 (Spring 1990): 195—209.
- . *Plot, Story, and the Novel*.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9.
- Castillo, Debra A. *Talking Back: Toward a Latin American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thaca, NY: Cornell UP, 1992.
- Caughie, Pamela. "Passing as Pedagogy: Feminism in(to) Cultural Studies." *English Studies/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alizing Dissent*. ed. Isaiah Smithson and Nancy Ruff.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4): 76—93.
- Cha, Theresa Hak Kyung. *DICTEE*. New York: Tanam, 1982.
- Chai, Alice Yun. "Toward a Holistic Paradigm for Asian American Women's Studies: A Synthesis of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Women of Color's Feminist

- Politic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8.1 (1985): 59—66.
- Chambers, Iain. *Migrancy, Culture,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4.
- Chametzky, Jules. “Beyond Melting Pots, Cultural Pluralism, Ethnicity—or,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Melus* 16 (Winter 1989—1990): 3—17.
- Chang, Elaine K. “A Not-So-New Spelling of My Name: Notes toward (and against) a Politics of Equivocation.” *Displacements: Cultural Identities in Question*. ed. Angelika Bammer.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 251—266.
- Chapman, Wayne, ed. Special Issue on Virginia Woolf International. *South Carolina Review* 29.1 (Fall 1996).
- Chatman, Seymour.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P, 1978.
- Cheng, Vincent J. *Joyce, Race,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 Chernin, Kim. *In My Mother’s House: A Daughter’s 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3.
- Chessman, Harriet Scott. *The Public Is Invited to Dance: Representation, the Body, and Dialogue in Gertrude Stein*.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1989.
- Chirot Daniel, and Anthony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97.
- Cho, Sumi K. “Korean Americans vs. African Americans: Conflict and Construction.” *Gooding-Williams* 196—211.
-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78.
- Christian, Barbar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Perspectives on Black Women Writers*. New York: Pergammon Press, 1985.
- . *Black Women Novelists: The Development of a Tradition, 1892—1976*.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0.
- . “The Race for Theory.” 1987. *Gender and Theory: Dialogues on Feminist Criticism*. ed. Linda Kauffma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225—237.
- Cixous, Hélène.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1975. *Marks and de Courtivron* 254—264.
- Clayton, Jay. “The Narrative Turn in Recent Minority Fiction.” *American Literary*

- History* 2.3 (Fall 1990): 375—393.
- . “Narrative and Theories of Desire.” *Critical Inquiry* 16 (1989): 33—53.
- . *The Pleasures of Babel: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ory*. Oxford: Oxford UP, 1993.
- Clifford, James. “Diasporas.” *Routes* 244—277.
- . “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 *Inscriptions* 5 (1989): 177—188.
- .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Clifford and Marcus 98—121.
- .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8.
- .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7.
- . “Spatial Practices: Fieldwork, Travel,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Anthropology.” *Routes* 52—91.
- . “Traveling Cultures.” *Cultural Studies*. ed. Lawrence Grossberg, G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 London: Routledge, 1992. 96—116. Rpt. *Routes* 17—47.
- Clifford, James, and Vivek Dhareshwar, eds. Special Issue on Traveling Theories, Traveling Theorists. *Inscriptions* 5 (1989).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6.
- Clifton, Lucille. “Last Note to My Girls.” *An Ordinary Wo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29.
- Cohen, Ralph, ed.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9.
- Cole, Johnnetta B.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ll American Women: Lines that Divide, Ties that Bind*. ed. Johnnetta B. Col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1—30.
- Collins, Patricia Hill.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A Black Feminist Statement.” 1977. Hull, Scott, and Smith 13—22.
- Coyner, Sandra. “Women’s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hy and How to Do It.” Bowles and Klein 46—71.

- Crosby, Christina. "Dealing with Differences." Butler and Scott 130—134.
- Crossette, Barbara. "Women's Advocates Flocking to Cairo, Eager for Gains." *New York Times* (2 September 1994).
- Cruikshank, Margaret, ed. *Lesbian Studies, Present and Future*. Old Westbury, NY: Feminist Press, 1982.
- Cuddy-Kean, Melba, and Kay Li. "Passage to China: East and West and Woolf." *South Carolina Review* 29.1 (Fall 1996): 132—149.
- Cummings, June. "Lily Briscoe's Journey to the Western Islands of Scotland: Kunstlerroman, Colonial Travelogue, or Intertextual Appreciation." Paper delivered at the Sixth Annual Virginia Woolf Conference. Clemson, SC, June 1996.
- . "The Voyage Out and Between the Acts: Readings of Empire." *Virginia Woolf Texts and Contexts*. ed. Beth R. Daugherty and Eileen Barrett. White Plains, NY: Pace UP, 1996. 204—290.
- D'Acci, Julie. *Defining Women: The Case of Cagney and Lacy*. Durham: Duke UP, 1994.
- Daly, Suzanne. "Botswana Pressuring Bushmen to Leave Reserve." *New York Times* (14 July 1996).
- . "Endangered Bushmen Find Hope." *New York Times* (18 January 1996); A4.
- Daly, Mary.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 . "The Qualitative Leap beyond Patriarchal Religion." *Quest* 1.4 (Spring 1975): 21—28.
- . Response. Session on Developing Feminist Theory at *The Second Sex—Thirty Years Later: A Commemorative Conference on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ity, 28 September 1979.
- Dash, Julie. *Daughters of the Dust*, film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ulie Dash. 1992.
- . *Daughters of the Dust: 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American Woman's Film*. New York: New Press, 1992.
- Davies, Carole Boyce. *Black Women, Writing and Identity: Migrations of the Subject*. London: Routledge, 1994.
- Davies, Tony, and Nigel Wood, eds. *A Passage to India*. Philadelphia: Open

- University Press, 1994.
-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974. Trans. Steven Rendell.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4.
- DeFrees, Madeline. *Imaginary Ancestors*. Seattle: Broken Moon Press, 1990.
- Dekoven, Marianne. *Rich and Strange: Gender, History, Modern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1.
- de Lauretis, Teresa.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4.
- . "Eccentric Subjects: Feminist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Feminist Studies* 16 (Spring 1990): 115—150.
- .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Issues, Terms, and Contexts." *Feminist Studies* 1—19.
- .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7.
- , ed. *Feminist Studies/Critic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6.
- , ed. Special Issue on Queer Theory: Lesbian and Gay Sexualities. *Differences* 3 (Summer 1991).
- DeLombard, Jeannine. "Buffalo Gal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4 October 1993): 24.
- de Man, Paul. *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 New Haven: Yale UP, 1979.
- .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1971. Rev. ed.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3.
- . "Reading and History."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54—72.
- Dembo, L. S. *Conceptions of Reality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66.
- Derrida, Jacques. "Fors." Abraham and Torok xi—xlvi.
- . "Ulysses Gramophone: Hear Say Yes in Joyce." *Acts of Literature*. ed. Derek Attridge. London: Routledge, 1992. 253—309.
- Dhareshwar, Vivek. "Marxism, Location Politic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Critique." *Public Culture* 6.1 (1993): 41—54.

- Dickie, Margaret. *On the Modernist Long Poem*. Iowa City: U of Iowa P, 1986.
- Dikötter, Frank.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2.
- Dill, Bonnie Thornton. "Race, Class, and Gender Prospects for an All-inclusive Sisterhood." *Feminist Studies* 9 (Spring 1983): 129—150.
- Domínguez, Virginia R. *White by Definition: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Creole Louisian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96.
- Donaldson, Laura E. *Decolonizing Feminisms: Race, Gender, and Empire-Building*.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92.
- Doyle, Laura. *Bordering on the Body: The Racial Matrix of Modern Fiction and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94.
- Drabble, Margare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5<sup>th</sup> ed. Oxford: Oxford UP, 1985.
- duCille, Ann. "The Occult of True Black Womanhood: Critical Demeanor and Black Feminist Studies." *Signs* 19 (Spring 1994): 591—629.
- Dumont, Louis. *Homo Hierarchicus: An Essay on the Caste System*. 1966. Trans. Mark Sainsbur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0.
- DuPlessis, Rachel Blau. 1979. "For the Etruscans." Showalter, *New Feminist Criticism* 271—291.
- . *The Pink Guitar: Writing as Feminist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1990.
- .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wentieth-Century Women Wri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5.
- Eco, Umberto, and Thomas A. Sebeok, eds. *The Sign of Three: Dupin, Holmes, Peirce*.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3.
- Eisenstein, Hester, and Alice Jardine, eds. *The Future of Differe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80.
- Eisenstein, Sergei. "Principles of Film Form." *Close Up* 8.3 (September 1931): 167—181.
- Elam, Diane, and Robyn Wiegman, eds. *Feminism Beside Itself*. London: Routledge, 1995.
- Eliot, T. S.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1919. *Selected Prose*. ed. Frank Kermod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 37—44.



- Ellsworth, Elizabeth. "Why Doesn't This Feel Empowering? Working through the Repressive Myths of Critical Pedagog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9.3 (August 1989): 297—324.
- Elton, G. R.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New York: Crowed, 1967.
- Erdrich, Louise. *Tracks*. New York: Henry Holt, 1988.
- 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 The Experiences of a Black Man in a White World*. 1952. Trans. Charles Lam Markman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 Featherstone, Mike, Scott Lash, and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 Fellows, Mary Louise, and Sherene Razack. "Seeking Relations: Law and Feminism Roundtables." *Signs* 19 (Summer 1994): 1048—1083.
- Felman, Shoshana. "Beyond Oedipus: The Specimen Story of Psychoanalysis." *Lacan and the Adventure of Insight*.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7.98—159.
- 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 Felski, Rita. *Feminist Aesthetics: Femin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 Ferguson, James, and Akhil Gupta, eds. Special Issue on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Cultural Anthropology* 7 (February 1992).
- Fields, Barbara. "Ideology and Race in American History." *Region, Race, and Reconstruction*. ed. J. Morgan Kousser and James M. McPherson. New York: Oxford UP, 1982. 143—177.
- Findler, Barbara, ed. *Listen Up: Voices from the Next Feminist Generation*. Seattle: Seal Press, 1995.
- Fiske, John. *Television Culture*. London: Methuen, 1987.
- Forster, E. M. *Aspects of the Nove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7.
- . *The Hill of Devi*.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3.
- . *A Passage to India*. 192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2.
- Fortney, Nancy D. "The Anthropological Concept of Race."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8. (September 1977): 35—54.
- Foster, Frances Smith. *Written by Herself: Literary Produc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 Women, 1746—1892*,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3.
- Foster, Gwendolyn Audrey. *Women Filmmakers of the African and Asian Diaspora: Decolonizing the Gaze, Locating Subjectivit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1997.
- Foster, R. Thomas. "Homelessness at Home: Oppositional Practices and Modern Women's Writing." Diss. U of Wisconsin-Madison, 1990.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1.
- .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66. New York: Vintage, 1970.
- .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ed. and trans. Colin Gordon. New York: Pantheon, 1980. 63—77.
- Fox, Richard G., ed. *Recapturing Anthropology: Working in the Present*. Sante Fe, NM: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1.
- Frankenberg, Ruth. *White Women, Race Matter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itenes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 Frankenberg, Ruth and Lata Mani. "Crosscurrents, Crosstalk: Race, 'Postcoloniality' and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Cultural Studies* 7.1 (May 1993): 292—310.
- Fregoso, Rosa Linda. *The Bronze Screen: Chicana and Chicano Film Cul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 Freud, Sigmun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0.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 Friedan, Betty.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1.
- Friedland, Roger, and Deirdre Boden, eds. *NowHere: Space, Time and Modernity*.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4.
- Friedman, Edward.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Asianization of the World." *State and Sovereignty in the World Economy*. ed. David Smith, 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 London: Routledge, forthcoming.
- Friedman, Jonathan. "Global Crises, the Struggle for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tellectual Porkbarrelling." *Werbner and Modood* 70—89.
- . "Global Syste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arameters of Modernity." *Featherstone, Lash, and Robertson*, 69—90.

-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Androgyny: An Overview of Feminist Definition and Debate." Unpublished essay.
- "Craving Stories: Narrative and Lyric in Contemporary Theory and Women's Long Poems." *Feminist Measures: Soundings in Poetry and Theory*. ed. Lynn Keller and Cristanne Miller.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4. 15—42.
- . "Forbidden Fruits of Knowledge: The Psychodynamics of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nd Women in Education." *Annual of Psychoanalysis* 15 (1987): 353—374.
- . "Gender and Genre Anxiety: Elizabeth Barret Browning and H. D. as Epic Poets."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5 (Fall 1986): 203—231.
- . "Hysteria, Dreams, and Modernity: A Reading of the Origins of Psychoanalysis in Freud's Early Corpus." *Rereading the New: A Backward Glance at Modernism*. ed. Kevin J. H. Dettmar.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2. 41—72.
- . "Identity Politics, Syncretism, Catholicism, and Anishinabe Religion in Louise Erdrich's *Tracks*."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26 (Spring 1994): 107—133.
- . "Lyric Subversion of Narrative in Women's Writing: Virginia Woolf and the Tyranny of Plot." *Reading Narrative: Form, Ethics, Ideology*. ed. James Phelan. Columbus: Ohio State UP, 1989. 162—185.
- . "The New Modernist Studies: A Polemical Call." Paper delivered at the Conference on American Modernism. Montreal, June 1995.
- . *Penelope's Web: Gender, Modernity, H.D.'s Fi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 . *Psyche Reborn: The Emergence of H.D.*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1.
- . "Relational Epistemology and the Question of Anglo-American Feminist Criticism."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2 (Fall 1993): 247—262.
- . "Spatialization, Narrative Theory, and Virginia Woolf's *The Voyage Out*." *Ambiguous Discourse: Feminist Narratology and British Women Writers*. ed. Kathy Mezei.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96. 109—136.
- . "Spatialization: A Strategy for Reading Narrative." *Narrative* 1 (January 1993): 12—23.

- . “Virginia Woolf’s Pedagogical Scenes of Reading: *The Voyage Out*, *The Common Reader*, and Her ‘Common Readers’.” *Modern Fiction Studies* 38 (Spring 1992): 101—125.
- . “Weaving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Re)Birth of the Author.” *Influence and Intertextuality in Literary History*. ed. Jay Clayton and Eric Rothstein.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91. 146—180.
- . “When a ‘Long’ Poem Is a ‘Big’ Poem: Self-Authorizing Strategies in Women’s Twentieth-Century ‘Long Poems’” *Lit* 2 (1990): 9—25.
- . “Women’s Autobiographical Selve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rivate Sel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Women’s Autobiography*. ed. Shari Benstock. Chapel Hill: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88. 38—62.
- Frye, Marilyn. “On Being White: Thinking toward a Feminist Understanding of Race and Race Supremacy.” 1981.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 1983. 110—127.
- . “White Woman Feminist” *Willful Virgin: Essays in Feminism*.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 1992. 147—169.
- Furbank, P. N. *E. M. Forster: A Life*. 2 vols. London: Seeker and Warburg, 1977—1978.
- Fuss, Diana.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Gallin, Rita S., and Anne Ferguson. “The Plurality of Feminism: Rethinking ‘Difference’” *The Wome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nual*. Vol. 3.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1—16.
- Gallop, Jane.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Ithaca: Cornell UP, 1982.
- Gallop, Jane, Marianne Hirsch, and Nancy K. Miller. “Criticizing Feminist Criticism.” *Conflicts in Feminism*. ed. Marianne Hirsch and Evelyn Fox Kell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49—369.
- Ganguly, Adwaita P. *India: Mystic, Complex, and Real*. Dehli: Motilal Banarsidass, 1990.
- Gardiner, Judith Kegan. “On Female Identity and Writing by Women.” *Critical Inquiry* 8 (Winter 1981): 347—361.

- Gardner, Thomas. *Discovering Ourselves in Whitma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ong Poem*.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89. Gaskell, Elizabeth. *North and South, 1854—1855*. Oxford: Oxford UP, 1982.
- Gates, Henry Louis, Jr. Introduction. "Race" 1—20.
- . "A Liberalism of Heart and Spine." *New York Times* (27 March 1994).
- .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P, 1988.
- , ed.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6.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 Gibbs, Peter. *Crimean Blunder: The Story of War with Russia a Hundred Years Ago*.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0.
- Gikandi, Simon. *Maps of Englishness: Writing Identity in the Culture of Colon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7.
- . *Writing in Limbo: Modernism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P, 1992.
-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P, 1979.
- Gilroy, Paul.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3.
- Ginsberg, Allen. *Howl, and Other Poems*.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56.
- Glancy, Diane. *Claiming Breath*. Lincoln: U of Nebraska P, 1992.
- . *Lone Dog's Winter Count*. Albuquerque: West End Press, 1991.
- Gluck, Sherna Berger. "Advocacy Oral History: Palestinian Women in Resistance." Gluck and Patai 205—220.
- Gluck, Sherna Berger,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1.
- Goldberg, David Theo, ed. *Anatomy of Rac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0.
- Gómez-Peña, Guillermo. *The New World Border: Prophecies, Poems, and Loqueras*

- for the End of the Centur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96.
- Gooding-Williams, Robert, ed. *Reading Rodney King/Reading Urban Uprising*. London: Routledge, 1993.
- Gordon, Avery F., and Christopher Newfield, eds. *Mapping Multicultural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 Gordon, Linda. "On 'Difference.'" *Genders* 10 (Spring 1991): 91—111.
- . "Reponse to Scott." *Signs* 15 (Summer 1990): 852—853.
- . Review of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by Joan Wallach Scott. *Signs* 15 (Summer 1990): 853—858.
- Gornick, Vivian, and Barbara K. Moran, eds. *Woman in Sexist Society: Studies i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Gould, Harold A. *The Hindu Caste System: The Sacralization of a Social Order*. Delhi: Chanakya Publications, 1987.
- Grahn, Judy. *Common Woman Poems*. 1969. *The Work of a Common Woman*.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 1978. 59—74.
- . *The Queen of Wands*.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 1982.
- Gray, Herman. "The Endless Slide of Difference: Critical Television Studies, Television and the Question of Ra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 (June 1993): 190—197.
- . "Television, Black American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6 (December 1989): 376—386.
- Green, Jennifer M. "Stories in an Exhibition: Narrative and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ic Documentary."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20 (Spring 1990): 147—166.
- Greene, Gayle. "Looking at History." Greene and Kahn 4—30.
- Greene, Gayle, and Coppélia Kahn, eds. *Changing Subjects: The Making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 Routledge, 1993.
- Grewal, Inderpal. "Autobiographic Subjects and Diasporic Locations: *Meatless Days and Borderlands*." Grewal and Kaplan 231—254.
- . *Home and Harem: Nation, Gender, Empire, and the Cultures of Travel*. Durham: Duke UP, 1996.
- Grewal, Inderpal, and Caren Kaplan, eds. *Scattered Hegemonies: Postmodernity*

- and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4.
- Gross, Jane. "Body and Victim Trampled, a Riot Victim Fights On." *New York Times* (22 October 1993).
- Gunew, Sneja.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Irreducible Differences: Multiculturalism/Ethnicity/Race." Gunew and Yeatman 1—19.
- Gunew, Sneja, and Anna Yeat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3.
- Gupta, Akhil, and James Ferguson. "Beyond 'Culture': Space,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Ferguson and Gupta 6—23.
- Guttman, Amy, ed. *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4.
- Hadas, Pamela White. *Beside Herself: Pocahontas to Patty Hearst*. New York: Knopf, 1983.
- Hale, Sondra. "Feminist Method, Process, and Self-Criticism: Interviewing Sudanese Women." Gluck and Patai 121—136.
- Haley, Alex. *Roots*. New York: Dell, 1976.
- Hall, Stuart.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ed. Patrick Williams and Laura Christia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4. 392—403.
- . "Ethnicity: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Radical America* 23.4 (1989): 9—20.
- .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Globalization and Ethnicity." Anthony King 19—40.
- . "New Ethnicitie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ed.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London: Routledge, 1996. 441—449.
- .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Anthony King 41—69.
- Hannerz, Ulf. *Cultural Complex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eaning*.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2.
- . "Scenarios for Peripheral Cultures." Anthony King 107—128.
- . "The World in Creolisation." *Africa* 57.4 (1987): 546—559.
- Harari, Josué V.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P, 1979.
- Haraway, Donna.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 Feminism of the 1980s." *Feminism/Postmodernism*. ed. Linda J. Nichols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190—234.
- .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Fall 1988): 575—599.
- Harding, Sarah. "Culture as an Object of Knowledge." *Contention* 2 (Spring 1993): 121—126.
- Harjo, Joy. *in Mad Love and War*.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P, 1990.
- Harlan, Davi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Return of Literatur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June 1989): 581—609.
- Harris, Virginia R., and Trinity A. Ordoña. "Developing Unity among Women of Color: Crossing the Barriers of Internalized Racism and Cross-Racial Hostility." Anzaldúa, *Making Face* 304—316.
- Hartsock, Nancy C. M.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Developing the Ground for a Specifically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overing Reality: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Epistemology, Metaphysic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 Sandra Harding and Merrill B. Hintikka. Boston: D. Reidel, 1983. 283—310.
-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Hawkesworth, Mary. "Confounding Gender." *Signs* 22.3 (1997): 649—685.
- H.D. (Hilda Doolittle) *Asphodel*. ed. Robert Spoo. Durham, NC: Duke UP, 1992.
- . *Bid Me to Live (A Madrigal)*.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0.
- . *By Avon River*.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 . *Helen in Egypt*. 1961.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4.
- . *Hermetic Definition*.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2.
- . *Hermetic Definition*. H.D., *Hermetic Definition* 1—56.
- . *Sagesse*. H. D., *Hermetic Definition* 57—84.
- . "Thorn Thicket" 1960. Unpublished memoir.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 . *Trilogy*. 1944—1946.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3.
- . *Vale Ave*. *New Directions: 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Prose* 44 (1982). 18—166.
- . *Winter Love*. H.D., *Hermetic Definition* 85—117.



- Heilbrun, Carolyn G. *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 . *Writing a Woman's Life*. New York: Norton, 1988.
- Hekman, Susan. "Truth and Method: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Revisited." *Signs* 22.2 (Winter 1997): 341—365.
- Henderson, Mae Gwendolyn. "Speaking in Tongues: Dialogics, Dialectics, and the Black Woman Writer's Literary Tradition." *Wall* 16—37.
- Hernández, Graciela. "Multiple Subjectivities and Strategic Positionality: Zora Neale Hurston's Experimental Ethnographies." *Behar and Gordon* 148—164.
- Herz, Judith Scherer. *"A Passage to India": Nation and Narration*. New York: Twayne, 1993.
- Hewitt, Nancy A. "Compounding Difference." *Feminist Studies* 18.2 (Summer 1992): 313—326.
- Heywood, Leslie, and Jennifer Drake, eds. *Third Wave Agenda: Being Feminist/Doing Femin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 Hicks, D. Emily. *Border Wri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Tex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1.
- Higginbotham, Evelyn Brooks. "African-American Women's History and the Metalanguage of Race." *Signs* 17 (Winter 1992): 251—274.
- Higonnet, Margaret R., ed. *Borderwork: Feminist Engagements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P, 1994.
- Higonnet, Margaret R., and Joan Templeton, eds. *Reconfigured Spheres: Feminist Explorations of Literary Space*.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94.
- Hirsch, Marianne. *The Mother/Daughter Plot: Narrati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9.
- Hite, Molly. "'Except thou ravish me': penetrations into the life of the (feminine) mind." *Greene and Kahn* 121—128.
- Holmes, Steven A. "Study Finds Minorities Resent One Another Almost as Much as They Do Whites." *New York Times* (3 March 1994).
- Homans, Margaret. *Bearing the Word: Language and Female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Women's Writing*.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6.
- . "'Women of Color' Writers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25

- (Winter 1994): 73—94.
- hooks, bell. "Feminism: A Transformational Politic." *Talking Back* 19—27.
- .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4.
- . "Seduction and Betrayal: *The Crying Game* Meets *The Bodyguard*." *Outlaw Culture: Resisting Represen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4. 53—62.
- . *Talking Back*. Philadelphia: South End Press, 1989.
- .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 hooks, bell, and Anuradha Dingwaney. "Mississippi Masala." *Z Magazine* 5 (July/August 1992): 41—43.
- Hull, Gloria T., Patricia Bell Scott, and Barbara Smith. *All the Women Are White, All the Blacks Are Men, But Some of Us Are Brave: Black Women's Studies*. Old Westbury, NY: Feminist Press, 1982.
- Hurston, Zora Neale. "Characteristics of Negro Expression." 1934. *The Gender of Modernism: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Bonnie Kime Scott.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0. 175—187.
- . *Jonah's Gourd Vine*.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34.
- . *Mules and Men*. 1935.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78.
- . *Tell My Horse: Voodoo and Life in Haiti and Jamaica*. 1938.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90.
- .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78.
- Hurston, Zora Neale, and Langston Hughes. *Mule Bone: A Comedy of Negro Life*. ed. George Houston Bass and Henry Louis Gates, Jr. New York: Harper, 1991.
- Hurtado, Aída. "Relating to Privilege: Seduction and Rejection in the Subordination of White Women and Women of Color." *Signs* 14.4 (1989): 833—855.
- Hutcheon, Linda.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 ed. Special Issue on Coloni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PMLA* 110 (January 1995).
- Hutnyk, John. "Adorno at Womad: South Asian Crossovers and the Limits of Hybridity-Talk." *Werbner and Modood* 106—138.
- Irigaray, Luce. "The Power of Discourse and the Subordination of the Feminine" 1975.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Trans. Catherine Porter. Ithaca: Cornell UP,

1985. 68—86.
- Jacobs, Harriet A.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186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 Jacoby, Russell. "A New Intellectu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7 (April 1992): 405—439.
- Jameson, Fredric.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Cornell UP, 1981.
- .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P, 1991.
- JanMohamed, Abdul, and David Lloyd, eds. *The Nature and Context of Minority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P, 1990.
- Jardine, Alice. "Gynesis." *Diacritics* 12 (Summer 1982): 54—65.
- . *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Modernity*. Ithaca: Cornell UP, 1985.
- Jen, Gish.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New York: Knopf, 1996.
- . *Typical American*. New York: Penguin, 1991.
- Jones, John Paul III, Heidi J. Nast, and Susan M. Roberts, eds. *Thresholds in Feminist Geography: Difference, Methodology, Representat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7.
- Jordan, June. "Report from the Bahamas." *On Call: Political Essay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5. 39—54.
- Jordan, Neil. *The Crying Game*. *A Neil Jordan Reader*. New York: Vintage, 1993. 177—267.
- . *The Crying Game*, film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ordan. 1992.
- Joseph, Gloria I., and Jill Lewis. *Common Differences: Conflicts in Black and White Feminist Perspectives*. New York: Anchor, 1981.
- Joyce, James. *Ulysses*. ed. Hans Walter Gabler et 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
- Kamboureli, Smaro. *On the Edge of Genre: The Contemporary Canadian Long Poem*. Toronto: U of Toronto P, 1991.
- Kamm, Henry. "In New Eastern Europe, An Old Anti-Gypsy Bias." *New York Times* (17 November 1993).
- Kamuf, Peggy. "Replacing Feminist Criticism." *Diacritics* 12 (Summer 1982):

42—47.

Kaplan, Alexandra G. *Psychological Androgyny*. New York: Human Sciences Press, 1979.

Kaplan, Alexandra G., and Joan P. Bean, eds. *Beyond Sex-Role Stereotypes: Readings toward a Psychology of Androgyn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Kaplan, Caren. "Deterritorializations: The Rewriting of Home and Exile in Western Feminist Discourse." *JanMohamed and Lloyd* 357—368.

———. "The Politics of Location as Transnational Feminist Practice." *Grewal and Kaplan* 137—153.

———.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NC: Duke UP, 1996.

Kaplan, Carla. *The Erotics of Talk: Women's Writing and Feminist Paradigms*. Oxford: Oxford UP, 1996.

Kauffman, Linda S. "The long goodbye: against the personal testimony or, an infant grifter grows up." *Greene and Kahn* 129—146.

———, ed. *Gender and Theory: Dialogues in Feminist Critic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Kavanagh, Thomas M. ed. *The Limits of Theory*.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1989.

Keetley, Dawn. "Contested Terrains of Feminine Subjectivity: Conflicts over Self and Spac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Women's Autobiography." Diss. U of Wisconsin-Madison, 1994.

Keith, Michael, and Steve Pile. eds. *Pl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3.

Keller, Evelyn Fox, and Helene Moglen. "Competition and Feminism: Conflicts for Academic Women." *Signs* 12 (1987): 493—511.

Keller, Lynn. *Forms of Expansion: Recent Long Poems by Women*.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7.

———. "Poems Containing History: Some Problems of Definition of the Long Poem." Paper delivered at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vention. December 1988.

———. "The Twentieth-Century Long Poem."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ed. Jay Parini.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3. 534—563.

- Kelly, Joan.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1977.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Essays of Joan Kell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4. 19—50.
- .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 *Signs* 1 (Summer 1976): 809—823.
- Kenner, Hugh.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ist Canon." *Chicago Review* 34.2 (Spring 1984): 49—61.
- Kessler-Harris, Alice. "The View from Women's Studies." *Signs* 17.4 (1992): 794—804.
- Kim, Elaine H. "Home Is Where the *Man* Is: A Korean-American Perspective on the Los Angeles Upheavals." *Gooding-Williams* 215—235.
- Kincaid, James R. *Tennyson's Major Poems: The Comic and Ironic Patterns*. New Haven: Yale UP, 1975.
- King, Anthony D.,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2d ed.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 King, Deborah K. "Multiple Jeopardy, Multiple Consciousness: The Context of Black Feminist Ideology." *Signs* 14 (Autumn 1988): 42—72.
- Kingston, Maxine Hong.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New York: Vintage, 1976.
- Kirby, Kathleen M. *Indifferent Boundaries: Spatial Concepts of Human Subjectivit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6.
- Klepfisz, Irena. *Keeper of Accounts*. Watertown, MA: Persephone Press, 1982.
- Kogawa, Joy. *Obasan*.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81.
- Kolenda, Pauline. *Caste in Contemporary India: Beyond Organic Solidarity*. Amsterdam: Benjamin/Cummings, 1978.
- Kolodny, Annette. "Dancing between Left and Right: Feminism and the Academic Minefield in the 1980s." *Feminist Studies* 14 (Fall 1988): 433—466.
- Kondo, Doreen. "Women of Color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Identity." *Romero and Arguelles* 57—70.
- Koshy, Susan. "The Geography of Female Subjectivity: Ethnicity, Gender, and Diaspora in Mukherjee's Fiction." *Diaspora* 3 (1994): 69—84.
- . "'Under Other Skies': Writing, Gender, Nation, and Diaspora." Diss. U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992.

- Kracke, Waud. "Encounter with Other Cultures: Psych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Aspects." *Ethos* 15.1 (1987): 58—81.
- Kramer, Lloyd S.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The New Critic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9. 97—128.
- Kristeva Julia.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 Anita Barrows. London: Marion Boyars, 1977.
- .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ed. Leon S. Roudiez. Trans.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0.
- .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in Abjection*. Trans. Leon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 .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1974. Trans. Margaret Waller.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4.
- . "Women's Time." Translated by Alice Jardine and Harry Blake. *Signs* 7 (1981): 13—35.
- Kuhn, Thoma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d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0.
- Kureshi, Hanif. *The Buddha of Suburbia*. London: Penguin, 1990.
- Lacan, Jacques.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 Muller and Richardson 28—54.
- Lach, David.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1.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65.
- LaCapra, Dominick. *History and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P, 1985.
- .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ts Ways"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97 (April 1992): 425—439.
- . *Soundings in Critical Theory*. Ithaca: Cornell UP, 1989.
- , ed. *The Bounds of Race: Perspectives on Hegemony and Resistance*. Ithaca: Cornell UP, 1991.
- Lambert, Andrew, and Stephen Badsey.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Crimean War*. Dover, NH: Alan Sutton, 1994.
- Lanser, Susan Sniader. "Compared to What? Global Feminism, Comparativism, and the Master's Tools." *Higonnet* 280—300.

- Larsen, Nella. *Quicksand*. 1928. New Brunswick: Rutgers UP, 1986.
- Laslett, Barbara. "Gender Analysis and Social Theory: Building on Ruth Block's Proposals." *Contention* 2 (Spring 1993): 107—120.
- Lawrence, Karen. *Penelope Voyages: Women and Travel in the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 Ithaca: Cornell UP, 1994.
- Layoun, Mary. "Telling Spaces: Palestinian Women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tional Narratives." Parker et al. 407—423.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LeGuin, Ursula K. "It Was a Dark and Stormy Night, or, Why Are We Huddling around the Campfire?" *On Narrative*.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1. 187—196.
- Lehrman, Karen. "Off Course." *Mother Jones* (September/October 1993): 45—51, 65—68.
- Lerner, Gerda.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P, 1979.
- Li, Victor P. H. "The Vanity of Length: The Long Poem as Problem in Pound's *Cantos* and Williams' *Paterson*." *Genre* 14 (Spring 1986): 3—20.
- Ling, Amy.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mon Press, 1990.
- Livesay, Dorothy. *The Documentaries*. Toronto: Ryerson Press, 1968.
- . "The Documentary Poem: A Canadian Genre." *A Family Romance: Critical Essays*. ed. Eli Mandel. Winnipeg: Turnstone Press, 1987. 267—281.
- Longnecker, Marlene. "Marlene Longnecker Responds." *off our backs* 20 (October 1990): 24.
- Looser, Devoney, and E. Ann Kaplan, eds. *Generations: Academic Feminists in Dialogu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7.
- Lorde, Audre. "Age, Race, Class, and Sex: Women Redefining Difference." Lorde, *Sister Outsider* 114—123.
- . "I Am Your Sister: Black Women Organizing across Sexualities." Anzaldúa, *Making Face* 321—325.
- . Interview with Pratibha Parmar and Jackie Kay. *Charting the Journey*:

- Writings by Black and Third World Women*. ed. Shabman Grewal, Jackie Kay, Liliane Landor, Gail Lewis, and Pratibha Parmar. London: Sheba Feminist Publications, 1988.
- . *Sister Outsider: Essays and Speeches*.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 1984.
- . *Zami: A New Spelling of My Name, Biomythography*. Trumansburg, NY: Crossing Press, 1982.
- Lowe, Lisa.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Ithaca: Cornell UP, 1991.
- . “Heterogeneity, Hybridity, Multiplicity: Marking Asian American Differences.” *Diaspora 1* (Spring 1991): 24—44.
- Lowell, Robert. *Hist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3.
- Loy, Mina. *Anglo-Mongrel and the Rose. The Last Lunar Baedeker*. ed. Roger L. Conover. Highlands, NC: Jargon Society, 1982. 109—176.
- Luce, Morton. *A Handbook to the Works of Alfred Lord Tennyson*. New York: Hurt Franklin, 1970.
- Lugones, María C. “Hablando cara a cara/Speaking Face to Face: An Exploration of Ethno-centric Racism.” Anzaldúa, *Making Face* 46—54.
- . “On the Logic of Pluralist Feminism.” *Feminist Ethics*. ed. Claudia Card. Lawrence: UP of Kansas, 1991. 35—44.
- . “Playfulness, ‘World’-Travelling, and Loving Perception.” Anzaldúa, *Making Face* 390—402.
- . “Purity, Impurity, and Separation.” *Signs* 19.2 (Winter 1994): 458—478.
- Lugones, María C., and Elizabeth V. Spelman. “Have We Got a Theory for You! Feminist Theory,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the Demand for ‘The Woman’s Voic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6.6 (1983): 573—581.
- Lyotard, Jean-Francois. 197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4.
- Manganaro, Marc, ed. *Modernist Anthropology: From Fieldwork to Text*.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0.
- Mani, Lata. “Multiple Mediations: Feminist Scholarship in the Age of Multinational



- Reception." Clifford and Dhareshwar 1—24.
- Marcus, Jane. "Britannia Rules *The Waves*." *Decolonizing Tradition: New Views of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Literary Canons*. ed. Karen R. Lawrence.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92. 136—164.
- . *Virginia Woolf and the Languages of Patriarch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7.
- Marks, Elaine, and Isabel de Courtivron, eds. *New French Feminisms: An Anthology*. Amherst: U of Massachusetts P, 1979.
- Marshall, George O., Jr. *A Tennyson Handbook*. New York: Twayne, 1963.
- Marshall, Paule. *Daughters*. New York: Penguin, 1992.
- Martin, Bidy. "Extraordinary Homosexuals and the Fear of Being Ordinary." *Differences* 6.2/3 (1994): 100—126.
- Martin, Bidy, and Chandra Talpade Mohanty. "Feminist Politics: What's Home Got to Do with It?" de Lauretis, *Feminist Studies* 191—212.
- Martin, Douglas. "Korean Store Owners Join Forces, Seeking Ties, Opportunity and Clout." *New York Times* (22 March 1993).
- Martin, Wallace. *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 Ithaca: Cornell UP, 1986.
- McDowell, Deborah. "Reading Family Matters." *Wall* 75—97.
- Medina, Rubén. "Gloria Anzaldúa: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Mestizaje*." *Critica: A Journal of Critical Essays*, forthcoming.
- Mehta, Gita. *A River Sutra*. New York: Vintage, 1993.
- Mernissi, Fatima. *Dreams of Trespass: Tales of a Harem Girlhood*. London: Addison-Wesley, 1994.
- Michaels, Walter Benn. "Race into Culture: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Cultural Identity." *Critical Inquiry* 18 (Summer 1992): 655—685.
- Michie, Elsie. "Race, Empire, and the Brontës." *Novel* 25 (Winter 1992): 125—140.
- Michie, Helena. "Mother, Sister, Other: The 'Other' Woman in Feminist Theory."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32 (1986): 1—10.
- Millay, Edna St Vincent. *Fata! Interview*. 1931. *Collected Sonnets of Edna St. Vincent Millay*. Rev.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 Miller, D. A. *Narrative and Its Discontents: Problems of Closure in the Traditional Novel*.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1.

- . *The Novel and the Polic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8.
- Miller, James E. *The American Quest for a Supreme Fiction: Whitman's Legacy in the Personal Epic*.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79.
- Miller, Nancy K. *Subject to Change: Reading Feminist Writing*.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 Minor, Valeric, and Helen E. Longino, eds. *Competition: A Feminist Taboo?*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87.
- Miyoshi, Masao. "A Borderless World? From Colonialism to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Critical Inquiry* 19 (Summer 1993): 726—751.
- Modleski, Tania. "Doing Justice to the Subjects: Mimetic Art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 Work of Anna Deavere Smith." Abel et al. 57—76.
- Modood, Tariq. "'Difference,' Cultural Racism, and Anti-Racism." Werbner and Modood 154—172.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Mohanty, Russo, and Torres, *Third World Women* 1—49.
- . "Feminist Encounters: Locating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 *copyright* 1 (Fall 1987): 30—44.
- . "On Race and Voice: Challenges for Liberal Education for the 1990s." *Culture Critique* 14 (Winter 1989—1990): 170—208.
- .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Mohanty, Russo, and Torres, *Third World Women* 51—80.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Ann Russo,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 UP, 1991.
- Mohanty, S. P. "'Us' and 'Them': On 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Political Criticism." *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 2.2 (1989): 1—31.
- Moi, Toril.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Methuen, 1985.
- Molina, Papusa. "Fragmentations: Meditation on Separatism." *Signs* 19.2 (Winter 1994): 449—457.
- . "Recognizing, Accepting and Celebrating Our Differences." Anzaldúa,

- Making Face* 326—335.
- Montefiore, Jan. *Feminism and Poetry: Language, Experience, Identity in Women's Writing*. London: Pandora, 1987.
- Moore, Henrietta L. *A Passion for Difference: Essays in Anthropology and Gender*.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4.
- Moraga, Cherrie, and Gloria Anzaldúa, eds. *The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Watertown, MA: Persephone Press, 1981.
- Morgan, Robin, ed. *Sisterhood Is Global: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Movement Anthology*. New York: Anchor, 1984.
- .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 Morrison, Toni. *Beloved*. New York: Knopf, 1987.
- . "Memory, Creation, and Writing." *Thought* 59 (December 1984): 385—390.
- .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P, 1992.
- .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8 (Win 1989): 1—34.
- Morson, Gary Saul. *Narrative and Freedom: The Shadow of Time*. New Haven: Yale UP, 1994.
- Mukherjee, Bharati. *Jasmine*. New York: Fawcett, 1989.
- . *The Tiger's Daughter*. New York: Fawcett, 1971.
- Muller, John P., and William J. Richardson, eds. *The Purloined Poe: Lacan, Derrida, and Psychoanalytic Read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8.
-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Screen* 16 (Autumn 1975): 8—18.
- Musil, Caryn McTighe. "'Rivers, Swamps, and Vanishing Ponds.'" *NWSAction* 3 (Winter 1990); 2—4, 22.
- Nair, Mira. *Mississippi Masala*, film written by Sooni Taraporevala and directed by Mira Nair. Mirabai Films, 1991.
- Nair, Mira, and Sooni Taraporevala. *Salaam Bomba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 Nandy, Ashis.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 Oxford: Oxford UP, 1983.
- Narayan, Kirin. "How Native Is a 'Native'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5.3 (September 1993): 671—686.
- Nicholson, Linda J.,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Nielsen, Aldon Lynn. *Reading Race: White American Poets and the Racial Discour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thens: U of Georgia P, 1988.
- Nelson, Gary,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88.
- NWSA Women of Color Caucus, "Institutionalized Racism and the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Sojourner: The Women's Forum* (August 1990): 8—9.
- Oliver, Melvin L., James H. Johnson, Jr., and Walter C. Farrell, Jr. "Anatomy of a Rebellion: A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Gooding-Williams* 117—141.
- Olson, Charles. *The Maximus Poems*. ed. George F. Butterick.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3.
- Omi, Michael, and Howard Winant. "The Los Angeles 'Race Riot' and Contemporary U.S. Politics." *Gooding-Williams* 97—116.
- .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London: Routledge, 1986.
- Orr, Linda. "The Revenge of Literature: A History of History." *New Literary History* 18 (Autumn 1986): 1—21.
- Ortner, Sherry.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ed. Michelle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1974. 67—87.
- Osborne, Nancy Scale. "Caryn McTighe Musil Resigns after Six Years as Director." *NWSAction* 3 (Winter 1990): 1—2.
- Ostriker, Alicia Suskin. *Stealing the Language: The Emergence of Women's Poetry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1986.
- Ozanne, Julian. "Old Clan Rivalries Fuel Bloodshed in Somalia." *Financial Times of London* (8—9 August 1992).
- Paget, General Lord George. *The Light Cavalry Brigade of the Crimea: Extracts from Letters and Journal*. 1881. London: EP Publishing, 1975.

- Papastergiadis, Nikos. "Restless Hybrids." *Third Text* 32 (Autumn 1995): 9—18.
- Parker, Andrew, Mary Russo, Doris Sommer, and Patricia Yaeger, eds. *Nationalisms and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 Parkerson, Michelle. "Did You Say the Mirror Talks?" Albrecht and Brewer 108—117.
- Parry, Benita. "Passage to More Than India." *Perspectives on E. M.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Ed. V. A. Shahane. New York: Bames and Noble, 1968. 151—166.
- Patai, Daphne. "Is Ethical Research Possible?" Gluck and Patai 137—153.
- Peréz-Torres, Rafael. "Nomads and Migrants: Negotiating a Multicultural Modernism." *Cultural Critique* 26 (Winter 1993—1994): 161—189.
- Perloff, Marjorie. "From Image to Action: The Return of Story in Postmodern Poetry." *The Dance of Intellect: Studies in the Poetry of the Pound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5. 155—171.
- . "Modernist Studie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ed. Stephen Greenblatt and Giles Gunn.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1992. 154—178.
-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Interpreting Women's Lives: Feminist Theory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9.
- Peterson, William, Michael Novak, and Philip Gleason. *Concepts of Ethnicity*.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0.
- Phelan, James.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 Character, Prog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9.
- Phelan, Shane. "(Be)Coming Out: Lesbian Identity and Politics." *Signs* 18.4 (Summer 1993): 765—790.
- Pheterson, Gail. "Alliances between Women: Overcoming Internalized Oppression and Internalized Domination." Albrecht and Brewer 34—48.
- Phillips, Kathy J. *Virginia Woolf against Empire*. Knoxville: U of Tennessee P, 1994.
- Pieterse, Jan Nederveen. "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Featherstone, Lash, and Robertson 45—68.

- Piggford, George. "'The Queer, Cautious Girl': Adela Quested and Gender Performance in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Paper delivered at Conference on Gender Politics and Twentieth-Century Multicultural Texts. Duquesne University, Pittsburgh, PA, November 1993.
- Pintchman, Tracy. "Snakes in the Cave: Religion and the Echo in E. M.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Soundings* 75.1 (Spring 1992): 61—78.
- Poliakov, Leon. *The Aryan Myth: A History of Racist and Nationalist Ideas in Europe*. Trans. Edmund How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Polumbo-Liu, David. "Los Angeles, Asians, and Perverse Ventriloquisms: On the Functions of Asian America in the Recent American Imaginary." *Public Culture* 6.2 (1994): 365—381.
- Pomata, Gianna. "History, Particular and Universal: On Reading Some Recent Women's History Textbooks." *Feminist Studies* 19.1 (Spring 1993): 7—50.
- Pratt, Geraldine. "Traveling Metaphors in Feminist Theory." Manuscript, 1993.
- Pratt, Mary Louise. "Arts of the Contact Zone." *Profession* 91.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1991. 33—40.
- . "Fieldwork in Common Places." *Clifford and Marcus* 27—50.
- .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 Pratt, Minnie Bruce. "Identity: Skin Blood Heart." Bulkin, Pratt, and Smith 9—64.
- Probyn, Elspeth. "Travels in the Postmodern: Making Sense of the Local." Nicholson 176—189.
- Propp, Vladimir. *The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1928. Trans. Laurence Scott. 2d ed. Austin: U of Texas P, 1969.
- Pryse, Marjorie, and Hortense J. Spillers, eds. *Conjuring: Black Women, Fiction, and Literary Tra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5.
- Purdom, Judy. "Mapping Difference." *Third Text* 32 (Autumn 1995): 19—32.
- Quintana, Alvina E. *Home Girls: Chicana Literary Voices*.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P, 1996.
- Radhakrishnan, R. *Diasporic Mediations: Between Home and Location*. Miao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6.
- . "Ethnicity in an Age of Diaspora." *Transition* 54 (November 1991):

- 104—115.
- . “Feminis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The Difference Within: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ed. Elizabeth Meese and Alice Parker.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9. 189—205.
- . “Post-Structuralist Politics: Toward a Theory of Coalition.” *Jameson/Postmodernism/Critique/*. ed. Douglas Kellner. Washington, DC: Mouton de la Haye Press, 1989. 276—290.
- Radical Lesbians. “Woman-Identified Woman.” 1970. *The American Sisterhood: Writings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ed. Wendy Marti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333—338.
- Ray, Sangeeta. “Gender and the Discourse of Nationalism in Anita Desai’s *Clear Light of Day*.” *Genders* 20 (1994): 96—119.
- . “Rethinking Migrancy: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Identity in *Jasmine* and *The Buddha of Suburbia*.” Paper delivered at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1992.
- Raymond, Janice. “The Illusion of Androgyny.” *Quest* 1.4 (Spring 1975): 20—40.
- Rebolledo, Tey Diana. *Woman Singing in the Snow: A Cultural Analysis of Chicana Literature*. Tucson: Arizona UP, 1995.
- Reeves, Jimmie L., and Richard Campbell. *Cracked Coverage: Television News, the Anti-Cocaine Crusade, and the Reagan Legacy*. Durham: Duke UP, 1994.
- Rensberger, Boyce. “The Melting Pot under a Microscope.” *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 (15—21 March 1993): 38.
- Rhys, Jean. *Smile Please: An Unfinished Autobiography*. Berkeley, CA: Creative Arts Books, 1979.
- . *Wide Sargasso Sea*. 1966. New York: Norton, 1982.
- Rich, Adrienne. *An Atlas of the Difficult World, Poems 1988—1991*. New York: Norton, 1991. 3—28.
- . *Blood, Bread and Poetry: Selected Prose, 1979—1985*. New York: Norton, 1986.
- . “Cartographies of Silence.” *Dream* 16—20.
- . “Disloyal to Civilization: Feminism, Racism, Gynophobia.” 1978. *On Lies* 275—310.

- . *The Dream of a Common Language, Poems, 1974—1977*. New York: Norton, 1978.
- . “Notes toward a Politics of Location.” 1984. *Blood* 210—232.
- . *Of Woman Bom: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 .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1978*. New York: Norton, 1979.
- . *Sources*. 1982. *Your Native Land, Your life*. New York: Norton, 1986. 3—17.
- . *Twenty-One Love Poems*. 1976. *Dream* 25—38.
- . “When We Dead Awaken: Writing as Re-Vision.” 1971. *On Lies* 35—50.
- Ricoeur, Paul. “Narrative Time.” *On Narrative*. ed. W. J. T. Mitchell.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1. 165—186.
- . *Time and Narrative*. 2 vols. Chicago: U of Chicago Press, 1983—1985.
- Riddel, Joseph N., ed. Special Issue on the Long Poe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Genre* 11 (Winter 1978).
- Robb, Peter, ed. *The Concept of Race in South Asia*. Delhi: Oxford UP, 1995.
- Robertson, George, Melinda Mas, Lisa Tickner, Joo Bird, Barry Curds and Tom Putnam, eds. *Travellers' Tales: Narratives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4.
- Robertson, Roland.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Featherstone, Lash, and Robertson 25—44.
- . “Social Theory, Cultural Relativity and the Problem of Globality.” Anthony King 69—90.
- Rodriguez, Richard. “Changing Faces.” Transcript of MacNeil/Lehrer Newshour. Show no. 4756, 13—14.16 September 1993.
- Romero, Gloria J. “‘Nose raje, chicanita’: Some Thoughts on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the Classroom.” *Aztlán* 20 (Spring/Fall 1991): 203—218.
- Romero, Gloria J., and Lourdes Arguelles, eds. Special Issue on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Academy: Testimonies from a War Zone. *California Sociologist* (Winter/Summer 1991).
- Ronen, Ruth. “Description, Narrative and Representation.” *Narrative* 5.3 (October 1997): 274—286.



- Rosaldo, Renato. *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3.
- . Foreword. *Hybrid Cultures*. Canclini xi—xvii.
- Rose, Gillian. *Feminism and Geography: The Limit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 Rosenthal M. L., and Sally M. Gall. *The Modern Poetic Sequence: The Genius of Modern Poetry*. New York: Oxford UP, 1983.
- Rowbotham, Sheila. *Wome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Baltimore: Penguin, 1973.
- Rubin, Gayle.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157—210.
- Ruby, Jennie, and Carol Anne Douglas. "NWSA: Troubles Surface at Conference." *off our backs* 20 (August/September 1990): 1. 10—16.
- Rushdie, Salman. "In Good Faith." *Imaginary Homelands: Essays and Criticism, 1981—1991*. London: Granta, 1991. 393—414.
- . *Midnight's Children: A Novel*. New York: Knopf, 1981.
- . *The Satanic Verses*. London: Viking, 1988.
- Russo, Ann. "'We Cannot Live without Our Lives': White Women, Antiracism, and Feminism." Mohanty, Russo, and Torres, *Third World Women* 288—296.
- Sahni, Chaman L. *Forster's "A Passage to India": The Religious Dimension*. New Delhi: Arnold-Heinemann, 1981.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king, 1993.
- .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 .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Raritan* 11.1 (Summer 1991): 17—31.
- . "Representing the Colonized: Anthropology's Interlocutors." *Critical Inquiry* 15.2 (1989): 205—225.
- . "Traveling Theor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3. 226—248.
- Saldívar, José David. *The Dialectics of Our America: Genealogy, Cultural Critique, and Writing History*. Durham, NC: Duke UP, 1991.
- Saldívar-Hull, Sonia. "Feminism in the Border: From Gender Politics to

- Geopolitics." *Criticism in the Borderlands: Studies in Chicano Literature, Culture, and Ideology*. ed. Hector Calderón and José David Saldívar. Durham, NC: Duke UP, 1991. 203—220.
- Sales, Ruby. "Letter from Ruby Sales." *off our backs* 20 (August/September 1990): 25.
- Sanchez, Marta Ester. *Contemporary Chicana Poetry: A Critical Approach to an Emerging Literature*.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85.
- Sandoval, Chela. "Feminism and Racism: A Report on the 1981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Anzaldúa, *Making Face* 55—74.
- . "U. S. Third World Feminism: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Genders* no. 10 (Spring 1991): 1—24.
- Sarup, Madan. "Home and Identity." George Robertson et al. 93—105. (Schechner, Richard). *Performance Theory*. Rev.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 Scholes, Robert. *Fabulation and Metafiction*.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79.
- Schumacher, Michael. "A Marriage of Minds: Louise Erdrich and Michael Dorris." *Writer's Digest* (June 1991): 28—59.
- Schweikart, Patsy. "Reflections on NWSA 1990." *NWSAction* 3 (Fall 1990): 3—4, 9—10.
- Scott, 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P, 1990.
- . "History According to Winners and Losers." *History and Peasant Consciousness in Southeast Asia*. ed. Andrew Torton and Shigenharu Tanabe.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1984. 161—210.
- Scott, Joan Wallach.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 . "Response to Gordon." *Signs* 15 (Summer 1990): 859—860.
- . Review of *Heroes of Their Own Lives*, by Linda Gordon. *Signs* 15 (Summer 1990): 848—851.
- Sedgwick, Eve Kosofsky.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5.
- .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90.

- . “Queer Performativity: Henry James’s *The Art of the Novel*.” *GLQ* 1 (1993): 1—16.
- Sennett, Richard. “The Rhetoric of Ethnic Identity.” *The Ends of Rhetoric: History, Theory, Practice*. ed. John Bender and David E. Wellberg.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1990. 191—231.
- Sharpe, Jenny. *Allegories of Empire: The Figure of Woman in the Colonial Tex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 Shohat, Ella. “Notes on the ‘Post-Colonial’” *Social Text* 31/32 (1992): 99—113.
- Shostak, Marjorie.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1981. New York: Vintage, 1983.
- . “‘What the Wind Won’t Take Away’: The Genesis of *Nisa: The Life and Words of a Kung Woman*.”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228—240.
- Showalter, Elaine.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7.
- .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1981. Showalter, *New Feminist Criticism* 243—270.
- . “Toward a Feminist Poetics.” 1979. *New Feminist Criticism* 25—43.
- . “Women’s Time, Women’s Space: Writ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t Criticism.” 1984. *Benstock* 30—44.
- , ed. *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 Essays on Women, Literature, and Theory*. New York: Pantheon, 1985.
- Siegel, Deborah L. “The Legacy of the Personal: Generating Theory in Feminism’s Third Wave.” *Hypatia* 12.3 (Summer 1997): 46—75.
- Silko, Leslie Marmon. *Ceremony*. New York: Viking, 1977.
- . “A Conversation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 *Sun Tracks: An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Magazine* 3 (1976): 26—32.
- . *Storyteller*.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81.
- Smiley, Marion.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Women and Politics* 13.2 (1993): 91—122.
- Smith, Anna Deavere. *Fires in the Mirror: Crown Heights, Brooklyn and Other Identit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94.
- . *Twilight: Los Angeles, 1992*. New York: Doubleday, 1994.

- Smith, Barbara. "Toward 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1977. Showalter, *New Feminist Criticism* 168—185.
- Smith, Neil, and Cindi Katz. "Grounding Metaphor: Towards a Spatialized Politics." Keith and Pile 67—83.
- Smith, Paul. *Discerning the Subject*.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8.
- . "H.D.'s Flaws." *Iowa Review* 16 (Fall 1986): 77—86.
- . "H.D.'s Identity." *Women's Studies* 10 (1984): 321—338.
- . *Pound Revised*. London: Croom Helm, 1983.
- Smith, Valerie. "Black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Wall 38—57.
- Soja, Edward. "History: geography: modernity."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 Simon D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3. 135—150.
- .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1989.
- Sollors, Werner. *Beyond Ethnicity: 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P, 1986.
- , ed. *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 Oxford: Oxford UP, 1989.
- Sommers, Christina Hoff. "Sister Soldiers." *New Republic* (5 October 1992): 29—33.
- . *Who Stole Feminism? How Women Have Betrayed Wo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 Spillers, Hortense. "Notes on an Alternative Model—Neither/Nor." *The Difference Within: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ed. Elizabeth Meese and Alice Parker.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89. 165—187.
- . "'The Permanent Obliquity of an In(ph)allibly Straight': In the Time of the Daughters and the Fathers." Wall 127—149.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Nelson and Grossberg 271—313.
- . "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 *In Other Worlds* 134—153.
- .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Methuen, 1987.
- . "A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Subaltern: A Woman's Text from the Third World." *In Other Worlds* 241—268.

- .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Routledge, 1993.
- .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 ed. Sarah Harasy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 “Scattered Specula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Culture Studies.” Spivak, *Outside* 255—284.
- .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Warhol and Herndl 798—814.
- Sprengher, Madelon. *The Spectral Mother: Freud,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Ithaca: Cornell UP, 1990.
- Springfield, Consuelo Lopez. *Daughters of Caliban: Caribbean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7.
- Spurr, David.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Durham, NC: Duke UP, 1993.
- Stacey, Judith. “Can There Be a Feminist Ethnography?” Gluck and Patai 111—120.
- Steel, Melissa. “New Colors: Mixed Race Families Still Find a Mixed Reception.” *Tolerance* 4 (Spring 1995): 44—49.
- Stein, Gertrude. “Lifting Belly.” *Yale Gertrude Stein* 4—54.
- . *Patriarchal Poetry*. *Yale Gertrude Stein* 106—146.
- . *Stanzas in Meditation*. *Yale Gertrude Stein* 316—464.
- . *Tender Buttons*.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Gertrude Stein*. ed. Carl Van Vechten. New York: Vintage, 1962. 459—510.
- . *The Yale Gertrude Stein*. ed. Richard Kostelanetz. New Haven, CT: Yale UP, 1980.
- Stepan, Nancy. *The Idea of Race in Science: Great Britain, 1800—1960*. New York: Archon Books, 1982.
- Stocking, George W, Jr. “On the Limits of ‘Presentism’ and ‘Historicism’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Race, Culture, and Evolution: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1968. Rev. ed.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2. 1—12.
- Strathern, Marilyn. “An Awkward Relationship: The Case of Feminism and Anthropology.” *Signs* 12 (1987): 276—292.
- . “Cutting the Network.”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3

- (1996): 517—535.
- Suleri, Sara. "Woman Skin Deep: Femin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 *Critical Inquiry* 18 (Summer 1992): 756—769.
- . *The Rhetoric of English India*.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2.
- Swindells, Julia. "Liberating the Subject? Autobiography and 'Women's History': A Reading of *The Diaries of Hannah Cullwick*." *Personnel Narratives Group* 228—240.
- Sykes, Charles J. *The Hollow Men: Politics and Corrup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0.
- 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 New York: Ivy Books, 1989.
- Taussig, Michael.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 Tennyson, Alfred Lord.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1854. *Selected Poems*. ed. Aidan Day. London: Penguin, 1991. 289—290.
- Thompson, Becky, and Estelle Disch. "Feminist, Anti-Racist, Anti-Oppression Teaching: Two White Women's Experience." *Radical Teacher* no. 41 (Spring 1992): 4—10.
- Thompson, Richard H. *Theories of Ethnicity: A Critical Appraisal*.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9.
-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Honolulu: U of Hawaii P, 1994.
- Todorov, Tzvetan. *The Poetics of Prose*. Trans. Richard Howard. Ithaca: Cornell UP, 1977.
- Torgovnik, Marianna.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uals, Modern Lives*. Chicago: U of Chicago-P, 1990.
- Torres, Lourdes.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in U.S. Latina Autobiographies." Mohanty, Russo, and Torres 271—287.
- Tratner, Michael. *Modernism and Mass Politics: Joyce, Woolf, Eliot, Yeats*. Stanford, CA: Stanford UP, 1995.
- Trevor-Roper, Hugh.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3. 15—42.
- Trinh, Minh-ha T. "Other than myself/my other self." George Robertson et al.

- 9—28.
- . *Woman-Native-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9.
- Trouillot, Michel-Rolph. “Anthropology and the Savage Slot: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Otherness.” *Fox* 17—44.
- Tucker, Herbert F. *Tennyson and the Doom of Romanticis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8.
- Twain, Mark.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New York: Signet, 1983.
- Uttal, Lynet. 1990. “Nods That Silence.” Anzaldúa. *Making Face* 317—320.
- van der Veer, Peter. “‘The Enigma of Arrival’: Hybridity and Authenticity in the Global Space.” *Werbner and Modood* 90—105.
- Visweswaran, Kamala. *Fictions of Feminist Ethnograph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1994.
- Wagstyl, Stefan, “Inter-religious Forgiveness Is Just Not Cricket.” *Financial Times of London* (22 February 1993).
- Wald, Alan. “Theorizing Cultural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Ethnicity School.” *Melus* 14 (Summer 1987): 21—33.
- Walker, Alice. “Everyday Use.” 1973. “*Everyday Use*.” ed. Barbara T. Christia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94. 23—38.
- .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1974. *In Search* 231—243.
- . *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 Womanist Pros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 . “One Child of One’s Own.” 1979. *In Search* 361—383.
- Walker, Cheryl.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Author.” *Critical Inquiry* 16 (Spring 1990): 551—571.
- Walker, Rebecca, ed. *To Be Real: Telling the Truth and Changing the Face of Feminis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5.
- Wall, Cheryl A., ed. *Changing Our Own Words: Essays on Criticism, Theory, 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89.
- Warhol, Robyn, and Diane Price Herndl, eds.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P, 1991.
- Weed, Elizabeth, ed. *Coming to Terms: Feminism, Theory, Politics*. New York:

- Routledge, 1989.
- Weedon, Chris.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Werbner, Pnina, "Introduction: The Dialectics of Cultural Hybridity." Werbner and Modood 1—28.
- Werbner, Pnina, and Tariq Modood, eds. *Debating Cultural Hybridity: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Racism*. London: ZED Books, 1997.
- West, Cornel. "A Genealogy of Modern Racism." *Prophesy Deliverance! An Afro-American Revolutionary Christianit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2. 47—68.
- . "Marxist Theory and the Specificity of Afro-American Oppression." Nelson and Grossberg 17—34.
- White, Hayde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0.
- .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74.
- . "The Question of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y and Theory* 23 (1984): 1—33.
- White, Richard.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1.
- Whitehead, Neil L. "Monstrosity and Marvel: Symbolic Convergences and Mimetic Elaboration in Trans-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 Anthropological Reading of Raleigh's Discoveries." *Studies in Travel Writing* 1 (Spring 1997): 72—95.
- Williams, Lisa. "Playing in the Dark and *The Voyage Out*: Reading Woolf with Morrison's Criticism." Paper delivered at the Sixth Annual Virginia Woolf Conference. Clemson, SC, June 1996.
- Williams, Patricia J. "The Obliging Shell." *The Alchemy of Race and Rights: Diary of a Law Professor*.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9. 98—132.
- Wilson, John, ed. Special Issue on *Who Stole Feminism? Democratic Culture* 3.2 (Fall 1994).
- Winnett, Susan. "Coming Unstrung: Women, Men, Narrative, and Principles of



- Pleasure." *PMLA* 105 (1990): 505—518.
- Wolfe, Susan J., and Julia Penelope, eds. *Sexual Practice/Textual Theory: Lesbian Cultural Critic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3.
- Women's Studies*. Special Issue on Androgyny. 2.2 (Fall 1974).
- Woolf, Virginia. *Between the A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1.
- . *The Common Reader*. 192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3.
- . *Flush*. 1933.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 1961.
- . *Freshwater: A Comedy*. ed. Lucio P. Ruotol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 . "Modern Fiction." 1919. *The Common Reader* 150—158.
- .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1924. *The Captain's Death Bed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0. 94—119.
- . "The Narrow Bridge of Art." *Granite and Rainbow: Essay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8. 11—23.
- . *A Room of One's Own*. 1929.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7.
- . "A Sketch of the Past." *Moments of Being*. ed. Jeanne Schulkind. 2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5. 61—160.
- . *To the Lighthouse*. 1927.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1.
- . *Three Guineas*. 1938.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3.
- . *The Voyage Out*. 191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8.
- Wright, Lawrence. "One Drop of Blood." *New Yorker* (25 July 1994): 46—55.
- Wyatt, Jean. "Hazards of Idealization in Cross-Cultural Feminist Dialogues: Abel, Cisneros, Gallop, McDowell, and Moraga." *Journal for the Psychoanalysis of Culture and Society* 1.2 (Fall 1996): 95—111.
- Yaeger, Patricia. *Honey-Mad Women: Emancipatory Strategies in Women's Writing*.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8.
- , ed. *The Geography of Identity*.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6.
- Young, Robert J. C.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London: Routledge, 1995.
- Zimmerman, Bonnie. *The Safe Sea of Women: Lesbian Fiction, 1969—1989*. Boston: Beacon Press, 1990.
- . "What Has Never Been: An Overview of Lesbian Feminist Criticism."

图绘:女性主义与文化交往地理学

Showalter, *New Feminist Criticism* 200—224.

Zinn, Maxine Baca, and Bonnie Thornton Dill. "Theorizing Difference from Multiracial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22.2 (Summer 1996): 321—331.

# 索引

(条目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

- Abel, Elizabeth 阿贝尔,伊丽莎白 250n.14, 279n.8
- Abu-Lughod, Lila 阿布—鲁戈,利拉 142, 143, 268n.8
- academic feminism 学院派女性主义 12—13, 71—72, 102, 107—108, 114—115; academy and 高校和学院派女性主义 3—4, 7—8, 17—18, 50—51, 69, 198, 199—217; attack on 对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批评 17, 204—206, 211, 215, 276n.9, 276n.10;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学院派女性主义的体制化 181—182, 184—186, 204—206, 213, 272—273n.3; interdisciplinarity of 学院派女性主义的跨学科 12, 50—51, 205, 213—214; intergenerational issues and 代际问题和学院派女性主义 17, 184—185, 215, 254n.3, 277n.28. *See also* academy; feminism; feminist criticism; women's studies 还见高校;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女性研究
- academy, the 高校 7—8, 40, 69—70, 80, 102, 107—108, 115, 188, 200, 227, 236, 255n.6; Culture Wars and 文化战争与高校 xi, 7, 102, 204—206, 274n.10;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高校的体制化历史 7, 11—12, 205, 213, 243n.5;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跨学科和高校 4, 12, 18—19, 34, 148—150, 270n.27; politics and 政治与高校 7, 20, 65, 181—185, 190—198, 213, 214—215. *See also* academic feminism; African Americans; anthropology; Chicano/as; cultural studies; gay

- and lesbian studies ; geography ; history ; hybridity ; literary studies ; multiculturalism ; postcolonialism ; queer theory ; women's studies 还见学院派女性主义;美国黑人;人类学;奇卡诺/娜;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地理;历史;杂合;文学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女性研究
- African Americans 美国黑人 45, 50, 53, 89, 135—156, 167—171, 173—175, 204, 233, 257n.26 ;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和美国黑人 38—39, 42, 48—50, 128—129, 207—208, 225—256 ; as a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2, 31, 183 ; racism and 种族主义和美国黑人 34, 36—37, 45, 46, 110, 169—170, 175, 225—226 ; slavery and 奴隶制和美国黑人 46, 54, 139, 153, 157—166, 176 ; texts by and about 关于或由其写作的文本 20—22, 23—24, 67—68, 73, 78—82, 90—91, 103—104, 128—130, 142, 152, 157—166, 167, 177—178, 183—183, 185, 192, 193, 194, 216, 217, 218, 221, 225—256, 228, 230, 234, 235, 246nn.10 and 11, 251n.16, 254n.43, 256n.13, 257nn.18, 19, 20, and 21, 266nn.44 and 45, 269n.17, 271nn.5, 274n.12. See also Africans ; agency ; diaspora ; ethnicity ; identity politics ; multiculturalism ; race ; racism ; women of color 另见非洲人;能动性;离散;族群;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人种;种族主义;有色人种女性
- Africans 非洲人 45, 49, 52, 53, 54, 55—59, 87, 117, 128, 128—130, 132—133, 135—136, 138, 140, 142, 148—149, 153, 157—166, 167, 183, 208, 250n.11, 253n.38, 254n.3, 257n.22, 261n.7, 261—262n.9, 263n.18, 266n.46, 266—267n.2, 267n.3, 269n.17, 270n.23, 272n.16. *See also* African Americans ; colonialism ; diaspora ; feminism ; race ; racism ; Third World ; West ; women of color 另见美国黑人;殖民主义;离散;女性主义;人种;种族主义;第三世界;西方;有色人种女性
- agency 能动性 6, 64, 85—86, 90—91, 92, 112, 142—143, 155, 181, 212, 230, 275n.14 ; definitions of 能动性的定义 90, 186, 218—219, 220 ;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能动性 5—6, 181, 186—187, 189—191, 193—198,

- 209—210, 217, 218—221, 226—227, 233—234, 235, 242, 247n.22, 271n.3, 273—274n.8; negotiation as 作为能动性的协商 4, 8—9, 11, 34, 55, 14—98, 226—227, 271n.2, 274n.13; the other and 他者与能动性 6—7, 46, 119, 120—121, 132—133, 154—156, 261—262n.9, 264n.29, 266—267n.2.
- Alarcón, Daniel Cooper 阿拉尔孔, 丹尼尔·库珀 88, 99, 259—260n.42
- Alarcón, Norma 阿拉尔孔, 诺玛 9, 247n.17, 259—260n.42
- Albrecht, Lisa 阿尔伯莱希, 丽莎 249n.6
- Alcoff, Linda 阿尔考夫, 琳达 246n.11, 275n.7
- Alexander, Meena 亚历山大, 米娜 50, 87, 262n.10
- Allan, Tuzyline Juta 阿兰, 图兹琳·吉达 266n.43
- Allen, Paula Gunn 艾伦, 宝拉·戈娜 47, 255n.10
- alterity 他异性 *See difference* 见差异
- Althusser, Louis 阿尔都塞, 路易 208—209, 247n.22, 255n.7
- American Indians 美国印第安人 39—40, 42, 47—48, 53, 67—68, 89, 90, 96—101, 104, 117, 125, 159, 164—165, 167—168, 183, 215—216, 229, 233, 242, 259nn.40 and 41, 259—260n.42, 260n.45, 271n.8, 280n.15. *See also* race; racism 还见人种; 种族主义
- Amin Idi 阿明, 艾迪 57, 59
- Amirthanayagam, Indran 阿米萨纳雅甘, 印迪安 54
- Anderson, Benedict 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 77, 153
- androgyny 雌雄同体 70, 77—78, 99—101, 148, 253—254n.42, 255n.8, 258n.32, 271—272n.12. *See also* hybridity 还见杂合
- anthropology 人类学 6—7, 56, 82—83, 261—262n.9, 269n.17; discipline of 人类学学科 11, 12, 68, 83, 129, 132—150, 162—163, 208, 262n.11, 263n.18, 266n.1, 266—267n.2, 267n.6, 268n.8, 269nn.16 and 18, 270n.27; ethnographic theory of 人类学的人种学理论 9—10, 74—75, 91, 112—114, 118—120, 121, 125, 127, 141—144, 152, 155, 162, 244n.9, 247n.17, 256n.15, 266n.1, 267—268n.7, 268n.8;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人类学 114, 148—159, 262n.11, 266n.1, 267n.6
-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22—23, 29—31, 53, 135, 169, 175, 190, 206, 250n.12. *See also* Jews; race;

- racism; religion 还见犹太人;人种;种族主义;宗教
- Anzaldúa, Gloria 安莎杜娃,葛洛莉亚 24, 43—44, 45, 92, 93—94, 103—104, 177, 201—208, 251n.22; *Borderlands* 《边境》3, 10, 13, 24, 39—40, 45, 46—47, 67—68, 73, 93—101, 251n.22, 259nn.37, 38, 39, 40, and 41, 259—260n.42, 260nn.43, 44, and 45, 261n.5, 262n.10, 263.15
- Appadurai, Arjun 阿帕杜埃,阿君 50, 88, 113, 119—120, 120, 141—142, 143, 247n.17, 253.39, 258n.27, 258n.31
- Appiah, Anthony 阿皮亚,安东尼 65, 249n.4, 252n.33
- Asian Americans 亚裔美国人 45, 110, 129—130, 135, 165, 183, 207—228; as model minority 作为模范少数族裔 36, 167, 176; texts by and about 关于或由其写作的文本 24—25, 55—59, 87, 152, 166—178, 271n.11, 271—272n.12, 272nn.13, 15, and 16. *See also* Asians; diaspora 还见亚洲人;离散
- Asians 亚洲人 6, 53—54, 75, 87, 117, 122, 167—168, 169—170, 172, 206, 243n.6, 257n.26, 261—262n.9, 270n.23, 272n.14; Chinese 中国人 24—25, 54, 119, 166—176, 225, 243n.6, 250n.11, 252n.31, 254n.3, 261n.7, 272n.16, 272n.17, 280n.15; South Asians 南亚人 45, 53—59, 87, 110, 113—114, 125, 127, 144—149, 250n.11, 252nn.32 and 33, 253n.35, 253nn.36 and 39, 261n.7, 270n.22; Southeast Asians 东南亚人 53—54, 154—157. *See also* caste; diaspora; feminism; race; racism; Third World 还见种姓;离散;女性主义;人种;种族主义;第三世界
- Austen, Jane 奥斯丁,简 110
- Bâ, Manama 巴,马利亚玛 270n.23
- Bahti, Timothy 巴蒂,提摩西 275n.1, 275nn.3 and 5, 278n.34
- Baker, Houston 贝克,休斯顿 249n.4, 251n.16
- Bakhtin, M. M. 巴赫金 85—86, 92, 95, 137, 138, 183, 258n.28, 279n.6
- Bambara, Toni Cade 邦芭拉,托妮·凯德 157, 158
- Barrett, Michèle 巴勒特,米凯莱 212—213
- Barthes, Roland 巴特,罗兰 70, 134, 182, 187—188, 189, 194, 196, 208—209, 210, 228—230, 231, 232—233, 255n.7, 267n.4, 269n.13, 279n.5

- Baumann, Gerd 鲍曼, 格德 268n.8
- Bazin, Nancy Topping 贝辛, 南茜·托宾 255n.8
- Beal, Frances 比尔, 弗朗西丝 246n.10
- Beck, Evelyn 贝克, 伊芙琳 207—208
- Bedient, Calvin 白丁特, 卡尔文 232, 279n.7
- Behar, Ruth 贝哈, 鲁斯 22—23, 50, 254, 262n.11, 267n.5, 268n.8, 270n.26
- Beja, Morris 贝佳, 莫里斯 253n.40
- Bell, Quentin 贝尔, 昆丁 263n.19
- Belsey, Catherine 贝尔西, 凯瑟琳 182, 193
- Bem, Sandra 贝姆, 桑德拉 70, 258n.32
- Benhabib, Seyla 本哈比, 塞拉 258n.33
- Benjamin, Jessica 本杰明, 杰西卡 271n.3
- Benjamin, Walter 本杰明, 瓦尔特 276n.18
- Bernal, Martin 伯纳尔, 马丁 263n.17
- Bernstein, Michael 伯恩斯坦, 迈克尔 235
- Bernstein, Susan 伯恩斯坦, 苏珊 250n.12
- Bersani, Leo 伯萨尼, 里奥 217, 233, 276n.20, 279n.8
- Bhabha, Homi 巴巴, 霍米 8, 9, 10, 33, 47, 77—78, 79, 86, 90, 91, 92, 103, 143—144, 163, 164, 247n.19, 258nn.27, 33, 34, and 35, 262n.12, 271n.2
- Bible《圣经》63, 159, 160, 239
- binarism 二元对立 4, 6, 36—66, 70, 77—78, 89, 95—99, 131, 133, 185—186, 190—192, 194—198, 213, 221, 230—234, 235—236, 237, 241, 261—262n.9; colonialism and 殖民主义与二元对立 6, 111—113, 119, 142—143, 148—149, 266n.1, 269n.18;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二元对立 8, 68, 71—74, 102—104, 211, 222—227; gender and 性别与二元对立 17—35, 31—32, 245n.1, 255n.7, 256n.15; race and 人种与二元对立 36—66, 71—74, 167, 169, 176, 243n.4, 248—249n.1, 253n.35, 257n.26, 261nn.5 and 7. *See also* difference 还见差异
- Birdcage, The*《鸟笼》136, 253n.36
- Bloch, Ruth 布洛奇, 鲁斯 251n.21
- Bloom, Harold 布鲁姆, 哈罗德 192
- Boelhower, William 波豪尔, 威廉 50, 249n.4
- borders 边界 3—13, 45, 67—104, 128, 132—150, 186, 257n.19; Chincanos and 奇卡诺与边界 93—101, 259n.36, 261n.5; contact zone and 接触地带与边界 3, 9—10, 24—25, 63, 66, 78—82, 90—91, 92, 102—104, 112—114, 132—133,

- 139, 141—150, 154—157, 177, 246n.7, 254n.1, 257n.25, 266—267n.2, 267—268n.7; definitions of 边界的定义 3, 93, 135;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边界 19, 77—78, 135—136, 151—178;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跨学科与边界 4, 115. *See also* difference; hybridity; space 还见差异; 杂合; 空间
- Borland, Katherine 博兰, 凯瑟琳 208
- Bourne, Jenny 波恩, 詹妮 50
- Bowles, Gloria 鲍尔斯, 葛洛丽娅 275n.6
- Bradbury, Malcolm 布莱伯里, 马尔科姆 116—117, 119, 263n.22
- Braidotti, Rosi 布雷多迪, 罗丝 258n.31, 262n.10
- Brecht, Bertolt 布莱希特, 贝尔托 257n.20
- Brewer, Rose M. 布鲁尔, 罗斯 66, 249n.6
- Brontë, Charlotte 勃朗特, 夏洛蒂 *Jane Eyre* 《简·爱》28, 108, 278n.39
- Brooks, Gwendolyn 布鲁克斯, 葛温德琳 230, 279n.4
- Brooks, Peter 布鲁克斯, 彼得 155, 217, 228—229; *Reading for the Plot* 《阅读情节》137, 217, 218, 269n.15, 277n.20
- Butler, Judith 巴特勒, 朱迪思 209, 256nn.14 and 16, 276nn.13 and 14; *Gender Trouble* 《性别麻烦》77, 209, 245n.5, 277n.26; *Bodies That Matter* 《重要的身体》34, 247n.22, 256n.16, 260n.2
- Campbell, Richard 坎贝尔, 理查德 51
- Cameron, Julia Margaret Pattle 卡梅隆, 朱莉娅·玛格丽特·帕特尔 265n.38
- Canclini, Néstor García 坎西利尼, 内斯托尔·加西亚 3, 258nn.27 and 31
- Capel, Sharon 坎贝尔, 莎朗 254n.43
- Carby, Hazel 加比, 黑泽 194, 274n.12
- Carlston, Erin G. 卡尔斯顿, 艾琳 246n.11
- Caserio, Robert 卡斯瑞欧, 罗伯特 228, 277n.21
- caste 种姓 45—46, 54—55, 89, 155, 252n.32. *See also* Asians; race 还见亚洲人; 人种
- Caughie, Pamela 考菲, 帕米拉 248n.29
- Cha, Theresa Hak Kyung 查, 特丽莎·阿永 259n.39, 280n.17
- Chai, Alice 柴, 艾丽斯 207—208
- Chambers, Ian 钱伯斯, 伊安 88, 258nn.30 and 31, 262n.10
- Cheng, Vincent 郑, 永兴 248n.26, 253n.38, 264n.28
- Chernin, Kim 切宁, 吉姆 216, 278n.1, 280n.18
- Chicano/as 奇卡诺/娜 25, 41, 42,



- 75, 88;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学科领域 87, 183; texts by and about 有关或由其写作的文本 36—37, 39—40, 68—69, 93—101, 103—104, 259nn.36, 38, 40, and 41, 259—260n.42, 260nn.43 and 44, 260n.45; theory and 理论与奇卡诺/娜 43—44, 207—208, 259n.36. *See also* feminism; Latino/as; race; racism; women of color 还见女性主义; 拉丁美洲人; 人种; 种族主义; 有色人种女性
- Christian, Barbara 克里斯蒂安, 芭芭拉 181—182, 182—184, 185, 192, 193, 203, 221, 249n.5
- Cixous, Hélène 西苏, 伊莲娜 70, 192, 193, 194, 208—209, 210, 224, 228—229, 232—233, 255nn.6, 7, and 9, 273n.7
- class 阶级 28—29, 34, 36, 48—50, 59, 70—71, 78—82, 89, 92, 94, 115, 120—121, 122, 126—127, 128—129, 135—136, 138, 152, 170—171, 207, 211, 212, 226, 250n.11, 264nn.27 and 28, 278n.40;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阶级 10, 20—25, 41, 45—46, 73, 75, 96, 102, 109, 115, 135—136, 142, 145, 152, 155, 168, 177, 178, 185, 196, 214, 256nn.13 and 14, 276n.13
- Clayton, Jay 克莱顿, 杰伊 216—217, 218, 229, 276n.20, 279n.8
- Clifford, James 克利福特, 詹姆斯 9, 11, 113—114, 133, 155, 244n.9, 258n.27, 262n.11, 267n.6, 268nn.8 and 12, 270n.1; “Traveling Cultures” 《旅行的文化》87, 94, 112—113, 119—120, 121, 125, 127, 141, 143, 145, 151, 152, 155, 162, 177
- Clifton, Lucille 克里夫顿, 露西尔 V
- Cohen, Ralph 科恩, 拉尔夫 272n.1
- Cole, Johnnetta 科尔, 约翰内塔 207—208, 251n.20, 256n.13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47, 48, 54, 57, 86, 87—88, 91, 102, 112—113, 152—153, 163—164, 173, 174—175, 188, 226, 261n.7, 262n.12; British Empire and 英帝国与殖民主义 27—31, 34, 45—46, 58, 59—63, 111, 112, 119, 121—122, 125, 126—127, 138, 144—149, 154—157, 252n.32, 261n.7, 263n.25, 265nn.36 and 38, 265—266n.45; West and 西方与殖民主义 6, 108, 117, 119—120, 121—122, 142—143, 144, 155—156, 171, 225, 250n.11, 254n.1, 254—255n.5, 255n.10, 257n.26, 261n.7, 269n.18, 270n.23. *See also* binarism; nation;

- postcolonialism ; racism ; West  
还见二元对立;民族;后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西方
-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康比河集体  
246n.10
- comparativism 比较主义 108, 127—  
131, 177—178, 257n.25,  
266n.43, 267n.6 ; conjuncturalism  
and 结合主义与比较主义  
9—10, 119—120, 129, 178,  
244n.9 ; methodologies of 比较  
主义方法论 6—7, 9—10, 112,  
114, 119—120, 127, 130—131,  
133—134, 261—262n.9, 262n.12.  
*See also* transnationalism 还见跨  
国主义
- Conrad, Joseph 康拉德, 约瑟夫  
263n.19, 264n.30
- contact zone 接触地带 *See* borders 见  
边界
- Copernicus 哥白尼 205
- Cosby Show, The* 《考斯比一家》52, 57
- Crane, Hart 克莱恩, 哈特 234
- Crosby, Christina 克罗斯比, 克里斯蒂  
娜 71, 256n.12
- Cruikshank, Margaret 克鲁克尚克, 玛  
格丽特 207—208
- Cuddy-Kean, Melba 卡迪一基, 美尔巴  
119
- Cullwick, Hannah 卡尔威克, 汉纳  
276n.14
-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3—4,  
7, 11, 18, 33, 51—52, 56,  
68, 71, 83, 84, 92, 102,  
152—153, 181—182, 248n.27,  
260—261n.2, 270n.27. *See also*  
academy ; African Americans ;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  
postcolonialism ; queer theory ;  
women's studies 还见高校;美国  
黑人;同性恋研究;后殖民主义;  
酷儿理论;女性研究
- culture 文化 4, 41, 37—38, 45, 51—  
52, 54—55, 56, 212, 226, 232,  
82—93, 113, 115 ; definitions  
of 文化的定义 134—135,  
268n.8 ; difference and 差异与文  
化 126, 128—130, 132—150 ;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文化 48,  
78—82, 151—58, 271n.8. *See  
also* hybridity ; multiculturalism ;  
narrative 还见杂合;多元文化主  
义;叙事
- Cummings, June 卡明斯, 琼 263n.25,  
264nn.26 and 27
- Daly, Mary 达利, 玛丽 70, 250n.11,  
255n.8, 260n.1
- Dash, Julie 达什, 朱莉 271nn.5 and 7 ;  
*Daughters* 《大地的女儿》11, 13,  
152, 157—166, 167, 177—178
- Davies, Carole Boyce 戴维斯, 卡罗  
尔·博伊斯 50, 258n.31, 262n.10
- Davis, Madeline D. 戴维斯, 马德琳·D.

- 206—207
- de Beauvoir 德·波伏娃 196, 250n.11, 254—255n.5, 273n.7
- de Certeau, Michel 德·塞尔托, 米歇尔 132, 151, 268n.12, 269n.14
- de Courtivron, Isabelle 德·库蒂夫龙, 伊莎贝尔 4
- Dekoven, Marianne 德科文, 玛丽安娜 119, 248nn.24 and 27
- de Lauretis, Teresa 德·劳拉提斯, 特瑞莎 217, 244n.10, 247n.22, 256n.16; *Alice Doesn't* 《艾丽斯不》233, 269n.14, 276—277n.20, 279n.8; *Technologies* 《性别的技术》276n.15, 276—277n.20, 279n.8
- DeLombard, Jeannine 德隆巴德, 雅尼娜 206—207
- de Man, Paul 德·曼, 保罗 31, 209, 210—211, 277n.21
- Dembo, L. S. 邓波 235
- Derrida, Jacques 德里达, 雅克 64, 70, 76, 152, 198, 208—209, 212, 221, 236—237, 254n.44, 255n.7, 258n.34, 265n.40, 274n.9
- Descartes, René 笛卡尔, 勒奈 95
- desire 欲望 59—63, 128—129, 133, 134, 135, 137—140, 143, 144, 150, 153, 155, 170—171, 203, 239, 240—241; for agency 对能动性的欲望 199—200, 201, 212; for connection 对联结的欲望 46—47, 72—74, 82;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和欲望 199—227, 250n.14, 259n.41; otherness and 他者属性与欲望 43, 74, 134, 138, 144, 145, 148—149. *See also* narrative; psychoanalysis; utopianism 还见叙事; 精神分析; 乌托邦理想
- diaspora 离散 6—7, 19—20, 24, 246n.8; African 非洲离散 11, 23, 56—63, 87, 88, 135—136, 138, 142; American Indian 美国印第安人的离散 165; Asian 亚洲离散 24—25, 56—59, 87, 152, 167, 176; Jewish 犹太离散 22—23, 176, 237—242
- Dickie, Margaret 迪奇, 玛格丽特 234—235
- difference 差异 67—104, 110—114, 130, 212, 259nn.40 and 41; alterity/otherness and 他异性/他者属性与差异 27—31, 33—34, 37, 41, 54—55, 62—63, 74—76, 78—82, 91, 102, 104, 164—165, 183, 191, 193, 225, 230, 235, 236, 246n.7, 256n.15, 263n.18, 264n.30, 269n.18, 273n.7; discourse and 话语与差异 4, 67—73, 93—94, 102—104, 107, 254n.3, 254—255n.5; feminist impasse and 女性主义僵局与差异 4, 10,

- 38—51, 55, 68, 71—74, 84, 104, 249n.6, 251n.21, 256n.12; gender/sexual 社会性别 / 自然性别差异 17—35, 69—70, 121, 208—209, 222;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差异 10, 11, 19, 74—82, 115, 144—148, 151, 155, 166—178, 169, 246n.7, 270n.1; narrative and 叙事与差异 132—150, 217; sameness and 同一性与差异 19, 46, 74—78, 79, 103, 114, 142—148, 149, 153—154, 177—178; among women 女性内部差异 20—21, 39—40, 41—44, 69—73, 117—119, 185, 207, 254n.3, 255n.5, 255—256n.11, 256nn.13 and 14, 260n.44, 276n.13. *See also* binarism; culture; desire 还见二元对立;文化;欲望
- Dikötter, Frank 迪考特, 法兰克 54, 272n.16
- Doyle, Laura 多伊尔, 劳拉 248n.24, 248n.26, 264n.28
- D'Souza, Dinesh 迪索萨, 迪奈希 204
- Du Bois, W. E. B. 杜波依斯 76
- duCille, Ann 杜西勒, 安 38, 249n.2, 250n.14
- Dumont, Louis 杜蒙, 路易 252n.32
- DuPlessis, Rachel Blau 迪普莱西, 拉谢尔·布洛 9, 60, 207—208, 246n.12, 248n.27, 279—280n.12;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终点之后的写作》193—194, 234, 277n.20, 279n.8
- Eisenstein, Hester 艾森斯坦, 海斯特 71
- Eliot, T. S. 艾略特 117, 128, 234, 263n.20
- Emecheta, Buchi 埃梅切塔, 布奇 266n.43
- Erdrich, Louise 厄德里奇, 路易丝 216, 247n.18, 252n.25, 271n.8
- ethnicity 族群 36—66, 44—45, 51, 53—55, 135—136, 141—142, 146, 152—153, 154, 155, 196, 247n.18, 253nn.36 and 3, 255—256n.10, 251n.22, 256n.16, 257nn.22 and 25, 261n.5, 271n.6; definition of 族群的定义 249n.4, 270n.1; multiculturalism and 多元主义与族群 48, 36—66, 166—178, 257n.26. *See also* identity politics 还见身份政治
- ethnocentrism 种族中心主义 5—6, 45, 54—55, 63—64, 70, 110, 111, 112, 114, 117—118, 129, 130—131, 152, 158—159, 204, 233, 250n.12, 252n.31, 261n.7. *See also* ethnicity; identity politics; racism 还见族群; 身份政治; 种族主义

- ethnography 人种学 *See also*  
anthropology 还见人类学
- European Americans 欧裔美国人 25,  
36—37, 38, 39, 167, 168, 169,  
175, 176, 252n.31. *See also* West  
还见西方
- Fanon, Frantz 法依, 弗朗兹 163
- Farewell, My Concubine* 《霸王别姬》  
55
- Fellows, Mary Louise 费罗斯, 玛丽·路  
易丝 10, 38, 50, 67, 251n.19
- Felman, Shoshana 费尔曼, 修珊娜  
203, 269n.15
- Felski, Rita 费尔斯基, 丽塔 193,  
274n.11
- feminism 女性主义: activism and  
行动主义与女性主义 8, 40,  
69, 71, 92, 107, 115, 129,  
181, 184—186, 199—200,  
201, 212—213, 220, 256n.13;  
Africa and 非洲与女性主义  
254n.3, 270n.23; “American”  
vs. “French” 美法女性主义之  
争 11—12, 108, 189—195, 200,  
211, 221—227, 255n.6 and 7,  
273n.7, 274nn.11, 12 and 13;  
definitions of 女性主义的定义  
243n.3, 274n.9; first wave 第  
一波女性主义 204, 205—206,  
254n.2, 254n.4, 272—273n.4;  
France and 法国与女性主义 11,  
187, 188—195, 200, 210—211,  
221—227, 234, 240—241, 242,  
244—245n.1, 255nn.6 and 9,  
273n.7; globalism and 全球主义  
与女性主义 4—5, 9, 105—178,  
184, 243n.4, 250n.13; human  
rights and 人权与女性主义  
5—6, 107, 254n.3; India and  
印度与女性主义 145—146,  
270n.23; internationalism of 女  
性主义的国际主义 4, 5—7,  
46, 52—55, 66, 67—68,  
72, 107—131, 225, 254n.3,  
262—263n.15, 260n.1; locational  
theory and 定位理论与女性主  
义 3—13, 17—18, 31—35,  
67—104, 118, 148—150,  
201, 211, 245n.4, 246n.11,  
246—247n.12, 247n.17, 250n.10,  
251nn.19 and 23, 256nn.14 and  
16; multiculturalism and 多  
元文化主义与女性主义 4,  
9—10, 49—50, 66, 71—72, 93,  
102—104; pluralization of 女  
性主义多元化 4—5, 25, 46,  
107—108; postfeminism 后女性  
主义 32, 102—103, 184; second  
wave 第二波女性主义 69—71,  
184—185, 204—206, 207,  
254nn.2 and 4, 255n.10; socialist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255n.10,  
273n.7; third wave 第三波女性

- 主义 69, 185, 254n.4; West and  
西方与女性主义 4, 50, 147,  
225—227. *See also* academic  
feminism; agency; androgyny;  
anthropology; binarism; desire;  
difference; feminism criticism;  
humanism; Jews; Lesbianism;  
mass media; narrative;  
poststructuralism; race; racism;  
transnationalism; utopianism;  
women of color, women's studies  
还见学院派女性主义;能动性;  
雌雄同体;人类学;二元对立;欲  
望;差异;女性主义批评;性别历  
史;人文主义;犹太人;女同性  
恋;大众媒体;叙事;后结构主  
义;人种;种族主义;跨国主义;  
乌托邦理想;有色人种女性;女  
性研究
- feminism criticism 女性主义批评 121,  
189—195, 197—198, 221—227,  
242, 274n.12; future of 女  
性主义批评的未来 15—53;  
gynesis 女性本原批评 15—35,  
223, 244—245n.1, 247n.21;  
gynocriticism 女性批评 15—35,  
109—190, 193—194, 196—197
- Ferguson, James 弗古逊,詹姆斯 141,  
143, 258n.27, 268nn.8 and 12,  
270n.26
- film 电影 *See* mass media 见大众媒体
- Fludernik, Monika 弗鲁德尼克,莫妮  
卡 269n.13
- Forster, E. M. 福斯特 137, 263n.19,  
264n.28, 270n.24; *A Passage to  
India* 《印度之行》144—149,  
269n.20
- fort/da 去/来 *See* psychoanalysis 见精神  
分析
- Foster, Gwendolyn Audrey 福斯特,葛  
温德琳·奥黛莉 253n.34, 271n.5
- Foucault, Michel 福柯,米歇尔 183,  
208—209, 210, 219—220,  
245n.5, 246n.9, 247n.22, 255n.7,  
276n.16, 277n.21, 278n.35
- Fox, Richard 福克斯,理查德 268n.8
- Frankenberg, Ruth 弗兰肯伯格,鲁斯  
9
-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西格蒙  
德 144, 155, 182, 267—278n.7,  
273—274n.8
- Fried Green Tomatoes* 《油炸绿蕃茄》  
55
- Friedan, Betty 弗里丹,贝蒂 192
- Friedman, Edward 弗里德曼,爱德华  
6, 243n.6
- Friedman, Jonathan 弗里德曼,乔纳森  
92, 258n.35
-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弗里德曼,  
苏珊·斯坦福 6, 233, 255n.8,  
268n.13
- Frye, Marilyn 弗莱,玛丽琳 249nn.2  
and 6
- Furbank, P. N. 弗班克 270n.24

Gall, Sally M. 高尔, 萨利 235

Gallop, Jane 盖洛普, 简 250n.14

Gardiner, Judith Kegan 加迪纳, 朱迪思·可甘 273n.8

Gaskell, Elizabeth 盖斯凯尔, 伊丽莎白 138

Gates, Henry Louis, Jr. 盖茨, 亨利·路易斯 65, 249n.4, 252n.33, 274n.14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同性恋研究 12, 18, 71, 103, 183, 244n.10, 256n.17, 277n.24. *See also* lesbianism; sexuality 还见女同性恋; 性征

Geertz, Clifford 格尔茨, 克利福德 41, 112, 258n.31, 266n.1, 268n.8

gender 性别 237—242, 256n.15, 278n.40;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性别 17—35, 41, 113—114, 209, 213, 258n.32, 270n.23; feminist criticism and 女性主义批评与性别 17—35, 269n.14, 272n.13;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性别 10, 33—34, 59—63, 96, 101, 109, 115, 118, 135—136, 145, 146, 152, 155, 174—175, 196, 233—234, 235, 253—254n.42; other axes of difference and 差异的其他轴线与性别 5—6, 10, 20—25, 34—35, 48—50, 59—63, 70—71, 93—94,

110, 118, 136, 139, 142, 157—166, 168, 177, 178, 185, 207—208, 214, 260—261n.2. *See also* androgyny; binarism; difference; feminism; home; long poem; nation; religion 还见雌雄同体; 二元对立; 差异; 女性主义; 家园; 长诗; 民族; 宗教

geography 地理 137—138;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2, 18, 20, 68, 246n.9; geographics 地理学 18—25; geopolitics and 地缘政治与地理 11, 94, 109—110, 115, 130—131;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地理 17—35, 40, 41, 86—87, 245n.4; locational rhetoric of 地理的定位修辞话语 19. *See also* geopolitics; space 还见地缘政治; 空间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 93—101, 107—131, 261n.3, 262n.12, 265n.36; definition of 地缘政治的定义 109—110; identity and 身份政治与地缘政治 10, 36—37, 48—50, 56—63, 96, 142, 146—148, 151—178, 261n.5; literacy and 素养与地缘政治 11, 107—131; narrative and 叙事与地缘政治 132—150, 151—178. *See also* geography; space 还见地理; 空间

Gikandi, Simon 吉甘迪, 西蒙 111,

- 253n.39, 258n.27, 261n.7, 270n.25
- Gilbert, Sandra 吉尔伯特, 桑德拉 193
- Gilroy, Paul 吉尔罗伊, 保罗 73, 87, 88, 92, 152—153, 158—159, 164, 166, 176, 258nn.27, 33, and 35, 261n.5
- Glancy, Diane 格兰茜, 戴安娜 67, 68, 104
- globalism 全球主义 5—8, 9—10, 11, 136, 141—142, 243n.4, 261nn.7 and 8, 261—262n.9; ethnoscaples and 全球族群景观与全球主义 19, 141—142, 145, 167, 247n.17;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0, 12; postmodernity and 后现代性与全球主义 19, 33, 37, 66, 167. *See also* feminism; nation; transnationalism 还见女性主义; 民族; 跨国主义
- Gluck, Sherna Berger 格拉克, 肖娜·伯格 208, 276n.17, 277n.22
- Goldberg, Theo 戈登堡, 西奥 39
- Gómez-Peña 戈麦斯—潘纽 259n.36
- Gooding-Williams, Robert 古丁—威廉姆斯, 罗伯特 248—249n.1
- Gordon, Linda 戈登, 琳达 13, 67, 68, 69, 218—221, 227, 251n.20
- Gornick, Vivian 寇尼克, 薇薇安 41, 255n.10
- Grahn, Judy 格伦, 朱迪 94, 251n.22, 260n.43
- Gramsci, Antonio 格兰西, 安东尼奥 90
- Gray, Herman 格雷, 赫尔曼 52
- Greene, Gayle 格林, 盖尔 214, 216, 277n.27
- Grewal, Inderpal 格鲁沃, 英德帕 *Home and Harem* 《家园与闺房》112, 114, 262nn.10 and 12, 269n.16; *Scattered Hegemonies* 《零散霸权》5, 111—112, 113, 114, 119—120, 121, 127, 258n.35, 259n.36
- Gubar, Susan 格巴, 苏珊 193
- Gunew, Sneja 古纽, 斯尼亚 244n.10, 261—262n.9
- Gupta, Akhil 库塔, 阿吉尔 141, 143, 258n.27, 268nn.8 and 12, 270n.26
- gynesis 女性本原批评 *See* feminist criticism; poststructuralism 见女性主义批评; 后结构主义
- gynocriticism 女性批评 *See* feminist criticism 见女性主义批评
- H. D. (Hilda Doolittle) H.D. (希尔达·杜立特尔) 34, 260n.43, 263nn.19 and 20, 273—274n.8, 278—279n.4; *Trilogy* 《三部曲》7, 230, 233, 259n.38, 260n.43
- Hale, Sondra 黑尔, 桑德拉 208
- Haley, Alex 黑利, 亚历克斯 152, 158
- Hall, Radclyffe 霍尔, 瑞克里芙



- 255n.10
- Hall, Stuart 霍尔, 斯图亚特 86, 92, 152—153, 158—159, 203, 258nn.27 and 35, 270n.1, 271n.6, 275n.1
- Hannerz, Ulf 汉内兹, 尤尔夫 88, 90, 258nn.27 and 31
- Haraway, Donna 哈拉维, 多娜 41, 245n.5, 247n.17, 250n.10, 256n.14, 275n.7
- Harding, Sarah 哈丁, 萨拉 251n.21
- Harjo, Joy 哈乔, 乔依 242
- Harlem Renaissance 哈莱姆文艺复兴 32, 128
- Hartsock, Nancy 哈特索克, 南茜 275n.7
- Hegel, Georg 黑格尔, 格奥尔格 275n.1
- Heilbrun, Carolyn 海尔布伦, 凯罗琳 70, 153
- Herodotus 希罗多德 194
- history 历史 94, 109—110, 115, 134—135, 138, 149—150, 194, 259n.41, 273—274n.8; consciousness of 历史意识 11—12, 108, 130—131, 157—166, 172—176, 181—182, 184—186, 230—231; definitions of 历史的定义 194—195, 200—201, 235—236, 280n.12; discipline of 历史学科 199—227; epistemology and 认识论与历史 200—203, 205—207, 209—210, 215—216, 275n.3; feminism and the writing of 女性主义与历史书写 199—227; as mode of thought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 11, 86—88, 95—97, 109—110; narrative and 叙事与历史 12, 194—198, 199, 200—201, 210—227, 230, 234—242, 275n.1, 276n.18; oral methods of 历史的口述方法 132—133, 200, 208, 212, 216—217, 276n.17, 277n.22; politics of 历史的政治 199—200, 206—207, 208, 211, 213—215, 218, 221, 223—227, 276n.12; the Real and 真实与历史 12, 182—183, 186—187, 201—203, 209, 210, 212—214, 216, 210, 227, 229, 237, 256n.15, 275n.3; theory and 理论与历史 12, 194—198, 199, 200—203, 206—207, 209—211, 221, 226—227, 275nn.1, 4, and 5, 276nn.17 and 18, 278nn.31 and 34; women's, the field of 女性历史学科 185, 199—200, 201, 204, 209—210, 214, 218—221, 236, 276nn.14 and 17. *See also* identity; women's studies 还见身份认同; 女性研究
- Hite, Molly 海特, 莫利 214, 277n.30
- Holocaust 反犹大屠杀 45, 94, 169,

- 175, 203, 216, 229, 237—242.  
*See also* Jews 还见犹太人
- Homans, Margaret 霍曼斯, 玛格丽特  
194, 197, 250n.14, 279n.8
- “home” “家园” 99—101, 107—131,  
150, 151, 154, 262n.10, 263n.12,  
264n.31; disciplinary 学科大本  
营 205; domesticity and 家庭生  
活与家园 113—114, 121—122,  
126—127, 265nn.36 and 38; as  
roots 作为根源的家园 151—178
-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See*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lesbianism,  
sexuality 见同性恋研究; 女同性  
恋; 性征
- hooks, bell 胡克斯, 贝尔 253n.35,  
253n.36
- Hughes, Langston 休斯, 蓝斯顿  
266n.44
- humanism 人文主义: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人文主义 118,  
190—194, 209, 211, 213, 224,  
273—274n.7, 274n.11, 274n.12,  
277n.25; poststructuralism  
and 后结构主义与人文主  
义 69—70, 77—78, 182,  
186—187, 208—209, 230—231,  
244—245n.1; West and 西方与  
人文主义 26
- Hull, Gloria T. 霍尔, 葛洛莉亚  
207—208
- Hurston, Zora Neale 赫斯顿, 佐  
拉·尼尔 128—129, 133, 143,  
269n.17; *Mules and Men* 《骡  
子与男人》142; *Tell My Horse*  
《告诉我的马》142, 269n.17;  
*Their Eyes* 《他们眼望苍天》13,  
128—129, 255n.10, 266nn.44  
and 45, 269n.17
- Hurtado, Aida 霍达多, 阿义达 50
- Hutcheon, Linda 哈钦, 琳达 199, 226
- Hutnyk, John 哈特尼克, 约翰 91—92
- hybridity 杂合 27, 45, 67—104,  
129; academy and 高校与杂合  
8, 11; culture and 文化与杂合  
4, 11, 19, 48, 66, 84, 85, 86,  
103, 112—113, 128, 134—135,  
141—142, 143, 144—149,  
152—157, 159—178, 260n.45,  
271—272n.12, 272n.15;  
difference and 差异与杂合 4,  
82—83; genre and 文类与杂合  
93, 95—96, 259nn.38, 39, and  
41, 279nn.10 and 11; history of  
杂合的历史 82, 102, 257nn.23  
and 24;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  
与杂合 19, 24—25, 47, 271n.8;  
mestizaje as 作为杂合的混杂  
文化 93—101, 177, 251n.22,  
257nn.22, 23, and 26, 258n.35;  
politics of 杂合的政治 88—93,  
97, 103—104, 257n.26, 258n.35;  
postmodernity and 后现代性与  
杂合 19, 33, 37; terminology of

杂合的术语 257n.22 and 23, 258n.24 and 27; theories of 杂合的理论 5, 10, 11, 82—93, 100—101, 247n.18, 257n.22 and 30. *See also* androgyny; multiculturalism; travel 还见雌雄同体;多元文化主义;旅行

*I Ching* 《易经》166—167

identity 身份认同: definitions of 身份认同的定义 19, 75, 143—144, 153, 247n.22, 251—252n.24, 270n.1; difference and 差异与身份认同 10, 19, 74—78, 79, 102—104, 144—148, 246n.7, 256n.17; geography of 身份认同地理学 18—25, 130—131, 247n.23; history and 历史与身份认同 217; locational 定位式身份认同 18—25, 33—35, 130—131, 142—143, 185, 211, 230, 246—247n.13; 247n.17, 251n.23, 257n.20, 271n.1; models of 身份认同模式 10, 20—25, 41, 45—46, 47—50, 244n.8, 251n.23; multicultural 多元文化身份 96, 100—101, 151—178; poststructuralism and 后结构主义与身份认同 186—187, 189—198, 209—211, 233—234, 251—252n.24, 273n.6; sameness and 同一性与身份认同 19,

74—78, 79, 144—148, 256n.17. *See also* class; difference; ethnicity; gender; geography; geopolitics; hybridity; identity politics; narrative; nation; performance; postcolonialism; race; religion; sexuality; space; travel 还见阶级;差异;族群;性别;地理;地缘政治;杂合;身份政治;叙事;民族;表演;后殖民主义;人种;宗教;性征;空间

identity politics 身份政治 18—19, 65, 91, 189—192, 209, 233; definitions of 身份政治的定义 251—252n.2, 271n.10; ethnic absolutism as 作为身份政治的种族绝对论 74, 94, 100, 103—104, 158—159, 162—163, 166, 170—173, 176—177; fundamentalist 基要主义身份政治 4, 5, 45, 48, 49, 81, 167, 185, 271n.8, 274n.10. *See also* difference; ethnicity; ethnocentrism; identity; race 还见差异;族群;种族中心主义;身份;人种

Irigaray, Luce 伊里加蕾,露丝 30—31, 70, 77—78, 124, 192, 193, 208—209, 224, 254n.44, 255n.6 and 7, 273n.7

Irish, the 爱尔兰人 27—28, 29—31, 44—45, 49, 53, 54, 59—63,

- 253nn.35 and 38, 253—254n.42, 257n.24, 264nn.27 and 28
- Irish Republican Army 爱尔兰共和军 54, 59—62
- Jacobs, Harriet 雅各布斯, 哈丽雅特 39, 218, 255n.10
- Jameson, Fredric 詹明信, 弗雷德里克 9, 130, 248n.25, 252n.27, 265n.39, 275n.4
- Jardine, Alice 贾丁, 艾丽斯 71, 193, 233, 244—245n.1, 274nn.11 and 13
- Jen, Gish 任璧莲 247n.18; *Mona* 《莫娜在希望之乡》11, 13, 152, 166—178, 271n.11, 271—272n.12, 272nn.13, 15, and 16; *Typical American* 《典型美国人》271n.11
- Jews, the 犹太人 29—31, 53, 57, 75, 78—82, 116, 135, 136, 166, 167—176, 198, 216, 237—242, 257n.26, 272n.17, 280n.18; Ashkenazi 德系犹太人 22—23, 49;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犹太人 41, 42, 44, 71, 207—208, 225, 250n.12; Holocaust and 反犹太屠杀与犹太人 237—242; Sephardic 西班牙系犹太人 22—23, 89. *See also* anti-Semitism; Holocaust; religion 还见反犹太主义;反犹太屠杀;宗教
- Jones, John Paul III 琼斯, 约翰·保罗, 三世 245n.4, 251n.23, 268n.12
- Jordan, June 乔丹, 琼 13, 48—50, 65, 66, 73, 246n.13, 253n.38
- Jordan, Neil 乔丹, 尼尔: *The Crying Game* 《哭泣的游戏》13, 40, 59—63, 64, 65, 136, 254n.44
- Joseph, Gloria 约瑟夫, 葛洛莉亚 256n.13
- Joyce, James 乔伊斯, 詹姆斯 27—28, 117, 124, 232, 263n.19, 264n.28; *Ulysses* 《尤利西斯》13, 29—31, 116
- Kamboureli, Smaro 坎博莱利, 斯玛诺 279n.10
- Kamuf, Peggy 卡慕夫, 佩吉 209, 233, 276n.16
- Kaplan, Alexandra 卡普兰, 亚历山大 255n.8
- Kaplan, Caren 卡普兰, 凯瑞 *Questions of Travel* 《旅行的问题》108, 111, 262n.10, 262—263n.15, 268n.12, 269nn.16 and 19; *Scattered Hegemonies* 《零散霸权》5, 111—112, 113, 114, 119—120, 121, 127, 258n.35
- Kaplan, Carla 卡普兰, 喀拉 266n.45
- Kauffman, Linda 考夫曼, 琳达 209
- Kavanagh, Thomas 卡瓦纳, 托马斯 182—184, 186—187, 198, 202, 203

- Keith, Michael 基思, 迈克尔 245n.4, 246nn.7 and 8, 247n.19, 268n.12
- Keller, Evelyn Fox 凯勒, 伊芙琳·福克斯 272n.2, 277n.28
- Keller, Lynn 凯勒, 林恩 279n.10
- Kennedy, Elizabeth Lapovsky 肯尼迪, 伊丽莎白·拉波弗斯基 206—207
- Kenner, Hugh 肯纳, 休 115—119, 125, 130
- Kessler-Harris, Alice 凯斯勒—哈里斯, 艾丽斯 67, 72
- Kidd, Chip 基德, 吉卜 171—172, 272n.15
- Kincaid, James R. 金凯德, 詹姆斯 265n.34
- King, Martin Luther 金, 马丁·路德 73
- King, Rodney 金, 罗德尼 36—37, 39, 64—65, 78
- Kingston, Maxine Hong 汤婷婷 24; *Woman Warrior* 《女勇士》24—25, 129—130, 255n.10
- Kirby, Kathleen M. 科比, 凯瑟琳 245n.4, 262n.10, 269n.19
- Klein, Renata Duelli 克莱恩, 瑞纳塔·蒂艾里 275n.6
- Klepfisz, Irena 柯蕾普费兹, 艾琳娜 94, 251n.22; *Keeper of Accounts* 《记账者》12, 13, 216, 237—242, 280nn.17 and 18
- Kogawa, Joy 小川乐 40
- Kolodny, Annette 科罗德尼, 安涅特 215
- Koshy, Susan 科希, 苏珊 246n.8, 258n.35
- Kracke, Waud 克拉克, 沃德 267n.7
- Kristeva Julia 克里斯蒂娃, 朱丽娅 70, 193, 208—209, 210, 221—222, 224, 225, 228—229, 232—233, 234, 235, 240—241, 255nn.6 and 7, 273n.7, 279n.7; *About Chinese Women* 《关于中国女性》225; *Desire in Language* 《语言中的欲望》279n.6;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诗歌语言的革命》187, 231—232, 237; “Women’s Time” 《女性的时间》192, 222
- Kuhn, Thomas 库恩, 托马斯 202
- Kureshi, Hanif 克尔西, 汉尼弗 99; *My Beautiful Launderette* 《欢乐洗衣店》99, 136, 253n.36, 271—272n.12
- Lacan, Jacques 拉康, 雅克 9, 70, 182, 194, 197, 198, 208—209, 224, 237, 250n.14, 269n.15, 274n.9
- LaCapra, Dominick 拉卡普拉, 多米尼克 38, 195—196, 199, 201, 203, 210, 217, 275nn.2, 3, 4, and 5
- Lanser, Susan Sniader 兰瑟, 苏珊·施奈德 114
- Larsen, Nella 拉森, 奈乐: *Quicksand* 《流沙》13, 21—22, 23—24
- Laslett, Barbara 拉斯莱特, 芭芭拉

- 251n.21
- Latino/as 拉丁美洲人 22—23, 36—37, 53, 73—74, 76, 80—81, 93, 103—104, 183, 257n.23, 259n.36, 261n.5. *See also* Chicano/as; race; racism; Third World; women of color 还见奇卡诺/娜;人种;种族主义;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女性
- Laub, Dori 劳波,德瑞 203
- Lawrence, D. H. 劳伦斯 27—28, 263n.19, 264n.28
- Lee, Ang 李安 55, 136, 253n.36, 271—272n.12
- Lefebvre, Henri 列斐弗尔,亨利 138, 269n.14
- LeGuin, Ursula 莱金,厄休拉 216, 229
- Lehrman, Karen 勒曼,凯瑞 276n.10
- Lerner, Gerda 勒纳,杰达 199, 214
- lesbianism 女同性恋 20—21, 23, 31, 93, 94, 116, 157, 164—165;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女同性恋 71, 206—207, 225—256, 250n.13, 259n.40, 260n.44;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女同性恋 50, 75, 99—101. *See also*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queer theory; sexuality 还见同性恋研究;酷儿理论;性征
- Lewis, Jill 刘易斯,吉尔 256n.13
- Lezra, Jacques 雷拉,雅各 253n.41, 254n.44
- Li, Kay 李凯 119
- Ling, Amy 林英敏 254n.45
- Lispector, Clarice 利斯佩克托尔,克莱瑞斯 232
- literary studies 文学研究 11, 12, 17—35, 108, 114, 117, 182—183, 189—198, 212, 213, 214, 221, 231—233, 244—245n.1, 247n.23, 270n.27, 277n.25; anthropology and 人类学与文学研究 112—131, 132—150, 267n.6, 269n.16. *See also* academy; feminist criticism; hybridity; long poem; lyric; narrative 还见高校;女性主义批评;杂合;长诗;诗歌;叙事
- long poem 长诗 96, 93—101, 216, 237—242, 278n.2, 280nn.16 and 18; definitions of 长诗的定义 279nn.10 and 11, 279—280n.12; gender and 性别与长诗 12, 230, 234—242, 259n.39, 278n.3, 278—279n.4. *See also* Anzaldúa; Cha; Klepfisz; lyric 还见安莎杜娃;查;柯蕾普费兹;诗歌
- Lorde, Audre 罗德,奥德莉 3, 7, 192, 225—226, 246n.10, 250n.11, 255n.10; *Sister Outsider* 《姐妹外人》20, 42, 67—68, 71, 163, 192, 207—208, 276n.10; *Zami* 《查米》20—21, 96, 246n.11, 260n.43

- Lowe, Lisa 洛尔, 丽莎 258n.27, 269n.19
- Loy, Mina 罗伊, 米娜 230, 263n.19, 278—279n.4
- Luce, Morton 卢斯, 莫顿 265n.34
- Lugones, María 鲁冈, 玛丽亚 13, 72—74, 76, 94, 103—104, 256n.14, 261n.5
- Lukács, Georg 卢卡奇, 乔治 224
- Lyotard, Jean-Francois 里昂塔德, 让—弗朗西瓦 216—217, 255n.7
- lyric, the 诗歌 12, 72—73, 167, 247n.23, 278n.2; long poem and 长诗与诗歌 228—242; narrative and 叙事与诗歌 12, 95—97, 216, 228—247
- McDowell, Deborah 麦克道尔, 黛博拉 194
- McFarlane James 麦克法兰, 詹姆斯 118, 263n.22
- Machin, Richard 马钦, 理查德 182
- Mani, Lata 马尼, 拉塔 9
- Marcus, George 马库斯, 乔治 113—114, 262n.11, 266n.1, 268n.8
- Marcus, Jane 马库斯, 简 119, 127, 248n.27, 265n.41, 267n.6
- Marks, Elaine 马克斯, 伊莱恩 4, 255n.6, 273n.7
- Martin, Bidy 马丁, 比迪 43, 50, 250n.14, 260n.2, 262n.10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30, 45, 92, 182, 244n.9, 255n.10, 273n.7
- mass media 大众媒体 170, 176, 272n.15;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2;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体 204—206; film 电影 40, 55—63, 136, 157—166, 252nn.27, 35, and 36, 252—253n.34, 253nn.35, 36, and 40, 253—254n.42, 254n.43, 271nn.5 and 6, 271—272n.12; news 新闻 36—37, 40, 50—55, 122—124, 265n.33. *See also* narrative 还见叙事
- Medina, Rubén 梅迪纳, 鲁本 259n.40, 260n.43
- Mehta, Gita 梅塔, 吉塔 270n.22
- Mernissi, Fatima 梅尔尼斯, 法蒂玛 270n.23
- mestizaje 混杂文化 *See* hybridity 见杂合
- Millay, Edna St Vincent 米莱, 埃德娜·圣文森特 279n.4
- Miller, James 米勒, 詹姆斯 235
- Miller, Nancy K. 米勒, 南茜 26—27, 33, 189, 193, 194, 197, 233—234, 248n.27
- mimesis 模仿: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模仿 74—75, 103, 142, 143—144, 145—148, 154, 177—178, 256n.15; parody and 戏仿与模仿 30—31, 77—78, 86, 123—125, 163—164, 168;

- performance and 表演与模仿 76—82, 168; realism and 现实主义与模仿 95, 157, 159, 168, 182—183, 187, 210, 253n.36, 256n.15, 276—277n.20
- Minnich, Elizabeth 米尼克, 伊莉莎白 205
- Miyoshi, Masao 三好将夫 39, 252n.27
- Modleski, Tania 莫德莱斯基, 塔妮娅 80, 257n.19
- modernism 现代主义 19, 89, 95, 158, 162, 229, 230, 259n.38, 263n.22, 278n.2;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1, 32, 114, 116, 263n.16; internationalism of 现代主义的国际化 114—131, 263n.16; writers and 作家与现代主义 27—31, 114—131, 144—148, 233, 234—245, 263n.19, 264nn.28 and 30, 273—274n.8. *See also*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还见现代性; 后现代性
- modernity 现代性 6, 84, 88, 147—148, 162—163, 214, 228—229, 230—234, 239, 245n.1, 251n.16, 258n.30, 259n.38, 270n.23. *See also* modernism; postmodernity 还见现代主义; 后现代性
- Modood, Tariq 摩都德, 塔里格 92, 261n.5
- Moglen, Helene 摩格兰, 伊莲娜 272n.2
- Mohanty, Chandra Talpade 莫安提, 钱特拉·塔尔培德 43, 48, 50, 64, 207—208, 250n.14, 251n.23, 262n.10, 277n.24
- Mohanty, S. P. 莫安提 46, 64, 91, 42—143
- Moi, Toril 莫依, 陶丽 13, 191, 193, 222, 224, 225—226, 227, 274n.11
- Molina, Papusa 莫莉娜, 帕普萨 50
- Montefiore, Jan 蒙塔菲瑞, 简 242
- Moore, Henrietta L. 莫尔, 亨里埃塔 67, 68, 69, 74, 103, 142, 155
- Moraga, Cherríe 莫拉加, 切丽埃 207—208
- Moran, Barbara 莫兰, 芭芭拉 41, 255n.10
- Morgan, Robin 摩根, 罗宾 41, 246n.10, 255n.10, 276n.10
- Morrison, Toni 莫里森, 托尼 126, 216, 217, 228, 230, 233, 234, 235, 253n.37, 255n.10; *Beloved* 《宠儿》34, 110, 139
- Muchery, Pierre 马舍雷, 皮埃尔 182
- Mukherjee, Bharati 慕克吉, 巴拉蒂 87, 110, 247n.18, 258n.31
-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主义 9—10, 15—104, 138; definitions of 多元文化主义的定义 37, 51, 135, 252n.26; metaphors for 对其的比喻 51, 74, 102, 169,



- 171—172, 246n.8, 252n.26; transnationalism and 跨国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130, 243n.4, 261—262n.9;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与多元文化主义 6—7, 36—37, 48, 51, 56—59, 78—82, 159—178, 248—249n.1, 249n.3, 251n.22, 252n.26. *See also* culture; ethnicity; feminism; race; religion 还见文化; 族群; 女性主义; 人种; 宗教
- Mulvey, Laura 穆尔维, 劳拉 217
- Mura, David 穆拉, 戴维 166
- My Beautiful Launderette* 《欢乐洗衣店》*See* Kureshi 见克尔西
- myth 神话 21, 93, 95, 157—166, 167, 202, 231, 232, 234—242, 259—260n.42, 260n.43, 279n.5, 280n.13. *See also* religion 还见宗教
- Nair, Mira 奈尔, 米拉 252—253n.34; *Mississippi Masala* 《密西西比马萨拉》13, 40, 55—59, 63, 65, 136, 253n.35, 253n.54
- Narayan, Kirin 纳拉严, 提林 142, 143
- narrative 叙事 8—10, 26—31, 279—280n.12; cultural 文化叙事 6, 8—9, 29—31, 36—66, 112, 120—126, 148, 153, 188, 195, 248n.25, 251n.16, 264n.28; desire and 欲望与叙事 134, 137—140, 143, 144, 148—150, 217—220, 228—242, 267n.5, 267—268n.7; ethnography and 人种学与叙事 119—120, 132—150, 157—166, 266n.1; figural and 比喻与叙事 200—201, 209—210, 220, 221, 223—234, 226, 277n.21; feminist theory and 女性主义理论与叙事 5—6, 36—66, 199—227; film and 电影与叙事 13, 55—63, 157—166; lyric and 诗歌与叙事 95—97, 228—242, 278n.2, 279n.10; master 主导叙事 8—9, 18, 121—122, 188, 191—192, 198, 202—203, 216—227, 227, 231—233, 244—245; as mode of knowing 作为一种知识模式的叙事 8, 216—217, 219, 228, 229, 233, 236; oral tradition and 口头传统与叙事 128—129, 132—133, 215—257, 229, 234; race and 人种与叙事 10, 36—66; space and 空间与叙事 40, 132—150, 217, 235, 268n.12, 268—269n.13, 278n.31; theory of 叙事理论 132—150, 151—178, 199—227, 239, 132—150, 151—178, 192, 193—194, 210—211, 217—218, 226—267, 228—237, 247n.23, 250n.8, 267n.3,

- 267n.4, 268n.12, 268—269n.13, 269n.14, 276—267n.20, 277n.21; time and 时间与叙事 137—138, 144, 149—150, 235, 268n.12, 268—269n.13. *See also* difference; geopolitics; history; identity; lyric; psychoanalysis; travel 还见差异; 地缘政治; 历史; 身份认同; 诗歌; 精神分析; 旅行
- nation 民族 111—112, 116—118, 128, 167, 170, 178, 278n.40; gender and 性别与民族 113, 118, 262—263n.15; globalism and 全球主义与民族 141—142, 260n.44;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民族 45, 73, 75, 95, 109—110, 115, 118—120, 128—130, 135, 153—157, 170, 185, 214, 259n.40, 259—260n.42, 260n.44, 276n.13; nationalism and 民族主义与民族 29—31, 33, 56, 118, 122—126, 146—147, 152—153, 171, 262—263n.15, 265nn.34 and 36, 270n.23, 272—273n.3. *See also* geopolitics; identity politics; postcolonialism; transnationalism 还见地缘政治; 身份政治; 后殖民主义; 跨国主义
-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美国国家女性研究协会 186, 204—205, 211, 249n.6
- Native Americans 土著美国人 *See* American Indians 见美国印第安人
- negotiation 协商 *See* agency 见能动性
- New Criticism 新批评 197
- Nightingale, Florence 南丁格尔, 弗罗伦斯 124, 264n.32, 264—265n.32
- Norris, Christopher 诺瑞斯, 克里斯托夫 182
-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客体关系理论 *See* psychoanalysis 见精神分析
- Oedipus 俄狄浦斯 140, 148, 267n.5, 269n.15. *See also* psychoanalysis 还见精神分析
- Ostriker, Alicia 奥斯翠克, 阿丽夏 194, 248n.27
- otherness 他者属性 *See* difference 见差异
- Ovid 奥维德 166
- Papastergiadis, Nikos 帕帕斯特爵迪, 尼可斯 258nn.27 and 30
- Patai, Daphne 帕泰, 达芬妮 208, 212, 276n.17, 277n.22
- Pearce, Richard 皮尔斯, 理查德 80
- performativity 述行性 94, 95, 103—104, 132—133, 134, 138, 168, 182, 183, 213, 221, 223—224, 266n.44;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述行性 11, 48, 168, 245n.5,

- 247nn.21 and 22, 251—252n.5, 256n.17; queerness and 酷儿特性与述行性 25—26, 77—78, 244n.8, 245n.5, 247nn.21 and 22, 256n.17; theater and 剧院与述行性 78—82, 257nn.18, 19, 20, and 21, 259n.36. *See also* mimesis 还见模仿
- Perloff, Marjorie 博洛夫, 玛乔瑞 229, 263n.16
- Phelan, James 弗兰, 詹姆斯 137, 253n.41
- Phillips, Kathy 菲利普斯, 凯茜 119, 263n.25, 265—266n.42
- Pieterse, Jan Nederveen 皮特丝, 简·内德维恩 258n.27
- Pile, Steve 派尔, 斯蒂夫 245n.4, 246n.7, 247n.19, 268n.12
- Plato 柏拉图 194
- Polumbo-Liu, David 刘大卫 176
- Pomata, Gianna 波马塔, 吉安娜 217, 278n.31
- postcolonialism 后殖民主义 92, 144, 152, 183, 188, 270n.23, 278n.39;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4, 10, 11, 12, 18, 20, 68, 71, 83, 93, 119, 141—142, 152—153, 247nn.17 and 18, 269n.21;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后殖民主义 46, 47; theories of 后殖民主义理论 118, 225—227, 243n.4, 244n.9, 250n.14, 251n.23, 271n.2, 275n.1. *See also* academy; colonialism; nation; transnationalism 还见高校; 殖民主义; 民族; 跨国主义
-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19, 33, 74, 84, 88, 93, 95—96, 133—134, 141, 166—178, 202, 216—217, 226—227, 229, 230—234, 258nn.30 and 31, 259n.38, 266n.1, 267n.6, 269n.17, 270n.27. *See also* globalism; hybridity; modernism; modernity 还见全球主义; 杂合; 现代主义; 现代性
-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9—10, 12, 18, 25—26, 77—78, 124—125, 152, 163, 173, 179—242, 245n.4, 258n.34; author and 作者与后结构主义 26—27; 182—183; 187—191; 189; 196; 233; critiques of 对后结构主义的批评 182—184, 190—198, 212—217, 221, 225—256, 277n.25;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4, 9, 11—12, 20, 209—210, 218—220, 223—237, 231—233, 244—245n.1, 250n.14, 255nn.6 and 7, 274nn.8, 9, 11, and 12, 275—276n.7, 276nn.13 and 16, 277nn.23 and 25, 278n.38;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后

- 结构主义 186—198, 209, 251—252n.24, 273n.6, 276n.16; politics of 后结构主义的政治 64, 181—184, 188, 212—213, 223—237; problematization and 质疑与后结构主义 199—200, 209—212, 218—220, 225—227; Real and 真实与后结构主义 182—183, 186—187, 210, 212—214, theories of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 4, 47, 70, 187—189, 204—245, 208—209, 219—220, 222—229, 230—234, 235, 236—237, 239, 240—241, 246, 267n.6, 266—267n.20, 279nn.5, 6, and 7; transplantation of 后结构主义的移植 69—70, 187, 196—197, 208—209, 224, 255n.6, 272n.2, 275n.14. *See also* humanism; identity 还见人文主义; 身份认同
- Pound, Ezra 庞德, 埃兹拉 117, 234, 263n.19, 263n.20
- Pratt, Mary Louise 普拉特, 玛丽·路易丝 91, 254n.1, 258nn.27 and 33, 269n.16
- Pratt, Minnie Bruce 普拉特, 米妮·布鲁斯 50, 262n.10
- Propp, Vladimir 普洛普, 弗拉迪米尔 267n.4
-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12, 25, 155, 189—190, 197, 198, 203, 208, 211, 220, 231—232, 237, 245n.4, 265n.40, 267—268n.7; desire and 欲望与精神分析 134, 143, 144, 148—150, 155, 217, 18, 276—277n.20; *fort/da* 去/来 10, 134, 144, 152—157, 160, 162, 167, 176—177; narrative and 叙事与精神分析 134, 137—138, 140, 143—144, 148—150, 217—218;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客体关系理论 47, 48, 251n.23, 267—268n.7, 271n.3; oedipal/pre-oedipal/post-oedipal 俄狄浦斯/前俄狄浦斯/后俄狄浦斯精神分析 11, 120, 121, 143, 139, 141, 143, 144, 145, 148, 149—150, 155, 210, 218, 229, 231—232, 233, 267n.5, 269n.14, 271n.3, 276—277n.20; political unconscious 政治无意识 120—121, 126, 127, 130, 161, 164—166, 188—189, 253n.38;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被压抑者的归来 172—173, 188—189, 238. *See also* desire; Freud; Lacan; Oedipus 还见欲望; 弗洛伊德; 拉康; 俄狄浦斯
- Purdom, Judy 普登, 朱迪 258n.34
- queer theory 酷儿理论: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2,

- 18, 244n.8, 247n.21, 256nn.16 and 17, 260—261, 277n.24;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酷儿理论 77—78, 93, 99—101, 144, 148, 244n.10, 245n.5, 256nn.16 and 17. *See also* academy; androgyny;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gender; lesbianism; performativity; sexuality 还见高校; 雌雄同体; 同性恋研究; 性别; 女同性恋; 述行性; 性征
- race 人种 127, 128, 138, 211, 212, 213, 257nn.23 and 24, 257n.25; binary views of 有关种族的二元对立观点 26—66, 72—74, 93—94, 110, 164—166, 243n.4; body and 身体与人种 78—81, 159, 161—162, 165, 169, 173—175, 258n.29, 272n.16; caste and 种姓与人种 54—55, 252n.32; definitions of 人种的定义 52, 54—55, 174, 249nn.2 and 4, 258n.29, 261n.5; ethnicity and 族群与人种 110, 249n.4, 264n.28;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人种 36—66, 69—70, 243n.4, 250n.12, 251n.4, 255—256n.11, 256nn.13 and 14;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人种 10, 20—25, 37—38, 41, 78—82, 96, 109, 110, 115, 142—143, 151—178, 185, 196, 215, 156nn.14 and 17, 261n.5, 276n.13; purity and 纯洁与人种 45, 66, 74, 83—84, 86, 98—100, 257n.26; theories of 人种理论 39—40, 249n.4, 251n.17, 257n.26; whiteness and 白种属性与人种 6, 22—23, 38, 44—46, 94, 113—114, 116, 207, 249n.2, 253n.38, 257nn.19 and 26, 272n.16. *See also* African Americans; American Indians; Asian Americans; binarism; Chincao/as; difference; ethnicity; European Americans; Latino/as; multiculturalism; narrative; racism; utopianism; West; women of color 还见美国黑人; 美国印第安人; 亚裔美国人; 二元对立; 奇卡诺/娜; 差异; 族群; 欧裔美国人; 拉丁美洲人; 多元文化主义; 叙事; 种族主义; 乌托邦理想; 西方; 有色人种女性
- racism 种族主义 34, 138, 152—153, 173—176; Asia and 亚洲与种族主义 45—46, 54, 56—59, 252n.32; binarism and 二元对立与种族主义 36—66; colonialism and 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 28—31, 97—101, 144—148, 163, 174—175, 253n.35; definition of 种族主义

- 的定义 45 ;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种族主义 36—66, 70—71, 250n.11 and 15 ; of people of color 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 36, 52—54, 56—59, 168, 169, 174, 175, 252n.30 ; primordialism 原生主义 52—54, 55, 252n.33 ; United States and 美国与种族主义 38, 46, 50—51, 58, 71, 78—82, 93—94, 97—101, 103, 110, 157—166, 167, 174—175, 177—178, 204, 206, 248—249n.1, 252n.30 ; whiteness and 白种属性与种族主义 36—37, 55, 56—57, 136, 144—148, 163—164, 168, 171, 175, 253n.38, 254n.43, 257n.19 and 26. *See also* anti-Semitism ; colonialism ; ethnocentrism ; narrative ; postcolonialism ; Third World ; West ; women of color 还见反犹太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叙事;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西方;有色人种女性
- Radhakrishnan, R. 拉达克里希南 48, 50, 64, 65, 209, 226—227, 251n.23, 252n.33, 262n.10, 278n.40
- Ramphela, Memphela 蓝菲乐,曼菲拉 129—130, 266n.46
- Ray, Sangeeta 雷,桑吉塔 33, 248n.27, 258n.35
- Raymond, Janice 雷蒙德,詹妮斯 255n.8
- Razack, Sherene 拉扎克,谢瑞恩 10, 38, 50, 67, 251n.19
- realism 现实主义 *See* mimesis 见模仿
- Reeves, Jimmie 里维斯,吉米 51
- religion 宗教 52, 75, 83, 257n.25, 273—274n.8, 280n.15 ; Aztec 阿兹特克宗教 99, 259—260n.42, 260n.43 ; Buddhism 佛教 53, 117, 270n.22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52, 53, 54, 60, 62—63, 99, 121, 125—126, 127, 135, 139, 147, 157, 159, 160—161, 162, 218, 228, 238, 250n.12, 253—254n.42, 260n.43 ; fundamentalism 基要主义 52—53, 157, 162, 175—176, 274n.10 ; gender and 性别与宗教 236—237, 259n.41, 260n.43 and 45 ; Hinduism 印度教 45, 52—53, 117, 146—147, 253n.39 ; Hoodoo 不祥之物 157, 159, 160—161, 162—163, 165—166 ;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宗教 10, 20—23, 41, 73, 109, 115, 135, 145—148, 152, 155, 168—176, 185, 196, 215, 276n.13 ; Islam 伊斯兰教 45, 52—53, 135, 144—148, 159, 161, 162, 253n.39 ; Jainism 耆那教 147—148, 270n.22 ;

- Judaism 犹太教 52—53, 157, 162, 175—176, 274n.10. *See also* Jews; myth 还见犹太人; 神话
- Rhys, Jean 里斯, 简 27—28, 248n.24, 263nn.19 and 28; *Wide Sargasso Sea* 《藻海无边》28—29, 138
- Rich, Adrienne 里奇, 阿德里安娜 70, 192, 194, 207—208, 250n.13; “Notes” 《通往定位政治的笔记》87, 115—119, 125, 130, 150, 260n.44, 262n.15; “When We Dead Awaken” 《当我们死而复醒》193
- Richards, I. A. 理查兹 182
- Richardson, Dorothy 理查德森, 多萝西 263n.22
- Ricoeur, Paul 利科, 保罗 137, 268n.13
- Robb, Peter 罗博, 彼得 252n.32
- Robertson, Roland 罗伯森, 罗兰 111, 261n.8, 268n.12
- Rodriguez, Richard 罗德里格斯, 理查德 36, 37, 38, 166
- Ronen, Ruth 罗恩, 鲁斯 268—269n.13
- Rosaldo, Renato 罗沙东, 瑞纳多 85, 258n.27, 268n.8
- Rosenthal M. L. 罗森塔尔 235
- Rothstein, Eric 罗特斯坦, 艾瑞克 253—254n.42
- Rowbotham, Sheila 罗博特姆, 希拉 218
- Ruddick, Lisa 鲁迪克, 丽莎 181, 273n.6
- Rushdie, Salman 拉什迪, 萨尔曼 24, 83—84, 86, 90, 92, 99, 247n.18, 258nn.27, 30, 31, and 35; *Satanic Verses* 《撒旦诗篇》83—84, 247n.19
- Ryan, Marie-Laure 瑞恩, 玛丽—劳拉 269n.13
- Said, Edward W. 萨义德, 爱德华 107, 112, 156, 269n.18;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文化与帝国主义》110—111, 119, 261n.7, 262n.12, 268n.12;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121—122, 261n.7; “Traveling Theory” 《理论旅行》5, 68
- Saldívar-Hull, Sonia 沙蒂瓦尔—霍尔, 索尼娅 259n.38
- Sarker, Sonita 萨克, 索尼塔 260n.44, 263n.15
- Sartre, Jean-Paul 萨特, 让—保罗 196
- Sarup, Madan 塞拉浦, 马丹 178, 262n.10
- Sawhney, Sabina 索内, 萨彬娜 136
- Schechner, Richard 谢克纳, 理查德 79
- Schenck, Celeste 施耐克, 塞莱斯特 181
- Scott, James C. 斯科特, 詹姆斯 206—207, 276n.12
- Scott, Joan Wallach 斯科特, 乔安·瓦拉奇 209—210, 211, 204, 218—221, 223, 227, 256n.16, 276n.13, 278n.35

- Secrets and Lies* 《秘密与谎言》55
- Sedgwick, Eve Kosofsky 塞吉维克, 伊芙·科索斯基 50, 62, 103, 109, 244n.10, 247n.22, 256n.17, 260—261n.2, 274n.13, 277n.24
- Sennett, Richard 桑内特, 理查德 270n.1
- sexuality 性征 144, 211, 217—218, 241, 256n.17, 259n.41, 267n.5, 278n.40; bisexuality 雌雄同体 28, 29—31, 61, 77—78, 109, 148, 165, 253—254n.42, 255n.9, 271—272n.12; heterosexism 异性恋主义 30—31, 59—63, 97, 100, 103, 109, 130, 226, 250n.12, 260—261n.2; heterosexuality 异性恋 28—29, 59—63, 70—71, 77—78, 102, 109, 135—156, 144, 148, 173—175, 207, 256n.17, 271—272n.12;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28, 30—31, 59—63, 77—78, 109, 135—136, 144, 147, 148, 253—254n.42, 253n.36, 254n.43, 256n.17, 260—261n.2, 271—272n.12;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性征 10, 20—25, 41, 59—63, 75, 96, 101, 109, 110, 115, 135—136, 142, 146, 152, 155, 185, 196, 214, 254—255n.5, 256n.13, 260—261n.2, 271—272n.12, 276n.13; lesbianism and 女同性恋与性征 20—21, 70—71, 99—101, 109, 164—165. *See also*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lesbianism; queer theory 还见同性恋研究; 女同性恋; 酷儿理论
- Shohat, Ella 肖哈特, 艾拉 258nn.27 and 35
- Shostak, Marjorie 修斯塔克, 玛乔瑞 132—133, 135, 138, 142, 148—149, 266n.1, 266—267n.2, 267n.3, 270n.26, 277n.22
- Showalter, Elaine 肖瓦尔特, 伊莱恩 18, 70, 193, 215, 221—223, 214, 225, 226, 244—245n.1, 255n.8, 278n.38
- Siegel, Deborah 西格尔, 黛博拉 254n.4, 277n.28
- Silko, Leslie Marmon 史尔戈, 莱斯利·马蒙 233, 242, 247n.18, 252n.26, 280n.15; *Ceremony* 《仪式》90; *Storyteller* 《讲故事的人》40, 47, 215, 229
- Smith, Anna Deavere 史密斯, 安娜·德维阿 13, 67, 78—82, 103—104, 247n.19, 257nn.20 and 21; *Fires* 《镜中火》78—79, 80—81, 257n.18; *Twilight* 《日暮洛城 1992》78—79, 81—82
- Smith, Barbara 史密斯, 芭芭拉 42, 194, 207—208, 225—226, 246n.10



- Smith, Paul 史密斯, 保罗 190—192, 193, 212, 273—274n.8, 277n.25
- Sollors, Werner 索罗尔斯, 威尔纳 249n.4, 252n.31
- Sommers, Christina Hoff 萨默斯, 克里斯蒂娜·霍夫 13, 204—206, 215
- Sophocles 索福克勒斯 139
- space 空间: computers and 网络与空间 19, 33, 37, 86—87, 243n.5; contact zone 接触地带 11, 19, 46—47, 66—104; creativity and 创造力与空间 127—129, 241—242, 257n.21, 266n.44, 266n.45, 271n.2; definitions of 空间的定义 109—110, 138, 261n.4, 269n.14; geopolitics and 地缘政治与空间 11, 109—114, 127—173, 261n.3; identity and 身段认同与空间 17—35, 245n.4, 251n.23; migrancy and 迁移与空间 110—111, 115, 246n.8; as mode of thought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 11, 18, 31, 86—87, 96, 97, 99, 100, 130, 278n.31. *See also* borders; geography; home; narrative; time; travel 还见边界; 地理; 家园; 叙事; 时间; 旅行
- Spillers, Hortense 斯皮尔斯, 霍顿斯 61, 254n.44
- 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斯皮瓦克, 佳亚特里·C. 6, 9, 13, 50, 119—120, 197, 207—208, 222; “French Feminism” 《国际框架内的法国女性主义》225—227; *In Other Worlds* 《在他者的世界》108, 244n.9, 278n.39;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深入教学机器》5, 6, 111—112, 127, 130, 199, 258n.35, 261n.9, 262n.12; *Post-Colonial Critic* 《后殖民批评家》6, 151, 167, 243n.4, 275n.1
- Stein, Gertrude 斯泰因, 格特鲁德 230, 263n.19, 263n.22, 264n.28, 278—279n.4
- Stephen, Caroline Emelia 斯蒂芬, 卡罗琳·艾米莉亚 127, 264n.32, 265n.41
- Stephen, Leslie 斯蒂芬, 莱斯利 27, 128, 265n.41
- Stocking, George W, Jr. 斯多金, 乔治 249n.4, 251n.17, 275n.2
- Strathern, Marilyn 斯特拉森, 玛莉莲 82, 258n.27
- Suleri, Sara 舒乐瑞, 萨拉 50, 250n.14, 269n.19
- Swindells, Julia 斯温德尔斯, 朱莉娅 276n.14
- Sykes, Charles 塞克斯, 查尔斯 204
- syncretism 融合主义 *See* hybridity 见杂合
- Taussig, Michael 陶斯格, 迈克尔

- 73—74, 76—77, 103, 142, 145, 246nn.7 and 8, 256n.15
- Tennyson, Alfred Lord 丁尼生, 阿尔弗雷德勋爵 121—125, 265n.33, 265nn.34, 36, and 38
-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97, 158; binarism and 二元对立与第三世界 6, 39, 89, 111—112, 142—143, 269n.18; category of 第三世界范畴 46;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第三世界 42, 71, 207—208, 225—226, 243n.4, 260n.1, 270n.23, 277n.24. *See also* colonialism; globalism; postcolonialism; racism; women of color 还见殖民主义; 全球主义; 后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 有色人种女性
- Thompson, Richard 汤普森, 理查德 252n.33
- Thongchai, Winichakul 童灿, 威尼楚库 154—156, 161, 258nn.27 and 31, 267n.3, 268n.9
- time 时间 11, 222—224, 268n.12, 269—270n.13, 276n.18; as mode of thought 作为一种思维模式 11, 92, 86—88, 96, 97, 99, 100, 115, 130, 261n.4. *See also* history; narrative; space 还见历史; 叙事; 空间
- Todorov, Tzvetan 托多罗夫, 茨威坦 269n.15
- Torgovnik, Marianna 托洛夫尼克, 玛丽安娜 263n.18
- transnationalism 跨国主义 95, 109—131, 153;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跨国主义 4—5, 69, 93—94, 107—109, 118, 130—131, 225—257, 261—262n.9, 262n.12, 262—263n.15; as field of study 作为一个研究学科 11; globalization and 全球化与跨国主义 19, 11. *See also* borders; comparativism; feminism; geopolitics; multiculturalism; nation; travel 还见边界; 比较主义; 女性主义; 地缘政治; 多元文化主义; 民族; 旅行
- travel 旅行 117, 263n.19; ethnography and 人种学与旅行 112—114, 119—120, 130; genre of writing and 书写文类与旅行 140—141, 269n.16; hybridity and 杂合与旅行 86—88, 93, 246n.8; identity and 身份认同与旅行 19—20, 76, 78—82, 86—87, 94—96, 99—101, 102—104, 110—111, 151—178, 152—153, 155, 270n.1; narrative and 叙事与旅行 121—126, 139, 142—144, 148—149, 151—178, 264nn.30 and 31; theory and 理论与旅行 4—7, 9—10, 68, 69, 107—108, 112—114, 127, 131, 246n.8.

- See also* borders ; globalism ; transnationalism 还见边界 ; 全球主义 ; 跨国主义
- Trevor-Roper, Hugh 特雷弗—罗珀, 休 264n.27
- Trinh, Minh-ha T. 郑明河 258nn.27, 30, and 31, 260n.1, 262n.10, 269n.16, 274n.13
- Tripp, Aili 特里普, 艾丽 254n.3
- Trouillot, Michel-Rolph 特鲁诺, 米歇尔—拉尔夫 142—143, 263nn.17 and 18, 269n.18
- Tucker, Herbert F. 塔克, 赫伯特 265n.34
- Twain, Mark 吐温, 马克 169—170, 175
- utopianism 乌托邦理想 62—63, 65—66, 68, 81—82, 93, 96, 97, 98, 99, 100, 194, 195, 237 ; desire and 欲望与乌托邦理想 55, 94, 103 ; feminism and 女性主义与乌托邦理想 72—73, 222, 276n.16 ; race and 人种与乌托邦理想 58—59, 146
- van der Veer, Peter 范德维尔, 彼德 92
- Visweswaran, Kamala 维斯韦沃兰, 卡玛拉 9, 82, 244n.9, 258n.31, 267n.5, 268n.8, 270n.27
- Walker, Alice 沃克, 艾丽斯 42, 128, 130, 192, 193, 207—208, 225—226, 246n.10, 255n.10, 266n.43
- Washington, Mary Helen 华盛顿, 玛丽·海伦 33, 248n.27
- Wedding Banquet, The* 《喜宴》 *See* Ang Lee 见李安
- Weedon, Chris 威顿, 克里斯 193, 274n.11
- Welles, Orson 威尔斯, 奥逊 62
- Werbner, Pnina 韦伯纳, 妮娜 86, 92, 103, 258nn.27, 30, and 31
- West, Cornel 韦斯特, 考奈尔 80, 249n.4, 252n.31
- West, the 西方 6—7, 92, 113—114, 117—118, 119, 130, 133—134, 148—149, 158, 159, 162, 163—164, 192, 225—256, 236, 243n.6, 247n.21, 271n.8, 274n.10, 280n.15 ; binarism and 二元对立与西方 6, 50, 142—143, 261n.7, 262n.12, 267n.3 ; colonialism and 殖民主义与西方 6, 108, 111—112, 119—120, 121—122, 142—143, 147, 154—155, 261n.7, 269n.18, 270n.23 ; heterogeneity of 西方的异质性 6, 22—23, 27—31, 44—45, 52—53, 97—98, 103—104, 120—121, 126—127, 225—256, 249n.3, 252n.26, 257n.26, 261n.7, 264nn.27 and

- 28; racism and 种族主义与西方 43, 44—46, 54—55, 83, 139, 252nn.31 and 32, 258n.29. *See also* colonialism; feminism; humanism; postcolonialism; racism; Third World 还见殖民主义;女性主义;人文主义;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第三世界
- White, Hayden 怀特,海登 195—196, 201, 210, 217, 275nn.3, 4, and 5, 276n.18
- Whitehead, Neil L. 怀特海德, 尼尔 258n.27
- whiteness 白种属性 *See* European Americans; race; racism 见欧裔美国人;人种;种族主义
- Whitman, Walt 惠特曼,沃尔特 230
- Williams, Patricia 威廉姆斯,帕特里夏 50
- Williams, William Carlos 威廉斯,威廉·卡洛斯 234
- Wilson, John 威尔逊,约翰 276n.9
- Winnicott, D. W. 温尼考特 267—268n.7
- Wittig, Monique 威蒂格,莫妮克 255n.6, 273n.7
- women of color 有色人种女性 183, 216, 225—256, 229, 249n.6; binarism and 二元对立与有色人种女性 39, 64—65, 72—73, 93—94, 175, 249n.7, 251n.5, 259n.41; category of 有色人种女性的范畴 21, 37, 42, 46, 47, 110, 174—175, 178; coalitions and 同盟与有色人种女性 39, 42; fetishization of 对有色人种女性的盲目推崇 43, 250n.14; pedagogy and 教学法与有色人种女性 43—44, 250n.15;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有色人种女性的理论贡献 20, 41—42, 70—71, 93—94, 185, 192—193, 207—208, 246n.10. *See also* African Americans; American Indians; Asian Americans; Chicano/as; feminism; Latino/as; race; racism; Third World 还见美国黑人;美国印第安人;亚裔美国人;奇卡诺/娜;女性主义;拉丁美洲人;人种;种族主义;第三世界
- women's history 女性历史 *See* history 见历史
- women's studies 女性研究 9, 12, 71—72, 107; epistemology of 女性研究认识论 12, 31—32, 186, 200—203, 205—206, 209—211, 216, 275n.6, 275—276n.7; history of 女性研究的历史 199—206, 272—273n.3; politics of 女性研究的政治 32—34, 40, 43—44, 50, 184—186, 202, 211, 214—215, 250n.15, 276n.10, 277n.28. *See also* academic feminism; academy; feminist

- criticism ; gay and lesbian studies ; history ; lesbianism ; queer theory ; transnationalism ; women of color 还见学院派女性主义 ; 高校 ; 女性主义批评 ; 同性恋研究 ; 历史 ; 女同性恋 ; 酷儿理论 ; 跨国主义 ; 有色人种女性
- Woolf, Virginia 伍尔夫, 弗吉尼亚 11, 21, 27—28, 107—131, 164, 223—224, 228, 254—255n.5, 258n.32, 262n.13, 263nn.19, 20, 22, and 26, 264n.28, 265nn.38 and 45, 273n.7 ; *Between the Acts* 《幕间》121, 263n.25, 264n.28 ; *Modern Fiction* 《现代小说》234 ; “Mr. Bennett and Mrs. Brown” 《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120 ; *A Room of One's Own* 《一间自己的房间》13, 70, 125—130, 264—265n.32, 265n.44 ; “Sketch of the Past” 《往事小记》34, 120 ; *Three Guineas* 《三个基尼》118, 119, 121, 125, 129, 186, 260n.44, 262—263n.15, 272—273n.3 ; *To the Lighthouse* 《到灯塔去》13, 120—130, 164, 265n.36 ; *The Voyage Out* 《远航》119, 263n.20, 264n.30, 264n.31
- Wordsworth, William 华兹华斯, 威廉 230
- Wu, Yung Hsing 吴勇兴 31, 248n.27
- Yaeger, Patricia 耶格尔, 帕特里夏 189, 194, 245n.4, 246n.9
- Yeatman, Anna 耶特曼, 安娜 244n.10, 261—262n.9
- Yeziarska, Anzia 叶齐尔斯卡, 阿齐亚 49
- Young, Robert J. C. 扬, 罗伯特 83, 92—93, 97, 102, 258n.27
- Zimmerman, Bonnie 齐默尔曼, 邦妮 207—208, 226

# 人文与社会译丛

## 第一批书目

- 1.《政治自由主义》(增订版),[美]J. 罗尔斯著,万俊人译 48.00 元
- 2.《文化的解释》,[美]C. 格尔茨著,韩莉译 24.50 元
- 3.《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法]B. 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35.00 元
- 4.《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德]A. G. 弗兰克著,高铨等译 13.60 元
- 5.《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美]F. 兹纳涅茨基、W. I. 托马斯著,  
张友云译 9.20 元
- 6.《现代性的后果》,[英]A. 吉登斯著,田禾译 22.00 元
- 7.《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美]M. 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 14.20 元
- 8.《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下册),[英]E. P. 汤普森著,  
钱乘旦等译 69.00 元
- 9.《知识人的社会角色》,[美]F. 兹纳涅茨基著,郑斌祥译 26.00 元

## 第二批书目

- 10.《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美]D. 克兰著,赵国新译 29.00 元
- 11.《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美]R. M. 昂格尔著,吴玉章等译 39.00 元
- 12.《后形而上学思想》,[德]J.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35.00 元
- 13.《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美]M. 桑德尔著,万俊人等译 30.00 元

- |                                  |        |
|----------------------------------|--------|
| 14.《临床医学的诞生》,[法]M.福柯著,刘北成译       | 25.00元 |
| 15.《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英]J.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  | 42.00元 |
| 16.《俄国思想家》,[英]I.伯林著,彭淮栋译         | 35.00元 |
| 17.《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加]C.泰勒著,韩震等译 | 88.00元 |
| 18.《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29.00元 |
| 19.《现代性与大屠杀》,[英]Z.鲍曼著,杨渝东等译      | 28.00元 |

### 第三批书目

- |                                       |        |
|---------------------------------------|--------|
| 20.《新功能主义及其后》,[英]J.亚历山大著,彭牧等译         | 15.80元 |
| 21.《自由史论》,[英]J.阿克顿著,胡传胜等译             | 58.00元 |
| 22.《伯林谈话录》,[英]L.贾汉贝格鲁等著,杨慎钦译          | 23.00元 |
| 23.《阶级斗争》,[法]R.阿隆著,周以光译               | 13.50元 |
| 24.《正义诸领域: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美]M.沃尔泽著,褚松燕等译 | 24.80元 |
| 25.《大萧条的孩子们》,[美]G.埃尔德著,田禾等译           | 27.30元 |
| 26.《黑格尔》,[加]C.泰勒著,张国清等译               | 88.00元 |
| 27.《反潮流》,[英]I.伯林著,冯克利译                | 48.00元 |
| 28.《统治阶级》,[意]G.莫斯卡著,贾鹤鹏译              | 68.00元 |
| 29.《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德]J.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        | 36.00元 |

### 第四批书目

- |                                 |        |
|---------------------------------|--------|
| 30.《自由论》(修订版),[英]I.伯林著,胡传胜译     | 38.00元 |
| 31.《保守主义》,[德]K.曼海姆著,李朝晖、牟建君译    | 16.00元 |
| 32.《科学的反革命》(修订版),[英]F.哈耶克著,冯克利译 | 28.00元 |

- |                                 |         |
|---------------------------------|---------|
| 33.《实践感》,[法]P.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 52.00 元 |
| 34.《风险社会》,[德]U.贝克著,何博闻译         | 17.70 元 |
| 35.《社会行动的结构》,[美]T.帕森斯著,彭刚等译     | 80.00 元 |
| 36.《个体的社会》,[德]N.埃利亚斯著,翟三江、陆兴华译  | 15.30 元 |
| 37.《传统的发明》,[英]E.霍布斯鲍姆等著,顾杭、庞冠群译 | 21.20 元 |
| 38.《关于马基雅维里的思考》,[美]L.施特劳斯著,申彤译  | 25.00 元 |
| 39.《追寻美德》,[美]A.麦金太尔著,宋继杰译       | 35.00 元 |

### 第五批书目

- |                                   |         |
|-----------------------------------|---------|
| 40.《现实感》,[英]I.伯林著,潘荣荣、林茂译         | 30.00 元 |
| 41.《启蒙的时代》,[英]I.伯林编著,孙尚扬、杨深译      | 35.00 元 |
| 42.《元史学》,[美]H.怀特著,陈新译             | 55.00 元 |
| 43.《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英]J. B. 汤普森著,高铨等译 | 45.00 元 |
| 4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加]J.雅各布斯著,金衡山译    | 29.50 元 |
| 45.《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美]R. K. 默顿著,唐少杰等译 | 48.00 元 |
| 46.《黑皮肤,白面具》,[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4.00 元 |
| 47.《德国的历史观》,[美]G.伊格尔斯著,彭刚、顾杭译     | 58.00 元 |
| 48.《全世界受苦的人》,[法]F.法农著,万冰译         | 17.80 元 |
| 49.《知识分子的鸦片》,[法]R.阿隆著,吕一民、顾杭译     | 45.00 元 |

### 第六批书目

- |                                |         |
|--------------------------------|---------|
| 50.《驯化君主》,[美]H. C. 曼斯菲尔德著,冯克利译 | 28.00 元 |
| 51.《黑格尔导读》,[法]A.科耶夫著,姜志辉译      | 45.00 元 |
| 52.《象征交换与死亡》,[法]J.波德里亚著,车槿山译   | 45.00 元 |
| 53.《自由及其背叛》,[英]I.伯林著,赵国新译      | 25.00 元 |



- 54.《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英]I.伯林著,马寅卯译(即出)
- 55.《运动中的力量》,[美]S.塔罗著,吴庆宏译 23.50 元
- 56.《斗争的动力》,[美]D.麦克亚当、S.塔罗、C.蒂利著,李义中等译  
31.50 元
- 57.《善的脆弱性》,[美]M.纳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 55.00 元
- 58.《弱者的武器》,[美]J. C.斯科特著,郑广怀等译 42.00 元
- 59.《图绘》,[美]S.弗里德曼著,陈丽译 49.00 元

### 第七批书目

- 60.《现代悲剧》,[英]R.威廉斯著,丁尔苏译 18.00 元
- 61.《论革命》,[美]H.阿伦特著,陈周旺译 25.00 元
- 62.《美国精神的封闭》,[美]A.布卢姆著,战旭英译,冯克利校 35.00 元
- 63.《浪漫主义的根源》,[英]I.伯林著,吕梁等译 28.00 元
- 64.《扭曲的人性之材》,[英]I.伯林著,岳秀坤译 22.00 元
- 65.《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美]P.查特吉著,范慕尤、杨曦译  
18.00 元
- 66.《现代性社会学》,[法]D.马图切利著,姜志辉译 32.00 元
- 67.《社会政治理论的重构》,[英]R.伯恩斯坦著,黄瑞祺译 25.00 元
- 68.《以色列与启示》,[德]E.沃格林著,霍伟岸、叶颖译 48.00 元
- 69.《城邦的世界》,[德]E.沃格林著,陈周旺译 54.00 元
- 70.《历史主义的兴起》,[德]F.梅尼克著,陆月宏译 48.00 元

### 第八批书目

- 71.《环境与历史》,[英]W.贝纳特、P.科茨著,包茂红译 25.00 元
- 72.《人类与自然世界》,[英]K.托马斯著,宋丽丽译 35.00 元

- |                               |        |
|-------------------------------|--------|
| 73.《卢梭问题》,[德]E.卡西勒著,王春华译      | 15.00元 |
| 74.《男性气概》,[美]H. C. 曼斯菲尔德著,刘玮译 | 28.00元 |
| 75.《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美]R. 塔克著,罗炯等译  | 25.00元 |
| 76.《谁统治美国》,[美]W. 多姆霍夫著,吕鹏、闻翔译 | 35.00元 |
| 77.《健康与社会》,[法]M. 德吕勒著,王鲲译     | 35.00元 |
| 78.《读柏拉图》,[德]T. A. 斯勒扎克著,程炜译  | 28.00元 |
| 79.《苏联的心灵》,[英]I. 伯林著,潘永强、刘北成译 | 28.00元 |
| 80.《个人印象》,[英]I. 伯林著,林振义、王洁译   | 35.00元 |

### 第九批书目

- |  |        |
|--|--------|
| 81.《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法]B. 斯蒂格勒著,赵和平、印螺译 | 25.00元 |
| 82.《抗争政治》,[英]C. 蒂利著,李义中译               | 28.00元 |
| 83.《亚当·斯密的政治学》,[英]D. 温奇著,褚平译           | 21.00元 |
| 84.《怀旧的未来》,[美]S. 博伊姆著,杨德友译             | 38.00元 |
| 85.《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丹]E. 博斯拉普著,陈慧平译      | 30.00元 |
| 86.《风景与认同》,[英]W. J. 达比著,张箭飞、赵红英译       | 35.00元 |
| 87.《过去与未来之间》,[美]H. 阿伦特著,王寅丽、张立立译       | 28.00元 |
| 88.《大西洋的跨越》,[美]D. T. 罗杰斯著,吴万伟译         | 58.00元 |
| 89.《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法]L. 博尔坦斯基、E. 希亚佩洛著,高铨译 | 58.00元 |
| 90.《比较的幽灵》,[美]B. 安德森著,甘会斌译             | 48.00元 |

### 第十批书目

- |                           |        |
|---------------------------|--------|
| 91.《灾异手记》,[美]E. 科尔伯特著,何恬译 | 25.00元 |
|---------------------------|--------|

- 92.《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法]B. 斯蒂格勒著,方尔平译 32.00 元
- 93.《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英]S. H. 里格比著,吴英译 47.00 元
- 94.《学做工》,[英]P. 威利斯著,秘舒、凌旻华译 39.00 元
- 95.《哲学与治术:1572—1651》,[美]R. 塔克著,韩潮译 45.00 元
- 96.《认同伦理学》,[美]K. A. 阿皮亚著,张容南译 45.00 元
- 97.《风景与记忆》,[英]S. 沙玛著,胡淑陈、冯樾译 78.00 元
- 98.《马基雅维里时刻》,[英]J. G. A. 波考克著,冯克利、傅乾译 68.00 元
- 99.《未完的对话》,[英]以赛亚·伯林、[波]B. P. -塞古尔斯卡著,杨德友译 38.00 元
- 100.《后殖民理性批判》,[印]G. C. 斯皮瓦克著,严蓓雯译(即出)

## 第十一批书目

- 101.《现代社会想象》,[加]C. 泰勒著,林曼红译 25.00 元
- 102.《哲学解释》,[美]R. 诺齐克著,林南、乐小军译(即出)
- 103.《风景与权力》,[美]W. J. T. 米切尔著,杨丽译(即出)
- 104.《根本的恶》,[美]R. 伯恩斯坦著,王钦、朱康译(即出)
- 105.《这受苦的国度》,[美]D. G. 福斯特著,张聚国、孙宏哲译(即出)
- 106.《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美]埃里克·沃格林著,刘曙辉译(即出)
- 107.《美国生活中的同化》,[美]M. M. 戈登著,马戎译(即出)
- 108.《论个体主义》,[法]L. 迪蒙著,桂裕芳译(即出)
- 109.《第二人称观点》,[美]S. 达沃尔著,章晟译(即出)
- 110.《宗教与巫术衰落》,[英]K. 托马斯著,芮传明、梅剑华译(即出)

有关“人文与社会译丛”及本社其他资讯,欢迎点击 [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 浏览,对本丛书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新浪微博@译林-人文与社会。